

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

上编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

自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中国面临瓜分危机以来，直到 1900 年义和团反瓜分的爱国主义运动全面爆发的这段时期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简单地说起来，我们可以把它们概括为帝国主义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时期，或者说是他们力图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时期。这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瓜分的救亡图存时期，所谓“举世的风暴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就是指这段时期来说的。这段时期，从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来说，是他们对华“抢夺让与权”（the Scramble for Concessions）的时期；从帝国主义列强本身的竞争来看，是他们在华的“让与权争夺战”（the Battle of Concessions）时期；从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的关系方面来考察，则是清政府在基本上听任他们侵略、予取予求的“受制于人的时期”（the Period of Subjection）。

这段时期，为时不过六七年，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衡量本来就是极短的；但是，就其影响和意义来评论，却是极端重要的。无论我们从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还是从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如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这段通过“抢夺让与权”来瓜分中国时期的历史更表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不仅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并且是最终要把中国由半殖民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这段形成义和团反瓜分爱国运动真实背景时期的历史无可置疑地表明，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因此，这段时期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且在整个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都是极端重要的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

在世界近代史上，“1894—1900 年的中国危机”（the 1894—1900 crisis in Chinese Affairs）或所谓的“中国问题”，即瓜分中国的问题，业已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头等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段时期中的“中国问题”会成为世界史上“国际关系中头等重要的问题”呢？这是由于中国本身是一个幅员广大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它拥有“四百万平方英里以上的土地和人类五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因此，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来说，中国一方面成为他们谁都想来“咬上一口”的“最大的一块骨头”；另一方面又成为他们彼此间拼命争夺的对象，形成了 19 世纪列强在华“让与权争夺战”的高潮。一时间，“中国问题”几乎成为世界政治中首屈一指的问题，全世界所有主要的

穆恩：《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1942 年英文版，第 321 页。

马士、宓亨利合著：《远东国际关系史》，1931 年英文版，第 422 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1927 年英文版，第 64 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1918 年英文版，第 3 页。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622 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1928 年英文版，第 419 页。

罗德津斯基：《中国史》第 1 卷，1979 年英文版，第 347 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1928 年英文版，第 27 页。

帕尔默、科尔顿：《近代世界史》，1964 年英文版，第 649 页。

帝国主义列强几乎都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远东来了。

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史上，在这段时期中出现了包括各阶级的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再接再厉的救亡图存的斗争。除了义和团运动及其前身反洋教斗争以外，还包括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包括了清政府统治阶级中的抵抗派官员和清军中的爱国官兵；他们的斗争在大部分情况下虽说是各不相谋，但他们的目标却都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当时，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数十年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中国必须被瓜分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广泛的反帝爱国斗争，不论其规模大小，或成或败，在抵制瓜分危机上都是起了作用的。最后，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各阶段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终于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径；拳民战斗的丰功伟绩，极端重要，挽救了中国的危亡。

为了认识这段重要的历史时期，明白它的来龙去脉，我们需要追溯一下 19 世纪末叶的历史，陈述一下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之失败而俱来的瓜分危机，以及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让与权争夺战”如何导致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灾难——瓜分狂潮的到来。这些问题，我们就在上编的各章中依次一一作些具体论述。第一章 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与分割世界的斗争之加剧

1870 年，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分期问题上，是一个十分明显的分水岭。在此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代，是迅速摧毁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时代”；在此以后，则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

什么是帝国主义？列宁于 1916 年在他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曾经指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个定义是特别适用于 19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初期正在进行瓜分世界斗争的帝国主义时代的；而这样一个垄断阶段则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业已发展到很高程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乃是 1870 年以来，即西方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中所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它是相对于 1770—1870 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来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在钢铁工业方面是一系列新式炼钢法的出现，如酸性转炉法、平炉法和碱性转炉法等等，特别是 1875 年发明的碱性转炉法，“这才有可能以极小的误差控制钢铁生产中的含碳量，从而开创了钢铁时代”。在电力方面，19 世纪 80 年代建立了第一批商业性的发电站，“电的应用使精确的控制成为可能，从而为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工业所依赖的完备的机械化创造了条件”。在化学工业方面，“则是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才开始”有“独立的、规模巨大的化学工业”。在石油方面，“大量的石油蕴藏是于一八五九年首先在宾夕法尼亚发现的，一八七一年成立了美孚石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58 页。

《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25 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808 页。

马格多夫著，伍仞译：《帝国主义时代》，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25 页。

油公司”，后来“在工业和运输业中把石油用作燃料”。这些科学技术上的新发展对于加速资本主义垄断化的过程是起了重大的作用的。随着垄断组织统治的逐步确立，银行和工业也逐步溶合起来或混合生长，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即金融资本。在金融资本形成的过程中，资本输出的作用加强了，国际垄断联合组织也出现了，它们为分割世界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因此，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实质上就是“金融资本时代”。

马格多夫著，伍仞译：《帝国主义时代》，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24—25 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768 页。

同上书，第 810、778 页。着重点系原书所有。

第一节 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1871—1900年）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是过渡到帝国主义新时代的时期”。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1870年是“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政策开始的一年”；这个“有意识的帝国主义政策”，基本上指的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扩张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政策。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使19世纪末叶从1871—1900年的30年间成为“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甚至连成吉思汗的征服也是不能同它相提并论的”；这是世界史上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代”。

根据一项统计，“从一八七一年至一九 年的三十年中，英国增添了四百二十五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六千六百万的人口，法国增添了三百五十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两千六百万的人口，俄国在亚洲增添了五十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六百五十万的人口，德国增添了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一千三百万的人口；甚至像比利时这样的小国也取得了九十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八百五十万的人口”。总计起来，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这30年中一共掠夺了居住着12000万人口的101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按1平方英里等于2.589平方公里折算，这片土地的面积就相当于2628万平方公里，与我国今天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相比较，只不过占它的36.5%左右。范围之大，可想而知。

当时，主要的欧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都为他们在非洲、亚洲和许多海岛上建立起他们的殖民地帝国。特别是在非洲，“在七十年代，全部土地有百分之十点八属于欧洲列强；不到三十年，在一九 年，欧洲各国在非洲的领土已经占大陆全部领土的百分之九点四了。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已经完毕”。

为什么从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新时代的过渡时期会成为“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呢？

首先，就其主要的直接原因来说，这是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金融寡头对市场、投资和原料资源的需求所导致的。他们生产的大量商品需要有销售市场，他们的过剩资本需要有投资出路，他们工业生产的原料资源则需要世界各地来提供；因此，他们就迫切地要求扩张殖民地来作为他们的“受保护的市場”、安全的投资地和有保障的原料供给地区。所以，“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特别是资本在国内积累越多，利润就越是下降，于是对有利可图的国外投资的要求也就愈来愈大。当时，“在先进的国家里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假如资本主义能发展现在到处都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农业，假如资本主义能提高在今天这种技术惊人进步的情况下仍然到处是半饥半饱、乞丐一般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那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93页。

霍布森著，纪明译：《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页。

斯塔夫里扬诺斯：《一五 年以来的世界史》，1971年英文版，第235页。

斯塔夫里扬诺斯：《一五 年以来的世界史》，1971年英文版，第203页。

同上书，第235—236页。

古贝尔主编，北京编译社译：《世界通史》第7卷上册，三联书店1975年版，第272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95页。

当然不会有什么过剩资本了。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人，就常常提出这种‘论据’。但是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因为发展不平衡和民众的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

其次，就国际政治来说，这是当时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拼命争夺殖民地的结果。列宁指出：“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占统治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的时期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现在我们又看到，正是在这个时期以后，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向金融资本的过渡，是同分割世界的斗争的尖锐化联系着的。”“在十九世纪末，特别是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拼命争夺殖民地，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因为，“只有占领殖民地，才能充分保障垄断组织获得胜利，战胜同竞争者斗争中的各种意外事件，直到战胜敌方打算用国家垄断法来实行自卫这样的意外事件”。“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来源，而且可能发现的原料来源，都是有意义的”；因此，金融资本“总想尽量夺取更多的土地，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

其三，就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政治来说，他们的统治阶级的政治领袖认为：为了避免内战，就应当占领新的领土，建立殖民帝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必然产生严重的阶级分化。拿英国来说，早在19世纪中叶，富人与贫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生活方式上的差别已经俨如“两个民族；在他们之间没有交往，也没有同情；他们不知道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好像他们是地球上不同地带的居民，又好像是不同的行星上的住户一样；他们好像是由不同的教育培养出来、用不同的食物来养大，以不同的风俗习惯来安排生活、并且不受同一个法律管辖似的”。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英国宪章运动爆发的一个真实的背景。到了19世纪末，公开鼓吹和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罗得斯（Cecil Rhodes）说：“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充满‘面包！面包！’的呼声的粗野的发言。回家时，我把看到的情形思考了一番，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的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出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主义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罗得斯这番话表明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政治根源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侵占殖民地的时代里，帝国主义

同上书，第783页。

同上书，第798页。着重点系原书所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02—804页。

迪斯雷利：《西比尔或两个民族》（*Sybil or the Two Nations*），1895年英文版，第74页。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6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99页。

者还利用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关于动植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的学说，把它直接搬运到人类社会中来替他们的侵略暴行辩护、即我们后来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他们利用达尔文关于动植物界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学说，断言在人类社会中有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的区别；他们根据适者生存的原则，认为只有强者和适者才能在生存竞争中保存下来，而弱者则只有灭亡，优等种族应成为劣等种族的天然统治者，劣等种族应被淘汰；他们声称，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生存和繁荣，殖民地是非常必要的，那里的“土著”都是脆弱的和低劣的，他们需要优秀强大的欧洲人的保护和指导。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崇尚武力、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时代。能生存的适者是最强大的；他之所以最强大，因为他是胜利者；而最终决定谁胜谁负则取决于武力和战争。正如那个自命为近代帝国主义诗人的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说：“谁有强权，谁该掠夺；谁能掠夺，谁也就该占有。”另一个英国作家贝洛克（Hilaire Belloc）在关于帝国主义侵占殖民地的问题上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说：“不管什么情况发生，我们有的是马克沁机关枪，而他们却没有。”帝国主义认为，要征服殖民地“土著”的反抗，连发来复枪的威力是足够的了。

当时，帝国主义者还有一个掠夺殖民地的借口，就是传播“现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对此，英国人的说法是‘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法国人的说法是‘他们的文明使命’（their mission civilisatrice），德国人的说法是‘传播文化’（diffusing kultur），美国人的说法则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保护下的幸运’（the blessings of Anglo-Saxon protection）。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流行的人类学教导人们说，白种人是‘适者’，或者说是具备着比有色人种更多的天赋（more gifted）”。这样一来，帝国主义者似乎更可以大喊大叫地去侵略，明目张胆地去犯罪并自以为是传播“现代文明”的“十字军”了。

实际上，这些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暴行作辩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其目的说是十分反动的，就其方法来说也是反科学的。它把生物学的规律机械地搬到人类社会领域，把自然科学的一般概念作为科学标签贴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其结果就是用“生物学的词句曲解历史唯物主

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他的巨著《物种起源于自然选择或生存竞争中占优势的品种的保存》与《人类由来和性选择》分别于1859年和1871年出版。

按“土著”（natives）一词，汤因比认为：“当我们西方人把别人唤作‘土著’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在我们的观念里把他们的文化特色暗中抹杀了。我们把他们看成是充斥当地的野兽，我们只是碰上了他们，同碰上了当地的动物和植物一样，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是同我们一样具有感情的人。只要我们把他们当作‘土著’来看，我们就可以消灭他们，或是（在今天也许更可能这样）驯化他们，而且还认真地相信（也许并不是完全错的）我们是在改良品种，但是我们却一点也不了解他们”（汤因比著，曹未风译：《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把异族社会的成员贱称为‘土著’，这是得势者武断认定失势者完全没有政治和经济的地位从而否认他们的人性。得势者把他们叫作‘土著’，也就是无形中把他们看与未开垦的新大陆的非人类的动物或植物一样，而这种新大陆是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和占领的。在这一前提下，这些动植物简直就可以被视为需要根除的虫虱野草，或被当做自然资源而予以保存和利用”（汤因比著，曹未风译：《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页）。

斯塔夫里扬诺斯：《一五〇〇年以来的世界史》，1971年英文版，第203页。

帕尔默、科尔顿：《近代世界史》，1964年英文版，第622页。

义”。“事实上，依靠这些概念是不能对社会现象作任何研究，不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任何说明的”。如今，这个自欺欺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荒谬性，业已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特别是殖民地、保护国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历史所充分证实。

第二节 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传教活动在殖民地掠夺中的作用

如所周知，义和团反瓜分运动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统治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而这种反抗在当时又是以“反洋教运动”来作为它的主要斗争形式。为此，我们就需要弄清楚以下几个问题：即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利用传教活动来掠夺殖民地的？传教活动在他们的殖民地掠夺中发挥了一种什么样的特殊作用？它在其殖民地掠夺政策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事实上，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基督教教会进行不断增加的传教活动的时代”。“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拉维热里创建了白袍僧；一八八五年剑桥大学赴华传教团成立；随后，全世界的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团成倍地增加。到了一九〇〇年，基督教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传教团体的人数，可以同任何一个大国驻海外的武装力量相比，共有四万一千余名天主教士，一万八千余名新教教士，二千余名东正教教士（以上数字均包括当地的教士）”。就这个数字来说，帝国主义传教活动的队伍真可算得是他们海外驻军之外的另一个方面军了。当时流传着一个神话，“这个十九世纪的重要神话就是‘西方基督教的神话’。那时的传教士们都相信这个神话，并且希望西方文明的扩张（即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张——引者）会为西方基督教王国的到来开辟道路”。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早已利用传教活动来作为他们掠夺殖民地的工具。那么，他们是怎样来利用这个传教活动的呢？在他们看来，传教士乃是他们在其掠夺殖民地过程中所必需首先派出的尖兵或先锋队。在对某个地区进行军事侵略或武装占领之前，他们的传教士早就到那个地区安家落户了。比如说，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马理逊（Dr. Robert Morrison）远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32年，即1807年就被派遣来到广州，成为新教“最先居住在中国的传道者”。此后，郭士立（Gutzlaff, Karl F. A.）、裨治文（Bridgman, Rev. Dr. Elija C.）等教士亦相继来到。在非洲，传教士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于1841年就达到南非，并深入非洲内地，成为“第一个看到维多利亚瀑布的白种人”。

这些手持《圣经》，口颂“福音”的人，果真是像教会所宣传的那样，是“下士之功修，无与于大廷之政术”的吗？显然不是的。就其结果而论，无论在侵略战争中还是在占领殖民地中，这些传教士的作用都极为重要。在非洲，“在扩大英国殖民地方面，有一个团体比其他任何人有更多的贡献，那就是传教士利文斯敦（David Livingstone）和莫发特（Moffatt）等人所进行的工作”。在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在整个战争中的功绩，是无论评价得多

欣斯利主编，丁钟华等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马尼卡姆：《教会在全世界传教活动中的一个新时代》，转引自维尔特：《以中国为例说明帝国主义的海外政策与教会政治》，1968年德文版，第13页。

贾立言：《基督教史纲》，上海广学会1940年第12版，第416页。

帕尔默、科尔顿：《世界近代史》，1964年英文第2版，第637页。

林乐知等汇译：《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卷下，《美轺载笔》，第28页。

诺尔斯著，袁绩藩译：《英国海外经济史》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6页。

么高也是不会过分的”。正是“在这个浩瀚的欧洲扩张的史诗中，扮演了显著角色的不仅有军人、商人和行政人员，并且还有传教士”。

传教活动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掠夺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特殊作用，才使得传教士扮演了如此显著的角色呢？

第一，传递信息、提供情报的作用。西方列强在其掠夺殖民地或对某一个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首先要知道对方的人情风俗，山川形势以及它的历史和现状、它的语言和文字等等，这些都非有人亲历其境、久居其地、并同本地居民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和往来是作不到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他们的殖民地掠夺政策中的一个根本战略问题，而要把这个战略付诸实践，自以传教士为最适当的人选。比如说，要侵入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认识它的语言文字乃是了解它的情况的重要途径之一；不过，这在当时的确是一项极困难的任务。“人要学会中文，身体须铜造，肺腑须铁制，橛为头，钢簧为手，有鹰儿的眼，使徒的心，马士撒拉的长寿”才行；一旦在他们掌握了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后，平时就能走私鸦片，战时更能大显身手了。作翻译、搞情报、起草条约等等，都是由这些传教士们一手担当起来的。

第二，传教士起到了麻醉人民、文化侵略的作用。西方列强在其向全世界扩张势力的过程中，总是一手拿着洋枪洋炮，一手拿着橄榄枝，文武并举，双管齐下的。传教活动的妙用，正在于它替虎狼之心蒙上了一层美丽的画皮。传教士在当时虽以掠夺殖民地为其终极目标，却打着“劝人行善”的旗号，把它作为口头禅以奔走于全球各地。“虽如坎拿大苦寒之境，赤道下酷热之乡，与夫印度国全境、阿非利加洲南角各土人、太平洋中西印度黑人，虽人极蛮悍而无礼，地极寒暑之不调，亦皆有传教之士托迹其间；盖谓若辈习于为恶，以无导之为善者耳。我辈惟竭诚尽瘁以与之更始，彼各国互相友善，以共学仁爱之天心也”。所谓传教活动的四大支柱：传道、医药、出版、学校与教育，正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的实施，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拿一个比较为人所熟知，并以编著宗教小册子《劝世良言》闻名的中国教民梁发来说，他在1816年入教，在1823年被马理逊封立为传教士，由伦敦布道会直接支发薪金，成为受毒极深的一个中国人。他无耻咒骂“中国人恶贯满盈”，不让他的儿子“为中国人办事，而希望他改在外人处觅一书记、翻译员或行员的位置”，致使他们“家中之非基督徒工人咸讥谤彼为背弃历代祖宗所信宗教之人且为卖国奸贼”。传教士通过文化侵略，麻醉人民精神的作用来吸收像梁发之流的教民以后，就有了一批受其愚弄的当地人来供驱使，这在殖民地掠夺中是能起到“炮舰政策”无论如何也起不到的巨大作用的。因此，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教会的整

柏纳德：《复仇神号轮船航行作战记》第1卷，1844年英文版，第380页。

伯里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0卷，1960年英文版，第8页。

《孙子·谋攻》篇。

清洁理：《马里逊小传》，上海广学会1948年第4版，第60页。按马士撒拉（Methuselah）是一位在传说中享有969岁高龄的老年人，见《圣经》《创世纪》第5章27节。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5页。

马恩西著，李提摩太译：《泰西新史揽要》卷四，上海广学会1895年版，第4页。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24页。

麦沾恩著，胡簪云译：《梁发》，上海广学会1948年第4版，第121、38页。

个活动几乎都可以被称为是西方的第五纵队”了。

第三，在传教活动开展以后，传教士就能逐步形成以教堂作为侵略的根据地并发挥其“教会政治”的作用。一般说来，西方列强在当时以军事侵略的手段打开一个国家的门户以后，在他们所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不仅要把沿海沿江的城镇划作“条约口岸”进行通商，并且还要允准他们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虽穷乡僻壤、山高林密之区，亦所不辞。传教士们可以到处租买田地，发展教民，建立教堂。由于他们拥有治外法特权，使他们和教民都不受当地政府的管辖；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有列强“炮舰政策”的充分支持，使他们在实际上成为其所在地区的当权者和统治者。在中国，“自准西人传教以来，直省天主、耶稣等教堂日增月益，几于无处无之”；“西洋教法盛行中国，天主、福音等堂几遍天下，虽至穷乡僻壤，皆有各国教士潜往传教”。这些“无处无之”、“几遍天下”的教堂，都是在西方列强“保护之下广泛散布在中国各地的独立王国”，“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一句话，这些教堂就是所谓“国中之国”的侵略根据地；在那里，由传教士导演的“教会政治”（Die Missionpolitik）充分地发挥了作用。教会政治既包括了传教士及其组织本身的政治活动能量，又包括了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对传教士的利用，直到作为军事干涉的借口。因此，所谓教会政治，实质上就是殖民政治，为掠夺殖民地而斗争的政治；它撕破了“劝人行善”的画皮，暴露了它本来的狰狞面目。为了殖民地掠夺，传教士不仅对当地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并且在他们之间也大动干戈。他们“公然教人仇杀”，在中国制造了无数次的“教案”，成为“野心侵略者之武器”。

在乌干达，“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和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都传布着一种那么厉害地充满了拿破仑精神的基督教”，以致在首都门戈，两派传教士为了争夺殖民地而动武，血流漂杵，到处都“凌乱地堆满了死去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以致人们很难把他们同旧制度下完全不信教的军人区别开来”。传教士正是“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

传教活动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掠夺政策中，由于他们曾经发挥了列强在军事、政治以及经济侵略方面所不能起到的特殊作用而占有一个十分突出和极端重要的地位，在整个19世纪中都是如此，到了最后30年，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基督教各差会充当着

维尔特：《以中国为例说明帝国主义的海外政策与教会政治》，第12页。

《山东泰安县知县秦应逵禀》（1885年10月8日），见王明伦：《反洋教文书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369页。

《川东道张华奎禀》（1891年6月6日），见王明伦：《反洋教文书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331—332页。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1929年英文版，第279页。

《清政府给各国议办传教节略》（1872年8月20日），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二，第166页。
卫三畏：《中国总论》第2卷，1883年英文版，第659页。

维尔特：《以中国为例说明帝国主义的海外政策与教会政治》，第14页。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四），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10964—10965页。

韦尔斯：《世界史纲》，1930年英文版，第985—986页。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4页。

那些注定要改变这个世界面目的列强势力的首要代表”，因为它们毕竟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里建立了“基督教殖民制度（DasChristliche Kolonialsystem）。在这个制度下，“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全世界一切地区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行为和不顾死活的迫害，乃是人世间任何时代、任何其他入种，不论他们多么残忍、多么无知，也不论他们多么狠心和无耻，都是无法跟基督教人种相比拟的”。因此，义和团反瓜分运动实质上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基督教殖民制度”的运动；它之所以采取“反洋教运动”来作为它的主要斗争形式，在当时看来不仅是理解的，并且还是非常必要的。

马恩西：《泰西新史揽要》，1896年英文14版，第208页。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年英文版。马克思认为，作者豪伊特是“一个由于对基督教虔诚而非常出名的人”。

第三节 中国的边疆危机和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我们在上面谈到，19世纪70—90年代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同时又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积极发展传教活动来掠夺殖民地的时代。这两点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前的中国近代史上不是没有反映的。前者反映的是中国在那些年代中所发生的边疆危机，后者则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在中国近代史上，1860年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中外关系方面是划时代的，它结束了在此以前的“冲突时期”而进入到在此以后30多年，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为止的所谓“屈从时期”。西方列强英、法、俄、美等国从结束这次战争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取得了进行政治、经济和宗教侵略等各方面的特权，使“中国主权的任何痕迹，在各项条约规定的界线之内都被一扫而光”；“现在是西方列强把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时候了”。这就是说，“到了一八六一年，中国已经几乎完全处在西方侵略者的摆布之下”。在此前后，中国正处于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革命之际；一个西方作者写道：当时“满清皇朝之所以在中国当权，既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精力充沛，也不是由于它的臣民效忠，而是由于列强曾经决意要它蝉联下去的这个事实。否则满洲人也许会不能苟全于太平起义之中了”。西方列强之所以决心要清皇朝蝉联下去，一是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经处于它们的势力控制之下；二是它们需要借助于它来镇压中国人民起义。因为反侵略、反封建的中国人民起义，不仅对于清朝封建统治者，同时对于外国侵略者都可以说是“心腹之害”，而统治者与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则不过是“肘腋之忧”和“肢体之患”罢了。西方列强这个“胁各官以制百姓，胁朝廷以制官民”的目的，其原因在于它们“所畏者民”，“自知非仗朝命，无以制中国之民，图中国之利”。这样的狼狈为奸，彼此都是心照不宣的。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才非常明显而具体地开始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如所周知，战后的“屈从时期”乃是中国近代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这个在中外关系史上的所谓“屈从”，对于清皇朝来说是正确的，对于包括了清政府中抵抗派文武官员的中国人民来说，则是荒谬的。他们在边疆危机和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中所反映出来的不屈不挠、英勇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大家所公认的。

我国的边疆危机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主要有1871年7月俄国派军占领我国西北重镇伊犁、1874年5月日军在美国支持下侵略我国东南海疆重地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1918年英文版，第5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1910年英文版，第617页。

莫瓦特主编，丁钟华等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第2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6页。

丹涅特著，姚曾虞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50页。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七一卷，第18页。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五五卷，第9页。

同上书第五四卷，第13页。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26页。

台湾以及 1879 年日军侵占琉球,从 70 年代起直到 80 年代的英国企图从缅甸侵入云南,引起了 1875 年的马嘉理 (A.R.Margary) 事件,签订了《烟台条约》,法国则通过占领越南,向我国西南边疆入侵等等。他们都是企图从中国版图上打下一个缺口,蚕食鲸吞,事先强占一个据点或一块地方,照法国殖民主义狂热分子安邨 (Francis Garnier) 的说法就是,“在将来这个广大帝国瓦解或瓜分时,可能作为侵略的前锋”。所幸有左宗棠西征军于 1878 年初在西北的全面胜利,部分地恢复了幅员辽阔的新疆领土;有刘永福黑旗军于 1873 年 12 月和 1883 年 5 月的两次纸桥之战对法国侵略军的歼灭性的打击,阵斩法军统帅安邨、李维业 (Henri L.Rivière) 等人,使“法人寝谋,不敢遽吞越南者,将逾一纪”;有冯子材将军于 1885 年 3 月在镇南关和谅山等地对法国侵略军的巨大胜利,统帅尼格里 (Négrier) 受重伤,法军狼狈溃逃,“几使巴黎闹成革命,引起茹费里 (Jules Ferry) 内阁的突然倒塌”,从而使法国“由交易所投机家操纵的殖民政策破产了”。所有上述这些军事胜利都是中国人民不顾清政府中屈服于西方列强势力的妥协投降派的阻挠才取得的战果,是来之不易的;也只有这些军事胜利才能在保卫我国边疆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使边疆危机在当时没有进一步发展成为瓜分危机。

至于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则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便早已开始。外国教会的侵略基本上都在中国腹地,相对于边疆危机来说,也可以叫作是“内地危机”。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萌芽于鸦片战争以前,而始盛于 60 年代。这是因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和战后,西方列强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之故。当时,英国国会议员、苏格兰著名的政治家和作家厄克特 (David Urquhart) 指出:“英国参加这次战争本身已经是海盗掠夺;英国人也已经不再是基督教徒;他们理应忏悔,理应在他们本国重新建立起真正的基督教以后,才可以把传教士派遣出去。”厄克特深知,“紧跟在军队后面”蜂拥而去中国的传教士决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传教士,而是以传教为名的真正的侵略者。所以,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其结果“实无异于发强军深入内地”。传教士们在当时就已经认为:中国“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他们声称,要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上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要用“基督教占领中国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安邨:《东京问题》,《中法战争》丛刊本第 1 册,第 413 页。

罗惇勳:《中法兵事本末》,《中法战争》第 1 册,第 1 页。

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同上书,第 3 册,第 529 页。

恩格斯:《致倍倍尔》(1885 年 4 月 4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291 页。

厄克特:《致牛津主教的两封信》。转引自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1929 年英文版,第 359 页。

宓克著,严复译:《支那教案论》,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铅印本,第 4 页。

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杨笃信在 1858 年 7 月 30 日的一封信。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6 页。

这是 1868 年 6 月代表清政府赴各国接洽修约的美国外交官蒲安臣在纽约州州长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的发言,见卫斐列:《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派赴外国列强的使团》,1912 年英文版,第 119 页。

按这个词组在外国教会的汉译中作“中华归主”,有时还以此作为书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即当时所称为的“教案”或后来所简称为的“反洋教运动”，就在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占有一个相当显著和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历时最长，分布最广，次数也是最多的。它差不多跨越了整个 19 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并且在基本上遍及全中国各省和各地区，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后一直到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传教士引起的大小教案共达四百余起，大部分是集中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其中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爆发的较为重大的教案计有 1848 年的青浦教案、1856 年的西林教案、1861 年的贵阳教案、1862 年的南昌教案、1865 年的酉阳教案、1868 年的台湾教案和扬州教案、1870 年的天津教案、1874 年的延平教案、1876 年的邻水、江北教案和建平教案、1881 年的济南教案、1882 年的呼兰教案、1886 年的重庆教案、1890 年的大足教案、1891 年的武穴教案和宜昌教案以及 1893 年的麻城教案等等。这些教案大都是传教士横行乡里、凌虐百姓；霸占田产，拐迷人口；包揽词讼、草菅人命；奸淫拷掠、无恶不作 引起来的。在西方列强看来，“强权即公理这个使人遗憾的原则，必须全部严酷地在中国予以实施；否则，就让我们带着我们的全部财产滚蛋罢！”因此，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首先就是对他们骑在人民头上的嚣张气焰和无耻掠夺的迎头痛击，而尤为重要的则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基督教殖民制度”在华的顺利发展，使之不致于发生那种一倒百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以上是我们对中日甲午战争以前的 19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 70 年代以后的中国边疆危机和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的概述。认识这段历史对于我们理解甲午战争中及其以后的形势，对于理解义和团反瓜分运动的爆发是十分必要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人民从这段历史中已经看出，边疆危机是外患之本，教会侵略乃内乱之源，其目的都在于掠夺我国领土。前者使用武力侵占，形迹昭然，不说自明；后者虽有“劝人为善”等各种饰词，但狐狸尾巴终究是掩盖不住的。1873 年 9 月在四川黔江贴出的所谓《大法国使臣告示》说：

“照得天下原属公器，并非一朝之私业。……清朝薄德，已失各省。我国奉天承命，分遣使臣，乘时图治。清朝再三讲和（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几次和谈——引者），请其先行传教，随后择吉禅位。我国王（指拿破仑第三——引者）以仁义治天下，不肯受争夺之名，于是准所请。是以王畿重地，已让我国使臣驻守（即所谓“派本国钦差公使等进京长住”事——引者），矧在外各省尚敢逆天行事，与我国争此土哉！不料黔邑绅民愚顽已极，不识时务，敢与我国抗衡，招集寥寥乡团，竟欲驱逐我国在黔差员（即传教士——引者）出境。是盖孩童气习，若卵与石斗，自取灭亡耳。……本欲调动洋兵，扫平顽梗，不忍不教是怨，尔官民其再思可也。特示。”

这篇告示中的要害问题是同侵略者“争此土”的问题。在传教士看来，黔江已属彼之领土，所以要来此设立教堂；中国人民则根本不承认这套无耻谰言，群起反对，酿成黔江教案，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强意志。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6 页。

参阅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 334—339 页。

高第：《一八六 至一九 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第 1 卷，第 390 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2 卷，第 259 页。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82—83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我们在上面引用的所谓中国“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手中”这句话，在这篇告示中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所以，教案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问题；它虽然被一些鸡毛蒜皮的无数借口弄得混淆不清，但中国人民在斗争实践中是深切体会到了的。

第二，中国人民还看出，边疆危机与教会侵略之间的相互配合、狼狈为奸的作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在我国边疆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同时发动在我国内地的传教士来作内应。中法战争中，1884年11月5日至15日（光绪10年9月18—28日）在云南永北厅的旧坪教堂爆发的教民“反教”、并通过民、教合作，扑灭了教会起兵倡乱的事实，可以拿来作一个典型的说明。教民饶国泰说：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法国的艾司铎来旧坪传教。……本年五月间（一八八四年六月间），艾司铎吩咐在教的人，说是你们奉了天主的教，就是我法国的人。现在大理教堂来信，我法国兴兵到福建越南，都打胜仗，叫彼此接应。将来要用你们，就是报效出头的日子，不可走漏风声。八月间，看见告示，果然开兵。……又见艾司铎发出银子，屯买粮米，调各处习教人来经堂议话。时常有人来，暗中都夹带有军火。九月半间，艾司铎去獐黑、马上各处经堂会商，调齐教民，由旧坪起事。小的……约童成兴于十八日反教，……二十三日，又有几家反教。……二十六日黑早，又有人看见驮来军火三驮，有百多人进教堂去，不见出来。自二十四五两日起，教堂每夜派队查街，俱是佩带洋枪器械，众人惊惶，才商量防备。不料二十八日寅时（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晨），教堂冲出二三百人，喊杀震天，点放枪炮。众人一齐在巷口四面堵御，适教堂军火屋内失火轰燃，他们才败走出去。”

旧坪事变表明，在西方列强向我国进行军事侵略的时候，遍布内地的教堂就可以立即成为他们的武装据点，收内外夹攻之效，完成其作为列强的“第五纵队”的任务。这次事变的失败则表明，饶国泰、童成兴等教民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由他们发难与当地居民合作，就能制止传教士的蠢动，使艾若瑟铎最后只好率部“奔北而逃”。这一点很重要。教民中固然有梁发之流那样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侵略者效劳的走狗，但是也有不少是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的人，他们一旦觉悟，就能反戈一击，变帝国主义的“内应”而成为中国人民的内应。因此，我们在本书中所指的中国人民，不仅包括了抵抗外国侵略的清政府中的文武官员，同时也包括那些爱国的教民在内。否则，所谓天主教民“自法以护教之故，动以兵威相挟，致教民之数骤减五十万人”的现象，就是难以理解的了。

第三，中国人民从这段历史中更看出，屈服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之下的清政府是不可能真正抵抗侵略的。它奉行的妥协投降政策是它本身政治腐化反动的表现，这样的政策即便在19世纪中叶也免不了被动挨打，如在鸦片战争中的情况所显示，更何况这时已经面临过渡到帝国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曾经在边疆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内地也起到了限制教会侵略势力膨胀的作用。这些事实证明，西方

云南：《丽江府云州知州黄毓全等禀》（1885年2月4日），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76—77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云南：《丽江府云州知州黄毓全等禀》（1885年2月4日），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73页。

陈炽：《教民》（1896年5月），同上书，第425页。

列强的侵入浪潮不是不可抵御的。但是，为什么边疆危机却越来越严重，教会势力却越来越嚣张呢？这些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安危，它们是不可能不被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民深长思之的。答案终于在中法战争的过程和结局中最明显地反映出来了。中法战争以两次歼其统帅、一次使其统帅受伤并迫使其内阁倒台的光辉胜利载诸史册，这样的战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在 1885 年 3 月却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法《越南条款》，使法国侵略者“不胜而胜”，中国则“不败而败”，这样的荒谬结局在中国近代史上，甚至在整个世界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样荒谬的结局只能是清政府荒谬的妥协投降政策的结果。面临着如此荒谬的形势，中国人民特别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谋出路了。

这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基本上表现为两派：一派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派；一派则是以康有为为首的，以改革清朝政治为鹄的的维新派。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说：“予自乙酉（一八八五年）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镇南关一战，中国还获胜仗。后来因被法国恐吓，中国才和法国讲和，情愿把安南让与法国。但是刚在讲和之前几天，中国的军队正在镇南关谅山大胜，法国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中国还是求和，法国人便以为很奇怪。曾有法国人对中国人说，‘中国人做事，真是不可思议，就各国的惯例，凡是战胜之国，一定要表示战胜的尊荣，一定要战败的割地赔偿。你们中国战胜之日，反要割地求和，送安南到法国，定种种苛虐条件，这真是历史上战胜求和的先例’。中国之所以开这个先例的原因，是由于满清政府太糊涂。”此后，他同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等人，就大谈其革命言论了；因为“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

至于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则因中法战争受到震动，目睹清政府统治下民不聊生的情境，于 1884 年开始就中西文化作出初步的比较，开始酝酿了他为变法维新制造出整套理论根据的《大同书》的思想。他说：“已而强国有法者，吞据安南，中国救之，船沈于马江，血蹠于谅山，风鹤之警，误流羊城，一夕大惊，将军登陴，城民走迁，穷巷无人。康子避兵，归于其乡”。“耳闻皆勃谿声，目睹皆困苦之形”，“生民之祸烈而救之之无术也！”“苍苍者天，转转者地，不过一大杀场大牢狱而已！”“康子于是起而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球”；“吾既生乱世，目击苦道而思有以救之”。

在以科举为前途的康有为看来，救之之法在于促使清政府变法维新。

中国人民的觉醒，不仅酝酿了义和团反瓜分运动的爆发，并且也成为辛

列宁：《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一书摘录和批注》，第 2 页。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68 页。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册，第 604 页。

胡去非：《总理事略》，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11 页。

康有为：《大同书》。转引自《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89—190、193、196 页。据考证，康有为“这时只有《人类公理》，没有什么《大同书》”，《大同书》是“1901—1902 年所撰”（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5、104 页）。不过，即就《人类公理》所论述的“平等公同”的“大同境界”来看，康氏的变法思想最初也是“兵警羊城”，受中法战争影响的产物。

亥革命和维新运动的嚆矢。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里，屈服于西方列强的清政府在战胜以后尚且“不败而败”；一旦果真战败，那就不堪设想了。瓜分危机之随中日甲午战争以俱来，那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第二章 中日甲午战争与第一次瓜分危机之出现

1894年7月—1895年4月(清光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三月)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一些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庇纵容下,为并吞朝鲜和侵占中国领土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清政府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开辟了列强梦寐以求的瓜分中国的新时期,自此以后直到1900年义和团反瓜分运动全面爆发的6年间,乃是帝国主义列强准备瓜分中国的时期。这场战争实际上决定了“中国泰否通塞之机”。“一八九四年乃是中国问题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的转折点”;“由于日本的胜利在远东所造成的新形势,一个使中国濒临于灭亡的过程开始发动起来了”,也就是说“一八九四年开始了瓜分的过程”。所以,对中国来说,1894年乃是一个“决定性的年代”,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此后6年中,“中华帝国瓦解的前景在政治的地平线上曾经始终是现存的,瓜分不止一次地迫在眉睫”。这也就是严复在其译著的按语中所说的“甲午东事以还,彼族常以部分支那为必至之事”的情景;因此,在中外关系史上,有的西方著作就把1894年标明为清政府由“屈服时期”进入到“受制于人的时期”的一年。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丛刊本,第89页。

怀特:《导言》,见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22—23页。

同上书,第27页。

严复译述,亚当·斯密原著:《原富》(二),第557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5页。

第一节 中日甲午战争为什么成为列强瓜分中国的起点

为什么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会成为列强瓜分中国的起点呢？这是由于国际上西方列强掠夺领土、争夺海外帝国的形势愈演愈烈，清政府腐败无能、不足以起衰振弱和《马关条约》为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瓜分中国敞开了大门的缘故。

中国地大物博，民殷物阜，早已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预谋侵占的土地。他们成算在胸，急不可待。19世纪70年代，英国在香港的喉舌《孖新闻》就曾提出这个尖锐的问题，即“中国在什么时候才受外国统治呢？这好像是目前最大的问题，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安邨也要在中国边疆占领一块地盘，以便在预计到的瓜分中国时作为侵略的据点。由于中国人民在边疆危机中的英勇奋战，才使得他们不敢贸然蠢动。不过到了这时，已经是1871年就开始的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时代的最后几年了，列强在非洲、亚洲和海洋岛屿的侵占基本上已成定局，接近尾声，“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列强占据了。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发生了某些冲突和势力变动，这预示着最近的将来会有更可怕的爆发。因为大家都得急急忙忙地干：凡是没有及时得到一份的国家，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它的一份，永远不能参加下一世纪（即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即对全世界进行大规模的剥削。所以近来全欧洲和美国都充满了扩张殖民地、实行‘帝国主义’的狂热，而‘帝国主义’就是十九世纪末最显著的特点”。因此，中国就成为他们所欲得的一块肥肉。正好在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抱着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狼子野心而主动地作为西方列强的马前卒登场了，自然深受他们的欢迎。1894年7月16日，在中日战争行将爆发之际，《英日通商航海条约》在伦敦签字了，英方外交大臣金伯利（J.W. Kimberley）在祝词中说道：“此约之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之大军。”战争过程中，英国宣称所谓中立，而“英国的中立事实上是对日本怀有德意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一些西方列强的鼓舞和支持下，抱着“行险以侥幸”的冒险心理，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一旦胜利，便可大肆掠夺我国，使自己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跃进成为一个“新起的帝国主义强国”；万一失败，则有中法战争的前例可援，可以“不胜而胜”。因此，中日甲午战争，从国际形势的大局来看，可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迫切要求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

这场战争的失败彻底地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自此以后它是再也没有机会、也毫无能力来振兴中华了。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不能从美国方面得到任何帮助，又为英国所背弃”；但是，主持清政府军国大计的李鸿章不把国家民族的安危置于自力更生、背水为战的基础上，却一味仰人鼻息，“依

转引自伯尔考维茨著，江载华、陈衍合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1页。
德里奥：《十九世纪末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转引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06页。

《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转引自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1974年日文版，第174页。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424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16页。

然一厢情愿地认定总会从西方得到一些帮助”。这样无知地昧于世界形势的大局，而平时却以深明所谓“洋务”号称于世的李鸿章，真是“其愚不可及也。”当时的情况是：

“倭人盛兵渡朝鲜，而我乃始请英使调停，复倚俄使劝阻，其间复要英舰以制倭，又虞英俄之互忌，终且依英俄合力以言和；而于专主英俄以外更告法、告德、告美以求息肩，转以兵备为大忌。而倭使之驻朝者，亦时示我以可和之情，摇我耳目。我乃一误再误，游移前却，入其彀中而不之觉也。我方以口舌文告，日劳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国之交，垂五十日，迄无要领。倭人正乐蹈是隙以渡兵朝鲜，争我先着。虽以牙山之求援，（袁）世凯之告急；而（李）鸿章答之：辄曰‘坚贞勿怯’也，曰‘静守勿动’也，曰‘已付各国公论’也，曰‘英法见已出场’也。虽奉严旨备战，而固持和局，直于言款之外无所措置。各国固知我以言款始，必以求款终，而知我兵之不足战也”。

引文中所谓“英、俄、德、法、美五国”正是当时在世界上到处掠夺他人领土的五个帝国主义强国，他们都乐意、有的还支持日本侵略我国，而李鸿章却浪费时间去乞求他们来保护中国不受侵犯，真是与虎谋皮，南辕北辙，不败何待？由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引起的“对日战争及其损失惨重的结局，使中国陷于束手待毙的境地。在战争时期，他不是竭尽全力去打败敌人，而是竭尽全力去乞求外国列强的干涉，他的统治者期望列强的干涉会把他自己从积弱的结果中拯救出来，而没有必要作出任何认真的努力去转弱为强。拯救中国免于侵略、保全中国免于瓜分乃是外国列强的义务，而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中国的责任；在一切有经验的观察家们看来，瓜分显然是迫在眉睫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里所谓的经验是属于西方式的经验而不是东方式的经验”。

如果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业已“屈服”于列强的清政府在出卖国家权益时尚可同他们讨论协商的话，那么在甲午战争后他就只有服从，屈辱备至，他已经“受制于人”了。他已经堕落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收税吏”；“总理衙门像个大拍卖场”，“简直变成了交易所、公证所”。他“正如一个大家庭中的那个灰姑娘一样，必须接受其中任何一个成员的任何要求，只有在对另一个十分强大的成员或整个集团的嫉妒让步的时候，要求者有时才未能成功——不过这通常也只是暂时的”。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中日《马关条约》就是在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两次哀的美敦书、云无可商”的压力下，在反映列强意见的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424页。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第72—78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57—58页。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4页。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86页。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63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413—414页。按“灰姑娘”（Cinderella）是民间故事中的一个受虐待的孤女。这个故事广泛流传于欧洲，被收入到沙尔·贝洛尔和格林兄弟所编故事中；但最早记载却见于9世纪时我国段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中。

《覆津海关盛道》，见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0卷，第39页。按“哀的美敦书”系Ultimatum一词之音译，意为最后通牒。

和德籍天津关税司德瑾琳等人以列强不拟干涉，“各国公会恐无望”，“拟请哀的美敦期前签约”的敦促下，由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李鸿章在“万难久待”的条件下画押签订的。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共计十一款，其中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1. 中国割让奉天省南边地方（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等地与日本。

2. 中国把库平银 20000 万两交与日本，作赔偿军费。

3. 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并新开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为商埠。

就上述三项主要内容来看，割地之大，赔款之多，都是极为惊人的；而可在中国开设工厂一点，则是正式承认外国资本可以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合法权利，是过去历次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所没有的新东西，表明了“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就当时情况说，日本资金本来就短少，还不曾感到有在国外开设工厂的必要；他之所以在条约中坚持这点乃是“别有用意”的，即是为了“对英国进行国际贿赂”。至于第二点，20000 万两的大量赔款，对于一个年收入为 88979000 两的清政府来说，是根本无力负担的，势必举借外债。日本通过这一条，既可满足帝国主义列强向清政府贷款的要求，又可利用这笔资金来促成他自己的现代化。我们知道，贷款给他国政府乃是金融资本作为借贷资本输出的一种主要形式，“贷款是银行追求最力的最有利益的事情”。日本拿去清政府这笔贷款，就“保证了维持（日本）帝国军备和奠定近代工业的资金”；有了这样一大笔资金，“日本得以采用金本位制，日本资本主义就能够把以国际市场为前提的贸易立国和工业立国加到新的目标中去”。

以上我们论述了中日甲午战争何以成为列强瓜分中国的开始；而第一次瓜分危机也就立即在战争过程中和战后出现了。

《天津德税务司来电》，见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 20 卷，第 39 页。

《寄译署》，见同上书，第 40 页。按“译署”即总理衙门。

参阅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14—617 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782 页。着重点系原书所有。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 190 页。

参阅费维愷：《一八七 至一九一一年前后之中国经济》（密西根中国研究集刊第五号），1969 年英文版，第 61 页；又本书附录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清政府岁入岁出一览表》。

季南：《一八八 至一八八五年间英国对华的外交》，1939 年英文版，第 270 页。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 183 页。

第二节 在战争过程中和战后出现的第一次瓜分危机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特别是战争过程中所出现的第一次瓜分危机表现为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出的变中国为英国保护国的计划，沙俄《新闻报》鼓吹的由俄、英、法三国瓜分中国的叫嚣，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向德国政府提出的瓜分方案，以及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美国国务院建议的把中国置于列强管理之下的主张等等，现分述如下：

一、李提摩太计划（1894年9月及其后）

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是1870年来华的英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后任英、美基督教在华出版机构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的总干事。他是一个善于玩弄“教会政治”的能手，在1894年9月7日，即中日战争刚刚开始之际，他就向在天津的罗丰禄和在武昌的蔡锡勇两人发出了信件，借此机会以便同李鸿章、张之洞两人挂上钩；他在信中预言中国必败，“仆为中国通盘筹划，似无可以幸胜之理”。1895年2月5日，他在南京两江督署见到了张之洞，认为“东险（指中国败于日本——引者）已呈于有象”，“西险（指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引者）尤在于无形”，散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理论和中国必亡论；其后他又见张之洞，著《与南洋大臣张制军论请他国代理庶政》一文。最后，他又向李鸿章、张之洞二人致电，拟立《华英相助条约》：内容主要是让“中国许英在各省筑铁路，开五金煤矿，立工作厂”；“中国整顿水师、陆军学校、赋税，英许同心商改，务归尽善，又许遴荐妥于人员相助为理”。这样“英许护华不再失地”。李提摩太把这个变中国为英国殖民地、保护国的计划大肆吹嘘，说成是“救目前兼救将来，无一损而有百益事”的妙策，要求李鸿章与张之洞“咨总署速与驻华英钦使妥议，以期事在必成”。李提摩太在这里没有提到瓜分，只计划变中国为英国的保护国，原因是想独霸中国；正如那个“把他自己看成是中国的谢西尔·罗得斯”的英国人柯乐洪（Archibald Ross Colquhoun）一样，认为英国“需要一个新的印度”，认为其他列强争夺中国的斗争是“篡夺”英国在中国的“巨大的垄断权”。

二、沙俄《新闻报》的叫嚣（1895年1月）

沙皇俄国历来对中国是怀有巨大的领土野心的。它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曾经利用时机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外

李提摩太著：《西铎》，广学会1895年版，第4页。

李提摩太著：《西铎二》，第2—3页。

李提摩太著：《西铎四》，第1页。

李提摩太著：《西铎五》，第1页。

李提摩太著：《西铎五》，第2页。

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6、171页。按谢西尔·罗得斯是一个“公开鼓吹帝国主义、最无耻地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英国风云人物”（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98页）。

兴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把乌苏里江以东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把我国西部 44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强行划归俄国。现在它又想利用中日甲午战争的机会，由代表它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喉舌《新闻报》出面大肆鼓吹，干脆把中国瓜分掉。“从一八九五年一月起，《新闻报》就竭力鼓吹大国必须进行干涉，以‘煞住’日本不可一世的气焰；同时建议利用‘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哪几个主要国家呢？原来就是它自己再加上英、法两国。“《拿缚司笛》者，俄之大日报也。当平壤及鸭绿江罢战之后，即作一论云：居今之日，各大国欲出解中日之衅，似已适当其可矣。愚谓各国不妨合力以压中日二国，使不得再战，此息事宁人之计也。惟尚有说者，俄、英、法三国，大可剖分中国而食之，俾不得再有杀教士、害商务之恶习。且中国大国也，日本败之，乃如摧枯拉朽，我三国之分中国，不较易于英之定印乎”。

三、青木方案（1895 年 4 月）

青木瓜分方案是日本驻德公使青木（Aoki）于 1895 年 4 月 2 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八日）、即《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半个月在柏林向德国政府代表、外交部参事米尔堡（Mühlberg）正式提出的。它首次披露在 20 世纪 20 年代德国刊行的一部外交资料汇编、即 40 大卷的《1871—1914 年欧洲各国内阁重大政策》一书的第 9 卷中，以青木和米尔堡两人会谈纪要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它的主要内容是：

“日本将要求南满一部分，尤其是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在内。这个将成为直隶湾（即渤海湾——引者）的直布罗陀。不据有这块领土，朝鲜的独立（应读作“吞并”——引者）将只是空谈。为顾及中国皇朝的体面，现无夺取沈阳之意。对于俄国，地位是困难的，它为铺设西伯利亚铁路向南接到波西图海港，已视北满为其囊中物。至于其他的事，与日本无关，俄国可与中国解决。……舟山岛已预定给英国了。……德国完全有权在东南要求一省。——这种占领要比我们在非洲的全部殖民地还有价值，我们在那里共同努力，一定办得到。”

由此可见，所谓《马关条约》中关于割地一项，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单纯地向中国要求割让领土，而且还是他们企图同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所谓青木方案，就是由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所设计的以北满归俄、以东南沿海除台湾、澎湖以外的岛屿和省分归英、归德，而以南满及其他一些地区归它自己的瓜分中国的第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也可能前后在别的列强首都如伦敦等地提出过；因为在次日，即 4 月 3 日德国驻英大使哈兹费尔德曾向德国政府报告，说是在伦敦“人们认为最大的危险不是日本通过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635 页。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44 页。

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朝警记六》卷四，第 20 页。按《拿缚司笛》即《新闻报》俄语“HOBOCY”一词之音译。

按青木在向米尔堡正式提出之前，已将同样内容向德国陆军大臣舍伦多夫提出过了。

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交涉史料选译》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20 页。以下我们引用此书时简称《德国外交文件》（一）。按波西图海港（Possiet Harbour），即今苏联邻朝鲜之波谢特湾（Posye to Bay）的港口。

领土兼并而来的可能的扩张”，反倒是中国可能会以某种方式“陷入在政治上完全依赖于日本的那种意外的事情”。这就是说，英国至少是得到了日本准备瓜分中国部分领土的通知的。尽管后来因“三国干涉还辽”一事使日本侵占南满的企图当时没有达到，但在列强纵容下占我台湾、澎湖却在实际上成为瓜分中国的第一个行动。

四、田贝十九条（1895年5月）

田贝（Denby, Charles）是美国外交官，于1885年开始任驻华公使。他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半个多月，即1895年5月8日向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提出了对华十九条建议，为帝国主义金融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敞开大门，把“中国变成所有列强‘监护’下的国家”，即“绝对地在条约列强管理之下的国家”。他主张“外国人可以用本地人同样的条件在中国经营工业”；值百抽五的进口税率本来已经很低，但他要求“洋货除进口税外，在其达到消费者手中时不再交税”；“全部中国必须向外国贸易开放”。他认为：“各省总督、巡抚以及各省当局均应禁止其处理国际事务，除了解决赔偿外入损失的要求以外。所有涉及外国人的一切问题只能在首都由中央政府审理”；他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他知道作为中央政府的清政权这时已经在列强“外交使团的有效控制之下”了，这就是说要把全权集中到作为太上皇的列强公使手中，把中国置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共管之下。我们知道，美国在19世纪末叶，它的工业生产已经从世界第4位迅速发展到了第1位，超过了德、英、法等国，它的生产和资本已经高度集中。我们还知道，资本家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势力’来瓜分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更的；要了解当前的事件，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的解决是取决于实力的变更，至于这些变更究竟是‘纯粹’经济的变更，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更，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也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引者）的基本观点”。因此，田贝的这个共管方案在实质上也是一个瓜分方案；因为“按资本”、“按势力”来说，美国在共管下是可以瓜分到最大的一份的。

上述李提摩太计划、《新闻报》的叫嚣、青木方案以及田贝十九条等等，都反映出在中日甲午战争过程中和战后所出现的可怕的第一次瓜分危机，其中除青木方案由于台湾和澎湖的割让而得到部分实现以外，别的都没有立即付诸实施；其所以没有立即付诸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瓜分中国而必须进行的资本输出的准备工作还没有作好，因为资本输出当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了。

福兰阁：《一八九四至一九一四年列强在东亚》，1923年德文版，第64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52页。

田贝建议中第十四、第四、第十七等条，见同上书，第50—51页。

田贝建议中第十八条，见同上书，第51页。

同上书，第52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95—796页。着重点系原书所有。

同上书，第818页。

第三节 中国人民为反第一次瓜分危机而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特别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广大人民的震动之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其中割地一项，表明瓜分业已开始，尤为令人痛心疾首；1895年5月8日都察院代奏道员易顺鼎的奏折中曾说：

“伏思割地一事，尤为万不可行。……辽东者，北洋之藩篱；台湾者，南洋之门户。今日无辽东，明日即可无北洋；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天下畏盗之人，必求远盗，未有揖盗于门内，而求其不发篋探囊；天下畏虎之人，未有纳虎于室中，而冀其不磨牙吮血。行见奉、锦、登、莱一带，不复能立锥；江、浙、闽、粤各疆，不复能安枕；海口海面，皆非我有。……英、法垂涎台湾，俄人蓄谋辽东，岂伊朝夕？况各国狡焉思逞之计，贪得无厌之怀，谁不欲拓境开疆，因时取利？今见倭人以一举手一启口之劳，而得地如此多，获利如此厚；虽云无故，亦必生心。倘群起效尤，则中国虽大，恐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此日之厉阶，皆由于昔；他时之欲壑，恐更甚于今；中国将来必无可存之地。”

据说日本军国主义者还作了一张与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示意图，谓倭人以中国舆图用五色画界，指示西洋各国，拟与各国瓜分；宣言十年之外，必可立见此局。“瓜剖立尽”的险象真是历历在目的了。

恩格斯曾经于1893年2月，在《致丹尼尔逊》的通信中指出：“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中国人民正是在我们国家民族业已进入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无法忍受的瓜分痛苦逼迫之下，鼓起勇气来掀起了遍及各阶层的、空前壮大的反瓜分运动的。这个反瓜分运动在第一次瓜分危机中即已开始，他们包括了孙中山先生成立的兴中会、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台湾人民的直接的反瓜分抗日战争以及作为义和团运动先驱的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如成都教案、古田教案等等；这时期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已经具有了反瓜分斗争的性质。

一、兴中会之成立（1894年11月）

在中国人民的反瓜分运动中，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先生眼光最敏锐，看问题最深入；他在中日战争的过程中，而不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就预见到了瓜分的危机，并且提出，为了反瓜分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的腐败统治。

我们已经知道，孙中山在1885年中法战争时便已有推翻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但是其间也不免有所动摇犹豫，因而于1894年6月有《上李鸿章书》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5—56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四，1920年版，第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页。按古代希腊神话中有九个司文学和艺术的女神，总称为缪斯（the Muses），其中司历史的女神是克利奥（Clio）。

之举，以“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由于李氏拒而不见，加以清军在随即爆发的对日战争中的失败和瓜分危机之迫近，孙先生义无反顾，为了挽救这个局面，最后决定在 1894 年 11 月 24 日于檀香山创立了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章程》中，孙先生指出：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忍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

另外，在《兴中会盟书》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任务。1895 年 2 月，孙先生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3 月筹划广州起义。这次起义虽未及发难即遭失败，陆皓东等人且为革命而被捕牺牲；但它却表现了中国人民为革命、为反瓜分危机而赴汤蹈火、英勇牺牲的战斗精神。

二、公车上书（1895 年 5 月）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立即连夜起草了长达 14000 余字的《上皇帝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于 5 月 1 日邀请 18 省应试举人“千三百余人，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决定共同签名于 5 月 2 日赴都察院上书，是为“公车上书”。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说：

“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廷国命；呈请代奏事。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此外尚有献俘迁民之说；闻《上海新报》，天下震动；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

“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吓，全岛已割；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

孙中山著述，甘永龙编译：《伦敦被难记》，第 6 页，转引自《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7 页。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9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按“瓜分”一词，似在此时首先为孙先生所采用；但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117 页中却说：“瓜分（thecuttingofthemelon）”是中国人用以形容 1898 年春季中国形势的用语。其实，这个用语早就被运用来形容 1894 年底的中国形势了。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0 页。

哀时老人：《公车上书记序》。见《戊戌变法》（二）丛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54 页。按“公车上书”题名者共 603 人，不足“千三百余人”之数；系因于时“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提前“请将和款盖用御宝，发使赍行”（见同上书，第 155 页），使部分人觉得局已大定，不可复救，遂将名单索回之故。

按“公车”系汉代官署之名，臣民上书和征召，均由公车接待，即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之人，后来便以“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康有为这次发动各省赴京应试的举人签名上书，故史称“公车上书”。

法人将向滇桂，英人将向藏粤，俄人将向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逞。有一不与，皆日本也，都畿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应时尽矣。……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所窃笑者也。……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则外患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国交争，必至四分五裂。……且夫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弊，盖在此也。……诸夷环伺，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必来。……近日土耳其为回教大国，不变旧法，遂为六大国割地废君，而柄其政。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康有为这次上书虽为都察院所拒而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在这里所指出的瓜分危机，间不容发，必须“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变法图存的思想，对中国人民，至少对当时 18 省 1300 多名知识分子是起到了当头棒喝，发聋振聩的巨大作用的。此后，他仍继续向清帝上书，在北京和上海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等等；而梁启超于 1896 年在上海所办的《时务报》，严复于 1897 年在天津所办的《国闻报》，尤为当时宣传变法维新救中国的南北两大阵地。

三、成都教案和古田教案（1895 年 5 月和 8 月）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第一次瓜分危机的到来，帝国主义列强强化了他们在华教会的侵略活动，使遍布全国各地的外国传教士气焰嚣张，活动频繁；同时也就激化了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他们的斗争，在过去是以反对外国教会的侵略和统治而著称于世，如今由于形势的变化而具有反瓜分的性质，并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先驱而登上历史的前台了。“在一八九五年的每一个月中，北京美国使馆都有机会去报导美国传教士处于危险境地（应读作因侵略活动而处于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浪潮中——引者）的新闻”。在这些遍布各地的斗争中，以成都教案和古田教案规模最大。

1895 年 5 月 28 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五日）爆发的成都教案是中国人民反对英、美耶稣教和法国天主教侵略的斗争，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当时“英国政府认为，中国的战败表明这个帝国显然

《戊戌变法》（二），第 131—133、140、145、153 页。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1474 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54 页。

按此时业已侵入中国的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耶稣教（Protestantism）和东正教（Orthodox Church）三大派。“天主教指一切承认教皇最高权力的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指俄国东正教会及其支派；耶稣教则包括一切否认教皇最高权力的基督教会，不管它是否采用天主教形式或自称为天主教，路德宗（Lutheran）或长老宗（Calvinist）等等，均属耶稣教”（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 480 页）。法国主要是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沙皇俄国利用东正教，英、美等国则利用耶稣教。耶稣教不是耶稣会（the gesuits），耶稣会属天主教系统。耶稣教当时在中国又称改正教、新教或耶稣基督教，天主教又称罗马教，东正教又称希腊教。在这三大教派之下，又各有会有宗，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是再也没有人支援它了，并且肯定不能抵抗任何外来强国的侵略。我们有足够的证明，在华美人，包括美国驻北京的公使（即田贝——引者）在内，也持有这个观点。一贯认为满清的保守主义是造成中国基督教化的主要障碍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们，坦率地欢迎现存制度的即将来临的崩溃，其中有些传教士甚至把日本天皇的军队看作是‘神天上帝所选中的工具’，为皇军的胜利而欢呼喝彩。”因此，成都教案爆发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认为日本之进攻中国，外国人负有责任的群众情绪所引起”。为爱国主义精神所武装了的成都人民，在传教士干涉他们端午节的掷果会，擅自把掷果儿童逮捕，扣押三名交涉人员之际，毅然奋起斗争，当夜焚毁教士住宅及教会医院，还把天主堂内埋藏的尸首送官府查验。次日即5月29日继续焚烧教堂，天主教主教杜杭受伤，并发布揭帖说：

“约初十日（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一日）打洋房、赶洋人，大众议和。各铺执棒一根，若有不来者，是洋人的舅子。”

其中，“大众议和”一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爱国精神。旬日之间，灌县、大邑、新津、乐山、宜宾、屏山、雅安、泸州、阆中、冕宁等11个县相继响应，大有席卷全川之势，震惊了西方列强。“成都暴动在欧洲引起一阵叫嚷，要求调查袭击外国人的情况并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发生同类的暴动”。美国也认为，成都教案的“目的不仅是反对传教士，而是蔓延全国的排外运动的一部分”。因此，法国炮舰四艘进泊南京，英美炮舰五六艘驶向宜昌。在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威胁下，清政府将四川总督刘秉璋革职、永不叙用，其他一些官员也被撤职，杀朱瑞亭等6人，充军17人，并向各教堂赔款约百余万两。

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威胁，两个月后，即1895年8月1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又爆发了古田教案。

古田位于福州西北，距福州约50公里，是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斋教活动的地方。斋教组织严密，主张素食和戒绝鸦片。在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台湾人民纷起反抗的影响之下，古田斋会首领刘祥兴号召人民抗税，以“官逼民反”的红色匿名揭帖来发动群众，预定在十月间举行起义。驻福州的英、美领事从他们在古田的传教士方面获悉此事，要求闽浙总督边宝泉派兵镇压。刘祥兴由于清军的来到而被迫提前行动，并把矛头首先指向告密的传教士。8月1日，由300多壮士组成的起义军在“龙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49—50页。

同上书，第58页；其中还提到在江苏江阴也由于同样原因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斗争。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92页。

福森科著，杨诗浩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89页。

1895年7月15日北京美国侨民会议就成都教案所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曾经美国政府正式同意（《北华捷报》1895年7月19日，转引自福森科著：《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89页）。按所谓“排外运动（Anti-foreign movement）”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应读作“反侵略运动”。一些比较客观地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也认为：“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印象，以为中国在它的全部历史中，一向是不喜欢外国人和跟外国交往的，但是，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7页）。“中国人并不曾因外国人是外国人的缘故，便对他们显加仇视。中国人喜爱对外贸易，因为它有利可图”（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50页）。以后引文中遇到此类提法时，均作上述解释，不再一一注明。

爷将要征服外国人的上帝”的红旗引导下，向传教士所在地花山进攻，击毙英国教士“十人，伤三人”。事后，英、美均派炮舰来到福建海面，英、美领事去古田“查办”；边宝泉逮捕了200余人，刘祥兴等“二十六人”就义。

古田教案尽管遭到中外反动派的镇压，但是，中国人民的反瓜分斗争是压不垮的。就在他们镇压古田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敌视外国人的行动更加厉害。一八九五年底不论在福建本省抑或其邻省广东，都曾发生多次暴动。规模特别大的一次是一八九五年九月汕头的暴动，暴动的结果捣毁了几处洋教会（包括美国教会一个）。排外情绪甚至于感染了中国军队”。

应当指出，在中国人民反瓜分危机的斗争中，帝国主义列强最重视的是反洋教斗争；因为在他们掠夺殖民地的历史上，传教士业已被证明为“了不起的尖兵”，比起从事其他各项侵略手段的人员来具有“更多的贡献”。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田贝十九条》中，为什么要专列一条提出“必须采取严格措施去镇压排外暴动；如有暴动发生，要严惩暴动者，还必须赔偿损失”。这一条无疑是指向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的，特别是在这段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期中，外国教会在中国的侵略和统治活动乃是他们瓜分中国的基础，无论是在准备工作上，在发挥其“第五纵队”的作用上，都是如此。

四、台湾省军民的抗日战争（1895年6月—1898年）

在中国近代史上，台湾军民是以富于爱国主义精神著称于世的。在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中，他们对英、法侵略者都曾加以迎头痛击，取得过台湾保卫战的胜利；而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台湾军民英勇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人民反外国侵略斗争史上尤其占有光荣的一页。

台湾人民是不承认卖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1895年6月2日，“李鸿章子经方为交割事偕日兵船至，至鸡笼，知台湾有备，不敢登陆，指授台湾而回”。3日，日军占基隆，4日，台湾巡抚唐景崧逃厦门，7日，日军占台北。爱国诗人丘逢甲统义勇营与日军战，败后内渡。于时，镇守台南帮办军务之原黑旗军统帅刘永福决定留台抗日；他说：

“倭寇要盟，全台竟割，……我台民发指眦，誓与土地共存亡，抗不奉诏。……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愿合众志成城，制挺胜敌。……本帮办亦犹人也，……任

阎崇年、田珏，韩恒煜编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5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675页。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09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55页。按马士在这里大大地缩小了牺牲的人数。据英、美领事“查办”结果，“古田爱国志士被拘捕受审的二百余人，因拒捕而自杀的十人，被捕后因拒审而自杀者若干人，被审判后屠杀者五十余人。九月十七日杀七人，十月二十一日杀十四人（以上在古田），十一月七日杀五人（在福州）。其他皆被处以流徙枷杖酷刑。一八九七年三月又杀二十余人。这就是最优秀的中国儿女用自己鲜血来灌溉革命花朵的英雄事迹，也是美、英两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滔天血债”（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611页）。

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96页。

诺尔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1卷，第126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51页。

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丛刊本（六），第334页。按鸡笼即基隆。

劳任怨，无诈无虞。短愿人攻，将弁不妨面告；事如未洽，绅民急宜指陈。……同心戮力，自可转危为安。”

这样，副将杨紫云所部新楚军，吴彭年、王德标、杨泗洪与刘成良等所部黑旗军七星队就同台湾义军领袖徐骧、吴汤兴、姜绍祖、李邦华、黄荣邦、林义成、简精华等人合作，展开了共同保卫台湾的抗日战争。他们都不怕牺牲、勇敢善战，身先士卒去同敌人拼搏。在机智顽强的居民的协助下，他们在 1885 年 6 月—7 月进行了新竹保卫战，在 8 月 22 日进行了大甲溪的阻击战，28 日进行了彰化八卦山的肉搏战等等。9 月 4 日，他们从敌军手中夺回了云林，次日，苗栗也宣告光复，23 日又反攻彰化。10 月 11 日，敌军进犯嘉义，被诱入地雷道，700 余敌兵被炸死，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宫即所谓之能久亲王者受重伤，旋毙命。10 月 19 日，刘永福在粮饷无着、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内渡，21 日台南沦陷。坚持了将近半年之久的台湾军民的抗日战争使敌人每得一地，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歼灭其最精锐部队近卫师团将近半数；因此，敌军的所谓胜利乃是一种“比鲁斯式的胜利”。台湾军民这种前仆后继、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精神深深地鼓舞了大陆的中国人民；人们认为：“平壤有若是战焉，高丽盖可不失；鸭绿江有若是战焉，辽东亦可不失，而何有割辽、割台之事也哉！”美国《教务杂志》也承认：“中国大陆上的目光都集中在台湾事件上”。在大陆，“广泛流传着这样的号召——以台湾为榜样，发动反抗外国压迫的全民起义。当时有一张揭帖这样说：‘驱逐洋鬼子，刘永福正在台湾驱逐洋鬼子，我们在这里同样能驱逐洋鬼子，洋鬼子滚蛋！’”“难道还用说明，台湾的事情便是中国的事情”；可见台湾军民的抗日战争与大陆人民的反洋教运动是密切联系着的。

尤其可贵的是，刘永福虽内渡，而台湾人民却并没有屈服；他们继续展开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统治的英勇斗争，人数众多、遍及全台，历时约 5 年之久。如 1895 年 12 月 31 日的由台北陈秋菊与新竹胡嘉猷等率领 3000 人乘夜会攻台北府，1896 年 1 月的宜兰人民围攻日本屯军，7 月的陈发义军攻取云林等等。于时，“台北简大狮、台南林小猫、中路柯铁虎，不约而同，各建旗鼓，谓之‘三猛’”；其中尤以柯铁虎所领导的大坪顶（在云林东南山区）居民的抗日斗争坚持最久，创敌亦最多。他们在 1896 年 6 月 18 日歼灭了进攻大坪的日军，1897 年 1 月又将“入穴捣巢”的敌军坑杀；大坪后来虽为日援军所占，然亦不能久守，在 1897 年 12 月 8 日的一场大战中被柯铁虎光复，“山顶飘扬黄龙旗，旗署清光绪二十四年月日云云”。据说：

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见《中日战争》（一），第 204—205 页。

按“比鲁斯式的胜利”（Pyrrhic victory）指代价昂贵、付出了极大牺牲而得到的胜利。古希腊伊皮鲁斯（Epirus）国王比鲁斯（Pyrrhus）在纪元前 280 年在赫克利亚，279 年在奥斯库卢姆击败了罗马人，他在奥斯库卢姆战后说：“再来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就完蛋了。”

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六），第 332 页。

《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1895 年 11 月，第 503 页，转引自福森科著：《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91 页。

同上书，同页。

同上书，同页，引《北华捷报》，1895 年 8 月 23 日。

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六），第 354 页。

洪弃父：《台湾战纪》，见《中日战争》（六），第 364 页。

“当丙申（1896年）、丁酉（1897年）之交，萑苻伏莽、斩木揭竿而起者处处皆是，日军到辄散，去辄聚，剿杀则不惧，招诱则不信，治之无术，日本政府遂有退还台湾之意。清廷方拮据筹偿辽东，无力更赎台湾。台湾富绅林维源……许捐资四百万，按诸全台富室又可得数百万，清廷费帑不过千余万，由英总领事居间。总理各国衙门闻于朝，清廷询于两广总督李鸿章，鸿章谓得之不能守，形势紧要不比辽东，议不可，罢。”

为了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侵略者还继续在1901年搞“大扫除”，在1906年搞“大讨伐”；但是，台湾人民可与日月争光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是侵略者所“扫除”不尽、“讨伐”不了的。

第三章 帝国主义列强让与权争夺战与第二次瓜分危机（上）

中日甲午战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起点，不仅在于出现了第一次瓜分危机，并且还在于它同时也引起了列强在华的让与权争夺战。所谓让与权争夺战，包括如下两个内容：即（1）帝国主义列强向清政府掠夺让与权；（2）他们之间对于让与权的彼此争夺；并且，不论属于哪个内容，它们都是在完全无视中国主权的条件下进行的。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义和拳‘叛乱’这段时期，列强于一八九四年至一九〇一年中都忙于去夺取中国这块几乎是没生命的躯体，号称为让与权争夺战；在这个让与权争夺战中，列强对中国人的权利的侵犯的不正义行为，乃是前此整个百年中所不曾有过的”。在这个时期中暴露出来的“一个赤裸裸的残酷的事实”就是“金融资本和各国政府之间的紧密结合”，以“便从清政府手中掠夺借款让与权、铁路让与权和矿山让与权”。等到这种让与权争夺战从借款、铁路和矿山等方面明目张胆地转移到利用军事力量来抢夺领土的时候，第二次瓜分危机也就随之爆发了。这就是在我们历史书上所通称为的“瓜分狂潮”的到来，使中国人民不得不为反对第二次瓜分危机而展开斗争。

在这个时期中，有关中国的重大问题已经不可能由清政府自己来解决，而是要根据英、美、法、德、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要求和斗争需要来决定。“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如何，往往不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当时沙皇俄国的首都——引者）、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这个形势形成了这几年间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格局，具有如下三点特征。

第一，有关中国的最主要的命运问题、即领土让与权的瓜分问题，均由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协商或签订条约来解决，清政府不得与闻其事；因为他们主要地不是同清政府来谈瓜分中国，而是他们本身之间谈判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例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青木方案，1896年1月15日在伦敦签订的关于川、滇问题之《英法声明》，1898年9月2日在伦敦签订的关于瓜分中国

怀特：《导言》，见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21页。按“让与权争夺战”（the Battle of Concessions）中的“让与权”（Concessions）一词，一指条约口岸中的各国租界，此处则指清政府出让给列强或他们的辛迪加（Syndicate）的特权，包括借款让与权、铁路让与权、矿山让与权、领土让与权等等，而重点则在于领土，不管它以何种形式出现。根据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的解释，让与权的政治价值和利益在于它要求“以某些领土为抵押”，所以它是“不属于正常的贸易范畴的”（见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79页）；这就是说，让与权是同领土的瓜分联系在一起的。让与权的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对一批比较后进的、或在政治上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或那些民族性尚未发达的人民的统治权（therighttodominate）应被让与给（wasconceded）一个强大而先进的国家，并且这个统治国还期待着他们应对于受到保护和统治表示感激之忱呢”（韦尔斯：《世界史纲》，1930年英文版，第962—963页）。显然，这是一种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掠夺殖民地辩护的荒谬逻辑。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417页。

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2页。

铁路范围的《英、德协定》和 1899 年 4 月 28 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关于瓜分在华铁路让与权的《英、俄协定》等均是。这些协定根本不通过清政府，而清政府基本上在当时也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所以在总理衙门编成的《各国通商条约》和一般的中外条约汇编之类的书籍中都没有记载，因而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甚至影响到后来的人们对当时的瓜分危机的认识不够和估计不足。但是，在一些外国人所编的这类书籍中，如马克谟的《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上，却是把这些协定记载得明明白白的。这种情况，基本上近似于列强从 1880 年开始的瓜分非洲的办法。当时，“常有欧洲的两、三个外交家，坐在巴黎或伦敦，把非洲地图打开并在其上划出几条线，就可把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地方划分给各自的国家”。孙中山先生曾说：“亡人国家，本有两种手段：一是兵力，二是外交。”后者是“用妥协的方法，只要各国外交官坐在一处，各人签一个字，便可以亡中国。签字只是一朝，所以用妥协的方法来亡中国，只要一朝。一朝可以亡人国家，从前不是没有先例的。譬如从前的波兰，是俄国、德国、奥国瓜分了的。他们从前瓜分波兰的情形，是由于彼此一朝协商停妥之后，波兰便亡”。

第二，这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同清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基本上大都是他们掠夺在华让与权的条约；但条约签订的方式则不同于过去。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外之间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几乎全部是由代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人员来签署的；此后则多半是由清政府的外交人员同列强的辛迪加或公司的代表来签字。甲午战争以后的这段历史“不应仅仅、甚至主要地也不应从条约和其他正式的国际协定来看，而应从和外国辛迪加或公司所订立的名义上属于私人性质的合同来看，根据这些合同，中国政府开始背上了一系列复杂的、广泛的债务和承担，其中金融的或经济的因素往往和政治上的考虑溶合在一起，无从区别”。这是因为，“在金融资本时代，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是交错在一起的，实际上这两种垄断都不过是最大的垄断者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个别环节而已”。这种交错在一起的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实际上就是金融资本和各帝国主义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盟。他们通过名义上属于私人性质的、以外国辛迪加或公司来同清政府签订的合同所取得的让与权，比如就铁路和矿山的让与权来说罢，到最后它们“如果名义上不是，实际上却都是这些帝国主义列强的公产”。

第三，为了掠夺让与权，帝国主义列强可以随意制造“教案”或“补偿原则”等等作为借口，把清政府置于被告的地位，以达到其强迫勒索、予取予求的目的。教案本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正义行动，它本身是无可非议的；至于所谓补偿原则乃是一种强盗逻辑，即一个强国为了均势的缘故要求享有另一个强国在华的特权。“索取补偿的理论看来是极为奇怪的。它的原则是：如果一个人抢劫了另一个人，那么第三者就向被抢的人说：‘为了得到补偿，我也应当抢你’。”总而言之，列强在掠夺中国的时候

海士、穆恩合著：《近代史》，1932 年英文版，第 683 页。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641 页。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 1 卷，1921 年英文版，第 8 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793 页。

威罗贝著，王绍坊译：《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641 页。

札莉娜与利弗希茨著：《英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八九六—一九一九年）》，1970 年俄文版，第 68 页，

候，总要找到或者制造出一个借口，这是当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世界作辩护的谬论。英国作家韦尔斯（H.G.Wells）认为：

“十九世纪结束时，有权势的人们（帝国主义者——引者）相信他们是借助于生存竞争而取得胜利的，强者和狡猾的人在生存竞争中胜过了弱者和诚实的人。……他们断定，人类是一种像印第安人的猎狗一样的社会动物。……正如在狗群中为了大家的好处必须欺压和征服幼者与弱者一样，人群中的那些大狗欺压和征服幼弱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了。……看来教训在于，在没有施加虐害之前，你务必得搞出一点可为道德愤慨作辩护的借口，那就万事大吉了。如果你有权有势，你就不会遭到谴责。这显然就是这个典型的帝国主义者简单信条。既然人类这种动物已经显示出了有意作恶的充分才智，所以每一个恃强凌弱的人都必须尽力遵守这个信条。……我们在这里也就得到什么是现代帝国主义最丑恶、最退化和最终要灭亡的思想的答案了；这个思想就是以合法手段掩饰其非法暴行的阴谋诡计（the idea of a tacit conspiracy between the law and illegal violence）。”

这正是“非法行为穿上合法伪装，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跋扈飞扬”。“作奸犯法者依靠同党，居然得到从宽发放，而清白守法良民，反而被诬有罪，陷入罗网。这么一来，世界必然瓦解，公理也就沦亡”。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还从来没有以这几年的那种形态和规模侵入中国领土，且又是如此地锲而不舍，粗暴地无视那个国家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数十万平方公里被强占，置于外国人的新型奴役之下，却美其名曰‘友好’以及按‘租借’（无代价的）原则实行‘补偿’”。所有这些借口，一言以蔽之，无非是帝国主义者恃强凌弱，把中国当作殖民地来任意宰割的非法暴行所搞出的一套障眼法罢了。它们是侵略者深文周纳的结果，是用来欺骗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并从而毒害他们的政治意识的。这套阴谋诡计，列强在甲午战争以前也曾经搞过；不过，在这一时期中却是司空见惯、俯拾即是的。

上述三项特征基本上表明了这段时期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格局，它们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让与权争夺战的局面下形成的。在这种特殊格局下，清政府在形式上的独立也快要成为泡影了。让与权争夺战是为公开瓜分中国作准备的；而就其实际效果来说，则是瓜分活动的具体进行；因此，这个特殊格局就是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作为殖民地来进行瓜分的格局。“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

引用英保守党议员劳瑟语。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韦尔斯：《世界史纲》，1930年英文版，第957—958页。着重点系原书所有。按韦尔斯在这里运用了英国帝国主义作家吉卜林的《狡猾公司》（Stalky and CO.）一书的情节作为例证。在这本书中，吉卜林以赞赏的笔调来描绘了三个男孩凌虐另外两个男孩的故事。这三个男孩在显示恶意以前，用诡计把两个受骗者不顾死活地捆绑起来，借口他们是“暴徒”。在背后秘密参与此事、煽动这三个男孩胡作非为的是校长和他的助手传教士，彼等对一个愤怒的母亲的一再控诉充耳不闻。吉卜林先生把所有这些都宣称最好不过的事情，他们需要这种恃强凌弱的事情发生。“什么也制止不住他们（包括吉卜林先生在内）去干这事的兴致”。韦尔斯认为：“《狡猾公司》一书中这个事件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非常生动地显示了十九世纪结束时英帝国的政治心理。不先理解这个故事所例证的心癖（thementaltwist）就不能理解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的历史”（韦尔斯：《世界史纲》，第958页）。

歌德著，董向樵译：《浮士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页。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63页。

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我们在下面即将谈到的、由沙皇俄国倡议发起的三国干涉还辽,实际上就是让与权争夺战的开始,而在“还辽”的借口下又使这个争夺战更加激化起来。

第一节 让与权争夺战的开始

一、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1895年4月）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让与权争夺战的开始，并且是在领土的问题上开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列强瓜分世界，是按资本、按势力来进行瓜分的，但是，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却从中国瓜分去了台湾、澎湖和辽东这样大面积的土地，按当时日本的资本和势力来说，同欧美列强相比，它是很不相称的。须知，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前，它也同中国一样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它的势力虽因战胜中国而有所变更，但还不是列强的对手；至于资本，那就更谈不上了。虽说在列强中有一些国家在幕后支持它，但它仍然必须吐出一部分土地来，这就是三国干涉还辽的真实背景。

1895年4月23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即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一个星期，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在东京同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关于中日条约中割让辽东半岛的声明，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福（Hittravo）在向日本外务省次官林董（Hayashi）的口述声明中说：

“俄国皇帝陛下之政府，查阅日本国向中国所要求之媾和条件，认辽东半岛为日本所有，不特有常危中国首都之虞，且同时朝鲜国之独立，亦为有名无实，对于将来远东永久之和平予以障害。因之，俄国政府，为向日本政府重表诚实友谊，兹劝告日本政府应放弃占有辽东半岛。”

德、法两国的对日声明大体上都与此相同，只是驻日德使古特施密德（Gutschmidt）还准备了一份书面备忘录，要求“日本必须屈服，因为向三强作战是没有前途的”；这样他就使用了“其他两国公使都没有使用的战争这个名词去威胁日本”。欺软怕硬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既感到自己的武力就是“单与俄国舰队抗战亦无甚把握”，何况三国；又感到清政府可能“乘此机会抛弃媾和条约之批准，竟使《马关条约》为废纸空文”；因此，它确定向三国屈服，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的方针。这样几经周折，日本政府于5月5日宣布放弃辽东半岛之占领，并乘机向清政府又勒索赔款。11月16日，清政府“为酬报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将库平银三千万两……交与日本国政府”。“自是日起，三个月以内，日本国军队从该交还地方一律撤回”。总计中日甲午战争后对日赔款20000万两，加上威海卫占领费150万两，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共达23150万两的巨大数字。

陆奥宗光：《蹇蹇录》，见《中日战争》，第175—176页。

福兰阁：《一八九四至一九一四年列强在东亚》，第89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126页。按古特施密德这句话被看作是在外交上使用了粗暴的语言，其实他是按德国政府的训令而逐字逐句转达给日本政府的；他因没有理解政府训令只是在于指导他怎样说话而不是要他生搬硬套，所以在1907年他受到特别调查，被认为是一个无能的外交官。

陆奥宗光：《蹇蹇录》，见《中日战争》，第178—179页。按日本在战后“国内海陆军备殆已空虚，而去年来继续长期间战斗之我军队人员，军需皆疲劳缺乏”（见《中日战争》，第177—178页）。因此，清政府中主战派的意见并非毫无根据，事情并不像李鸿章等人所形容的那样草木皆兵，一筹莫展。

按此项赔款，我们即将在本书下面看到，由清政府借款于1898年5月7日，提前在3年之内付清，先后

三国干涉还辽从现象上看好像是突然发生的，其实它早有一段酝酿过程，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在瓜分中国领土的斗争中面临着复杂而尖锐的矛盾。清政府此时业已“因战败而威信一落千丈，达到了受人支配的程度，……如果日本打算征服中国的话，清政府是完全不能抵抗的。面临着瓜分中国的可能性，列强之间的妒忌和对抗日形尖锐”。早在青木瓜分方案于1895年4月2日在柏林提出的时候，4日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 Baron）就认为，日本占有辽东，“把旅顺变成第二直布罗陀，会使日本控制直隶湾，因此事实上降中国地位为日本的保护国；……其结果并足以危及欧洲的和平”。日本“这样高压的要求，将使中国继续生存的问题以及欧洲列强领土取得问题现实化，因此对利益直接有关各方包含着战争之危险，而这个危险是不能估计过低的”。马沙尔这个看法实质是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观点，甚至支持日本的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也“完全同意这种见解”，从而为三国干涉还辽的实现打下了基础。至于法国，除了同意这种见解外，还特别关心日本对澎湖列岛的占领问题；因为他的对华野心是以越南为据点而企图蚕食我国西南，梦想建立一个所谓的印度支那大帝国。法国外长哈洛托（Hanotaux）认为，对于澎湖列岛，“必须阻止日本在这领土上设防，形成为第二个直布罗陀，为欧洲航行上一个严重和长久的威胁。又必须约束日本不把这些列岛割让给任何国家”。

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沙皇俄国是起带头作用的；因为辽东也正是他处心积虑想要占据的地方。在1895年4月12日由那个“被一种夺取远东土地的贪欲迷住了心窍”的沙皇尼古拉第二（Nicholas II）所召集的御前会议上，自命为唯一熟悉远东地区政治、经济情况的财政大臣维特（Witte, S.Y.）就说：

“看来，所有欧洲大国，以及日本都意识到，对中国的瓜分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发生，而一旦发生这种瓜分，西伯利亚铁路将大大增加我们的机缘。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日本人准备占领南满，这对我们将是一种威胁。……日本人在得到中国六亿卢布的赔款后，将在他们占领的地区构筑工事，并把非常尚武好斗的蒙人和满人拉到自己一边，而后就将开始新的战争。在这种事态下，日本天皇过几年将成为中国的皇帝，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现在我们容许日本人到满洲去，那末，为了保卫我们的属地和西伯利亚铁路便需要几十万军队，并需要大大扩充我们的舰队，因为我们或迟或早不可避免地要和日本人发生冲突。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或是我们现在容忍日本占领南满，而等到西伯利亚铁路完工后再为自己要求补偿；或是现在就决定积极地阻挠这种占领。这两种办法中哪一种对我们较为有利呢？现在就转而采取一种积极的行动方式对我们较为有利。……倘若事出意料，日本不听从我们外交上的坚决要求，那就应当命令我国舰队对日本舰队采取敌对行动并且炮轰日本港口。……在这时，我们就会起

是在伦敦共折合为“英金 38082887 镑 15 先令 8 便士又 20 分之 13”（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 1962 年版，第 313 页）付给日本的。

珀塞尔：《义和拳起义背景研究》，第 83 页。

马沙尔：《致驻圣彼得堡代办齐尔绪基电》，见《德国外交文件》（一），第 21 页。

马沙尔：《致驻伦敦大使哈慈菲尔德》，见《德国外交文件》（一），第 21 页。

哈慈菲尔德：《致德外部》（1895 年 4 月 4 日），见《德国外交文件》（一），第 22 页。

拉度林：《致德外部》（1895 年 5 月 8 日），见《德国外交文件》（一），第 45 页。

阿尔莫林斯基编，傅正译：《维特伯爵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64 页。

到中国的拯救者的作用，中国也会认清我们帮助的价值，然后便会同意通过和平途径修改我们的边界。日本对中国的胜利还不足以证明前者的力量。实际上，据悉日本的作战部队不超过七万人，并且分散在朝鲜、满洲和南方。”

在这种情况下，“以俄国为首的这个反动的欧洲，曾因中国败于年轻的日本而感到不安，它曾经联合起来，从日本手中抢走最好的胜利果实”。

此事“就表面来看，好像是三个有骑士气概的西方列强曾经很有礼貌地保护了中国；可是，就其实际上有如糟蹋女人的行为来说，这三个进行干涉的强国在它们的动机上决不是具有骑士品质的”。但是，在李鸿章看来却自以为具有先见之明并借此而在自己脸上涂脂抹粉；他说：在议定《马关条约》之日，“臣曾告知日本使臣伊藤等，将来欧西必出而干预，该使悍然不顾。及定约后，俄、法、德三国果有违言，当经总理衙门王大臣，相机力劝三国驻京使臣，出为挽回。臣在津时，亦叠次商电各使，冀收转圜之效，三国方允此事”。还辽一事经李鸿章这么一说，好像是他本人“电商各使”的结果；其实就其前因后果而论，与李鸿章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历来卖国奴才们恬不知耻的丑表功，多属此类。由于“此次争回要地，非寻常交涉可比”，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欣等奏明清帝，赏给俄国使臣喀希呢（Cassini, A.P.）、法国使臣施阿兰（Gérard）、德国使臣绅珂（Schenk）等三人宝星；更由于“此举倡议自俄”，所以喀西呢的宝星还高一级，“略为区别”，“特示优异”。这样就达到了维特要以“中国的拯救者”自居的目的，使他的口蜜腹剑式的对华外交可以得逞；表面看来，沙皇俄国的“对华政策似乎始终是敦睦中国，争取它的特殊好感”；其实，沙俄的目的在于“放长线钓大鱼”。

我们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这段历史的酝酿和出笼的过程可知，它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让与权争夺战的开始；此后三个国家都以“中国的拯救者”作为借口，纷纷向清政府索取让与权，让与权争夺战也就立即激化起来，国无宁日了。

二、英法在我国西南的让与权争夺战（1895年6月及其后）

对于腐败的清政府来说，“法国是第一个由于她的帮助而接受到补偿的好朋友”。1895年5月8日，法国外长哈洛托就向中国驻法公使龚照瑗提出了订立条约的要求。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更以借款来威胁清政府就范。他说：“我特别向他们指出，如果中国政府对我们所作的保证不从现在起就毫不迟延地付诸实施，那么法国政府方面就不能许可执行它所同意的为中国解放其领土的四万万法郎借款的条款。我的俄国同僚已经收到了罗拔诺夫亲王（沙俄外交大臣——引者）的一项命令，支持我的声明。”

罗曼诺夫著，陶文钊等译：《俄国在满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8—69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8卷，第30页。

穆恩：《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1942年英文版，第331页。

王彦威辑，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八，1932年版，第5页。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九，第22页。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38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52页。

施阿兰：《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七年使华记》，第76页。借款事见下节。

1895年6月20日（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由庆王奕劻军机大臣徐用仪与施阿兰在北京签订了中法《商务、界务条约》，清政府同意：

1. 把中国和越南边界上的一些土地，如漫美、猛乌、乌得、化邦、哈当贺、联盟、猛地、八盐泉等原属我国云南省的地方，利用重新划定边界的机会，割让给法国。

2. “议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至越南之铁路或已成者或日后拟添者，彼此议定，可由两国酌商妥订办法，接至中国界内”。

3. “凡边界所开之龙州、蒙自、思茅、河口通商四处，若有土货经过越南来往出此口时，应照十分减四之例收税。……由以上四处运土货出口，前往沿海沿江通商各口，于边界出口时，应照十分减四之例收出口税”。

这就是说，法国通过这个条约占领了滇越边境上的一部分领土，取得了从越南延伸铁路进入中国的特权，取得了与法属印度支那相邻的我国南方三省开矿的特权，还取得了在中法边境上新开商埠的贸易要降低关税40%的确认。“这些特权对于中国政治家李鸿章来说，从前也许不是那么危险的；如今，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这些特权看来就是经济入侵的常用手法（按即指资本输出——引者），就是作为并吞领土的一个开端的行动”。实际上，法国帝国主义者从这个条约中不仅取得了铁路让与权和矿山让与权，同时也取得了领土；因此，它的性质是极为严重的，英、法在华的让与权争夺战也就以此为契机而展开起来了。

英国驻京公使欧格讷（N.R.O'Conor）在6月20日订约的当天，就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反对批准这个条约。1896年1月15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Robert, Salisbury）与法国驻英大使柯赛男爵（Alph, deCourcel）在伦敦签订了一项关于川、滇协议的《英法声明》；其中第四条声称：“两国政府同意，由他们各自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一日和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同中国签订的协定中，在云南和四川两省所让与给英国或法国的所有商业和其他方面的特权与利益，以及今后在中国这两个省分内让与给英国或法国的不论任何性质的一切特权和利益，只要是取决于他们的话，都必须为两国所共同享有”。这就是说，在我国西南，只要清政府出卖了任何特权和利益与英、法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则另一国就必须要求同样的让与权作为补偿。于是，中、英之间在多次谈判后，在1897年2月4日由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龚纳乐（C.M. Mac Donald）在北京签订了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十九条及一条关于西江通商的专条，声称由中法《商务、界务条约》“所让江洪界内之地（今西双版纳南——引者）致与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即1894年3月1日——引者）与英国订立之《中緬条约》相违”，因此要索取新的让与权：

参阅《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24页—625页。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法《商务、界务条约》包括了《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两者。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22—623页。

穆恩：《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第332页。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1卷，第55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86—687页。按1894年3月1日之中英《续议滇緬界、商务条款》第五条中规定说：“惟订明一事，若未经大皇帝与大君后（指英国维多利亚皇后——引者）预先议定，中国必不将孟连与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让与别国”（见同上书，第578页）。此处所谓“相违”，即系就此而言。

1. 中英重新划定自云南尖高山（北纬 25° 35'、东经 98° 14' 处）至江洪一带之边界，英国在重划边界过程中又蚕食了我滇、缅边界一大片土地。并将“南碗河之南，那木喀相近，有三角地一段”即南坎一处，“是地乃中国永租与英国管辖，其地之权咸归英国，中国不用过问。”同时声明，“日后中国未经先与英国议定，不能将现在仍归中国在湄江（即湄公河或澜沧江——引者）左岸之江洪土地，以及孟连与所有在湄江右岸之江洪土地，或全部或片土，让与他国”。

2. “中国答允”将来如果“在云南修建铁路”，“即允与缅甸铁路相接”；“英国欲令两国边界商务”与“矿务一律兴旺”，答允中国船只“任意在厄勒瓦谿江（即大金沙江）行走”。

3. 把梧州、三水和江根墟三处作为条约口岸，开埠通商，并将江门、甘竹滩、肇庆府及德庆州城外四处，“开为停泊上下客商货物之口”；在云南省的“腾越或顺宁府，一任英国之便，择定一处”驻扎领事，“并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及驻扎”。

法帝国主义者抓紧这次中英条约的机会，立即利用它来要求清政府给与相应的补偿。1897年3月15日，总理衙门发表致法国公使的《海南岛不割让照会》，声称“法国因欲坚固与中国友谊邻邦之情，极盼中国国家永不再将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不论久暂，作为停船趸煤之所”。6月18日，又致法国公使以《商务专条及铁路合同等事照会》：

1. 法国费务林公司（The Compagnie de Fives-Lille）可延长同登至龙州铁路到南宁和百色。

2. “在广东、广西、云南南边三省界内矿务，中国国家开采之时，即延用法国矿师、厂商商办。”

3. 法国将“自越南交界起，由百色河一带或红河上游一带修造铁路，以达省城（昆明——引者），应由中国渐次察勘办理”。

以中法《商务、界务条约》为契机的英、法在华让与权之争，我们暂时就叙述到这里，因为此后不久第二次瓜分危机就出现了。这段英、法在华让与权之争对于理解这段时期的历史是极关重要的；除借款让与权以外，所有关于领土、铁路以及矿山的让与权都涉及到了，只要这些让与权之争由中国西南扩大到全国，只要参与斗争的列强由英、法两国扩大到俄、德、美、日等国，事实证明，瓜分狂潮就立即到来。并且，在这两个老牌帝国主义中，英国是“殖民帝国主义”的典型，法国则是“高利贷帝国主义”的代表；他们在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中，往往都是始作俑者，某些恶劣的掠夺先例是由他们开创的。

第一，英帝国主义者开创了“租借”原则的恶例，为此后德租胶州湾、俄租旅大等地提供了示范和借口。1897年2月4日中英条约第二条中南坎地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687—688 页。

同上书，第 689 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689—690 页。按腾越今名腾冲，顺庆府今名凤庆。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697 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722 页。按费务林公司是一家法国的辛迪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785 页。

同上书，第 785 页。

区的“永租”在实质上无异于割让。美国一位史学家施达格论述其事说：

“英国利用中国对法国的让与权作为一根‘棍棒’来取得补偿，这是完全符合于欧洲外交的传统的；不过，更为重要的却是那条在‘永租’（Perpetual lease）的规定下的领土让渡。在中西关系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租借领土的先例：即澳门的葡萄牙殖民地和英国香港殖民地之第一次向九龙扩张。这两块领土原来本为‘租借’，——但最后中国却被迫把它们完全割让了。虽然如此，在一八九七年二月四日之前，这个‘租借’原则只用过两次，而在那个日期以后，它就注定要变成一个普遍公认的有利行动了。只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期间，中国就不得不看到她那许多不曾向世界开辟为条约口岸的港口，通过租借的方式都不属于她所控制的了。”

第二，法帝国主义者通过 1895 年 6 月 20 日的条约，首先向中国索取了铁路和矿山的让与权。同年 9 月 9 日，他又要求一项绝对性的让与权，使法国费务林公司成为自越南凉山和同登以达中国龙州铁路的所有者。几经交涉，最后于 1896 年 6 月 5 日签订了中法《龙州至镇南关铁路合同》，由费务林公司包办这条铁路的修筑和经营管理，“以三十六年为期，期满亦准会商展久新立”，实际上就是无限期地控制这条铁路。法国这个铁路政策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一项更远的政策中的一个事件，而这项政策就其意图来看只能说是开拓殖民地的政策”。人们认为：

“这样，法国人就赢得了中国所允许的第一条铁路让与权。这条铁路筑成后经过的中国领土虽不算多，但却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条外国铁路伸入了中国，从而树立了给予外国人铁路让与权的先例。人们认为，一旦这条铁路筑成和通车后，可能进一步扩张，深入中国领土。……法国籍条约之助，已被允许为法、中贸易开辟通商地点，把电线从法国领土延伸入中国领土，把他自己的铁路延长到中国土地之上，并且在云南、广西和广东三省行使优先的采矿权。具有帝国世代传统经验的英国政治家们深知，独占的经济统治权乃是政治并吞的不变的先驱。”

为此，法国早在 1895 年 11 月以来，就派出了一个由金融资本家“为了法国殖民地的扩张而组织起来的”里昂赴华贸易考察团（La Mission Lyonnaise d'Exploration Commerciale en Chine）。它的目的首先是要“了解邻近东京的中国诸省和四川的经济资源和商业资源；”其次是了解通过让与权的不断取得，“究竟能够希望把四川直接纳入我们的政治势力范围或商业势力范围到何种程度。”考察团以布雷里（M. Brenier）为团长，还有法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参加，到我国云南、四川、广东、广西及贵州等省勘探，于 1897 年完成任务，并于同年 12 月发表考察报告。

第三，1897 年 3 月 15 日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强迫总理衙门公开发表的《海南岛不割让照会》，开创了此后列强划分中国领土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的恶例。施阿兰本人就说：“这是那些希望在这个时期确定他们势力范围的列强迫使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个不割让声明”；因为它“不仅向个别强国保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54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653 页。

甘博士：《中国铁路企业之起源和发展》，1907 年英文版，第 158 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149—150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里昂赴华贸易考察团报告》，第 11—12 页，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229—230 页，着重点系约瑟夫原书所有。

施阿兰：《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七年使华记》，第 203 页。

证不让渡中国的一个特定地区，并且也成为列强要求这块指定地区作为势力范围的论据”。不过，这个所谓的“不割让”问题，追源溯始，它的始作俑者恐怕还是英国。虽说它并未强迫总理衙门作公开声明；但是在 1894 年 3 月 1 日和 1897 年 2 月 4 日的条约中，确实载明了云南省的江洪与孟连全区或片土，都不能让与他国的。当时，法国“乘中国有事之秋，借挟日本允退辽东之功，复肆要求”，坚请以猛乌、乌得等地归法；“然而英法两国，在东方经营属土，有互相猜忌之意，各存不退让之心。英见法得此新地，即以为有碍滇緬条约（即 1894 年 3 月 1 日条约——引者）。加以英人心计甚远，其与薛使订约时，已虑及法人之得步进步，故在条约第五款中，订明孟连、江洪之全地或片土，不得于未与英使商妥之前，让与别国。所谓别国者，即暗指法国也。……沙侯坚称不补地无以对答议院”。英国即以此为借口，开始了英、法在我国西南的让与权争夺战，可见所谓的“不割让”，实即割让，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必然是要导致列强在华势力范围之争的。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185 页。

《出使英、法、意、比大臣龚照瑗致总理衙门书》。见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四），商务印书馆 1955 年版，第 10883 页。按“意”指意大利，文中所谓薛使，指薛福成，沙侯指索尔兹伯里。

第二节 借款让与权争夺战

中法《商务、界务条约》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同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条约，由此发生的英、法在我国西南的角逐虽说在不少问题上为列强在华让与权争夺战开创了恶劣的掠夺先例；但是，它还远远不足以包括即便是英、法两国在我全国范围内的争夺，更不用说其他的列强了。

实际上，在签订中法《商务、界务条约》前后，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列强对华的借款让与权争夺战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知道，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是资本输出，即包括借贷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输出。借贷资本的输出是贷款给外国政府、城市 and 银行，生产资本的输出则是在国外建筑铁路，创办工业企业、租让企业和巧取豪夺、贱价收买外国已有的企业等等。在借贷资本的输出中，列强争夺着清政府为对日赔款而大举的借债；此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大小，从某一方面来说，即可根据他们借款给中国政府的数量多少来衡量。“只要借款一经成立，某一国家在华的政治势力，即使不能用债务数目来测量，也可用债务数目来表示，这已成为一种传统了”。

一、俄法借款与华俄道胜银行之成立（1895年7—12月）

远在1894年12月，英国伦敦方面就已经“传说中国打算向日方媾和，赔款五千万镑”。¹到1895年3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向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Compbell, J.D.）表明：“战事结束后，中国需要大批款项，对日赔款如交我筹措，恐怕除了海关之外还有许多别的职权交到我手中。”因此，在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前后，赫德就为借款事积极进行活动，准备由汇丰银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来兜揽这笔大借款。与此同时，“美国、德国、法国都在那里积极活动”。美国的摩根和佛林辛迪加（The Morgan and Flint Syndicate）向清政府建议贷款20000万两，“条件是由它取得对华建筑铁路的控制权”。但是，俄国认为他领先对日本进行干涉，退还辽东半岛，出力应有酬劳，必须由他来借。沙俄财政大臣维特于5月向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表示并“述其国主之意，深愿中国速给偿款，俾日本早日退兵，并令伊部代筹款项以备周转，必于中国有益等语，旋拟推荐俄法银行承办”。当时，清政府把沙俄看作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因此，“中国对俄国开的门比对任何其他列强的都大”。在这种情况下，赫德认为他满有把握的、由英国操纵的借款让与权竟然被俄、法抢去，只好气急败坏地说道：

“局势之混乱、严重和绝望，简直是无以复加；但是，我却没有失望，并且我以为英国人也不会像大陆人所想象地那样会如此容易地被人撵走。……我注意到三个强国（俄、法、德三国——引者）在态度和措词上，不仅对总理衙门，并且加上我在一起，

雷麦著，蒋学楷等译：《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0页。

海关总署研究室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5、149、167页。

海关总署研究室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5、149、167页。

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37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3646页。

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112页。

调子都改变了，这事预示着困难；不过，那也是我们的家常便饭，过去像这样猛烈的风也曾刮过多次，虽说不是来自同一个方向；正如我在从前的电报中所说，‘我们看到了’，而今天的口令则必须是‘屈而不折’：我们或许不得不屈服于风暴，但是我以为我们以后将再一次抬起头来：但愿我更年青二十岁吧！正如欧格讷所说：‘王牌都在别人手里，我们就只有这一手同花牌了！’”

赫德这些话预示着今后列强在借款让与权的争夺战方面必将愈演愈烈；但是，这次借款只好让俄、法集团捷足先登了。

1895年7月6日（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在圣彼得堡俄国外交部签订了俄法《四厘借款合同》。当天，以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为一方，当着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Prince A.B.Lobanov—Rostovski）的面，同以六家法国银行、四家俄国银行组成的法俄辛迪加（Franco—Russian Syndicate）为另一方，订借了4亿法郎，约合中国白银1亿两。根据《合同》第十五条，各银行借款分配数字如下：

“凡合同内画押之各银号彼此不相牵连，兹将摊分之数开列于左：

霍丁格公司银号（M.M.Hottinguer & Cie），六千二百五十万佛郎。

巴黎和兰银号（La Banque de Paris et des Pays—Bas），六千二百五十万佛郎。

利杭银行（Le Crédit Lyonnais），六千二百五十万佛郎。

巴黎爱斯刚脱银号（Le 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de Paris），二千五百万佛郎。

推广制造商务银号（La Société Générale Pour favoriser le Développement du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 en France），二千五百万佛郎。

制造商务银号（La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Crédit Industriel et Commercial），一千二百五十万佛郎。

森彼得堡各国商务银号（La Banque Internationale de Commerce à St-Petersbourg），七千五百万佛郎。

俄罗斯通商银号（La Banque Russe Pour le Commerce Etranger），二千五百万佛郎。

森彼得堡爱斯刚脱银号（La Banque d'Escompte de St-Petersbourg），二千五百万佛郎。

倭尔噶喀玛商务银号（La Banque de Commerce de Volga—Kama），二千五百万佛郎。共计总数四百万佛郎。”

此处前六家为法国银行，共借出2.5亿法郎；后四家为俄国银行，共借

赫德：《致金登干》（1895年5月19日），见费正清、布伦纳和马西森编：《一八六八至一九〇七年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信集》第2卷，1975年英文版，第1019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29页。按约中列举之利杭银行，即里昂信贷银行，巴黎爱斯刚脱银号即国民贴现银行，推广制造商务银号和制造商务银号即总公司，它们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所指出的“法国三家最大的银行。”（《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56页）俄罗斯通商银号与森彼得堡各国商务银号即列宁所举出的“俄国两家最大的银行‘俄罗斯银行’（“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和‘国际银行’（“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同上书，第774页）。可见这次借款把法俄两国最大的金融资本集团都卷进来了。此外，就俄国，‘国际银行’之为德国“‘参与制’下的银行”（《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73页）而论，它也卷进了部分德国金融资本。引文中“总数四百万佛郎”应作四万万，“佛郎”即法郎。

出 1.5 亿法郎，总计 4 亿法郎。借款实收“九四又八分之一”，即 94.125%，4 亿法郎实收数为 37650 万法郎；年息四厘，即 4%，故名《四厘借款合同》；此项借款以中国海关所入税项及存票作为偿还本利的担保。

为什么我们说“输出资本的国家总是捞到最肥的油水”，而在资本输出中又以借贷资本的输出为银行追求最力和最有利益的事情呢？这是因为他们从中可以取得垄断利润；俄法借款在这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说明。金融资本家从俄法借款中取得垄断利润的途径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根据《合同》所得的借款利息超过本金一倍以上。“俄法借款的利息率形式上是年息百分之四，打折扣后实交额的利息率就是百分之四二五，到一九一一年按所欠银数核计就达年息百分之五点六七；从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三四年偿清时止，所得利息合计达库平银一万万一千七百九十四万六千零六十七两，比所付本金超过百分之一百三十点二”。

第二是银行发行公债所得的利润。“查泰西银号揽办各国国债，无不以散售股票为聚集巨款之计”。购买股票的人一多，就可以高于股票票面价值的市价出售。在俄法借款中，“银行从四亿法郎的中俄公债中得到百分之八的利润”，即 3200 万法郎。事实上，“在借款时，债务国所得到的通常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十被银行和其他中介人拿去了”。

第三是利用借款取得的特权来保证利润的收入和扩大投资。俄法《四厘借款合同文件》规定：“借款之事，中国声明，无论何国、何故，决不许其办理照看税入等项权利。如中国经允他国此种权利，亦准俄国均沾”。所谓“办理照看税入等项权利”者，按照其相应的外文条款乃是“监督或管理中华帝国任何国库收入的权利或特权”。这就是说，俄国要通过这项政治奴役性的条款来保证取得垄断利润。如所周知，英国早已通过英人赫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这个事实，业已取得了中国海关关税的监督权或管理权；现在俄国通过借款要求均沾。此外，俄国当然也包括法国在内，利用这次借款还取得了其他各项让与权来扩大投资掠夺权利的事实，如中法《商务、界务条约》之签订等等，我们在本书其他各处还要谈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1895 年 12 月 10 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法、俄两国的金融资本家就在这次借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参加这个银行的法国银行有霍丁格尔公司银号、巴黎和兰银号、利杭银行和巴黎爱斯刚脱银号等，俄国银行则有森彼得堡各国商务银号等；银行资本共计 600 万卢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628 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774 页。

徐义生：《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外债》，《经济研究》1957 年第 4 期。

许景澄奏（1895 年 7 月 10 日），见《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3647 页。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775 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775 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630 页。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 1 卷，第 41 页。按当时中外所订条约，遇有可疑及不符之处，均以外文为准。关于俄法借款《合同》，“彼此言明专用法文缮写，各不配本国字以从常例。”[《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3647 页]

麦克拉斯：《中国年表》，1982 年英文版，第 177 页。按华俄道胜银行（The Rus-so—Chinese Bank Association）于 1910 年改称道胜银行（The Russo—Asiatic Bank）。

布，其中法国资金占 5/8，俄国占 3/8。维特供认，法国银行的代表奈斯特和霍丁格尔都曾到这里来，“请求我帮助他们由法国方面来扩大在中国的银行活动，以此作为他们向我贷款的酬劳。于是，根据我的提议和这些法国银行家的请求，我筹办了华俄道胜银行”。实际上，“俄国政府保留着对银行的控制权，因为董事会的八个席位中法国人只占三席，而五个俄国董事实际上是财政大臣委派的。法国人对此得到的许诺是：在中国领土上发生国际纠纷时，俄国政府全力支持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成立后，迅即在北京、上海和汉口（俄国人在中国的茶叶贸易中心）设立分行，同已经在华南活动的东方汇理银行一道，成为法英、俄英争夺东方市场的政治角逐中不可小看的工具”。

根据它的章程，华俄道胜银行拥有的“权力极大，如供给商业资本、发行钞票，鼓铸当地货币、取得建筑铁路及架设电线让与权，自行买卖货物，代客买卖不动产，经营各种保险事业及运输货物等”。它的资本增加得很快，从 1895 年底的 600 万卢布猛增到 1897 年的 1125 万卢布，到 1899 年“据估计达到了 2000 万卢布”，增长了 3 倍多。它的股票价值也跟着猛增，使资本家大获厚利，“在一八九七年每股的股息是七卢布五十戈比，到一八九八年就增至十三个卢布，到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更增加到十五个卢布”。

华俄道胜银行在维特的主持下，实际上是代表法俄两国金融资本为瓜分中国而组成的资本家垄断联盟。虽然就它的资本来看，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曾挖苦地说它不是“华俄道胜银行”，而应是“华法道胜银行”。但是，就它受沙俄政府的控制来看，它确是一个“俄国的国家银行，而由一个国家银行来经营的企业则是具有政治目的的”。当时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华俄道胜银行就等于是俄国政府”。

二、德英银行总会与英德借款（1896 年 3 月）

在借款让与权争夺战中，俄、法集团的胜利使“英国驻北京公使（欧格

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6 页。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第 46 页。按华俄道胜银行总行在圣彼得堡，它在中国的分行除北京、上海、汉口外，还在哈尔滨、吉林、沈阳、齐齐哈尔、铁岭、海拉尔、旅顺口、营口、宽城子、乌鲁木齐、宁远城和喀什噶尔等处设立了分行，加上它在法国巴黎、日本横滨、神户、长崎和俄国莫斯科、撒马尔罕、雅库茨克、波达伊波、恰克图、赤塔、海兰泡、庙街、伯力、海参崴等地的分行，总共有 30 多个。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于 1896 年在香港，1898 年在上海、天津设立分行。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第 417—418 页。

同上书，第 558 页。按华俄道胜银行于 1896 年曾经让清政府“以库平银五百万两与华俄道胜银行伙作生意”（《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671 页），但清政府并未付出现款。到 1911 年 8 月该行改组时，清政府所持有之 500 万两股票，在银行资本猛增 3 倍多之际，却缩减到 350 万两。

斯拉德科夫斯基：《一九一七年以前中俄经济关系史》，1981 年莫斯科英文版，第 253 页。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第 152 页。按华俄道胜银行的真正名称应是“法俄道胜银行”。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341、337 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341、337 页。

讷——引者)对这项借款愤怒地加以抗议,德国由于被俄、法排斥,被迫和英国携手”,组成一个新的金融集团——德英银行总会,向清政府强行借款。

1895年12月,英国汇丰银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和德国德华银行(Die Deutsch—Asiatische Bank)达成合伙兜揽清政府第二次大借款的协议,组成德英银行总会。德英银行总会按其外文名称直译是“英德辛迪加”(Anglo-German Syndicate),正如法俄银行界对华借款组成“法俄辛迪加”一样。

汇丰银行于1866年在香港注册成立,1867年在上海设立分行,1885年又在北京设有分行。“它在一八八一年就十分确定地赢得了对华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英国很多商行同它有利害关系。同一切海外银行一样,人们谴责它只为英国人的利益而采用非法手段操纵贸易,并且为了它自己的目的来使用这些收入。这是造成它压倒一切金融势力的重要原因,使它成为英格兰银行的强大支柱”。到19世纪末叶,汇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远东首要的国际银行”,它完全是“按英国政府的要求来办事的”。它在其成立之时,于70年代就已借款给清政府,攫取了厚利,被看作是香港“非官方的造币厂厂长”。汇丰银行在开始营业时只有资本港币250万元,到19世纪末增长4倍,达港币1000万元。

至于德华银行,它的成立时间比汇丰要晚一些,是在1889年2月在俾士麦的支持下于柏林设立的,资本总额500万两。投资股份最多的是“德国和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的‘贴现公司’(Disconto—Gesellschaft)”,其余几乎所有德国在国外有利益关系的银行都入了股。1890年1月2日,德华银行在上海开张营业后,立即参与了借款给中国的活动,如同年4月的山东河工借款40万两,就是由德华银行贷款的。

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组成德英银行总会后,即由英国新任驻华公使窦纳乐与德使绅珂向中国提出借款条件。与此同时,俄法集团在第一次借款成功后还拼命争取第二次借款。1896年3月初,法国财政部长在巴黎“力促银行辛迪加承办借款”,并“答应在中国海关内派法国代表”作担保;另一方面,法使施阿兰则在北京“力促总理衙门接受法方贷款,条件之一是法国管理海关”。当时盛传“俄法包揽了所有借款,不光是控制海关,而且控制全中国”。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53页。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1卷,第56页。按辛迪加是资本家的垄断同盟的一种形式,此外尚有卡特尔和托拉斯等种种形式。当时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基本上都采用辛迪加这种形式,因为参加辛迪加的企业主要是在流通领域内实行集中和垄断,但在法律上和业务上仍然是独立的。当参加辛迪加的各个成员的力量对比或市场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他们可以要求重新分配定额和改组辛迪加领导机构。辛迪加这种垄断组织的形式,比起卡特尔的协议来较为稳固,比起那使参加者在法律上和业务上都完全丧失其独立性的托拉斯来,它又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其国际性的垄断组织中所能接受的唯一的形式;因此,当时,在华的外国公司或银行团,基本上都采用辛迪加这种垄断形式。

季南:《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五年间英国对华外交》,第269页。

柯立斯著,李周英等译:《汇丰——香港上海银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71页。

雷麦:《外人在华投资》,第342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57页。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206页、207页。

赫德闻讯后于3月6日赶去总理衙门，施阿兰也紧跟而去，对总署大臣们“大肆咆哮”；翁同龢当其冲，感到处在让与权争夺战中的日子很不好过，“终日在犬羊虎豹丛中，可称恶劫”。结果，清政府被迫接受英德贷款，总理衙门于3月6日当天就把借款事交赫德办理；7日早晨，赫德“就办妥了”。

1896年3月23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英德借款详细章程》由汇丰银行熙礼尔（E.G. Hillier）德华银行乌尔比希（Urbig, Franz）代表德英银行总会为一方，中国国家代表总理衙门为一方在北京签订，向清政府贷款1600万英镑（约合银1亿两）。款额由汇丰、德华两行均分，“各分一半”；中国借款实收94%，1600万镑是“虚数”，实收数是“一千五百零四万镑”；“此借款常年利息，按本银虚数系五厘，合每年八十万镑”。同俄法借款一样，限期也是36年，并“以中国通商各关之税银抵还”；“此借款定为三十六年清还其本银，每年付还十六万六千九百五十二镑”。“英德借款的利息率形式上是年息百分之五，实交额的利息率是百分之五点二六，到一九一一年按所欠银数核计就达百分之六点八八。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三二年偿清时止，所得利息达库平银一万万四千一百一十六万五千八百三十二两，比所付本金超过百分之一百五十二点七”。此外，这“一千六百万英镑的借款，银行经办这种业务通常收取贷款额百分之二的手续费”共32万镑；至于中介人的手续费，我们虽无具体数字，想来也不在少数。个中情形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帝国主义阶段，在纯粹经济活动上发生了某种转变，出现了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

不论是1895年的俄法借款，还是1896年的英德借款，也不论其利息是四厘还是五厘，到最后单就利息而论，都大大超过本金；购买中国公债等于买进“金边股票”，特别有利可图，所以英国的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高尔斯华绥就把帝国主义时代讽刺为一个“金边股票的时代”。列宁指出，这种利息款额的收入“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国家的坚实基础，就是极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正像1895年俄法借款中人们拥挤着“在巴黎里昂信贷银行（即利杭银行）门前排队认购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206页、207页。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1896年3月6日）。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207页。按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熙礼尔（Hillier, Guy）在这次借款中“干得很漂亮很果敢”，赫德认为，“如果他没有这样干，汇丰银行势必会失去这笔业务”（见柯立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第36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42—644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42—644页。

徐义生：《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外债》，《经济研究》1957年第4期。

柯立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第36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49页。

高尔斯华绥著，周煦良译：《福尔赛世家》第一部，第XIII页。按金边股票（gilt-edged stocks）指由政府担保的股票，主要指那些向殖民地作资本输出而发行的债券。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故称这个时代为“金边股票的时代”（gilt-edged period）。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84—785页。

中国公债”的情况一样，如今，英德借款在 1896 年 3 月 23 日一经签订，26 日金登干从伦敦给赫德来电就说它的“ 债票市价已超出票面百分之一以上， ” 并根据赫德本人存款“ 在英格兰银行的私人帐户内结余七千多镑 ” 而询问他“ 是否认购 ”。29 日赫德回电，他自己“ 认购二万五千镑 ”。 赫德这个干金融勾当的“ 天才 ” 当然是不会放过机会的。

《英德借款详细章程》还规定：“ 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 ” 即由英国人任总税务司来控制中国财政。在“ 三十六年期内，中国不得或加项归还，或清还，或更章还 ”， 即不得用任何方式或方法来提前偿还借款，从而不使控制海关之权从英国落到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手中。显然，这是针对上述俄法《四厘借款声明文件》而提出来的，所以赫德在《章程》签订之次日就说：“ 借款签字，海关终获保全 ” 在英人手中了。虽说俄使喀西尼“ 反对英国染指借款 ”，“ 极不甘愿英方分占借款 ”， 法使施阿兰“ 也竭力为法方争夺借款 ”，“ 但是他们的额外条件，管理海关和总税司（赫德——引者）的迅速行动，终使他们失败 ”。 赫德认为，俄法的政策是“ 反英的，力图在陆军、海军、铁路和财政各方面，特别是在最后两方面排斥英国人，如俄法控制借款和海关，中国就须听命于他们，而不肯听任何人（英国人——引者）的话了！ ”

古贝尔主编：《世界通史》第 7 卷，三联书店 1975 年版，第 108 页。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 215 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642—643 页。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 213 页。

同上书，第 209 页。

同上书，第 208 页。

第三节 铁路让与权争夺战

铁路让与权争夺战是紧接着借款让与权争夺战以俱来，并且是同矿山让与权争夺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帝国主义列强借款给清政府后，随即要求铁路建筑的让与权；而铁路所到之处及其沿线地区的矿产自然也成为掠夺的对象。路矿一到手，领土让与权的要求也就随之而至了。“自中日战后，外人窥伺中国益亟，侵略之策，以揽办铁路为先”；列强“始则借路攘地，终必因路割地，后患无穷”。因此，铁路让与权在借款让与权和领土让与权之间，成为列强瓜分中国的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它的重要性是十分突出的，甚至形成为列强对华的所谓“铁路征服”政策（The Policy of “Conquest by Railways”）。这种“铁路征服”政策，当时的人们把它叫作是“铁路政略”。“今一言说破之，铁路政略，即殖民政略也；殖民政略，即侵略主义也”。“铁路政略，今列强于东亚大陆柔缓侵略之独一手段也”。参加让与权争夺战的列强也特别看重修筑铁路，认为在中国，“铁路的发展乃是具有最高的重要性的问题，没有一个关心远东的人看到由此引起的国际敌对而能够无动于衷的。如果这种敌对仅仅在金融方面，那么情况也许无关紧要。在一个充分强大、足以保持自主的政府之下，谁去修筑铁路都没关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铁路修起来。可是，清政府在政治上是依赖他人的，因此就必须明了，外国在国家主持并在国家帮助下修筑起来的这些铁路在将来会被认为是要求承认领土所有权的根据”。因此，所谓“铁路征服”政策也就是开拓殖民地、瓜分中国的政策。

正如列宁所指出：铁路在当时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总结，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标志。”它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却“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体系”。

一、《中俄密约》与《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1896年6—9月）

我们在上面谈到了在1895年底成立的华俄道胜银行，“这个银行的目的就是要把所谓的‘铁路征服’政策付诸实践的”。它同沙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兴建，关系极为密切。维特曾于1892年11月18日上奏沙皇说道：建筑西

《清史稿》（十六），中华书局1967年版，第4435页。

盛宣怀：《致翁斌孙电》（1896年5月11日），见《愚斋存稿》卷八九，第11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83页。

转引自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八六三至一九一一年）》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20页。

伦敦中国协会：《致索尔兹伯里》，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40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33页。着重点系原书所有。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83页。

伯利亚铁路是一个“世界性事件”，它“将保障俄国舰队得到一切必需品，并将在我们的东方港口中为它提供一个坚固的据点。”“因此，随着铁路的通车，这支舰队可能大大加强，一旦在欧洲或东亚发生政治纠葛，它都将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从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把西伯利亚一百四十二万平方俄里（宽度按铁路两侧各一百俄里计算）辽阔而且大有希望的地带再度并入大俄罗斯主权国，或者按列宁的说法叫做‘经济征服’，这一地带等于当时的德国、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加上丹麦那么大，也就是一块够用上很长时期的殖民地”了。沙皇俄国出于它“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征服他人领土的强烈野心，依靠巴黎交易所的贷款，以“超越一切先例”的年平均建筑“五百八十七俄里”的速度，到1895年已经修筑到外贝加尔；三国干涉还辽和俄法借款的成功更使它作出强迫清政府同意这条铁路通过我国东北境内，直达海参崴的决定。

实际上，早在1895年秋，沙俄就已派员到我国东北查勘路线，事后俄使喀西尼才于10月1日照会清政府，“以该国兴造西伯利亚铁路，须预先查明路经所过，以择趋向，拟派游历人四起，由乌苏里、黑龙江前处交界起，分道前来内地查勘，并请电饬照料”。“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底，虽然筑路情况并未公布，但是大家知道，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将不会北向远绕黑龙江、再沿乌苏里江南行，而是将穿过满洲，‘从尼布楚笔直地到达海参崴’。”11月30日，“中俄达成秘密协定，允许西伯利亚铁路穿过满洲”。到1896年春，维特利用沙皇尼古拉第二加冕典礼的机会，特意安排了李鸿章去俄，否认了清政府原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为祝贺专使的决定，就为的是索取这项铁路让与权的缘故。1896年3月28日，李鸿章等人自上海启程赴俄，维特派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吴克托（Oukhtomsky, H. Prince）专程去塞得港迎接；

转引自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5、58页。着重点系原书所有。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页。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35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2页。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八，第1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82—83页。

麦克拉斯：《中国年表》，第177页。

按李氏此行，曾经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特别使团，其中不仅包括了他的儿子李经方、李经述和罗丰禄、马建忠等人，还有几个任职中国海关的外国人：俄人五品衔副税司柯乐德（Victor von Grot），德人二品衔税司德瑾琳（G. Detring），法人三品衔税司穆意索（A. M. de Bernières），英人花翎头品顶戴税司赫政（James H. Hart），美人三品衔税司杜德维（E. B. Drew）等充任特使参赞来作李氏的顾问。李氏自认为这样就“无负特遣专使之意，亦以慰殊方慕之忱”[《光绪朝东华录》（四），第3735页]。其实，对于俄国人来说，“中国使团的人员组成是再好不过了。”李经方“以贪婪出名”，罗丰禄是“同样贪婪的李鸿章的亲信译员”，李氏“随带的‘财政事务代理人’是一个名叫维克托·柯乐德的俄国臣民，他是中国海关的职员，俄国驻北京公使特地把他推荐给维特”的。事前，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Rothstein）就已经同柯乐德商谈了铁路的建筑和经营的计划，被柯乐德“欣然接受了”（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99、101页）。李氏奏折中所称“俄使喀希尼亦请酌带俄员现充税司者就地照料，更昭妥协”[《光绪朝东华录》（四），第3735页]等语，即指柯乐德；可见李氏此行，在各方面都受到俄人精心策划的控制。签订《中俄密约》后，李氏一行途经德、荷、比、法、英、美诸国，于1896年10月3日返抵天津，10月17日赴都复命。

4月30日到达圣彼得堡，随即开始了秘密会谈；5月26日在莫斯科参加了尼古拉第二的加冕典礼；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他同维特和罗拔诺夫分别代表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所谓的《中俄密约》。维特以中俄两国共同反对日本侵略和将以300万卢布对李鸿章个人进行贿赂作为诱饵来迫使他就范，签订这项密约：

1. “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领土，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2. “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等等。

现存俄国财政部档案表明，维特曾经答应李鸿章，“如果建筑铁路一事顺利成功，将付给他李鸿章300万卢布。”为了“至少能让李鸿章对于所承诺的款项已正式确定拨付感到放心”，在《中俄密约》签订之次日，即6月4日，维特匆忙地搞了一个“给李鸿章过目”的《议定书》。这笔300万卢布的贿赂后来被称作“李鸿章基金”。

当李鸿章出使俄国之际，由美国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哈里曼金融集团组成的辛迪加——华美启兴公司（The American—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的代表美人柏许（Bash, A.W.），于1896年4月也在北京进行谈判，要求承办修筑由北京经汉口直达广州的铁路干线，并延伸入东北把这条干线同西伯利亚铁路衔接起来。这一切都由这家公司独家承包。美国这套计划与沙俄是尖锐对立的，被看作是“两个大规模谋夺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计划直接遭遇的第一个回合”。柏许“过于自信，直截了当地向璞科第和喀西尼讲述了自己的计划，建议同俄国政府订立‘密约’，以便俄方可以通过该约获得美国公司的股票和证券。”实际上，柏许的建议“不仅在政治意义上，而且在经济意义上都是与维特制定的满洲铁路计划针锋相对的”。柏许计划由于6月3日《中俄密约》的签订而宣告失败。这项密约虽说俄国政府一直加以否认，李鸿章也说过“中俄无密约，有妄言余往俄都觐面画诺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50—651页。按此约于同年9月28日被清政府批准。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06—107页。按这笔贿赂，李鸿章并没有完全得到。1896年9月8日《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签字后，按《议定书》规定，第一次付给李氏100万卢布的期限便到了，不过拖延了很久。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吴克托以汇款到上海，“指明交给某人”会“泄露机密，引起李氏一家惶恐不安”，于是，吴克托决定“亲赴上海，亲手‘如数付款’”（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08页）。实际上，吴克托是在“一八九七年夏前往中国”的，“把一百万卢布交给李鸿章之后”又同时提出新要求（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第68页）。当时，“由于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经过中介人十分顺利地“在上海交付了”那100万元。“老头子（即李鸿章）是等得不耐烦了”，“实在不能再继续拖延履行（诺言）了。”他们认为：“趁着李鸿章和皇太后还活着，在他们身上下赌注是合算的”（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50—151页）。虽说如此，不过“另外的两个一百万，李鸿章则根本没有收到”（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09页）。所以，李氏认为很可靠的贿赂，实在是一个很复杂的诡计。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11页。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第58—59页。按璞科第（D.D.Pokotilov）是华俄道胜银行董事并任该行驻北京代表。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者，误之甚矣”的话；但是，它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早已甚嚣尘上，并被称为所谓的《喀西尼条约》（Cassini Convention）。

根据《中俄密约》，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吴克托与该行总办罗启泰等与清政府特派代表、出使俄、德、奥、荷大臣许景澄在1896年9月8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于柏林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章程规定：

1. “华俄道胜银行建造经理此铁路，另立一公司，名曰：中国东省铁路公司（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 Company）。”“该公司章程应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一律办理。”“该公司总办由中国政府选派”。据1896年12月在圣彼得堡批准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条例》第十九节规定：“公司董事会由股东所推举的九个成员组成，董事长（即总办——引者）由中国政府指定，副董事长由董事推举。”“公司的总办是唯一的中国人，他的职权严格地局限于下列两点：（1）察公司对中国政府应尽义务的履行情况，（2）经办公司与中国中央及地方当局的交涉事宜。”至于副董事长，则专任公司管理及经营，大权在握。财政大臣维特有权批准副董事长、总工程师和所有其他官员的提名，这样他就在实际上控制了这条铁路，而所谓公司总办则不过是一个傀儡。

2. 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与俄之赤塔城及南乌苏里河之铁路两面相接”；“铁轨之宽窄应与俄国铁轨一律，即俄尺五幅地（5 Russian feet），约合中国四尺二寸半。”“凡该公司建造、经营、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与，民地则按时价由公司收购或按年纳租。“凡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由该公司一手经理”这句话的法文本是“该公司对于它的土地应有绝对的和独占的行政权（La Société aura le droit absolu et exclusif de l'administration de ses terrains）”；按当时惯例，条约的解释以外文为准来看，铁路沿线公司的大片土地根本不受清政府管辖，实际上成了俄国的领土；因为华俄道胜银行本是“一个政治和金融机构的混血儿，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稍加伪装的俄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由它来设立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如果在理论上可以说成是一个独立的公司的话，那么实际上它简直就是俄国政府的一个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就可在这片土地上为所欲为了。“在被指定修筑铁路及铁路附属土地上，法律和秩序之维持应由公司任命警察人员担任”。这个所谓的警察人

《李傅相游历各国日记》，转引自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38年版，第397页。

参阅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1卷，第79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72页。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1卷，第88页。按其中第一点应读作“考察中国政府对公司让与权的履行情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14页。按清政府指定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董事长，即总办为许景澄，副董事长是俄人克尔贝茨（S.I. Kerbedz）。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72—673页。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1卷，第76页。

罗森：《四十年外交》，1922年英文版，第1卷，第198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列强对华外交》，第167页。

《中国东省铁路公司条例》第八节。见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1卷，

员的配备，实是沙皇俄国攫取到的铁路及其附属土地上的“驻兵权。一八九七年底，一八九八年初，第一批护路军五个骑兵连（七百人）进驻中东铁路沿线。到一九〇〇年初，护路军已拥有八个步兵连（二千人）和十九个骑兵连（二千五百多人）”。“这是驻扎在我国领土上的一支殖民军队”。再加上公司在这里开采矿山，架设电线并经营其他企业，就使这大片土地“俨然成了‘在中国疆域内建立的俄罗斯帝国’”。

3. 合同规定，“自该公司路成开车之日起，以八十年为限”；“八十年限满之日，所有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全归中国政府，毋庸给价。又从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有权可给价收回”。在维特看来，所谓36年后赎回铁路乃是难以实现的。他说：“中国所给与的铁路让与权的条件，对俄国来说乃是非常有利的。章程规定三十六年之后中国有权赎回此路；但是，赎路条件是中国政府担当不起的，致使它在任何时候想达到赎买的目的都非常不可信。我算了一下，如果中国政府在第三十七年度之初要赎回这条铁路，那么按照让与权的条件就必须偿付给公司一笔不下于七万万卢布的款项。”至于80年后铁路归中国政府所有的话，照维特当时对瓜分中国形势的估计看来，那不过是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何况他的野心大得很，还不仅限于侵略中国的东北呢！

这样，通过《中俄密约》与《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的签订，到了1896年底，“俄国政府开始实现它自北方和平侵入中国的计划方面已经成功了。它不仅取得了采矿权，而且根据这个铁路章程还取得了管理部分中国领土的权利和派遣它的军队穿过中国领土的合法权利，并且在警察保护铁路规定的掩护下，它的军队则以‘护路兵’的名义占领了中国的领土。俄国人的成功在于，他们在更大的规模上取得了他们的法国盟友在中国南方所取得的东西，即无限期地实际控制一条穿过中国领土的铁路”。“靠了这条铁路，俄国开始从事于一项帝国主义的冒险事业，要把北部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中国让给了它沿着铁路全线长达一千零八十一英里的一片狭长地带的领土，实际上是把中国在那个地区的主权让给了该公司”。这条铁路于1897年春开始动工修筑，大批沙俄殖民地移民和筑路人员涌入了铁路地区，妄图把我国东北变成他们所谓的“黄俄罗斯”。我们知道，《中俄密约》本是维特对李鸿章“进行收买，取得让步的结果”，这些让步大大地超过了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建议所包含的俄国的要求”。但是，李鸿章却自己另编了一套说法。据称：“方李出国时，黄遵宪谒之于上海。李语黄曰：‘连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及《中俄密约》成，归又语黄曰：‘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另一说则谓“李合肥与俄联盟，保五年太平”。

第86页。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第35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74页。

亚尔莫林斯基：《维特伯爵回忆录》，第95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167—168页。

《联共（布）党支简明教程》，第75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02页。

左舜生：《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下册，第387页。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四），第141页。

这大概是李氏回国后向清政府汇报时的一个估计。实际上，密约与铁路合同的签订只能加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进程。在瓜分狂潮即将到来之际，李鸿章却还在那里侈谈“保五年太平”或保“二十年无事”，大言不惭地自欺欺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奇谈怪论如果不表明中国封建买办统治者的昏聩糊涂，那就如实地反映出他们毫无心肝的国贼面貌。

二、《卢汉铁路借款合同》（1897年5月）

继1896年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之后，在1897年又有中比《卢汉铁路借款合同》之签订。

由卢沟桥直达汉口的卢汉铁路，早在1889年已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条陈筹建；到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同年7月19日，张之洞又上奏清政府，认为“日本之和不可恃”而提出“宜亟造铁路”。他说：

“方今地球各国，无一国不有铁路，千条百道，交错纵横，军民农商，事事称便。……即以日本论之，该国变法才二十年，而国势日强，几与各大国抗衡；寻其收效之著，实莫如铁路一端。……军事之兴（中日甲午之战——引者），一切隔阂，兵饷军火，转运艰辛，劳费百倍而仍有缓不济急之患；使铁路早成，何至如此？中国应开铁路之地甚多，当以卢汉一路为先务；此路南北东西，皆处适中，便于通引分布，实为诸路纲领，较之他路之地处一偏，利止一事者，轻重缓急，大有区别。……前曾与比国柯克里大铁厂议及此事，该厂亟愿承办。此外尚有奥国、美国商人亦请承办。……惟此事断不宜英、法诸大国商人包办，恐获利以后，收回或费唇舌。惟小国远国商人，则无此虑。若中国自办，则委员视为利藪，旷时糜费，十年亦难成矣。”

1896年10月20日（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清政府设立铁路总公司，任命“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著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并奉准举借外债，先造卢汉铁路。

卢汉铁路是贯穿中国心脏地区的所谓“中权干路”，帝国主义列强都纷纷谋求此路的借款和修筑的让与权。最早取得在华铁路让与权的法帝国主义者，蓄意要把他们在中国南部的铁路同俄国在北部的铁路接联起来，所以在卢汉铁路的修筑“一被提出讨论的时候，法国公使（施阿兰——引者）便立即为他本国人要求修筑此路的权利”。早在1896年4月，代表华美启兴公司的柏许曾在北京活动修筑此路，当时虽无着落，但在同年11月1日，他就同盛宣怀签订了卢汉铁路借款草约。美国前参议员，华美启兴公司董事华士宾（Washburn, W.D.）于同年12月28日赶到上海活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1897年2月15日致函美国务卿奥尔奈说，他以“强有力的根据期待美国辛迪加（华美启兴公司——引者）与盛道台签定合同，而这项合同将可全盘控制中国的发展”。

在此前后，英德两国也曾在那里积极活动。据中国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英人金登干于1896年9月12日致赫德电中透露，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瑾

《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四，第5—6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3870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176页。

《美国外交文件》，1897年，第278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琳八月二十八日返德，携有仿照海关制度管理中国铁路的计划”。因为他“想取得现在中国铁路督办盛宣怀的地位”，而一般德帝国主义者也认为，中国应该给与德国“到汉口的铁路建筑权”。同年11月20日，金登干在致赫德电中又说，他“秘密得悉，英国下院议员摩根应李鸿章的急电邀请，将去中国，接洽关于矿山铁路等利权”。“据告诉我的人了解，摩根带着克松和张伯伦的介绍信，索尔兹伯里勋爵并且已电令莫纳乐给摩根以有力的支持”。1897年3月，英国银公司（The British and Chinese Corporation）的代表曾提出400万英镑的借款草约，条件是粤汉铁路由它修筑；4月14日，盛宣怀致总署电称：“美商及英、法、德各洋行议借款，数月不成。近有英人恭佩珥，称系中英公司（英国银公司——引者）首董培垒派来，专议路债，已议定草约。”该公使帮办于5月16日在武汉找到盛宣怀面谈说：“伊公司德亦在内”，即不只是英国，也包括德国股份。

卢汉铁路借款让与权的争夺战是十分激烈的，内幕也很复杂；但是，最后把借款兜揽到手的却是高于俄法集团的小国比利时。比利时不仅早同张之洞有联系，并且也跟李鸿章接洽过。在1896年7月8日至13日李氏访比之际，“他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第二曾就卢汉铁路的修筑问题进行过商谈”。实际上，法、比两国的金融资本家是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李鸿章、张之洞和盛宣怀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认为：“比、法银行相连”，“比无钱，必有法国在内。”法国虽未把它参与卢汉铁路借款让与权的事正式通知清政府，但法外长哈洛托却把此事告诉其驻华公使施阿兰说：“在法、比两国金融资本家的同意下，他认为应使华俄道胜银行获悉拟议中的交易”。“很显然，比利时是俄法集团的傀儡”。卢汉铁路借款不过是由比利时出面而由法俄操纵的借款，李鸿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微妙的。施阿兰说：

“我推测李鸿章是得到了华俄道胜银行的通知的，无论如何，他很精明，能够猜测到一个不含有任何使他不快的秘密协定的内在意义；李鸿章是整个谈判中的灵魂和主要人物。费葛男爵或我本人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有作过任何坦白承认或明确地私下表示过态度，虽然我从不加干涉而由费葛男爵行动，但李鸿章很快地就抓住了要害，理解到我们是同盟者。比利时在这件事情上与法俄一致的考虑只能使他满意，并且因为这和他自己所采取的、在他看来是中国应该遵守的唯一政策的总路线是相符合的，所以他更恢复了信心。在这个重要谈判中，如同中国政府在当时所进行的一切谈判一样，负起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7页。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122—123页。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10页。按克松（G. Curzon）时任英国财政副大臣，张伯伦（J. Chamberlain）任英国殖民地大臣。

转引自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八六三至一九一一年）》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1页。按英国银公司是由英国汇丰银行和英商怡和洋行（Matheson, Jardine & Co.）联合组成的一个辛迪加。英国银公司的成立，乃是英国外交部“选定它作为让与权争夺战的战略机构”的，它代表英国在华“既得金融利益团体和商人利益团体。”（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355、357页）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八六三至一九一一年）》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4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177页。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八六三至一九一一年）》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7页。

施阿兰：《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七年使华记》，第180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56页。

责任、提出建议并作出决策的就是李鸿章；总而言之，李鸿章是这个帝国的真正大臣和宰相，任何事情没有他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当他和费葛男爵之间进行长时间的预备性谈判时，即使他只不过是沉默或意味深长的翻翻眼皮，有时也还会提出某些恶意的询问，李鸿章也不只一次地使我理解到：他完全知道此事的一切最新情况，他完全赞成，并且他也秘密地知道我们的事情以及法比两国合作和一致行动的决心。”

我们知道，卢汉铁路借款谈判表面上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王文韶和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负责的，但它的实际决策者却是李鸿章。在具体工作中，张之洞和王文韶都是把事情交盛宣怀去办理，而盛则听命于李鸿章，“盛是李鸿章的代理人，李把一切都委之于盛”。观于当时李、盛之间的往来函电和 1897 年 5 月 19 日李所说“吾先递节略，极言比议可准”的话来看，事情就由李鸿章拍板定案了。

1897 年 5 月 27 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卢汉铁路借款合同》由盛宣怀与比国银行工厂合股公司（The Sociétefinancière et industrielle belge en Chine）代表马西（Masy）与海沙地（Rizzardi）二人在武昌签字了。《合同》规定：“借款四百五十万金镑，九扣实付四百零五万镑”；“比国公司借付之款，按年起息四厘（即每百镑每年起息四镑）”。

这个以比利时公司的名义来提供的借款，实际上“几乎所需款项的五分之四都在巴黎认定，余下的款项则来自布鲁塞尔，还有少数是由荷兰认定的”。6 月 28 日，巴黎《时代报》上披露了一份法国外交部的官方公报，庆祝法国金融资本的胜利，而这一胜利又“适逢铁路问题在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上注定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时候”取得的。

在签订《卢汉铁路借款合同》的同一天，盛宣怀筹办的中国通商银行（The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在上海开业。1897 年 7 月 27 日，盛宣怀与比国合股公司代表德福尼（Dufourny）与爱兰（Wal in）二人又在上海签订了《卢汉铁路借款续增合同》，把借款年息改为四厘四毫，规定付款“应兑于北京总银行，该行名曰‘协助本国工艺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pour favoriser l’Indus-trie Nationale）’，而中国铁路总公司则以所收之款，汇存于上海中国通商银行。此银行系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奉旨设立”。中国通商银行于 1897 年底在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处都开设了分行。1898 年 6 月 26 日，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比公司代理人总工程师俞贝德（Eugène Hubert）在上海签订了《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把原来的 450 万镑折合成为 11250 万法郎，把年息改为五厘，称“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之大清国铁路五厘借款”。

施阿兰：《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七年使华记》，第 182 页。按费葛（Baron Carl de Vinck）系 1896—1899 年比利时驻华公使。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 122 页。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 1 册，第 290 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709—710 页。

甘博士：《中国铁路企业之起源和发展》，第 102、99 页。

甘博士：《中国铁路企业之起源和发展》，第 102、99 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723—724 页。

第四章 帝国主义列强让与权争夺战与第二次瓜分危机（下）

第一节 领土让与权争夺战开始了第二次瓜分危机

酝酿已久的第二次瓜分危机随着领土让与权争夺战的开始而立即出现了。领土让与权争夺战基本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列强采取军事行动强占我沿海港口；一是划分所谓“势力范围”（The “Sphere of Influence”）。划分“势力范围”则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帝国主义列强本身之间关于它们怎样划分的谈判；二是列强在强占港口后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或直接胁迫清政府对中国领土的大片地区发表“不割让声明”（The “Declaration of Non-alienation”）以确认其势力范围。这些情况，在第一次瓜分危机中都是没有出现的。那时除了日本占领了我国的一些领土以外，第一次瓜分危机主要是表现在方案和计划上，而第二次瓜分危机则见诸行动了，它已经不是什么只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企图，而是强占沿海港口与划分势力范围。这就是说，列强已经在采取瓜分中国的行动了，它使中国人民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瓜分狂潮。

1897年11月，德军强占胶州湾是“瓜分中国的信号”。是“标志着中华帝国的逐渐的、然而却是进一步的瓦解”，在中国引起了急转直下的紧张局势。同年12月，俄军强占旅顺口、大连湾则是“瓜分中国的开始”，直接导致了1898年1月间帝国主义列强关于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的谈判。1898年2月，英国强迫清政府声明扬子江沿岸各省不割让给他国，把广大富庶的长江流域划作它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是把这个地区划定为英国在瓜分中国时应当得到的领土。此后各国相继效尤，“瓜分之局已成”。列强通过势力范围的划分，为的是“当中国‘这个病夫’死亡的时候，可以保证它们分享遗产”。换句话说，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乃是“抢在中国成为死尸（即成为殖民地——引者）之前的一种活体解剖（A Kind of vivisection of the anticipated Corpse）”。

领土让与权争夺战开始之日，就是第二次瓜分危机到来之时。它本身是借款、铁路、矿山等让与权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它又反过来促成了这些让与权争夺战的尖锐化，使1898年又成为列强对华“铁路征服政策”达到高潮的一年。

一、德军强占胶州湾（1897年11月）

德帝国主义者企图在中国沿海占领一块既可作为海军基地，又可成为通商口岸的地方的野心，酝酿已久。远在1895年4月17日，即中日《马关条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143页。

参阅《德国外交文件》（一），第199页。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第116页。

梁启超：《与夏穗卿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09页。

珀塞尔：《义和拳起义背景研究》，第92页。

约》签订的当天，德国外交部就收到了海军总部的密件，提出胶州湾、舟山岛、厦门、澎湖和大鹏湾等处作为选择的对象。德国之所以参加三国干涉还辽活动，照其前驻华公使巴兰德（M. Von Brandt）的供认，就是“和俄国共同行动，我们有可能从感恩的中国——当然，必须做到使中国感恩——得到一块地方为我们的海军停泊或屯煤之所。这地方，不论是割让或租借都行，因为两者实际上完全相同”。1895年10月29日，德使绅珂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所谓“储煤站”的问题。同一天，德国驻俄大使拉度林（Radolin）在圣彼得堡向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提出，德国在华取得“一个军港实在是需要的”。清政府认为此事“没有先例”，“不能进行这样一个要求的谈判”，而使中国“陷于一个极困难和危险的地位”。事情就这样拖延下去了，根本原因在于德国政府一时还决定不了哪个海港是它所希望占据的基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和选择，这样一个基地的目标就逐步集中到胶州湾了。1896年8月，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提督铁华子（Admiral Tirpitz）就在烟台向德国驻华公使海靖（Herr Von Heyking）讨论了胶州湾的优点：它有“一个安全的停泊处，容易设防而无需多大费用；又它的附近，如果我们相信李希霍芬教授在其有关中国的名著中所说的话，还有煤矿地层，能提供很大的经济利益。再如从我们将来要驻在那边的士兵的健康着想，胶州湾比较凉爽的气候也比华南海港高温气候更为合适”。同年11月3日，中国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瑾琳在德国同海军司令克诺尔（Admiral Knorr）会谈，他列举了胶州湾的七大优点而建议加以占领。这七大优点就是：

“（一）它的港口位置优越，不仅足以控制山东，且亦足以控制整个华北的进出口货物。

（二）它的位置也有利于船坞及码头的设置，因为它离扬子江并不很远，而那里吃水深的船只却没有进船坞和修理的机会；至于在北方，更根本缺乏船坞。

（三）它的后方资源丰富并有消纳力量，有煤铁及其他矿产足资开采。

（四）交通路线已经有了一部分，另一个部分也容易修筑，胶州堪为一条到达北京的铁路的良好终点。

（五）在体质与智力方面，这一地区的居民是全中国最优秀的。

（六）气候完全适宜于欧洲人居住。

（七）港内挖泥挖到足够的深度也没有困难，因为土地到处都含有软土；只要黄河中大量泥沙土被带至北直隶湾（渤海湾——引者）内，此处就无须顾虑新沙泥的淤积。……取得胶州……英国方面将不会有什么为难，因为英、德在华的利益是一致的。”

参阅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55页。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26页。

同上书，第101—102页。

同上书，第105页。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116页。按李希霍芬（Richtofen, Ferdinand）是德国地质学家，一个“公认的”“著名的中国通”，当时在德国政府中任“殖民局长”（同上书，第9、88、128页）。19世纪60至70年代，李希霍芬曾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进行资源调查，1877—1885年间他在柏林出版了《中国——亲身旅行和根据旅行研究的结果》一书共三大卷及一卷《中国地图集》。他很重视山东的煤矿以及胶州湾作为一个港口的重要性；他本人“是一个自觉的、有目的的代表外国资本，并且特别是代表德国在华资本的利益的人”（施丢克尔著，乔松译：《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3页）。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118—119页。

半个月后，11月18日，中国驻俄使馆参赞、原江南制造局翻译美国人金楷理（Kreyer, Carl）向德驻俄大使拉度林建议，仿照沙俄以武力和外交双管齐下的方法去夺取胶州湾。他说：“只有武力才是他们（中国——引者）唯一能懂的语言。”“俄人就是掌握了对付华人的唯一正确的方法。首先，他们从中国人手中取得帕米尔，从而显示其力量。然后，他们又施软功，把辽东退还他们。现在则又取得穿越满洲全境的铁路，这等于征服该省。俄人表示了他们能随意支配及处理一切，这就折服了华人。”1896年11月29日，德皇威廉第二最后决定用武力夺取胶州湾，把它作为建立远东德国殖民地的起点。为了夺取胶州湾，德帝国主义者曾经准备在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及其他地区对英国让步，曾经向日本表示不反对它对中国福建省所抱有的野心，曾经向沙皇俄国表明他们对其侵华计划准备给予支持的程度。1897年8月，德皇威廉第二访问俄国，沙皇虽然声称要保留军舰出入胶州湾的权利，但他却取得了德国海军强占胶州湾的谅解。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德国首相霍亨洛埃（Hohenlohe, Chlodwig）告诉威廉第二的要搞到一个制造事端的机会和借口了。

这个所谓“以合法手段掩饰非法暴行的阴谋诡计”的借口，终究由德国在华的传教士来提供了。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教士能方济（Franz Nies）和韩理（Richard Heule）在山东曹州府（今菏泽县）巨野县张家庄以行为不轨和作恶多端，被中国农民杀死。6日德皇接到报告，立即下令德国远东舰队从吴淞口去胶州湾登陆，次日即谕示外交大臣比洛（Bülow, Bernhard）说：中国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您的前任者——马沙尔——好久所期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刻动手”。11月14日，德国远东舰队驶入胶州湾，“德国棣提督（棣德立希斯 Admiral von Diederichs——引者）带兵上岸，勒令将胶州湾兵退出，以四十八点钟为度”。当天“早晨，三艘德舰及其提督进入胶州湾，有二百人登陆。他们立即破坏电报线。提督要求中国驻军首长在四十八小时内由港口及要塞撤退，否则就开火。中国军队后撤，大炮、仓库、军用品及物资都落入德军手中”。当时，胶州守将章高元曾要求抵抗，山东巡抚李秉衡也表示“非与之决战不可”。但总理衙门在15日却电称：“惟有镇静严，任其恫吓，不为之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衅自我开。”17日又电李秉衡说：“敌情虽横，朝廷断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言决战，致启兵端，必致牵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束？”事实上，正是清政府这种对领土不战自弃的投降主义才真正是“贻误大局”的，它造成了今后一系列的割地狂潮。

1897年11月15日，德皇召开御前会议，批准了对胶州湾的“永久占领”；“立刻募集一千二百人作为一支殖民军队，派往该处”；并“向中国尽量抬高我们的要求，务使其无法履行，因而有理由继续占领”。另一方面，却又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118—119页。

同上书，第128页。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147页。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第18页。

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2—103页，以后引用时简称《红档史料》。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第18、19页。

担心“中国向我们作战（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为了“防止”这一点，“中国的主权”，“应在占领的同时仍予以保存，也许用永久租借的方式向中国取得土地”。我们知道，德国在那时是一个“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 国家”；德皇威廉第二叫嚣的所谓“世界政治”（Die Weltpolitik）就是向外掠夺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政治。1897年11月德军的强占胶州湾，不仅“为列强瓜分中国发出了行动的信号，同时也是德国世界政治的开始。1897年12月，比洛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上就把这条路线确立下来了：‘我们谁也不愿意相形见绌，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Platz an der Sonne）’。”德国的世界政治，虽然在非洲以明显的失败告终；如今在远东却是走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最前面了，并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实际有用的先例”。在胶州湾被占两天以后，伦敦英帝国主义的喉舌《泰晤士报》于11月16日就立即对德军暴行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它说：

“德国人就不在北京搞什么规劝去浪费时间，那是准会碰到中国外交的数不清的拖延诡计的，德国的军队已经在胶州湾登陆了，为的是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让中国佬明白。……这种实验，我们自己就曾经作过多次，同通过外交协商途径去谋求达到任何目的相比，它的结果都是最佳的；可为什么我们却不总是去采用这种更加有效的办法呢，真使我们有理由感到奇怪。”

《泰晤士报》这番帝国主义言论，当时中国的爱国之士都是很熟悉的。康有为在1898年1月24日上呈光绪皇帝的《抗论德据胶州亟宜变法自强书》中就曾提起它，说是“英国泰晤士报论德国胶事，处置中国极为得宜”。在当时情况下，“德国人的行动特别给与了俄国人以深刻的影响，俄国立即如法炮制，但却机智得多了”。

但是，冥顽不灵的李鸿章这时却把他的唯一希望一厢情愿地寄托在沙俄的帮助上面。11月15日晚上，他在得到德军强占胶州湾的消息以后就立即去俄国代办巴布罗福（Pavloff, Alexander Ivanovich）处，“以中国政府名义恳切地乞求忠告，支援他们以便不使德军用强力占领港口”。“在以后几天中李鸿章数次派其秘书来我处探听”；李的目的“是拟利用目下的机会重新恢复其在最近时期略为动摇的威信，并明白地证明他是如何的正确，他坚持应无条件地最密切地与俄国接近，在艰难的时候只有俄国才是中国政府唯一可以依靠的国家”。实际上，他对沙俄的乞求除了得到几句像德占胶州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162—163页。

《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44—545页。着重点系原书所有。按“容克”系Junker一词音译，义为贵族地主。

蒙森：《帝国主义时代》，1984年德文版，第367页。按比洛这句传诵一时的“要求阳光下的地盘”的名言，见《德意志帝国议会议事录》（Verhandlungendes Reichstages）第1卷，第60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28页。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29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018页。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29页。

《红档史料》，第103页。

同上书，第112页。

“是不会长久的，海湾不久就会恢复正常秩序”的空话来自我安慰以外，毫无所得，的确是缘木求鱼！

至于清政府对要求德国撤军的谈判，则更是与虎谋皮，毫无结果。德使海靖（Heyking，Fdmund von）在强占胶州后向中国提出了六款横暴无理的要求：“一、革巡抚李秉衡职，永不叙用；二、给天主堂建筑费六万六千两，赔偿盗窃物品银三千两；三、钜野、菏泽、郓城、单县、曹县、鱼台、武涉七处，各建传教士住房，共给工费二万四千两；四、保以后永无此等事件；五、以两国人资本设立德华公司，筑造山东全省铁道，并许开采铁道附近之矿山；六、德国办理此案费用，均由中国赔偿”。清政府提出以德军自胶州撤出、再就六款进行谈判。海靖回答说：“撤退却是我唯一不能谈判之点。”

12月16日，德皇威廉第二任命的东亚远征军司令、海军上将普鲁士亨利亲王（Admiral Prince Heinrich of Prussia）“率领巡洋舰德意志号和格费欧号启程出发”来华。威廉第二在基尔军港发表了“‘铁拳’政策”的演说，要对中国“用铁拳打进去”，炫耀德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沙俄驻柏林军事代表恩加勒乞夫认为，“中国目下不能摆脱不请自来的‘文化提倡者’”。而在这支舰队，“海军步兵及大炮来到时”，“山东半岛将成为，即令不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是德国的领地”。

于是借口“曹州有驱逐教士、杀害洋人之说，德使复要求租借胶州湾”，清政府又只好被迫屈服。1898年3月6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李鸿章、翁同龢与海靖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 胶澳租界：“大清国大皇帝已允将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先以九十九年为限”。“德国所租之地，租期未完，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因胶澳内海面均归德国管辖，德国国家无论何时，可以妥定章程，约束他国往来各船；此章程，即中国之船，亦应一体照办”。这样，实际上就把这块地区，相当于今天的青岛市，变成了所谓的外国飞地（Foreign Enclave）而成为德国的殖民地。

在“离胶澳海面潮平周遍一百里内，系中国里，准德国官兵无论何时过调”。“德国在这里办什么事”，中国不得拦阻；“而中国要在这里”派驻兵营，筹办兵法，则须“先与德国会商办理”。因此，这样一个所谓“中立地带”（Neutral zone）的圆周地区实际上成了德国殖民者的保护区。

2. 铁路矿务等事：“中国国家允准德国在山东盖造铁路二道”：一道由潍县、青州到济南；一道由沂州、莱芜到济南。在“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攫取在山东的铁路、矿山让与权。

《红档史料》，第113页。

《清史稿·邦交五》第十六册，第4604—4605页。按“传教士”原文作“教师”，今改。

《德国外交文件》，第176页。

同上书，第180页。

转引自《前进报》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6页。着重点系原文所有。按光绪皇帝曾于1898年5月24日在勤政殿接受了亨利亲王的觐见。

3. 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在山东省内如有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为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中国应许先问德国商人等愿否承办工程，售卖料物”。这就是向全世界表明德国金融资本在山东全省享有特权，从而把它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德国帝国主义者这个首先抢夺沿海港口、攫取各项让与权、划分势力范围的模式立即为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所效法，开始了中国人民面临的第二次瓜分危机，形势非常严重。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诗人黄遵宪在《书愤》一诗中写道：

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
瓜分惟客听，薪尽向予求。
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
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所谓“珠崖”，诗人自注即指“胶州”。他深切感到，清政府放弃胶州以后的局势，开创了俄国强占旅顺、大连，英国强占威海卫，法国强占广州湾的恶劣先例，纵使秦楚纵横之日，契丹强占燕、云十六州之时，也比不上今天列强强占我国南北海口的咽喉，国家危亡的形势已经达到极点了。

二、俄军强占旅大（1897年12月）

在德军强占胶州湾以后不过一个月，沙俄舰队就驶入了我国旅顺口，这两个事件我们可以说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但是，清政府还在那里幻想俄国帮助他使德军撤出胶州，实在是有如痴人说梦。

“俄国的全部历史是无情地向外扩张的历史”。俄国政府要为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掠夺一个不冻港的野心，早已成算在胸。1895年5月，《俄国思想》在欢呼三国干涉还辽一事的“完全成功”时就说，这次成功“为通过外交谈判取得不冻港……创造了条件”。1896年签订《中俄密约》时，维特曾向李鸿章透露了这一信息；否则，“俄国舰队一年当中有五个月被冰封在符拉迪沃斯克（Vladivostok，俄语原义为‘东方的占领’，即海参威——引者）港内，哪还能起什么作用呢？”“在一八九七年和一八九八年之交动工修筑中东铁路干线以前，俄国即已就取得不冻港问题作出决定，选定了远处南满顶端，位于辽东半岛北直隶湾入口处的旅顺口”。1897年11月23日，即德军强占胶州湾后10天，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Murawieff，Count）就建议要“不失时机”地“占领旅顺口、大连湾”。俄皇尼古拉第二同意：“决不能失掉时机”。同年12月1日，在圣彼得堡的一次外交代表招待会上，穆拉维约夫直接告诉一个奥国人巴拉维西尼（Pallavicini，Markgraf），实际上是通过他间接告知德国代办齐尔绪基（Tschirschky）说，胶州湾事件并不“像许多人相信地那样严重”。照他看来，事情的结局一定是“皆大欢

《红档史料》，第119—120页。

《清史稿·邦交五》第十六册，第4605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38—740页。

转引自《近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67—268页。

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页。

转引自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第44页。

喜的”。后来，他更对德驻俄大使拉度林明确地说，现在俄国只能对德政府“表示感激，因为有了胶州的占领才使旅顺口、大连湾的迅速占领成为可能，否则在这方面就难于找到一个借口。这个占领将无限期的延迟，如果我们不先驶入胶州的话”。他又说，“胶州无论如何终究离俄国的利益范围太远，所以除了海参威外，还要有旅顺口或北直隶湾沿海一个同样不冻港，作为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这对俄国的东亚政策是绝对必要的”。

1897年12月15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俄国舰队在副提督伦诺夫（Rennov）率领下驶入旅顺口。先是，穆拉维约夫一面向中国驻俄公使杨儒说，德占胶州事，俄“愿效力，而难于措词，或请中国指定海口，俾泊俄舰，示各国中俄联盟之证，俄较易借口，德或稍敛迹”；另一面又指示其驻华代办巴布罗福，“要他叫中国政府放心，并声称我们到达那里是为了帮助中国免遭德国人侵害，保护中国不让德国人欺侮，只要德国人离开，我们也就离开”。清政府受骗上当，命令旅顺守将宋庆听任俄军强占旅顺口、大连。“十二月（一八九八年一月），俄以兵入金州城征收钱粮，阻之，不省。乡民聚众抗拒，俄人遂于貔口枪毙华民数十。奉天将军依克唐阿以闻，命出使大臣杨儒迅与俄人商办，议久不决”。2月17日，杨儒谒见俄皇尼古拉第二，“请俄船退出旅大，免中国为难，并保东方太平之局。俄君称，俄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据；而于退船一层，不答。又复婉叩，始云，俟春暖，拟离口，或留小船照看，惟冬令尚须回泊。又云，中国须拒他国兵船屯泊”。3月3日，巴布罗福照会清政府，提出租借旅大及建筑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的要求。同日清政府派许景澄为头等钦差大臣赴俄谈判。3月12日，许景澄同杨儒一起会晤穆拉维约夫，告以俄军占领旅大，“事关东方大局；中国允俄，则英、法、日亦必生心。中俄交密，务请体察”。穆拉维约夫回答说：“俄主意在必成”，即必须占领旅大；“词意坚持，大非昔比”，3月15日，许景澄和杨儒谒见尼古拉第二，“面陈中国难以允借旅顺、大连湾两口情形”；“如中国一允俄国，则英、法、日三国皆接踵要求，中国即不能自立，必致东方大局扰乱，务请俄国皇帝通盘筹画，看重睦谊”。俄皇回答说：“俄国在东方不能不有一驻足之地，现在外部所定条款及画押期限，实难改动。”同时，穆拉维约夫还恫吓说，如过3月27日，“约未订成，俄国另有办法”云云。

此时，退居幕后的维特出面活动了，侵占旅大实际上是由他来完成的，他通过贿赂的卑劣手段促成了条约的签订。他说：

同上书，第60页。

《红档史料》，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第56页。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184页。

同上书，第230—231页。按俄国强占旅大，维特在《回忆录》中曾表明他是不赞成的。罗曼诺夫认为这是维特本人炮制的神话，“所有自由资产阶级的报刊后来也遮盖了它们自己在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间与这种占领的主意有关的种种形迹，跟着维特这么说。但是这种神话现已证明是无稽之谈。”（《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第61页）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第28页。

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109页。

《清史稿·邦交一》第十六册，第4508页。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九，第18页。

“中国政府很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要求。摄政的太后和年青的皇帝一起到北京近郊的颐和园去了。她受了英、日两国外交官的影响，坚决不肯割让任何地方。鉴于这种情况，如果我们不能同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就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所以我电告我驻北京的代表（即华俄道胜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引者）去见李鸿章和另外一名大臣张荫桓，并以我的名义劝告他们同我们达成协议。我还训令代表馈赠两位大臣以各值五十万卢布和二十五万卢布的贵重礼品。这是我在同中国人办交涉中，第一次对他们行贿。

“这时我们的军舰停泊在旅顺口外，准备采取行动，这两位大臣多半是受了这个事实的影响去朝见太后，劝她让步。太后终于答应签署协定。这对于我们皇上是一件意外的快事。”

据说，当时光绪皇帝曾为此事而“大怒，面责恭邸（奕邸——引者）及合肥（李鸿章——引者），谓汝等言俄可恃，与定约，输以大利，今约期未半，不独不能阻人之来分，乃自谕盟索地，密约之谓何？盖李合肥与俄联盟，保五年太平也。恭、李皆免冠叩首曰：‘若以旅、大与之，密约如故。’上大怒向西后变色；后曰：‘此何时，汝乃欲战耶？’上默然而出”。

1898年3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李鸿章、张荫桓与巴布罗福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九款，主要内容如下：

1. “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

2. “旅顺口既专为武备之口”，“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

3. “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引者）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

4. “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隙地内“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5月7日，由许景澄、杨儒与穆拉维约夫在圣彼得堡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六款，确定了租地以北的隙地范围，“其北界线应从辽东西岸盖州河口起，经岫岩城北至大洋河，沿河左岸至河口，此河亦在隙地内”。在这个隙地内，“一、非俄国应允不将隙地让与别国人享用；二、不将隙地东西沿海口岸与别国通商；三、非俄国应允，不得将隙地地段内造路、开矿及工商各利益让给”。同时确定西伯利亚铁路接至旅大，“经过地方，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由于这条铁路贯穿东北各地，实际上就是把东北看作它的势力范围，并在次年把旅大租借地擅自改名为“关东省”。沙俄帝国

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十，电报，第29页。

同上书卷九，函牒五，第33—34页。

亚尔莫林斯基：《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03页。按维特说他是第一次行贿，其实他在1897年夏季已就“李鸿章基金”向李行贿100万卢布了。据罗曼诺夫统计，此次贿赂是在3月30日“付给了李鸿章六十万九千一百二十卢布五十戈比”；在5月和11月“付给了张荫桓十五万一千一百七十一卢布一戈比，共计六十六万二千九十一卢布五十一戈比”（《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第144页）。

康有为：《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二），第141页。

主义者“运用它的外交”，“既没有耗费人力——除了用小费的形式之外也没有耗费金钱——并且还没有在任何方面补偿衰弱不堪的中国，就取得了这些非常宝贵的让与权”。

三、列强关于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谈判（1898年1月）

根据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业已对帝国主义列强“彻底屈服”，对于他们瓜分中国、掠夺让与权的侵略要求，没有任何一项是它所能抗拒的。它能做的事，无非是在列强矛盾的罅隙中，适应于压力的大小而决定由谁来掠夺到手这份让与权罢了。自德军强占胶州湾和俄军强占旅大以后，形势急转直下，清政府手中这一小点仅存的在选择方面的自主权也快要丧失殆尽了。因为不管他同意或不同意，列强动用了武力来侵占中国领土，武力只能用武力来对抗，在“朝廷断不用兵”的决策下，它就只好任人宰割了。在胶州事件中，俄国代办巴布罗福的看法就是：“毋庸置疑，在中华帝国今日受压迫的情况及海陆军武力设备不完全的情况中，中国政府事实上自己没有任何方法能防止此种任意的攫取，甚至不能对德国政府安置在这些区域的这样较小的海军力量作任何一点点厉害的抵抗。因此，在目下情况中，中国的一切希望自然就寄托在其他外国的可能干涉上”。

当时，清政府所寄托的这个外国的干涉的希望，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划分中国为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时所产生的矛盾。实际上清政府从这些矛盾中除了进一步丧失主权以外，是根本得不到任何一点东西的。

这几年来，整个世界局势的重心显然是转移到中国来了。它的转移不是由于中国的强大，而是由于中国在清朝政府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极端衰弱，衰弱到不能保卫自己的领土，甚至连本身的生存都要去乞求于列强的维护。个中情形，正如1896年8月7日李鸿章在签订《中俄密约》后途经英国伦敦、在中国协会（China Association）为他举行的宴会上由他的秘书罗丰禄代他致词时所说：

“西人若借箸而筹，欲求治华之第一善策，务在不损其体统，不减其尊严；否则，治丝而禁，迫而酿成大乱，甚至百务荒废，难言底定之期。……今中英两国，……通商……毫无限制，利益均沾；……万一一撤国有损害自主权利之祸，必致波及于贵国，贵国仍应出其智力，奋其威武，匡扶而救平之。故敝国之倚仗贵国及通商诸国者，贵国亦断不肯袖手旁观；本大臣悄悄之忧，于此略能自慰矣。”

所谓“不损其体统，不减其尊严”者，即维护清朝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之意也。在李鸿章看来，这是列强“治华之第一善策”。就当时英国把印度，法国把越南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以后情况来看，印度的王公、越南的顺化阮氏王朝到底还是保存下来了。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41—742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54—755页。按“隙地”一词即所谓的“中立地带”（Neutralzone）或“中立区域”（Neutralground）。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279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01页。

《总理衙门致山东巡抚李秉衡电》（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七，第19页。

德军强占胶州湾以后，清政府主要是寄希望于俄国的干涉来使德军撤退，殊不知俄国正在利用此事来作为它强占旅大的借口，同时又作为它迫使德国承认其在华的势力范围的对策。俄国政府利用 1895 年冬清政府曾允许其舰队在胶州湾过冬的要求，同德国政府展开了讨价还价的谈判，提出“决不放弃”胶州湾作为俄国“海军海上根据地的优先权”，使德国认识到“必须付出一笔俄人所认为等值的代价”才行。经过双方外交官的往来谈判，俄国驻德大使奥斯登萨根(Osten-Sacken)于 1898 年 1 月 2 日向德国外交大臣比洛提出一份备忘录，声明“中国北部各省，包括全部满洲、直隶及新疆在内，是我们独占行动范围的原则，我们不能让任何外国势力侵入这些地区”。德方认为：“我们只希望俄国占居满洲及新疆；至于直隶，以其包括天津、北京在内，乃是一块肥肉。但如果俄国能诚恳地、有效地协助我们完成胶州协定，并承认我们在山东的、包括黄河在内的利益，则我们也可把直隶让给它”，但“对保留黄河直至河套为止一段地区作为我们的势力范围一点寄予极大的重视”。这就是俄、德两国关于瓜分中国北方的势力范围的谈判。在此前后，德国还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和对华野心而施展了它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以迫使他们承认强占胶州湾的既成事实。比如说对英国，它承认其在中国南方的势力范围，并使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完全了解德国占据胶州不仅不违反英国的利益”，还“会使俄国独霸中国北部海岸的局面受到障碍”。对日本，它深知其“能不惜任何代价”扩张领土，就向其暗示“关于或早或迟分配中国遗产的问题我们绝无意从原则上妨碍日本进取中国大陆的计划”。

1897 年 12 月 15 日俄国利用德占胶州而强占我国旅大的罪行，进一步促成了瓜分中国过程的连锁反应。帝国主义列强，其中特别是在中国本来占有实际垄断地位的英国看到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亟谋与俄国达成关于瓜分中国的势力范围的协议。1898 年 1 月 17 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授命其驻俄大使欧格讷说：“如果切实可行的话，你询问维特，英俄两国在中国的合作是否可能。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严重敌对的；另一方面，如要彼此为敌，我们彼此都能够大大加害于对方。我们最好是达成一项协议。如果我们能够认为俄国愿意同我们合作的话，我们愿意促进我国达到它在北方的商业目的。”

欧格讷在 5 天以后，于 1 月 22 日会见了维特，讨论英国的建议。维特认为：“俄国的地理位置迟早一定会保证她在中国北部的政治优势”，他认为：“中国南部，包括扬子江下游和上游，不在俄国的扩张领域之内，并且无疑是英国的优势范围(the Sphere of British preponderance)”，并问：“如果俄国对旅顺口的占领成为永久性的，英国会有什么意见？形势的压力可能使暂时的占领成为长期的”。欧格讷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说英国“正常

《红档史料》，第 100 页。

林乐知、荣章甫汇译：《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卷上，《英轺载笔上》，第 42 页。

参阅许景澄：《许文肃公遗稿》卷三，函牒四，第 53 页；又《红档史料》，第 95 页。

《红档史料》，第 116 页。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 164 页。

同上书，第 210 页。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 212 页。

同上书，第 171 页。

的和必要的政策是要保持中国对外开放通商，反对寓禁关税，不容许她的商业利益和相应的政治地位因其他列强的行动而被排斥”。维特“准备支持他所谓的英国的现实的和贸易的政策”，也“赞成他所谓的同盟”，“但以英国不得阻挠俄国对华北的野心为条件”。维特从一张上了锁的书桌中取出了一张中国地图，“用手指着直隶、山西、陕西和甘肃等省划了一个圈，然后说道，俄国迟早是会并吞所有这片领土的”。接着他就指着兰州说，“西伯利亚铁路会及时地修筑一条支线通到这个城市，又说他已经有了关于这条支线的长度和造价等等细节”。维特如此迫不及待地把沙皇俄国瓜分中国领土的野心向英使欧格讷和盘托出，为的是“想知道女王陛下的政府会和俄国一起走多远，因为维特明白，如果能同英国达成协议，我们的裁决（rule）将成为远东的法律”。

1898年1月25日，索尔兹伯里发给欧格讷一个密件，向俄国摊牌，把英国的建议概述如下：

“我们的意见是，中国和土耳其两个帝国是如此衰弱，以致在所有重大事情上他们不断地受到外国列强意见的支配。在提供这种意见的时候，俄国和英国总是对抗的，它们抵消了彼此的努力，情况之多远远超出了它们真正的利益对抗所要求的；并且这种情况还可能不会减少，只会增多。为了消除或减少这种弊端，我们认为同俄国达成一项协议可能对两国有利。我们不打算侵犯既存权利。我们不会允许破坏任何既存的条约，或者危害目前中国或土耳其这两个帝国的完整。这两项条件是极端重要的。我们不想瓜分领土，而只想瓜分优势。显然，就土耳其和中国来说，有广大领土对俄国的利害关系超过了对英国的利害关系，反之，也有广大领土对英国的利害关系超过了对俄国的利害关系。如果仅仅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而不是我在这里保证的话，那么我要说濒临黑海的土耳其领土以及直到巴格达的幼发拉底河流域对俄国的利害关系比英国大得多，而土属非洲、阿拉伯以及巴格达以南的幼发拉底河流域对英国的利害关系则比俄国大得多。在中国，黄河流域，包括黄河流域以北的领土在内同扬子江流域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分界线。是否可能议定：对于这些领土在我们意见分歧时，利害关系较少的强国应对另一强国让步，并且帮助另一强国呢？”

这就是当时“英国首相在事实上，建议把整个亚洲从亚历山大勒塔（今土耳其伊斯肯德仑——引者）到北京划一条线，分为北部的（俄国）范围和南部的（英国）范围”，以便进行瓜分。1898年1月31日，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在其上奏沙皇的奏折中认为，“在我们的军舰已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湾的情况下”，索尔兹伯里这个建议是“值得注意的”。正是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由于旅大的占领，“现在”使俄国“在北直隶湾范围内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并“有可能不使英国人对华北事务进行干预”。2月1日，穆拉维约夫受沙皇全权委托，向欧格讷提出，“暂且不要解决总的问题”，

同上书，第197、208页。

顾奇与坦珀利合编：《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1卷，1927年英文版第五件：《索尔兹伯里致欧格讷》（1898年1月17日）。

《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1卷，第八件：《欧格讷致索尔兹伯里》（1898年1月23日）。

《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1卷，第八件附件：《欧格讷致索尔兹伯里》（1898年1月30日）。

同上书，第八件：《欧格讷致索尔兹伯里》（1898年1月23日）。

《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九件：《索尔兹伯里致欧格讷》（1898年1月25日）。

可以先就“业已刻不容缓的”中国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俄国决定放弃酝酿已久的对华借款，以谋求英国对他占领旅大的承认，“沙皇外交当局之所以表示愿意牺牲对华贷款可以得到的利益，恰恰是而且也仅仅是为了要把暂时占领(旅大)变为永久占领”。英俄谈判实际上在3月份便已中断。但英国却取得了借款让与权，于1898年3月1日签订了《英德续借款合同》。清政府在威胁之下，不得不于2月11日宣布扬子江流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瓜分之祸就迫在眉睫了。

四、英国以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及英德续借款（1898年2—3月）

如上所述，德国占领胶州湾和俄国占领旅大都是以承认英国以长江流域，即扬子江流域作为他的势力范围来作出的肮脏交易。而英国强迫清政府发表“不割让声明”，无非是让他向全世界公开宣布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在这个广大地区拥有“独占的或排他性的特权”，别的列强不得染指罢了。就强迫清政府发表“不割让声明”来说，法国在1897年3月15日就对海南岛地区也这样干过了。不过，就领土面积之大和德、俄强占沿海港口的严重形势下，英国这样干，无异于火上加油。它“促进了对中国的瓜分，使瓜分即将来临；英国以此而变成了最凶恶的国家之一”。

先是，清政府为了赶在1898年5月8日《马关条约》换约3周年这一天以前付清对日赔款，不得不向列强谋求第三次大借款，但是条件都很苛刻。清政府最初向俄国提出借款要求，英国金融界得知后认为，“如果英国政府不帮助，俄国借款谈判就会成功，结果中国就会变成俄国的一个州，海关也就不再在英国人的手中了”。这样就开始了英、俄在借款问题上的激烈争夺。当时俄国对中国的借款条件是：（1）俄国在东三省和蒙古享有铁路和工业垄断权；（2）把修筑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的让与权给予中东铁路公司，并由铁路董事会在营口以东的黄海岸边选择一个港口作为支线的终点；（3）容许俄国在该港设置码头，凡悬俄国旗的一切船只皆有权驶入；（4）作为贷款的抵押品除了海关收入外，还有中东铁路沿线和东三省的厘金以及全部盐税等等。英国的借款条件则为：（1）英国控制中国作为借款担保品的税收，即洋关和常关税、盐税和厘金；（2）建筑一条由缅甸到长江流域的铁路；（3）保证不把长江流域的领土让与任何其他外国列强；（4）大连、南宁与湘潭辟为通商口岸；（5）外货在通商口岸免纳厘金等等。

从上述条件来看，这次借款事关势力范围和“铁路征服政策”等等重大让与权的争夺；在这场让与权争夺战中，英、俄双方都互不让步，展开了非常剧烈的、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的斗争。英军总司令吴士礼（Wolseley, G.P.）于1898年1月上旬公开宣称，英国军队业已作好“充分准备”以应付“战争

兰格：《世界史百科全书》，1948年英文版，第747页。

《红档史料》，转引自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第141页。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第96页。

同上书，第105—106页。

马士、宓亨利合著：《远东国际关系史》，第442页。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33页。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6页。

之突然爆发”。双方都向清政府施加强大压力，必要时都准备利用贿赂手段来促成其事。在这次借款中，清政府在事实上是无法摆脱英俄的控制的。他虽然早在 1897 年 8 月曾谋求英商呼利詹悟生辛迪加（Hoo-ley-Jamieson Syndicate）的不带政治条件的借款，也曾在 1898 年 2 月 3 日决定不借外债，准备募集内债，发行所谓“昭信股票”100 万张，“每百两为一股”来应急，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无济于事。我们从本书上节叙述的情况可知，借款问题最后是通过英俄就索尔兹伯里关于划分势力范围的谈判，由俄方决定不反对中国向英借款，以换取英国对他强占旅大的承认来解决的。

1898 年 2 月 5 日（光绪二十四年一月十五日），英国驻华公使龚纳乐在列强业已就势力范围达成了交易的情况下，借口清政府在 2 月 3 日宣布的不借外债，要求“补偿”，其中一条就是担保不把长江流域让与他国。这就是说，不管借与不借英款，清政府都必须满足英国这条要求。2 月 11 日（一月二十一日），总理衙门根据龚纳乐 9 日来照“极愿中国国家确切保证不将扬子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义让与他国”的要求复照说：“扬子江沿岸地方均属中国要地，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他国”。这个照会同 1897 年 3 月 15 日总理衙门致法使施阿兰的照会一样，都被帝国主义列强看作是清政府公开宣布这片领土是他们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根据。2 月 20 日，龚纳乐致电索尔兹伯里说，英国“不能容忍在一天早上发现，由于一个外国臣民的被害，或由于外国某项要求遭到拒绝，扬子江流域的某个地区便已被该国占领了，并且以九十九年的租期而被该国保有”。英国这样擅自把中国中部的广大领土和最富庶的地区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在伦敦“操纵着外交部”的中国协会主席盖德润（Gundry, R.S.）在 3 月 1 日竟然声称，这项不割让协定就是“英国对于扬子江流域的保护权”。

1898 年 3 月 1 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九日），清政府在满足英国划长江流域为势力范围，加上原来在 2 月 13 日曾认可英政府的中国海关“聘用英人为总税务司”的要求以后，在赫德的撮合下，《英德续借款合同》由汇丰银行熙礼尔（Hillier, E.G.），德华银行鲁姆普（Rump）代表德英银行总会为一方，中国国家代表总理衙门为一方在北京签订，贷款 1600 万英镑（约合 1 亿两），款额由汇丰、德华两行各分一半。中国借款实收 83%， “按本银虚数每一百合八十三镑”，1600 万镑的借款总额实收“一千三百二十八万镑”。银行把按八三折扣的借款按九十折扣发行债券，“在这笔交易里赚百分之七，‘即 112 万镑’，中国只得到八三，银行得到了九十，中国是‘上

参阅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169—170、173 页。按俄国四条中前三条系维特在 1897 年 12 月 16 日提出，后一条是他在 1898 年 1 月 11 日新加上的。

参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115 页。按英方五条系 1897 年底至 1898 年初向清政府提出的。

转引自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上册，第 94 页。

参阅《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 13、14 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034 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732—733 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250 页。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 32 页。

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 266 页。

了当了’！”“此借款常年利息，按本银虚数系四厘五”。这样按实行83%的“实交额的利息率则达百分之五点四，到一九一一年按所欠银数核计就达百分之七点零五，从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三四年间所付利息达库平银一万万三千三百一十二万三千八百四十三点零六两，已超过本金百分之一百六十四点八（照借款合同，本息须至一九四三年始能偿清，尚有九年本息，因缺乏资料未列入）”。

《英德续借款合同》还规定，“此款定为四十五年还清其本银”，“四十五年内，中国不得或加项归还，或清还，或更章还。”“至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即保证在这45年内由英国人来充当海关总税务司。此次借款，除以关税作担保外，还以苏州、松沪、九江、浙东等处货厘和宜昌、鄂岸、皖岸等处盐厘“共银五百万两”作保，“应即行派委总税务司代征”。“如有中国以上洋税、厘金付还此款本利不敷之时，或因银价跌落，或因所征税厘缺少，或因他故所致，即应由中国另行加指足敷抵偿之项，以便按期付还，所加指之各项，仍由总税务司代征”。

这就是说，英国通过这次借款，不仅保证了英国人长期掌握中国海关的特权，并且还扩大了总税务司的特权，由征关税扩大到征收厘金；而“厘金的征收”，本来就是赫德“一直希望插手”的。

英国强迫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及英德续借款的签订满足了英国金融资本家掠夺中国领土和资本输出的侵略目的。盖德润认为：“可以说中国协会主张的每一项都被接受了——担保借款的计划；保留英国人为总税务司；为轮船开放内地水道，以及在扬子江流域的英国保护权。”盖德润还继续在3月23日吹捧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说：“他在两年中所完成的要比他的前任者们在二十年中所完成的更多，并不能算是夸张。”

五、法占广州湾与法、日之划分在华势力范围（1898年4月）

法国帝国主义者早在1895年间就已经同英国在我国西南展开了让与权争夺战，通过1895年7月的俄法借款和1897年5月的卢汉铁路借款，扩大了他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法国本来是一个“高利贷帝国主义”国家，他的工业生产在19世纪末虽说已经落后于美、德、英等国，由世界第2位降到了第4位，“在人口、工商业和海运都发生停滞的情况下，‘国家’却可以靠放高利贷发财”。这种通过高利贷资本形式的金融资本的迅速发展使法国加紧推行其扩张殖民地的政策。正是在德军强占胶州湾和俄军强占旅大之际，法国的里昂赴华贸易考察团于1897年12月发表了他们的考察报告，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开始修筑这条直达老街的铁路”，以便由此直达昆明，“通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33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36页。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39、40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34页。

徐义生：《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的外债》，《经济研究》，1957年第4期。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34—735页。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37页。

往云南”。1898年3月7日，法国外交部长哈洛托训令驻华代办署法使吕班(Dubail, G.)，让他向清政府要求就云南、广东、广西等省作出类似长江流域那样的不割让声明；允许法国由越南修筑一条铁路到昆明；允许法国在中国南部海岸建立所谓煤栈与法人管理中国邮政等事。3月11日，吕班要求清政府让与法国以与英俄相同的权利；13日，又将哈洛托训令中的要求向清政府提出。

这时，列强之间的让与权争夺战又围绕着法国的要求展开了。1898年3月19日，英使窦纳乐向清政府提出：“以一个煤栈租借给法国不可避免地将引起其他列强包括英国在内的类似要求”；比如说“扩张九龙地界，而扩张九龙地界（对香港来说）则是迫切需要的”。“给予法国”任何让与权必然要“给予英国以对等的让与权”。清政府训令驻法公使庆常“切实商阻”，法国外交部回答：“山东允德借地及铁路数道，法独向隅，议院不平，请派舰重办。所开四事，必须照准；如中国和商，法必顾大局，否则不得不筹办”。

法国使用了通常的武力威胁办法，又同沙皇俄国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而取得了俄方的支持，使清政府无法抗拒他的要求。4月4日，法国署使吕班提出“越南邻省之现况应注意不予变动”，“无论永暂，无论租借或以其他名义，均不将各该省地方全部或一部让与他国”。4月9日，法国公使毕盛(Pichon)提出《滇越路及广州湾等事往来照会》，蛮横宣称对照会底稿“不准动一字，限明日复”。

1898年4月10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清政府完全屈服于法国帝国主义者的压力，由总理衙门照会法使，同意法方要求，使法国取得了如下的让与权：

1. 中国保证决不出让同越南毗连的各省领土，“越南邻近各省系属中国边疆要地”，“绝无让与或租借他国之理”。这就是说，同英国要求公开声明不出让长江流域而把这片地区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样，法国也通过这项声明而把同越南邻近的云南、广东、广西各省划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2. 租借广州湾，“中国国家将广州湾作为停船趸煤之所，租与法国国家九十九年”。4月22日，法国国旗便在广州湾升起。5月27日，法国把《广州湾租界条约》送致总署，条约规定把广州湾连同它的内外岛屿，以及从北纬 $20^{\circ}50'$ — $21^{\circ}25'$ 的海湾周围大陆上的土地一并租与法国；所有在这个范围以内的地方，全归法国一国管辖；所有各国船只，按照中国通商各口办法，一律优待办理，并且还允准法国自雷州府属广州湾地方赤坎至安铺之处建造铁路等等。1899年11月12日，有两名法国军官在广州湾附近被杀，1900年2月19日，清政府批准了上述条约。

转引自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65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76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231页。

参阅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第67—68页。

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06—307页。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一，第4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43页。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九日（1898年4月9日）。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43页。

3. “中国国家允准法国国家，或所指法国公司，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城修造铁路一道”；“该路所经之地与路旁应用地段”，由中国提供。这就是说，法国要从海防经老街修筑一条直达昆明的滇越铁路。我们已知，法国在1895年6月至1896年6月的一年时期中，曾要求自越南凉山和同登修筑到广西龙州的、为费务林公司所有的铁路让与权，他们并没有放弃，虽说他们始终不曾修筑此路。这条铁路的谈判将近一年之久，而滇越路却是头天一个照会，第二天就“可允照办”了。

4. 任命一个法国人主管中国邮政。“中国邮政局现归海关办理，中国国家将来设立总理邮政局专派大臣之时，拟聘请外员相助，所请外国人员，声明愿照法国国家请嘱之意酌办”。实际上，在1896年3月20日，朝议行邮政，以总税务司赫德兼总邮政司，由海关现设邮递推广，以税务司葛显礼（H.C.J. Kopsch）总办，“凡都会、省城、通商口岸，渐次设局，命曰‘大清邮政’”。此后，到1901年，清政府遂任命法人帛黎（Piry, Théophile）为邮政总办。1911年5月，邮政脱离海关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帛黎被派为首任邮政会办。

至于日本，它虽因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而成为一个“新起的帝国主义强国”，但在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帝国主义阵营中以羽毛未丰而尚处于一个小伙计的地位，不得不听从俄、德、法三国关于退还辽东半岛的干涉，对曾经帮助过它的英、美帝国主义者，也是谈不上平起平坐的。虽说它对中国怀有极大的领土野心，但在这时它的手法却是利用列强瓜分中国斗争中的矛盾来投机取巧，讨价还价。由于它在甲午战争后占领了台湾，使“台湾对面的区域”即福建省“因台湾重要性的增加而为日本舆论所重视”。在我们上述列强关于划分中国势力范围的区域上，正好又都没有包括福建在内，而法国提出与越南邻近各省划为法国势力范围的先例，又正好为日本援例要求福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在这种种情况下，日本外务大臣西德二郎（Nishi Tokujiro）于4月15日训令驻华公使矢野文雄（FumioYano）向清政府提出正式要求。

1898年4月24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四日），总理衙门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先是，矢野文雄在22日来照中声称：“日本政府闻清国政府近日维艰，常深軫念。即如威海卫撤兵，前经声明在案，原系虑节外生枝，加累于清国起见，亦足昭命意所在。但日本政府查明实在情形，反顾利害所及，未克置若罔闻，自宜设一妥法，以期未雨绸缪，则请清国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矣。”总理衙门复照说：“本衙门查福建省内及沿海一带，均属中国要地，无论何国，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也。”这样，日本军国主义者又模仿其他列强，以互换照会的形式，强迫清政府答允了它划

同上书，第745页。

参阅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1卷，第128—129页。《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929—930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45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45页。

《清史稿》第四十册，第12363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16页。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197页。

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的“不割让声明”。

根据我们以上所述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现在已经可以明显看出：英国以长江流域各省，俄国以广大的东北、西北和直隶，德国以山东并沿黄河直至河套地区，法国以中国西南各省和海南岛，日本以福建作为他们各自拥有的势力范围。在这些势力范围中，有的是明确地让清政府作出了“不割让声明”的，有的如沙皇俄国等虽未让清政府这样发表声明，但问题的严重性并未因此而有所减轻。例如中国同沙俄所签的各种条约和协定，其中“所列的行政和军事特权，蕴有虽非名义上至少也是实际上的主权的转移”。对强迫清政府作出声明的列强来说，所有这一切“不割让声明”全都是对该要求国的不折不扣的“割让声明”，全都是在为了保持中国国家领土之完整获得维持的冠冕堂皇的词句下，以划分势力范围来彻头彻尾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的确，如果对某一地区拥有真正主权的政府却要去对该地区作什么“不割让声明”的话，即使不是梦呓，至少也是废话。势力范围政策正是反映出帝国主义列强中的“每个国家都对预期中的和希望中的中华帝国的瓦解和瓜分提出了它的要求”，难怪英帝国主义分子盖德润就直言不讳地把清政府对英国发表关于长江流域的“不割让声明”看作是“英国对于扬子江流域的保护权”了。

六、英占威海卫和九龙（1898年5—6月）

在中国近代史上，英国是最先用武力侵略中国并在中国享有特权和拥有垄断利润（因为它在中国市场上占垄断地位，操纵了中国70%以上的对外贸易）的国家。到了80年代前后，英国在世界上的工业垄断地位逐步被美国、德国赶上和超过；俄、法对中国边疆的侵略被英国看作是对它“在东方优势的挑战”。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英国由于它在华的垄断地位而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紧随俄、德、法之后亦步亦趋，力图取得优先地位和得到最多、最好的份额。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无论是在他前期对俾斯麦的斗争中，抑或是在这时对以维特为首的俄法集团瓜分中国的斗争中，他都是最善于运用一种“熟视而待机”的外交策略的。有的历史学家曾经评论他说：

“在外交政策上，索尔兹伯里一向是保持着所谓英国的‘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的。索尔兹伯里认为英国可以永远利用大陆各列强的冲突而平稳地安排自己本身的问题。依据他本人的天性，这位英国首相仿佛是天生长下来就是为了执行这种政策的。他是聪明的和仔细的政治家，然而伟大的缓进者，疏懒的贵族，并未经过特别努力而位居保守党的领袖。他没有俾斯麦那种蓬勃的精力，也不像俾斯麦那样在不断的斗争中为自己打出了一条掌握政权的道路。然而索尔兹伯里却有胜于俾斯麦一筹的长处——坚毅。‘熟视而待机’，这就是他的策略。”

当德、俄强占胶州湾和旅大以后，索尔兹伯里于1898年1月提出了同俄国合作瓜分中国优势范围的建议，取得了以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和英德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50—751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50—751页。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10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10页。

续借款的“胜利”。3月英俄谈判中断以后，由英国占领威海卫的问题就提到索尔兹伯里的日程上来了。他在2月25日还告诉窦纳乐，认为“讨论租借威海卫的任何建议都是过早的”。到了3月7日，他“认为对俄国占领旅顺口不宜加以反对”而决定占领威海卫。“由于同样的理由，他拒绝了鼓动中国的暴力革命以推翻中国亲俄派的建议”。索尔兹伯里在3月22日说道：“我完全同意窦纳乐所说的关于俄国占领旅顺口对中国的(舆论?)的影响。不过，这同俄国军团无疑会及时地屯驻在那漫长的中俄边疆的影响比较起来，乃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暴力革命是不明智的，并且会不符合于我们的对法政策而引起困难”。

由于威海卫此时因对日赔款尚未付清而在日本占领军手中，更由于它地处登州府而在德国的山东省势力范围之内，所以英政府必须先同日本和德国进行协商后，才好加以占领。3月15日，英驻日公使萨道义(Satow, F.M.)询问日本政府“是否同意”英国租借威海卫？在经过协商后萨道义认为“日本人愿意让英国占领它”。看来为了占领威海卫，英国是给与了日本一笔代价的，“这笔代价就是英国同意和支持日本自中国获得关于台湾对岸福建省的不割让声明”。至于德国，索尔兹伯里于3月26日电告英驻德大使拉赛尔斯(Lascelles, F.)说：“我们要占领的领土是山东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并不希望干涉德国在那个地区的利益”。到4月20日，两国达成协议：“英国正式宣言，它占威海卫并没有意思欲损害或争论德国在山东省内的权益，或在该省与德国为难。特别清楚地是，英国将不修筑从威海卫及与它同时租借的地区到山东内地的任何铁路联络线”。这就是说，英国为了占领威海卫而承认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

索尔兹伯里在3月25日电告窦纳乐说：“渤海湾上的均势由于总理衙门放弃旅顺口给俄国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必须以你认为最有效和最迅速的方式获得当日本人一旦撤出威海卫之后对它的优先占有权。条件必须同给予俄国对旅顺口的条件一样。英国舰队正在由香港驶往渤海湾途中。”3月31日，窦纳乐到总理衙门提出占领威海卫的要求，“要挟谓十二日(即四月二日——引者)若不定，水师提督带兵到烟台，事且不消。”“千万语不变，所要者威海卫租地与俄抗衡耳”。据说，当时李鸿章曾向窦纳乐说：“你跟别人一样是不道德的。”窦氏回答说：“不是。情况是这样的：你已经给与了两个彼此对立的人当中的一个人一条枪。现在你就必须把另一条枪给与其中的另一个人。俄国如果立即放弃旅顺口，我们就撤出威海卫。为了你们的利益，我们不能走得太远去同俄国打仗；但是，给与我们的威海卫行将抵消俄

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71页。

鲍爵姆金主编，葆和甫等译：《世界外交史》第三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950年版，第99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294页。

同上书，第274页。

《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1卷，第32件：《索尔兹伯里备忘录》(1898年3月22日)。

同上书，第40件：《萨道义致索尔兹伯里》(1898年3月26日)。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298页。

同上书，第298页。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243页。

国的行动，这是一件仅次于最好事情的好事。”这种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的强盗逻辑竟使清政府觉得卖国有理，认为英方要求“尚属实情，并非无端图占”。** 奕纳乐不允许清政府拖延，如果迟迟不作出决定就等于拒绝，“那时候，这件事情就将不由”清政府“来决定”。这就是说，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英军都必须占领威海卫。清政府最后在英国舰队的威胁下屈服，答允照办。

1898年5月7日，中国对日赔款全部在伦敦付清。5月9日，“日本军队从威海卫撤退，英国国旗于五月二十四日就在那里升起了”。实际上，英国侵略军为了迅速行动以造成既成事实起见，早在5月2日就从日本人那里接管了威海卫。7月1日，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奕劻、廖寿恒与奕纳乐在北京签订了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中国政府将山东省之威海卫及附近之海面租与英国政府，以为英国在华北得有水师合宜之处，并为多能保护英商在北洋之贸易；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所租之地系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之十英里地方。以上所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此外，在格林尼址（今译格林威治——引者）东经121°40'之东沿海及附近沿海地方，均可择地建筑炮台，驻扎兵丁，或另设应行防护之法。”英军占领威海卫，为的是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最初的打算是，在大不列颠旗帜下的威海卫作为一个海军基地和设防海港方面，必须在竞争中胜过旅顺口和青岛”。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Rear-Admiral Charles Beresford）于1898年10月去威海卫以后认为，取得该地是“我们在中国海上海军势力的极大收获，用较少的费用就能把它建成为一个最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海军基地”；刘公岛“有直布罗陀的三分之二那么大”，而且“此刻在中国水域，没有一个地方军舰能够像这里那样紧靠岸边停泊”。因此，威海卫在计划中是要成为英帝国主义者**在华北的一个军事堡垒的。**

奕纳乐在强租威海卫的同时，已经谈到还要在中国南部索取地方；他向清政府表示：“威海抵俄，专为北方；若法占南海口岸，我亦须别索一处抵之。”当4月10日法国取得租借广州湾的让与权后，奕纳乐于4月24日就向总理衙门提出五项要求，其中之一就是以扩展香港界址为名来强占我九龙地方。在要求给与对等的让与权的威胁下，清政府既然不能在俄占旅大之后阻止英军进占威海卫，当然更不可能在法租广州湾之后拒绝英方扩大香港界址的罪行。但是，总理衙门却自欺欺人地认为：“展租界址与另占口岸不同，允议暂租专条，尚可操纵自我”；“且香港英官原允帮助中国整顿税务，亦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898年，第129件，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296页。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1898年3月31日）。

培根：《泽立科伯爵传》，1936年英文版，第75页。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二，第7页。

《英国蓝皮书》，1899年，第154件：《奕纳乐致索尔兹伯里》（1898年4月16日），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299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13页。

参阅培根：《泽立科伯爵传》，第77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82页。

赖特主编：《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中国其他商埠志》，1908年英文版，第773页。

可趁机议明实力相助”；把这种幼稚之见形诸奏章，实在是滑稽的事情。无奈，李鸿章、许应骙于1898年6月9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同英方签订了《展招香港界址专条》，完全根据英方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以九十九年为限期”，把北九龙半岛连“大鹏湾、深圳湾水面”包括在内，“专归英国管辖”。1899年3月19日，由广东补用道王存善与香港辅政司骆焜在香港签订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把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北九龙半岛广大地区和大小200多个岛屿，总面积为975平方公里的领土，即所谓的“新界”强租去了，它比起1841年强占的香港本岛和1860年强占的南九龙半岛两者的总面积来扩大了11倍，水域则比以前扩大了50倍。

根据以上叙述，索尔兹伯里这个老牌“殖民帝国主义”的首相，运用他“熟视而待机”的战略，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大部分的让与权。他抓住德、俄两国掠夺我国领土的时机同他们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取得了清政府关于华中广大富庶的长江流域各省的“不割让声明”；又以“补偿”为借口从清政府那里强占了华北的威海卫和华南的北九龙半岛；真是一举多得，却还在那里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克制”的呢！1898年5月4日，即英军强占威海卫后的第三天，索尔兹伯里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会堂作了一次演说。他在演说中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帝国主义列强，他称之为“有生命的国家（the living nations）”；一类是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如中国等则是“垂死的国家（the dying nations）”。他以浮夸的口吻就所谓的“中国问题”发表了一通议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垂死的国家，有生命的各国正在侵略它，争论在于究竟谁享有“‘瓜分中国’的特权（the privilege of ‘Cutting up China’）”，并且“应该用什么办法”去瓜分。他说：“不要以为发生在中国的时局纠纷在性质上是特殊的，或者类似的事件将不会再出现。”“如果所有这些事件的结果都造成中华帝国的崩溃的话，那么就会开始一系列的混乱。”“同时我认为，这些混乱可能把我们所不欢迎的扩张机会给与守在中国边境上的那些国家。”但是，“无疑地我们决不让英国在可能发生的任何新安排中处于不利地位”。索尔兹伯里在这里认为类似于瓜分非洲那样的瓜分中国的事情是会出现的，而机会却可能落到守在中国边境上的北方的俄国和西南的法国，但英国是决不能吃亏的。10天以后，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Chamberlain, J.）于5月13日的伯明翰演说中，就把问题说得很明确了。他认为，现在是事关“中华帝国的整个命运的问题，我们在中国的利益是这样重大”，“以致于我感到任何政府和国家从来都没有遇到比这更重大的问题需要决定”。“我们必须同俄国在中国打交道”，而“同恶人打交道却是危险的”。如果俄法在中国获得成功，英国的生存“就将受到本世纪初拿破仑企图阻止英国贸易以来所未受到过的威胁”。看来，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让与权争夺战中，他们之间的斗争也随着中国

贝思福：《中国的瓦解》，1899年英文版，第79—80页。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1898年4月2日）。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一，第17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69页。

同上书，第864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85页。

人民面临的第二次瓜分危机的到来而日趋激化。

七、外国教会侵略与第二次瓜分危机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中，已经分别就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传教活动在掠夺殖民地前后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第一次瓜分危机中传教士李提摩太建议的变中国为英国的保护国以“救”中国的计划加以论述。如今，中国人民面临第二次瓜分危机，外国教会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外国传教士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在各地蠢动，制造教案来提供列强抢夺让与权的借口，他们的罪行与第二次瓜分危机之出现和加深都是密切而不可分割的。

为什么外国传教士这样迫不及待地要在各地蠢动呢？这是基于他们对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时局的估计，即认为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成熟。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耶士谟（Ashmore, Rev. William）在为斯贝杰（Speicher, Jacob）所著《十字架征服中国》（The Conquest of The Cross in China）一书的序言中说道：“这已经是传教活动达到顶点的时期，所有来自中国对外关系而拥有权势的人们，不管他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在这个时期中被卷进到了一个紧急关头。那是这个时代的收获时期。”什么“收获时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要把半殖民地的中国瓜分成为它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时期。对传教士来说，就是要把他们在华教会所在地区建立的基督教殖民制度转变成为他们各自国家的殖民地帝国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在鸦片战争中对中国所播下的侵略之种，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已经进入到最后收获侵略的果实的时期了。在这种情况和估计下，传教士们就大肆制造舆论，说明中国注定必遭瓜分。1896年4月，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Allen, Young John）与蔡尔康编辑的《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八卷在上海出版。林乐知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各国之鹰临而虎视者，非尽欲欺侮中华也；弱肉而强食，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也”。他在《治安新策》中又说：“欧洲各国，类皆驰情于域外，虽以非洲之酷热，北极之严寒，犹且按图剖分而食之，造舟龟勉而赴之；矧以地处温和带下，民殷物阜之中国，有不思染指于鼎，过屠门而大嚼乎？”“呜呼！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尚有朝潮汐汐，进退盈缩之一候！若夫各国之入中国，则竟如水之就下，有进而无退，有盈而无缩也，其孰从而御之哉？”这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金融资本对土地是贪得无厌的，它不管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土地，不管这些土地在北极在非洲还是在中国，也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它总是要夺取更多的土地的。因此，中国的瓜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抗拒的。

外国传教士在宣传中国必遭瓜分的同时，还宣传由基督教来“宰治”中国的谬论。因为“今日治国之道，仅有三大端：泰西各国救世教一也，中国儒教二也，土耳其等国回教三也；而宰治之最广者，实推救世教”。在儒教宰治下的中国，“沿至今日，竟不能敌一蕞尔之日本。呜呼！谁之咎欤？谁之咎欤？犹幸有明敏之才，深知中国近年不体天心，不和异国，不敬善人，

伦敦《泰晤士报》（1898年5月5日第7版，B、C栏），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16—318页。

伦敦《泰晤士报》（1898年5月14日第12版，B、C、D栏）。转引自同上书，第319—321页。

斯贝杰：《十字架征服中国》，1907年英文版，第20页。

实有取败之理；因冀幡然尽改其谬误”。“此明敏之才，既熟察乎中外之情形，爱知中国近来讹谬之关系，大莫与京，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一大错字也”。这就是说，中国之所以败于日本，原因是没有信奉基督教的大错造成的。因此，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这个“明敏之才”，在这里就希望中国“幡然尽改其谬误”，改信基督教，由基督教来“宰治”中国。我们知道，李提摩太曾经向李鸿章和张之洞提出过由英国来攫取中国铁路、矿山等各项让与权，变中国为英国保护国的计划，那么，他这套基督教“宰治”中国的谬论无非就是由英国来“宰治”中国罢了。

实际上，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并不仅限于制造瓜分中国和由基督教来“宰制”中国的谬论，更重要的是传教士们还在中国各地兴风作浪，挑起事端，为列强抢夺让与权、瓜分中国提供借口。“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是特别积极的”。他们在各地制造教案以后，帝国主义国家金融资本的“舆论总是要求行动，而政府则很懂得去利用这种事件来作军事干涉的借口”。这时，帝国主义的海外传教活动已经同社会达尔文主义密切结合起来。因为他们的上帝乃是所谓的优秀人种的上帝。正如英帝国主义的吹鼓手和实行者谢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所宣称：

“我坚信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我坚信我们占据世界上的土地越多，对于人类就越好。……如果有上帝存在的话，我认为他会喜欢我的所作所为，就是尽可能多地把非洲画成英国属地的红色地图。”

非洲如此，中国也是一样。英国这样看，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又何独不然。既然上帝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者，传教士传上帝之教，制造事端以提供帝国主义列强军事扩张的借口，当然是他们所当为的。这就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 John）所指出的那时的“传教士职业所特有的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同时也正是我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所指出的当时中国“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教堂遍地，无刻不可起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的真实情况了。

我们已知，第二次瓜分危机开始于胶州湾之被强占，它的始作俑者是德帝国主义者，他们的借口就是由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所挑起的巨野教案提供的。教案发生于1897年11月1日，于时鲁南教区主教安治泰（Anzer, Jean Baptiste）适在德国休假，他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于11月7日向德国外交副大臣罗登汉男爵（Rotenhan, Baron Von）表示：“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11月17日，安治泰又亲自进见德皇威廉第二，敦促他利用巨野教案的机会强占胶州。

《中东战纪本末》，序言，第3页。

《治安新策下之下》。见《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34页。

李提摩太：《泰西新史揽要译序》（一八九五年孟夏），第1—2页。按《泰西新史揽要》系李提摩太所译马垦西（Robert Mackenzie）所著《十九世纪史》（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一八八一年）一书之汉译名；此书被柯林武德看作是“第三流的历史著作中最令人恶心的渣滓”（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1951年英文版，第145页）。又引文中的“救世教”，即基督教。

斯塔夫里扬诺斯：《一五〇〇年以来的世界史》，第235页。

转引自同上书，第235页。

参阅高尔斯华绥著，周煦良译：《福尔赛世家》第一部《有产业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页。

他说：“如果德意志帝国真的想在东亚取得一个属地”，“这将是最后一个机会。不管代价如何，我们不应放弃胶州。在经济与工业方面，胶州有一个比目前的上海更大的、更重要的前途。胶州的占领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士早已料到这件事”。从安治泰这些话看来，威廉第二应该任命他作胶州湾占领军司令，比起当鲁南教区的主教来可能是更恰当一些的。

法国帝国主义者在 1898 年 4 月 10 日取得了与越南相邻各省的势力范围，占据广州湾和滇越铁路等让与权以后，又利用 4 月 21 日在广西爆发的永安教案取得了以北海为起点的铁路让与权和其他要求的承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一日（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法国教士苏安宁（Bertholet, Mathieu）带同教民唐启虞、彭亚昌……一共七人，由永安蒙寨村前往荔浦，当经该州何臻祥移拨兵役护送。行至州属凉亭地方，苏安宁见墙上贴有劝人不宜从教说帖，即向附近之联兴号杂货店伙计李元康……斥骂，……喝令教民唐启虞、彭亚昌将李元康拿住带走。……李元康当众赔礼央求释放，苏安宁仍不允许。……行至古排塘地方，观看之人愈聚愈多，约有二百余人，众忿莫遏，齐声喊夺。适李亚安携带竹銃赴山捕雀，廖七携带铁咀禾枪与李三赴田工作，先后走近该处看见……即向苏安宁斥骂。苏安宁喊拿，李亚安点放竹銃，飞沙中伤苏安宁脐肚倒地，……李元康乘势挣脱跑走。……苏安宁……登时殒命。”

法国抓住这个传教士横行不法而死有余辜的苏安宁事件，于 5 月 2 日立即向中国提出了新的要求：惩罚当地官吏，赔款 4 万两，建立一座教堂，处理李亚安等“凶手”，以及修筑自北海至南宁的铁路，其条件和由同登至龙州铁路合同中所载有的那些条件相同。5 月 28 日，清政府答允了这些要求，并议定“只许法国公司或法华公司可以建造以北海为它们的所有铁路”。由于这个协定，使法国能阻止所有其他外国铁路公司以北海为它们的铁路终点，并使法国为自己取得了建造自沿海至扬子江的铁路所必需的港口，实现了里昂赴华贸易考察团所制订的计划”，扩大了法国在第二次瓜分危机中从清政府手上所取得的让与权。

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与第二次瓜分危机之出现和加深，从上述各方面的事实来看，乃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018 页。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 154 页。

《德国外交文件》（一），第 154 页。

《广西巡抚黄槐森奏》。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类·帝侵项》，第 308 卷。

参阅《永安县志》（见《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 5 期）；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 1 卷，第 125 页。

第二节 中国人民面向第二次瓜分危机展开各种斗争

以 1897 年底德军强占胶州湾和俄军强占旅大而开始的第二次瓜分危机，再通过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而加深的第二次瓜分危机，使中国人民面临瓜分狂潮，“外患极度紧张，瓜分大祸迫在目前”，“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看来很清楚，瓜分正迫在眉睫并且是无可避免的了”。这就是 1898 年在中国出现的危机四伏惶惶不可终日的严重形势。

这个形势是由帝国主义列强旨在瓜分中国的让与权争夺战所造成的。在让与权争夺战中，“中国业已向全世界表明，它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正在衰亡的帝国，是一个比起有名的‘欧洲病夫’来还要更加严重的东亚‘病夫’。以‘让与权争夺战’著称于世的不体面的事情紧跟着发生了。当时，帝国瓦解之迫在眉睫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被证明了的。每一个外国强国都下定决心要为它自己在中国分割到一块土地，用中国人自己的措辞来说，就是中国正要被‘瓜分’（*about to be melon—divided*）——即蒙受一种鸡零狗碎式的分割和各式各样并吞的痛苦。在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不到两个月就开始了互相争夺，不到两年功夫，西方列强都像一群猎狗那样呼叫着要拼命去追赶它们的猎获物了”。时局之严重，正如康有为在《抗论德据胶州、亟宜变法自强奏折》中之所陈述：

“德人强据胶州，……修造炮台兵房，进据即墨。……俄、日屯买吾米各七百万，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恐惧回惶，不知死所。……十年前吾幸无事者，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今非洲剖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议论，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臂画详明，绝无隐讳。……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耿耿，朵颐已久，慢藏诲盗，陈之交衢。主者屡经抢掠，高卧不醒；守者袖手熟视，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觞。……且铁路与人，南北之咽喉已绝；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权亦失。……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至于帝国主义列强抢夺而去、所谓“租借地”和胁迫清政府发表《不割让声明》来作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地区，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克莱门茨（Clements, P.H.）在一本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作中说：

“这些租借权和让与权曾经把一定数量的领土置于外国的行政管理之下，并且常常附有‘尊重中国权利’的补偿条款，而中国权利却在任何方面都是没有得到尊重的。但是，真正割让的领土根本不曾限制住欧洲的侵略范围。每一个强国总是指明周围的一省或数省来作为‘势力范围’，而每个强国总认为它自己在‘势力范围’中有权统治一切。

《毕盛致哈洛托》（1898年5月28日）。见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1卷，第125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18页。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18页。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7页。

马士、宓亨利合著：《远东国际关系史》，第411页。

这样，租借胶州的德国就宣布山东全省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借助于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就要求中国的东三省（满洲）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日本通过厦门的一个居留地和一份不割让的允诺，就要求福建省作日本的‘势力范围’。法国要求毗邻东京的领土，英国则通过对扬子江流域的‘含糊要求’，被认为是对其重要支流所灌溉的富庶地方拥有最优先的资格。中华帝国一共有十八个行省，列强却在这十八个行省中抢先占有了十三个行省，这十三个行省是全国人口最多的、最富庶的和最令人满意的省份，它们包括了所有重要的航道、港口、矿产和外国贸易可能进入的经济中心。……（这是历史上肮脏贪婪的一章，……史无前例的侵略。”

这就是说，“每一个强国都把它利益范围看作是，有朝一日如果中国被瓜分，那么中国这部分就会注定是它的土地”。

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情况正如传教士所早已大肆宣传的那样，是注定必遭瓜分的了。一般“论者，谓病入膏肓，虽和缓，扁鹊不能救；火燃眉睫，虽焦头烂额不为功。天运至此，无可挽回”。“对于冷酷而不知悔改的帝国主义分子来说，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剥削的泉源，一个为竞争的帝国主义者落脚的地盘，中国没有管理它自己事务的能力；因此，它就是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则来设计的这个世界的不可避免牺牲品。甚至那些同情于中国困难处境的观察家们也采取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面临着如此严重的第二次瓜分危机，中国人民却没有束手待毙，而是展开了英勇的反瓜分斗争，其中包括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也包括了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都继承了反第一次瓜分危机的斗争精神，而这一次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和行动上都有所发展，有所前进，有所深入和提高。斗争方式也不仅限于政治方面，并且扩大到了思想方面。它们包括了 1898 年 4 月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的正式出版，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6 月的戊戌变法，形成了维新救国运动的高潮；7 月有革命党人《东亚时局形势图》的出现，唤醒国人奋发图强反对瓜分；有余栋臣在四川发动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武装斗争，成为 10 月山东冠县义和拳正式发动武装起义的前驱。

山东义和拳 10 月起义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转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自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 11 卷，1977 年英文第 4 次重印本，第 453 页。按引文中的“欧洲病夫”，指的是奥托曼帝国。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017—4019 页；《戊戌变法》（二），第 188—190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又引文中“乱民蠢动”一语，是康有为对当时各地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的诬蔑。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 36—37 页。

穆恩：《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第 340 页。按引文中所谓的“利益范围”（spheresofinterest）即“势力范围”（spheresofinfluence），它是英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掠夺中所玩弄的外交辞令。1898 年英国驻俄大使欧格纳在《致索尔兹伯里电》中说：“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势力范围；我们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利益范围。这个区别可能是一个微妙的区别”（《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第一卷，第二三件）。英国的狡猾之处在于，它要用它占有优势的所谓经济性的“利益范围”去反对其他列强的政治性的“势力范围”；并且说“利益范围”不是独占的。不过，英国凭借它在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别人无法同它竞争，因而实质上也是独占的。其实，它们都是帝国主义者，本来就是一丘之貉，“政治霸权在逻辑上要导致经济霸权，而经济霸权也同样会走向政治霸权”（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418 页）。其实，它们谁也骗不了谁，帝国主义列强的“每个政府都往远处看，它们不满足于其资本家所享有的铁路和矿山的垄断权所划出的利益范围，而是注意到有朝一日瓜分中国领土乃是经济瓜分的必然结果”（穆恩：《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第 340 页）。

此以后，中国人民的反瓜分爱国斗争就在义和团运动的光辉旗帜下逐步展开，成为一个波澜壮阔的、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一步一步地取代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让与权争夺战而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虽说这种争夺战尚在继续进行，并未停止。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在中国对外历史中发挥作用了”。“这时，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人们的注意力最后在很大的程度上终于要放到中国人自己身上来了”。下面我们就戊戌变法和余栋臣起义等斗争事迹作些论述，而把山东义和拳起义则放到中编和下编去作专题叙述。

一、《天演论》的出版（1898年4月）

当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强占我国沿海港口、划分势力范围之际，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杰出的思想家严复译著的《天演论》一书在1898年4月正式出版了。此书是依据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Huxley, Thomas Henry）于1893年在牛津大学所作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报告和1894年他为这个报告所写的《导言》（*Prolegomena*）翻译的，“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嚶求，易言丽泽之义”。由于严复在翻译过程中加按语，有发挥、有评论，有他自己的见解和论证，所以我们把这本《天演论》称作是严复的译著，而不是一本纯粹翻译的书。

《天演论》的出版，迎头痛击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论，为反对列强瓜分我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一代的爱国主义者。读者之多，影响之大，是当时出版的书籍所望尘莫及的。它成为中国人民面向第二次瓜分危机而展开的英勇斗争的前奏曲。

严复译著《天演论》一书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强调指出，他是为了“自强保种”而提供“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才译著此书的。为了达到“自强保种”的目的，严复必须面对着当时帝国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依据所散布的中国“亡国灭种”论加以痛斥。这种谬论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特别盛行：“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翦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这就是说，中国是一个野蛮国家，中国人民还是一群“未开化的群众”。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按照达尔文关于动植物界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学说，在人类社会中也应当像园艺家那样来一个人为的选择，“芸其恶种，使善者传”，“为善群进化之事”。这就是说，优胜劣败，野蛮国民应被淘汰，应当亡国灭种，人类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022页。

戴克：《文化冲突，义和拳“叛乱”》，1978年英文版，第209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413—414页。

《天演论》，《译例言》，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9—12页。

《天演论》，第8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018页。

社会才能进化。

在《天演论》中，严复根本不同意帝国主义列强“以野蛮待我”，更不同意在人类社会中运用自然选择的原理来搞人为的选择。尽管他对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和中国现状有比较严厉的批评；但是他明确指出：“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言”，安能遂分人种优劣？“从来人种难分。比诸飞走下生，奚翅什伯？每有孩提之子，性情品格，父母视之为庸儿，戚党目之为劣子。温温未试，不比于人。逮磨砭世故，变动光明，事业声施，赫然惊俗；国蒙其利，民戴其功。吾知聚百十儿童于此，使天演家凭其能事，恣为抉择，判某也为贤为智，某也为不肖为愚，某也可室可家，某也当鰥当寡，应机断决，无或差讹，用以择种留良，事均树畜。来者不可知，若今日之能事，尚未足以企此也”。

所谓“天演论”，用我们现在的译名来说，就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动植物的进化乃是生存竞争（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和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中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结果。严复把“生存竞争”译作“物竞”，把“自然选择”译作“天择”或“天行”。“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这个动植物界的规律任意地、不科学地运用到人类社会，所以引起了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反对，他提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伦理过程”（the ethical process），不同于自然选择。严复把这个“伦理过程”译作“人治”。赫胥黎认为，人与禽兽不同，人类社会的进化也与动植物界的进化有异；人类社会越文明，它就脱离动植界的自然状态越远。“治化愈浅，则天行之威愈烈；惟治化进，而后天行之威损。理平之极，治功独用，而天行无权。当此之时，其宜而存者，不在宜于天行之强大与众也；德贤仁义，其生最优。故在彼则万物相攻相感而不相得，在此则黎民于变而时雍；在彼则役物广己者强，在此则黜私存爱者附。排挤蹂躏之风，化而为立达保持之隐。……故天行任物之竞，以致其所为择；治道则以争为逆节，而以平争济众为极功”；故“人治天行二者”，“决非同物”。

既然天行“固无在而不与人治相反”，那么在人类社会中运用自然选择的原理来搞人为的选择，即“人择”，那就是非常荒谬的了。“人择之术，可行诸草木禽兽之中，断不可用诸人群之内”。“且择种留良之术，用诸树艺牧畜而大有功者，以所择者草木禽兽，而择之者人也。今乃以人择人，此何异上林之羊，欲自为卜式；涇渭之马，欲自为伯翳，多见其不知量也已[案原文用白鸽欲为施白来（Sir John Sebright）。施、英人最善畜鸽者，易用中事]。且欲由此术，是操选政者，不特其前识如神明，抑必极刚戾忍决之姿而后可。夫刚戾忍决无难，雄主酷吏皆优为之。独是先觉之事，则分限于天，必不可以人力勉也。且此才不仅求之一人之为难，即合一群之心思才力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410页。

《天演论》，导言十八《新反》，第64—65页。

同上书，论十四《矫性》案语，第129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同上书，导言十《择难》第37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天演论》导言一《察变》，第3页。

同上书，论十六《群治》，第136页。

同上书，论十七《进化》，第139页。

为之，亦将不可得。久矣合群愚不能成一智，聚群不肖不能成一贤也！”

我们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叶对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粗制滥造的曲解”，它由于适应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掠夺瓜分殖民地和奴役各国人民的需要而风行一时，在不同程度上曾经毒害了各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意识。严复译著的《天演论》的出版，及时地充分地驳斥了它的谬论，使它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破产了，这就为中国人民反抗列强的奴役瓜分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根据，使全国人民顿时耳目一新，使他们敢于面向第二次瓜分危机而展开英勇斗争。

在民族危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之际，严复译著的《天演论》不仅揭发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无知，并且还积极地指明一条通过“自强”来“保种”的道路。严复是属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认为自强之道，首先在于向西方学习。他从政治上，西方“民权日伸，公治日出”；从经济上看，西方之“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从教育上看，西方“学校庠序之制善”，提高了“民力、民智、民德”，“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他特别看重教育，“夫言治而不自教民始，徒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皆苟且之治，不足以存其国于物竞之后者也”。最后，他从学术上看，认为“西人之于学也，贵独获创知，而述古循辙者不甚重”；“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如是所为，已足生事；更骛高远，真无当也。夫只此意验之符，则形气之学贵矣。此所以自特嘉尔（Descartes, René 今译笛卡儿——引者）以来，格物致知之事兴，而古所云心性之学微也”。反观中国，则“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但是，也有人不以为然，“一二巨子，訖然谓彼之所精，不外像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中国诚然是一个世界上的文明古国，现在是落后了，应当急起直追；不然，“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昏也哉！”

除了必须向西方学习以外，严复认为，自强之道不在于空谈，更重要的是在于展开英勇斗争。因为“人事”是“足恃”的。目前形势是够“惊心动魄”的了。但徒知“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轻之间者”，则是“深无益于事实”的。世间“祸福倚伏，患难玉成”。“人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夫宁不然？但忧患之所以生，为能动心忍性增益不能故也，为操危虑深者能获德慧术知

同上书，论十三《论性》，第124页。

同上书，导言十五《最旨》，第50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天演论》导言十《择难》，第37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韦尔斯：《世界史纲》，第957页。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474页。

《天演论》，论四《严意》，第85页。

同上书，论十六《群治》案语，第137页。

同上书，导言八《乌托邦》，第30页。

《天演论》，导言八《乌托邦》案语，第33页。

《天演论》，论三《教源》案语，第83页。

同上书，论九《真幻》案语，第105页。

同上书，《译天演论自序》，第8页。

故也”。盖“世运铸圣人，非圣人铸世运也。使圣人而能为世运，则无所谓天演者矣”。严复感到担心的是，中国民气尚文，斗争性还不够强，这样就“易于驯伏”，“贪生守雌；不幸而遇外仇，驱而靡之，犹羊豕耳”。从中国历史上看，“周秦以降，与戎狄角者，西汉为最，唐之盛时次之，南宋最下。论古之士，察其时风俗政教之何故，可以得之所以然之故矣”。从与西方对比看，西人“好然诺，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亦轻生尚勇，死党好名，与震旦之民大有异。呜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因此，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严复不禁在篇末向国人大声急呼道：

“吾辈生当今日，固将沉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strongin will；Tostrive，toseek，tofind，andnot toyield）。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懂焉。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丁尼孙（Ten-nyson）之诗曰：‘挂 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辣不难，丈夫之必。’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号召全国人民面向瓜分危机展开斗争，坚持到底，决不投降。这就是严复关于“自强保种”的结论。

二、戊戌变法（1898年6—9月）

戊戌变法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面临第二次瓜分危机，力图通过清王朝的变法来达到救亡图存的运动。它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高峰，是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图保自存之策”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来进行的一次政治运动。它开始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的诏定国是，决定变法。这年是戊戌年，故称“戊戌变法”。但是，在同年9月21日（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运动被迫中止，总共只有103天，因此又被称作“百日维新”。

中国面临亡国的威胁开始于中日甲午战争，变法自强是中国维新派的一贯主张。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1895年5月的公车上书中，变法就是其中主要的一条。1897年底德占胶州、俄占旅大开始了第二次瓜分危机以后，康有为又第五次上书，抗论德据胶州，亟宜变法自强。于时光绪“念国势阽危，毅然有改革之志；知康有为伉直敢言，又因大学士翁同龢之请，欲擢用之；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随时接见康有为，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1898年1月24日，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人接见了康有为，并将其《上清帝第五书》上奏光绪。康有为在这篇奏折中痛论时局，同时提出了他的变法三策。他说：

“欧洲数强国，默操成算，纵横寰宇，以取各国，殷鉴具在，覆车可验。……顾

同上书，导言十七《善群》，第63页。

同上书，导言三《趋异》案语，第15页。

同上书，论十二《天难》，第120—121页。

同上书，论二《忧患》，第75页。

《天演论》，论十四《矫性》案语，第129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同上书，论十七《进化》，第142—143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按丁尼孙诗出自所作《尤利西斯》（Ulysses）一首。又“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投）降”句则出自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那首《王孙罗兰来到黑暗的城堡》（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的未完成的诗稿中。

见举朝上下，相顾嗟呀，咸识沦亡，不待中智，群居叹息，束手待毙，……言路结舌，疆臣低首，不惟大异于甲申，亦且迥殊于甲午，无有结纆誓骨慷慨图存者。生机已尽，暮色惨凄，气象如此，可骇可悯，此真自古所无之事。……哀莫大于心死，病莫重于痍痍。……分局早定，民心已变。瑞典使臣之奔告，各国新报之张皇，亚洲旧国，近数年间，岁有剪灭，近且殆尽，何不取鉴之？祸起旦夕，毕命尽丧；而谓少延年载，老人可免，此又掩耳盗铃、至愚自欺之术也。……皇上……即不为天下计，独不计及宋世谢后签名降表，徽、钦移徙五国之事耶？……故胶警之来，不在今日之难于对付，而在向者之不发愤自强也。势弱至此，岂复能进而折冲，惟有急于退而结网。职不避斧钺，屡有所陈，今日亦不敢言自保，言图存而已，亦不敢言图存，即为偏安之谋，亦须早定规模已耳！……若皇上赫然发愤，……职犹有三策以待决择焉。……

“第一策曰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起衰振靡，警聩发聋，其举动非常，更有迥出意外者。……职可保外人改视易听，必不敢为无厌之求。……然非皇上采法俄、日，亦不能为天下雄也。

“其第二策曰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六部九卿诸司百执事，自有才贤，咸可咨问。若内政之枢垣，外政之译署，司计之户部，司法之刑曹，议论之台谏翰林，尤为要剧，宜精选长贰，逐日召见，……若者宜革，若者宜因，……谋议既定，次第施行，期年三月，成效必睹。

“其第三策曰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宜通飭各省督抚，……取用新法，……守旧而不知变者斥之，习故而不能改者去之。要以三年，期使各省均有新法之练兵数千，新法之税款数万，制造之局数处，五金之矿数区，学校增设若干，道路通治若干，……如此则百废俱举，万象更新，销萌建威，必有所济。……

“若皇上少采其言，发愤维新，或可图存。……否则，诏吴之祸立见，裂晋之事即来，职诚不忍见煤山前事也。”

1月29日，康有为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取鉴日本把变法措施具体化，认为“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希望通过君主立宪，进行改革，发展资本主义来抵抗列强的侵略。

在第二次瓜分危机越来越迫近的形势下，光绪皇帝在6月11日不得不下诏《明定国是》：认为“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须博采西学”，“变法自强”。否则，“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挾坚甲利兵乎？”

自此以后，“上自朝廷，下至人士，纷纷言变法”，“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此后大量的变法诏书就不断地颁发了，其中主要地有：

6月19日，命各省陆军改练洋操。

6月23日，废止八股文，考试一律改试策论。

7月4日，命地方官振兴农业，各省成立农业学堂。

7月5日，奖赏士民著作新书及创作新法，实行专利法和版权法。

7月9日，改革兵制，八旗汉军炮营藤牌营等，改习洋枪，新法练兵。

“戊戌变法”运动本身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专题之一，内容丰富，本文在这里是只就其反瓜分意义这一点上来立论的。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017页。

《戊戌变法》（二），第192—197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同上书，第199页。

7月10日，各省府厅州县书院改为各级学堂，兼学中学和西学。

7月13日，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7月14日，饬各地方官保护商业，奖进商务。

7月25日，再谕振兴商务，试办商务局。

7月29日，命各部院衙门删去旧例，另定简明则例。

8月2日，设矿务铁路总局。

8月9日，京师大学堂成立，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美人丁韪良(Martin, W.A.P.)充西学总教习，赏给二品顶戴。

8月10日，谕南北洋大臣及沿海将军督抚整顿水师，并饬王文韶、张荫桓于各铁路区及开矿处增设学堂。

8月16日，译书局成立，由举人梁启超办理。

8月21日，设农工商总局。

8月24日，谕示将奉慈禧太后于10月29日乘火车赴天津阅兵。

8月30日，诏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大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凡设有总督省份的巡抚，一律裁撤，计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惟江苏因巡抚驻苏州，不在此例；东河总督，不产盐和不办漕运的各省盐、粮道，以及其它闲曹，一并裁汰。

9月4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革职，因为他们不遵谕旨，把该部主事王照的条陈抑不上闻。

9月5日，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9月11日，设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

9月12日，变通武科考试办法，一律改试枪炮。

9月13日，准许一切臣民上书言事。

9月14日，准旗人可在外省经商贸易。

9月16日，准编岁入岁出表，公布周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晋授侍郎衔，责成专办练兵事务。

以上就是在“百日维新”中所颁发的主要诏令，康有为的变法纲领在其中只得到了部分的实现。诏令范围虽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各方面，但其重点在于军事和文教。由于政变和其他缘故，这些诏令除成立京师大学堂以外，都基本上并未执行，有的执行了后来也全部推翻，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尽管如此，它毕竟是在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晚清政局中掀起了一阵疾风暴雨，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呼声和改革政治的部分要求。在中国近代史上，它的影响是巨大的。

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在帝国主义卵翼下，对列强抢夺让与权的要求百依百顺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力量过于“强大”。在6月11日“诏定国是”后的第4天，即6月15日，慈禧就下令以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军）三军；此后补授满汉侍郎以上及各省将军督抚等官，均须具折向太后奏谢，也就是说任用二品以上大臣之权操诸太后；同时又将主张变法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开缺回籍”。这样一来，保守派掌握了军政大权，维新派变法的命运也就可以想见了。“手里握住刀，统率一支大军，一个人才能发号

施令，制定法律，有把握使人们服从他。没有这样的条件，掌大权就会危险”。

光绪也深明此点，企图以晋授侍郎衔来争取袁世凯。不料竟被这个善于玩弄两面派手腕的人所出卖。9月21日，在袁世凯的告密下，慈禧当即发动政变，由她“临朝训政”，把光绪幽禁于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参与变法的谭嗣同、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林旭、康广仁等人于9月28日（八月十三日）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百日维新宣告结束。

在戊戌变法中，光绪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本是一个养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还不到30岁的青年，目睹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瓜分危机，自己“不甘作亡国之君”，敢于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下支持康有为的一些变法主张，这是难能可贵的。康有为本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是在中国儒家经典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领导了这场变法运动而成为我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后来变成了一个保皇派，这是他的封建思想复辟的结果，也是不足为奇的。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结果，在于它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一贯主张的君主立宪、变法图存的思想 and 实践的破产，使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和势力得以逐步扩大，取得发展，清皇朝的封建统治看来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了。这就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深刻历史教训。

三、《东亚时局形势图》及其《题词》（1898年7月）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列强瓜分我国的政治家，远在1894年底就为此而成立了兴中会的革命组织。1895年10月，他领导的广州重阳节武装起义因谋事不密，未及发难即遭失败，他本人也遭到清政府通缉，流亡国外。自此以后，直到第二次瓜分危机到来的两三年间，革命派因在国内受到镇压，不可能在政治上公开有所作为。他们只好在散布世界各地的广大华侨中进行革命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华侨的热爱祖国热忱。尽管处境非常困难，他们对国家的命运也不能熟视无睹。1897年7月兴中会员谢缵泰所绘制的《东亚时局形势图》及其《题词》，集中地反映了人们对惊心动魄的时局，忧心忡忡，成为这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第二次瓜分危机的宝贵文献。

先是，在1895年10月10日，兴中会成员在香港开会，选举兴中会总办（即会长）兼广州重阳节起义后临时政府的总统人选，谢缵泰推举杨衢云，孙中山表示谦退，杨遂当选。及起义失败，杨去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

同上书，第19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097页。

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8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戊戌变法》（一），第476页。目前，关于这个问题，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历史报告文学张建伟著《世纪晚钟》一书中又有新的说明，即根据1909年杨锐之子杨庆旭上交清廷的光绪皇帝给杨锐的《密诏》说明；当年谭嗣同持以说服袁世凯兵变的诏书并非光绪本意，乃是康有为伪造的所谓《密诏》。详细摘要见《中华读书报》1996年6月19日第101期第4版所载古风《“戊戌政变”有新解》一文；同时还可参阅该报1996年7月17日第105期第6版所载房德邻《“戊戌政变”有新解，“新”在何处？》的文章。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戊戌变法》（一），第331页。

各埠，所至皆建兴中分会；谢则在香港任职于英文《南华早报》。孙中山去横滨赴檀香山，又经旧金山、芝加哥抵纽约，1896年9月由美赴英，10月11日被伦敦清政府驻英使馆人员绑架，准备偷运回国杀害。10月23日，孙先生在前香港西医书院老师康德黎（Cantlie, J.）和孟生（Manson, P.）二人的援救下脱险，此后他在伦敦住下，宣传中国革命。1897年七八月间，他由伦敦经加拿大赴日本，在与日人宫崎寅藏笔谈时指出：

“瓜分之机已兆，则我辈须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结英、日两国为后劲。我同志之士相率潜入内地，收揽所在之英雄，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也。……惟此起点之地，……以广东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

11月，杨衢云听说孙先生“从欧洲至日本，乃东归访之”。

另一方面，留在香港的兴中会员谢缙泰此时亟谋与维新派联合起来，共同救国。他在“丁酉、戊戌间（1897—1898年）与康有为之弟广仁谋联合各党，一致救国；以有为鄙视他党，运动无效。戊戌六月缙泰感慨时事，特绘制一《东亚时局形势图》，以警世人。图中以熊代俄国，犬代英国，蛙代法国，鹰代美国，日代日本，肠代德国。其旁题词曰：

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

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正如孙中山所说，那时的革命党人、兴中会成员大都认为须先起义，“据有一二省为根本”，而地点的选择，则“以广东为最善”。因此，谢缙泰在作了这首诗的《题词》以后，为便于号召广东一带人民，很可能又为此创作了一篇用广东方言来写出的通俗《题词》对《时局图》加以解释；他在《题词》中说：

“争什么野气！使什么思疑！时局分明看一下便知。你看俄国好似一只大黑狼到极地，张牙伸爪以恶为题：踏实山、陕、辽东兼及直隶，满洲、蒙古都系他跨下东西；他一心想着吞高丽，又把眼神插住个齐齐哈尔；若然给他来吞噬，遍地将来被他踏低；他见着人就乱屠，村就乱毁，看当地中国人性命贱过沙坭！”

“再怕有个法人同他合计，你看他伸开臂膀像一只大田鸡：他占据安南作为根据地，还说暹罗那边都是任他施为，揽住琼州还说要两粤东西；怕他一声来一吠，那时川、广、云南就惹问题。

“故此英国好似一只大虫同他抵制：蟠藏两广誓不输亏，他就全身枕住个长江位；又见胶州入了德国箍围，故此伸尾搭藏威海卫，预备俄人南下他就发起雄威；宁可左眼暂留时半闭，等他饥鹰侧翅插下个面花旗。

“还有东洋一个如唇齿，都说同文同种两两相依；那里想到他又光射却台湾去，还有层层光，射影入迷离。

“唉！我好笑好鬻还有个只虾仔，他一身咸气重，八字须仔飞飞，枉费你中原如许大地，总系一角落藏，没有作为！看他大睡长眠，犹是未起。他还张开罗网，等你起脚难飞，为的是‘之乎也者’迷住你，为的是‘弓刀大石’等你越练越更顽皮。当官的提住个金钱来做生意，兜肚阴虚实在难于医治；个的财主人家诸事懒理，酒色昏迷乐此不疲。那知到外便还有好多谋住你，立刻时常会起祸机；况今日事已临头，收手未易；如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474页。

康有为在他的《上清帝第五书》中，即已诬蔑中国人民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为“乱民蠢动”，为“伏莽遍于山泽”的了（见《戊戌变法》（二）第189、192页）。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2—183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页。

果中国人再不奋发图强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正如严复在其译著的《天演论》中从理论上批判了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谢缙泰则以其绘制的《时局图》及其《题词》形象地揭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行，号召中国人民在瓜分之前醒悟过来，奋发图强，挽救中国。他在这幅画中用象征的手法描绘了1898年在列强抢夺势力范围下，面临第二次瓜分危机的中国现实，并在《题词》中指明，用黑狼即马熊象征俄国，用田鸡即青蛙象征法国，用大虫即老虎象征英国，用饥鹰象征美国，用日代日本，用德旗代德国。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真是一幅“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可怖景象了。可是，清政府呢？他们有的在那儿酣睡，有的在那儿贪污，有的在那儿酒色昏迷，大祸临头，还诸事懒理，中国真是危险极了！他用艺术的手法来显示了孙中山一年多以前在伦敦所宣传的中国革命的真理，即清政府“腐败势力所造成的中国在国际间的耻辱和危险”；要依靠李鸿章之流来使中国新生，“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银制餐具，想借此把它们改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孙中山的预见是何等正确！我们知道，谢缙泰在绘制此图以前曾经企图通过康广仁的关系，谋求与维新派合作救国而不果。所以他在《题词》中开宗明义就不无感慨地说道，国家到了这个时候还“争什么野气！使什么思疑！时局分明看一下便知”其危险，迫切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了。

1898年7月兴中会员谢缙泰绘制的《东亚时局形势图》及其《题词》，在某种程度上并在一定的范围内，唤醒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起而反对列强瓜分我国的爱国热忱。在中国近代史上，它们不愧是一幅现实主义的艺术作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1—42页。按据本书图片《时局图》，冯自由在说明时，将图中之虎误认为犬，原因系其似犬而不甚似虎，盖“画虎不成反类犬”者；又将虎尾误认为肠，遂以“犬代英国”，“肠代德国”为解，殊不知在图上山东胶州湾处，插有一道德国三色国旗；故应作“虎代英国”，“旗代德国”，方符事实。《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创刊号）第7页上所载《时局图题词编者按》中正确地“将英国改为虎”，但仍沿“肠代德国”之误而未改正，并谓“时局图显然是由谢氏图修订而成”。我认为《时局图》可能即是谢缙泰的《东亚时局图》，不过把名称简化罢了。

按这篇通俗《题词》，《时局图题词编者按》认为：“原件未注明年月，据文字判断，既言沙俄‘他见着人就乱屠，村就乱毁’，似在1900年以后，又言沙俄‘他重心想着吞高丽’，则似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以前”（《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7页）。实际上，俄国之想吞朝鲜，决非始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前。1897年5月，俄人就任朝鲜的财政顾问，“俄国通过实际上是朝鲜王国财政大臣的财政顾问，使俄、日对等的保护权变成了俄国占优势”，并“阻止了外国在朝鲜建筑窄轨铁路，而坚持要用五英尺宽的轨道（照俄国的标准）”（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6页）。另一方面，沙俄“见着人就乱屠，村就乱毁”，也决不是1900年以后才有的事，远在1897年12月俄军强占旅大以后就开始了，正因为如此，才爆发了1898年春金州人民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由此可见，通俗《题词》中所反映的俄国情况，正是1898年的事实，而不是开始于1900年以后或1904年以前。因此，按照绘图题词一般均由绘者来作的通例，如同诗的《题词》一样，这篇通俗《题词》也很可能就是绘制者谢缙泰所作；谢广东开平人，也便于用广东方言来写。

《时局图题词》，见《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7—12页。为便于一般读者理解起见，此处引文根据《近代史资料》的注释，把一些难解的广东方言译成了普通话。

品和一篇爱国主义的革命文学作品。

四、余栋臣起义（1898年7月）

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就开始具有了反瓜分的性质，1895年的成都教案和古田教案是为了反对第一次瓜分危机而爆发的。自此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扩大和深入，教案层出不穷。它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又反映出教会侵略的日趋激化，更反映为列强需要这些教案来作为借口，便于他们抢夺更多的让与权。因此，当第二次瓜分危机出现之际，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的中国人民，到处掀起了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在这些斗争中，以1897年7月余栋臣起义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成为义和团运动的直接的前驱。余栋臣起义乃是联结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余栋臣，四川“大足，龙水镇人，有兄弟四，姊妹二，贫不能自存，以负炭为生。有大膂力，秉性强悍，乡里以‘蛮子’称之。彼处多哥老会，余隶籍其间，俨然翘楚，为同党所推尊”；“扶危救困，有胆略，好雪不平，人皆慕其义”，“推为龙水镇龙善堂哥老会龙头”。远在1886年和1887年，余栋臣都曾参加过龙水镇人民捣毁教堂的斗争。到1890年，教堂重修竣工，龙水镇教堂彭若瑟司铎通知大足县令钱葆臣出示禁止迎神赛会（灵官会）和派兵保护教堂。8月4日（六月十九日）发生打死群众和烧毁民房事件，群众又起而捣毁教堂，县令诬指为富绅蒋赞臣所主使，更激起人们义愤。余栋臣遂组织西山煤窑、纸厂工人竖旗起事，于8月8日攻入龙水镇，焚毁新教堂；同时发布檄文：痛斥列强和传教士“无法无天”的侵略罪行，“不惟凭凌小国，敢又欺侮中华”；揭露封建官绅与传教士狼狈为奸，“助桀为虐”，“使司铎而钻衙门，颠倒是非，买保正以作心腹，别有阴谋”。于是清政府急派桂天培带兵到大足查办，余栋臣被迫撤离龙水镇，退匿西山。四川总督刘秉璋以赔银5万两与通缉“凶手”结案。1898年春，清吏捕获余栋臣，送赴荣昌县监禁。5月21日被蒋赞臣等率众200余人打监劫狱救出，于5月23日回龙水镇，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余栋臣于是招募兵卒，铸造武器，准备起义，一时云集在他的旗帜下的便有6000多贫苦群众。

1898年7月3日，余栋臣在准备就绪后即以“闹教”来宣布他的起义了。他派张桂山、唐翠屏分兵两路，到荣昌县河包场郑家湾天主教堂去捕捉法国教士华芳济（Fleury, Père Francois）。该教士自述其经过如下：

“西历七月初三夜，炎热殊常，乘凉至十一下钟，……余党一人潜踪入屋。……予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见《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705页。

《中国的现在和未来》（1897年3月1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8、103—104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按黄曾源在其二十四首《庚子前纪事》诗之第八首中，在“无奈瓦全宁玉碎，忍看豆剖与瓜分”句下注有所谓《瓜分图》（《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31页）者，不知其详，想来近似于《东亚时局形势图》或即是此种图之翻版。

华方济：《被俘记》，见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7页。

就寝一下钟，门外大哗，惊跃而起，见睡房隔板已飘掷如飞，……无计可施，……力拒良久，卒以身受数伤，不能支而就擒，……经堂付楚人一炬。俄整队回龙水镇，一路鸣枪示喜，欢呼辱骂之声充斥途巷。……乡民闻声麇集，络绎追踪，或云食予肉，或云饮予血，或言当火烧，或言当刀割。……天方曙，抵三吉村；适值大市之期，商贾云集，齐来观瞻。余蛮向众曰：‘此外国人究为我捉到，逃不出我手矣’！众人云：‘杀之，杀之！此是我大教之仇，不杀之吾大教不能行矣’。……至午后二下钟，始抵龙水镇，群集普光庙中，市商来贺，合镇哗然。……黠者咸来，千般盘问，……首尾二昼夜，几类公堂讯案。”

根据这段自述，可见广大群众多么痛恨传教士平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的罪行！又是多么衷心拥护余栋臣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起义！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纷纷捐银助饷，参加起义队伍，“黎庶附之者日益多，而以哥老会人为最”；“党人中有自湖南来者，更促余反，自言千里远来，原为行大事，不特杀教民已也”。余栋臣把他们按营哨编制起来，每营分中哨、左哨、右哨，每哨50—200人。余栋臣正营有大红旗两面：一写“余”字，一写“义民”二字，还有许多写着“顺清灭洋”，“除教安民”，“民教不和，打奉教徒”，“专打洋人奉教人，不打中国人”等字样的小旗。

8月，余栋臣传檄四方，拟分兵三路出击，他自己东攻重庆，“蒋赞臣招兵于冈窑，向成都进发；唐翠屏率兵往泸州、叙州”。在《檄文》中余栋臣声称：“本义民但戮洋人，非叛国家”。“今洋人者，海船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爱起义师，誓雪国耻”，“事必有成，则日本兵费合二百兆之款，本国昭信票六千万数，仁厚吾民，一切免矣”！蒋赞臣等在引兵攻入安岳、资中时，还沿途张贴《告白》说：“海禁大开以来，泰西传教通商，……不应欺凌乡党，……不应动摇边疆。……往者迭次打毁，衅由彼教不良。……此番兴师起义，打教非比寻常，意在除邪辅正，并不扰乱地方”。

当余栋臣起事之初，川东道即派重庆镇官兵到大足镇压，至永川三教场，遇伏败溃。起义军在7月3日夜抓住华方济后，“使省当局的行动陷于瘫痪，因为法国政府要它对华司铎的安全负责”。7月18日，川东道派员偕大足县令丁昌燕“同来镇上，请余蛮释予，余不从”。八九月间，余栋臣分兵出击，铜梁、永川、荣昌、隆昌、郫县、叙州、璧山、合川、武胜、南充、遂宁各县人民，纷起响应。10月18日，清廷电谕川督文光设法收抚，文光派安定营统领周万顺、丁昌燕与余栋臣议和，不果，余并将周万顺拘留。11月6日，清廷以奎俊任四川总督，派布政使王之春为总兵；并于15日电示王之春“慑以兵威，分别剿抚，以惩‘余匪’而安教民”。“此案关系极重，事

汪茂修：《余栋臣仇教记》，见同上书，第507页。

《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1期，第123—124页。

华方济：《被俘记》，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518—519页。

同上，第520页。

参阅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90页。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521页。

《余栋臣告示》（1898年8月3日），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92—94页。按昭信票于1898年9月7日，由清政府明令停止。

《蒋赞臣告白》（1898年9月），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94—95页。

机甚迫”。12月，王之春集中兵力，乘起义军不备之际，击败唐翠屏军于资中；唐在贾家场遇害。余栋臣于月底释放周万顺，率军退入西山。1899年1月16日，清军占龙水镇；19日，余栋臣把华方济释放，随后即至清营请降；起义群众则分走贵州及铜梁、江津各处潜伏。清军上山受降，仅余几所空庙而已。事后清政府向法国侵略者赔银118.61万两结案。

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中，余栋臣1898年7月的起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以如下的三个特点而成为即将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前驱。

第一，这次起义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的政治口号。在《余栋臣告示》中，已经指明教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比较全面地历史地指斥了列强对华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和暴行，而归结为“胶州强立埠镇，中国意欲瓜分”。他之所以起义，不仅只为反洋教，而是为了“剪国仇”，“雪国耻”。余栋臣还向参加起义的群众说道：

“中国之患在二：一西教日昌，一西人日盛。昔我烧毁教堂，惟竭我一人之力；今则举世皆醒，知教堂不可不灭，故众志成城；欲出国家于危急。……今朝廷百官，懵不解事，徒知受西人之贿，而国将瓜分，民将瓦解，茫然不介于怀。鄙人此举，为国家计，亦为诸君计也。苟有志气，当与我戮力同心，群起剿除西教。行见西人虽强，必以众寡不敌，不复敢蹈我中原。况我近日所制枪炮，灵利无伦，可命中于百丈之外，诚万全无一失之虑，君等无虞。”

这就是说，要使中国免于瓜分，则“教堂不可不灭”。我们即将看到，义和团运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严重问题而走上历史舞台的。

第二，余栋臣自称“义民”，竖起了“顺清灭洋”的旗帜。这面旗帜曾为后来由赵三多、阎书勤在冠县发动第一次义和拳武装起义时所沿用；而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这面旗帜表明，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国家面临列强第二次瓜分危机之际，“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换句话说，这面旗帜表明当时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业已转化，由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转化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余栋臣的起义已经不单纯是反洋教斗争，而是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的性质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在余栋臣起义前后，有些清政府地方官吏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站在余栋臣一边。他在1898年5月之出狱，虽说是蒋赞臣等率众劫狱的结果，同时也是荣昌知县杨寅恪“借公出衙”有意纵囚所致。故曰：“杨公察其无辜，脱囚归里”。余栋臣在出狱后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聚众起义，也同大足知县丁昌燕的暗中同情有关。他出狱后，丁昌燕“带兵往荣昌，行抵刘公河，与蒋、余相遇，不擒执，反让道而行”。“厥后二阅月，谣诼四起，风鹤惊疑，咸谓余蛮子将大闹教堂”，“事闻川东道，下札饬查。大足令仍以安谧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165页。

华方济：《被俘记》，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520页。

《清德宗实录》卷四三一。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93页。

华方济：《被俘记》，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521—522页。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309页。

如常稟复。按大令系山东人，闻德廷占胶澳，大抱不平”。“据外人言大令曾密谕余蛮闹教，未知确否？”为什么地方官吏会同情人民群众的“闹教”呢？我们这里有一份一年多以前一个江西省永新县令阎少白的《自述》，多少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

“近年来各教堂教士大背条约，相习成风。……地方官类皆仰体时艰，借三尺之法辅助主教，以鱼肉华民，必满教民之欲而后已。……主教遂愈觉得意，肆行无忌，遇事生风。地方官稍拂其意，即电报上海、京都，立即雷厉风行。……得尺进尺，得寸边寸，究必勒赔巨款，久矣习以为当。……无中生有，借端索诈，……卑职腆然人面，忍心害理，俯首下心，仰鼻息于洋人，以犯众怒，内负吾学，内负吾民，已无以自立于天壤，……甚至边衅由是而开，卑职何敢当此重咎。再四思维，非一死无以大白此心于天下。……否则但问民教，不能复问曲直，是非公道无存，尚复成何世界！”

永新县令阎少白不惜以生命来反抗该县传教士步师嘉的压迫的事实（当然这只是少数的具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封建官僚），反映了外国教会在中华大地上的横行霸道。如不起义，中国人民实在是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

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和条件下，余栋臣起义军才竖起了这样一面“顺清灭洋”的旗帜。当然，他们的“顺清灭洋”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各府州县，官是朝廷之官，兵是朝廷之兵，差是朝廷之役，如能见容，一切不犯”；“倘目为盗贼，反兵相向，则兵丁官役，皆畏洋人，并非我朝臣子，于国法正所必诛，于义民碍难束手”了。至于“灭洋”，实际上“并不是要伤害或者杀害外国人，而是恐吓外国人，把他们吓出中国去，由此使中国摆脱外国的非法入侵、污染和侮辱”。华方济在余栋臣起义军中半年多，并没有被杀害，就是一个明证。义和团后来的“扶清灭洋”，也并不是要杀害他们，而是要驱逐他们。

第三，余栋臣起义以后，面临第二次瓜分危机的中国人民纷起响应，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反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余栋臣“是最得人心的”，“他的势力和威望在与日俱增。写有他的名字的小册子四处传播，所有的秘密社团都以他为榜样”。“自九月份以来，余蛮子的名字在穷乡僻野中尽皆知晓，好似他是一个救星。由于他的作用，欧洲人与教士将被驱走而永远不再出现，而统治王朝终于将要摆脱外国人的桎梏，中国要收复失地，黄金时代终将重新到来”。因此，这次起义在四川省内，“计闹教三十余州县，焚毁教堂、医馆二十余处”。在省外则湖北、湖南、贵州、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各省均有响应。湖北施南府利川县，宜昌府长乐县、长阳县、巴东县，襄阳府老河口，湖南之耒阳、澧州、武陵，贵州之遵义府仁怀县，浙江之严州府桐庐县、建德县，台州府黄岩县、太平县，福建之建宁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 510 页。

《余栋臣告示》，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93 页。

华方济：《被俘记》，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运动》，第 518 页。

《署永新县令阎少白遗稿并绝命诗》（1897 年 1 月），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370—371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余栋臣告示》，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 93 页。

赫德：《北京公使馆：一个民族起义和国际事件》（1900 年 8 月），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1901 年英文版，第 53 页。

府建安县、瓯宁县，江西之清江县、贵溪县，广东之兴宁州等各地均有教堂先后被毁，形成了多米诺连锁反应。湖广总督张之洞看到这种形势后惊呼：各地“教堂处所尚多，倘以掳教士为护符，则‘匪焰’益张，各省教案接踵，直无办法，大局将不可问”。余栋臣起义在各地所引起的这种“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局面，也正是义和团起义以后的情况，说明中国人民群众在反瓜分爱国主义精神指导下所形成的革命形势，业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并且日趋激烈。

总之，余栋臣起义，就其目的来看，他已经不单纯是反洋教，而是反对列强“意欲瓜分”中国，并且认识到要反瓜分，则“教堂不可不灭”，因而就必须通过反洋教来反瓜分。这一点他和义和团运动是完全一致的。就其方式来看，他由于认识不到这时的“朝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洋人的朝廷”，列强已经“把中国和欧洲熔合成为一个政治体系”而走上了“顺清灭洋”的道路，这同义和团“扶清灭洋”的道路也是差不多的。但是，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以推翻清朝，维新派的以改革清朝政治来使中国免于瓜分的活动都不免于遭到清廷的镇压来看，这似乎又是中国人民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行的道路，更何况当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业已转化成为主要的矛盾了呢！不过，这正是余栋臣起义失败的悲剧所在，也预示着义和团起义的未来。最后，就其影响来看，正如余栋臣自己所说，过去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惟竭我一人之力”；如今“则举世皆醒”，“众志成城”。也就是说，过去的“教案”，一般说来是孤立的，地区性的，先后相继的；如今则是联合的，全国性的，同时并存的了。只有在这种“天下云集响应”的形势下，起义才能变成真正的民族战争。

因此，我们认为，余栋臣起义乃是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前驱，甚至可以说就是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川南教区德来赛写给法国驻北京公使毕盛的报告》（1899年3月19日），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592—593页。

王之春：《复张之洞电》（1899年6月），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536页。

中编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其发展

在余栋臣起义以后三个多月，山东冠县梨园屯义和拳于 1898 年 10 月发动了武装起义，正式宣布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直接推动了义和团运动在 1900 年的全面爆发。

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到它全面爆发这段过程中，中国人民面临第二次瓜分危机的余波和正在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义和团运动就是在中国人民反对第二次瓜分危机中兴起，在同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的斗争中茁壮成长起来的。

为了说明这个过程，我们在本编中准备就以下三个问题进行论述，即：

1. 在中国人民反瓜分危机斗争中兴起的义和团运动。
2. 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
3. 义和团运动在斗争中蓬勃发展。

第五章 在中国人民反瓜分斗争中兴起的义和团运动

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始终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危机，并且已经经历了其中的两个高潮，即甲午战争中及其后的第一次瓜分危机和德、俄强占胶州湾及旅、大以后的第二次瓜分危机。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都卷入了反瓜分的斗争。他们之中既有中国封建地主统治阶级中的爱国人士，也有中国资产阶级中的革命派和维新派，更有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统治斗争的广大的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群众。他们都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不同程度上并在不同的方面对反瓜分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而使我们这个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毕竟渡过了困难重重、危如累卵的两次瓜分危机。

但是，渡过瓜分危机并没有中止瓜分危机；在帝国主义列强疯狂的让与权争夺战下，瓜分危机反而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各阶级虽说都卷入了瓜分的斗争；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遭到清政府的镇压，他们的斗争一般说来主要地只能在海外华侨中进行；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 1898 年 9 月“戊戌政变”以后也遭到了革命派同样的命运，他们的领袖有的被杀害，有的则逃亡国外。至于封建地主统治阶级中的爱国人士，他们的爱国活动有的遭到帝国主义者的监视，有的被列强逼令撤职或调任，有的则依违两可而获得保全。总之，他们的活动是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的。只有中国人民群众的反瓜分斗争却反而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卖国的封建统治者日甚一日的压迫与剥削中日益高涨激烈。他们的斗争“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他们“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义和团运动就是在中国人民群众的反瓜分斗争中兴起来的。如果说这个运动以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统治来作为它的基本斗争形式，那么，它可以说是继承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传统。如果说这个运动以反瓜分来作为它的主要目标，那么，它可以说是继承了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成都教案”和“古田教案”的传统。如果说这个运动兴起于 1898 年中国人民的反第二次瓜分危机的斗争，那么，余栋臣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也就成为它的直接的前驱。

张之洞：《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1898 年 12 月 21 日），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 534 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416 页。

第一节 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之沿革

义和团这个名称来自义和拳，它的前身就是义和拳。“义和拳之名，萌芽于乾隆年间”。据我们目前所知，“义和拳”一名首见于1779年1月12日（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周元理的奏折中；该奏折说：

“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承准军机处抄寄山西壶关县民人张九锡呈控河南黄河漫口派累民间办料折收钱文，并首出山东、直隶有邪教聚众情事，经尚书公福隆安等审讯具奏，奉旨：此案……所控山东冠县及直隶元城县有民人杨姓等起立义和拳邪教，聚集多人之处，并著周元理、国泰迅速严查，据实复奏。……伏思民人敢于起立学拳邪教，聚集多人，实属不法。其所称童姓，既有义和拳名色，为行路推车人之所知，断难掩众人之耳目。……童姓名唤童国林，住元城县隆华村，教拳徒弟约有百余人。……山东冠县杨姓名叫杨四海，住在碗儿庄。……冠县与元城连界……。”

我们知道，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清水教首领、山东寿张县人王伦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10月在寿张、阳谷、堂邑、临清等地起义，官方文档中便已经出现了“入教从‘贼’及学义合拳”字样。义合拳实际上就是义和团的前身。据此，则义和拳之最早记载还可以上溯到1774年。到1783年12月8日（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一月壬寅、即十五日），在《清实录》中有一条上谕说道：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福长安奏，有直隶南宫县人魏玉凯喊禀。讯据供称，在本县魏家庄居住，该庄有乡约李存仁，及魏学宗、简七、王三、严龄等，与山东王伦都是高口地方之李姓徒弟。从前原系白莲‘邪教’，演习拳脚。四十六年（1781年——引者）后，又改为义和拳，各人供藏有绳鞭等语。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加审讯。据魏玉凯供，伊向乡约，上年正月告退，即系李存仁充当；李存仁又将伊殴打过一次等供。是魏玉凯与李存仁显有仇隙；但既喊控李存仁等有演习拳脚之事，自应彻底查办，未便因其挟有微嫌，将就完事。著传谕刘峨，即派明于大员，会同正定镇，速赴魏家庄严密访查。如果李存仁等有传教敛钱、滋事不法、并藏匿绳鞭之处，即行就近详细根究，按名查拿，解部审办。如果实无此项情节，止须将李存仁等解京，与魏玉凯质讯，不必株连。至魏玉凯因何不充乡约，是否因事革退及自行告退，即查明具奏。其高口地方，是否有李姓其人，系王伦党羽，亦著一体密访，据实奏复。寻奏白莲教久经严禁，当此光天化日之下，岂可复容此鬼蜮？现已飞札镇臣全保，会同清河道梁肯堂，驰赴南宫，严密查访。其魏玉凯因何不充乡约，臣衙门并无报案，俟飭属查明另奏报闻。”在1808年9月4日（嘉庆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年的上谕中，我们看到：

“给事中周廷森奏请严惩聚众匪徒一折，据称近日江南之颍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归德府，山东之曹州府、沂州府、衮州府一带地方，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名目，……勾通胥吏为之耳目，……自应严行惩办，……不可养痍贻患。……著交江南、安徽、河南、山东各督抚，认真查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5页。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491页。

《拳事杂记》，见丛刊本《义和团》（一），第237页。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朱批奏折·农民运动》卷796，第1号。转引自陆景琪、程歆编：《义和团源流史料》，中国人民大学1980年版，第23—24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办……。”

根据上述引文，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义和拳是18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于山东冠县一带冀、鲁、豫边区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而以“会拳”、“演习拳脚”来作为它结社的形式。在封建社会中，人民是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2月，清政府重定聚众结盟罪例，凡异姓人订盟焚表结拜兄弟者，照谋叛未行律定罪；若聚众至20人以上者，为首者绞立决，为从者则发极边充军。因此，民间结社在当时都是秘密的；而人民之所以冒险结社，则是由于不堪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所以必须组织秘密结社来反抗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准备起义。乾隆一朝，是清帝国由盛而衰的过渡时期；在残酷的封建统治下，人民群众的起义已经越来越多。照同时代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的看法是“民不安生”，“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那也只不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反映。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义和拳就是中国人民为了反抗清政府的压迫和剥削而进行起义准备的民间秘密结社，作为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是一定要“严加确究”，“彻底查办”的。

第二，义和拳是属于白莲教系统的民间秘密结社，具有宗教的色彩。在清政府看来，它是“义和拳邪教”，认定它“从前原系白莲邪教”，是后来“又改为义和拳”的，并且把它同1774年10月王伦在山东寿张领导的清水教起义联系起来，清水教本来就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我们知道，就清代人民起义的组织来说，基本上有两大系统：一是宗教系统，一是会党系统。会党系统以天地会、哥老会为主；宗教系统除拜上帝会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外，基本上是白莲教系统。白莲教产生于宋代，历史悠久，势力遍及大部分中国。自此以后，历代都有白莲教及其支派领导的人民起义运动，1355年爆发的红巾军起义和1796年爆发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则是其中有名的和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镇压，白莲教的名目时有变化，支派甚多，如八卦教、天理教、先天教、灯花教、文贤教、大刀会等等，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义和拳既属于白莲教系统，它同各支派都会有些关系。有人认为：“义和拳即八卦会”，或“又名八卦教”；它曾以八卦之名来组织拳会，是否就是八卦教呢？有人又认为它“初起名曰大刀会”，大刀会“持红双缨枪”，“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以其浑身工夫都用到刀枪不入之故也；所以又有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之名号”。义和拳后来自称能避刀枪，是否就是大刀会或金钟罩呢？我们说它既是又不是：说它是，是因为它具有这些支派的特点；说它不是，是因为它还可能同它们有些细微区别，所以它就没有改为这些支派的名称。总之，义和拳本来就是白莲教这

转引自陆景琪、程献编：《义和团源流史料》，第16页。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伪满影印本，卷一九二，第21—22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按“乡约”是明清时代由知县任命的乡中小吏。

劳乃宣辑：《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见《义和团》（四），第433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红楼梦》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6—27页。

按八卦教系利用我国古代的八卦符号来作它的名称：八卦教又分为震卦教、坎卦教，离卦教等八个支派。

胡思敬：《驴背集》，见《义和团》（二），第483页。

杨典浩：《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页。

些支派中的一派，它可以吸取各派甚至是白莲教系统以外的其它秘密结社的、适合于它或对它有利的优点或特点。另一方面，义和拳虽属白莲教系统，虽同白莲教各支派有关系，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有时会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而互相敌视或火并。这种情况在世界宗教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了。因此，我们不能据此来否认义和拳与白莲教及其各支派之间的关系。

第三，义和拳自 18 世纪 70 年代前后出现于山东冠县一带以后，它的发展是很快的。到 18 世纪初叶，从直隶之南宫县到“江南之颍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归德府，山东之曹州府、沂州府，袁州府一带地方”，均有义和拳活动。这就是说，它的活动范围已经遍及冀、鲁、豫、苏、皖等五省交界处的大部分地区。正是在这个时候，爆发了 1796—1804 年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民群众多至数十万人。起义的失败使白莲教及其各支派的活动不得不更加隐蔽，被清政府认为与白莲教有关的义和拳，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以后“改称梅花拳”的。流行于冠县一带直鲁地区的“梅花拳供奉‘乾坤正气’与‘天地君亲师’牌位，分为文场和武场两种组织，也叫内功与外功。武场是公开的，凡愿意练拳的人都可以下场，不一定要行拜师礼。文场是不公开的，入文场是入道，要经过道众介绍，拜师叩头，……信仰所谓‘寿元老母’、‘老老太母’、‘千佛教主’等六尊神号，称‘六炉行世’。……文场的职能是占卜算卦，为人治病，祭神，治病有各种咒语，……还有一首只为老师父掌握的秘诀，它作为拳会之间联络的暗号，以区别于其他的会道门”。

直鲁地区的梅花拳，同当地的大刀会、红拳会等一样，都保持了民间秘密结社的斗争传统。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教会的侵略势力逐步向我国内地的广大农村深入发展，这一带地区的民间秘密结社也同全国各地一样，相继领导了人民从事于反洋教的斗争。自 1869 年（同治八年）法国传教士在山东冠县以北十八村的梨园屯（今河北威县）建立教堂以来，“民、教屡经构衅，结怨甚深”。1886 年，德国传教士朗神父将梨园屯玉皇庙拆毁，改建教堂，“村人大哗，群起抗拒”。村民中平日善习“红拳”的阎书勤、高元祥等 18 人起来帮助群众夺回庙基，展开了武装护庙斗争，深受群众爱戴，被被誉为“十八魁”。但教会在地方官吏的支持下，坚持修建教堂。这样，毁庙建堂、毁堂建庙的斗争就一直继续下去。这里的情形，同余栋臣起义前四川大足县龙水镇人民因建庙一事多次捣毁教堂的情况有其相似之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瓜分危机的到来，外国教会的侵略势力日益嚣张，使直、鲁、豫、苏边区一带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更加高涨。1895 年底曹县、单县、城武、丰县、沛县等地的烧毁教堂事件乃是外国教会向大刀会首刘士端、曹德礼等“一再寻衅”引起的。至于 1896 年刘士端领导的大刀会起义则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345 页。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第 183—184 页。

参阅路遥：《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概述》，见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书社 1985 年版，第 42—62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5 页。

程歆：《晚清直鲁梅花拳会浅析》，见《清史研究通讯》1988 年第 1 期，第 26—27 页。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齐鲁书社 1980 年版，第 354 页。

是因教会抢割江苏砀山县（今属安徽）农民庞三杰的麦禾导致的。而 1897 年被德国作为强占胶州湾借口的巨野教案则是德国传教士韩理等作恶多端、横行霸道、民愤极大所造成的。在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的高涨声中，“十八魁”首领阎书勤于 1897 年初便率领红拳会众参加支持他们斗争的梅花拳，并拜梅花拳首领赵三多为师，继续同教堂争夺庙地。同年 3 月 24 日，赵三多和阎书勤等聚集梅花拳民约“800 至 1000 人”在梨园屯“亮拳”比武，拆毁教堂，向教会示威。自 1897 年底德、俄分别强占胶州湾和旅、大从而开始了第二次瓜分危机以来，1898 年二三月间，即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二月间，谣言来有洋兵，梅拳遂又麇聚，以至远近惊惶，民教震恐。当经卑府（即东昌知府洪用舟——引者）传到拳首赵三多割切开导，晓以利害，即将梅（花）拳解散。……自是以后，各路拳民间或聚会亮拳，遂讳言梅拳，仍旧立义和名目。”“盖梅花拳本名义和拳，直东交界各州县地处边疆，民强好武，平民多习为拳技，各保身家，守望相助，传习既众，流播遂远。豫、晋、江苏等省亦即转相传授，声气广通。”据此可知，大约在 1898 年 3 月左右，梅花拳恢复了义和拳的名称。

由此可见，在 18 世纪 70 年代前后以山东冠县为中心兴起的义和拳是在 19 世纪初期可能因白莲教大起义的失败而改称梅花拳，到 1898 年 3 月又因第二次瓜分危机的到来，借清政府地方官吏劝令解散梅花拳之机而恢复了它本来的名称义和拳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坚持已有的名称或改为别的名称而要恢复他们原来的名称义和拳呢？

我们认为，这个名称的恢复，在 1898 年初祖国面临第二次危机的时刻是最能表达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感情和救亡图存的决心的。所谓“义和拳”就其含意来说，就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和衷共济、同心协力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拳民。他们为了保家卫国而习拳练武，这是无可非议的。这面旗帜一下子把全国人民的衷心愿望都说出来了，它是不可抗拒的、义不容辞的。因而也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号召力。如果简单地用我们现在的句话说，“义和拳”就是义勇军。英使窦纳乐在 1900 年 1 月向首相索尔兹伯里谈到这个名称的意义；他说：“该结社的名称，在照会中作‘义和拳’，是同‘拳民’一样的。‘拳民’这个名称，最初不是传教士就是新闻报纸提出来的，但它没有表达出中文名称的意义。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该结社成员应团结起来，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窦纳乐的解释是正确的。这样看来，他们恢复这面旗帜既保存了它在 18 世纪 70 年代出现时的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第 100 页。

按“十八魁”指阎书勤、高元祥、阎书太、阎书嘉、阎仕和、阎仕杰、阎士林、阎广德、阎招来、马廷凤、马廷梅、高启山、刘福和、刘保玉、蒋忠山、蒋建青、李老兆、阎明鉴等 18 人。“其中，阎明鉴是小地主、李老兆是富裕农民，其余 16 人皆为贫苦农民。”（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第 65 页）另一说则谓“十八魁之名，系因当日十八村习拳，故有十八魁之名”（《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 119 页）。

按赵三多是威县沙柳寨人，沙柳寨距梨园屯约三十余里。

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9 页。

《教务教案档》第六辑，山东巡抚张汝梅：《致总署》（1898 年 6 月 17 日）引东昌府禀帖。按“亮拳”是“习拳之辈”趁每年春二三月民间买卖会场之期“传单聚会，比较技勇，名曰‘亮拳。’”（同上禀）着重系引者所加。又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 117 页。

反抗封建统治压迫和剥削的光荣传统，又能增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爱国内容。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两者全都是正义的事业，而后者尤其是时代的要求，即使没有清朝地方官吏劝令解散梅花拳，这个名称迟早也是会恢复的。特别是在1897年11月14日德军强占胶州湾以后，12月18日德皇威廉第二在欢送亨利亲王率舰队来华的基尔演说中有对中国要“用铁拳打进去”的话，中国人民在1898年初恢复“义和拳”这个名称，就可以被看作是用我们的“义和拳”去打倒德国侵略者的“铁拳”的意思了。两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社论说：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Zeit)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出自著名的基尔演说的‘铁拳’一语，很快也在东亚变成流行的话。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我们倒要来看看这两个铁拳究竟哪一个要利害些哩。”

由此可见，“义和拳”这个名称的恢复可以说是最合时宜的了。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义和拳”就是拳民们“以义勇为名”的义勇军。“简单地说，义和拳运动就是一个纯粹爱国主义的自发自愿的运动”。另一方面，就白莲教各支派的名称来看，如大刀会、红拳会、八卦教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名称，似乎都不可能提供我们以赋予“义和拳”这样名正言顺的含意，因此，它就不可能对秘密结社以外的群众具有较大的号召力量。同时，又因为“义和拳”本来就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所以它又易于被已经参加了当时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白莲教各支派秘密结社的人们所接受。在中国历史上，“义”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道德价值的范畴：人们为了维护正义或公益事业，可以“大义灭亲”，有时甚至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在中国面临亡国危险的第二次瓜分危机之下，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乃是当时最伟大的“义举”，“见义勇为，无勇也。”所以余栋臣在组织民间秘密结社哥老会起义时，他就自称为“义民”；而梅花拳在恢复义和拳的名称以后，“道路传闻异词，即因义和之民，讹为义民会”，“虽系传说”，却是事出有因的了。

按由于“义和拳”的民间秘密结社性质，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组织者对这个名称的正式解释；只是在后来公开成为“义和团”以后，有的记载提出过一些说明。如刘以桐在《民教相仇都门见闻录》中说：“查该团总名，取朋友以义合之义。”（《义和团》（二），第183页）又绅士杜海龙等所设《马兰村坎字团的晓谕》中则说：“义和团，义者仁也，和者礼也。仁礼和睦乡党，道德为本，务农为业，而遵依佛法，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见陈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按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义和团始源于‘相互信任，志愿联合’的秘密教派。”（见《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附《义和团资料》，第18页）

《铁拳》(DiegepanzerteFaust)，《前进报》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着重点系原书所有。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5页。

赫德：《北京公使馆：一个民族起义和国际事件》（1900年8月），见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1901年英文版，第52页。

第二节 义和拳的组织、成员和纪律

义和拳这种民间秘密结社，是按我国古书《易经》中八卦的名称和符号来分别组织拳会的，即乾字（☰乾三连）拳会、坤字（☷坤中满）拳会、坎字（☵坎中虚）拳会、离字（☲离中虚）拳会、震字（☳）拳会、艮（☶）字拳会、巽字（☴）拳会与兑字（☱）拳会等等。这些拳会分布在直隶和山东各州县。就山东来说，乾字拳会分布在武定府之滨州、沾化、阳信、利津、蒲台等县，离字拳会分布在武定府之惠民、商河，济南府之齐东、济阳、邹平、章丘等县，东昌府之冠县十八村有坎字拳会，武定府之海丰县有巽字拳会，武定府之乐陵县西南乡有兑字拳会等。就直隶来说，保定府新城“南二十里高桥村”有巽字拳会，天津府之“沧州、南皮二处”有兑字拳会，“永定河南岸某村”有震字拳会，“京西村落”有坤字拳会，至于乾字拳会和坎字拳会，则拳众较多，分布较广，京、津一带及直隶各州县多有之。

“拳教谓其公所为‘坛’，亦曰‘炉’”。坛，又称坛口、坛场（厂）或拳场（厂），它是拳会在一个地方的基层组织。按义和拳易名前之梅花拳“分为文场和武场”、按文场不公开、武场公开的惯例来看，每个坛口或拳场亦当有文场和武场之分，而人们所见到的一般情况大体上不过是武场的情况罢了。坛的首领“皆称大师兄”，“其称谓无师父之名，授受者称之为师兄，师弟，或称大师兄而已。收入门者，朝出暮归，父不能禁其子，兄不能阻其弟，速则七日而艺成。艺成之后，头挽英雄结，腰缠红带，足履快靴”。

除大师兄外，还有称二师兄、三师兄的；因为入会之人，“不分老少、祖孙、父子，皆称‘师兄’”；“其管事者称大先生、二先生、三先生”。

各拳会间的主要标帜表现在服饰上，一般说来，乾字拳会尚黄，坎字、离字拳会尚红，巽字、兑字拳会尚黑等等。各拳会之间，甚至一个拳会的各坛之间，都彼此独立，“各不相属”。但是，在乾、坤、坎、离，震、艮、巽、兑等八个拳会之上，是否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呢？一般看来是没有的；如果说有的话，也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传说在这八个拳会之上的“活佛”

《余栋臣告示》，见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93页。

张汝梅：《致总署》（1898年4月17日），见《教务教案档》第六辑。按“义民会”一词，虽系讹传，但是它却一直沿用下去。后来顺天府尹何乃莹向他们说：“尔等皆义民”（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页）。劳乃宣的《拳案杂存》说：义和拳起义后，“群相信从，有义民会之称，是民目之为义民也。”（《义和团》（四），第470页）

参阅朱金甫、庄建平：《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笔偶成述略》，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436页。

艾声：《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463页。

支碧湖：《续义和拳源流考》，见《义和团》（四），第444页。

侨析生：《拳“匪”纪略》第五卷。

管鹤：《拳“匪”闻见录》，见《义和团》（一），第468页。

程啸：《晚清直鲁梅花拳会浅析》，见《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第26页。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373页。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页。

洪寿山：《时事志略》，见《义和团》，（一），第90页。

和“祖师”，一说“其称为活佛、祖师者，则有一僧一道，僧名‘道通’，道号‘清照堂主’”；一说“来自四川峨眉山，今已二百余岁”；一说“其初祖曰忧世先师，深忧西教之害国家，思其扑灭之法不置”；一说“老师居山东深山中，派大师兄数人下山传道”。具体情形，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它一般的授拳教师都“隐其姓名，行踪诡秘”；它的真正的“活佛”和“祖师”，在当时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就更不会亮相的了。

此外，还有一个与义和拳“相辅而行”的青少年妇女组织叫作“红灯照”。参加者“大则十七八岁，小则十二三岁，着红色衣履”，“一手持红扇，一手持红帕；传云其练法为焚香念咒”。红灯照首领称大师姐、二师姐、三师姐等，彼此则以师姐、师妹相称。“红灯照”这个名称的源流不详。一说是来自“当时的拳术中有一种叫‘红灯罩’的套路”。除此以外，年岁较大的已婚或孀居妇女之参加者则有“蓝灯照”、“青灯照”、“黑灯照”、“花灯照”或“沙锅照”等等名目。

总之，义和拳是属于白莲教这个宗教系统的民间秘密结社。它“以合掌为礼，佛教也；袂头、腰剑，道术也；头巾书佛字，刺神字，杂于僧道之间”；“佛、道两教，皆为拳党所重”。以上所述，大体上是它武场方面的概况；文场方面，由于不公开的缘故，我们所知甚少。至于整个义和拳的具体的详细的组织情况，当时许多人都“莫详其底细”，至今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自1897年初赵三多、阎书勤等“亮拳”比武、拆毁教堂，年底德军强占胶州湾，1898年初赵三多等复立义和拳名目以来，义和拳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性质就已经十分明显，平时备受外国教会压迫的贫苦农民就纷纷加入当时在直隶和山东两省边区州县活动的义和拳，学习拳术。参加义和拳的群众以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农村青少年为最多。而拳会首领，如果“不是出身于贫苦农民、雇工、赤贫无产者，就是黄河沿岸的纤夫、船夫、挑米为生者、赶脚驴者，或是木匠、修伞者、厨役、小贩、小手工业者，江湖卖艺者等等，也有一些已革粮书、营勇等人”。“他们大都出身于下层社会，很少有地富绅董参加义和拳者”。这个“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的“中国下层阶级”，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参加。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前途”的“无穷希望”。他们目睹清政府已经不能保卫祖国的领土，也不能阻止外国教会在内地欺压人民，本着“天下兴亡，

艾声：《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444页。

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51页。

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5页。

佐原笃介等：《拳事杂记》，见《义和团》（一），第240页。

《拳事杂记》，见《义和团》（一），第299页。

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41页。

艾声：《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444页。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9页。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7页。

管鹤：《拳“匪”闻见录》，见《义和团》（一），第470页。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53页。

匹夫有责”的信心，志愿把保家卫国的重担挑起来，敢于同帝国主义侵略者一决雌雄。

义和拳既然已经是为保家卫国的正义事业而战斗的团体，它自然需要一套比较严明的纪律。“立坛之始，有愿投坛者须有切实保人，且须向坛跪香立誓，有不愿者亦不强”。志愿参加义和拳的群众，首先要有自我牺牲、战斗报国的精神。“拳众皆打仗为事，出自心中愿意”；“义气相尚，心必直爽，路遇不平，不惜躯命代为伸理”。在同帝国主义侵略军战斗中“有伤亡者，其师不许哭，不许焚纸钱，棺木不许上漆；曰：‘渠成神矣，焉用哭’！”

有人认为：“昔回教有言，战死即是天堂，人人求战死，而教中人遂强”，他虽诬蔑义和拳为“拾其唾耳”，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战斗精神。拳民们“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他们确实是正义之师。其次是拳民们不贪财、不好色、不吸鸦片。他们有禁洋烟（即鸦片）咒云：“奉请如来佛，善除洋烟毒，弥陀佛、弥陀佛”。“吾道最戒者贪财”；“毋贪财，毋好色”，是参加义和拳的人必须遵守的信条。

其三是拳民要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们所过之处，秋毫无犯。拳民生活一般是“每日三白饭，夜间席地而卧，最苦”。他们“自备口粮，毫无滋扰”。“义和拳大家一志，吃素、喝白开水，不谓为一钱，不扰百姓，不沽名气”。他们在行军中，雄纠纠，气昂昂，好像是受过多年正规军事训练似的。一个目睹者记载拳民于1900年5月11日晚进入直隶易州涑水县城时的情况时说道：

“吾城中见拳民由东南两门整队而来，或十数人一起，或二三十人一起，壮丁幼童皆有，持长枪者十之七八，持腰刀双手袋者十之二三，持鸟枪者甚少；或腰红带，或蒙红巾。目不旁视，鱼贯而行。问何往？曰‘高娄’。问何来？曰‘某某村’。不多言亦不买食物，有灭此朝食之势，街市官署无敢过问。”拳民在占据涑州城时，“闻其居城一日，城内毫无扰害”；“拳众亦丝毫不犯官军，因之见面无事”。

正是由于义和拳具有严明的纪律，所以在轰轰烈烈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

朱金甫、庄建平：《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笔偶成》述略》，见《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集》，第444—445页。

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144页。

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56页。

《石涛山人见闻志》，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82页。

劳乃宣：《拳案杂存》，见《义和团》（四），第453、470页。

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53页。

《论拳“匪”》，《国闻报》，见《义和团》（四），第176页。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

佚名：《庸扰录》，见同上书，第260页。

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53页、142页。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一），第346页。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义和团》（二），第183页。

的高潮声中，“虽有举国若狂之势，而未闻其滋事也”。义和拳之所以深受人民爱戴，“乡人无不乐从”，决不是偶然的。把拳民的纪律同清政府的官军加以比较，其间实有天渊之别。这一点清政府最后也不得不承认。1901年2月14日的一道上谕就公开说出了直隶练军“漫无纪律，戕害良民”，而拳民则“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拳民。在帝国主义列强第二次瓜分危机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遭到镇压以后，这个以纪律严明而深受人民爱戴，并且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的义和拳却是反动卖国的清政府所镇压不了的。这批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和衷共济、同心协力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拳民，他们以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组成了义勇军，为了救国而“为民请命”，正是鲁迅先生所赞美的“中国的脊梁”，过去那些“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的。

艾声：《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448页。按“高娄”系离涑水县城十五里处高洛村之俗名。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吴正斋家书》，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261页。

佚名：《遇难日记》，见《义和团》（二），第162页。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一），第347页。

第三节 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1898年10月）

在余栋臣起义三个月后，由赵三多、阎书勤等领导下的义和拳于1898年10月，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发动了武装起义。

我们知道，这时全国人民已经在为反第二次瓜分危机而展开了各式各样的斗争；我们还知道，第二次瓜分危机是1897年11月德军占领山东的胶州湾开始的，山东因此也就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到1898年5月，英军又强占了山东的威海卫，瓜分中国的危机日益迫近，一时风声鹤唳，颇有草木皆兵之势。1898年二三月间，赵三多等之会集拳民“亮拳”，就是因为“谣言来有洋兵”，为的是“各保身家、守望相助”的。3月10日御史胡孚宸奏中就“闻山东有德兵枪毙平人之案，经德官验明，仍未将洋人抵命，远近汹汹，民怀怨愤”；“若再姑息，是属国之不如，我自主之权全予外人，尚堪立国乎？”“德人横暴，我民隐忍；隐忍不已，终必溃决”。尤为严重的是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日益嚣张。传教士挑起的“巨野教案”成为德军强占胶州湾的借口，当时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立意要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效犬马之劳的传教士这时更是到处兴风作浪，指使他的心腹“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遽欲恣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民气遏抑太久，川壅则溃，伤人必多，其患有不可胜言者”。

1898年10月26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二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河北威县）蒋家庄马场发动的首次义和拳武装起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根据威县城北赵家庄教堂法籍耶稣会传教士赵席珍（P. Remy Isoré）的报道，情况是：

“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应作二十六日——引者）星期三，上午十点钟，有人将义和拳（Ihonokinen）敌对派的暴动的消息告诉了我。这些暴动者的标志是头裹手巾，脚穿长靴，武器是快枪和长矛，他们的旗帜是镶有黑边的黄幡，上面写着‘顺清、灭洋’（‘Obedienceto the Tsing; Death to the Europeans’）的字样。他们打算在新年头一天发动普遍的起义（their object to pro-voke a general revolution at the begining of the year），从此时到那时，到处招兵买马，操练武艺。他们同官吏妥协，只进攻基督徒。”

在这段记载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这是民间秘密结社“义和拳”于1779年最早见诸文献记载以来，大约120年后发动的第一次起义。义和拳最早出现于山东冠县，这次起义也在山东冠县梨园屯，“该屯与直省村庄紧接”，向“为义和拳渊藪”；或者说“冠县之河北一带，又与直省之威县，曲周犬牙相错，威曲之间向为拳教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5页。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2页。按坚决主张镇压、并定义和拳为“邪”教的袁昶说义和拳的反侵略是“用邪于正，斯亦奇矣！”（《义和团》（一），第347页）义和拳是正义的爱国组织，他们反侵略是用正于正，何奇之有！

张汝梅：《致总署》，（1898年6月17日），见《教务教案档》，第六辑。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页。

《山东巡抚张汝梅折》（1898年5月18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页。

渊藪”。他们在这次起义后还准备要发动一场更加“普遍的起义”而“到处招兵买马，操练武艺”。实际上他们的准备工作在1898年3月左右恢复义和拳名称以后就已经开始了。那时他们“传单直、豫、苏，欲与洋教为难”，已经开始了对附近天主教村如魏村等的零星攻击，大名府在4月27日（闰三月初七日）也出现了《揭帖》说：

“各省爱国志士，睹西人无法无天之行，已决于四月十五日，（即1898年6月3日——引者）集合，屠戮西人，焚毁其居。其不与我同心一致者，男盗女娼。闻此告示而不为传播者，亦如之。”

正是在这些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才有10月26日的正式起义。而在起义以后的“到处招兵买马”，才有清平县等地部分大刀会的加入和改称义和拳，以及本来散布在其他各地的义和拳的相继响应。

第二，这次起义公开打出了“顺清灭洋”的旗帜。我们知道，这面旗帜本来是三个月前余栋臣起义的旗帜，由于它的影响遍及全国，义和拳在第一次起义中就沿袭了它的旗帜，只是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才把它改变成为较多主动和积极意义的“扶清灭洋”的旗帜。赵三多、阎书勤等之所以能“同官吏妥协”而打出“顺清灭洋”的旗帜，是由于当地清政府的团练并不与义和拳为敌之故。一个曾经是“赵三多幕中的一人”的郭栋臣的《亲笔回忆》中说：

“（光绪）廿四年（1898年——引者），赵三多争庙起事。天主教要求集齐团布防，以抵赵三多。团总与各村团绅开会讨论，谓赵三多不是反叛，不是土匪，又在山东地方为的争庙，与天主教私斗，与团无干涉，团不能布防齐集先起衅。再者团勇玩义和拳亦不少，恐起内讧。”

这就是说，正如余栋臣起义时的情况一样，“顺清灭洋”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第二次瓜分危机的严重威胁下，一般具有爱国心的清政府地方官兵或团练不愿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人民为敌的结果。

第三，“这些暴动者的标志是头裹手巾，脚穿长靴”，“他们的旗帜是镶有黑边的黄幡”。根据这些标志，我们判断不出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属于哪一个拳会。人们当时主要是利用服饰的颜色去区别拳会的：例如乾字拳会“用黄旗、黄巾蒙头，腰束黄布，腕缠黄巾，踝缠黄布”；坎字拳会“则用红旗，红布蒙头，腰束红布，腕缠红布，踝缠红布”。如果说冠县十八村一

《处于临战状态的赵家庄堂口》（伊索勒神父的日记），见《义和团研究会通讯》，1987年8月第4期，第1页；又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132页；珀塞尔：《义和拳起义背景研究》，第216页。按赵席珍是伊索勒神父的汉名。又据《教务教案档》第六辑所载张汝梅1899年1月16日咨总署文，称赵三多起义为1898年10月26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三，故知引文中的“二十五日”是笔误，应作“二十六日”。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359页。

同上书，第364页。

《山东巡抚张汝梅电报》（1898年5月22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页。

吴宣易节译：《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8页。按吴氏此书系译自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一书。这分《揭帖》是施达格根据直隶献县天主教神父葛弗纳（Père Gouveneur, S.J.）1898年6月15日的一封信中所录而转译成英文的。葛弗纳在信中曾谈到攻击威县魏村附近教民的人“很可能是从前称为‘白莲教’的一派而如今却命名为‘十八魁’的，或即‘大刀会’。”（施达格书，第138—139页）我们知道，阎书勤领导的“十八魁”这时早已加入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因

带是习“坎字拳会”的话，那么在梨园屯首义的义和拳却没有这种红色服饰的标志；如果说他们属于别的拳会，那么上述记载的标志也没有明确指明是什么颜色，我们更无从判断。实际上，参加这次首义的拳民都是农村中的贫苦农民，他们的领导者赵三多就是“赤贫农”，他们的主要目的在起义不在服饰，更不能为服饰而因噎废食。他们只要高举义和拳起义的旗帜，登高一呼，就可以造成星火燎原之势了。

由于赵三多、阎书勤等“打算在新年头一天发动普遍的起义”，所以他们在10月26日“冠县十八魁拳民”聚众起义之后，就率领拳民出去“招兵买马”。他们的行踪是“十三（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冠县红桃园、邱县柳疃聚二三百人；十四（二十八日）在曲周大寨邀人借马，至临清龙上固住宿，聚至四五百人；十六（三十日）仍在龙上固及临清杏叶村等处；十七（三十一日）龙上固一股，聚有三四百人，马四五十匹，现往曲周白果树、辛庄等村”；另一队则仍聚红桃园，约有五六百人。清政府闻讯后急电直隶总督裕禄，山东巡抚张汝梅出兵镇压。这时，直隶广平府拳会首领姚洛奇率众与聚集在红桃园的一队拳民合作，于1898年11月2日，即“十九夜五更在冠县红桃园焚烧教堂及教民房屋百余间，杀死教民二名，殴伤一名”。

“十一月三日星期四，山东省的一个名叫红桃园的堂口遭到袭击、抢劫和焚烧。至少有三名教徒被杀戮。……中午，……只见东南有一大股烟，这是堤三口，罗泽溥神父（Father Lomuller）管理的堂口起火了。……将近下午四点，我（赵席珍——引者）写信告诉官吏：‘今天必须救援。’……将近十一点半，听到号角声，官吏的军队来了”。11月4日，赵三多带队到了沙柳寨西北二里之威县侯未村，与山东盛军马队五营激战，“四人牺牲，姚文起连同二三十人被捕，姚被带到冠县杀害。赵三多率二百多人突围到临清留善固，……决定暂将队伍解放。保存力量，……对大家说：你们暂且回家，耐心等待，只要我死不了，咱们再来第二回，这回我们败之于南，下次我们就要兴胜于北”。此后，“赵三多与部分人沿运河北上，在运河两岸地区和滹沱河流域的武邑、晋州、正定、沧州等地设场练拳，广招徒弟，以图再举”；而阎书勤等则仍在“威县、丘县一带活动”。

在全国人民反对第二次瓜分危机之际，赵三多、阎书勤等发动的义和拳第一次起义为今后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打响了第一炮，意义至为重大。当时的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义和团运动“作俑于冠县之十八魁”，

此施达格所谓的大刀会的《揭帖》实际上是义和拳的《揭帖》。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1期，第155页。按“争庙”即前述之关于梨园屯玉皇庙的护庙斗争一事。

洪寿山：《时事志略》，见《义和团》（一），第90页。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309页。

郭栋臣：《亲笔回忆》，见《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1期，第156页。

林学斌编：《直东剿“匪”电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30页。按当时清方记载，把这次起义称作是“冠县十八魁拳民”起义。

《大名道万培因禀》（1898年11月3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31页。

《万培因又电》（1898年11月10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35页。

《处于临战状态的赵家庄堂口》，见《义和团研究会通讯》第4期，第3页。

宋文瑄、刘绍刚：《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斗争》，见《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1

而“始于二十四年（即1898年——引者）冠县仇教之案”。“义和拳老巢总根，实在冠县十八村”。这次起义声震直隶、山东两省，“赵三多为头领，啸聚数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威大振，风鹤频惊”。义军所过之处，群众云集响应。他们10月26日在梨园屯竖旗起事后并未停留在那里，但附近的赵家庄教堂却始终“处于临战状态”。赵席珍神父的日记表明，在27日义军出发后，“白天令人惊慌的报告相继而来。山东王神父给我写信说：‘两幢房子已经被烧毁’”。他召集教民，“但他们不来。”29日，听说群众的“进攻就要开始了。人们惊惶失措，挖地窖掩藏自己贵重的东西，女人们想逃走”。可见群众自发的斗争的声势也是不小的。至于赵三多本人，在这次起义后又于1899年5月17日在正定大佛寺和朱九斌、刘化龙等人开会筹备再起义，联络冀中、冀南和鲁西北的拳民于1900年5月2日在枣强县卷子镇举行了第二次起义。到1902年3月16日，赵三多还率领余部在巨鹿县厦头寺参加了景廷宾“扫清灭洋”的第三次起义，5月被捕，在南宫县监狱中绝食7日，以身殉国。赵三多的三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对义和团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愧为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英雄。

期，第94页。按姚文起即姚洛奇。

同上文，见《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1期，第98页。

《汇报》，第153号。

劳乃宣：《庚子拳禁义和拳汇录跋》，见《义和团》（四），第486页。

裕禄：《致袁世凯电》（1900年1月9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73页。

《冠县志》（一九三五年修）卷十，《杂录志·纪变》。

第四节 从义和拳到义和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自 1898 年 10 月 26 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直鲁边区冠县梨园屯蒋家庄马场发动首次义和拳武装起义以后，很快就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中国人民反洋教、反侵略、反瓜分的爱国主义运动——义和团运动。我们看到，这中间有一个从义和拳到义和团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说明爱国的拳民群众团体要逐步由非法的秘密民间结社向某种合法的公开的爱国组织转化。在转化过程中，许多白莲教系统的其他名称的秘密结社大都改称为义和团，许多具有反洋教斗争传统的爱国人民也都起来练拳习武救国，欢迎大师兄前来辅导，也成立了义和团。这种转化是在列强准备下手瓜分中国的严重形势下，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之间的矛盾业已成为主要矛盾，而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主要矛盾则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的结果。

义和团这个名称，在赵三多冠县义和拳起义前三个多月，即 1898 年 6 月 30 日，便已经出现在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中。他说要“改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铃束，似于民教两有裨益各等情。禀由藩司张国正、臬司毓贤会洋请奏前来。臣查直隶、山东及江苏、河南各邻近州县，凡有教堂之处，与民人多有积怨。……此次查办义民会，即义和团，名目不同，而情事则一。臣现正檄行各属，办理保甲团防，谨当督饬地方官吏剴切劝谕，严密查禁，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以杜流弊而消乱萌”。这篇奏折首先由于它是最早、或者说是第一次提出了义和团这个名称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次由于其中有“改拳勇为民团”与“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的主张而形成了一种义和团起源于乡团或民团的说法，引起了近年来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的讨论。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所谓“改拳勇为民团”与“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的意思乃是“对‘义和团’这个组织予以取缔，而将其成员（‘拳民’）编入乡团”，即“取缔其组织，收编其成员”。论者认为，改名为义和团“是由义和拳自己改的”。“改名的时间是在冈子李庄之战以后，森罗殿之战以前这几天之内”。也就是说，在 1899 年 10 月 11 日之后，到 10 月 18 日以前的这几天之内。其根据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平原县给毓贤的报告（《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十六—十八页）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史料。这份报告中录有平原县廩生裴秀亭的呈文一件，内有谈到‘上月十四日（即 1899 年 10 月 18 日森罗殿交战之日——引者）官兵与团民在生庄外接仗，团民败北。’……呈文把朱红灯起义队伍称为‘团民’而不是称为‘拳民’，……比较合乎情理的解释是，这时义和拳已改名为义和团”。还有一个根据就是平原县大芝坊一位经历过义和团运动的老人任于军（朱红灯起义时他已有 22 岁）明确地说：“在森罗殿打仗时，就叫义和团了。”“因为各地有义和拳，五百多人，都聚在这里，是一团一团的。”“义和团是同心义和的意思”（《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 年，第 127 页）。“拿这份档案史料与任于军的回忆相印证，我们可以初步定义和拳在森罗殿之战时已改用义和团的名称”。

《处于临战状态的赵家庄营口》，见《义和团研究会通讯》第 4 期，第 1—2 页。

参阅《义和团研究会通讯》，第 2 期（1987 年 2 月），第 1—5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5—16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1898年6月30日的这份奏折表明，当时山东巡抚张汝梅、布政使张国正和按察使毓贤等人的确是向清政府提出了一个改“拳”为“团”的所谓抚的策略，这个策略的意思也的确是要“对‘义和团’这个组织予以取缔，而将其成员（‘拳民’）编入乡团”。所以这时虽说已经出现了义和团这个名称，但起义队伍仍然自称为义和拳，直到1899年10月18日朱红灯领导拳民在山东平原森罗殿起义之战中，却自称为义和团了。从义和拳到义和团的转化过程中，义和拳自己改称义和团这个事实很重要：第一，它宣布了官方所谓的改“拳”为“团”的政策，即“取缔其组织，收编其成员”的政策破产，它是义和拳本身势力壮大的结果。第二，它为义和拳利用官方所谓的改“拳”为“团”的策略来为自己开辟了一条迅速的广阔发展的道路，即利用官方这个“取缔”他们的策略改变成为发展他们的策略。使义和拳在义和团的名义下，不断茁壮成长，减少了前进的阻力，加快了他们的发展速度。这是因为在列强下手瓜分中国，大敌当前的时刻，具有浓厚爱国主义思想的中国人民群众也需要“同官吏妥协”，以便“外御其侮”。这便是所谓“顺清灭洋”和“保清灭洋”旗帜的由来，也是义和拳自己改名为义和团以适应官方抚的策略的由来。“拳”与“团”虽是一字之差，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却是具有原则性的区别的。“向来下层社会中非法秘密结社都是称为‘会’的，而只有地主阶级所组织的的地方武装才称为‘团’。‘义和团’这个名称就是由于官方实行这种抚的策略而取得的。”

从清朝封建统治者方面来看，他们之所以容许义和拳自己改名为义和团，乃是他们对人民爱国斗争无法镇压的结果。比如就毓贤来说，他服官山东多年，1889年署曹州知府，1891年实授，1895年授兖沂曹济道，1896年补山东按察使，1899年3月授山东巡抚。1896年7月，大刀会首领刘士端就是“由毓贤讯明正法”的；可是在8月份，大刀会仍“聚众千余人继续活跃于山东曹州府一带”，“闹天主教堂三十余处”。次年3月，赵三多、阎书勤等又集会梅花拳众在冠县梨园屯“亮拳”比武。在外国教会咄咄逼人的侵略下，毓贤越是镇压，群众反教会侵略的斗争就越是高涨，有时政府的地方武装团练也去参加，形成“刀会、拳会与团练相表里”的现象，使他无从着手。他不是不镇压，而是镇压不了；即便一处被镇压下去，结果是各处风起云涌，使他应接不暇，疲于奔命。拳民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业已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拥众千百，枪械林立”，“官吏熟视之，而莫敢谁何！”在这种情况下，毓贤之所以容许义和拳自己改名为义和团，客观上也是适应于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主要矛盾向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主要矛盾转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毓贤的这种容许，同时也是他遵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

例如1990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1994年由张俊义、王栋所译，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1987年所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书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2—13页。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3—584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页。

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编著：《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4—5页。

《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第302页。

提倡办理保甲团练的结果。自 1898 年 9 月 21 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以来，25 日即下令各直省将军督抚“加意练团”，26 日即宣布被囚禁的光绪皇帝有病，“调治日久，尚无大效”，准备加以废黜。但是驻京各国公使却“经常不断地询问皇帝的健康和平安，并且敏感地提出各国公使是派给皇帝而不是派给任何篡位继承者的”，他们蓄意要干涉慈禧的行动。马士认为，这是“各国公使已经变成强迫他人接受的”问题了。在第二次瓜分危机的形势下，帝国主义列强的公使们早就已经强迫清政府接受了他们各项让与权的要求，慈禧不是不知道，但是，她没有想到，在清朝皇室的内部事务上，也得听他们的，各国公使果真是变成名符其实的太上皇了。她声称光绪病重，又不敢抗拒各国公使“请以法医入视病”的要求。法国医生多德福（Dr. Dethève, Claudius）入视后，“出语人曰：‘血脈皆治，无病也。’太后闻之，不悦”。同年 11 月 1 日，董福祥所部甘军全部调集北京南苑；5 日谕令“自直隶、奉天、山东、山西为始”，办理“保甲团练”，“久之民尽知兵，自足为缓急之恃”。这本是张汝梅、毓贤等人过去的主张，如今又让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也就不是把这个谕令“视为老生常谈，将来以一奏塞责”，而是所谓“亟图保卫闾阎之计”了。

自义和拳自己改名为义和团以后，许多爱国的民间秘密结社都改称为义和团，使义和拳的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时白莲教的许多支派、各地团练都纷纷打起了义和团的旗帜，壮大了爱国群众的队伍。特别是 1899 年 3 月，德军在沂州府日照县焚烧两个村庄，又在兰山县（今临沂）焚毁韩家村民房 300 余间；5 月，德军打死反对修筑铁路的高密县群众 9 人，英军打死反对威海卫划界立石的荣成县群众 16 人等等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残暴罪行，更使得广大的爱国人民纷纷加入义和团的队伍，藉以自救和救国，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代表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自鸦片战争以后“六十年来增长的愤怒和仇恨，由于长期的压迫而更加激烈，它获得亿万没有卷入运动的中国人的衷心的同情。毫无疑问，义和团运动代表了他们一种爱国的努力，是要把他们的国家从外来侵略和可能发生的瓜分中拯救出来”。

另一方面，义和拳虽说自己改名为义和团，但事实上仍然保持了他们在反帝爱国斗争中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他们“因以习拳为入教正课，故彼中自称为义和拳”。有一次，“那桐、许景澄两侍郎，出都行至丰台”，准备去天津求和，被拳民捕获，“二公再四申说，皆不听；曰：‘吾团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有人甚至认为：“民权之说，吾于义和团见之矣”。“团以神自命，与王公论师弟兄”；“自由自主”，“是非民权而何？”从这些事实看，他们并没有像张汝梅和毓贤等人所设想的那样，在改“拳”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45 页。

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书后》，见《义和团》（四），第 451 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202 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第 150 页。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一），第 11 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246 页。

何天爵：《中国之过去与将来》，第 33—34 页。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 196 页。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 374 页。又如在四川“搜集到的档案史料中”，就只有“义和拳”，至今“还没有发现‘义和团’名称”（《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编辑说明》第 2

为“团”后，就易于受封建统治者的“钤束”。因为他们是自改，而不是清政府“取缔”、“收编”的结果。

页)。可见就在义和团运动中，他们也大多是“自称为义和拳”的。

第六章 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形势。自 1898 年 10 月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冠县梨园屯领导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以后，中国人民于 1898 年底到 1899 年初可以说是基本上渡过了第二次瓜分危机，但却面临着紧跟而来的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

第二次瓜分危机是严重的。其所以严重，就在于列强通过沿海港湾的占领和势力范围的划分，业已初步完成了瓜分中国的主要的准备工作。按照他们瓜分非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实例来看，剩下的就是授与该国或跨国企业家的垄断同盟、辛迪加等以统治权，或者干脆径直宣布其势力范围作为他们的保护国或殖民地这样一个最后步骤了。我们说中国人民渡过了第二次瓜分危机，指的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在 1898 年没有宣布他们这个最后的步骤。

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宣布他们这项最后步骤的原因，基本上有两个：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民面向第二次瓜分危机所展开的各种斗争，使他们感到可虑，举棋不定；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之间在瓜分中国问题上所发生的矛盾，特别是英美集团和俄法集团之间矛盾，剑拔弩张，一时还难以解决。

中国人民面向第二次瓜分危机所展开的各种斗争，重要的我们在上面都谈到了，需要补充的是在这种危机下造成的全国性的动荡不安。“在一八九八年的春夏两季，海南岛、沙市、松浦和扬州各地都发生了排外暴动。在湖北，当地教民有大批被屠杀的危险。在那一年春季，广西有一位法国教士被杀害；夏季叛乱爆发，用兵五年才平定下去。戊戌政变之后，十月二十五日广州发生了一次排外骚动。十一月间在贵州有一个英国教士被杀害”。在一份广州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篇表达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的义愤的文章；其中说道：

“外国全是贪婪无厌的，并且准备瓜分中国：俄国攫去了旅顺口和大连湾，并且在满洲驻军二万五千人；英国实际上占有了包括有七省之多的扬子江流域；德国夺取了胶州并且要求山东全省作为她的势力范围，同时又向河南伸张；法国占据了广州湾，但是她的隐蔽而确定的计划是要全部占有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日本得到了台湾，现在又向福建伸手；中国必须提高警惕，必须改造革新，必须提防进攻。”

对于这种情况，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是没有看到，也不是不感到可虑。正如在让与权争夺战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于 1898 年 10 月 24 日致函其亲信马士（H. B. Morse）说道：“当前的时势是太难于应付的了，甚至在我们最熟悉的方面，我们也不可能放胆去干，无论在什么地方，警惕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和对眼前的事情多加小心都是必要的。”同年 9 月 30 日到达香港、在中国考察了 3 个多月的英国海军少将、议员贝思福（Rear-Admiral Charles Beresford）在其《观察报告》中说，英商在华投资的安全是使人担心的，“这种现存的不安全感是由于清政府的衰弱、腐败和贫穷；也由于遍及全国的、连续不断的暴动、骚扰和叛乱”。“在四万万人口中的

《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 135 页。

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128、131、132 页。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 453—454 页。按引文中所指法国传教士为苏安宁（Mathieu Bertholet），英国传教士为傅勤敏（Mr. Fleming），广西夏季“叛乱”指李立亭、洪振年等所领导的会党起义。

一次人民革命的可怕前景，行将囊括像欧洲一样大小的地区，仅靠沿海稀疏一线的欧洲文明和一些战舰对这样的灾难很少会有什么效果，或者说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尽管如此，帝国主义者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谬论，他们无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战斗力，坚持瓜分中国。他们说：

“长期以来，中国就已经处于一个进退维谷的境遇中，束手无策。一方面有国内革命的可能，一方面有外强瓜分的危险。……假如瓜分的问题一时不易得到解决的方法；那么，叛乱的余烬将因此而迅速被煽成炽烈可怕的火焰。……果然如此，必不免大量的无辜生命与商业利益的牺牲。上面所说的这一事实的可能性是不应低估的，而其可怕的结果也不能忽视。如果把瓜分与叛乱两样摆在中国人面前，让他们选择，无疑地将异口同声选择前者；因为他们虽则不免对外国人恨恶，但这种恨恶的情绪，每每能因尊敬外国人的公道与人道而缓和。一切的平民都将欢迎外国的统治。……

“总之，帝国之谜仍然是无法解释的。……没有任何先知能有透视现局之谜的本领，也没有任何人能预测舞台上的下一出将搬演些甚么。但仍然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存在，而且每次在中国试用时都曾得到过成功，那就是武力的展示。哥第乌斯之结（Gordian Knot）不是无人能解吗？但在宝剑之前便迎刃而断了。……任何一个单独国家的决心干涉都是中国无法应付的。……究竟第一个打开这僵局的国家是哪一个？三年前一个很愉快的任务，曾经落在日本身上，就是把世界对于中国可能战斗力的错觉给纠正过来了。

难道这一次的工作又要留给日本吗？若果如此，那将是我们西方国家的一大耻辱。”

这是一篇帝国主义的典型言论。它主张通过“宝剑”即军事力量来解决瓜分中国这个难题。它对中国人民的反瓜分斗争极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能事，胡说中国“一切的平民都将欢迎外国的统治”。奇谈怪论，匪夷所思！实际上，帝国主义者也是“不能忽视”“其可怕的结果”的。与此同时，它也反映出列强之间的重重矛盾，勾心斗角，“究竟第一个打开这僵局的国家是哪一个”呢？

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就力图强化他们在华的侵略势力，一面彼此斗争，一面又互相协商，以谋求解决他们在瓜分中国问题上所产生的矛盾。不论是通过协议，还是通过战争，矛盾到最后总是要解决的。列强之间矛盾解决之日，也就是中国面临瓜分之时；因此，我们说第二次瓜分危机是严重的，但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却更加严重，因为它是列强要把瓜分罪行付诸实践的最后一回了。

“在一八九九年，欧洲的一致看法不管怎么说都是，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实体马上就会消失而被瓜分被宰割了。那时候，每件事情都指向瓜分：其原因一半由于中国尚未表现出任何抵抗外国侵略的决心，另一半则由于欧洲的要求总是相对地那么易于实现”。那时，对中国“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政府都在商量这个即将来临的瓜分问题，并且对其敌手的要求力图达到一个满意的调整”。因此，“在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〇年上半年中，在欧洲消息灵

《北华捷报》1899年12月4日的（译文），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3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57页。

贝思福：《中国的瓦解》，1899年英文版，第437页。

刘启戈译：《北京之谜》，《字林西报周刊》（即《北华捷报》，1898年10月6日），见《戊戌变法》（三），第489—491页。按引文中的“叛乱”，主要是指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一部分为虎作伥的叛国教民自然会选择瓜分，因此，引文中所谓的“中国人”或“平民”，指的就是这种教民。

通人士中间曾经有过一种广泛流传的信念，那就是中国最后的正式瓜分即将来临”。

这就是中国人民在 1899 年所面临的在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中的一般情景。

第一节 英德铁路范围协定（1898年9月）

英、德铁路范围协定是两国金融资本家关于在华修筑从天津到镇江的铁路的协议，它在实际上代表了英、德两国政府分别对他们在华势力范围的确定。

先是，早年留学美国的江苏补用道容闳于1898年2月11日，从清政府那里取得了“筹借洋款”，“设立公司”修筑津镇铁路的权利。8月23日，容闳和“一个英美辛迪加（Anglo-American Syndicate）签订了一个五百五十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准备筑路。德国驻华公使海靖（Herr von Heyking）向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提出：“容闳不应借英美款造镇津路”。津镇铁路要经过山东地面，德国认为山东是他的势力范围，“山东造路之权，为德人所专有，无论何人，不能在山东另造铁路”。海靖向总理衙门要求把津镇铁路让与德华银行建造。

另一方面，在1897年卢汉铁路让与权的争夺战中，英国不甘心于他在同法比金融集团斗争中的失败而向清政府要求补偿。1898年8月17日，英政府“授权”驻华公使窦纳乐，对于津镇等五条铁路的承筑权“除非他们立即同意，我们就将认为他们关于卢汉铁路事的背信是故意敌视我国的一种行动，而且我们将采取相应的行动。你在和舰队司令磋商之后，可以发出限定他们答复的日子的通牒。耽搁的时间是不能太长的”。8月21日，窦纳乐向总署书面提出五路承筑权的一揽子计划，即：

- “一、由天津至镇江一条（此路如德、美等公司愿行会办，亦可。……）
- “二、由河南、山西两省至长江一条（此条乃使福公司矿产按照合同得一通河口捷径。）
- “三、由九龙至广州府一条（此条乃怡和洋行与盛大臣所议者。）
- “四、由浦口至信阳一条（此路乃推广沪宁铁路。）
- “五、由苏州至杭州或展至宁波府一条（以上两条皆系怡和与盛大臣所议未入草合同之内。）”

窦纳乐在舰队司令的军事支持下所提出的五路要求，除津镇路与德国有关尚须“另议”外，其余的清政府都一概照允。

为什么津镇铁路需要“另议”呢？原因是这条铁路事关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问题。德国在山东的和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虽说经清政府以条约或声明的形式正式承认过，但在列强之间尚缺乏正式文件的正式相互承认。如果津镇路由英国单独修筑，那就意味着对山东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否认。德方“声明不能主张扬子江流域向北延伸直到天津，德国不能同意我们的势力范围这样的扩大”。英国代理外交大臣巴尔福（Balfour, Arthur James）于1898年8月30日回答其驻德大使拉塞尔斯（Lascelles, Sir Frank C.）说：英国“从未表示过天津属于扬子江流域；至于其他方面，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79页。

珀塞尔：《义和拳起义背景研究》，第97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040页。

甘博士《中国铁路企业之起源和发展》，第148页。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三，第14页。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41页。

英国承认德国完全享有最惠国待遇的权利”。同一天,巴尔福致电窦纳乐说:“我认为解决津镇铁路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由英、德两国辛迪加共同建筑该线。如果德国希望特别规定通过山东省的部分将由德国资本建筑,而其余的归英国建筑,在我看来,只要对行车权力和全线运费率作出明白的规定,这就无须强烈反对。……英、德两国辛迪加的代表即将在伦敦会议,我希望他们将达成如上所述的一些协议。”

1898年9月2日,英、德两国的辛迪加在两国政府相互承认彼此势力范围的基础上于伦敦达成了关于津镇铁路的协议。参加这一协议的是德国辛迪加(The German Syndicate)代表汉西曼(M.A.vonHansemann)、英国银公司(The British and Chinese Corporation)代表克锡(W.Keswick)和汇丰银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代表嘉谟伦(Ewen Cameron)与布罗赛(Julius Brussel)四人。双方辛迪加确定了各自掠夺铁路让与权的范围:

“(一)英国的利益范围是:扬子江流域,但山东铁路得在镇江与扬子江联接;扬子江以南各省;山西省以及自山西联接卢汉线上正定以南某处和穿过黄河流域联接扬子江流域的铁路。

“(二)德国的利益范围是:山东省和黄河流域并接至天津和正定,或卢汉线上其他地点和在南方在镇江或南京联接扬子江的铁路。关于黄河流域,经谅解属于英国利益范围的组成部分只限于联接山西省内的铁路,以及通到扬子江流域的铁路。

“又及——无论何处,‘流域’一词的英语‘valley’即德语的‘Flussgebiet’,其含义是流入扬子江或黄河的一些河流所经过的区域。”

这样规定了山东是德国的范围和扬子江流域是英国的范围以后;那么,津镇路“自天津至济南或至山东省北界另一地点”的那段路就必须由“德国公司的联合组织修筑、供给器材和经营”;“自山东省南部某地至镇江”的那段路就必须由“英国公司的联合组织修筑、供给器材和经营”。铁路资本由英、德“双方共同征集”,竣工以后也由“双方共同经营”,并由“两国政府”“相互支持彼此的利益”。

英德协定于9月2日签字后,10日两国公使照会总署,由英、德二国辛迪加共同建筑津镇路。德使海靖威胁总署说:“‘德商请办津镇路,出自国家之意。如果不允,中德交谊就此中止’。语甚决绝”。清政府只好派许景澄接管督办铁路,以张翼为帮办,于1899年5月18日与“德华银行及汇丰银行以及汇丰所约之怡和洋行代中英公司定立草合同。”借款“约英金七百四十万镑”,九扣,年息五厘。“借款以五十年为期”;“此借款未还清之际,所有造路、行车事宜,均由德华银行及中英公司代为经理”;“凡铁

《英国蓝皮书·中国》,1899年第1号,第192页,转引自《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432—433页。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433—434页。按福公司(The Peking Syndicate)在名义上由英国与意大利合办,实际上“它的资本却是英国的”(见《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355页),但以一个意大利人陆泽溪(Luzatti, Anglo)作为该公司的董事长。

《英国蓝皮书·中国》,1899年第1号,第211页,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62—363页。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396页。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1卷,第267页。

路上紧要之员司，必须用练达之洋人。”此合同“遇有文辞可疑之处，以英文为准”。

英德两国金融资本家关于在华铁路利益范围的协定实质上是两国政府关于在华势力范围的协定。“虽然这个协定不是政府的协定，只是私人银行之间的协定；可是，就其实际的作用来说，它是一个有效的协定。这个协定不仅将消除两国政府间冲突的原因，并且还将促进德英两国企业家的活动”。按一般惯例，“各国铁路，造不造皆由自主，今则互相争造，不仅在路利，而在路权”。铁路所经之处，即列强势力范围所到之区。所以在这个协定签字以后，“就英德两国而论，势力范围政策从此就支配着它们在华相互之间的态度。由于这个协定，英国利益集团确认德国利益集团在山东企业的地位不仅是优先的，并且也是独占的。另一方面，英国在实现它保持中国全境开放通商以及保留它的特殊贸易中心扬子江作为一个独占的英国企业范围的野心方面也前进了一步。这是英德协定的条款所保证了的”。列强“各争地势”，“路权尽属他人，即以占路为裂地之媒”。事情已经很明显，建筑铁路、势力范围与裂地瓜分，在当时中国所处的情况下，乃是三位一体的了。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列强的“铁路征服政策”。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1卷，第266—267页。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三、第16页。

《津镇铁路草合同》，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898—903页。按“中英公司”即“英国银公司”。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65页。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三，第15页。

第二节 美国夺取粤汉路权和英美协定（1899年2月）

早在1896年4月，华美启兴公司的代表美人柏许曾向清政府要求承筑由北京经汉口直达广州的铁路干线。同年年底到1897年初，公司董事华士宾又向清政府活动修筑卢汉铁路，结果都没有达到目的。于时湘、鄂、粤三省绅商倡议集股兴建粤汉铁路，公举黄遵宪为总办，呈请创立湘粤铁路公司。但张之洞、盛宣怀等却利用各种借口加以反对。1898年1月中旬他们会奏设立粤汉铁路公司，密筹向美借款说：“臣宣怀前拟卢汉铁路借用美债，嗣以美商华士宾来华，多方要挟，议遂中辍；不得已而谋诸比利时国，……委曲迁就，事甚勉强。则粤汉借款，断宜另谋。至英及法、德，无论何国承办，皆有大害。拟函商驻美使臣伍廷芳，就近仍与美国绅商筹议借款。”3月17日盛宣怀重申“粤路非美莫属”，借款机会“稍纵即逝”。4月14日，由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美华合兴公司在华盛顿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规定借款400万镑，年息五厘，九扣，“另给余利五分之一”，即“除支给薪工及各项经费及借款利息外，铁路所得余利，以五分之一（即每百分之二十分）归美华公司”。借款“以五十年为期”，以铁路财产作保，借款期内铁路由公司建筑、经营，“美华公司有添建短支路之权，接连要处，以招运载”。此外还有两个附件：一是准备兼并卢汉铁路，企图利用清政府与法比辛迪加的谈判陷入僵局，如所订卢汉铁路借款合同“作废”的话，“当准美华合兴公司建造，公司允借英金五百万镑，若须添增，亦可多借”。一是“铁路附近地方开采煤矿，当即允准美华合兴公司勘查开办，该公司并允筹划本合同所需之款”。根据1898年4月14日的合同来看，美国金融资本家对铁路让与权和矿山让与权是抱有极大野心的。

这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我国索取沿海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之际，但“美国还没有表现出领土野心”。因此，有人认为，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去“寻求美国资本家的支援自然是有坚强的理由的”。事实是，美国不是没有这样的野心，而是在1898年4月21日爆发了美国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美、西战争的爆发和结果是美帝国主义对菲律宾群岛的占领，占领菲律宾则是“通往亚洲和中国的一步”。“美国是紧跟着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占领中国领土之后而占领菲律宾群岛的，两者在意义上实质相同”。“美国领事福勒（Fowler）把在菲律宾群岛升起美国星条旗一事和德国占领胶州，俄国租借旅大，英国夺取威海卫和法国夺取广州湾相提并论”。这是因为，菲律宾的“马尼拉就等于美国的香港，也等于美国在中国沿海的租借港口，美国在远东的贸易和利益要是没有它，纵然在一八九八年夏季幸免于一时，将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64页。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三，第17页。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498页。

同上书，第499页。

按“美华合兴公司”即“华美启兴公司”。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第499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47页。

同上书，第747—749页。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418页。

来也必会陷入严重的困难的”。因此，所谓“美国还没有表现出领土野心”之说是符合事实的，它的侵略野心在当时中国爱国人民的心目中是明显的：1898年7月的《东亚时局形势图》及其《题词》中的“饥鹰”代表的就是美国，它正在振翅向中国大陆飞来。“美之构难于菲律宾也，实美经略亚洲之第一着”；“我卧榻之侧，又增一虎矣”。

在美、西战争中，英国在事实上支持了美国。当时，德国对菲律宾群岛也有野心。1898年5月初，德国政府派了两艘军舰到马尼拉。6月，侵占我国胶州湾的德国海军中将棣德利希斯又率领其他军舰驶往马尼拉。7月，美德矛盾加剧，美国总统麦金雷(Mckinley, William)电告在古巴水面上的海军指挥官说：“不要让任何一只船冒险；对德国的战争迫在眉睫。”8月6日，德国驻英大使哈兹费尔德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提出由各大国列强来使菲律宾中立化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同意。8月13日，当美国舰队在地面部队配合下进攻马尼拉之际，英国海军上将奇切斯特(Admiral Chichester)“把英国兵船‘不朽号’(H.M.S. Immortalité)移动到介乎美国舰队和欧洲列强船舶间的一个地点。在收到城市已向美国人投降的通知之后，向美国旗致敬的，只有英国船舶”。

为什么英国会在美、西战争中支持美国呢？这是中国人民面临第二次瓜分危机中的帝国主义列强在华斗争的形势所决定的。英国本来认为它在中国的权益是具有垄断地位的。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之后，这三个国家在华的侵略势力有巨大发展，对英国的侵略势力造成了威胁。同时在瓜分整个世界的斗争中，英国在南非对德关系紧张，在尼罗河上游和埃及问题上对法关系也尖锐，在近东同俄国也有摩擦，看来它的所谓“光荣孤立”政策是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时，英国外交主要是想联合德、美去对抗俄、法同盟。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1898年3月与德使哈茨费尔德谈判时曾建议缔结英德同盟，缓和英德之间的矛盾。5月，英国以不损害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侵占了威海卫。9月又签订两国在华铁路范围的协定。但是，它同德国结盟的尝试没有取得成功，不得不转而竭力争取美国对它的支持。这就是英国在美、西战争中偏袒美国的原因。1898年4月，美国夺取了粤汉路权。这条铁路基本上算是在英国势力范围之内，它自然是不甘心的。不过，它既然在战争中支持了美国，张伯伦又在同年11月16日的讲话中声称了“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的人民的联合是不怕其他同盟”的问题。这个讲话在美国总统麦金雷的12月5日向国会提出的年度咨文中所说的“美国对中华帝国发生的非常事件并不是一个漠不关心者”的词句中得到了积极的答复。这就为英、美帝国主义合作侵略中国提供了政治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英美两国金融资本家同意瓜分他们在华的权益；他们在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第212页。

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113页。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26页。

《论美菲英杜之战事关系于中国》，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四册。

爱卡德斯太因：《政治事件回忆录》，第312页，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76页。按爱卡德斯太因(Eckardstein, Baron von)系当时德国驻英使馆一等秘书。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23—524页。

1898年12月达成协议，1899年2月1日签订了中英公司和美华合兴公司之间的正式协定的备忘录，其中说道：

“由于英美两国政府联合保证对他们各自的臣民和公民的权利的保护，这种权利是他们至今在外国进行投资所依赖的，所以两国政府对于这种企业的保护将提供有效的力量。如果为在华经营事业的他们各自的臣民和公民的合作与共同行动作出安排，特别是由于中英公司和美华合兴公司的共同行动，他们两国政府的这种联合行动将有所促进。……

“缔约一方今后在中华帝国获得在任何事业中的利益之后，将在获得这项利益后适当的时期内提供他方分享它自己利益的一半，接到分享利益的对方在适当的时期内对此接受或拒绝，具有选择权，但没有必须接受分享利益的义务。任何这种提议如果在适当的时期内未被接受，就被认为是被拒绝了。……

“……本文件的意图是，在可行和可能的范围内，缔约双方对一方或双方在中华帝国所获得或经营的一切企业将联合一致行动，不论双方是否都参与了这项企业。”

正如1898年9月的英德铁路范围协定一样，1899年2月的英美协定，名义上是两国金融资本家的辛迪加或公司之间的协定，实质上则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协定，用以协调瓜分中国的步调。根据英美协定，双方各自给与双方分享美国的粤汉铁路让与权和英国的广九铁路让与权，但英国早已取得的沪宁、苏杭甬、山海关外等铁路的让与权不在其中。自此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过程中，基本上英美集团与俄法集团的对立就正式形成了。

1899年3月，美华合兴公司的代表坎理（Cary）来中国议订正约，它的总工程师柏生士（Parsons, W.B.）在1888年早已对粤汉路进行了测量勘绘。坎理来华后，“所求权利大过卢汉”，“骄狠更甚”。美使康格（Conger, E.H.）扬言粤汉铁路“美国国家必办，断不能让他人”。最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于1900年7月13日在华盛顿签字，把借款增至美国金洋4000万元，并以明确规定建筑支线等来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路权。

伦敦《泰晤士报》，（1898年11月17日，第10板，D栏），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81页。

《美国外交文件》（1898年），第73页，转引自同上书，第381页。

《英国蓝皮书·中国》1899年第1号，第325页，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82—383页。

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四，第18、25页。

第三节 清政府被迫授予外国传教士官衔（1899年3月）

1899年3月15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四日），清政府被迫授予外国传教士官衔，正式确定了他们多年来在中国的事实上的统治者的身份。当天，“帝国颁布了一道上谕，授予传教士以官员的地位。主教与总督及巡抚列为同等，并且得以平等地位拜访和写信给他们；副主教和主持牧师与司道（藩台、臬台、道台）为同等；一般的传教士与府、县为同等”。这道上谕就是所谓的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议定”并在15日公布后于“一八九九年三月十六日奏请批准”的《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其中是这样说的：

“分别教中品秩，如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相同，应准其请见总督、巡抚。倘主教因事回国，或因病出缺，护理主教印务之司铎，亦准其请见督抚。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请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请见府、厅、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要照品秩以礼相答。”

这个所谓的《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实际上是“把官员的地位让与给天主教传教士”。根据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中关于最惠国条款（the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一体均沾”的规定，这项让与权既然让给了天主教传教士，同时也就是让给了所有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外国传教士。这道上谕虽说“在字面上仅仅是针对天主教各差会而言，但其他教派的差会自然也被给予了同等的特权”。

为什么我们说这项让与权的取得是正式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多年来事实上的统治者身份呢？

首先，条款虽以“接待教士事宜”为名，但要害却不在于“接待”规格，而在于授予官衔，确定“品秩”，即让与他们以官员的地位。对传教士的接待问题，早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解决，要等到快40年后才来规定条款进行处理，那不是马后炮吗？1861年，法国贵州天主教主教胡缚理（Louis Faurie）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为了显示“威严”，就“乘紫呢大轿，侍从多人，游行街市”。1862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罗安当（Antoine Anot）初到南昌，“自抚军以下，皆按平行礼接待”；第二次再去南昌时，江西巡抚毓科“传谕升炮开中门，如督、抚相见之仪”。当时所谓的各国传教士，动辄就与各省大吏相抗衡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要各省大吏首先用平行的礼仪去接待他们，显示外国侵略者的威风。

其次，侵略中国的外国教会对其所在地区的统治事实上早已存在，但外国传教士却没有官员的地位，它迫切需要在酝酿第三次瓜分危机之际由清政

同上书，第27页。

参阅《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954—965页。

《英国蓝皮书·中国》，1900年第1号，第141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0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863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862—863页。按“司铎”指一般传教士，“摄位司铎”指副主教，“大司铎”指主持牧师。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56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6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0—161页。

府来正式肯定和授予。外国教会对其所在地区的统治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之上的。不平等条约之所以不平等，基本上在于中国丧失了主权；在主权的范围内是不存在真空地带的。谁丧失了主权，取得者即拥有主权；谁在某一范围内拥有主权，谁就成为该范围内的实际统治者。于时，传教士不仅全“都拥有治外法特权而不受中国的管辖”，并且还拥有清政府“由于战争与和谈而已经丧失了了的征税权和行政权”，即所谓的教堂收税权与主教发卖执照等等权利。“山东州县，西南乡教堂教士向商贾收税，苛虐异常”。“福建有主教者，鬻卖执照，每张洋银二十四元。良民有此，始免教士凌虐；奸民有此，即可横行乡里”。此外，外国教会还在其所在地区霸占大量土地，“例如内蒙古地区一八七七年占地二十四顷的大教堂到一八八七年竟然扩占到一万顷，耶稣会在江南肥腴之地霸占有二百万亩土地，北京城内从西单到宣武门内外有一百三十余家店铺成为天主教堂的房产”。传教士在取得这些地产和房产以后，便用非常苛刻的条件把它们出租给农民和住户；“其结果，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农民的眼里很快变成和中国封建主一模一样”，教堂也名符其实的成为地主堂，成为当地的权力中心，成为在列强“保护之下广泛散布在中国各地的独立王国”。不过，传教士此时虽有统治者的实权，却没有统治者的身份，而这个官员身份在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中却是迫切需要的；其所以迫切需要，有两点理由：一是便于名正言顺地去伙同清朝封建统治者去镇压当时各地反对教会侵略和列强瓜分中国的人民起义，二是准备着中国一旦被瓜分，被宣布为列强殖民地之际，具有官衔的传教士当可“弹冠相庆”，顺理成章地就任各该国的殖民地总督、巡抚或府、厅、州、县的官员了。因此，这个上谕就不无理由地被看作是“天主教僧侣统治集团的政治阴谋成功的结果了”。

再次，是在正式确定外国传教士事实上的统治者身份以后，“拥有官阶就会巨大地增强他们的权力”。这时的教堂就不仅只是地主堂，同时也成为名符其实的衙门了。不过，在传教士拥有官衔以后，是否就能取代督、抚、司、道、府、厅、州、县等地方官的实职呢？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对“实职”一词作什么样的解释。如果说他们的实职为征收上交清政府的钱粮，按照儒家经典对人民进行教育，并组织秀才、举人等的考试的话，那么以建立基督教殖民制度的统治为目标的外国传教士，即便清政府授予官衔，他们也是不会去作的，其中有些甚至是他们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大肆破坏和反对的。如果说这些地方官的实职为掌握关防印信、保举或罢免下属官员，审处民、教之间的各种民、刑案件，以及利用政权机构如堤塘官驿等来递送文件等的话，那么这些实职，实际上在没有明令授予官衔之前，他们就早已越俎代庖地去作了。在明令授予他们官衔之后，他们就更加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取代这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十二卷，第40页。

江上蹇叟：《中西纪事》卷二十一，第3—4页。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476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5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3929页。

张寄谦：《中国通史讲稿》（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

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86页。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279页。

些地方官的实职了。一句话，外国传教士所取代的地方官的实职，不是为清政府服务，而是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权利服务的。

从上述各方面看来，外国传教士取得官员地位这项让与权，无论是从教会本身的“基督教占领中国”即所谓的“中华归主”来说，还是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所运用的“教会政治”来说，都是一个决定性的步骤。虽说这项让与权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而没有收到它所预期的效果，但它的严重性是不能忽视的。什么是它的预期效果？它的预期效果就是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领土的瓜分而建立起相应的“基督教殖民制度”。列强瓜分中国是有赖于他们的“基督教殖民制度”的建立的。换句话说，它是他们瓜分中国、建立殖民地统治的基础。这当然不是什么接待规格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权力统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就命令其驻华使节通知清政府说：“就英国国籍的主教和传教士而论，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允许他们的事务受到英国政府以外的任何其它政府的官员们的干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英国传教士不能受具有督、抚、司、道官衔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的统治，虽说英国传教士也可取得这些官衔。显然，这件事已经引起了列强之间在华的权力磨擦。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79 页。

卜舛济：《中国的暴动及其原因》，1900 年英文版，第 110 页。

第四节 英俄铁路范围协定（1899年4月）

英俄铁路范围协定同半年多以前的英德铁路范围协定一样，实际上代表了英俄两国政府分别对他们在华势力范围的互相承认。

我们知道，沙俄在1897年12月15日强占旅顺口以后，1898年1月25日，英首相索尔兹伯里提出了同俄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建议。双方谈判结果是：英国承认俄国占领旅大，并迫使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则放弃对华借款，使《英德续借款合同》得以签订。3月，英俄谈判中止。1898年6月7日，汇丰银行熙礼尔代表英国辛迪加为了取得贷予清政府一笔借款的权利，同顺天府尹胡燏棻开始谈判《关内外铁路借款草合同》，并准备签字。《合同》规定借款“一千六百万两，用以建造中后所至新民厅铁路及营口支路之用”；借款以关内外铁路“所有车辆，一切产业，以及脚价进款，并新路沿线所留煤铁矿开采权（其距离待定），均作为此次借款之保”；并继续委派英人金达（C.W. Kinder）为关内外铁路总工程师。同日，俄国驻华代办巴布罗福对这个合同提出强硬抗议，认为违背了上月即5月7日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中第三款，该款允俄国将西伯利亚铁路建至旅大，而“此支路经过地方，不将铁路利益让与别国人”。现在关内外铁路建至新民厅，离沈阳距离不远；因此，他认为这合同违反了上述续约。实际上，该约第三款还有最后一句是“至中国以后自造路从山海关接长至此支路最近之地，俄国允不干预”。所以胡燏棻说明此路与俄国政府的活动范围无关，“他还忆及旅顺租借后巴布罗福同他的一次会晤中所作的明确的诺言，即展筑到牛庄的铁路，不论雇用哪国人或向何处借款筑路，均与俄国无关”。于是，《关内外铁路借款草合同》“在六月十五日由胡燏棻签字”。

草合同签字以后，巴布罗福继续反对，于7月12日提出关内外铁路不得作为借款抵押。1898年7月13日索尔兹伯里电告驻华英使窦纳乐说：“看来让与权争夺战进行得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如果大批的中国铁路一旦修筑起来，都会落入外国手中，这是我们必须应付的一种可能。这种情况的一个害处是不来向我国订购器材，我们对此毫无办法。另一害处则是，铁路经营者可以通过差别运费和特权来窒息我们的贸易。我们应该坚持在各种‘让与权’中要对平等待遇作出适当规定，借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7月22日索尔兹伯里又电告窦纳乐说：“女王陛下政府将支持中国反对任何一个因其让与英国臣民修筑或援助任何铁路或类似的公共工程而对中采取侵略行动的强国。”24日，窦纳乐偕翻译甘伯乐（Campbell, C.W.）到总理衙门声称：“如借英款修路，无论何国与中国有征战之事，英国必愿相助。”又说：“修铁路事，若交英国人办理，后来不论有何国向贵署争论，英国均有

参阅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的二、三小节有关部分。

《英国蓝皮书·中国》1899年第1号，第149、323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0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67页。按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津榆铁路已展“筑至山海关外四十英里的中后所，但尚未正式通车。”（见甘博士：《中国铁路之起源和发展》，第43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55页。

甘博士：《中国铁路之起源和发展》，第53—54页。按《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的签字日期，一般均作1898年6月7日，实际上，中国代表以俄国抗议之故，一直拖延到6月15日才签字的。

办法。”8月6日，清政府屈服于俄国压力，通知英国不能履行草合同的条款。8月8日，索尔兹伯里又致电窦纳乐说：“今天下午我接见了中国公使（即罗丰祿——引者），我告诉他，俄国没有任何权利来抗议汇丰银行贷与牛庄铁路的抵押借款，我坚决建议中国将俄国政府的抗议置之不理。”

在关内外铁路借款问题上所反映出来的英俄之间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谈判最后由北京移到了伦敦和圣彼得堡。8月12日，在伦敦开始了英俄谈判。巴尔福同俄驻英代办雷萨尔（Lessar P.M.）讨论了关内外铁路让与权的问题；雷萨尔说：“他希望可以就牛庄铁路达成一项协议，如果为了换取‘英国方面’对于这条铁路作为抵押及其将来的管理问题的让与权”，俄、英两国缔结一项协定，“据此英国决不参与满洲的铁路或矿山的让与权，俄国方面对于更富庶的和人口更稠密的扬子江地区的铁路或矿山的让与权，也决不参与”。这就是说，英、俄两国要在满洲和扬子江流域之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关于这点，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也在圣彼得堡同驻俄英使斯科特（Scott, Sir Charles）进行了讨论。9月，英俄双方达成妥协：俄国不反对一家英国银行参与关外铁路的借款，英国则同意山海关至牛庄的铁路仍应是中国铁路，不得抵押给任何一家非中国的公司。1898年10月10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在这个妥协的基础上，由胡燏棻代表清政府、熙礼尔代表中英公司正式签订了《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规定借款“二百三十万镑”，“按九扣付与铁路局”，“常年付息五厘”，“以四十五年为期”；“在借款期内，总工程师应用英人”；“此借款本息，均由中国国家作保”；“此办法与他合同不同之处，在于督办大臣极思将此借款本息按期付还，始终照常归中国统理此路一切事宜”。英国银行由于放弃了以这条铁路抵押作为担保的权利，却取得了朝阳区南票煤矿采煤让与权的利益的一半作为抵押，于同日双方又签订了“南票矿务合同”。

现在，英俄两国剩下的问题就是关于势力范围的划界问题了。在上述9月英、俄双方达成的妥协中还有一条是“俄英两国政府互相担保，英国不在满洲，俄国不在扬子江地区，为自己谋求或支持本国臣民谋求铁路让与权”。

双方相互承认了在华势力范围，但分界线在哪里呢？穆拉维约夫认为：“分界线可以横过北京划定”；但维特一派人的意见则认为“俄国范围的界线应当大致沿着黄河划定”。因为华俄道胜银行金融资本的活动范围早已超越满洲，发展到北京以南了。远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为了建筑柳林铺到太原府的铁路并经营铁路附近的铁矿和煤矿，银行签订了贷款合同，一八九八年五月，银行又就自己参加修筑天津到济南府和沂州到镇江两条铁路（亦即将

《英国蓝皮书·中国》1899年第1号，第二三二件，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39—340页。

《英国蓝皮书·中国》1899年第1号，第二四三件，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38页。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第337页。

同上书，同页。按关内外铁路在外文中称为“北京至牛庄铁路”（Peking-Newchwang Railway），故此处牛庄铁路即关内外铁路。

《英国蓝皮书·中国》1899年第2号，第6页。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51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829—832页。

北京与扬子江下游连接起来)的贷款问题与德国人开始了谈判,此外,银行最近又谈妥在一家比法辛迪加修筑北京到汉口的铁路的金融事务中充当“中介人”等等情况均是。维特本人的野心是不在满洲“围起墙垣”,是要“通过历史的道路走向南方”的。因此,他认为“在远东事务方面保持完全的行动自由对俄国是最为适宜的”,不值得与英国进行谈判。

但是,穆拉维约夫却“完全意识到,我们在太平洋沿岸的地位尚无保障”,要巩固俄国在满洲的地位,“只有在事件和平进行以及我方完全抑止可能引起任何政治纠葛的断然行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俄国需要同英国签订一项协定。维特对此没有异议,只是提出了他自己的协定草案。他主张由英俄“两国政府签订并由两国君主批准一个一般性的协定”作为双方关系的“更远为坚固的基础”,“至于中国以及铁路上和其他企业上的竞争者,他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根据这个一般性的协定易于解决”。英方的反映是:索尔兹伯里认为:“如果我们按照维特的语言来签订一个协定,我怕那会为人们所大肆嘲笑”。巴尔福也认为:“维特建议是可笑的”,因为这个笼统的草案没有具体提出分界线,维特的意图是在实质上要排除英方提案中“将来对俄国不利的约束”。在英国看来则是“俄国将能准备好进一步侵略中国之前巩固它在中国的地位”。维特的草案被否决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磋商,最后在圣彼得堡于1899年4月28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九日)达成了在华铁路利益范围的《英俄协定》,又称《斯科特——穆拉维约夫协定》,内容是:

“(一)英国保证不为其本身或为英国臣民或其他人士要求在中国长城以北的任何铁路让与权,也不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为俄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

“(二)俄国方面保证不为其本身或为俄国臣民或其他人士要求在扬子江流域的任何铁路让与权,也不直接或间接地阻碍为英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

英、俄协定显然是两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在华的势力范围,“甚至李鸿章也公开谈起了已经发生的对中国的瓜分。”当两国驻华使节把协定内容通知总理衙门以后,清政府申明,“扬子江一带,长城以北,乃中国土地,权在自主”;“将来中国设或欲作某处铁路,应由中国自主”;“不得以贵国与某国自行商议之事,作为中国允许之据”。实际上,列强对清政府的申明

同上书,第840—842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87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89页。

同上书,第75页。

同上书,第194页。

罗曼诺夫:同上书,第192页。

《英国蓝皮书·中国》1899年第2号,第27页,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74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75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195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75页。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一卷,第204页。

根本置之不理。维特于 4 月 29 日，即协定签字后之次日，即以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名义向清政府提出建筑一条从满洲至北京的铁路让与权的要求。这项要求虽遭到清政府的反对，但新的铁路要求并没有收回，并预定于 1902 年以前付诸实施。因为英俄协定只规定了俄国“不要求在扬子江流域的任何铁路让与权”，而没有保证它不要求长城以南的铁路让与权。

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自一八九五年以来，以愈来愈快的速度破坏了中华帝国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它们和义和团起义一起，使中华帝国政府陷入了反对洋‘鬼子’的‘隐蔽的’战争状态之中”。——

第五节 美国宣布所谓“门户开放”政策（1899年9月）

1898年美国发动对西班牙的战争和夺取菲律宾，取得了侵略中国的有利条件以后，就阴谋参与瓜分中国的斗争。美国总统麦金雷在同1898年9月30日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John Hay）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表示，如果中华帝国的肢解果真发生，他情愿同享中国的瓜分”。“至少从蛛丝马迹之中可以看出，麦金雷本想对中国采取一种和正在实施于菲律宾的相似的政策”。不过这时中国的情况已经急转直下，1897年底到1898年上半年的第二次瓜分危机的高潮已经过去，帝国主义列强正在酝酿第三次瓜分。美帝国主义者想要用武力掠夺中国沿海的那些军港早已为别的列强夺去，他们还想在中国搞一个势力范围，看一下地图也没有这样一个范围提供给他了。他们如果要重复列强在第二次瓜分危机中的故技，势必导致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军事冲突。加以此时在远东，他们如果同“其他列强对比，军事力量又比较薄弱”。因此，它要采取一种实施于菲律宾的相似的武力政策乃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因为这些列强的军事力量都超过了西班牙，而就英德协定和英俄协定的签订过程来看，它们都把在华的势力范围看作是它们自己的领地似的，简直是寸土必争；美国要插足其间当然是十分困难的。

看来，就具体地要强占一个中国海港和划分在华的势力范围来说，美帝国主义者当然是晚点了。麦金雷似乎落后于德国的比洛一步，1898年4月27日比洛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上说：“瓜分中国的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已经作过的一切在于保证，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不会空跑一趟；用一句德国人特别爱谈的谚语来说就是：“旅客不能决定在什么时候开车，但他能够保证在开车的时候不晚点”。让魔鬼去作弄最后来的人吧！”如所周知，美帝国主义者的晚点不在于他们没有领土野心，而在于对西班牙的战争。虽说他们取得的马尼拉相当于美国的香港，也相当于美国在中国沿海的租借港口；但这却满足不了他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的要求。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当时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世界的风暴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谁懂得怎样去同那个巨大的帝国打交道，谁就有了解决今后五百年世界政局的钥匙。”中国是势所必争的，晚点了就加速赶来，说不定还会后来居上呢！既然武的不行，就来文的吧！因此，他们就确定了采取“和平”侵略中国的战略。这一战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伺机钻其他列强的空子，要求一个在华的沿海基地和势力范围；一是利用英国对它的支持，搞一些中国通来为它设计高招，用以保证和扩大它的在华权益。由于当时中国形势瞬息万变，特别是在“一八九九年，美国处于在华的势力有被全盘铲除的严重危险中”。因此，事不宜迟，美帝国主义者于是双管齐下，立刻着手。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我们知道，那个在1898年7月11日接替田贝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康格，曾于1899年3月1日向国务院条陈租借中国的大汉口并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八，第25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05页。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36页。

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146页。

转引自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128页。

以直隶省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的计划。他说：“打开地图一看，俄国已经在满洲打下了巩固的基础，德国在山东也如此，意大利要求浙江，日本希望福建，英国在香港，法国在广东及东京，英国更要求整个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包括最重要的上海租借地在内。除了直隶一省而外，事实上没有其他地方剩下来给美国了。但是，这一省，加上可供整个华北出口的天津，将来必然成为东方具有永久商业价值的占领地之一。”“如果中国被列强所瓜分，则美国在这里取得一个强固有力的据点，……可能强迫他们（列强——引者）永远对我们的商业开放门户。”因此，康格主张美国海军应首先占领大沽口。实际上，直隶省是清帝国中央政府所在地，首都北京就在这个省的范围之内，也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他们各自的驻华公使对清政府“发号施令”之所在。他们还通过所谓“铁路征服政策”，英、德和俄法集团都在这个省争夺得很厉害。英国曾经运用各种手段“来阻止俄国实现把直隶省置于她的势力范围之下的计划”。直隶省虽说没有被明确地宣布为某某列强的势力范围，其实它已成为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康格的条陈是很难实现的。正在这时，即1899年3月2日，意大利驻京公使马迪讷（Renato de Martino）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租借浙江三门湾为海军基地，遭到日本的反对，日本认为“该地区正位于根据中日协定不得割让给任何其它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内”。这项要求最后被清政府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康格不得不有所顾忌。但是，美帝国主义在这方面的野心却是始终没有放弃的。最可惊异的却是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海约翰本人，竟然在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之后的1900年12月7日致电其驻日公使巴克（Buck）说：“海军极欲得福州北面的三沙湾作为煤站。请非正式地缜密地探听日本政府会不会反对我们以此事向中国交涉。”我们知道，在德军强占胶州湾以前，德使就曾以“储煤站”的要求向清政府提出过。如今美国以三沙湾即三都澳作为“煤站”即军港的要求，乃是不说自明的。日本政府立即以“中国政府已向帝国政府保证不割让福建省的任何土地，美国政府所拟定的取得实际上等于取消这项诺言”为理由加以拒绝后，美国政府没有把这项要求向清政府提出。不过，我们也可看出它对强占我国沿海军港和划分势力范围的野心是多么强烈！多么锲而不舍！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美国所要探讨的一个办法是怎样在中国目前的既成事实下，提出一个保证和扩大美帝国主义在华权益和侵略中国的政策方针。他们虽说晚点了，但在华势力却不仅不能被铲除，而且还要后来居上。为此，海约翰找到了当时国务院的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 Rockhill）为他草拟一个文件。在草拟过程中柔克义又得到一个中国海关英籍职员、有名的中国通贺璧理（A. Hippisley）的帮助，最后完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the “Open Door”）的通牒。这就是1899年9月6日，海约翰行文美国驻英、法、德、俄等国大使，又于11月13日和17日分别行文驻日本大使和驻意大利大使，训令他们向各驻在国政府递交的一项照会，要求取得该政府的一项

穆恩：《帝国主义与世界政治》，第321页；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780页。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44页。

德尼士：《美国外交的冒险》，第207—208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441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392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25页。

“正式保证”：

“一、将决不干涉在中国任何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any vested interest）。

“二、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前述‘利益范围’内所有这类口岸（‘自由港’除外）所装卸的一切货物，不论其属何国籍，应课税款概归中国政府征收。

“三、在各自‘范围’内的任何口岸，对他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在各自‘范围’内修筑、管理或经营的铁路，对他国公民或臣民运输的货物，应与对本国人民运输同样货物、经过同等距离所征收的铁路运费相等。”

以上三点，就是 1899 年美国宣布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它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对中国进行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时期中的产物，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首先，“门户开放”政策是根据中外不平等条约中关于最惠国条款的原则提出来的。最惠国条款的原则首见于 1843 年的中英《虎门条约》第八款，声称“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对美国来说，就是 1844 年的中美《望厦条约》第二款，说明“中国日后”“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如今，美国虽因对西班牙战争而晚点，但它也有权要求沿海占据军港与划分势力范围的权利，并且过去的“既得利益”也不能因形势的变化而放弃。这就是上述政策中第一点和上述康格在 1899 年 3 月 1 日，海约翰在 1900 年 12 月 7 日要求的根据。因此，“门户开放”政策也包括了美帝国主义第一个方面的战略。“‘门户开放’主义的目的是在实质上和最惠国条款的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规定各国在和中国的关系上应具有平等地位——任何国家不得主张或享受其他国家所未享受的特权或豁免权”。

其次，“门户开放”政策不仅要求中国遵守、也要求帝国主义列强共同遵守这个最惠国条款，“是各有约国和中国发生关系时在它们自己之间所采取的政策原则”。它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利益范围或租借地的条件下要求它的商品输出，不论在口岸或铁路上享有同等税则的权利，“否认各国有权利在中国尤其是在它们专有的利益范围内对贸易和商业事项要求优先权利”。当时，“中国不仅被迫对许多租借地放弃实际的行政管理权，而且各有约国不断地企图要为它们自己划出大块中国地方，在这些地区内，当中国给与铁路或其他让与权时，它们得要求优先的权利。这样，不仅中国的瓜分看来就迫在眉睫，而且在未实行瓜分前，对于那些仍在中国官厅行政管理下的地方，看来列强之间将有一场为夺取优先特权的斗争”。因此，“门户开放”政策乃是美帝国主义在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时期中为了谋求取得跟列强相同的侵略中国权利的一种斗争策略和手段。

《一九一四年美国外交文件》，第 113—114 页，转引自《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1 页。

《一九一四年美国外交文件》，第 141 页。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 1 卷，第 223 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36 页。

同上书，第 51 页。

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 41 页。

再次，就列强的答复来看，除了情况与美国相同，即不曾在华取得军港与势力范围的意大利而外，没有一个国家对“门户开放”政策曾经表示过无条件的同意。英国是支持美国的，它在1899年9月29日最先答复美国，同意准备发表美国所希望的声明；11月30日，英国又答复说它“发表声明，但应以其他各有关列强发表同样声明为条件”。“门户开放”政策对有关列强来说“都不是全部可以接受的。就连英国也想订出几项例外，以适应它本国利益的特殊情况。可注意的是，虽然通牒中拟议把这项宣言适用于一切租借地，可是索尔兹伯里却未将九龙新租借的地方置于同意之列”。12月4日，德国声明，如果别国同意，它“不会提出异议”。法国于12月16日作复。日本于同月26日作答。12月30日，俄国发表了最为含糊其词的宣言。1900年1月7日，意大利答复，表示同意。美国政府在收到这些答复后，根本不管各国答复的不同，特别是俄国的表态，“这里根本没有提到俄国的任何‘利益范围’，也没有提出有关‘利益范围’的任何保证，俄国的保证仅限于它所租借的领土，并且只涉及到关税，它没有提出关于航行税和禁止优惠铁路运费的保证”，但美国却一律把它们答复看作是接受，于1900年3月20日宣称各国的同意是“最后的和确定的”。不过，尽管它这样宣称，“列强在法律上必然不会遵守‘门户开放’政策。它们都向美国提出了它们的承诺，但都附有须其他列强接受‘门户开放’政策的限制性条款。俄国不曾遵守这项条款。事实上，俄国不曾表示全面的和明确的接受。这就自动地解除了列强遵守‘门户开放’的诺言”。因为列强的承诺是“非得其他国家表示同意后不生效力的，这一点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宣布所谓“门户开放”政策以后，列强的对华侵略仍然照旧进行，而美国在这个政策后面所隐藏的“建立对华国际共管的体系”和“向新地区扩张的倾向”，在列强之间却是心照不宣而又有目共睹的。

同上书，第41页。

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43页。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1卷，第228页。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47页。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47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列强对华外交史》，第406页。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1卷，第235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列强对华外交》，第407页。

第六节 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的严重性

在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中，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的目的在于准备即将来临的正式瓜分。为着这个目标，他们的侵略活动，根据上述事实，基本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已经在华占有军港和在清政府手中取得势力范围的列强，他们此时都在强化“铁路征服政策”，并从事于铁路范围的协定来谋求一个彼此承认的、明确的势力范围，以解决正式瓜分时他们相互之间的领土野心的矛盾。二是尚未在华占有军港和取得势力范围的列强则要求同样占有军港和取得势力范围。在这一点做不到时，他们就援用早已取得的最惠国条款来同别的列强作斗争，以准备万一，要求“利益均沾”。这就是美国的“门户开放”通牒的由来。三是所有在华派出过传教士的列强，都在强化“教会政治”，以便在正式瓜分后建立起相应的“基督教殖民制度”。

以上三个方面，除了建筑铁路和授予外国传教士官衔必需同清政府打交道以外，大多是列强之间为掠夺中国而进行的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就清政府而论，表面上看来，比起 1897 年底到 1898 年纷至沓来的侵占军港和强迫发表不割让声明来说，形势似乎稍微缓和了一些，局面也似乎比较平静。不过，这只不过是“暴风雨快要来到之前的平静”罢了。因为，潜伏在这个表面较为平静形势下面的是中国的正式瓜分和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因此，我们认为，第二次瓜分危机诚然是严重的，但是，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比起它来却更加严重。

首先，就国际形势来看，这时已经是 19 世纪最后的年代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从 70 年代起已经步入了它的最后的也是最高的阶段。“到了一九〇〇年，整个非洲在欧洲列强中间已被测绘、探究、估价和瓜分了；……列强在这场争夺中丝毫不注意到土著的福利”。当时“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列强占据了”。因此，他们都像虎狼一般地成群结队地集中到中国来，掠夺这块尚未被正式占据的地方。我们知道，在非洲的瓜分中，主要限于欧洲的列强；而在瓜分中国的斗争中，则除此而外，还加上了美国、俄国和日本。中国人民所承受的瓜分压力比起世界上其他被瓜分地区的人民来说要沉重得多。特别在当时，“在十九世纪结尾的几年中，正如读者细查那时期流行的文献可以得到证实的那样，人们认为全世界将落到欧洲的统治之下乃是一件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欧洲人以一种佯为不愿而故发善心之态度，准备承担吉卜林所谓的白种人的负担——就是说，白种人是地球的主宰。……他们竟真的相信东亚的巨大人口可以永远从属于这样的一个欧洲”。在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看来，中国业已注定要被瓜分，是在劫难逃的了。中国大地已经成为世界风暴的中心，中国问题已经成为世界事务中头等重大的问题，举世注目之所在。

其次，就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资本输出来看，这时中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金融资本的附庸。根据一项统计，清政府的外债从 1864—1894 年为

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 46 页。

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 154、163 页。着重点系原书所有。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62 页。

韦尔斯：《世界史纲》，第 984 页。

4000万两，从1895—1899年则高达37000万两；而清政府每年的收入则只有7500—8000万两。这样债台高筑，整个清政府一年的收入只够支付借款的利息，他的经济命脉已经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家的手中。列强在铁路让与权的争夺战中，从清政府那里掠夺到手的铁路长度到1898年11月的统计数字为：属于英国的有2800英里，属于俄国的有1530英里，属于德国的有720英里，属于比利时（其中80%系法国资本）的有650英里，属于法国的有420英里，属于美国的有300英里。铁路所到之处，即列强势力所及之区，上述英德协定和英俄协定就是根据铁路范围来划分他们的势力范围的。美国掠夺的粤汉路大部分在英国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之内，上述英美协定即是英国要分享美国所取得的铁路让与权。总之，这个时期中列强之间许多根本不通过清政府的关于中国的协定或通牒，都是有关瓜分中国事务的蓝图；他们是企图采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正式瓜分中国的矛盾的。等到他们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之日，也就是中国面临着正式瓜分之时。

其三，就帝国主义教会侵略来看，这时他们的势力已经如日中天：不仅差会、修会林立，人数众多，并且还通过历年制造的无数教案和官衔的取得，他们的活动早已远远地超出了所谓文化侵略的范围。“到十九世纪末，在华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共约八百人，教徒从一八六一年四十万人发展到大约七十万人”。在基督教方面，“到一八六一年，基督教传教士从一八四四年的三十一人增加到一百余人，教徒从六人增到约二千人。到十九世纪末，传教士增至约一千五百人，教徒增至约八万人”。在东正教方面，缺乏具体数字，到19世纪末，其“传教区域也扩大到东北、西北、蒙古等地。一九〇五年，在蒙古和西北地区注册的教徒达三万七千余人”。天主教在华男、女修会，到19世纪末，约有耶稣会（the Roman Catholic Society of Jesus）、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方济各圣母传教会（Franciscaines Missionnaires de Marie）等13个；新教“在华差会，共有四十余个”。实际上，这些数字只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有时根据不同，差别极大。比如说上述新教在华传教士在19世纪末为1500人，但根据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1898年的估计，单是美国一国在华的传教士就“达一千五百人”。新教在华差会，从1807年的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开始，到1830年的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1847年的德国礼贤会（Rhenish Mission）、1866年的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到1899年的美国复初会（Re-formed Church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06页。

韦尔斯：《世界史纲》，第988页。按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这首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作辩护的并在帝国主义者中传诵一时的著名诗篇，所谓《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就是在1899年写成的。

参阅罗德津斯基：《中国史》第一卷，第350页。据本书附录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清政府岁入岁出一览表》中所载，这时清政府每年收入约为88979000两。

参阅同上书，第355页。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08页。

同上书，第117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页。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00页。

in U.S.A.) 为止, 总共就达 70 个之多, 而不只 40 余个。我们不论依据何项统计, 反正数字都是不小的。这些“传教之士, 察我形胜, 测我盈虚, 言财政详于度支之司, 谈物产精于商局之册, 论内政或较深于朝报, 陈民隐或更切于奏章; 举以相质, 动形窘屈”。他们“各连枝党, 发作待时”。真是“教堂遍地, 无刻不可起衅”的一幕险局了。

其四, 就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来看, 他们的炮舰可以在中国沿海或内河航行和停泊, 也是随时到处, 无刻不可起衅的。“在远东进行竞争的各列强, 其实力对比如下: 英国有一级军舰八十艘, 军舰的总数五百八十一艘; 法国——一级军舰五十艘, 总数——四百零三艘; 俄国——一级军舰四十艘, 总数二百八十六艘; 德国——一级军舰二十八艘, 总数——二百十六艘; 日本很快将赶上德国水平, 并将比德国更加强大, 因为日本靠近军事活动的场所。美国能参加军事活动的一级军舰估计有十八艘, 军舰的总数将达到八十一艘”。至于欧洲列强各国的军事力量则为: “德军和平时期有五十六万二千三百五十二人, 战时有三百万人; ……法军和平时期有六十一万五千四百十三人, 战时有二百万人; 俄军和平时期有七十五万九百四十四人, 战时有二百五十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三人”。除日本不计外, 总计列强在远东有一级军舰二百十六艘, 军舰总数为一千五百六十七艘, 势力之强大, 可以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任何一个时期所不曾有过的。真是远东地区, 列强炮舰云集, 中国这个世界风暴的中心, 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不过, 这样庞大的军事力量, 列强把它集中起来与其说是准备同清军交战, 毋宁说是预备着一旦不可能用协商方式解决正式瓜分中国的矛盾时而采取的最后军事手段, 还更恰当一些。这是因为, 一方面列强之间, 特别是英、俄之间“互相威胁”, 经常“处于战争的边缘上”; 另一方面, 他们认为清政府已经腐败到了极点, 它的军事力量是不堪一击的, 我们在下面就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其五, 就清政府方面来看, 他的军队毫无保家卫国的能力, 乃是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列强的一致结论, 并为他们在第二次瓜分危机中任意掠夺沿海军港而不受抵抗的事实所一再证实。当 1895 年 4 月 17 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前, 赫德在 4 月 7 日曾就清军兵败如山倒的形势致其属员杜德缙 (Drew E.B.) 的信中说: “休战由今天起两星期后届满, 如果我们在那时不吞下日本的药丸, 军事行动将在第二天重新开始, 那就意味着日本人会来到北京, 而皇帝, 也许连同朝代, 在 5 月底就会不知去向了。”清军何以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呢? 据在战争中曾以观察员身份在清军中考察过的加利勤 (Prince Galitzin)

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 第 345 页。

格里斯沃德:《美国远东政策》, 1938 年英文版, 第 61 页。

参阅中华续行委员会编制:《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 年)。

《光绪朝东华录》(四), 第 4018—4020 页。

比如说, 在 1897 年 10 月 30 日爆发的“武昌事件”, 就是德国炮舰高莫兰号 (Cormoran) 司令与几位军官在登陆时肇事, “被中国群众投掷石头”(《德国外交文件》第(一)卷, 第 146 页)。德使海靖要求湖广总督“张之洞自己即刻到‘高莫兰号’亲自对此一船只的司令道歉。此一要求立即由张之洞履行。……此外, 武昌炮台还对德旗行特别的敬礼”(《红档史料》, 第 99 页)。尽管如此, 时人认为, 如果隔一天以后没有 11 月 1 日爆发的山东巨野教案, 那么“武昌事件”即可能成为德军强占胶州湾的借口。

卡内基:《美国精神与帝国主义》(1899 年 1 月), 转引自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第 122 页。

说：“日军装备好、指挥好是真的；但华军却由于吸食鸦片之故，使士气如此低落，以致无论什么军队都不能抵抗，这也是真的。”英领事胡力穉(Consul Hurst)于1895年在其《致王家鸦片调查委员会书》中也说：“只要中国依然还是一个吸食鸦片者的国家，那就一点理由也没有要去担心她会变成什么重要的军事强国，因为鸦片烟瘾伤害了这个国家的元气和精力。”因此，在帝国主义列强中，“甲午战争以后普遍流行的信条就是，只要有现代化的军队一万人，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横行整个中华帝国”。他们认为：“少量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得好，武装齐备，他们就可能在全中国横行，长驱直入，而不会遭到任何有效的抵抗。”这个信条在侵略军后来强占我国沿海港湾时业已得到证实；他们更有理由认为，在行将来到的正式瓜分中国之际，他们也是不会遭到任何抵抗的，这样的瓜分又何乐而不为呢！

以上就19世纪结束年份的国际形势、金融资本的侵入、教会的侵略、列强重兵压境和清政府军事力量之不堪一击等五个方面来看，我们认为，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比起1897年底至1898年的第二次瓜分危机来是更加严重的。第三次瓜分危机不出现则已，一经出现就没救了；它是正式的瓜分。不仅满清王朝行将寿终正寝，并且中华大地、神州古国也就立即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了。殷鉴不远，近在眼前的是越南和朝鲜的命运，稍远的则是非洲大陆的瓜分，至于印度、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的事就更不用提了，因为这个时代本来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大规模地瓜分掠夺全世界领土的时代啊！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在第三次瓜分危机来到之前对列强的瓜分狂潮作出有力的和有效的抵抗。正式的瓜分业已迫在眉睫，时间已经不容许人们高谈阔论，坐而论道了！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里，谁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呢？举目一望，苍茫大地，又到底是谁主浮沉呢？

事实甚于雄辩，他们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所及时掀起的、轰轰烈烈的、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瓜分爱国运动！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417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50页。

转引自比钦：《鸦片战争》，1975年英文版，第258页。

转引自比钦：《鸦片战争》，1975年英文版，第258页。

第七章 义和团在斗争中蓬勃发展

自 1898 年 10 月 26 日赵三多、阎书勤等人领导的义和拳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即今河北威县发动首次武装起义以后，直到 1900 年 6 月义和团进入北京和天津，中间经过了将近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是义和团在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抗击清军镇压的斗争中蓬勃发展的时期，它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 义和团在冀鲁边区的发展阶段（1898 年 10 月到 1899 年 12 月）。

2. 义和团在冀中和京畿附近发展阶段（1900 年 1 月到 1900 年 6 月）。

这个时期同时也是帝国主义列强酝酿着对中国的第三次瓜分时期，反瓜分的义和团爱国运动必须争取在第三次瓜分危机，即对中国进行正式瓜分的危机来到之前进军北京，才能对列强的瓜分狂潮作出有力的和有效的抵抗。北京这时不仅是清政府的首都，并且由于它是外国公使们的驻地，所以同时也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华阴谋侵略，准备瓜分中国的策源地。如果说当时“世界的风暴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那么中国的风暴中心就在北京。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北京正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阴谋掠夺和瓜分中国的虎穴之一。义和团运动在首次武装起义之后，只在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内，就能进军北京，居然赢得了时间，抢在正式瓜分之前挺身而出，血战联军。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可以说是相当神速了。

义和拳的反洋教爱国运动，起源于冀、鲁边区，在其蓬勃的发展过程中是指向京、津一带帝国主义列强势力集中的地区的。据说在 1899 年春，北京就出现了义和拳的揭帖。自 1899 年秋天开始，北京就有群众练拳，“早晚在城内外僻静处街衢练之，动辄数十人，到处遍是，而无巾带形迹”；“天津西北部村庄亦有群众练习神拳”。1899 年 11 月山东义和拳首领朱红灯与心诚和尚被捕后，据说“起出私书数十通，中有‘明年四月初八日（一九〇〇年五月六日）攻打北京’语”等等。由此可见，拳民们之能及时进军北京，是同他们指向这个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策源地的目标不可分割的。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52 页。

明恩溥：《动乱中的中国》第二卷，1901 年英文版，第 444 页。

参阅孙敬：《义和团揭帖》，见《近代史资料》1957 年第 1 期，第 13—14 页。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一），第 347 页。

第一节 冀鲁边区发展阶段（1898年10月—1899年12月）

从义和拳1898年10月起义以后，拳民们在“顺清灭洋”的旗帜和他们自己改名为义和团的情况下，纷纷秘密串连，设坛亮拳，使他们的爱国活动在冀鲁边区，即冀南和鲁西北地区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1899年冬以朱红灯、心诚和尚和武修和尚等人领导的起义运动。这段时期大约经历了一年零两个月，是为义和团在冀、鲁边区的最初发展阶段。

一般都说义和拳“起于山东”。这个说法有它的根据，因为拳民首义是在山东冠县所属的梨园屯蒋家庄。但是比较精确的说法应是义和拳起源于冀鲁边区，因为梨园屯周围都属直隶省，即今河北省，梨园屯乃是山东冠县在河北省境内的一块飞地，它现在就是河北省的威县所在之处。因此，拳民们在首义以后就在冀鲁边区一带迅速发展当是很自然的了。实际上，赵三多、阎书勤等人起义后就率领拳民去山东丘县、临清和河北曲周、广平一带活动，发动群众，这些地方都处于冀、鲁边区，犬牙交错。他们在同清军交战失败后，除赵三多沿运河北去河北，阎书勤仍留本地继续活动外，许多拳民都分散而去冀、鲁边区各地，发动群众，准备一场更大的起义去了。因此，在1899年初，冀、鲁边区各府州县，大体上都有了义和拳的踪迹了。1899年4月23日即调署山东平原县令的蒋楷上任那一天，就闻“恩县四境盛行义和拳，或云：‘自冠县十八团’；或云：‘自东昌府曹州’；莫详其底细”。活动于直隶河间府各州县的拳首武修和尚，据说“于光绪二十五年春”即1899年春在“衡水留仲玉皇庙内设过拳场”；有人曾经说过他是“从山东冠县来”的。活动于直隶冀州一带的拳首王庆一“于光绪二十四年冬”即1898年冬“在枣强张家屯设立拳场”。“一八九九年春，河北景州七里铺也有山东师父张某某、王某二人来授拳”。

根据上述这些材料来看，我们如果说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等人领导的义和拳梨园屯首次武装起义，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并促进了义和团1899年在冀、鲁边区的发展，应当说在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

在1899年义和团初期发展阶段中，活动于冀鲁边区的朱红灯、心诚和尚、武修和尚和王庆一等人，他们大多是一些武艺高强，身怀绝技的武林精英。他们往来于各地城乡村屯，设坛亮拳，开展群众性的练武活动，为的是展开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朱红灯籍隶泗水，家无亲属，只身游荡”。心诚和尚即本明和尚，“俗名杨照顺，又名杨顺添”，“籍隶高唐，自幼在禹城丁家寺披剃为僧，后住省城张仙祠”。“光绪二十五年春，在平一带因近来教民欺压平民，众情不服，学习拳棒，捏称得自神授，意图抵制洋教。朱红灯、心诚亦各拜师降神，设厂受徒”。武修和尚“原名石修，

李文海等：《义和团史事要录》，第55页。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61页。

柴萼：《庚辛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04页。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53页。

《河北景州、枣强、衡水地区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见《山东大学义和团运动研究专辑》，1980年第一期，第158页。

同上书，第158页。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第107页。

阜城东南小庄人，本是冀州城内开元寺的住持僧。当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后，他就去山东学拳，加入义和团，据说还曾参加过一八九八年冠县的反洋教斗争”。王庆一是枣强“张家屯人”，“光绪二十五年春夏之际，王庆一在家里铺场练拳，叫‘五祖神拳’，后叫义和团”；“他的武术学得很好，颇有功夫”；“家里不富裕，有十多亩地”，“但仗义疏财，喜交朋友，远近百十里都知道王庆一的为人”。枣强知县凌道增以拳民声势日增，“以王庆一系拳民教师，遂任听其出入衙署”。

他们在不辞辛苦、往来各地设坛练拳的同时，还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宣传工作。他们的旗帜是“顺清灭洋”、“保清灭洋”、“助清灭洋”和“扶清灭洋”等等，后出的“扶清灭洋”口号比较为后来各地义和团所常用。他们在宣传的时候，往往要讲一些为什么要“扶清灭洋”的道理，并提出拳民的纪律。有一个材料谈到武修和尚在阜城城南临镇村拳场的讲话情况说：

“大师兄武修讲话，指着旗说是扶清灭洋。怎么扶清呢？清兵自光绪二十年被日本打败了，清兵怕死，不战而退，各国会议瓜分中国。现在咱们受教民的气，若瓜分了中国，洋人进中国，咱们更受不了咧。但是中国无兵还有民，中国人多，若能团结一致，就能扶起已倒的清，灭掉来中国的洋。他们想瓜分中国，如同作梦一样。武修当日立有十戒：戒贪、戒奢、戒欺、戒骄、戒怠等等。”

武修和尚作为义和团的首领之一，幻想“能扶起已倒之清”，他不知道这个“已倒之清”是扶不起来的。“扶清灭洋”这个口号反映出中国农民的爱国主义要求，是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时代产物。它首先出现于中国人民反第二次瓜分危机的1898年7月余栋臣起义时的“顺清灭洋”大旗，同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起义也沿用了这面旗帜。它在中国人民反对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的义和团运动中逐步发展成为“扶清灭洋”的旗帜和口号，正是反映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业已上升成为主要矛盾，而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已经暂时地降到了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这面旗帜也提供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的依据，部分同情拳民爱国精神的清政府地方官吏和清军中的下级官兵也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听任他们在城乡活动，许许多多有志于保家卫国的城乡人民也才能较少顾虑地参加拳民的队伍，或主动地请拳首来他们这里设场教拳。因此，“扶清灭洋”这面旗帜，在当时条件下是有利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的。“其党以扶中期灭洋教为词”，“官民皆目之为义民”，“故群相信从”。“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非尽无业游手也”。实际上，拳民的“扶清”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清朝官兵前来镇压，他们就会立即把拳头对准这些反动派，加以迎头痛击的。他们是以“灭洋”、反瓜分来作为“扶清”的条件的。当然，这面旗帜也有其局限性。不过，在当时情况下，我们要求中国农民来提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口号，也是不现实的。

以下我们就分别来看一看义和团运动在冀、鲁边区的发展和斗争情况。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9页。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8、19页。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第109页。

《山东大学义和团运动研究专辑》，1980年第1期，第184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496页。

一、朱红灯和心诚和尚在鲁西北的活动与平原冈子李庄森罗殿 及在平大张庄教堂之役（1899年10—11月）

1899年2月，朱红灯来到在平县，在平与冠县同属山东东昌府，相距不远。在平县境内外国“教堂林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1899年春，在平等县民人因教民欺压平民而学习神拳，抵制洋教。朱红灯来到后与“籍隶在平、素习拳棒”之于清水、王立言并与在在平、高唐和平原等县活动的心诚和尚等人“均相认识往来”。他们以在平为中心，到附近州县如禹城、长清、博平、恩县、平原等地活动。例如在平原的拳会，照署该县令的蒋楷看来，即“因外来拳师，在境内夸炫技勇，乡民年少无知，为之欣动，约集人众，学习拳棒，其意亦为自相保卫”。所以他“即令强壮者归入团练仍不失为各保身家”。这样改“拳”为“团”，当然是义和团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至于蒋楷，他本来把义和拳看作是“邪教”而主张禁止的，但他也认为民教冲突责在教会。“教民多无赖，其所谓会长，又无赖之尤，平日倚势欺凌平民，以为莫我敢校，而不知积怨众且久，一遇激煽，如水之奔壑，火之燎原也”；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其恶教民也，有同心，其仇外洋也，亦公愤”。当时有些义和拳甚至“揭有山东巡抚部院‘保清灭洋’大旗”。不过，蒋楷始终对义和拳心存偏见，以致“办理不善”，酿成了1899年10月11日的冈子李庄之役。

冈子李庄之役是由于教民李金榜与平民里长李长水向来“不睦、遇事欺压”引起。蒋楷因李长水“信朱红灯特甚，签差往捕；则方招党以示众，撞金伐鼓以鸣威，敢为大言，私立名号。适恩县请到马队莅恩，近诸捕藉此声势”，于9月22日“吓散悍党，获从犯六人。二快捕陈德和尤出力，取供后赏钱百千”。蒋楷取到什么供呢？无非是“教民贿串蠢役”陈德和，“妄报村民谋变”，而他本人又“纵蠢役陈德和屡向百姓讹诈，以致激成众怒”罢了。实际上，他们抓到的六个拳民是什么人呢？经审讯“均系案外无辜之人，致激成众怒”。这一带的拳民首领朱红灯“侦知其事”后，即在高唐、在平、长清等州县号召拳民二三百人于10月初来到冈子李庄，“扬言为拳民复仇”；“心诚和尚及其余党暂住在平，以为后劲”。蒋楷抓住“村民谋

《景州、阜城义和拳的兴起与斗争》，见《山东大学义和团运动研究专辑》，1980年第1期，第162页。

按原文中“武修”作“晤修”，今改。

劳乃宣：《拳案杂存》，见《义和团》（四），第452、453页。

《山东省志资料》1960年第2期，第83页。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8页。

同上书，第7页。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54页。

同上书，第355、356页。

同上书，第361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3页。

同上书，第35页。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55页。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55页。

变”的大帽子，在教民的支持下，到平原县城正南约十公里处的冈子李庄进行镇压；他说：

“九月初七日（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一日），（蒋楷）率勇役数十人往捕，……行抵捉狐屯，闻拳‘匪’愈聚愈众，十数人住一棚，环庄外且遍。督勇役贾勇前进；比至，则‘匪’众已成列逆拒。朱红灯戴大红风帽，著红裤；头目各执两红旗，枪刀之属，以红布为饰。盖其色尚红，托南方火色，以别于它卦。其初出，向东南叩头，其令以鼓，其党有和尚，有道士，其队以四人为一圈，轮伏轮起，轮退轮进，其人皆外来，其中多游勇，故娴于战事。城汛同往，但作壁上观。‘匪’众且悍格，勇役寡不支，遂退。”

在这次冈子李庄之役中，朱红灯打起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旗号，在战斗中“伤勇役二名”，蒋楷落荒而逃，归至城中。是夜，南乡庄长及他人前后来见，不许蒋楷向上级请兵镇压，要求释放六人并索取陈德和，蒋楷概加拒绝。10月12日，蒋楷夸大其词地说是“情势渐大，恐滋巨患，当即具禀”济南府尹卢昌诒“请队弹压”。卢昌诒于15日“驰抵平原，查明此案起衅缘由，胥由该署县听蠢役滋诇和讹脏而起。即将陈德和提案，严讯收禁，所拿之邱被子等六名，当室保释”。事后毓贤并将“蒋楷即行革职，以示惩儆”。

10月11日冈子李庄之役的胜利，显示了鲁西北地区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的高涨。朱红灯在胜利后即率领拳民去恩县城西的刘王庄教堂和城西北的庞庄教堂，帮助人民展开斗争，一时形势甚为紧张。早在9月份，恩县县令即已向庞庄教堂“派往勇役，妥为弹压保护，可期无虞”。当时住在庞庄的美国公理会（the American Board Mission）传教士傅恒理（Dr. H. D. Porter）于10月14日的一封信中说道：

“自我们从本地县城（即恩县——引者）首先得到少数兵勇来保护我们，以抵抗义和拳会（the Yi Ho Chuan Society）暴徒的可能的、然而看来却是即将发生的进攻以来，到今天早晨恰好有一个月了。这个三个字的会名的最后一字是‘拳’或‘拳民’的意思，而这个会名是去年被命名的。所谓‘神拳’（“Spirit Boxers”）就是聚集起来角力格斗和作一般健身体操的一群青年人，根本目标在于联合起来去反对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所有外国人。这些人群以爱国的目标‘扶清灭洋’（“Exalting the Dynasty and Destroying the Foreigners”）为借口，在他们完全渗透到我们周围的整个地区以前，他们的人数已经是很多的了。”

从傅恒理这封信中可见鲁西北拳民声势的浩大，也可知恩县令早在9月14日就把兵勇派到了庞庄教堂。但在10月11日冈子李庄之役后，人心振奋，保护庞庄教堂的兵勇已经不够了。到10月17日，“庞庄来告急，派朱哨官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3、35页。

《筹笔偶存》，第34页。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20页。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56页。按据义和拳会的服饰标帜来看，红色系坎字拳会或离字拳会；据蒋楷调查，朱红灯的义和拳会，属离字拳会。

《汇报》第一四六号（1900年1月10日）。

《筹笔偶存》，第34页。

《济南府禀》（1899年10月23日），见《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3页。

《筹笔偶存》，第34、35页。

带马队一哨往，恩县来告急，派马队三十人往”。不意朱红灯已于当天移驻平原县西 18 里处之森罗殿，“森罗殿位于马颊河东岸大芝坊庄的东头，庙基立于河堤上，四周树木茂密，地势居高临下”。拳民来此，希望避免清军追捕。朱红灯告诉清军马探说，我之所以离开“冈子李庄，为两大人地耳；若再相逼，自失颜面，勿怨我！”

先是，毓贤派济南知府卢昌诒去平原时，还派有统领亲兵马步队的袁世敦同去。10 月 18 日晨，卢昌诒与袁世敦“商进止。谓临之以兵，当散”。袁世敦于是带队直前，爆发了森罗殿之战：

“统领（袁世敦）甫近森罗殿，遽闻炮声。俄一骑以黄纸来投，……问之曰：‘战书也。’遂驰去。正诧异间，‘匪’以二三倍之众来扑，……我军伤十余人，阵亡三人；后哨失其门旗一。……统领……策马（逃）至小马庄，曰：‘今日不活矣！捕一士‘匪’，而挫辱至此，复何面目见人乎？’……军猛进，‘匪’党力拒，‘匪目’各执两红旗旋绕胸前，有中数枪弹始仆者。适庞庄恩县马队，闻警回援。两路夹攻，始渡马颊河狂奔。马队穷追，至四散乃已。”

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在森罗殿之战中自称己为义和团。他在战斗中因受到两面夹击，被迫渡河退走，一如冈子李庄之役那样，迅速率领团民转移。袁世敦因军先败老羞成怒，俟“仗后多时，团民”转移“已净”之际，率兵进攻大芝坊庄，“视人命如草菅，以杀人为儿戏”。他这样作的目的，一方面为的是泄忿，一方面也好向上级汇报交差，说是在战役中互有伤亡。不料毓贤在事后认为袁世敦“此次弹压查办实属孟浪”，“应即撤去统带”，“以肃戎行而服民心”。

1899 年 10 月 11 日和 18 日的冈子李庄之役和森罗殿之役说明，“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中的“兴清”决不是不抵抗，而是以对来攻的清军必须反击为条件的。但是，他们的目的不在此，而在于发动和帮助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因此，他们在战后即去各地发动群众，计划对一个罪恶的大教堂的一次进攻。朱红灯当时的行踪是这样的。

“（他）复回在平与心诚（和尚）等晤商，……分党四出，……以图再举。十月初二日（十一月四日），遂率领同伙并遣党羽前往禹城县。……初六日（十一月八日），复往长清县。……初七日（九日）……夜……至在平县张官屯，……因教堂教读王观杰屡次欺侮民人，遂将王观杰架出杀害。……初九日（十一日），转至博平县，……闻宪台法外施仁，仍令解散，不咎既往，……拟暂分散。不料十三日（十五日）路过在平大

《恩县会禀》（1899 年 9 月 29 日），见《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 5 页。

转引自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131—132 页。按芮义德（Alice Reed）在《记山东德州基督教工作的开端与发展》，一文中说：“义和拳时期，庞庄的基地奇迹般地未遭到破坏。几乎是南从扬子江北到黑龙江，天津通商口岸以外的传教基地，唯一免于破坏的便是庞庄”（见《义和团研究会通讯》1987 年 8 月第 4 期，第 6 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庞庄教堂之所以保存，是它首先得到清军保护和后来又增兵保护，朱红灯移军森罗殿的结果。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 358 页。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第 79 页。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 359 页。

同上书，第 359 页。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第 359 页。

参阅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第 12—13 页；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 296 页。

张庄，该庄教民见拳会人少，开枪拦阻，激怒拳民，拚命堵拒，教民大败，当场杀毙二人，并将洋式教堂放火焚烧。该‘匪’等聚议，势成骑虎，一旦解散，教民必不放手，不如再行纠聚，以顾目前。遂于十五日（十七日）又至（博平县）吴杨二庄，……十六日（十八日），又遣同伙复往长清县。”

看来，在 1899 年 11 月上半月中，朱红灯与心诚和尚活动于东昌府之茌平、博平和济南府之禹城、长清一带，其目的在于用义和团的旗帜调集这些地区的拳民和大刀会众，共同进攻拥有洋式武器和弹药的天主教会侵略的据点——茌平地区的总教堂大张庄教堂。在 11 月 15 日开始的大张庄教堂之役中，“砍毙教民张学曾、张传路二人，并伤张安居等三人，复放火焚烧教民住屋。因火势蔓延，燃着堂内存储火药，致将洋式教堂十六间及教民住屋一百八十余间延烧”。战斗进行了三天，才使这个侵略据点化成灰烬，“烧在平洋楼张庄，或自高唐夜行，薄暮见火光，至晓未息也”。“洋楼烧了以后，可把洋人制服了，教民反教了，唱戏，修了庙”。上引《济南府禀》中，把朱红灯与心诚和尚的活动说成是到处“抢劫”、“讹诈”、“聚众横行”、“勒索”银钱以及“杀人放火”等等，纯属诬蔑不实之词。至于把大张庄之役说成是因教民见拳会人少路过该地所发生的偶然事件，则同事实真相是不符合的。

“时济南、东昌、曹州三府，济宁、临清二直隶州”，拳会“数十起，每起数百人”，外国教会“惶惶不安”。帝国主义列强在北京的代表如法使毕盛、美使康格等均纷纷行文总署，迫清政府镇压山东义和拳。11 月 15 日大张庄之役后，毓贤于 17 日接到意大利教士马天恩主教来函，告以“茌平县北张家庄教民四十三家，教民共三百余名，并洋式大教堂均被烧尽”后，复函称已派济东道吉灿升、督同游击马金叙“驰赴该处巡缉”。马金叙临行前请示，毓贤“曰：‘弹压’，‘弹压不了，奈何？’曰：‘以好言抚之’。‘我以好言，而彼以毒手，奈何？’曰：‘事当不至于此’。”由于马金叙力主镇压，他利用拳民在“扶清”旗帜下虽说对清军的进攻严阵以待，但对清军的阴谋则警惕不够的弱点，于 11 月 21 日夜在博平县属之花园寺“计诱朱红灯”就捕，又于 23 日夜在高唐州杨家庄趁心诚和尚“就寝，猝不及防”之际，将其擒获，与朱红灯一并解送济南。

1899 年 11 月 27 日，美使康格以山东义和拳事“第五次照会总署”。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于 28 日下谕批评毓贤“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 17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36 页。

《济南府禀》（1899 年 12 月 3 日），见《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 20—21 页。

《历城县禀》（1899 年 12 月 19 日），见同上书，第 9 页。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 360 页。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 161 页。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 20—21 页。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 361 页。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 361 页。

《筹笔偶存》，第 42 页。

《筹笔偶存》，第 42 页。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 361 页。

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毓贤于12月1日上奏说：

“大刀会名目由来已久，俗传能避枪炮，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各省习者颇多。近年以来，平民因屡受教民欺凌，希图自保身家，更有创立乡团，学习拳勇，名为义和拳者。远近讹传，以东省旧有大刀会名目，遂指义和团为大刀会，或又指为新立之红拳会。……自经奉旨筹办保甲团练，奴才即札饬地方官认真稽查，凡属私团，概行归官督率办理，以杜流弊。……愚以为筹办教案，只分良莠不分民教，即是持平办结而无庸畸轻畸重于其间也。伏查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百姓能知君亲大义为务者颇不乏人，设有缓急，必有可恃。”

后来，毓贤还亲自提讯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据朱红灯、心诚、于清水合供，向习拳棒，均未为匪”，他们只“因平民屡被教民遇事科罚不平”，才掀起反洋教斗争的。不过，毓贤话虽这样说，他最后还是借故于12月26日左右把他们杀害。朱红灯、心诚和尚与于清水三人成为义和拳起义运动中第一批为反帝爱国而牺牲的烈士。

1899年12月6日，清政府在列强的催逼下以袁世凯署山东巡抚，把毓贤调离山东，来京陛见。26日袁世凯到济南接任，27日即发布告示说：“本署抚部钦承恩命，建军以来统率重兵，弹压镇抚”；“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焚”。此外，他还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道：“到此二十四日（即12月26日——引者）接印，即办理‘匪’案，先以解散晓谕为主，次再缉其‘匪’首，以清祸根；如其抗拒不散，再派兵弹压；倘来格斗，再相击歼，已可谓格外慎重。”显然，袁世凯以剿为主，抚为辅的政策与毓贤的以抚为主，剿为辅的政策是有区别的。“东抚袁慰帅不助拳‘匪’，严惩土‘匪’，为东民所憾，皆有欲杀之势。民间谣云：‘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当时，拳民把揭帖贴到了袁世凯的大门口，“在抚署照墙画红顶花翎之大龟，伏于洋人臀后，以示痛恨。故慰帅防范甚严，有于卧室外密护铁网之说”。这些铁网虽说能保护袁世凯的生命于一时，但同时也充分地暴露了他仇民媚洋的丑恶嘴脸，遗臭万年。

如果说袁世凯凭借他所统率的重兵，一到山东就能使义和拳销声匿迹，那也是言之过甚，太小看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力量了。就在他上任后第5天，12月30日，英国安立甘会（The 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 in North China）传教士卜克斯（S.M. Brooks）由泰安返平阴，途经肥城张家店，与赶集之庄农孟洸汶等人相遇发生争执，“卜克斯下驴，拢前夺获孟洸汶刀子乱札”行凶，以此在互相殴打中丧生。袁世凯为了讨好他的外国主子，不分是非曲直，故意扩大案情，判处两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二人两年徒刑，肥城知县撤职，并赔银9000两，再加500两在卜克斯毙命处盖造碑亭。他这样作只能更加暴露中国反动派不过是列强瓜分中国的无耻帮凶。在他的镇压下，充其量也不过只能使山东义和拳运动在部分地区改变斗争方式，转入秘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9页。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57页。

《筹笔偶存》，第43—45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1页。

《查禁义和拳“匪”告示》，转引自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第95页；参阅李文海等：《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第65页。

《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2期，第19页。

密活动，积蓄力量，为 1900 年夏秋之际的斗争高潮准备条件罢了。

实际上，山东人民当时反对外国教会斗争的情况是：一方面，朱红灯、心诚和尚虽牺牲，但是，继承他们事业的却大有人在。如“在平田庄的田怀德，据称是‘神拳教习，代朱红灯为统领’；与朱红灯认识往来的王立言继续坚持斗争，“于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率团民两次攻打禹城的天主教总堂——韩庄教堂”，1900 年 2 月在在平与清军激战后，始远走莱州府高密，“转入秘密活动”。另一方面，朱红灯只是当时山东最著名的一派拳会的领袖，与他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拳会在活动，“如罗洪英、于福堂、和尚徐发，是在平境内另一拳会的首领”；“贾士位是平阴县境内的拳首；李继浩、李延生等人是长清县的拳首；李希魁、李魁头是堂邑县的拳首；德州排子庄李发祥又名李庆海，李德海又名李振海，他们和张开祥是当地著名的拳首；阎书勤、牛壑子、董姓和尚是临清的拳首；陈芒仔是禹城北乡的拳首。还有毕文祥据称是义和拳总头领，贾树田据称是大师兄等等”。由此可见，他们的斗争是不因个别拳首的牺牲而停止的。

二、武修和尚和王庆一等在冀南的活动与枣强萧张镇教堂案及景州朱家河教堂之役（1899 年 12 月）

冀、鲁边区是义和拳的发祥地，自 1898 年 10 月义和拳在冠县梨园屯首义以后，他们在鲁西北发展的同时，也在冀南地区展开了活动。当时，“以山东的海丰、阳信、德州、临清、邱县、冠县、曹州及直隶的盐山、庆云、景州、故城、威县、曲周等州县为最多，而以两省边境州县为活动的中心”。

因此，既有山东的义和拳进入河北境内，也有河北的义和拳进入山东境内的；这带地区犬牙交错，水道纵横，地处华北大平原，平时人们就是相互往来，络绎不绝的。而留在冠县地区坚持斗争的阎书勤等人，他们的活动范围实际上就跨处山东的邱县、夏津和河北的曲周、威县一带，是在山东、河北两省都有其斗争事迹的。虽说在 1899 年间，冀、鲁边区的直隶省方面活动的义和拳，不像在边区的山东省方面那样有平原冈子李庄、森罗殿之役以及在平的大张庄教堂之役。但是，他们在活动范围、斗争情况和群众斗志上，丝毫不亚于鲁西北方面，1899 年 12 月的景州朱家河教堂之役，规模也是不小的。

当时，在冀、鲁边区直隶省方面活动的义和拳，主要分布在冀南区的各府州县，特别是集中在河间府和冀州一带，他们的首领是武修和尚、王庆一和渠成江等人。据说武修和尚作为冀州城内开元寺的住持僧去梨园屯参加义和拳首义以后，1899 年春就去衡水留仲玉皇庙设拳场，有福海和尚和觉活和尚参加。1899 年 9 月，他去河间府阜城肖村石塔寺，10 月又在阜城临镇八里屯等地设拳场，有成章、瑞章两个年青和尚和祥安老和尚参加。最后，他以景州刘八庄作为他“最主要的活动据点”。 他属于乾字拳会“武场”。另

佐原笃介等：《拳事杂记》，见《义和团》（一），第 254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66 页。

《筹笔偶存》，第 77 页。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第 86、97 页。

外，还有一支在景州宋门和杜桥活动的拳民，则属于乾字拳会“文场”。

另一方面，在冀州东南的枣强县于 1888 年冬天便开始有拳民活动，枣强县张家屯人王庆一请来师父在家设场练拳，名曰“五祖神拳”，参加者“打红包头，也有打青包头的。用大刀片、长枪头做武器。还有红边三角大白旗，上面写着‘助清灭洋’四个大字，还写着王庆一的名字。他又到故城、景州一带去铺场子。景州故城一带，他的徒弟最多”。他属于乾字拳会“文场”。

1899 年 5 月中旬，“王庆一率领团众前往攻打枣强县城北面的萧张镇教堂，放火烧了教堂大半，同时还逮捕了教堂司事，使当地洋教士人心惶惶”。当时在萧张镇的英国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麦克法兰（Dr. S. MacFarlane）于 1899 年 5 月 28 日向在伦敦的卡曾斯（Mr. Cousins）去信时，说明了外国教会当时在拳民起义的形势下惊惶失措的情况。他说：

“关于这个勃兴的被称为义和拳（I Ho Ch 'uan）的秘密会社的情况，瑞思义（Rees）无疑地已经让你知道了很多的细节。当三个同伴拿起装好子弹的左轮手枪，在妇女住房的外边熬夜，准备着如有必要就坚决抵抗的时候，形势乃是非常之紧张的。当凌晨一点半钟之际，我们围着哈勒小姐（Miss Harré）的卧床（皮尔‘peill’带着腰痛说她卧床已经有三个星期了）跪下并把我们的委托给上帝保佑照顾，深知上帝保佑我们的力量更大于反对我们的力量的时候，那真是一次难忘的祷告会。在我们作祷告的时间中，一阵一阵的枪弹射击声不时地使得情况更加危险严重。我们打电报去天津，叫一个大官查究此事。他来此处一个星期，如今仍在衙门里彻底研讨解决此事。”

这大概就是直隶总督裕禄于 1899 年 5 月 20 日致清河道高骏麟一电的来历了。该电称：

“现据关道禀：接准英领事函称：据英国教士瑞（即瑞思义——引者）电：冀州属枣强县地方，有义和拳‘匪’持械滋事、将教堂司事华人抢去，勒索，声言如不给银五百两，欲害洋人等语。虽经呈报，枣强县官不肯保护。现在人心惶惶，该县福音堂教士三人，带有眷属幼孩，该‘匪’势将闹教，若不急为防范，恐酿成案等情。应由道迅派妥干之员，即日驰赴枣强，查明实在情形，会同该县认真保护，实力防范，毋得稍涉疏虞，别酿事端，致于严谴。仍饬将查办情形，迅禀复，勿延为要。”

5 月 24 日高骏麟与督标中军副将张士翰禀裕禄说：“枣强拳教一案”，当即“专马”告枣强县令凌道增，“据复称：此案因演戏启争，现已将人放回等语”。6 月 8 日，瑞思义又致函卡曾斯说：“五月初，通称为‘义和团’（“United Boxers”）的秘密会社的几个‘叛党’首领出现在一个正在演戏的市集上，若干志愿者在那里传教。拳民们用辱骂并挥舞‘七把尖利的大刀’来阻止了传教活动”，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因演戏启争”。瑞思义继续说道，

《筹笔偶存》，第 17 页。

同上书，第 19 页。

《河北景州、枣强、衡水地区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见《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第 1 期，第 158、159 页。

同上书，第 183 页。

同上书，第 159 页。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第 108 页。

转引自珀塞尔：《义和拳起义背景研究》，第 285—286 页。按瑞思义（Rees, WilliamHopkyn, 1859—1924）是 1883 年来华之英国伦敦会牧师，在河北省冀州一个村落中传教，即萧张镇。

在第三天上，一个教堂司事被捕，需要 75 英镑的赎金。后由总督派来官员，达成五条协议，其中之一就是拳首得流放到“六百英里以外。如果他企图逃脱或敢于回家，就得立即斩首”。这可能就是王庆一此后“把活动重点推移到景州、故城”的原因。据说，“王庆一曾先后去过北京二次。第一次去，封了个官，回来时戴着亮白顶子，大花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1900 年 8 月——引者），他又领义和团去保卫北京，后来光绪皇帝出走，他就往天津去。未到，天津就失了，王庆一就回了家。官兵和奉教的来拿他，他就跑到口外去，住了几年又回家。后在德州开起‘庆和栈房’，直到死去”。可见，王庆一除了在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敢于公开回家以外，此后他不过偷偷地回去过一两次，而终身流浪在外了。

直隶总督裕禄的镇压措施，虽说在冀州的枣强萧张镇奏效；但是，在冀州东边的河间府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河间府南部本是武修和尚活动的地区，如今又来了王庆一，拳民声势十分浩大，闹教事件层出不穷。为此，裕禄于 1899 年 11 月底派直隶准军右翼统领梅东益带兵三营，驰赴阜城、献县、景州等处，要他“查明”“教堂处所”，“派队驻巡”“三营如不敷用”，亦可“添调一二营”。梅东益于 12 月 10 日到景州，立即召开景州、吴桥、故城、阜城和东光五州县的“查办义和拳滋事事件”会议。他们在会后的禀报中说：

“伏查义和拳一党，恃众横行，日甚一日。自五月至今（1899 年 6 月至 12 月——引者），卑州景州出案七起，卑县阜城出案五起，卑县故城出案一起，卑县东光出案一起，卑县吴桥虽未出案，而谣言四起，岌岌可危。……

“窃维该党，以扶中朝灭洋教为词，声言为国家出力，非特托名于义，抑且托名于忠，故与教民有嫌隙者为其所动，与教民无嫌隙者亦为其所动，用心之谲，饰说之巧，有乱雅夺朱之况。窃似乱真，习非成是，其簧鼓众听，得力全在于此。……

“又其人数众多，蔓延广远，声势浩大，骄悍难驯，非厚集兵力，不能镇服。……

卑职等与梅军门统筹全局，三营犹嫌单薄，拟请多调数营，以资得力，而免疏虞。”

这篇禀报统计了河间府南部四个州县在 1899 年下半年一共发生了 14 次反洋教斗争，其中充满了对义和拳的诬蔑，不过我们从它的胡言乱语中也可看出这批封建官僚对拳民们正义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主义言论和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战斗精神深感胆怯。因此，他们要求“请旨申禁，为第一义”，“拨派重兵，为第二义”。裕禄当即同意，于 1899 年 12 月 12 日批准下令“由两司刷印《源流考》，并会衔示禁”。13 日复令直隶按察使廷雍把《源流考》百余本“分行有拳民各属”，并让他“妥拟”禁止义和拳的“告示”。在拨派重兵方面，裕禄于 14 日下令直隶巡防营务处总理张莲芬赶赴河间府及深、冀各属，会同梅东益，共带“马、步六营，前往查拿首恶，弹压解散，并保护教堂”，又抽调直隶提督、武卫前军统领

林学城：《直东剿匪电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 39 页。

同上书，第 39 页。

珀塞尔：《义和拳起义背景研究》，第 286、287 页。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第 1 期，第 159、184 页。

林学城：《直东剿匪电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 55 页。

劳乃宣：《拳案杂存》，见《义和团》（四），第 473—474 页。

聂士成二营马队，会同张莲芬、梅东益“所带之队，办理此‘匪’”。

裕禄这些措施是没有得到预期结果的，轰轰烈烈的义和拳起义运动并没有被吓倒，景州朱家河教堂之役紧跟着在12月18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就爆发了。“景州朱家河教堂是当时天主教直隶东南教区的总堂，朱家河村住有教徒三百余人，是教会反动势力在直隶境内的一个大本营”。附近的刘八庄是武修和尚最主要的拳场所在地，拳民们为了攻击朱家河这个总堂，首先在其附近展开了反洋教斗争。景州知州王兆骥在12月13日电告裕禄说：“卑州苏古庄堂，初八（十二月十日）被焚；刘八庄堂，初十（十二日）被焚，并烧民房十余间，伤教民四人；城乡谣言四起，总堂危甚”。“十四、五，（十六、十六两日）拳‘匪’首犯武修和尚，在刘八庄聚众起事”。18日开始了朱家河教堂之役；关于此役前后情况，山东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的《调查资料》说：

“义和拳在这一地区的斗争活动，最重要的要算是攻打朱家河教堂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义和团的声势浩大，规模也较为壮观。义和团攻打朱家河，完全是由朱家河教会侵略势力压迫所引起。朱家河教堂原是天主教直隶东南教区的一个重要侵略据点，在义和团期间，这个教堂配备了许多快枪，组成了一支反动武装队伍，各地教民都聚集在这里。那里的教会、教民对百姓进行肆无忌惮的欺压，它的罪恶事实如下：（一）朱家河教堂曾占有三顷土地，教堂以这些地租给佃户，攫取对半分地租。不仅教堂占有土地，教民中也占有大量土地。如教民朱玉申就占地一顷多，此外大富户还有好几家，这里教堂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十分严重。（二）平时教民践踏民间坟地，破坏人家风水；教民还在集上贱买贵卖，诈扣物产，无事生非，捣乱市集。（三）神父强迫平民入教，不入教的不让在村里住。在朱家河战斗之前，非教民就被迫搬到村外去。教会的侵略势力激起了广大民愤，它同附近各地的村民形成了严重对立的局面。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武修和尚就曾号召义和拳进行反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他把从献县、交河和景州各地招来的义和拳先聚集在刘八庄，烧了该村小教堂和小油房教民房屋，然后去攻打朱家河教堂。可是这支战斗队伍行进至许高时，武修和尚在冷不防备的情况下被清军诱捕。”

武修和尚是怎样被“诱捕”的呢？据说是在12月18日那天“正在路上行军的时候，忽然有两个官兵跟上来，问哪个是大师兄，武修从车上跳下来，说：‘我就是’。一个官兵就向他施礼，另一个官兵就把武修搂住逮着了”。

参加这次战斗的本来有拳民“千余人往攻朱家河大教堂”，他们在武修和尚被诱捕、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仍然奋起同清军作战，有“三十余名”阵亡，“七八十名”被捕。清军统领梅东益把情况说成是在战斗中“将武修拿住”一事

同上书，第474页。

林学城：《直东剿匪电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58页。按《源流考》指当时吴桥县令劳乃宣所辑之《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此书主旨在诬蔑义和拳为所谓“邪教”，力主镇压。据说，“劳乃宣素奉天主教”，“县民祈雨，恭请关圣神像，求其拈香；伊不行礼，反将粪桶加于冕旒之上。民恨刺骨，久旱不雨，皆云该令辱神所致”（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4页）。

林学城：《直东剿匪电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60页。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第110页。

林学城，前引书，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58页。

同上书，第63页。

《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1期，第160页。

似不可信。因为他在头一天还同武修有联系，“再三派人开导”。 实际上他是利用拳民“助清灭洋”的旗帜，搞阴谋来把武修诱捕的。对武修一边施礼，一边搂住逮捕的情况，与山东马金叙计诱朱红灯和擒获心诚和尚的故事，相去并不甚远。武修和尚被诱捕后，与其徒弟成章和尚等均于1900年1月初遇害。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着拳民坚持斗争，继续前进。

第二节 冀中和京畿附近的发展阶段（1900年1—6月）

紧跟着义和团在冀、鲁边区的起义，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在冀中和京畿附近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1900年1月起，直到6月进军京、津为止，大约经历了半年光景，比起上一阶段的一年零两个月来，快了将近一倍的时间，运动显示出以加速度的形式正在蓬勃发展。

一、各地设厂、练拳毁教与任丘梁召镇之役（1900年3月）

义和拳在冀、鲁边区的起义为他们在冀中和京畿附近的发展创造了充分条件。在上一阶段中，拳民活动的主要地区基本上是在直隶省的冀州、广平府和河间府南部数县以及山东省的东昌府、临清州和济南府东北数县境内。在这一阶段中，拳民们的活动范围就扩大到京畿附近，即顺天府各州县和冀中各府州县了，它们包括天津府、保定府、正定府、顺德府、赵州、定州、深州和河间府北部数县的地区。当然，原在冀鲁边区的拳民仍在继续活动，坚持斗争。

实际上，在第一阶段中，冀中和京畿附近的某些地区就已经闻风而动了。比如说，在1899年春，北京就出现了所《南苑三台山、神字三百六十》的揭帖，其中说道：“不使金银钱了，不使铜铁钱了，不使当十钱了。……乾坎刀兵滚滚了。……有仇报仇有冤的报冤了，西北真主当值了，神仙发了难全现天书了，东方明星出现了，饥荒年来了，要过太平年了。”揭帖中表现了人民对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清政府统治下的通货膨胀，年年闹饥荒的情况深致不满，预言乾字拳会和坎字拳会的义和拳要动刀兵起义，要让老百姓快过太平年了。此外，在1899年秋，保定已有拳民“纠众树党”。1899年冬，天津府静海县独流镇、保定府雄县张冈村、新城县板家窝村都出现了村民习拳的现象，其中有的师父还是从山东请来的。

到了1900年春、夏，冀中各府州县和京畿附近，基本上都先后设厂练拳毁教，形成了义和拳反洋教斗争的高潮。我们拿1900年1月清政府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们当时已“风闻津、保、正、赵所属，亦有暗迎拳师立厂之事”。“正定、赵州所属州县，多有拳场”。天主教驻北京副主教林懋德（Jarlin, StanislasFrancois）的信中说，保定府“新城境界东马营等村，拳‘匪’甚伙，夜聚明散，习演‘邪术’，潜谋不轨。虽屡经地方官出示晓谕，严行禁止，无如伊等置若罔闻，愍不畏法，约定十二月十七日（即1900年1月17日——引者）起事，毁教灭洋。若不及早扑灭，势必遐迩附和，纷

林学城：《直东剿匪电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63页。按梅东益及其营官范天贵在这次战役中“杀死无辜多名，抢掠二十余村”，因此有民谣说：“遇著梅东益，家家没饭吃；遇著范天贵，家家都是会”。“道路传播，众口一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4页）。

林学城：《直东剿匪电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63页。按梅东益及其营官范天贵在这次战役中“杀死无辜多名，抢掠二十余村”，因此有民谣说：“遇著梅东益，家家没饭吃；遇著范天贵，家家都是会”。“道路传播，众口一词”（《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4页）。

陈振江、程歆：《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李杓：《拳“祸”记》上册，第48页。

纷效尤，益无底止”。几天后，山东巡抚袁世凯来札又说，义和拳1898年10月首义的领导人之一阎书勤现在“邱县之吴家寨、长屯一带，聚二三百人将赴冠县之梨园屯滋事，并传闻，约东路‘匪’众千余，到齐举事”。1月上旬，义和拳“李洛单等，由冀州至（赵州宁晋县）南孟庄，聚百余人”，宁晋知县胡锡纶“亲往驱逐，不退，仍械斗”。1月19日，赵州知州孙传栻派员会同胡锡纶等“前往南孟庄、曹庄、孟庄桥、史家嘴各拳场，……劝令解散。三日内，……惟南孟庄五六十人，执迷不散”。1月22日黎明，正定镇总兵董履高亲督队伍“抵南孟庄，该村竟敢鸣锣聚众，……该‘匪’等仍在庙内舞刀，……‘匪’拒捕，刀伤”清军马勇4名；“‘匪’首道士薛明有，‘匪’目赵新德，供认掌‘伪’令不讳。……现深、冀、景等处，兵力较重，此辈皆向西趋”。拳民们这时都纷纷向冀中各州县去设立拳场，而清军在深、冀、景等处已经“不敷分调”，他们已经处在拳民包围下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1900年二三月间，拳民们设厂练拳的活动已经从冀中各府州县发展到京畿地区的顺天府各州县了。在顺天府霸州，“一九〇〇年二三月间义和团即‘传布几遍全境’”。3月间，顺天府永清县出现了拳民的活动。直隶总督裕禄说：

“据英（驻天津）总领事贾礼士（Carles, WilliamRichard）来函，以接北京教士来信，转据现赴永清县教士函称：县属陈家庄见有揭帖，系杜贵林‘捏造诬蔑’教堂，请飭拿办。并称该县所属一带，立有拳厂，请派兵驻扎。”

4月天津天主教总堂的传教士在给法国领事的密信中说，顺天府大城县“情况很紧，现在骚乱的消息仍不断传来”。那里“练拳之人甚伙，甚至将总督告示撕毁，各地还出现反对教徒和反对洋人的揭帖”。“目前，义和团正在向天津流动”。至于冀中各地，这时期实际上已处于拳民甚众、拳厂林立的阶段。拳民们的活动不仅在广大城乡、外国教堂林立之处，并且已经发展到了铁路沿线附近。裕禄说：

“接据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GuyGeorges）称：接其本国驻京大臣电开：据有人禀称，保定北境离铁路十余里之定兴县地面，现有拳‘匪’党羽，势将‘蠢’动，祈为转请北洋大臣，设法务保平安。”

裕禄对义和拳的对策，照他本人说是“办理要义，当以解散胁从，捕除首‘恶’，使知法有可畏，方能敛迹”。他派提督梅东益，候补道张莲芬二人“驻景州”，拥重兵，就为的是“速弭巨患”。实际上，他这番话完全是纸上谈兵，拳民们继承了他们过去对进攻清军反击作战的传统精神，又接受了反动派耍阴谋把朱红灯、心诚和尚和武修和尚等诱捕加害的血的教训，现

梅东益、张莲芬：《致裕禄电》（1900年1月16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76页。

正定镇董履高等：《致裕禄电》（1900年1月25日），见同上书，第79页。

裕禄：《致按察使廷雍等电》（1900年1月14日），见同上书，第75页。

梅东益：《致裕禄电》（1900年1月21日），见同上书，第77—78页。

裕禄：《致梅东益电》（1900年1月14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75页。

正定镇董履高等：《致裕禄电》（1900年1月25日），见同上书，第78—79页。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第121页。

裕禄：《致中协张士翰电》（1900年3月27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88页。

《义和团运动在盐山地区》，见《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137页。

在他们不再上当受骗了，也决不向清政府交出首要了。1900年3月中旬在河间府任丘县爆发的梁召镇之役可为明证。

3月12日左右，河间知府因“任丘拳厂林立，前往督县劝禁。讵至县属梁召村，有拳厂不服查禁，持械竟欲伤官。千总向前保护，受伤甚重”。16日，梁召拳民“千余人，在彼暗为盘踞”。他们在“拒捕”后派出“四人说合，拒捕之事，仅可赔礼，不交首要，势甚猖獗。声言：即官兵来，惟有打仗！等语”。因此，梅东益认为“非用兵不可”。他同张莲芬等于18日率领马队一营、步队两哨去任丘，3月21日爆发了梁召镇之役。这次战役，据当时外电报道，是以清军大败、义和拳胜利来宣告结束的。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3月27日——引者），天津来电云：练拳会‘匪’，近在天津南面六十英里之某处附近一带，甚为鸱张。派往剿办之华兵，业与该‘匪’等交锋，闻华兵被杀甚多（译香港西报）。”“闻官兵在河间府属之任丘县内，与义和团‘匪’曾开仗一次，官兵为其所败，统带官受伤甚重，兵士亦被杀多人，知府亦受刀伤。并闻该‘匪’等与天主教中人亦曾接仗云（译京津时报）。”

但据梅东益的报告，却只说梁召来了保定府之雄县、新城县、容城县与顺天府之涿州等地拳民“三、四千人，占聚梁召，固结不散。声称：官军往捕，即行拒敌。尚无滋事情形”等等，对他的战败一字不提，只说“若即用兵，伤人必多”，“如肯解散，再当会县密拿伤弁要犯”等等来搪塞一番罢了。

到4月20至21日，保定爆发了清苑教案，它是由教民挑衅引起的。据清苑县知县陈鸿保调查，系姜家庄教民借庄民张洛弟钉火镰细故，而提出四条无理要求：“一、罚席五十桌；二、罚修教堂；三、要京钱百吊；四、要张洛弟全家奉教”。因而引起20日的姜庄“拳民与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21日，“有白帽、白衣教民开枪骂街，放伤张姓三人，枪毙张麦收一命；村人不平，聚人找至姜庄教堂，教民升屋开放枪炮，放毙二十余人，并自焚教堂之半，及教民房屋十一间”。结果，法国天主教驻京总主教樊国梁（Favier, Alphonse Pierre Marie, Mgr.）却倒打一耙，反诬拳民数千，齐赴姜家庄，“与教民寻衅，抢夺财物”，并派副主教林懋德到保定查办。裕禄明知他们理屈护短，却致电按察使廷雍等“务与林副主教和衷商办一切”，其目的仍在查拿拳民首要。实际上，个中情形帝国主义者是很清楚的。据英使窦纳乐说：“法国领事卡拉德（M. du Chaylard）在四月二十二日通知我，他得到保定来电说，前一天在 Lunglu（？）近郊的

裕禄：《复两司（廷杰、廷雍）电》（1900年2月18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81—82页。

同上书，第76页。

梅东益等：《致裕禄电》（1900年3月12日），见同上书，第84页。

梅东益：《致裕禄电》（1900年3月17日），见同上书，第85页。

佐原笃介等：《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107页。

同上书，第108页。按《京津时报》（ThePekingandTientsinTimes）系1894年3月创刊，当时为周刊，至1902年10月1日始改为日报。

梅东益等：《致裕禄电》（1900年3月23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88页。

廷雍等：《致裕禄电》（1900年4月23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94页。

同上书，第92页。

姜家庄有大批教民被杀。两天后他又告诉我，这次骚乱确实利害，但只有一个教民丧命，而拳民却有七十人被杀。他又说，天主教听我的劝告，把枪分发给教民。”看来把一个教民丧生说成是“大批教民被杀”，无非是为了把武器分发给教民作借口罢了。

帝国主义者这种倒行逆施，企图利用武装教民来打击拳民，结果只能激起义和拳运动的更加高涨。

二、拳民运动的高涨，涑水石亭镇之役与涿州城之占领（1900年5月）

1900年5月23日（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拳民抗击清军的涑水石亭镇之役和5月27日（四月二十九日）的进据顺天府涿州城，标志着义和团在冀中和京畿附近的发展阶段中的高涨形势。前者击毙了清军的高级将领、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后者则是拳民活动基本上由乡村过渡到城市的开始。

涑水石亭镇之役是在该县高洛村和定兴县仓巨村拳民反洋教运动的基础上导致的。定兴、涑水之有拳民，始自1900年2月前后。一篇《纪略》论述其事说：

“吾邑（定兴县）之有义和拳也，自今年正月月中旬，由新城之沈各庄传习而来。始因仓巨村天主教民欺凌善良，霸占公产，官不能申理；百姓控诉无门，始习拳以敌。数十日间，蔓延牛家庄、老李村等村。近又传染东江村、石柱等十数村。涑水亦有之，禁不胜禁。县公罗顺循履任，即倩余作函，传谕合境遵旨，劝禁不能止，幸亦不抗官祸民。”

先是，在义和拳尚未传入时之1899年2月，涑水县高洛村（与南面之定兴县二地距离甚近，仅15华里）一些教民在安肃县安家庄总教堂席教士的布置下，诬蔑村民“阎老福毁教堂。省城窦教士挟清河道，压涑水令高拙园押阎老福等六人以酒筵款教民张姓，乞怜罢讼；而教民索赔万金修教堂，并令老福等跪门筵酒赔礼。上宪日以函牒数四，催令结案，不问是非，不准稍延。高公计无所出，幸赖该县商人，有与京城总教士熟识者，极力排解，令老福赔银二百五十两，设席二十余筵，并赴安家庄总教堂叩头陪礼始了。高公因此获咎，教民益横”。自1900年2月“义和拳流传至涑”，阎老福“意在借习拳”以“雪其耻”。由于高洛村“拳民积忿太深，一日之间，飞帖”邀请定兴、新城、涿州、易州、涑水各州县拳民，于5月11日夜穿过定兴县城。12日傍晚，“申酉之间，风霾昼晦，义和拳聚众数百人”，攻打涑水高洛村教堂；县令祝芾，亲往弹压，几被拳民“砍伤、踉跄遁归”。13日，拳民移得胜之师，前往攻打定兴仓巨村教堂，“烧杨老和等房十数家，未杀一人”。据主教樊国梁说，由于高洛村和仓巨村的反洋教斗争，教民“逃难来京就食者，男女已占满堂院”，并为“安肃县安家庄”教堂告警，又说

同上书，第94页。

裕禄：《致廷雍等电》（1900年5月10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98页。

《英国蓝皮书·中国》，1900年第3号，第二七三件附件二，转引自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170页。

艾声：《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444页。按涑水在定兴县西北，定兴有义和拳在1900年2月中旬，涑水亦当在2月前后。引文中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他“现闻宣化府属延庆州、京东蓟州、邦均、宝坻、丰润以及天津等处，拳‘匪’甚伙，均皆预备起事”，让裕禄“严饬查办”。

其实，裕禄早已在5月14、15两天，派道员张莲芬、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副将王占魁等分别率领马队前往涞水、定兴弹压，“并抽拨淮军右翼一营驻扎高碑店，以资镇慑”。5月17日，杨福同率军至高洛村，“查无”拳民，“傍晚回城。詎料该村邀来外‘匪’二三百人，分为两段：一伏史各庄南路旁沟内，一伏高洛西北路旁，欲乘我不备，前后夹攻”。杨福同发现拳民，“即令弁勇开枪”，致使拳民伤亡不少。他们在撤退时，“回头誓曰：‘必得杨某而后甘心’”。18日，杨福同又杀拳民“十数人”。拳民们在这种情况下，撤至涞水县石亭镇，与该处拳民及涿州来的拳民会合，声“势甚大，约三千人”。杨福同闻讯，于22日晨“带马步六七十名”，赴石亭镇“剿办”。他在这里碰上了3000多拳民，“装束大非昔比，巾带皆红色，衣紫衣”，杨“领兵直前”，拳民“复退去，盖诱兵计也”。杨“不悟，追过村落深处，伏发，马惊窜”，遂“中枪刺伤胸部，急以刀抵格，而第二枪已中喉，不可救矣”。这个疯狂屠杀爱国拳民的刽子手杨福同，活该落到“困于山沟，落马阵亡”的下场。这就是1900年5月22日的涞水石亭镇之役。

拳民们在石亭镇的胜利为5天以后占据涿州城创造了必要条件。他们为胜利所鼓舞，“其势更盛”。5月25日，武卫前军左路统领杨慕时“率领步队三营前来驻扎高碑店铁路左近，伊时据探报称，‘匪’尚团聚陈家庄、石亭一带，众约数千。领队者，为房（山）、涿（州）拳师密熏和尚，并道士两名，曾在石亭左右亮队操演”。到27日，拳民遂一面进占顺天府涿州城，一面“焚毁涿州铁桥，又放烧高碑店长辛店铁路车站”。“闻烧高碑店时，左近村民，皆按户出给秫秸一束，外糊黄纸，蘸以火油，每人手持一把，点火飞传”，“故顷刻传集，易兆焚如”。

涿州“为咽喉要地，北卫神京，南系直隶全省”，乃“京师门户”，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在27日被占以后，立即成为“各团拳民麇集之区”。“一时黄巾红带者流，城厢内外，蜂屯蚁聚，其数达三万人。声言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由是城墙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如将有敌者然”。他们“竖旗起事，大书‘兴清灭洋’”。“四门上下高树旗帜，把守甚严，居民出入皆须搜查”。5月29日，他们又“将武卫前军马队左营

同上书，第448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同上书，第448、449页。

总署：《致裕禄电》（1900年5月17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05页。

裕禄：《致总署电》（1900年5月17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06页。

佐原笃介等：《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114页。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10页。

佐原笃介等：《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114页。

艾声：《拳“匪”纪略》，见同上书，第452页。

作者佚名：《遇难日记》，见《义和团》（二），第102页。

祝蒂：《禀裕禄》（1900年5月29日）。见《义和团》（四），第378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8页。

同上书，同页。

管带聂汝康、差派前站看店马兵张锡恩等十七名，因见所穿窄衣小帽，疑是洋兵，全行扣住”，“踞城自卫，尚无骚扰衙署、居民之事”。杨慕时在其派去的17名奸细被拳民抓获后，于5月31日气急败坏地说：“涿州城不失而失，城门启闭，概由拳‘匪’，办公之人，不得入城；城内文武，具文而已。此外松林店为大宗，余则无处不有，穿起衣巾则为‘匪’，脱去衣巾则为民，至于不可究诘。论者谓其党二三千，附和者且一二万也”。拳民烧毁铁道，本“不必纷拥而来，村庄人民间立道旁，即可举火，防不及防也。马队被捉十七人”，遣人前往说项，“百说不成，只得作罢”。“十七人现留参将署中，军装马匹，亦具在是，不知日后如何也”。杨慕时承认他已处于爱国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能区别他所谓的“匪”与民，保护铁路已经防不胜防。但是，他仍然要同爱国人民对立到底。

拳民们从5月27日占据涿州城之日起，即开始烧毁电杆、铁路、桥梁。到5月底，他们已把卢保铁路涿州以北到琉璃河，以南到高碑店的百余里铁路拆毁，把沿线车站、电杆也加以焚毁；甚至“津卢铁路卢沟桥车站”也被毁，又至丰台，有千余群众参加，“纵火先毁制造厂，次及库房、材料厂、车站、机车房，以及客车、机车、敞车，陆续被毁”。拳民们这个行动，在当时情况下，乃是必要的；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占据涿州城，即使占据也不可能守住。他们所有的只是那点简陋的武器，他们是不能用血肉之躯去同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聂士成武卫军作战的。不这样做，他们就不可能在6月份大队拥入京、津，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拳民们这样行动是无可非议的，难道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不是也曾采取过同样的手段来抵抗过日本侵略军和蒋介石反动武装的进攻吗！

三、时局急转直下（1900年5月底—6月初）

1900年5月下旬义和团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造成了拳民运动的高涨，使整个时局急转直下。从此时开始，直到6月中旬，有的人把它看作是“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十日之危机”。这种形势，无论在帝国主义列强方面，还是在屈服于列强瓜分要求下的清政府方面，都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是他们事先所不曾估计到的。

首先，在帝国主义列强方面，我们知道，他们这时正在忙于如何使酝酿中的第三次瓜分危机付诸实践，并且，在他们看来，瓜分已成定局，问题在于如何解决列强领土要求本身之间的矛盾，如本书第六章中之所陈述，而不在于中国方面。因为清政府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的五六年中，一贯屈服于列强在各方面的让与权的要求，那是有目共睹的。至于中国人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瓜分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斗争，在帝国主义列强看来也是不足挂齿的。尽管在1899年义和团已经在冀、鲁边区活动，同年10月2日在上海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中已有“‘义和拳’（Boxers）的英

柴萼：《庚辛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06页。

《石涛山人见闻志》，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74页。

张士翰：《致裕禄电》，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37页。

杨慕时：《上聂士成书》（1900年5月31日），见《义和团》（四），第339—340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文名字的第一次出现”。但是，“不管怎样，欧洲在一八九九年的一致看法”依然“是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实体马上就会消失了，需要瓜分她和宰割她”。

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对瓜分中国的前景充满乐观，主要在于清政府不仅对于他们勒索让与权予取予求，并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清政府对中国人民反瓜分的爱国斗争的镇压。我们知道，在中国人民的反瓜分运动中，特别重要的有三大派：一派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派是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一派则是早已散布在中国城乡各地的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并在这个基础上于1898年出现的义和拳运动。如今，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的反瓜分运动，都已经相继被清政府镇压下去。1899年12月20日，清政府又下令对维新派穷追迫害，认为康有为“有只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认为他们“往来信函有谭嗣同堪备伯理玺之选”等等，并以此为借口下令“悬赏购线，无论绅商士民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者，定必加以破格之赏，务使‘逆’徒明正典刑，以申国宪”。清政府这样倒行逆施，只能起到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结果而为帝国主义列强所耻笑。至于革命派，那就更不用说了。同年12月22日，孙中山先生在《支那现势地图跋》一文中，“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而回天无力，只能发出“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的沉痛叹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能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反瓜分斗争的就剩下义和拳运动和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了；但是，由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于1899年12月26日到济南任山东巡抚，同直隶总督裕禄一起，准备对活动于冀、鲁地区的拳民大肆镇压。

帝国主义列强面对这种形势，自是高枕无忧。不过，义和拳运动和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不因镇压而走向低潮；相反地，他们却更形高涨。对这一情况略有所知的英国在华报刊曾对此有所报道。但是，在上海的德国机关报《德文新报》（Der Ostasiatische Lloyd）却撰文对此大加反对。1900年3月20日的《柏林邮报》（the Berlin Post）把《新报》上的这篇文章加以转载。该文抗议在上海的英国报纸“传播关于中国事件的极不可信的谣言，其性质是要使欧洲的人民相信，中国不是即将发生革命，就是她的政府制度将要全面崩溃”。这篇文章继续说：

“人们完全能够笑着来谈论全部的事情，不管问题是否有其最严重的一面。恰好在上一两周内发表在最可靠的报上的这篇报道，已经给整个中国居民，特别是那些对清朝和他们国家的政情没有什么了解而对欧洲人的报告却绝对信赖的商人们以不可磨灭的深刻的印象。

“这篇野狐禅的电讯一到欧、美，就一定会影响到中国股票的价值，特别是影响到我们国内市场上的对中国现状的信心。

“英国机关报知道他们态度的这种效果吗？”于是，“欧洲的政治家们毫不关心中国人民的民族渴望，他们也不怕这个‘东亚病夫’能够对瓜分他的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7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01页。

珀塞尔：《义和拳起义背景研究》，第182页。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39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454页。按伯理玺（president）即“总统”一词之汉译。

财产会予以真正的反抗”。 “欧洲完全受到那种根据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和窃据清帝国领土易如反掌的情况所推断出来的表面估计的影响，已经听不得反面意见了”。

1900年5月19日，天主教主教樊国梁在拳民的反洋教运动的威胁下向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形势日益变得严重和危险。……仅北京一地，就约有四百名逃难的男、女和儿童安置在我们这里和修女会那里。……北京已被团团围住，拳民们日益接近京都，他们沿途若有耽搁，也只是为了要对所有的教民居留地进行破坏活动。请你相信我，公使先生，我是十分熟悉情况的，而不是信口开河。……拳民们打算以袭击教堂开始，以攻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我们这里北堂的日子也已经真地定了下来；全城都知道这件事，大家都这么说，民心显然激动。……公使先生，我不想谈那些贴满全城、反对欧洲人的数不清的揭帖的内容了；每天都不断出现新的、更加露骨的揭帖。……在这种情况下，公使先生，我认为有责任请求你派四十名或五十名水兵到我们这里来，至少到北堂来，以便保护我们的财产。”

但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却认为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他在5月21日致索尔兹伯里的报告中认为，樊国梁的信只不过是“法国神父们的丧气的预测”，北京欧洲人的处境还不致于那么“危险”。不过，在5月22日的石亭镇之役和27日拳民进占涿州城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看来，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形势突然转变了。同一个窦纳乐到5月29日就马上改口了，说什么“这里的局势严重”。到30日，他又说：“此时局势极为严重”，“现在的问题是这里欧洲人的生命财产正处于危险中”。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列强经常说的“中国人像所有的东方人一样，都不尊重论据而尊重武力”。这句话，业已成为他们的口头禅，用来作他们军事侵略中国的借口。就上述情况来看，这话说的正是他们自己。没有拳民们的军事胜利，他们怎样也不会深感局势的严重的。

其次，在清政府方面，情况也是如此。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已经闹了几十年，总是被镇压下去。想不到星星之火，如今竟成燎原之势。5月27日涿州失守后，28日拳民就“已到丰台”，“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房屋，均有”拳民“蜂起焚烧”。拳民势力已经迫近北京南郊，使清政府感到“情势危迫”，不得不对所谓的“剿、抚”问题最后表态决定了。

“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7—188页。按此时革命党人自谢缙泰于1897年7月绘制《东亚时局形势图》及其《题词》以后，在宣传工作中很重视舆图。孙中山先生在此跋中还说，此图对帝国主义列强“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惊心云”（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8页）。又孙先生诗系引用陆放翁《剑门城北回望剑关诸峰青入云汉，感蜀亡事慨然有赋》中的两句诗。

《英国蓝皮书·中国》1900年第3号，第25件，转引自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85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79页。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85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1901年英文版，第56—58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1901年英文版，第58页。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第21页。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第21页。

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论十年之朝局”。这个说法如果只就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皇朝的某些动向来说，并结合着列强瓜分势力之深入到干涉皇位继承，把它作为伟大的义和拳运动的一幕插曲来看，还是反映出了某些值得注意的现象的。所谓“已亥建储”，指的是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用皇帝名义下的一道诏书：“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封载漪之子溥漪为皇子”，即大阿哥，准备把光绪皇帝废掉。我们知道，废君之事早在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以后早就提出来了，“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中未尝稍释，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卒行”。由于列强的干涉，引起了慈禧太后和主张废立的亲贵大臣们的不满，正好这些人中大部分又对义和团主“抚”，其间当然会有一些个人恩怨掺杂在一起。但是，把拳民起义主观主义地说成是“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遂利用之，以发大难”的结果，这才真是“隔靴搔痒之谈”，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拳民起义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而不是为了拥戴大阿哥登基，在当时情况下，说到底如果根本就没有这幕插曲，拳民起义也照样是会蓬勃发展的。

事实是，尽管清政府面临危迫的情势，他仍然决定围剿拳民，孤注一掷，以求一逞。1900年5月29日的上谕说：拳民“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就是“乱民”；“著派出之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直隶总督裕禄的办法是三面围剿，在他6月2日《复总署电》中说：“筹办之法，总须抽拨劲旅两支：一由东安赴永、固至涿州，自北而南；一由津取道文、霸、雄一路至省，自南而北；联合已扎涑、定之营，三路兜截”。他们围剿的结果怎样呢？在拳民浩大的声势下，武卫前军先锋队统领邢长春只能株守在保定，武卫前军左路统领杨慕时率军于5月31日由高碑店到定兴城也被迫撤回。他们除了诱击一些拳民和百姓外，实际上已经处在义和团的大包围中了。6月4日晨，拳民袭击黄村车站，清军“伤亡八十余名”，清廷命武卫前军统帅聂士成亲自出马。聂于6月6日中午“乘火车将至廊坊”，拳民“持旗械列道旁抗拒”，“当即退至落垡调队筹备”。下午，拳民“数千来扑”，“先烧铁路，断电线，四面包围”，激战“二时余”，清军“伤损数十人”，拳民“百余人”牺牲，京津铁路中断，聂士成只好退回杨村。在此前后，清廷对于愈聚愈多的拳民，还曾经命武卫后军统帅“董福祥以甘军平之。董复以不能杀此老百姓、苦娃娃为辞；内外交讷，而后有失和攻打使馆事”。

事情已经很明显，清政府不是不“剿”义和拳，而是他“剿”不了；形势又如此危急，那么他到底怎么办呢？5月29日，慈禧太后曾调兵两营保卫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77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03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7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465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7页。

同上书，第47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06页。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47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9页。

颐和园驻地。6月2日英使窦纳乐“从权威方面了解，慈禧太后准备逃往西安府，因为义和拳对她本人采取了敌对的示威行动”。特别是当时，人人都说拳民是“义民”，“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狡诈阴险的慈禧太后面对这种形势，如果逃往西安的话，那么“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于是她采用了顺天府尹赵舒翘和何天莹的“因势利导”的办法，于6月5日派他们两人前往涿州，宣布晓谕，准备实行改“剿”为“抚”的政策。次日，她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去谈判。

清政府准备对拳民实行改“剿”为“抚”的政策实质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清政府围剿失败后的一种权宜之计。根据赵、何两人的奏折来看就是“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至于拳民当时情况与双方谈判情形，刚毅在1900年6月14日的奏折上说：

“奴才……于次日（1900年6月7日）已刻由京启程，自芦沟桥以南，沿途查看，拳民三五成群，所在皆有。……各乡村镇，均设有拳厂，声言灭洋，……市面买卖照常，尚无骚扰。闻拳民等所食，仅小米粗粮，不茹荤酒，持戒甚严。琉璃河左近，聚集甚伙；涿州逼近涑水，麇集尤多。……其幼稚者，年不过十岁上下。奴才在马上讯其练拳意欲何为？供称原为保护身家。讯其聚众欲作何事？供称近被教民欺压，是以集团报复。但一言及洋人，则怒目切齿，愿得甘心；呼洋人为毛子。因聂军之装束，近似洋人，便呼曰二毛子，持刀相向，势不两立。……凡此之类，闻直隶、山东各州县，无处无之，蚩蚩之众，诛不胜诛，……断无轻于用剿之理也。……十二日（6月8日）由良乡起程，途次闻涿州拳民，因聂士成派队在……高碑店驻扎，拳民等误为洋兵，遂相抗拒；经该军饬人晓谕，该民等跪迎，聂军出其不意，轰毙拳民一二百名，自此结仇甚深。该军进剿，殊形孟浪。……是日午刻，行至窦店，与臣舒翘，臣乃莹相遇，细加斟酌。臣舒翘回京面奏，请撤聂军。奴才当约同臣乃莹，驰赴涿州。……惟该拳民等，因初九日高碑店伤毙拳民太多，疑惧不肯撤厂。”

拳民一方参加谈判的是“拳魁两僧人，红巾黄带，服色离奇。曰：‘须先退兵，且高碑店无故杀我多人，何以偿我云云’。”刚毅要“解散”拳民是作不到的，且拳民依据过去血的教训，不能轻于相信清政府的诺言，同时调“涑水、定兴一带老团，复来四千余人，屯聚涿州南关”。经过了大约一个星期的谈判，刚毅于6月16日回京，言拳民“不能解散”。由此可见，刚毅涿州之行的结果有三：一是确定了清政府对拳民的改“剿”为“抚”的政策，这个“抚”也不是像过去那样是以“解散”拳民为先决条件的；二是撤退了聂士成的在围剿中失败的武卫前军，使其不再为侵略中国的外国教

聂士成：《致荣禄电》（1900年6月7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75页。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一），第348页。

《英国蓝皮书》，第24页。按恽毓鼎在《庚子日记》中亦谓“风闻奎舆有西幸之说”，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0页。

慈禧：《述出宫情事》，引自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436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0页。

同上书，第137—138页。按柴萼《庚辛记事》谓赵舒翘曾参与拳民谈判事，实误（见《义和团》（一），第306页）。

艾声：《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456页。

会效犬马之劳；三是为大批拳民进军京、津，同正在准备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展开斗争提供了较好的比较顺利的条件。

第三节 义和团在斗争中蓬勃发展的原因

举世震惊的义和团运动，自 1898 年 10 月由赵三多、阎书勤等领导，并以义和拳名义首次发难，实行武装起义以来，中经在冀、鲁边区和在冀中及京畿地区的两个发展阶段，到 1900 年五六月间，竟然兵临京、津城下，使猖狂一时的帝国主义列强感到局势极端严重，也使一贯屈从于侵略势力的清政府不得不改“剿”为“抚”，取得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光辉战果。这段期间总共为时不到 18 个月，即大约一年半光景，拳民们在这样一个短时期中，在列强侵略势力和清政府反动统治势力都比较集中和强大的直隶、山东两省，竟然在同外国教会侵略和清军围剿的斗争中蓬勃发展并茁壮成长，实在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义和团运动如此迅速蓬勃发展的原因何在呢？大体看来，约有以下三点：即义和团运动集中地代表了中国人民反瓜分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得到了全国各地城乡人民的广泛响应和支援；此外，它本身又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特殊的农民起义运动。下面我们准备分别论述一下这三点原因。

一、中国人民反瓜分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代表

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义和团运动是在中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反洋教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反洋教运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统治的运动。义和团运动则是在这个基础上把它扩大到反对清军的镇压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因而成为反洋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的最高阶段。反洋教运动本身已经初步具有近代中国人民“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这种性质在义和团运动中就表现得更加清楚了。所以毛泽东同志把义和团运动作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的一个例证来表现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义和团运动无疑地集中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民反瓜分的爱国主义精神，毛泽东还严正指出：“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瓜分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是遍及各阶级、各阶层，甚至封建统治阶级的部分文武官员中，也不乏主张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爱国人士。当然，其中的主流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康有为领导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等三大派。但是，自革命派和维新派相继被清政府镇压，赵三多、阎书勤等领导义和拳首义以来，这时能够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相对抗的就剩下义和团运动，由它来集中代表中国人民反瓜分的爱国主义精神了。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38 页。

见《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46 页。

参阅拙文《中国人民反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见《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 页。

义和团运动所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先是由拳民们所展开的反洋教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数十年来的经营，中国不仅通商口岸，并在内地城乡，到处教堂林立。凡是教堂林立之处，即是“基督教殖民制度”建立之区，也就是所谓“教案”不断爆发之所在。为什么有教堂的地方总是不断爆发“教案”呢？当时的一般说法是“民、教不和”。为什么“民教不和”呢？因为“教民亦民也，乃与平民争讼，到堂，平民长跪，教民则不跪；居乡，平民有差徭，教民则无差徭，平民有厘税、杂派、酬神、演剧等费，教民则一概全无”。这就是说，在中国广大城乡，凡有教堂之处，就存在着两种身份、地位和权势都极不相同、差别很大的人群，即有权有势的教民和被他们任意欺侮剥削的平民。他们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势不两立、一触即发。当这种矛盾爆发以后，谁来解决呢？名义上是清政府的地方官吏，实际上却是在后面支持教民和挑起争端的外国教会和传教士。清政府的地方官吏，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只能唯传教士之命是听，根本不能持平办理。“近来遇有民教争讼，地方官稍欲持平，教士已登堂恐喝；略不满其所欲，则赴督、抚署恐喝矣，则赴总理衙门恐喝矣。虽欲持平，乌得而持平！”不仅不能持平，并且经常是倒打一耙，任意处置中国人民，判死刑的判死刑，判徒刑的判徒刑，有时地方官还受处分，赔款动辄数万两到数十万两，均由地方来负担。试看各地“教案”，基本上大都是用这种办法来“结案”的。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就生活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里，有冤难伸，有国难投。他们之所以积怨于外国教会、传教士和教民，决不是偶然的，也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遍及全国的人民大众对教民、传教士和外国教会，义愤填膺，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主义精神。拳民们所展开的斗争，就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这种公愤。

其次，拳民们的斗争所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反映中国人民的公愤，并且还要深刻得多，它反映了中国人民为保卫祖国领土而斗争的决心。福州英国领事白挨底(Playfair, G.M.H.)在1899年8月说道，中国人民深信，“每一个欧洲人本质上都是一个‘土地掠夺者’(a“land-grabber”)；传教士们乃是他们政府的先锋队；《圣经》是炮舰的确实可靠的前驱；哪里来了寄居的传教士，他就是打算留下来作一个地主的；因此，保卫中国完整的唯一希望在于，她的忠实的儿子们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去毁灭教会这个致命的病菌”。“正如白挨底先生在这里所提出的，如果说传教士被看作是一个掠夺领土的政府的一个侦探或先锋的话，那么教民就会被视为一个正在促成——也许不是有意地——瓜分他的祖国的叛徒。因此，对外国侵略的担忧就经常表现在对天主教和新教教堂的进攻上，那就不是没有理由的了”。

我们试看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等人所领导的首次义和拳武装起义，它本是1869年梨园屯出现外国教堂以来民、教屡经构衅的结果，也是1886年教会拆毁玉皇庙，改建教堂以来多次发生的毁堂建庙、毁庙建堂的结果。这个毁堂建庙、毁庙建堂之间的斗争为什么持续十余年得不到解决，并且一再重复爆发呢？因为它是一场在以宗教信仰为名的外衣下掩饰着的外国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26页。

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3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3页。

教会与中国人民之间关于土地占有权的斗争。我们知道，中国的寺院庙观，一般都拥有大小不等的土地财产的。我们还知道，自 1858—1860 年的中国和英、法、俄、美等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关于所谓《传教宽容条款》（the so-called “toleration Clause”）的规定：允许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发展组织，吸收中国教民，并可任意“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到 1894 年，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又搞了一个发给全国各省主教或副主教的《执照》，内称“自此以后，某某在某某省内来去传教居住，无论何处租买田地，建造天主屋宇，均听其便，丝毫不可留难”。1899 年 3 月，清政府又被迫授予外国传教士以官衔。这些措施都使外国教会在所谓“到处租买田地”的活动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势和便利。

其三，根据上述情况，自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外国教会为了配合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形势的日益逼近，他们也加剧了教会的侵略活动。这些活动除了我们在上编有关章节的叙述，如制造瓜分舆论和为了强占沿海港口蓄意搞教案作借口外，看来所谓“租买田地”的活动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无独有偶，不仅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在四川大足县爆发的余栋臣起义，同样也是毁庙建堂、毁堂建庙的多次斗争的结果；这样一个事实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在义和团运动前后，教堂林立之处，中国平民的土地大体上已被教会掠夺殆尽；薪不尽，火不灭；外国教会就进而掠夺庙观寺院的土地了。这可能就是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在发动了反洋教斗争之后，许多和尚、道士也纷纷起来，参加和领导斗争的一个原因吧！他们之中有些是我国武林英杰，这就为义和团运动增加了新的血液。这个保卫中国城乡土地的斗争乃是义和团运动所代表的中国人民反瓜分的爱国主义精神之所在；所以在拳民起义以后，就能蓬勃发展，自非偶然。

二、全国各地城乡人民的响应和支援

从 1898 年 10 月赵三多、阎书勤等领导的梨园屯首次义和拳武装起义以来，直到 1900 年 5 月底形势急转直下之际，在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城乡人民，也都纷纷展开了反洋教斗争，这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的。

在这段时期中，全国城乡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主要地计有：

（一）贵州重安堡教案（1898 年 11 月）

英国内地会教士飞明（Fleming, William S.）于 1897 年来华，到贵州苗族地区传教。1898 年 11 月，他在重安堡（the village of Chungan）被当地群众杀死，引起了将近整整一年之久的交涉。一个英国领事被派到省城贵阳，进行调查；结果，“凶手们在审判后依法定罪，六名官员被撤职，三个绅士被取消功名，并赔款二万二千两”。但是，英帝国主义者并不就此罢休，他要求地方当局负责，认为贵州巡抚王毓藻“犯有纵容的罪，至少也犯有疏忽的罪”，在 1899 年 6 月提出“罢免该巡抚职务的要求”，被清政府拒绝。

《英国蓝皮书·中国》，1900 年第 1 号，第 384 件的附件，转引自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125—126 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126 页。

按 1860 年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中的这几句话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德拉马（Delamarre）利用翻译工作

1899年10月，据报出事地点的头人已被捕获，才算结案。

（二）湖北西南江湖会的反洋教斗争（1898年11月）

鄂西江湖会的反洋教斗争是在余栋臣起义的影响下出现的。“湖北宜昌、施南两府，与川省毗连。自川省余蛮子闹教以来，讹言四起。该两府哥老会‘匪’素多，亦名江湖会，群思效其所为，与各处教堂为难，广播余蛮子伪示，煽惑民心。……本年九月二十四、二十九等日（1898年11月7日至12日），施南府属利川县川、楚交界地方，有‘匪’众数百名，假托余蛮子旗号，扰至该县，将野茶坝，李子槽等处教堂、育婴堂烧毁，并焚掠教民房屋，阖县大扰。……十月十五日（1898年11月28日），宜昌府属长乐县……聚众……焚毁教堂，扰及长阳、巴东等县，杀戮比国洋教士董若望（Delbrouck, Victorin）一名，到处焚掠教堂。……该‘匪’以伪主帅向策安为首，李策卿、李少白次之。……李策卿本系霆军散勇，改装道士，……招众集党，山中会‘匪’闻风响应。长乐县属渔阳关另起李清臣会‘匪’一股，与为声援，旬日之间，众至二三百人，旗上大书‘灭洋’字样。……突至湖南石门县子良坪地方，焚抢教堂教民，洋教士方娄思逃至沅州。……荆州、沙市人心亦颇惶惶，伏莽皆思蠢动”。

（三）全国各地的普遍不安和反洋教斗争（1899年到1900年5月）

“在一八九九年的一整年中，并且持续到一九〇〇年，中华帝国的每个省份都曾经发生过不安、暴动或叛乱；在每一个省份里，教堂都受到攻击，在云南和山东的铁路工程师是在中国的外国人当中唯一不在条约口岸庇护之下的人也受到攻击。在许多省份中，不满情绪甚至采取了对现存政府背叛的方式”。其中重要的有：

1899年1月，“安徽涡阳刘朝栋、牛世修陷义门集，涡河南北纷起响应，众至二万余”。

2月，广东人民在水上起事，袭击外人，引起了香港总督的一分“有力的声明和强硬的抗议”。

3月，“在满洲，发生了一次由驻在旅顺口的俄国当局的行动所引起的骚动。他们窃取了在保留给中国管辖的领土之内征收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地租的权利”，引起当地中国居民的抗议，以此遭到俄国哥萨克兵的枪杀，“中国农民有九十四人被杀，一百二十三人受伤，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

在湖北，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9年3月25日上奏说：“近日湖北风气，

之便在条约的中文本上私自添加的，换句话说就是伪造的；但是，它却被1865年清政府的《法国教堂入内地买地照会》（见《中外旧约章汇篇》第一册，第147、227页），即通称为所谓的《柏德美协定》

（thesocalled“BerthemeyConvention”）所承诺。根据《最惠国条款》，这条为法国天主教取得的特权，随即为其他各国传教士所同享；否则，比如说，“如果美国人所接受的比法国人所得到的少，就会被中国人解释作美国方面的懦弱”（见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73页）。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中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74页。在这份《执照》上所填写的“某某在某省内”是“教士林公（即林懋德）在直隶省内”。又见《樊国梁等函牍》，《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2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4—165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303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9页。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1039页。

动辄造谣聚众，攻毁教堂”，他准备搞团练，“每日于团丁牌长中，择派妥慎者三五人，轮流在于教堂附近巡查，遇有争端，立即解散。教士出外游历，亦由该团丁牌长妥为防护”。总之团练一事，“其力只能戢内‘匪’，若责以械猛艺精，折冲御侮，则臣实不敢为此铺张欺饰之辞”。4月，在山东，德军踞日照，赴沂州，又滋扰兰山，撵逐兰山县韩家村白莲峪等处居民，“焚烧房舍柴草”。在广东，九龙人民反对以九龙归英，“英军武力弹压，击毙多人”。在甘肃和新疆，也爆发了回民起义。5月，在四川，余栋臣又“揭竿起义”。6月，在福建省建宁县，群众将“教会房产烧毁，七个教徒被杀”。在江西南昌也“发生了反教会的暴动，并宣布在二十六日那天把所有的洋人驱出城外”。在云南，“驻蒙自的法国领事馆被乡村的一群人所焚毁，领馆的人员只是空身逃到城里躲避”。7月，在四川省大竹县，发生了反洋教斗争，“有许多教民被害”。在甘肃固原州海城县，有冯百潮等领导的回民起义。8月，在福建厦门，发生了“一次反对日本人的暴动”。在云南昆明，还发生了“一次反对法国人的暴动，街上张贴着揭帖，号召爱国志士起来反抗洋人；住在庙里的法国铁路工程师被赶走”。9月，在广东，以“会‘匪’猖獗，命谭锺麟等剿办”。在湖北，据报在该省西南部，“已经在春季镇压下去的叛乱，计划在一九〇〇年春季重振旗鼓，再次爆发；对于洋人或与他们有关系的人绝不再加宽恕；并以南京作为帝国的首都”。10月，在浙江绍兴府和宁波府，因歉收发生了抢米的“风潮”。在江西广信府的河口镇（今铅山）“发生了一次暴动，内地会教堂被毁”；在饶州府也“发生了一次普遍反对天主教会的起义，教堂被毁，神父逃窜”。在陕西三原县，在1898年底已有“消灭洋人的阴谋”，到本年10月，巡抚魏光燾的离省又给“各秘密会社以起义和攻击教会教堂的又一次机会”。11月，在四川，“据报哥老会用武力占据了与湖北交界的川东四县”。12月，在江西萍乡，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叛乱”，甚至蔓延到了邻省湖南，据称“要想镇压它，须派出六千名军队”。1900年1月，安徽人民“受到山东大刀会成功的鼓励”，成立了“一个名为‘小刀会’的组织”，据宣布，其目的为劫富济贫，许多劫夺教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4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9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341—4342页。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1044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6页。

同上书，第166页。

同上书，第162、167、164页。

同上书，第166页。

参阅《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428—4429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3、164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3、164页。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是志》下册，第1053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67页。

旭 鲜棕 *161、166、167页。

旭 鲜棕 *161、166、167页。

旭 鲜棕 *161、166、167页。

民的案件“都是他们干的”。2月，在云南，由于英军强占片马，屠杀我国人民，致使在距离腾越200英里的勐格地方，有两名属于中英缅甸划界委员会的成员英人纪德(Kiddle, Walter)和苏得龙(Sutherland, A.B.)被“当地人所杀”，腾越英领事烈敦(Litton, George John Letablers)亦“受伤”。

在河南，发生了“普遍不安的情况”，“特别是更直接地反对政府和富人”。

在山东，高密人民进攻“鲁家庙德国公司”，“张庄人民炮击德人”。

3月，在湖南，由于维新党人唐才常等在上海的活动，“有发生总起义的危险”。在湖北，“民间普遍传说当年将要发生叛乱”。

4月，在云南，由于法帝国主义的活动，流传着“磨快你的刀，准备即将来临的战斗”。在广东，革命党人杨衢云自香港赴日本，“与孙中山商在粤举事”。

5月，在广东，清政府官员显然在积极准备对付“夏季的大叛乱”。在浙江台州府，又发生了教民本身间的仇斗，“一个天主教的传教士受了重伤”。

在广西，“永福会党数千入横州，围困防营”。

以上我们列举了自义和拳首义以来全国城乡人民的各种主要斗争，其中以反洋教运动为主，也涉及到其他有关方面。这些斗争当然远非全豹，不过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地看出拳民运动时期中国内各地的一般形势。这种形势既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同时在客观上又是对它的响应和支援。全国普遍不安的形势表明，在第三次瓜分危机迫在眉睫之际，全国人民反侵略、反洋教、反瓜分的起义形势已经成熟。在直、鲁地区，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也必然会有其他的反洋教运动发生，正如全国各地所呈现出来的形势一样。义和团运动既然敢于同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狂潮相对抗，它就是任何强大势力所阻止不了的。另一方面，它一经起来，就会像燎原的烈火一样迅速烧遍全中国”。如所周知，义和团运动本身也不只是在直、鲁地区发展，拥有拳技的拳民同时还去附近各省发动斗争。比如在河南，“一八九九年五月间，一个名叫高志忠的山东人，开始在开封教授当地人演练神拳”。“一八九九年秋季，义和团向河南南部蔓延，浙川义和团在信阳散发揭帖”。到1900年春夏，在山西、内蒙、东北各地，已有义和团活动，并且发展很快。“二月，营口附近居民群起练拳”；“三月，锦州一带”，“练拳习刀，日盛一

同上书，第166页。

同上书，第168页。

同上书，第168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90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90页。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1064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90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90页。

同上书，第190页。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1069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90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90页。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第1069页。

日”。六七月间，在山西晋阳一带，已经是“联群结伴”，“练者纷纷”。在内蒙古也是“旬日之间，蔓延各地，风靡一时”。

义和团运动本身在直、鲁周围各省的发展和全国各地城乡人民的反洋教斗争，都是对拳民运动的响应和支援，成为义和团运动在反洋教斗争和反清军围剿中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上述全国各地城乡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中，其中有不少也是需要结合实地调查进行区域性探索的。

三、中国史上一次特殊的农民起义运动

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在短时期内取得如此蓬勃的发展，除了它代表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全国人民的响应支援等两个客观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主体方面的原因，那就是说，义和团运动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极为特殊的中国农民起义运动。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运动比较来看，义和团运动具有的特色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它从起义以来所标榜的斗争锋芒和打击目标乃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侵略和瓜分势力，而不是像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那样，以打击封建统治势力为首要目标。为了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它甚至要联合包括封建统治势力在内的、主张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一切爱国力量，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最早提出这类性质的口号的，是余栋臣起义而不是义和拳。提出这类口号或打出这面旗帜的根据，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已经下手瓜分中国，它同中国人民的矛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的矛盾。打出这面旗帜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中已经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抵抗派从投降派中分化出来，他们听任团民活动，不加干涉，从而减少了或减轻了义和团发展的阻力。1899年底，主张把拳民尽行剿绝因而被列强看中挑选去山东就巡抚任的袁世凯到达济南以后，在清政府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如何对待拳民运动的辩论。以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御史黄桂鋆和熙麟等人为代表的抵抗派官员提出了以事实为根据的有力论点：即（1）自第二次瓜分危机开始以来，列强占据沿海军港以后，实际上已把其势力范围看作是他们的殖民地了。“自德人据有胶澳，意直以山东为其所有”；德人如此，俄人在东北，英人在长江流域，法人在西南，日人在福建，亦莫不皆然。（2）拳民纪律严明，有口皆碑。“第该拳会等为徒虽伙，未闻扰害平民，劫掠官府。偶与教堂滋事，但择其一二渠魁，责令地方官缉获惩办，自足了事”。（3）在民教斗争中，在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清政府到底站在拳民一边，还是站在教民一边？这个重大问题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如果站在教民一边，则：

“仇教者既被夷诛，从教者益行恣肆，一日不入其教，一日不安其生，势必驱中国之民胥归彼教而后已。天下皆教民，国将谁与立乎？载舟覆舟之喻，不可不深长思也”。

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52页。

吴应光：《义和团起义及其后果》（陶飞亚译），见《义和团研究会通讯》第3期（1987年4月），第8页。

黎光、张璇如：《义和团运动在东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38页。

刘大鹏：《潜园琐记》，见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重修绥远通志稿本》，《教案篇》，转引自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第286页。

“岂可专护教堂，为丛殴爵哉！”

“自侍郎袁世凯奉命署理山东巡抚，……似惶惑愈甚。其强悍者，则思纠众附团，劫洋目以抗官兵；其懦弱者，则思质地保险，避官兵以从洋教。……则东省全境，不属于团，即属于教。属于团，已难猝办；属于教，何计挽回。是山东一省，将不复为国家有矣”。

“大军所临，耳目震慑，铤而走险，已属可虞，甚至势成燎原，洋人以助剿助守为名，干预军事，小则索偿兵费，大则占据城池，操纵两难，为祸益烈。即不至此，而诛戮过重，拳会之势虽戢，教堂之气益张，彼无告之民，不敢入拳会，势必入教堂。夫拳会仇洋，犹是朝廷赤子也；既入洋教，则蚩蚩者氓，岂复为朝廷有哉！此亦可虑之大者也。”

抵抗派这些意见是，即便为清政府本身着想，在民教冲突中也是不能站在教民一边去镇压平民的。话虽如此说，这时业已屈服于列强侵略势力的清政府，却在1900年春仍然命令直隶总督裕禄镇压拳民，而拳民在清军的镇压下却只好坚持反击了。

有一篇载于《日本邮报》(the Japan Mail)中的《义和拳揭帖》(A Boxer proclamation)，猛烈地抨击了清政府的整个朝廷以及各地衙门都是“恶劣透顶的”，贪污腐化，“卖官鬻爵”，无所不为。“整个人民群众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有的官员都是他们生计的剥夺者”。“皇帝本人就是罪魁祸首”。“洋鬼子来华传教，天主教民和新教教民已经为数甚多”，他们都是“贪得无厌的”。这篇不是“扶清灭洋”而是“扫清灭洋”的揭帖，我颇疑心它是裕禄在直隶镇压拳民，特别是派出武卫前军杨福同、杨慕时等人大举剿杀拳民时的产物，以此在当时被译成外文而广泛传颂，并定义和拳是慈禧太后“他们所不能控制的怪物”的。不过，由于拳民军事胜利所造成的形势急转直下，刚毅奉命去涿州同他们谈判，清政府改“剿”为“抚”，不再要求解散拳民，而是听任他们大举进入京、津以后，义和团就又立即重新举起他们“扶清灭洋”的旗帜，以便共同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罪行了。所以，“扶清灭洋”这面旗帜，就其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一点来说，是具有意义的。

第二，义和团运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运动的特点是，它只称大师兄、二师兄等等，不称王称帝，不在组织上搞统一领导，也不另立新的朝代。这一点既反映了它作为一个爱国主义的志愿的义勇军的特色，同时也是符合于它所提出的“扶清灭洋”这个口号和自己把义和拳改称为义和团的要求的。在反洋教运动和民、教冲突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在过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统一领导的组织，在目前瓜分危机迫切的形势下也没有条件来搞组织上的统一领导。这是因为，如同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搞组织上的统一领导需要较长时期的准备，较大面积的根据地以及一系列的胜利的武装起义等等，这些条件在义和团起义的时刻乃是很难满足的。一般说来，组织上的统一领导乃是行动一致的先决条件，但是，在义和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2、43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2、43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同上书，第46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同上书，第43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团运动中，组织极其分散，行动却非常一致。在全国，不仅以义和团为名义的起义，并且在不用义和团作名义的起义中，他们都起来反抗外国教会的侵略和统治，在行动上呈现出罕有的一致色彩。尽管时间有先有后，全国城乡在当时爆发的起义基本上都属于反洋教斗争，好像是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在那儿发号施令，号召全国人民都一齐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似的。实际上，这只不过说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的爱国主义觉悟已经空前高涨，而他们的一致行动则可以弥补义和团运动组织分散的弱点。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义和团运动这个在组织上没有统一领导的弱点，在这个阶段中在一定的条件下却转化成为一个优点，就是促成了这个运动的蓬勃发展。当时，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义和拳和大刀会等纷纷改“拳”为“团”。但是，业已屈服于列强势力下的清政府在1900年5月底以前始终坚持镇压的方针。如果说拳民们有一个统一领导，如果说朱红灯、心诚和尚或武修和尚等人中之一个是他们的总的领导人的话，那么在他们在被清政府抓去或遇害以后，其影响总比他们作为大师兄的身份要严重得多。如今，一个或两个大师兄被清政府镇压了，他们的影响诚然也是严重的，但它只及于一些派别或某些地区，并且，义和团在各地、各城乡，有的是大师兄，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发展就越是迅速和扩大，使中外反动派为之目瞪口呆。他们只好惊呼：“德国的‘铁拳’难道不是企图对拳民们的军事发展加以限制的结果吗？或者，种种惩罚性的措施能有用处吗？在殉道者的血液中难道不是有一种像不死鸟一样的力量（a phoenix-like power）吗？”换句话说，中外反动派如果要通过所谓“擒王”的办法来扑灭义和团，他们总要扑一个空并使自己更加狼狈的。

第三，义和团运动比起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运动来说，是它更广泛、更充分地利用了“揭帖”这种宣传形式来作为发动人民群众起义的手段。就近代来说，揭帖是直接继承了中国人民在反洋教运动中的一种传统作法。这种揭帖、告白或通告的形式多种多样，可长可短；可以是匿名的，也可以用某人、某地或义和团的名义来发布；有时遍贴通衢，有时在一些集会场所出现。

义和团运动时期揭帖的主要内容，大体上有以下三点：

一是揭露外国教会的侵略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因天主教并耶稣教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生民涂炭”。中国人民“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帝国主义侵略者这种在中国的“无法无天之行”，至今已“四十余年”了，“中国洋人到处行”，如今竟然强迫中国同他们签订各种让与权的不平等条约，准备瓜分“割据”中国了。

二是出现瓜分危机的原因，乃是“只因鬼子闹中原”，所以拳民们挺身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8—9页。

汤姆森：《中国与列强，记一九〇〇年暴动》，1902年英文版，第205页。

赫德：《中国和重建》（1900年11月），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111页。

《义和拳告白》，见陈振江、程献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页。

《刘伯温碑文之二》，见同上书，第82页。

同上书，第5页。

而出，展开斗争“闹教”，为的是“免被割据逞奇能”。因此，他们发出号召，要求全国人民踊跃参加义和团。“今告尔三界人士，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精练义和团拳术”；“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熄天怒”；“不论君民商贾士农，急学义和拳”。这是因为“义和团上能保国，下能安民”。三是利用揭帖，告诉教士教民离开教堂；或指定日期，号召爱国志士前来参加反洋教斗争。前者如“着尔耶稣教各教堂知悉：令限尔一礼拜内，教堂内之人，悉行离开，各教堂均由本会中神人居住。如敢不遵，即须用术将尔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毁，纵火焚烧，彼时悔之晚矣”。后者如《保定义和团揭帖》所说：“三月二十日（1900年4月19日——引者），各处义和团当聚万余人，同在南关聚会，以泄公愤”。总之，揭帖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极为丰富的。不过它主要是说明拳民斗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以便发动爱国的人民群众参加斗争。

在拳民发布的揭帖中，往往都写明一个附带条件，即要求看见它的人来尽力传播这份文件，扩大影响。“见而广传，即免灾殃”。“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难。倘若见而不传，必有大祸临身”。义和团一般的活动方式，大都是拳师后至，揭帖先行。爱国人民在读到揭帖以后，先有了练拳习武、保家卫国的思想准备；等到教练拳棒的大师兄一来，大家都纷纷要求习拳，参加到义和团的队伍中了。义和团在这个阶段中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揭帖在宣传鼓动方面所发挥的动员作用乃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巨大力量。

以上我们从义和团代表中国人民反瓜分的爱国主义精神，从全国各地城乡人民的响应和支援，从拳民起义作为中国史上一次特殊的农民起义运动等三个方面来论述了一下义和团在斗争中蓬勃发展的原因。总起来看，这三方面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帝国主义教会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迫在眉睫之际，在中国城乡极度加剧了他们的侵略和统治罪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迫使他们不得不起而铤而走险，在过去反洋教运动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支在基本上可以说是全民反帝爱国的起义运动。正因为如此，所以义和拳一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就在客观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并打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从改“拳”为“团”的活动中取得了半公开、半合法的地位。他们通过胜利的武装斗争使自己茁壮成长，蓬勃发展，迫使清政府在形势急转直下的局面中不得不改“剿”为“抚”，从而使他们得以大张旗鼓地进入北京、天津，同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势力展开了直接的、面对面的武装斗争，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万众一心的强大公愤。

《警告“国闻报”之一》，见同上书，第35页。

《神助拳之二》，见同上书，第33页。

同上书，第35页。

《北京西城义和团揭帖》，见同上书，第14页。

《玉皇示梦庆王奕劻之二》，见同上书，第20页。

《增福财神李告白》，见同上书，第22页。

《勒令耶稣教各堂》，见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13页。

下编 义和团与爱国官兵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

我们在叙述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所面临的瓜分危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其发展以后，现在要进而论述义和团与爱国官兵同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军浴血备战，以及这些激战怎样阻止他们瓜分中国的事情了。这就是我们在本编内所要加以讨论的主题。

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无论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在世界近代史上，它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首先，就世界史的范围来说，我们试把当时的世界地图打开一看，就会看到这时的帝国主义列强势力已经如日中天，世上能够被他们瓜分的领土基本上已经分割完毕。其中最强大的英帝国，它的殖民地遍布全球，因而享有“日不落国”的称号。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业已濒于瓜分边缘而尚未被正式瓜分的国家，但它的被瓜分的命运业已被注定，是无可挽救的了。但是，义和团起义却打乱了他们的既定部署，阻止了他们实行瓜分中国的最后一步，从而在1900年结束了这个自1871年开始的，持续了30年之久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这是出乎帝国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其次，就中国近代史来说，我们也可以把《东亚时局形势图》打开来看，看到中国领土已经被列强的“势力范围”分割殆尽，甚至清政府中自命为头号精通洋务的大臣李鸿章在1899年也“公开谈起了已经发生的中国的瓜分”。在甲午战争中，清军连一个日本都打不过，如今，全世界的列强都来远东要瓜分中国了，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道一个“不”字呢！不料，中国的拳民们竟然天不怕、地不怕，敢于挺身而出，宣称要同在全世界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者较量一番。而较量的结果居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最后瓜分，这在中外许多人士看来，有如历史上的奇迹，多少是有点不可思议的。其三，就世界上已被列强瓜分的弱小民族来说，一般看来都基本上有一个从半殖民地到殖民地的过程。中国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殖民地，在帝国主义者看来，也是一个必然的逻辑过程。但是，义和团运动竟然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阻止了这个逻辑过程的必然发展，使世界上保留了一个唯一的未被瓜分的大而又弱的国家，这自然引起了这些弱小民族的重视，同时也是我们必须加以研究的问题。

因此，在1900年，无论在世界史上还是在中国史上，当人类结束19世纪的最后一年或者说是20世纪开始一年中的第一件头等大事就是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勇敢的中国拳民们在5月底和6月初的胜利使形势急转直下，此后“两个月内，义和拳运动在全世界的报刊上都占据着光荣的一页”。那时候，全世界人民的“每一只眼睛近来都已经指向了中国，每一种语言都已经有了一个新名词——义和拳运动（Boxer movement）来丰富它的词汇；但是，这个义和拳运动简单地就是群众饥饿的产物吗？或者还有其更深刻的意义呢？”赫德还追问说：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六十年来条约关系的结果，发展到顶点竟然成为这个义和拳运动。这样一个最后的结局我们怎么来说明呢？”赫德本来就不该忘记，在“条约”前面应当加上一个不可缺少的、必

《勒令耶稣教各堂》，见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7页。

同上书，第18页。

斯塔夫里扬诺斯：《一五〇〇年以来的世界史》，第235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04页。

要的形容词，即“不平等的”这个词。有了它，“这样一个最后的结局”就可用“六十年来不平等条约关系的结果”来说明了。还有的研究者认为应该追溯得更远更深一些。施达格在他关于义和拳的著作的序言中说道：

“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史上，要把义和拳暴动（theBoxer outbreak）看作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而把它草草了结乃是不可能的，满足于不符合这个运动（themovement）所有事实的任何解释（any explanation）也是不足取的。的确，在中西双方长期接触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事变比得上义和拳运动那样更适合于我们加以仔细研究的了。运动的爆发不仅仅是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军强占胶州所突然引起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的高潮，或者甚至也不仅仅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国败于日本而引起的一系列重要事件的高峰；义和拳运动乃是四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关系史上发展的顶点。……甲午战争以来的许多重大事件和胶州被占以来的亡国灭种的威胁使中国从她的自满自得中激动起来了。但是，对这个作为反抗西方统治的结果而发生的大发雷霆的暴动的任何满意的研究都必须追溯到那些起作用的原因上去。”

把义和拳运动看作是 400 年来中西关系史上的顶点，这种观点是深刻的。它说明，自 16 世纪世界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来，400 年来西欧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地掠夺政策到这时要开花结果，把中国名符其实地作为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反抗瓜分，就是反对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义和拳运动代表了中国人民不甘作亡国奴的意志，与西方列强相对抗，所以成为 400 年来中西关系发展史上的顶峰。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把义和团运动置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来考察，才能高屋建瓴地对它进行论述，评价它在世界史上和中国史上的地位，才能对它血战联军、阻止瓜分的丰功伟绩具有正确的认识。为此，我们在本编中拟分为以下五个问题进行叙述：

1. 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之失利与瓜分危机的第一次缓解（1900 年 5 月底至 6 月中旬）。
2. 拳民京津鏖战与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900 年 6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
3. 全国反帝怒潮的兴起与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1900 年 6 月至 10 月）。
4. 瓜分危机缓解后之大局（1900 年 10 月至 1902 年 7 月）。
5.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

第八章 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之失利与瓜分危机的第一次缓解 (1900年5月底—6月中旬)

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曾面临过两次瓜分危机，中国人民也曾作出过反对这些瓜分危机的斗争。这些斗争有的被清政府镇压，有的则虽遍布全国各地，但却没有在列强势力集中的京、津地区展开直接搏斗。因此帝国主义者对其严重性重视不够，一直“认为可以安然瓜分这个民族的国家”。到义和拳运动起来以后，帝国主义者承认：“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曾获得警告。”“事实上，如果有一个我们的耳朵听得如此习以为常，以致我们对它比对我们心脏跳动的声音还要不予注意的喊声的话，那就是中国人的大叫‘狼来了’！”“我们当中有些人认为这个运动是严重的，但是我们没有预料到它在秋季之前会成为一种危险；它的提前发展乃是一件真正的出其不意袭击。”“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一种普遍的预料，即在阳历八月会发生严重的动乱。许多在当时作这种事件的预测的人，都因灾难这样提前几个月突然爆发而深感惊骇。”根据中国民间宗教的劫变信仰，有闰八月天下大乱的迷信；在义和团的揭帖中也有“闰月秋时是大乱”的话。1900年正是阴历庚子年闰八月，当时在中国的外刊也报道“有很多关于八月份普遍起义的预言”。事实上，普遍的起义却提前在5月底，6月初爆发了；这也许是事变的发展过程为拳民始料所不及，或者也许是拳民们有意利用民间迷信来麻痹帝国主义侵略者，或者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的结果。

无论如何，事变是提前闹大了，使帝国主义列强在调兵遣将上，由于来不及从容准备而陷于被动。

赫德：《一九〇〇年的义和拳》（1900年12月），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150—151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一 页。着重点引者所加。

《铁拳》（1900年6月19日德国《前进报》）

《北京公使馆：一个民族起义和国际事件》（1900年8月），见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1—3页。按“狼来了！”的故事是说一个牧童因喊邻人拒狼吃羊而无狼，后狼果来，虽狂叫而邻人不至。

明恩溥：《动乱中的中国》第一卷，第219页。

第一节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瓜分狂想曲

京畿地区之有义和拳这种民间秘密结社，可能为时甚早。自 1898 年 10 月赵三多、阎书勤等在黎园屯发动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以来，到 1899 年秋，即义和团在冀、鲁边区的发展阶段中，北京人民便已开始练拳，“早晚在城内外僻静处街衢练之，动辄数十人，到处皆是，而无巾带形迹。瑞王府所统虎神营兵，有设团于端府空地练者，庄府、澜府等皆有练者，亦无巾带形迹”。

1900 年三四月间，随着义和团在冀中和京畿地区的发展，北京练拳之风逐步普遍，“有拳民入京授人以艺者，初在僻处，继则城厢内外街巷中，时见率领十五、六岁之俊童，授以艺”；“艺成之后，头挽英雄结，腰缠红带，足履快靴，向院内东面焚香叩头，佩刀而出”。到 5 月初，北京“纷传义和拳之多，几至遍地皆是。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家亦为之者”。“沿街多帖有告白，仿佛希腊神话。时廷议方禁止习拳，告示皇皇，以拳为厉禁。然凡有告示处，则后必有义和拳之告白粘于其后，一若互相诘难也者。”有一项统计称：“谨案五月以来，有禁团民滋扰禁城谕旨七道，严饬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及派出之统兵大员，缉拿首要，解散胁众，撤坛拆棚，至矣尽矣。乃禁者禁而为者为，城门由其出入，官兵任其猖獗”。“虽明诏煌煌，不特团民蔑视无关，即地方官吏亦视若弁髦，是则诏谕直等于官样文章耳”。从上述义和拳在北京的发展过程来看，似乎是和他们在冀、鲁地区的发展是同步的。由于北京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的中心，义和拳自首义以后，似已注意及此，拳民来此授拳者逐渐增多。赵三多等在 1898 年 10 月提出的“发动普通的起义”的号召，到 1900 年 5 月底由于涿州的占领而在实际上就形成了。刚毅之亲赴涿州与拳民谈判，正是清政府处于“剿抚两难”的情况下而不得不改“剿”为“抚”的结果。

在帝国主义列强方面，他们对义和拳运动一直是很注意的；但是，他们对这个运动的严重性和事态之如此迅速的扩大，却是重视不够、意料不到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反洋教运动已经闹了几十年，就过去的经验来看，只要他们一施加压力，就能迫使清政府把这个运动镇压下去。如今，他们正在着手瓜分中国，在华侵略势力远比过去强大，清政府也更不敢违抗他们的意旨，连皇位继承问题都得听他们的，镇压人民的反洋教起义更是不在话下了。事实也的确是如此。比如说，1899 年底美使康格之要求以袁世凯代毓贤作山东巡抚，1900 年初英使窦纳乐之要求对肥城教案作穷凶极恶的科罚，没有一件事列强不是如愿以偿的。不过，他们怎么也估计不到的一点，就是在义和团的势力逐步发展以后，拥有洋枪洋炮的清政府的军事力量也是镇压不了的。自 5 月 27 日拳民占据涿州城，28 日拳民焚毁长辛店、芦沟桥车站、料厂使形势急转直下，29 日英使窦纳乐惊呼局势严重以来，英、俄、

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 42 页。

《北华捷报》（1900 年 4 月 25 日），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194 页。

据《袁昶奏稿》说，他于 1899 年曾“询提督程文炳，该提督乙未年（1895 年）驻军近畿，有山东义和拳，又自称金钟罩、红灯照名目四五十人投效”（见《义和团》（四），第 159 页）。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在赵三多等起义之前，就已经有人以义和拳名义作爱国活动了。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一），第 347 页。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80 页。

德、法、美、日、意、奥、西班牙等国公使连日集会。在 28 日晚各国驻华公使的会议上，一致决定“不失时机地调来卫队保护各国使馆”，德使克林德（Freiherr von Ketteler）在会上认为“这些行动是瓜分中国的开始，这个言论引起伦敦与圣彼得堡间的交换意见”。30 日清政府要求“卫队应延迟几天到达”，中午各国公使开会认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干涉各国使节调来部队的意图”。

1900 年 5 月 31 日晚，英、俄、美、法、日、意等六国官兵共 356 名，自天津抵达北京。“计英国兵官三员，兵七十二名；美国兵官七员，兵五十六名；意国兵官三员，兵三十九名；日本兵官二员，兵二十四名；法国兵官三员，兵七十二名；俄国兵官四员，兵七十一名；共计各国兵官二十二员，兵三百三十四名，均随带枪械”。6 月 3 日，“有五十一名德国兵和三十二名奥匈兵到达北京”。据马士统计，“总共有四百五十一名武装人员。其中有两名军官及四十一名卫兵保护西什库天主堂北堂，十七名军官和三百九十一名卫兵保护使馆。英、美、奥、意的部队每队都有一架机关枪；俄兵带来的炮弹则只能适用于他们自己的大炮”。在列强海军陆战队相继来京以后，各国政府又相继给予了他们驻华公使以便宜行事的大权。6 月 7 日，英政府给与窦纳乐以“完全不受约束”的“处理事务的自由”，“可以采取那些您认为方便的措施”。在此前后，克林德已被德政府“受权得直接与舰队司令协商必要的保护措施”。美使康格“已被赋予以极广泛的全权，让他应用他的专门经验的判断来决定一切个别事件”。沙俄政府“授与格尔思先生（Giers, Michail Nikolajevitch de）最充分的权力，采取他认为有必要采取的任何立即行动，并从海参崴或旅顺口调集所必需的任何数量的部队，以保持同沿海的联系及保护各国使馆”。本来已经成为清政府太上皇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在京公使，如今既有侵略军在身边，又拥有便宜行事的大权，特别是调遣那些早已停泊在远东海面的军事力量的特权，这不是克林德所说的“瓜分中国的开始”又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列强更积极干涉的时机业已到来”了。

不料，5 月 31 日的洋兵入京，对于业已在城乡全面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来

唐晏：《庚子西行记事》，见《义和团》（三），第 471 页。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13 页。按杨氏此语，不见于上引《庚子纪事》中之同名著作，因《丛编》本系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抄本刊录，比《纪事》本所据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稿本较为完备之故。

《英国蓝皮书》，第 78—79 页。

《德国外交文件》（二），第 2 页。此事经德国外交大臣比洛询问后，克林德声言：“我没有提到瓜分中国”。比洛在 6 月 5 日告诉克林德说：“把每一个真理说出来不是都有利的”（《德国外交文件》（二），第 3、4 页）。可见事出有因。

《英国蓝皮书》，第 79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11 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198 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198 页。

《英国蓝皮书》，第 29 页。

《德国外交文件》（二），第 5 页。

同上书，第 7 页。

说，在促成事态进一步严重发展上乃是火上加油。洋兵入京不仅在侵略者克林德看来，在反侵略的爱国拳民们看来更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我们知道，1898年10月梨园屯的义和拳首次起义就是以“谣言说有洋兵”作为导火线来爆发的。我们还知道，拳民占据涿州以后，便“声言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可见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下，以反瓜分斗争为目标的拳民们对于洋兵在中国领土上的出现，是抱有极高的警惕的。在洋兵未来中国之前，义和拳“扶清灭洋”的宗旨是“扶中朝、灭洋教”，而不是灭洋人。因此，他们对于外国传教士，只采取威胁吓唬的办法迫使其离开中国了事，并不在于要在肉体上消灭传教士。义和团纪律严明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一九〇〇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前，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外国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唯一的一个就是卜克斯先生在山东的遇害”。实际上，如我们在前面有关章节所述，卜克斯是在肥城县张家店与庄农孟洸汶互殴致死的，而孟洸汶却并不是一个拳民。

但是，在洋兵既来中国并进入北京城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拳民认为，洋兵入京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既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动用军队来到中国的首都，也是他们势力集中的地区，那就是开始瓜分中国的战争的开始。既然敌军已经深入堂奥，单纯采取威胁吓唬的办法就是远远不够的了。英国传教士两人于6月1日之所以在顺天府永清县遇害，当然事有凑巧，不过也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了。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实质上已经发动了侵略战争，拳民们当然以战争的手段来对付战争。那些负有瓜分中国使命的列强公使们，尽管身边有军队，却也置身于拳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只是处于千军万马的人民群众的反帝怒潮之中时，各国公使才真正有了一种危机感，感到“此惟救死而恐不赡”了。从这时起，陆续发生了如下的一些事件。

（一）永清教案（1900年6月1日）。当天清晨，有一队义和拳约数百人进入顺天府永清县城，此地在京津铁路廊坊东南。拳民们随即“攻击该处英国教会，杀死了派驻该处的两名传教士中的一名，即孙牧师（Charles Robinson），并带走了另一名传教士孟鹤龄先生（H.V. Norman），将他囚禁在邻近的一个村庄”，“他在被关了二十四小时后被杀”。这两人过去曾组织教民与当地拳民斗争，负有血债。据说杀死孟鹤龄的李某就是为了报复其杀子之仇的。

（二）“义和拳与武装的欧洲人的第一次冲突”（1900年5月29日至6月4日）。由于芦保铁路洋工司倭松（Ossent）等41人“急欲赴津，遂于

《英国蓝皮书》，第132页。

《红档史料》，第218页。

《教务教案档》第六辑，第236页。

柴萼：《庚辛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06页。

劳乃宣：《拳案杂存》，见《义和团》（四），第470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162页。就这一点来说，义和拳比之于同时期在中国其他各地爆发的反洋教斗争，如本书第二章第三节、三、（二）所述情况，在不伤害传教士的纪律上，是十分严明的。

《英国蓝皮书》，第82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99页。

本月初二日（5月29日）雇民船十一只，派护局马勇十四名，步勇八名保护前进，孙道钟祥亲送至安州，回顾局务。兹于初五日据去勇王得功等回称，初四日（5月31日）午前行至雄县小龙庙庄，突遇拳‘匪’数百名，队与洋人均开枪抵敌，无如‘匪’行陆续聚至万余，将洋人追赶上岸，未知存亡。伊等凫水得生，计逃出步队六名，马队四名，余无下落”。据另一种说法是，“护送的士兵也参加了攻击，但这次攻击却被洋人打退了。他们于是舍舟登陆，带着极少的食粮在烈日和风尘下徒步前进；他们有时边跑边打，有时秘密爬行于村落之间，这样经过了四天，在六月四日下午四点钟到达天津。在这一队人中，有九人失踪，二十三名受伤，九名无伤害”。其间在6月2日，俄使格尔思曾派在天津的25名哥萨克兵去接他们。当哥萨克兵“行至独流镇地方”，在夜晚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们被义和拳包围，不得不从包围中冲杀出来，并退回天津，而没有遇见那些逃难的人。一名哥萨克军官从马上跌下来，被刺了六枪；一名哥萨克士兵在援救他的军官时被割掉了鼻子；据说大约有十四名义和拳被杀死”。

（三）拳民陆续来京与京内拳民结合，展开斗争（6月上旬）。“五月初一日至十五日（5月28日至6月11日），义和拳团民在京外各府州县，及京南黄村、丰台等处，焚拆铁路洋房，拔毁电杆、电线”；“连日团民陆续来京者甚众，俱在庙宇及空闲客店内设坛居住”。6月4日，在北京总税务司任职的英人朴笛南姆威尔（Putnam Weale，系辛博森 B.L. Simpson 之笔名）记载其仆人说曾亲眼看见拳民“有三大车，满装刀枪，从哈达门（即崇文门）进来”。是日，“团民拆杨村铁桥，京津火车从此停轨矣。自是各路电线均断、电报不通，如欲打电，须送至山东转行”。6月7日，“连日义合（和）团民，三五成群，头包红布，手持刀械进城，络绎不绝”。6月9日“清晨，一伙义和拳从附近的一座庙宇中冲出来，并放火焚烧跑马场的大看台，跑马场在北京以西大约三英里，是外国侨民常去的一个娱乐场所”。同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京”，董福祥也率领业已有拳民渗入的甘军“重入城中，驻扎于天坛先农坛前之空地”；“使馆至此，始大震动，急电与水师提督，速派援兵，至急至急！但为时已晚矣，真太晚矣”！为什么这事引起使馆的惊恐呢？这是因为，他们本来认为慈禧太后“十分惊慌，并已决定逃往西部的古都西安府”；如今却又从颐和园回到北京城，显示出清政府要倒向义和团一边，也就是说要改“剿”为“抚”。他们本来认为，清政府是

参阅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73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05页。

廷杰，廷雍、张士翰：《致裕禄电》（1900年6月2日）。林学斌：《直东剿“匪”电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148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99页。

佐原笃介等：《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172页。

《英国蓝皮书》，第82页。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记事》，第11页。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213页。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页。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义和团》（二），第184页。

《英国蓝皮书》，第87页。

可以并且能够镇压义和团的，所以他们最初的努力都集中在勒令清政府限期剿灭义和团和把那些关于镇压义和团的上谕在《京报》上明令公布；如今，在清政府镇压失败以后，他们所调的卫队于5月31日进军北京，以为这样就可以吓倒拳民，不料洋兵入京促成了拳民运动的更加高涨。他们本来还认为，在拳民运动高涨以后，还可以利用“若局面无速转机，各国必定并力，大局危亡即在旦夕”的威胁来迫使清政府“镇压北京城内潜伏的骚乱势力”；如今，却把过去“各国公使曾经要求撤出北京近郊的董福祥甘军”调近城内。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形势的发展跟过去相反了，完全不以帝国主义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出现了许多他们估计不到的情况。这时候“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了他们瓜分中国的狂想曲了。但是，帝国主义列强是不甘心的，英使窦纳乐在6月9日下午，立即给舰队司令西摩尔(Seymour Admiral Sir Edward H.)发出一份急电，通知他说：我认为北京的局势极为严重，除非作出安排立即派增援部队进军北京，否则援军就可能来得太迟了”。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215页。

《英国蓝皮书》，第86页。

赫德：《致盛宣怀电》（1900年6月8日）。见《义和团》（四），第325页。

《英国蓝皮书》，第87页。

第二节 帝国主义列强调兵遣将，发动侵略战争之失利

1900年5月31日洋兵入京，我们前面业已提到，乃是“瓜分的开始”，并且意味着瓜分中国的战争的开始。同日在雄县小龙庙庄，6月2日在独流镇，开始了拳民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武装冲突。6日龚纳乐在其致英首相索尔兹伯理的电文中就说：“在没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对北京进行武装占领的情况下，结果将会是：城内发生起事，终于出现无政府状态，它在各省可能引起叛乱。”9日的情况发展，迫使龚纳乐迫不及待地致电当时在大沽口的英国东亚舰队总司令西摩尔，要他率军前来对北京进行武装占领。17日联军舰队又攻占了作为京、津门户的大沽炮台。这样，帝国主义列强就正式发动了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

对西摩尔联军和联军舰队进攻大沽炮台的防御战是极端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外之间的“初战”或“序战”。“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西摩尔联军向北京的进攻和联军进攻大沽炮台乃是帝国主义列强在第三次瓜分危机酝酿了一年多之后所正式进行的实际瓜分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开始；因此，它们乃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斗，我们是决不可等闲视之的。

一、西摩尔联军廊坊遇阻，被迫撤退（1900年6月10—18日）

以“对北京进行武装占领”为目的的西摩尔联军，其意义之重大远非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时所可比拟。一是当时中外之间只是签订了几个不平等条约，不像这时中国已被列强成堆的掠夺让与权的条约所束缚，这些条约已经把中国从半殖民地推到了殖民地的边缘。二是当时侵略中国的外国教会势力才刚刚开始进入中国，不像这时已经遍布中国城乡各地，教堂林立，教民众多，传教士也正式拥有了官衔。这样扩大和深入的外国教会侵略势力，我们如果说它为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作了准备，并打下了现实的统治基础，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三是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清皇朝的一统天下，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正在由低潮重新转入高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一个农民革命政权的首都——天京，在南方遥相对抗，不像这时的北京是全中国的首都，代表着整个中国。因此，如果西摩尔联军果真能达到目的，在预定的时间内占领北京的话，对中国来说，情况就非常严重，其严重性是“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的。因为，从象征的意义来说，占领首都北京就意味着对全中国的占领和瓜分，历史的进程当然就要改变了。

由于中国这时已经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第三次瓜分危机的严重形势下，所以预计占领北京的军事行动不可能按照龚纳乐设想的只由一个国家来进行，只能按照他的另一个想法由一个以上的国家来共同进行，这就是所谓“八国联军”的由来。当时，由于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居列强中第一位，所以这一军事行动由它带头进行。英国东亚舰队总司令西摩尔连同他的舰队本来驻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52页。

《英国蓝皮书》，第88页。

同上书，第27页。

在威海卫，“现已率领着旗舰‘百夫长号’(Centurion)和英国皇家军舰‘鳕鱼号’(Whiting)，‘安狄米恩号’(Endymion)和‘声誉号’(Fame)驶赴大沽”。1900年6月9日晚，由驻津英领事贾礼士召开了一次各国领事和海军司令官的紧急会议，会上日、意、奥、美等都同意立即进军北京，但俄、法领事却拒绝说，“除非派出一支至少有一千五百人的军队，或者是铁路可通车运行。有人建议说：如果局势真正像人们所描述的那么严重，可向旅顺口方面要求获得这支军队或更多军队”。这情况显示出沙俄想代替英国来充当这次进军北京的主力。不过，话虽如此说，英国毕竟还是抢在头里了；现将以英国为首的西摩尔联军的进军情况简述于下：

1. 联军之组成并进军廊坊(1900年6月10日至12日)。西摩尔在6月10日接到龚纳乐拍来的“情况极端严重。除非作好准备立即进军北京，那就为时太晚了”的紧急电报后，立刻在当天早上五点，率领着海军陆战队，带着野战炮、机关枪和两三天的口粮从大沽登陆，上火车出发，七点到达天津。联军由西摩尔海军中将(Vice-admiral seymour)任统帅。由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Captain Mccalla)任副统帅，由俄国海军上校恰金(Kapitan I. Ranga Tschagin)任参谋长。直隶总督裕禄告以“京津火车不通，属其从缓。各领事等峻词不允。德、法两国竟至有抢夺车头而行者，并带同铁路局洋工程司及工料物等随行，意在将道修好，由车路进京”。当时，“由于铁路局不肯调火车，说是铁路被‘暴徒’毁坏了。英国人和德国人就自己跑进车库，强占了机车，并派上了自己的司机”。

“上午九时，第一列开往北京的列车从天津出发，载有英军四百八十名，并有美军百名、意军四十名、奥军二十五名”，“还有铁路局修路幕僚柯里先生(Mr. Currie)和一百名苦力”。随后，又开出第二部列车，“载有英军三百五十名，日军五十名，俄军百名，法军百名”，并带有一个从塘沽弄来的能装“一千五百加仑的水箱”。以供全军饮水和机车用水。在距离天津20英里的杨村跨过北运河的那座桥依然无损，在这里西摩尔“发现了聂士成的军队，约有四千多人，但是我们相互致敬后，渡过了河，继续前进直到午后，这时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修理被拳民们破坏的铁路了”。当天即10日傍晚，“在离落岱数英里处不得不为了过夜而停止前进，因为要在黑夜里在可能被破坏的铁路上继续前进，那是太危险了。在这里我们会合了第三部和第四部随后开来的列车”。第三部列车载有德军450名，英军60名。第四部列车载有俄军200名和法军60名，至此，联军“总数为军官一百零三人，兵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11页。

赫德：《北京公使馆：一个民族起义和国际事件》(1900年8月)，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12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62页。

《英国蓝皮书》，第32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84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2页。

扬契维茨基著，许崇信等译：《八国联军目击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培根：《泽立科伯爵传》，第101页。

培根：《泽立科伯爵传》，第101页。

士两千零二十六名，野战炮七门，机关枪十架”。其中英军 915 名，德军 512 名，俄军 312 名，法军 157 名，美军 111 名，日军 54 名，意军 42 名，奥军 26 名，这就是西摩尔第一次八国联军各国所占名额。由于俄军人数比英、德少，在天津的沙俄军官沃加克上校非常气愤地说：“我打了几次电报要求派一支强一点的俄国部队来，可现在英国人抢在我们前面了。他们比我们更早意识到危险，立即出动了比我们多两倍的部队”。

1900 年 6 月 11 日，西摩尔联军继续前进，“留下三十名卫队守落岱车站，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安狄米恩炮楼（Fort Endymion）”，这是用一艘英国军舰的名字来命名的。当天下午六点钟，在落岱附近“与拳民们发生了第一次遭遇战；但这次攻击很快就被击退”。裕禄奏称，闻联军“开车后，于十四日（6 月 10 日——引者）晚行至落岱，路遇拳‘匪’数人，洋兵见即下车，追赶至村外，猝出数百人，与洋兵交仗，洋兵放两排枪，轰毙拳‘匪’五十余人，擒获四人”。

联军一边修路，一边前进，于 6 月 12 日中午抵达廊坊，声称“北京至天津之铁路，现已归洋人修理，修成后专载西兵，不得装载华人及其货物”。同日，贾礼士致电索尔兹伯里说，在 11 日，“另一支三百人的特遣部队前往北京。到昨夜为止，离开天津的部队总数，估计达二千三百人”。

2. 义和团在廊坊与联军血战（1900 年 6 月 12 日至 18 日）。廊坊今安次县，这一带曾是古代战略要地，如今又位于京津铁路中途，是由天津向北京铁路进军的必争之地。汉代“光武初，追破尤来、大枪诸贼于安次，即此”。其附近之常道城，“晋司空刘琨尝守此以拒石勒”；石梁城则为“南北朝时所置戍守城”。如今，在一个星期以前，拳民们曾在此力拒聂士成的围剿军队，使其“火车不敢前进”，聂军退至“落岱驻扎”，“调队筹备”。6 月 6 日“申刻，‘匪’众数千来扑”，“先烧铁道，断电线，四面包围”，“我军伤损数十人”。

6 月 12 日中午，联军进抵廊坊，但“进展极为迟缓；铁路大遭破坏，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仅前进三英里”。西摩尔报告说：“俄国人另有一支一千七百人的部队正在登陆：我已要求将军派遣目前在香港待命的六百五十名军队乘坐‘可畏号’前来大沽。从北京前来的可靠信差报告说：当我们逼近时，那里大为激动”。联军到廊坊后，立即由德军、美军和英军一起修筑了一座用德国军舰名称来命名的“格菲蓉炮楼”。（Fort Gefion）同时，西摩尔派出“曙光女神号”（Aurora）上的史密斯海军上尉（Lieutenant Smith, A. Gordon）带两天给养，率 45 名军队前往 13 英里处之安定站，开道前往北京，

西摩尔：《我的海军战绩》，1911 年英文版，第 344 页。

培根：《泽立科伯爵传》，第 103 页。

培根：《泽立科伯爵传》，第 103 页。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 65 页。

培根：《泽立科伯爵传》，第 103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42 页。此处日期与上述的差一天。

作者佚名：《庸扰录》，见《庚子记事》，第 251 页。

《英国蓝皮书》，第 37 页。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第一册，中华书局 1957 年版，第 484 页。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 174—175 页。

但他们只前进了 5 英里，于当天晚上占据了该处一个村庄。

13 日晨，史密斯先遣军受到拳民们的攻击。西摩尔又派陆军少校约翰斯顿 (Major Johnstone) 带队前往，也遭到铁路附近村庄拳民的袭击。侵略军的军火在同拳民的战斗中消耗完了，他们不得不放弃所占村庄，全部退回了廊坊。一群美军在廊坊“同一百拳民发生了小战斗”。西摩尔于本日从一个化装为苦力的秘密情报递送人处得息，“北京人民和以董福祥将军为首的帝国军队正在进行抗敌的准备工作，以抵抗外国军队进入北京城，与此同时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 (Mr. Sogiyama) 业已被董军马队士兵所杀害”。实际上，杉山彬是在 11 日被使馆派去打听联军消息被杀的。“予等之西摩尔统领，今日何为不至乎？彼于十号动身，相距只九十英里，今日为十一号，理应到京，而竟不见至，究为何故？使馆欲派一人往探之”，“会在日使馆言及”，“书记官杉山彬遂当此任，然彼一去而不归矣”。“众人皆知予等已围困于此，不能逃矣”。

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的战略本来是一厢情愿和十分顽固的，他们采取了边修路、边前进的战术。6 月 10 日星期天，他们前进了 25 英里，此后就越来越多地遇到了义和团的阻击。11 日星期一只前进了 5 英里；12 日 3 英里。13、14 两天基本上不曾前进一步。但是，他们向前修理轨道的工作却仍在继续着。到 6 月 14 日，他们又准备步步为营地从廊坊向前进军了。当天“清晨，第一部列车进至廊坊五十六基罗迈当地方，第二部列车尚在廊坊车站，贮备所需之水”，正要准备出发，不料，一场拳民与联军的血战开始了，这场血战的结果迫使西摩尔联军不得不放弃进军北京的顽固战略。“是日早晨九点半钟，忽见有拳‘匪’约三百人，持军刀，荷长枪，大声疾呼，进向车站攻击。联军立即还击，击死拳‘匪’约八十人。有意兵四人，距列车在百里（原书如此，疑当作‘百米’——引者）之外，遇拳‘匪’围攻，亦被害。是日晚间，闻悉留在后面保护落岱车站之支队，为华兵数百人向之攻击，遂分一列车，急回援救，留一列车，追击拳‘匪’，约击死拳‘匪’二百人。至夜八点钟，仍返廊坊”。兰多在《中国与联军》中描述这次战争的过程说：

“六月十四日，拳民们发动了一次夺取和破坏装甲列车的最坚决的袭击。午前十点钟左右，……拳民们力图隐蔽他们自己前进直到离列车两百码左右时，突然跳出来战斗呐喊，并冲向联军。联军把连发枪的子弹统统都射向了他们；但是，他们虽说全都暴露在联军的火力之下，却仍然挥着刀剑以惊人的勇敢向着联军冲锋，不怕牺牲。……不幸的是，意军一个哨兵的退路被切断，围满了中国人，一个下级军官和四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被杀了。……那些被小口径子弹所打伤了的中国人的生命力乃是非常之惊人的。有几个被一、两颗子弹击中的人总是还要继续向着马克沁机关枪冲锋，几个死者经检查确定，他们负伤的地方都不下于四五处之多。他们之中的几个勇士的尸首离开联军的阵地只有四十码之远，战场上至少躺着一百五十名牺牲者，他们是冲锋要来夺取我们的连发枪的蛮勇袭击的受难者。”

西摩尔：《致海军部电》（1900 年 6 月 13 日）。见《英国蓝皮书》，第 38 页。

培根：《泽立科伯爵传》，第 104 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第 94 页。

同上书，第 92 页。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 217 页。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依合著：《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 282 页。

这就是 1900 年 6 月 14 日义和拳和八国联军在廊坊的一次震惊中外的大血战，是拳民们不惜以现有生命的重大牺牲去换来中华民族生命继续存在下去的血战。“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段《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本是中国人民在 20 世纪 30 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歌唱和十分熟悉的。哪知道在 19 世纪的最末一年，就由当时的义勇军，我们的义和团战士在廊坊血战中已经把它亲身实践了。因为在当时八国联军的入侵和 1937 年日寇的进犯，都使中华民族同样“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缘故。

拳民们在 14 日的血战中伤亡不少，但联军也没有得到什么便宜。“六月十四日，大批义和拳有很大决心袭击停在廊坊的火车，但被击败，所受损失大约有一百人毙命。我方损失为五名意大利人阵亡”。西摩尔在这里没有提到联军在这一场血战中的受伤者和因伤致死的人数。不过，我们拿联军全部过程为“死者，官二人，兵六十三人；伤者，官二十人，兵二百零十人”的伤亡总数与之相比较，除当场五人阵亡外，伤者和因伤致死者估计也不在少数。因此，在 6 月 15 日，英军上校泽立科 (Captain Jellicoe) 与德军上校乌泽多姆 (Captain von Usedom) 二人不得不清点伤亡，然后就实际情况把联军部队加以改组重编。他们的安排是：“第一部列车为英军和美军，第二部列车为英军和日军，第三部列车为德军、俄军与奥军，第四部列车为法军与意军，第五部列车为需要恢复健康的伤员”等等。“次日，即六月十六日，不管怎么说，都是决定远征军的命运的一天”。当天清晨，西摩尔“与各统兵官会商，拟暂停止由铁路一带前往北京之议”。他们派出泽·希尔默尔上尉 (Leutenant zur See Hilmers) 乘火车回天津求援。他在傍晚返回廊坊说，不仅到落岱的铁路破坏了，甚至从落岱去天津的铁路也遭破坏，他不可能到天津去了。联军与其基地已被隔断，天津到廊坊已经三天没有通讯了。如今“必须承认，远征在事实上已经失败”。17 日，第一部列车在边修路边行军的情况下从廊坊经落岱撤退到了杨村车站附近，车站已经全部被毁，得不到供应品，甚至连找一个人去天津送信都找不到。

“六月十八日，星期一，收到了北京英使和法使求救的更加紧急的要求，西摩尔才不愿放弃所有前进的希望，遂要求德军和第二部列车坚守廊坊并巡逻铁道”。不过，当德军发现去北京的一座大桥业已被彻底破坏后，前进于是成为毫无希望的了。不料，这天下午，他们又“遭到义和拳和来自北京的清朝军队的袭击，他们有四、五百人被击毙，我方伤亡为六人阵亡，四十八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侬合著：《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 282 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第 94—95 页。按码约合 36.5 公尺。又在义和团的战斗呐喊中，可能还包含着他们的军乐。前些年在廊坊市军卢村冯兆来大师兄的家乡发现了 8 首义和拳乐曲：《巧跳神》、《鹅浪子》、《会跳神》、《切八板》、《琵琶令》、《扑蚂蚱》、《倒提金灯》、《刀兵祭》等，其中《扑蚂蚱》用于集合战士，《倒提金灯》用于夜战（参阅 1984 年 3 月 9 日《文汇报》）。萧兴华、曹国金：《廊坊军芦村的义和团乐队》，见王广远主编：《义和团廊坊大捷》，第 248—258 页。

《英国蓝皮书》，第 57 页。按拳民牺牲人数，此处为 100 名；兰多的《中国与联军》一书为 150 名。

培根：《泽立科伯爵传》，第 117 页。

同上书，第 107 页。

同上书，第 107 页。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 283 页。

人负伤”。于是，“从廊坊召回了第二部列车和第三部列车”，当天晚上同西摩尔在杨村会合。

19日，联军举行军事会议。他们本来准备在杨村，改道顺北运河而上，“直抵通州”，再去北京的。但是，在这次会议上，西摩尔确定了“退兵之议”。他认为，“杨村与天津相通之铁路，此时必全已拆毁，即欲再从事于修理，诚恐其难。且据各处探报，董军已在北方，拦塞至北京之路；聂军又切断联军与天津通消息之路。当此时势，非退至天津，与他队联合，以便体察情形，妥筹良法，再往北京不可”。会后开始撤军。

“使联军头疼的是，中国人会在战斗中使用诡计。举例说，他们有一次曾经燃放爆竹，以迫使西摩尔的远征军分散展开。此外，许多人从前相信中国人怕天黑，而现在是必须丢开这种想法了。因为义和团和正规军常采用夜袭”。撤军开始以后，联军伤员被送上由他们掳掠而来的四支帆船，纵队集合在北运河的左岸，在把不能带走的东西连同列车一起举火焚烧之后，联军于下午三时出发。浅浅的、黄色的和湾曲的北运河满布着沙洲，人们只能从岸上用绳子把帆船拖走，随时会遇到搁浅，他们在19日天黑以前只走了2.5英里。

联军自19日起开始从杨村仓皇逃窜，直到6月26日，整整用了8天时间，才逃回了天津租界。

3. 廊坊血战的重大历史意义：我们从以上叙述可知，6月14日义和拳与西摩尔联军的廊坊血战构成了整个这次战争的转折点。在此以前，联军不管每天前进多少里，或有无进展，他们总是乘胜前进的。在此以后，联军伤亡重大，败局已成；尽管他们一再想卷土重来，或另行觅路前往北京，事实上却只有败退撤走的一条路。这次血战使他们丧失了元气。虽经多次努力，想重振旗鼓；可是再也恢复不过来，只好撤退了事。因为他们深知，“坚持下去，就是导致全军覆没”。他们“除了撤退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自由”。

所以，廊坊血战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乃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它粉碎了赫德之流所盼望的、代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观点的所谓“能够改变历史”的西摩尔八国联军向北京的进军，使之不得不半途而废。它已经改变了“能够改变历史”的联军进军，就说明廊坊血战本身更具有“能够改变历史”的重大历史意义。帝国主义列强，北京的公使，甚至西摩尔本人，事先都完全没有预计到这一点。他们事先设想并有先例可循的是：中国人是不会在洋枪洋炮洋兵面前抵抗的，像两年多以前，即1897年11月14日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棣德立希斯之进军胶州湾一样；万一他们即使抵抗，也不过是望风而逃，正像5年多以前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它的军队未曾打过一次胜仗”一样。西摩尔认为，他率领的联军在6月10日出发以后，“他将

培根：《泽立科伯爵传》，第107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同上书，第107—108页。

《英国蓝皮书》，第57页。按参战的清朝军队为董福祥军。

培根：《泽立科伯爵传》，第108页。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83—284页。

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八九五—一九一二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0页。

按西摩尔联军的撤退（1900年6月19日至26日）经过如下：联军在19日只退了2.5英里。20日在拳

作一趟十分顺利的行军，今晚就能到达北京”，“在北京公使们那儿进晚餐”；“但是他大错特错了。即使让他带上两千人，也将一事无成，很快就会空着两手回来。只要他还能平安无事地回得来，也就万事大吉了”。

其次，就义和拳本身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的一次用血肉之躯去同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侵略军相搏斗的、最悲壮的、可歌可泣的血战。侵略者把它看作是“拳民们的蛮勇”或“有勇无谋的企图”(their foolhardy attempts)。其实，这是他们深思熟虑的结果，认定没有这场拼搏，联军一进北京，中国的瓜分就是不可避免的。从一年多以来他们同清军的战斗中可知，义和团已经拥有一些游击战术，并且是十分爱护拳民的生命。反动军官杨福同之被诛，就是他们施用诱兵计和出其不意地进行袭击的结果；他们在同清军战斗中如有伤亡，一定要报仇雪恨；在朱红灯、心诚和尚和武修和尚等牺牲以后，拳民们的领袖一般都隐姓埋名地去干挽救中国的事业，以免暴露目标，为敌所乘。但是，这次西摩尔联军却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到一处就修补铁路，到一站就建筑炮楼碉堡，如落岱之安狄米恩炮楼和廊坊之格菲蓉炮楼等均是。等到联军把路修好，装甲的火车开出后，没有现代化武器的义和团是无法阻止联军前进的。他们只有在联军出发之前，去展开一场血战，使联军伤亡枕藉，打掉侵略军的锐气，才能阻止敌军前进。这就是6月14日廊坊血战的真实背景。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情况下，拳民们不得不实现他们的祖先在反洋教运动初期所许下的“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利害，我们都拌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的庄严的诺言了。在这场血战中，英勇爱国的拳民们的牺牲当然是重大的，数倍于敌人的；但是，联军在把枪炮打空以后，就不能阻止他们上前去同自己肉搏了。联军在肉搏中伤者累累，事后因伤致死的当不在少数，所以西摩尔在报告中一反旧例，干脆就不提伤兵数目。如果联军在这次血战中除死了5人以外，别的毫无损失，那是根本不可能阻止侵略军前进，也是根本不可能使联军自此以后一蹶不振，只能撤退，才能避免被拳民们歼灭的

民的追击下且战且走，到下午六点只走了8.5英里，晚上只能背向北运河露营。21日，联军由于缺乏粮食，早餐只有一杯可可和一片饼干；餐后于五点半出发。由于拳民在北运河两岸都有，右岸的拳民可以射击左岸的联军，于是改变撤退计划，由乌泽多姆率德、俄、奥军从右岸撤退，其余的人仍沿左岸后撤。本日整天只走了6英里，英军上校泽立科受重伤，并写下了遗嘱〔此人大难不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英国舰队总司令(Comander-in-Chief of British Grand Fleet)，是1916年5月31日英德双方日德兰大海战(the great naval battle of Jutland)的英方统帅〕。他们开会决定晚上到西沽，舍水路而由陆路去天津。22日凌晨一点钟联军出发，四点半西摩尔等至西沽武库附近。五点左右，英军少校约翰斯顿(Major Johnstone)率兵百名同德军支队占领西沽武库。“其时练军卡长胜队札西沽，其守武库者，为我军后路方、王两营官”；因杨慕时“教授不力”，“武库遂失”(杨慕时：《庚子剿“匪”电文录》，见《义和团》(四)，第352页)。联军因此而获得了大量的枪支武器、军火弹药和食物供应；所以有人正确地评论说：“武库的占领事实上是把联军从差不多必须全军覆没的命运中挽救出来了”(汤姆森：《中国与列强，记一九〇一年暴动》，1902年英文版，第15页)。此后数日，清军欲夺回武库，展开战斗，不果。25日，沙俄上校希林斯基(the Russian Colonel Shirinsky)率军来西沽。26日凌晨三时，联军烧毁武库后撤，于九点半退回天津租界。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133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55页。

杨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65、66页。按西摩尔联军的实际总数为2300人。

命运的。英国随军记者惠泰尔（Whittall）承认拳民们“面对着来福枪和机关枪秋风扫落叶似地射击，还是勇猛冲锋，真是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勇敢的人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也是最早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评论说：“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很多人，血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死死的把联军围住。弄得西摩尔带的那三千联军，终不敢通过杨村（应作廊坊—引者）直进北京”。“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尔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

二、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之代价（1900年6月17日）

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早已云集大沽口海面；他们早已调兵遣将，准备着要发动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自6月10日西摩尔联军出发之后，“它的危险处境是各位舰队司令知道的。一个水兵首要的天职，他所应尽的最紧要的义务，是要在具有任何预防的方法的条件下挽救他的派遣部队不致被歼；所以为了这个目的，显然必要的步骤就是维持或打开交通路线”，以便对西摩尔联军实行增援。当时“在天津还有一千七百名俄国军队，他们从旅顺口来得太晚，没有来得及参加西摩尔的部队，还有五百六十名不同国籍的水兵，以及足够的志愿兵，可使天津外军总数达两千四百人”。但是，沙俄东亚舰队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Alexeiff, Evgenilvanovitch）认为，要争取积极发动对大沽口的攻占，要由一个俄国军官指挥，“以便与企图担任领导角色的西摩尔海军中将相抗衡”。6月15日，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the senior Vice-Admiral Hildebrant）以“保全铁路和保护天津外侨”为借口，在巡洋舰“露西亚号”（the Imperial Cruiser Rossia）上邀集了各国海军头目开会，商议进攻大沽炮台。300名日本兵立刻被派到塘沽，占领了塘沽车站，另有250名法军和俄军被派去天津铁路线上更远的军粮城，占领军粮城火车站，这完全是帝国主义列强蓄意已久、毫无理由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否则，为什么美国海军上将开姆夫（Kempff, Louis Admiral）在6月14日就通知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海军上将布鲁斯（Bruce, Admiral Sir James A.）说他“未被授权向一个与我国保持和平的国家发动任何战争行为”呢？为什么他在15日又以“不能参加对中国政府财产的占有”为理由而拒绝参加对塘沽车站的占领呢？当然，美军由于已经参加了西摩尔联军而发动了对华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它之所以不参加攻占大沽炮台乃是另有打算，我们在这里引用这几句话无非说明联军之进攻大沽炮台纯属挑衅，强词夺理。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95页。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二，第43页。

《惠泰尔日记》，转引自天津历史研究所：《义和团反帝斗争》，第60页。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23—724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10—211，206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10—211，206页。

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第26页。

6月16日，各国海军将领已知西摩尔联军于6月14日在廊坊遇阻，便于上午十一点在“露西亚号”上集会，决定次日凌晨进攻大沽炮台，立即布署对炮台的水陆围攻计划：

在陆路方面，除昨日已派兵进占塘沽车站和军粮城车站以外，本日下午又派出一个由935名六个不同国籍的士兵（其中英军250人，俄军180人，德军150人）所组成的陆战部队在大沽登陆，“皆由德国水师统兵官保赫统带，当由保君留日军一百名，驻扎于东沽之车站，以便防护其余各军，及所占据之处，得以进攻大沽炮台”。

在水路方面，由于“大沽湾系泥泞之斜堤，水流最属迂回”；“所以有极巨之兵舰及巡洋舰二十二艘，不能驶至该湾之内，以其炮火协力助战”。因此，在16日黄昏以后，有10艘浅水炮艇开进了海河大沽炮台的内侧即西边停泊下来。这10艘浅水炮艇是：“一曰毛拿加西（Monocacy），系美国水师。二曰亚打告（Ikagero），系日本炮船，载有军械粮饷，以及动用之杂件，为数最巨，该船有防护东沽车站之责。毛拿加西一船，受派与东沽之戍兵相联合，若有意外之虞，可将本地之妇孺，接待上船。三曰力勇（Lion），系法国炮船。四曰倚而的（Iltis），系德国炮船，均下碇于海关附近处，该处居于东沽下流，在大沽之前面。五曰灰丁（Whiting，即前译之“鳕鱼号”），六曰发霉（Fame，即前译之“声誉号”一引者），系英国兵船，皆监视缠缚于此间之中国鱼雷船四艘，第一次开炮数门，即将该四艘鱼雷船拖带至东沽，并无阻拒。七曰日爱立亚克（Giliyak），八曰保布（Bohr），皆系俄国炮船。九曰稿烈（Koreets），系俄国巡洋舰，均停泊于大沽之下流。十曰亚尔舍林（Algerine），系英国小巡舰，停泊于大沽之北”。

联军在水路军事布署妥当后，即由沙俄海军中将基利杰勃兰特向我大沽炮台守将、天津镇守总兵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说什么“本提督欲以两造情愿之主张，或以兵力从事之目的，暂据大沽各炮台。该各炮台，至迟限于十七号早晨两点钟，一律退让。此系已决之事，望即达知直隶总督及各炮台官急速勿延云云”。据罗荣光说，6月16日“亥刻，突有俄水师参赞副提督，以英通事二员，来营面称：……现在俄、英、德、法、意、奥、日本七国约定，限两点钟要让出大沽南北炮台营垒，以便屯兵，疏通天津、京城道路，并交有各国水师提督公函一纸。……如两点钟不让出营台，定即开炮轰夺等语。口气强横已极，势非决裂不止”。在最后通牒上签字的联军将领除俄国的基利杰勃兰特和英国的布鲁斯外，尚有德国的裴德满（Bendemann, Felix, Admiral von），法国的库尔诺尔（Cour Jolles），日本的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o）和意大利的卡泽拉（C. Casella）等海军上将和中将，他们都是各国的舰队司令。罗荣光在接到通牒后，因津、沽间“电线铁路均已不通，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06页。

同上书，第207页。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86—287页。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87页。按美舰“毛拿加西号”舰长崴兹（Wise）说：“我未参加攻击大沽炮台”，实际上却接受了联军“收容大沽外侨”和联系东沽戍兵的任务。美国海军上将开姆夫之所以在名义上不合作，受到美国总统麦金雷（McKinley, William）的批准，理由是“我们并未同中国作战，一个敌对性的示威可以促成排外分子的团结并加强义和拳对援军的反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07—208页）。

当一面专差赴津飞报，一面严饰南北岸各营，加意备战，一面专弁密约海军统领叶祖珪所部各鱼雷艇管带，赶紧预备战事，由海神庙夹攻，并商定与副将韩照琦督守南岸大营炮台，营官卞长胜督守南滩炮台”。

1900年6月17日凌晨零点五十分，距通牒规定时间七十分钟前，联军便首先向大沽炮台搞突然袭击，爆发了侵占大沽炮台的激战，经过情形如下：当时，

“各国停泊余家埠之兵船十余艘，一齐开炮，用电光照定南北岸各台轰击。该提督（罗荣光——引者）督同副将韩照琦，率领南岸各台弁勇，奋力开炮，瞄准该兵船电光路灯路还击。当将电灯击毁，该兵船（“亚尔舍林号”——引者）受伤，起轮躲避。该提督亲自挂线，横腰一炮，击中船身，船即偏侧不支；复赶紧针对正面，连击数炮，遂将该船（“日爱立亚克号”——引者）击坏。韩照琦亦在海字炮台，督饬勇丁，打沉兵船一只（似指被火焚烧之“稿烈号”——引者）。其余船只，均往里河退避；因被民房遮掩，炮不能击。遂饬左营，就对面攻击。复差人密约鱼雷艇开炮助攻。詎该鱼雷船，始终并未援应（按鱼雷艇共四艘，不战而被“灰丁号”和“发霉号”所俘获，巡洋舰“海容号”则不参战而被联军拘留——引者）。左营与之鏖战时许，击坏敌船二只。随赶调铁帽桥三营留营之官弁兵夫一百人，齐赴万年桥前营，拉炮上墙，帮同夹击。旋据前营报称，亦毁敌船一只。四点钟时，细察情形，似可获胜，奋督各营，尽力猛击。敌船亦抵死回攻，炮弹如雨，各营弁兵，均有损伤。左营逼近敌船，官弁兵勇，伤已大半。敌见该营墙台人少，以小舟载洋兵登岸，迭次分道扑营。该营放枪迎敌，轰毙洋兵甚多，敌锋大挫。余（罗荣光——引者）仍折回兵船，用炮苦击。该营药库火发（按中国军火库系在四点半钟时为联军炮击爆炸——引者），管带封得胜血战阵亡，兵勇死伤相继，敌遂越墙破门，将北岸左营炮台占据。而练军副左营势孤，亦相继被夺。敌得北岸两营炮台，即将兵船驶靠左营，以大炮遍击南岸各营垒；并用左营左哨之炮，直击南滩营炮台。经营官卞长胜用大炮击毙洋官兵十余人。至七点钟时，敌船开花炮弹，落入南岸练军副营子弹库中，火箭子弹，一齐被焚，……势孤力竭，……不得不召集各营余队，打通后路，现已退至新城（按西方记载，敌军是在六点五十分夺得南岸大营炮台的——引者），收查共约一千余人。”

直隶总督裕禄根据罗荣光报告来写的这篇奏折，基本上是真的，描述了清军在敌人围攻下坚守大沽炮台的应战情形。它代表了中国爱国官兵，也同英勇的义和团一样，誓同发动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军血战到底。保卫大沽炮台之战的意义，也不下于三天前拳民在廊坊血战联军；因为炮台尽管最后失守，它却使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再可能去增援西摩尔联军了。

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之代价是：

1. 在部队人员伤亡方面，共计达216人。“那天晚上，联军的损失是死者共四十六人，其中有六名军官，伤者则有一百七十人”。一说伤亡总计255人：“是役也，联军之在陆路丧失者，计有死者三十三人，伤者一百零三人；在兵舰中丧失者，计有一百十九人，内有俄军死者十九人，伤者七十人；与其现有之兵数较之，约已去百分之二十八矣”。当17日四点半钟中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86页。

《直隶总督裕禄折》（1900年6月21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4—165页。

同上书，第165页。

《直隶总督裕禄折》（1900年6月21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5—166页。

国军火库被敌军开花炮击炸之后，拂晓他们冲锋去夺取北岸左营炮台，日本“亚打告号”炮艇统带官喀秀(Hattori)以殿后部队而争先恐后地去抢头功，不料被坚守阵地，不屈不挠的中国守军所“继续施放的猛烈的排枪”。所击中，在离炮台仅数码之处毙命丧生。

2.在炮艇损失方面，亦属不轻。从6月17日凌晨零点五十分起，直到四点半，将近四个钟头内，双方炮击是始终不曾间断过的。炮战一开始，“唯一受到重创的船是俄船稿烈号”。“它承受了一个中国炮台在四百码射程内的全部火力，在炮轰中它的水兵十六人丧生，其中包括四名军官，伤者达四十五人”。“稿烈船被弹击穿其身，现出五孔，亦被火焚”。当“灰丁号”和“发霉号”掳走中国四艘鱼雷艇去塘沽途中之际，“灰丁号”为“一颗五英寸的炮弹所重创，穿透其煤仓，使四号汽锅和锅管受损”。“倚而的船被八颗炮弹击中，它的指挥官兰茨(Lanz)被打掉了一条腿，一个军官和六名士兵丧生，九人受伤。力勇船被击一次起火，死一人，四十六人受伤。日爱立亚克船被击中四次，其中一次是在水位标下被击中，因而搁浅；八人丧生，其中包括两名军官，四十六人受伤”。“各兵舰中弹被伤，以日爱立亚克船为最重，该船被弹连击四次，火药舱立时爆裂，烟筒亦遭毁坏，竟至不救”。

俄船“保布号”上亦“有一人受伤”。总之，在这些浅水炮艇中，以“日爱立亚克船”和“稿烈船”两艘俄国炮艇受创最重。

帝国主义列强攻占大沽炮台，付出如此重大代价，乃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他们原来以为，在事先占领塘沽和军粮城火车站，切断津沽间一切交通并在海、陆军包围的情况下，大沽炮台可以在他们最后通牒的恫吓下不战而得。这本是鸦片战后数十年来列强对中国所实行的、累试不爽的炮舰政策的惯技；并且眼前就有叶祖珪所统率的清军水师巡洋舰“海容号”和鱼雷艇四艘的不战自降的现实例证。他们没有想到，仅仅是大沽炮台的守军竟自敢于抵抗他们万炮齐发的进攻，严重地惩罚了他们的挑衅。因此“各西人论中国兵将未可轻视，此次以七国水师攻一炮台，能持至六点余钟之久，可谓难矣”。

另一方面敌军付出的代价还是打了折扣的。这是因为：第一，他们是乘夜偷袭，减少了大沽炮台的威力。“幸此次之变，尚在夜间；若值白昼，则弹丸之标的，射得极准，各兵舰必全受伤。至亚尔舍林船，距北方之第一炮台，不及七百迈当，尚受一弹，亦可见该炮台之炮火，有异常之准的矣”。第二是由于大沽炮台本身的缺陷和军火方面的问题。守军在“还攻时，又多不适用之炮弹”。“炮台缺少藏避火药之栈，致联军炮弹所及，连轰数次，使其防不及防”。“所存军火之处”的火药库，“露出”在外，致使中弹爆炸，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128页。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89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125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118页。

《义和团》（三），第289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119—120页。

《义和团》（三），第289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120页。

佐原笃介等：《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182页。

佛甫爱·加来与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89页。

我方守军以此伤亡不少，并造成敌军乘机登陆，逼近炮台。第三是大沽守军没有得到中国海军的协同作战。当时停泊在海河内，在联军炮艇附近的鱼雷艇本来是可以发射鱼雷，击沉或击伤敌军炮艇的；不料当“灰丁号”和“发霉号”进犯时，艇上的清军水师只是“作出了一种类似怯懦的防御，放了几下手枪和来服枪后就冲向码头逃命去了。他们在造船厂的一个安全之处，并在军队的支持下向进攻英军和鱼雷艇放了一下速射枪。英军利用鱼雷艇上的炮去射击他们，立即终止了他们的骚扰”。就这样，四艘鱼雷艇成了英船“灰丁号”和“发霉号”的掳获物。巡洋舰“海容号”本来也可以配合大沽炮台守军在海河中同敌舰作战的；但是，这只“悬挂有上将旗帜的中国巡洋舰‘海容号’”在日本炮艇“亚打告号”在其周围巡视并监督她时，“这艘中国巡洋舰，依然既无参战的倾向，也没有参战的愿望。她就这样被联军扣押起来了”。联军“勒令该船灭去炮火，停泊本处；该船亦遂安之”。至于四艘鱼雷艇，则分给了英、俄、德、法四国军队。

如果没有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那么联军之进攻大沽炮台是很可能以失败告终的；即使他们能攻占炮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也必将更加惨重。

同上书，第 288 页。

同上书，第 288，289—290 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第 119 页。

第三节 联军《大沽宣言》与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1900年6月20日）

1900年6月20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列强联军在占领大沽炮台后的第三天，由各国海军上将或中将组成的舰队司令们发表了一篇联合宣言（a joint proclamation）说：

“驻华各国水师提督等为晓谕事，照得目下北省团‘匪’作乱，各国之所以调兵进京者，不过为救援各国人民起见，并非另有他意。兹当拔队进京，如有团‘匪’或中国人民敢于阻御者，定即痛加攻击；苟不抗拒，亦断不侵犯地方。为特谕中国沿海及沿江等省督抚及一切官员知悉。”

这篇宣言是“向中国人民保证，他们的武力是，并且总是用来仅对拳民‘叛乱者’和那些反对救援北京的外交人员及其他外国人员的。这篇宣言证明，外国的海军上将们最后终于开始体会到北部中国这次骚乱的性质和原因了，宣言在直隶的有利影响甚微；但是，它却被上海和其他条约口岸的领事官们所复制和重新发表，把它作为消除认为北部战争即表明帝国之逼近瓜分的这种疑虑”。

美国历史学家施达格先生在这里论述联军《大沽宣言》时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论点：第一，这篇宣言证实了联军统帅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的改变；第二，联军统帅发表这篇宣言并要求广为宣传的目的在于消除中国人民对瓜分中国的疑虑。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两个重要问题，因为它们表明了自甲午战争以来五六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日益严重的和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

毫无疑问，联军统帅对时局认识的改变是由于他们以进军北京为目的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一再失利导致的。6月14日，第一次联军即西摩尔联军在拳民的血战下于廊坊受阻，只好撤退，不得前进。6月17日，第二次联军进攻大沽炮台，准备由此登陆援助西摩尔军共同向北京进军。不料在清军爱国官兵的坚持抵抗下，“伤亡惨重，军火供应不足”，连去天津都“最迫切地需要援军”，“需要机关枪或野战炮”，当然更谈不上进军北京了。假定两次联军都能顺利地到达北京，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有所谓《大沽宣言》的发表了。在各国公使和舰队司令差不多都拥有“自行决定采取最适合的行动步骤”的权力下，联军如果能够“到达北京”，那么“局势将是怎样”，那是“不

同上书，第120页。

《义和团》（三），第290页。

佐原笃介等：《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184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按这篇《大沽宣言》亦即联军向清政府地方官吏致送的《照会》：“为照会事：照得在华各国水师提督等，情愿知会各总督及各省、各府、各县、并海口大吏地方官，各沿海河口各文武官员等，所有动兵用械，只为弹压义和拳‘匪’，及所有拦阻我军等驰往北京救援各本国人等。为此知会，请烦查照可也。各国水师提督在大沽口，于西历一千九百年六月二十日，华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会议订立于右”（见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二十二卷，第41页）。译文与上述《宣言》大同小异。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46—247页。按这篇宣言乃是应联军各司令的要求而在中国各地公布的。例如1900年6月23日上海领事团的布告结尾处便声明：“本布告（即宣言一引者）系应大沽口方面高级司令官的请求而公布”（见《义和团》（三），第531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可能预言的”。这个在两年前就发表过中国注定是一个“垂死的国家”的言论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今天又说出了局势的“不可能预言”的话，人们不难想象出它所意味到的瓜分的含义。更何况在半个多月前，即5月28日晚在北京外交使团的会议上，德使克林德曾经公开“表示赞成”“瓜分中国”的意见呢！并且列强都知道，沙俄立意要把东北从中国瓜分出去，在“满洲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在那方面要求完全行动自由，因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铁路”的借口下，准备实行全面占领。所以，赫德就不无理地说出我们在前面所引用的那句联军进京就“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话。如果他们能到达北京，联军统帅们也就用不着发表“并非另有他意”，“亦断不侵犯地方”的那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宣言了。

战争形势本身的重大变化，迫使联军统帅们不得不改变他们对中国时局的认识。拳民的血战和清军的抵抗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本来认为，这也是绝大多数帝国主义侵略者自甲午中日战争以来的共同看法，中国人民“现在还是一个原始的群体，个人利益是其唯一的动力，盲目的愤怒取代了爱国主义的发愤图强”。“中国人像所有其他的东方人一模一样，都不尊重论据而只尊重武力，这样一个惯用语再加上中华帝国是由一群毫无活力的群众所组成的信条，所以西方国家能够对他们为所欲为而用不着害怕他们的抗议和憎恨”。这个“向来以‘睡狮’名称成为列强怀疑目标的中国，也因中日战争暴露了势力，身价降落到‘死骆驼’以下，列强于是各随所欲，伸展他们的爪牙，对中国全境各自划定势力范围，促进了再进一步便是瓜分中国的局势”。他们对中国人民这样看，对清政府的军队他们又是怎样看待的呢？他们认为清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从来没有取得过一次胜利，在每一个战场上都是望风而逃，并且把坚强的阵地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弃了；她的舰队，本来寄托着许多希望，却可耻地被驱逐到了设防港口的掩护之下；她的司令们的自我表现全都是无能的，很多还是懦夫；她的管理以缺乏效率和腐败而闻名于世，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和承平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侵略者认定，“中国的一切希望已成为泡影了”。

没有义和团同爱国官兵的血战联军，联军统帅们是不可能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认识的。当西摩尔联军在天津出发之际，当各国联军决定进攻大沽炮台之际，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认为进军北京，乃指顾间事，朝发而夕至耳！他们瓜分中国之心已炽，那里想得到会被阻于廊坊，受创于大沽，又被痛击于天津老龙头火车站呢！在到达北京的希望已成泡影之后，他们一想到如果拳民手中掌握了新式武器，如果拥有新式武器的清朝水师也参加卫国

《英国蓝皮书》，第47页。

同上书，第44页。参阅本一所述各国公使所拥有的便宜行事的大权。

索尔兹伯里：《致驻日大使怀特赫德函》（1900年6月16日），见《英国蓝皮书》，第44页。

伦敦《泰晤士报》1898年5月5日第七版。

《德国外交文件》（二），第15页。

同上书，第21—22页。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410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77页。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4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55—56页。

战争的话，就会是面对着全军覆没的前景而心有余悸的。世间一切东西，没有比事实更顽强的。这一被阻和受创的事实，就使得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中国军队一遇到外国军队全都“望风而逃”的论点，也如同说少量外国军队，可以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的胡说一样，被“永远彻底地消除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主义的人民起义和民族战争。联军统帅们在总结西摩尔联军和大沽口事件后，不得不“最后终于开始体会到北部中国这次骚乱的性质和原因了”。

根据上述事实，再加上遍及各地的人民起义，远在欧洲的西方人民也得出了同联军统帅们在某些论点上相一致的看法。

1900

年6月1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Vorwärts）在其社论《铁拳》（Die gepanzerte Faust）中说道：

“在大沽，中国的海岸炮台和停泊在大沽口前的列强军舰已经展开了战斗。……并继续七小时之久。……由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两千名远征军，现在的处境也已非常危险。……起义并不仅限于直隶省，并且也在江苏和广西爆发了。……英国报纸认为，有关列强必须各派一万人到东亚去。然而，调配这样的兵力，是不是就足够应付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还值得怀疑。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应付中国的人民运动，列强想要扑灭它，也许会门牙都被打掉。假使列强仅仅是同中国政府及其正规军交手的话，列强的处境就不像现在这样不利。……反对所仇恨的外国人的人民战争，将使被称为怯懦的中国人，表现为另外一种光彩的好战士。……现在，这种侵略政策以及对中国人民民族尊严和民族存在的一切侵犯行为的后果，对于所有的人说都已经昭然若揭了。……我们的报纸上的殖民狂热和海军狂热，现在不能不因为他们所鄙视的那个民族爆发了民族起义而大为晦气了。……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是谁给了外国人要求中国人放弃他们原有的信仰并强使他们信奉其教义，同‘基督教’列强的行为大相径庭的宗教权利呢？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应该……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

当然，联军统帅们是为瓜分中国而进军，不会“同情”中国“维护本国领土”的斗争的。但是，他们在“晦气”的战争和“非常危险”的“处境”中是会体会到“也许会门牙都被打掉”，并想一想是谁给了他们以“瓜分中国人的国家”的权利的。不管出于何种考虑，联军统帅们认识到他们瓜分中国的罪行是一切问题的总原因，也不管是出于权宜之计还是什么别的打算，他们也只好声明他们“并非另有他意”，“亦断不侵犯地方”来粉饰一下自己，间接地否认他们有瓜分中国的企图，并请求各条约口岸的领事们把这分宣言作为布告，到处张贴，为的是消除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疑虑。

联军《大沽宣言》的真正历史意义在于：它不是联军统帅们在一夜之间忽然变得慈善起来，不愿瓜分中国了。他们不是不愿，而是不能。瓜分中国的第一步是进军北京。现在他们连第一步都作不到，还侈谈什么第二步呢？

同上书，第 101 页。

按 1900 年 6 月 18 日老龙头火车站之役见第九章《天津的激战》一节。

明恩溥：《动乱中的中国》第 2 卷，第 443 页。

促成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的真正力量，乃是6月14日在廊坊的拳民血战，乃是6月17日爱国官兵在大沽口炮台对联军的坚持战斗。“嗟乎！列强之于东亚，鸢顾鹰瞵，龙骧虎视，其视中国之地，则波兰耳，印度耳；其视中国之民，则奴隶耳，牛马耳。岂不谓瓜分之，豆剖之，惟我所欲；拉拽之，蹈藉之，任我所为。然而揆以理则未顺，度以势则不能也”。这里根本之点是“势则不能”；因为他们在军事上受到重创。否则，理虽“未顺”，波兰照样受到瓜分，而印度也照样曾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的。

按西摩尔联军在6月22日夺取西沽武库以后才最后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它在6月20日即《大沽宣言》发表以前的“危险处境，在大沽口的联军统帅们是知道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10页）。

第九章 拳民京津鏖战与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900年6—7月上旬)

自1900年5月底6月初，时局急转直下以来，形势的变化极为复杂，又是非常迅速的。爱国主义的义和团反瓜分运动，业已席卷京、津，在全国爱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下，正在方兴未艾。这种情况迫使各方面的政治势力，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是站在义和团反瓜分运动一边，还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因为形势的发展已经使得人们再也不能犹豫不定了。

拳民们的廊坊血战与爱国官兵的大沽口抗战，已经迫使以联军统帅们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通过6月20日的《大沽宣言》，表示了他们明确的态度。那就是说明联军这次军事行动没有瓜分中国的“他意”，只是对“敢于阻御”他们“调兵进京”的拳民要“痛加攻击”的。历史的讽刺正在于，帝国主义侵略军如今却在打起不瓜分中国的旗号下去攻击反瓜分的义和团爱国运动了。不管怎样，他们是非常痛恨义和拳民，必须把他们的进攻矛头主要地指向拳民了。至于清政府，形势的发展也迫使他不得不公开表态了。但是，对它来说，这个表态过程却是很曲折复杂的；因为它牵涉到主和与主战的根本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牵涉到清皇朝的兴废存亡的根本问题。它到底怎么决策，就是我们在这一章中首先要加以讨论的问题。

第一节 清政府御前会议与《宣战诏书》之发布（1900年6月21日）

在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二十五日）发布《宣战诏书》以前，从6月16日起，相继在17、18和19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仪鸾殿召开了“王大臣六部九卿”等“约百余人”参加的会议，“是为庚子御前四次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对义和团是“剿”是“抚”，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是和是战等两个彼此相关的重大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所谓列强“勒令皇太后归政”的新问题，最后决定宣战，并于21日发布了《宣战诏书》。现在我们就御前会议之性质和经过、所谓“勒令皇太后归政”和决定宣战的主客观因素等三个问题作如下一些论述。

一、御前会议之性质和经过

御前会议是在6月16日到19日这四天中召开的，我们已经知道，这时大量拳民已在京城内外展开斗争，帝国主义列强已发动侵略战争，形势已非常紧张；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面临这种形势，正像联军统帅们在6月20日发布《大沽宣言》一样，他们已经势成骑虎，不明确表态是不行的。

在此以前，清政府通过刚毅涿州之行，已经确定了拳民“不能解散”；通过“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亦已足敷保护”的事实，认识到西摩尔联军“倏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对列强侵略军之来北京已经是顾虑重重的了。6月16日，贝勒载灏的奏折说：拳民斗争“端由积怨太深之故。朝廷即大加惩治，恐复溃甚防川。若是断绝根株，将来赔款钜万，偿命多人，实有非今日力所能给者。彼类愿或不遂，仍多责言。彼时民心涣散于内，敌衅猖獗于外，大局何堪设想！”且拳民“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不扰良善，则系众口一词”。他的结论是：“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人心之所同，即天心之所系，转移之机，即在于此”。

《义和团史料》（上），第23—27页。

《各国宜守和平宗旨说（上）》（1900年7月28日《中外日报》），见《义和团》（四），第186页。按在同篇文章中还提到了要求列强遵守这篇关于不瓜分中国的《大沽宣言》；它说：“当夫起事之初，大沽之各国水师提督，公议照会各省督抚，声明此次用兵，专剿义和拳‘匪’，及阻止西兵，进援钦差商民人等，并无他意。斯言也，固天下所共闻也。今若顿变其宗旨，而以暴易暴，假公济私，是前日所言，为给人之计，势必动四百兆之公愤，群起而与为难，商务从此不通，大局何堪设想，是则有害于东亚大局矣”（见《义和团》（四），第187页）。1900年8月19日，慈禧太后在怀来发寄李鸿章的上谕也说到此事，谓“彼方以代民除‘乱’为词，谓于国家并无他意”（见《义和团》（四），第39页）。这几句话就是指《大沽宣言》说的。可见《大沽宣言》以放弃瓜分为名而在企图缩小拳民运动的影响上，是多少起到了一点作用的。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7、50页。按仪鸾殿所在之地即今怀仁堂；参加会议人数在恽毓鼎的《庚子日记》中为“约四十人”（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0页）。相差60人。可能“约四十人”是正式出席人数，“约百余人”则包括了列席的人数。如果说这是“王大臣六部九卿”的御前会议，那么恽毓鼎本人作为当时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去参加，就应当是属于列席的人了。

高栲：《日记》，见《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6页。

既然事实和情况如此，那么为什么就从6月16日当天下午开起，还要费四天时间，开四次御前会议来讨论“和”、“战”，“剿”、“抚”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投降还是抵抗的问题。

就第一次御前会议的经过情况来看，当时大沽口之战尚未爆发，西摩尔联军尚在廊坊，慈禧太后召开这个会主要是属于征求意见的性质。她说：“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摠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随而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民，设法解散，遂麾群臣出”。当时的主要问题还是阻止西摩尔联军入京，所以决定了派员出京；同时荣禄在场说他将把袁世凯“调入京城镇压‘乱’民”。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这次会议对“和”、“战”，“剿”、“抚”还是没有什么定论的。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和派主张“弹压‘乱’民”，他们是“乌合之众”，是不能保国的；认为此时不能言战，战必亡，“国命安危，在此一举”，“无论是非得失，万无以一国尽敌诸国之理”，即“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理”。以端王载漪为首的主战派则认为“人心不可失”，“义民起自田间，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今以为‘乱’欲诛之，人心一解，国谁与图存”？对于洋兵之来则认为可以董福祥“御夷，当无敌”。在几次御前会议上，说来说去，两派对“和”、“战”，“剿”、“抚”的理由无非就是这些。在当时情况下，主和派的理由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战争是由列强首先发动的，并且是以“联军”的形式组成的。中国要么投降，要抵抗就是“尽敌诸国”，对这种强加于中国的联军，清政府不能承担责任，他根本就没有选择的自由。至于把拳民评为“乌合之众”，就其纪律和战绩来说，也是不符事实的。主战派主张抵抗列强入侵，除了对董福祥的“无敌”评价有夸大之处以外，对拳民的看法还是合情合理的；当然我们不否认其中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至于主持会议的慈禧太后，虽“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她还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所以在列强于6月10日派出西摩尔联军，首先发动侵略战争，侵略中国之际，“如果中国政府曾经愿意同外部世界作战的话，那么，西摩尔远征军的登陆就已经为它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口实”。但是，“这个口实并没有被利用”。这个“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慈禧太后谈起主和的理由来，可以比主和派谈得更多更好。所以在第三次会议上，她批评那帮人说：“若所言，吾皆习闻之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2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6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8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8页。

同上书，第47页。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同上书，第337页。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378、435页。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378、435页。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一），第13页。

比如说，端王载漪以其子溥俊被慈禧看中，在戊戌变法后，“欲遂立溥俊，各公使不听，有违言”（见《义和团》（一），第11页）之故，遂存心利用拳民的斗争来为自己个人的目的效力。

尚待若言耶？”在这次会议上，她虽说由于拳民斗争来势甚猛，深恐“纸老虎穿破”而“不敢轻说‘剿’办”，但她毕竟没有下达让荣禄调袁世凯来京的命令。这时，她“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对于“和”、“战”，“剿”、“抚”的问题，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只好不了了之。她虽也说了“岂人心亦不足恃乎”？“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的话，但实际上是没有决策的。

不料，在当天晚上偶然发生了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决定了御前会议必须继续召开，使会议性质为之一变。这个问题是“二十（16日——引者）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罗嘉杰——引者）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即“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荣禄看见这四条后，“绕屋前，旁皇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自此以后的三次御前会议的性质，就由征求意见的性质一变而为因列强“勒令皇太后归政”而成为主战的会议了。

6月17日下午又召开第二次会议。慈禧太后在会上说：“顷得洋人照会，凡四条”；但她只讲前三条而讳言“归政”一条，作为“其一未详”一笔带过后复说：“现在是他开衅，若如此将天下拱手让去，我死无面目见列圣！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群臣闻之悲愤，大半皆决战议，端郡王、侍郎溥良言之尤力”。太后复高声谕云：“你们诸大臣均听见了！我为的是江山社稷，方与洋人开仗。万一开仗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尔等今日均在此，要知我的苦心，不要说是我一人送的天下！”于是“派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论以利害，若必欲开衅，可即下旗归国。三臣先出，复谕荣禄布置战事，群臣始退”。18日召开第三次会议，会上“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19日召开第四次会议，“太后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派兵护行”；“因彼水师提督，塞我大沽口门，占我炮台”，“已成决裂之局，无可挽回矣”。

不过，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慈禧太后也始终没有把主战的思想统一起来。在她决定宣战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中，甚至光绪皇帝也没有同意她的这个决策。他立即下坐执总署大臣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毋误事。”“皇帝当日曾叫许景澄救我”，“因持其手而泣”，许景澄“亦泣”，哭作一团了。但是，慈禧是不管这些的，决策已定，没有再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438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33页。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一），第14页。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436页。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436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8页。

同上书，第49页。

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0—51页。按当时盛传，“事初起，或言外人有以四事要挟者，诸王愤怒，遂激成此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31页所载黄曾源：《义和团事变》）。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一），第14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9页。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一），第339页。

行讨论的余地了。这个“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太后，虽因“归政”问题而下决心利用义和团，不惜一战，但“当宣战之日，因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她召开会议的目的，无非是“特籍盈廷集议，一以为左证，一以备分谤”罢了。不过，在她自己以后又立意主和以前，这帮在御前会议上坚持主和的所谓“五大臣”，由于政局的发展和消灭左证等等的需要就得身首异处了。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于7月29日，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于8月11日，皆相继“斩于市”。这个老练阴险的慈禧太后就是这样来主持晚清政局的。

二、所谓“勒令皇太后归政”的有无真伪问题

从御前会议的经过来看，所谓“勒令皇太后归政”问题乃是决定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主张宣战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过，在迄今为止的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中，这个问题的有无真伪尚是一个未曾解决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宣战以后就曾经受到过主和派的否定。袁昶说：“决战之机，由罗粮道嘉杰上略园相书，称夷人要挟有四条（相出示同列，其一条，称请归政，不知确否，各公使无此语，岂出于各水师提督照会北洋耶？北洋不以上闻，而罗轻启当国者，此人乃祸首也）。致触宫闱之怒，端邸、徐相、刚相、启秀等，又力主惩治外人，推抨之几遂决”。袁昶在7月29日被杀前曾断定“罗语妄诞不根，荒唐无据，轻率密禀，实为祸魁，非请旨革职拿问，讯明严惩不可”。还有人认为这是罗嘉杰的“轻信”，“各国无是说也”。后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H.B. Morse）也说它是“一份伪造的公文”。有的说，“这四点要求，实际上是端王（载漪——引者）捏造的。”或者说“这些要求纯系捏造，几乎可以肯定是出于端王之手。”或又说：“有人伪造各国公使要求太后归政照会，太后声言决战。”但是，问题的破绽在于，罗嘉杰诚然“轻信”，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和她所信任的荣禄却决不是这样“轻信”的。况且，在16日晚间得到此四条后，到21日发布《宣战诏书》，中间还有四五天时间和好几次御前会议，清政府和使馆之间的联系并未中断，要弄清这个问题应当说不是很困难的。再说，在20日清军和义和团开始攻打使馆后，肃亲王善耆曾要求一位京师大学堂教授秀耀春送一封信给英使窦纳乐说：“他深信，如果他能够带给朝廷一项关于各国无意瓜分中国的保证，那么，便将下令停止攻击。”窦纳乐授权秀耀春先生说：“所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9页。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434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50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51页。按太后此举，还在借此诛锄所谓帝党，戊戌政变后革职流戍新疆之张荫桓亦于此时“追坐”“赐死”（《义和团》（一），第52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9页。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一），第340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9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193页。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44页。

有各国驻北京使节的任务是要维护同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英国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国家对中华帝国的完整都不怀有任何图谋。”肃亲王在得到此信后，“立即上马向宫廷的那个方向奔去”。如果窦纳乐此说正确的话；那么，慈禧和荣禄即便一时“轻信”，也当不再继续“轻信”下去了。

关于所谓“勒令皇太后归政”的有无真伪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问当时有没有“四条”之说？其次是如果有“四条”，那么在其中是否包含有“勒令皇太后归政”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一解决，那么别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现有史料证明，这“四条”是有的，其中正好也包含了“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一条。它是帝国主义列强驻京公使们准备在西摩尔联军到达北京以后作为对中国的瓜分方案，即他们所谓的“重建方案”（a scheme of reconstruction），也就是赫德所说的“能够改变历史”的方案而事先起草的一个文件。起草这个文件的人非他，原来就是“游中国二十余年，历充同文馆大学堂教习、赏头品顶戴”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鼎鼎大名的中国通丁韪良（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他回忆受命写这“四条”要求时的情况说：“我被告知，列强驻京公使们在提出要皇帝复起（也就是要“太后归政”——引者）方面时意见一致。这个想法本是理所当然，以致于没有一个人敢于声称，他想到这点乃是一个创见；不过，笔者也许是把这提出来作为重建方案的基础的第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早在六月中旬，便已经形成了文件，它在掀起围攻使馆以后不久就付印了”。这个在当时“业已送呈各国使臣核览”的《丁教习韪良条陈》说些什么呢？它说：

“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秩序恢复，同时也是怎样把一次革命的果实拿到手（secure the fruits of a revolution），这次革命非常出人意外地已经把中国的命运交给了外国列强。以下四条措施看来可以充分地处理这些问题：

1. 必须把皇太后流放（let the Empress Dowager besent into exile），以消除她所造成的损害，必须让皇帝在附属于几个大强国提携的条件下，恢复他的适当的权威。
2. 自戊戌政变以来开始的，所有皇太后的政令，包括她所任命的党羽，除为新政府所同意者外，必须一律废除取消。
3. 皇帝的改革计划，必须在列强的批准下方能重新开始和执行。
4. 必须让列强划线分出他们的利益范围，每一个强国均须任命一个代表，以控制省政府的行动。

对于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自主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上述计划可能使现存的政府机关保持运转，可能防止无政府状态，可能有利于进步，也可能赢得中国人民中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否则，只有推翻当前的朝代和帝国的正式瓜分（the formal partition of the em-pire）——那是一个笼罩着长期的、激烈的冲突的过程。外国列强通过我所提出的这个方案，将有时间来慎重拟定他们的政策，将有时间来引进逐步的改革，这要比起他们通过公开的或暴力的并吞所能希望拿到手的東西多得多。通过中国人来统治中国是容易的；否则，就不可能。

北京，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八日。”

欣斯利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634页。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76页。

《英国蓝皮书》，第262—263页。

胡思敬：《驴背集》，见《义和团》（二），第518页。

丁韪良：《北京之围，中国对抗全世界》，1900年英文版，第145页。

这就是丁韪良所拟定的“四条”的内容。无独有偶，英国在上海的喉舌《字林西报》于6月19日晨就发表了一篇社论说：

“中国与列强同时作战，是出于慈禧太后及其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外国列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批奸党如不自动离去，就必须把她们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找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应该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战争的是慈禧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

此文在6月20日即由《北华捷报》作为每周社论转载，其中“太后归政”的腔调与上述“四条”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同时在中国南北一齐抛出。可见所谓“四条”在实质上乃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酝酿已久的一个瓜分中国的方案。这个方案很显然，它是在“勒令皇太后归政”的条件下，以光绪皇帝为傀儡，以列强在华势力范围为基础来拟定的对中国进行非正式的瓜分方案。

这个方案是在6月18日正式送呈各国公使的，但它在16日晚就被罗嘉杰弄到手并送呈荣禄了。17日晨，荣禄把它送呈了慈禧太后；两人在当天上午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准备，下午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抛出了它的部分内容。丁韪良的“四条”与御前会议上讨论的东西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就是要清政府“将天下拱手让去”，但在内容的细节上，慈禧作了更改。她不仅闭口不提“把皇太后流放”的“太后归政”，反而把它说成是把光绪皇帝流放，即所谓的“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用心良苦。不管她作什么更改，反正她同荣禄两人，是看到了丁韪良“四条”原件的内容的。

在义和团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在丁韪良看来，瓜分中国只能采取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种方法。二者择一，别无他法。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保留清朝政府。丁氏“四条”虽说“让列强划线分出他们的利益范围”并在各自的范围内自行派出代表加以控制，但仍然保留了一个在列强共同控制下的光绪皇帝。这样，表面看来，中华帝国还是“完整”的，所以在6月20日英使窦纳乐可以通过肃亲王向清政府保证，列强“对中华帝国的完整都不怀有任何图谋”。但是，看过丁氏“四条”原件内容的慈禧太后，深知其中卖的是什么膏药，可以说是与“太后归政”问题毫不相干，当然不会发生什么作用。须知，所谓中华帝国表面上的“完整”，在“太后归政”以后，保留光绪皇帝也是可以完全作得到的。不过，慈禧所谓“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语，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她得到的是江苏粮道罗嘉杰弄来的副本，并不是洋人向清政府提出的正式照会。丁氏“四条”要以正式照会的形式送达清政府，是必须以西摩尔联军到达北京为其先决条件的。

左原笃介等：《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229页。

丁韪良：《北京之围，中国对抗全世界》，第146—147页。按这份所谓《丁韪良条陈》乃是他从北京后来出走到天津后，在他发表于1900年9月15日的《京津时报》（thePekingandTienTsinTimes）上的一篇《重建问题》（TheProblemofRecon-struction）文章中公布的。丁韪良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他在9月13日对这“四条”所必须作出的一项唯一的补充，即“外国列强的联合委员会（thejointcommissionofforeignpowers）对于敌视他们共同利益的一切措施都应该有一个绝对的否决权。除此以外，他们应当发起进步的改革，但这不是唯一的事情”（丁韪良：《北京之围，中国对抗全世界》第147页）。丁韪良犯下了阴谋设计瓜分他人国家的罪行，却不忘侈谈“进步”来作掩饰，可谓无耻之尤。

三、决定宣战的主客观因素与发布《宣战诏书》

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诏书》，内容如下：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迨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泉张，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披猖，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浹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令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冑，礼义干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剪彼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尚义捐赀，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这篇诏书称义和团为“义勇”，颂扬“慈圣”即皇太后的“恩德”，指出在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侵略战争的情况下不得不宣战的理由，写得倒是很慷慨激昂的。不过，这一行动确实既违反了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兴起以来数十年间清政府横加镇压的先例，又不符合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它的一贯妥协投降的事实。连在胶州湾登陆的一队德军，它都不敢抵抗；如今是八国联军，它竟敢于宣战，真是出乎帝国主义列强意料之外了。因此，英使窦纳乐就说：“没有一个欧洲人（在北京肯定是没有的）曾预见到这件事。”“很显然，如果中国政府方面要挑起同所有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的争端，那将是发疯。同时，没有人认识到这个可能性，即中国政府事实上将要发疯，而且它将做那些当它仍然清醒时决不会想象到要做的事。”列强的公使们不知道，他们委托丁韪良拟就的“四条”方案已经泄底，而他们所轻视的拳民却敢于血战联军。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不得不被迫宣战，以为权宜之计，企图侥幸渡过自己的难关。于时决定清政府宣战的主观因素是所谓“勒令皇太后归政”问题，而决定性的客观因素则是义和团的血战联军。

所谓“勒令皇太后归政”问题乃是自1898年9月戊戌政变以来始终悬在慈禧头上的岌岌可危的达摩克里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它折磨着慈禧不仅难以废立光绪皇帝，并且还有把她“流放”，以“勒令”她“归政”于光绪皇帝的危险，这样就形成了两人之间势不两立的倾向。“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中未尝稍释，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卒行”。1900年1月

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18—219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8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2—163页。按《宣战诏书》系“军机章京连文冲”起草的（见《义和团》

24日，慈禧“立端郡王载漪子溥儒为大阿哥，天下然，经元善等连名上书至二千人。载漪恐，遣人风各公使入贺，太后亦召各公使夫人饮，甚欢，欲遂立溥儒。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夜谋所以报”。她深知此事要冒极大风险，到时候不仅废立不成，反而会迫令自己归政。因此，早在1899年11月21日，她就在寄各省督抚的上谕中说：“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谕中所谓“万不能允之事”，指的就是“勒令皇太后归政”问题。如今，在丁韪良的“四条”措施中，她真地看到这个“万不能允之事”出现了，并且这个归政还是以“必须把皇太后流放”来作为其先决条件的，这就不免使她更大吃了一惊了。这就是她宣战的唯一理由。当然，她在事先也不是没有预感，所以她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中要派人“出京劝阻洋兵”，因为她深恐洋兵入京，可能迫她归政。直到1900年11月21日，清政府已同列强议和之际，她还一直在询问议和全权大臣奕劻和李鸿章说，所议条款中“有无万不能行之事”，要他们“据实密奏”。可见在义和团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是为了这个“太后归政”的问题而忧心忡忡，坐卧不安的了。

但是，清政府这次发布《宣战诏书》，却是不以慈禧个人对“太后归政”问题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取决于义和团对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战斗成果的。如所周知，西摩尔联军是在6月10日晨自天津出发的。京津铁路全长不到85英里，如果没有拳民们的阻挠和事先破坏铁路，那么联军朝发夕至，问题早已解决，清政府根本就来不及发布《宣战诏书》了。西摩尔联军受阻只不过是推迟了他们到达北京的时间，事实上直到6月18日，北京的公使们还在向联军紧急求救，而慈禧的主战则是在17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才基本确定的。如果没有拳民们14日在廊坊的血战，使联军受到重创不能继续前进的话，那么就会等不到21日《宣战诏书》的发布，联军也早已到京，可能就会按照丁韪良的“四条”措施来解决问题了。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慈禧的归政和流放不管怎样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第一，就清皇朝而论，它的生存权，说得坦白一点，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就多少是操纵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的。“在一八五三年以后，满清朝之所以在中国当权，既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精力充沛，也不是由于它的臣民效忠，而是由于列强曾经愿意它蝉联

（一），第17页）。诏中所指之杜士兰（DuChaylard）系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照会》指由他代表各国把大沽口联军的照会于6月17日上午送交直隶总督裕禄，其时大沽炮台已沦陷。照会内容与联军司令致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的最后通牒相同。据1901年2月14日上谕，认为“五月二十四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即1900年6月20日至8月14日）谕旨”是“拳‘匪’衅起，凭恃城社，挟制朝廷”，“首祸诸人竟于事机纷扰之际，乘间矫擅”的；故把它们“提出消除，以重纶音而昭信史？”（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47页）靠“消除”第一手史料来“昭信史”，真是匪夷所思；然而在历史上却又是真有其事，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因此，这篇《宣战诏书》在《清实录》或在《光绪朝东华录》中，都是找不到的。

《英国蓝皮书》，第96—97页。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7页。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一），第11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7页。

下去。否则满洲人也许不会苟全于太平起义之中了”。第二，教案的责任问题，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列强要求不仅是处理地方官员，而且必须惩办该省的总督、巡抚。“任何一件暴动案发生，外国所要求的第一个人头，不是‘无名小卒’的暴乱分子的头，而是该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头”。如今，义和团运动在好多省份爆发，列强所要求负责的不只是省的当局，而是清政府的最高当局——慈禧太后了。如果西摩尔联军到京，慈禧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她在16日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中要派人去劝阻，试问他们在天津就根本不听直隶总督裕禄的劝阻而枪夺火车头以行，他们能听那桐和许景澄两个侍郎的劝阻吗？当然，义和团也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出都行至丰台，为团‘匪’所截，牵入坛内，将甘心焉。二公再四申说，皆不听，曰吾团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二公此行，必将通情洋人，以害我等耳。然既为朝廷大臣，亦未便遽加诛戮”，“即回京覆命可也”。

由此可见，清政府之得以发布《宣战诏书》，实在是拳民们英勇抗敌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拳民们6月14日在廊坊的血战，西摩尔联军迟早是要到达北京的。他们的到达意味着帝国主义列强把事先炮制好了的瓜分中国的方案、即丁韪良“四条”措施的执行；而所谓“勒令皇太后归政”只不过是其中一条罢了，重要的是他们要根据其势力范围，划线瓜分中国。拳民的斗争使他们不可能抛出这“四条”，这当然也是属于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因其没有正式出笼，所以我们在正式论述这个问题时没有提到它。“四条”措施虽说是一个非正式的瓜分方案，不过，只要它一经出笼，谁也很难估计它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它的起草人丁韪良直到1900年11月6日，尽管当时情况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他还顽固地坚持这“四条”，后来他又倡言说：“满洲之入中国也，兵分八旗，今我八国之兵，其国旗亦犹是也。天道好还，不急取，后悔何及。”可见丁氏“四条”无非是由非正式瓜分过渡到正式瓜分的一个很阴险的方案。

在发布《宣战诏书》的同一天，清政府还“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认为“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抚如能召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此外，清政府又根据津、沽战况，传旨嘉奖义和团说：

“各国……恃其坚甲利兵，攻我大沽口炮台，又由紫竹林分路出战。经裕禄四处分应，复经我义民竭力协助，以血肉之躯与枪炮相薄，……击坏兵轮二艘，杀敌不少，众志成城，民心既固，兵气亦扬。所有助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且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此皆……团民万众一心，有此义勇。著先行传旨嘉奖，将来事走后，再行加恩。尔团民等，惟当同心戮力，御侮效忠，始终勿懈，有厚望焉。”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8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82页。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50页。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一个美国外交官的观察、回忆和结论》第2卷，1906年英文版，第75页。

佐原笃介等：《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135页。

参阅丁韪良：《北京之围，中国对抗全世界》，第147页。

胡思敬：《驴背集》，见《义和团》（二），第518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4、163页。

次日，军机处寄裕禄上谕说：“为今之计，只有多集义和团，加以激厉，厚我兵力”，形成了中国军民并肩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局。

第二节 “雄豪意气今何在？坛场宫馆尽蒿蓬！”

拳民与爱国官兵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早在《宣战诏书》发布之前便已开始，《诏书》发布以后拳民们在北京和天津等地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拳民的斗争代表了“每个中国人都将为了把外国人（侵略者——引者）赶出去而欢庆”的爱国热情，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度终结了帝国主义列强颐指气使、横行霸道的无法无天的时代。“绅士们在天津（在北京也是如此——引者）过着豪华、惬意的时代已经終了，代之而来的是鲁宾逊的时代”。

拳民由于没有新式武器，除了破坏铁路电线以阻止敌军进攻外，他们都采取了焚毁教堂、跑马场和攻打租界等斗争方式。为什么采取这种斗争方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Nixon, Richard）在其所著《真正的战争》（The Real War）一书中有一段话可以帮忙我们理解其中的部分原因，现在我们把它引用如下。他说：

“对中国来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是同外部世界发生严重冲突的时代，是中国本身彻底变化的时代。从中国的观点看，它早年同西方的接触——以及还有它后来同西方的许多接触——都是屈辱的，灾难性的，只有助于加强对‘洋鬼子’的敌意，同时又加深了文化优越感。西方人到中国来，有的来殖民，有的来传教，多数则是来剥削的。然而，最使人沮丧的，不是经济上的影响，也不是政治上的影响，而是故意对中国人民的尊严进行的冒犯。我在一九五三年第一次访问香港时，我问一位已经很有成就的亲英的中国企业家：如果香港人民有机会在独立和继续作为英国殖民地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怎样投票？他回答说，尽管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在经济上比在非共产党亚洲其他地方的独立政府统治下的人民富裕，大概还会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投票赞成独立。我问这是为什么？他说，……在亚洲各地的华人中有句俗语：英国人每建一个殖民地，他们就按下列次序建立三个机构：第一，教堂；第二，跑马场；第三，东方人不得加入的俱乐部。一九七二年，……上海市委书记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指点着一个完善的儿童游戏场。他平静地说，这个地方以前是高尔夫球场，入口处挂着上写‘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没有再说什么，也无须说了。我上次在一九七九年访华时，到了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引者），东道主一再指出过去是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或其他欧洲国家‘租界’里的医院、学校和其他建筑物，中国人只有在受到欧洲人邀请的时候才能进入租界。中国人自尊心极强，在他们看来，这些怠慢是不可原谅的。”

由此可见，教堂、跑马场和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租界等等，这些帝国主义列强的“坛场宫馆”，乃是他们在建立殖民地的过程中的几个机构。在中国面临瓜分危机的形势下，也就是中国正在由半殖民地走向殖民地、由附属国走向保护国的过程中，这些机构无疑是代表着帝国主义列强行将瓜分统治中国的权威的象征。这些机构乃是一块硬币的两个面，另一面则是无情地掠夺中国的让与权。义和团在起义以后，由于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就把他们的主要斗争锋芒指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62、167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62、167 页。

赫德：《致金登于》（1900 年 6 月 3 日），见《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7 页。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 78 页。

向了这些机构，指向了帝国主义列强作为瓜分统治中国的权威性的象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现在我们把拳民们在北京和天津的斗争情况分述于下。

一、拳民在北京的斗争

1900年夏秋之际，义和团在北京的斗争曾经是举世瞩目之所在。“当其时中国都城，处于惊风骇浪之中，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虽英国适有南非之战，世人亦暂忘之，其事之重要离奇，可以想见”。 “当北京之围结束后，一个美国的主要传教士写道，‘鉴于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太大，那样的事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即人类竟敢于忘掉其在十九世纪结束那年在中华帝国的经验’。他这个谨慎的预言未必应验。义和拳起义（The Boxer Rising）是历史上诸如波士顿茶叶事件（the Boston Tea party）和加尔各答黑洞事件（the Black Hole of Calcutta）等等事件之一——我们都记得，它们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它们那栩栩如生，引人注意的性质起到了保存自己的作用，它们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每一个人头脑中必备的一般知识”。拳民在北京的斗争乃是整个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当时中外人士的注目，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义和拳在京畿一带的活动为时较早。自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等在梨园屯发动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以来，随着运动在冀鲁边区和冀中地区的蓬勃发展，北京城内就开始有了零星的、逐步扩大的习拳和散布揭贴的活动。1900年春，“有拳民入京授人以艺者，初在僻处，继则城厢内外街巷中，时见率领十五六岁之俊童，授以艺”。5月27日义和团进占涿州使形势急转直下以后，京郊各县拳民便纷纷进入城内，到处“铺团”，到处张贴揭帖。广大的劳动人民，“肩挑负贩者流”纷纷参加；爱国士兵参加的也不少，如守卫京城的神机营和董福祥率领的武卫后军等等。据说董军中练义和拳的就有“五百余人”之多；义和团著名的首领之一李来中，据说就是“董福祥军门下之武弁也”。自6月10日西摩尔统率的“一支由两千名武装士兵组成的国际联军侵略中国”，从天津出发，首先发动侵华战争以后，拳民来京者更多。6月11日，“义和团纷纷进城，予亲眼所观已十数起，别处更不知凡几矣”。6月12日，“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

尼克松著，常铮译：《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77页。按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进入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8页）。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199页。按南非之战指1899至1902年英国对布尔人的侵略战争。

傅勒铭：《北京之围》，1959年英文版，第11页。按波士顿茶叶事件指美国独立以前，波士顿的居民于1773年扮成印第安人登上停泊于港内之英船，把茶叶倾到海中，以抗议英政府对殖民地进口茶叶之苛捐杂税。加尔各答黑洞事件指1756年印度莫卧儿帝国孟加拉总督把146名英国殖民者关入地牢的事件。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庚子记事》，第80页。

唐晏：《庚子西行纪事》，见《义和团》（三），第471页。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义和团》（二），第190页。

佐原笃介等：《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150页。

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各随所用，装束却都一般。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入。此予亲眼所见”。

“其来自京东者，曰武清团、香河团；来自京南者，曰固安团、永清团。或竖旗曰：某庄村，某镇集。金鼓喧阗”。他们“携持大旗，排队而行，比之军伍尤觉整齐”。一时王公府第，家家设坛；文武衙门，团民驻守；住户铺户，各钉红布。北京城简直是成了义和团的天下了。

拳民们在北京城内大肆展开焚攻教堂和教民的斗争，基本上是在西摩尔联军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和大沽口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之际开始和激化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之“每一次升级，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人民群众对洋人的敌对行为的增强，必然是深恐侵略和瓜分帝国之即将开始，或者说在实际已经开始了”。在此以前，拳民们多半是在郊区焚毁教堂，并在6月9日把北京西郊外国殖民者的跑马场，10日把在西山的英国公使馆的别墅等付之一炬。在此以后，他们为了配合在反侵略反瓜分前线战斗着的廊坊拳民和大沽口爱国官兵的斗争，就在北京城内翻天覆地地干起来了。在当时，如果说全中国都是“教堂林立”的话，那么在北京更是大街小巷都几乎布满了教堂。自此以后，旬日之间，拳民大举焚毁京城教堂。6月12日晨，“东华门外教堂起火”。13日，“焚烧八面槽、双旗杆等处教堂、施医院、讲经堂”。“凡在奉教之男妇老幼莫不丧胆，逃脱不及，多藏隐东交民巷英国府中”。14日，“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所烧全系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术亦奇矣”。15日，“团民焚烧绒线胡同教堂”。16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20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内回子营教堂，并杀教民数人。又焚烧中街、旗手卫、永光寺街，烂面胡同等处奉教之房”。总之，“自十六日（6月12日）始，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城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

当时，法国天主教在北京最大的教堂是在西安门内的西什库教堂，又称北堂；是主教樊国梁所修建的。6月15日下午，“义和团民火之，仅焚其门面旁舍，至内堂等甚坚固，建有短墙，以为守御之计”。堂内有“法水师兵三十人，意水师兵十人，法教士十三人，女教士二十人，华教民三千二百人”

是北京城内帝国主义的一座较为强大的侵略堡垒。拳民始终没有把它攻下来，原因是参加进攻的清政府官兵的阻挠和出卖。掌握军权的武卫军统帅荣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33页。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12页。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12页。

胡思敬：《驴背集》，见《义和团》（二），第504页。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20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34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292页。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庚子记事》，第82页。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12—15页。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庚子记事》，第83页。

禄“与法教士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

二品顶戴纳继成，在“交仗之时，打鬼子则装药，不装铅子；打在闹热之时，回身打毙团民不少”，使团民不胜愤慨。“团民质之端王（载漪），纳继成再三哭求端王救命。端王拟交刑部。团民云：‘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如定须赦宥，团民等即散去矣’。无可奈何，任其杀之。”6月26日，纳继成“被团民杀于顺王府前”。

在义和团焚毁教堂之际，5月底6月初前来北京的拥有新式洋枪洋炮的帝国主义侵略军队已经把东交民巷使馆区变成了他们在北京城内的强大军事堡垒。6月12日“东交民巷一带之地，已均为西兵所据，禁人出入”。13日“夜间，在东交民巷之西兵，开放连珠大炮”。14日，有义和团“一队，向东交民巷进发，为西兵枪毙八人”。同日，各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署，声称“现在贵国既不能办‘匪’，我等将推英国代守北京，‘剿’此‘匪’党。但自古亡国，未有如贵国之奇者，我等不胜诧异”。我们把它结合着在此前后丁韪良在公使们委托下提出的“四条”措施去考察，中国形势之危急是可以想见的。据窦纳乐说，13日有“一名义和拳身穿全套制服（头系红巾，肩上或腰上缠有红带，腿裹红布或黄布）经过使馆街时，被德国公使捉住。步军统领崇礼……于次日来访，为使该拳民获得释放而作了坚决的努力，但未获成功”。据牧师艾伦（the Rev. Rolland Allen）的日记说，“十三日下午，一支德国和意大利的特遣队袭击了附近一座庙宇中正在习拳的拳民”，“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大量红带”。这位目击者还说，在14日黄昏，“在接近他们使馆城头上的德国海军陆战队曾向城南正在举行的义和拳群众大会开了枪”。美使康格在其6月15日的电报中说：“我们仅仅力图保卫我们自己直到增援部队来到之时，但是，各国使馆驻军早已枪杀了差不多有一百个拳民。”由此可见，使馆驻军从6月13日起就首先向义和团挑衅，开枪射杀拳民；不到三天，拳民死于侵略军之手者便已将近百人。

从上述事实来看，使馆之围实际上是外国侵略者挑起的；他们还以为西摩尔联军瞬息将至，可以有恃无恐。我们知道，清政府的《宣战诏书》是6月21日发布的：但是，在19日下午五时左右，清政府认为大沽炮台为列强联军攻占，各国已与中国宣战，照会“要求各国使馆于二十四小时内启程前往天津”。20日，下令围攻使馆。此事固然违反了“国际公法”；不过，使馆驻军枪杀拳民也违反了国际公法，而列强对待他们正在瓜分的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也是很少真正按国际公法办事的。当天上午，德公使克林德与翻译柯达士（Cordes, Heinrich）前往总署。“当公使之乘轿而出也，适值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率领部下数十人巡街，见洋人乘轿而来，亟让在北首高处立住，取枪对准轿子，将发；而公使先在轿中开手枪，恩海让过敌弹，

同上书，第82页。

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188页。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293页。

刘以桐：《民教相仇教门闻见录》，见《义和团》（二），第193页。

作者佚名：《庸扰录》，见《庚子记事》，第252—253页。

《英国蓝皮书》，第91—92页。

转引自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21页。

同上书，第221页。

即发一枪。枪声响处，轿夫弃轿逃散。恩海至轿前拖出公使，已气息奄奄”。

先是，公使们在6月19日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西摩尔联军作为增援部队“已被认定在廊坊处境狼狈。杨村车站已被焚毁。求援急差已落入拳民手中，他的信件已被烧掉，急差本人是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的”。当天下午接到总署照会后，公使们要求“展缓时间，派兵护送，并望于（20日）九点钟回复。今九点钟已到矣”，“中国政府竟无明白回答之公文来到”。“十一公使中多胆怯之辈，仅有二三人，竭力鼓舞，以壮其同伴之胆，但无效果”。他们都不敢全体去总理衙门询问，“其后法公使言英公使此日面甚红，不知何故。史君亦言法公使自告奋勇，言苟全体去者，彼亦同去，而言时面色发白。予等既有红面公使，又有白面公使，苟再加蓝面公使、绿面公使者，则此全体会议之国旗，即凑成矣”。后来德使克林德自告奋勇，前往总署，“被枪打死，闻之不寒而栗”。“其余各公使自经此事，始恍然于事之真象，知予等今已处于绝域”；“彼等已无法可施，实皆不称其职；今已变为兵卒，与予等同矣”。自此以后，各公使“开始遭到围困，它恰好持续了八周。直到七月十四日为止，它的历史几乎纯粹是军事方面的”。“从七月十四日起开始有信件往来，它一直持续到围困结束”。

以上是拳民在北京的斗争初期时的一个大概情况，它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是显然的。首先是，义和团抢在帝国主义列强动手瓜分中国之前，即在1900年5月底6月初大举进军北京，使他们陷于被动，打乱了他们的瓜分步骤。有人在事后把部分责任归之于列强公使说：“欧人皆谓派往东方之代表，只需二等人才即足”；实则“为中国使臣者，必须其聪明才略，足以转移事势，而不为事势所转移，乃能胜任，已无疑义；非有敏活坚强之腕，不能当此艰巨变幻之局也”。实际上，列强瓜分中国和中国人民反瓜分斗争的事势，不是这些使节所能转移的。其次是，拳民在北京的斗争与拳民在前线的抗战，关系极为密切，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6月14日拳民在廊坊与西摩尔联军的血战，那么，他们就早已入京，丁韪良的“四条”措施也就必然出笼，局势的发展是难以预计的，至少也将增加在京拳民斗争的不少困难。其三是，列强从北京拳民斗争中认识到中国人民反瓜分的起义运动有如法国“巴黎公社（Commune）与过激共和主义（Sansculottism）混杂在一起”的起义，换句话说，就是1870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混杂在一起的起义，使“两个世纪的目标都同时碰在一起了，这是因为我们外国人

《英国蓝皮书》，第96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34页。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庚子记事》，第83页。按在20日以前，西方通讯社已谣传“德国公使在北京被杀”（见《义和团史料》上，第23页）。这可能是6月11日的日人杉山彬遇害之误传。又恩海后被“日本执杀”（见《义和团》（一），第16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2卷，第57页。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238—240页。按此书作者当时是北京总税务司署的总司录事司，英国人，原名辛博森（B.L.Simpson）。引文中的“十一公使”系指英使窦纳乐，美使康格，俄使格尔思，法使毕盛，德使克林德，意使萨尔瓦葛（Marquis G.Salvago - Raggi），日使西德二郎（Baron Nishi Tokujiro），西班牙使葛络干（J.B.decologan），比利时使姚士登（M.Joostens），荷使克罗伯（F.M.Knobel）和奥匈帝国代理馆务的纳色恩（Arthur von Rosthorn）等11人。“史君”指意使萨尔瓦葛。

不断强求让与权、贪婪黄种人的财富，颠倒了远东的平衡之所致”。当然，义和团就其没有资产阶级领导来说，它不同于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就其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来说，更不同于 1870 年的巴黎公社。不过，拳民们毕竟是把革命革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头上来了。他们“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他们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的中国人民的义勇军。帝国主义列强在幻想把这次“革命的果实拿到手”之际，他们的一些坛场宫馆已被焚毁，公使们也为自己的安全而胆战心惊了。

二、天津的激战

在义和团运动中，拳民斗争的中心首先是北京，其次就是天津，因为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集中的地区。

天津之有拳民活动，始于 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间，天津突来一穷和尚”，“名海乾，为义和拳首领”。到 1900 年 2 月，在拳民入京授人以艺的同时，也“流入天津县，每日有人在南门外，瑞和成机器磨坊后宽阔地方习练，河北一带亦有之”。3 月，“练拳者较众，官不深究，‘匪’等愈无忌惮，沿街童孩，三五成群，无非以练拳为戏者”。4 月，拳民有“为人疗炎治病者，人多信之，由是习其术者日益众”。5 月，各处拳民，“渐有立坛者，河北、河东、城内外皆后先踵起，其坛多立于庙宇中”，“数日之间，多至数十处，众至数百人。彼此见面，则打单手问心，称‘匪’首曰大师兄，他人则概以老师称之。其装束有黄头巾、黄腰带者，有红头巾、红腰带者，亦有花头巾者。大约黄色者为乾字门，红色者为坎字门”。同时还有红灯照，“津西北一带村庄多有之。据云，临战时，能保护义和拳”。此时拳民既多，“皆争购刀矛等器械，于是各铁铺颇沾利益”。“时有直隶候补道谭文焕，又督轅武巡捕徐某二人，屡在裕禄前称义和拳之神”，“不如抚而用之”。可见义和拳在天津的发展，基本上与北京是同步进行的，也是在 1900 年 5 月才大量出现，城内劳动人民都纷纷加入，直隶总督裕禄此时也逐渐地减轻了对拳民的敌视态度。

到 6 月，各地拳民来津日众，其中主要的计有：8 日安次县民杨寿臣率数百拳民到“城内三义庙，树义和团旗，设坛聚众”，影响甚大，“两日间，城内立坛十余处，城外二三十处，每处或数百人，或数十人”。数日后，静海县人曹福田率拳民一二千人进入天津，号称“统带津、静、盐（山）、庆（云）义和神团”，在城西吕祖堂设总坛口。25 日，文安、霸县、雄县义

《英国蓝皮书》，第 99 页。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 199—200 页。

参阅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 231 页。按此处系据原书翻译（见《Indiscreet Letters From Peking》第 82—83 页）。又“过激共和主义”一词来自过激共和党即所谓无裤汉（Sansculotte），是 1789 年法国反革命贵族对革命者所起的绰号。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 15 页。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 26—27 页。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 8—9 页。

和团首领“王德成率领拳‘匪’数百人来津”，在大佛寺建总坛口。28日，新城县人张德成也率领他在静海县独流镇成立的“天下第一团”的5000左右拳民相继来津，在小宜门设立总坛口。天津本地侯家后船家女林黑儿也在船上设坛，组织红灯照，称“黄莲圣母保护团”。

拳民们在大量进入天津的同时，立即同本地群众一起展开斗争。6月2日，他们焚毁了苏家桥教堂。4日，以日人《国闻报》诬蔑拳民为“乱世界之匪徒”，要清政府“严惩痛剿”之故，乃贴出《警告国闻报》揭贴说：“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国闻报》上多谬妄，乱语胡言任意登；该报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谤诋我们”。“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这张揭帖贴在北洋大书院相近之泥城门外上，“其时旁有兵士数人在彼，不独并不揭去，且并不准洋人往揭”，可见义和团运动深受天津爱国军民的同情和支持。10日，为了准备斗争，津地拳民“共有十余万人，皆托铁店代打铁刀，即至小之铁店，亦自早至晚不能停工。天津县出示禁止，皆视同具文”。12、13日，拳民“传令各家，于晚间用竿高挑红灯一个，并插一小红旗，名曰得胜旗”。14日“晚十二点钟，西门内、镇署前、仓门口三教堂”被焚。15日“晚十二点钟，三岔河口望海寺旁教堂被焚”；同时被焚的还有“马家口教堂”。

帝国主义列强在天津原有驻军大约2400人，他们随着义和团运动在天津的发展便已开始屠杀拳民；但是，大规模的激战却是在6月17日上午大沽炮台失守后才爆发的。当天下午，敌军就在天津发动了侵略战争。由英、德、意、奥军所组成的175名联军进攻武备学堂，遭到了学生们的英勇反击。他们攻不进去就放火焚烧房屋，使储藏在那里的大量军火爆炸，枪炮亦被焚毁。为了屠杀天津人民和进占天津，列强从大沽口派出大量侵略军于22日晨“抵顺良镇车站”，“此间铁路毁坏已多，车行不便，乃改为徒步而前”。“至二十三号早晨六点半钟”，侵略军抵达天津近郊，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使“联军伤亡达二百二十四人”。直到当天下午三点半钟，侵略军才得以达到紫竹林租界。到6月24日，“联军全部兵力已在天津集结”者，有步兵“五

作者佚名：《天津一月记》，见同上书，第141页。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同上书，第25页。

同上书，第23页。

同上书，第26页。

同上书，第37页。

王其桀：《有关义和团舆论》，见《义和团》（四），第175页。

佐原笃介等辑：《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120页。着重点引者所加。

同上书，同页。

同上书，第128页。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11、12、14页。按望海寺旁“三岔河口教堂”曾于1870年天津教案中被毁，“惟余前面耸然矗立，后面房屋终未起盖。今三四年内，始又鸠工修建，碑亭楼阁，焕然一新”（见同上书，第14页）。三岔河口教堂（the church of Notre Damedes Victoires）与北京的北堂，广州的天主堂三处，是在华“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和法国军事威力的三大象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261页）。

千三百名”，“骑兵一百五十七名”。于时在塘沽登陆的侵略军共计有 7767 人：“其中美军三百三十五人；奥军二十六人；英军五百七十人；法军四百二十一人；德军一千三百四十人，意军一百三十八人；日本海军装甲旅六百零二人，陆军一千零五十人；俄国海军装甲旅二百三十五人，陆军三千零五十人”。连同原有天津驻军人数，那么，从大沽口到天津列强侵略军共计达到了 15624 名。

拳民和爱国官兵从 6 月中下旬开始，特别是大沽炮台的夺占，他们立即展开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大军、保卫天津城的激烈的战争。一时城区域郊各地，硝烟弥漫，炮击和枪射之声，不绝于耳。其间主要的战区有两个：一个是海河东岸的老龙头火车站，它是天津城的交通枢纽，有铁路东至大沽，西北到北京，是为了切断敌人援救西摩尔联军的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一个是河西紫竹林租界，它在天津城东南，沿着海河依次为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德租界等，是当时侵华联军的军事基地，原来就“拥有一支大约二千四百人的军队”。

于是老龙头火车站被俄军盘据，常派兵外出袭击拳民，双方在此不断展开战斗，其中主要的大战有以下三次：第一次大战发生在大沽口之战次日，即“六月十八日，（在天津集结的）一支联军试图由铁路进军，救援西摩尔海军中将，被迫退回了”。这就是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之战。当天早晨，为了切断敌人救援西摩尔联军，曹福田率领拳民会同清政府的淮练各军猛攻老龙头火车站。根据一个参战受伤的俄国军官的回忆，激战情况如下：

“从大清早起，中国人就埋伏在铁路堤旁、坟墓后。突然间，密集的子弹和榴弹向我们劈头盖脑地倾泻而下。守在车站上的是（俄军）第四连和第六连，还有我们的两门野战炮和一门英国的戈奇基斯式大炮，……（由）希林斯基中校（Lieutenant-Colonel Shirinsky）……指挥。第四连埋伏在车站前面的战壕里。第五连的半个连布置在车站后面，另半个连布置在车站前面。……第四连的处境很快就变得十分困难，第七连立即赶来援助。日本人也来了，……大约三十人。……希林斯基又把我们的两门野战炮派到车站来，并请英国人支援我们。英国人带了两门炮来到车站，但其中一门很快就不响了，因为他们好几个炮兵一会就受伤了。中国人瞄测得很准，……接二连三地向车站进攻，终于从三面包围了突出在前沿的第四连。……铁路另一边和村子里攻过来成百成千的中国人。……他们完全吓呆了：这已经是第三个连长给抬走了。……情况糟透了。中国人一鼓作气，当着我们的面冲进车站前面最近的一个村子里。那儿的日本人报告说，他们损失了两名军官和一半的士兵，再也坚持不了了。怎么办呢？德国人真行！他们及时赶到，把中国人从村子里打跑了。随后，法国人也来了，他们接替了日本人。第五连和第七连的处境也很坏。中国人……向我们匍匐进攻，有几个不要命的甚至上了刺刀直扑上来。……中国人吃了午饭，休息了两个来小时，两点半钟，又重新开火了。他们又向车站进攻，……打得比先前更加猛烈了。……情况可真是糟透了，因为中国人下定决心要拿下车站，而我们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没有人可以增援的地步了。无论是我们俄国自己的，或是别国的，都没人了。天津的全部驻防军都在车站这里战斗，而且已经精疲力竭了。……中国人……至少有两千人越来越逼近，形成一条一俄里长的锁

佛甫爱·加来、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 290、291 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 卷，第 148 页。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 161 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 149 页。

链紧紧地包围了车站，就在离我们两百步远的地方卧倒埋伏下来。看到这一切，就连希斯基这个勇敢的人也悲观绝望了。……在绝望中开始考虑把所有的大炮都拉过桥，安到兵营里，撤走所有的连队，退出车站，毁掉白河大桥，然后在租界里抵抗。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因为无处可得救援了。”

看来拳民和练军通过一天的苦战和激战的结果，已经把俄国的“哥萨克骑兵、炮兵以及日本人、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的联军打得晕头转向，决心放弃阵地，狼狈逃窜了。眼看着老龙头火车站立即能够收复，但是，为什么最后却没有达到目的呢？因为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敌方从军粮城方面来了援军而我们却没有援军之故，虽鏖战到“傍晚六时”，敌军也伤亡惨重，但是最后却终于不得不撤军了。这是中国近代战史上一个典型的功败垂成的战例，它的经验教训是值得加以总结和吸取的。此外，由于这次大战，6月18日，这支试图由铁路进军援救西摩尔海军中校的联军不得被迫撤退。

第二次是6月27日发生在老龙头火车站东北贾家沽的东局子（北洋机器局）之战。东局子是当时华北最大的兵工厂，有“将近两千工人，能制造鱼雷、炮弹、褐色菱形无烟火药、普通黑色火药、火棉和毛瑟枪子弹等等”，是中国军队弹药的主要供应地。由于“不得东局，租界不能安枕”，侵略军遂由俄国斯捷谢利将军指挥前来进攻。当天清晨五时，敌军侦探队前往侦察，“遇到猛烈的火力，不得不撤回”。在上午九时，大队俄军联合英、美、德、法、日军共2000余人“分三路纵队向制造局发起总攻”，“互相射击持续了约两小时”。“武卫前军营官潘金山严饬营兵潜伏不动，俟其将近，用排枪轰，击退复来，如是数次，击毙洋兵多名”。“战未逾时，而军粮城又突来洋马队千余，与洋兵会合，四面包抄。我军仍竭力抵御，枪炮弹如雨。潘金山右腿被枪子洞穿，裹创力战”。“约午后一时”，敌“炮打中了一个大火药库”，“洋兵即乘势闯入。其时四面火起，我军抵敌不住，遂退至堤头”。

于时天津城内义和团约2000名前往声援；但是，远水难救近火，东局子于一时三十分被敌军攻入，清军伤亡300余人，敌军死伤亦近百人。由于东局子“是一座价值一千万卢布以上的，里面有数不清的炮弹、子弹以及火药和各种作坊的大型兵工厂”，所以被敌人看作是“在整个直隶战争中”的“最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15页。

同上书，同页。括号内的话为引者所加。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113—116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同上书，第116、117页。

按1900年6月18日的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之战，敌军伤亡人数是比较多的；但各书记载不一；有的说俄兵“丧失百余人”（《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92页）。有的说：“西兵与华人接战，于六月十八号在铁路车站处一仗最厉，俄兵二千名内，竟死伤有五百名之多。”（《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191页）此说显然夸大，比较准确的数字是吉普斯（G.Gipps）《华北作战记》

（The Fight in North China）和《天津海关1982—1901年调查报告书》的记载，都说这次战斗联军共伤亡112人，其中24人战死，88人负伤（参阅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9，440页）。

拉斯马森：《插图天津史纲》，1925年英文版，第168页。

作者佚名：《遇难日记》，见《义和团》（二），第167页。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173、174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8页。

好的战利品”。

清军在东局子之战中是很勇敢的，但无补于统领的腐败，以此终于被敌人占领。“天津东制造局之未失也，聂军分统姚良才驻其中，先则纵兵大掠，铸钱局银数十万，顷刻都尽。继而西兵来攻，则置鞭炮无数燃之，以助威烈，最后棉花厂不知何故轰炸（被敌炮打中——引者），聂军遂以退让西人。盖彼以西人之来，正合其意；不然，则数十万之款，无从着落故也。聂军于五月二十一、二日（6月17、18日——引者）到处掠夺，目不忍睹，……此实录也。然武卫无军不掳，吾何必于聂独深责备也”。这就是东局子为什么陷入敌手的真象。

第三次是7月2日至3日的再次老龙头火车站激战。先是，拳民领袖曹福田于6月27日，即东局子之战的当天曾向帝国主义侵略者下了一道战书说：

“统带津、静、盐，庆义和神团曹，谨以大役布告六国（指英、俄、德、法、美、日六国——引者）使臣麾下：刻下神兵齐集，本当扫平疆界，玉石俱焚，无论贤愚付之一炬。奈津郡人烟稠密，百姓何苦受此涂炭。尔等自恃兵强，如不畏刀避剑，东有旷野，堪作战场，定准战期，雌雄立见，何必缩头隐颈，为苟全之计乎！殊不知破巢之下，可无完卵，神兵到处，一概不留。尔等六国数十载之雄风，一时丧尽。如愿开战，定准战期。”

28日，张德成率领拳民来津后，立即同曹福田联名出示说：“初三日（6月29日——引者）与洋人合仗，从兴隆街至老龙头，所有住户铺面，皆须一律腾净，不然恐有妨碍。”此后拳民就大举展开了对敌营、车站和租界的进攻，适马玉昆率武卫左军于7月1日由刘家庄移扎新浮桥一带，与曹福田率领之拳民联合，“以便规取老龙头一路”，发生了7月2日至3日的再次车站激战。7月2日，他们“由陈家沟、贾家桥、十字街、娘娘庙各处，分路进剿。洋人出队约有二千人，迴环抵御。该军亦分队迭进，昼夜不停，阵毙洋人百余名。该军愈战愈奋，洋人力渐不支，直到初七（7月3日——引者）傍晚，退归老巢，该军遂将火车站夺回，移营前往填扎”。我军“力战两昼夜之久，击毙洋人百余名之多，实为异常苦战。现将火车站要地夺占，扼守咽喉，使洋人不能肆出侵扰”。据西人记载，这次战役十分激烈，但老龙头火车站可能系一度占领，却并未夺回。在战斗中，华军“有逼近车站之势，日军乃遣发步兵一队，野战炮兵一队，前往援助。至晚间炮兵未能得手，终行撤退；惟步兵固守其车站及附近一带地方”。

至于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地区的战斗，比起老龙头火车站的战斗来，开始较晚。租界地区先是遭到拳民的围困和清军的炮轰。大约从6月20日起，开始了对租界的“炮击和枪射，以后天天如此，造成许多伤亡”。“洋兵之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174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8页。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176页。

佐原笃介等：《拳事杂记》，见《义和团》（一），第291页。

《义和团》（二），第25页；又奇生编：《庚子并蜂录》，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287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义和团》（二），第26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29—230页。

保护租界者，西面则由英美两国兵士，南面则由德日两国兵士，东北则由俄法两国兵士”。7月2日上午七时，清军“开炮轰击租界，俄兵由东岸还炮相击，华兵接连开炮，轰至四点钟之久，租界中房屋多处俱遭击损”。“至午刻西兵欲驱散华人（拳民——引者），冲突前进，力战有五点钟之久，未能取胜，祇得退回。是役日兵阵亡武弁两人，兵士一人，法兵阵亡一人，受伤十二人，俄兵伤折更重。华人炮火，其准头甚准，颇为利害”。当时，紫竹林租界：“在几天之内受到不下六十门大炮的攻击，数千名兵士的射击以及拳民们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所作所为的威胁，处境看来是危险的”。

拳民和爱国官兵在这个阶段，主要是6月中下旬在天津的激战的意义在于：首先，它在拳民血战廊坊与大沽口守军坚持抗战之后继续发扬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战斗精神，特别是6月18日老龙头火车站之役，使外国侵略者也不得不认为：“华人此次甚勇敢，为从来所未见。向尚不信其有此耐战之心，目下观之，彼等之勇猛及耐心之处，较被围西人之心更胜矣”。这种英勇战斗精神，诚如曹福田在其《战书》中所说，使帝国主义列强“数十载之雄风，一时丧尽”了。其次，它阻止了敌军对西摩尔联军的增援。联军于6月14日在廊坊遇阻后，非新增援兵不能进攻北京。他们一直等到6月19日，差不多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决定撤军，就是因为拳民在天津的激战断送了他获救的一切希望，最后才不得不撤军的。须知西摩尔在6月18日还“要求德军和第二部列车坚守廊坊并巡逻铁道”呢！可见当天老龙头火车站之役从这一方面来看也是具有重要作用的。看来西摩尔只要有一线获得救援的希望，是不会放弃他进攻北京的目的的；即便不走铁路，他也准备走北运河那条水道去北京。对中国来说，西摩尔联军到达北京的后果，问题就是非常严重的。其三，天津的激战使敌人不止一次地想撤退到大沽，它是关系全局的激战。“方联军未据该城（天津——引者）以前，华兵在各阵地，防守极为奋勇，致联军欲退大沽，已非一次”。敌军在天津“战既无功，退亦为难，每日丧失，动辄不可以数计。迨至奋力进攻一次，华兵抵御亦极坚。联军总数，不过八千，竟伤亡九百。连日天气极热，又无水取而御渴，但借干粮以度饥。事后追思，每令人心悸”。“若果该城永能固守，则联军旷日持久，势非撤退不可；而直隶一省，即可高枕无忧。不过联军退去后，扬子江两广一带，又从此多事耳”！“这样的撤退必定会丧失北京外侨最后获得解救的机会，并且把上海和其他北方口岸置于危险的境地”，可见义和团和爱国官兵保卫天津激战的重大的、事关全国形势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意义。

佛甫爱·加来、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95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15页。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192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15页。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191页。

培根：《泽立科伯爵传》，第108页。

第三节 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之议定（1900年6月26日）

所谓《东南互保章程》指的是1900年6月26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上海道余联沅与盛宣怀等奉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电令，与帝国主义列强驻上海领事官会商议定的《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两者而言的。《东南保护约款》的主要内容是：

1. “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2. “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但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藉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吴淞及长江各炮台、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兵轮勿往游弋、驻泊；“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

3. “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切勿冒险前往“偏僻未设防地方”；租界设防亦“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的主要内容则为：

1. 共同保护上海城厢租界和非租界地区。“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遇有紧要之事，互相知照妥办”。一体“严拿”华洋地界“聚众滋事”之“流氓”及“土棍”，由地方官“从重严办”。

2. 共同在上海设防。由“中外官商公议捐助章程”，以“添办各项工程及添募勇丁口粮”。租界内外，都应“添募巡捕”。租界内边地，由工部局“建造捕房，常川驻守”。租界外边地，则由华官派兵，“搭盖棚帐，常川驻守，勿令成群‘乱人’闯入租界以内”。“若有火警，附近居民不可乱动”。

3. 共同稳定上海金融。上海“以钱业为大宗”，“钱市一有挤倒，各行生意必皆窒碍。市面一坏，人心即震动不安”。因此，“钞票应照旧行用”。现又因“各处商贾停滞”，应请“中外各银行东及钱业董事，互相通融缓急，使钱行可以支持”等等。

根据上述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两项条约的主要内容来看，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的地方封疆大吏慑于义和团起义的声威，互相勾结起来，镇压在上海、长江流域以及苏杭等地准备起义的爱国人民而议订的一个公开同中央政府的《宣战诏书》唱反调的协定。当时，由于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和天津的狂飙突击式的发展，引起了全国各地爱国人民的响应，使遍布各处的外国传教士和侵略者感到大难临头，坐卧不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起义并不仅限于直隶省，也在江苏和广西爆发了。在镇江的中国人的银行都因害怕义和团而未开门营业，上海各银行将透支款项全行收回。在扬子江流域笼罩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特别是在上海，人民的爱国情绪日益高涨。日销

佛甫爱·加来、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302、303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16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968—969页；《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522—4523页，《义和团》（三），第338—339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969—970页；《义和团》（三）第339—340页。

2000份的上海《新闻报》，由于首先登载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害一事，上海人民都拥向报馆，不惜“以高出平常三倍的价格去强购这份报纸。报纸的发行数量立即跃至一万份”，可见情况之紧张。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不亚于京、津人民，它的形势很可能步京、津人民的后尘而一触即发。因此，中外反动派就准备利用《东南互保章程》的议订来首先稳定上海的局势，然后再对长江流域及苏杭地区加以控制。

这个所谓“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英国政府导演的。它是在6月14日由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霍必澜（Warren, Sir Pelham Laird）向首相索尔兹伯里首先提出由英国保护其“势力范围”，后来演变成为列强共同参加，搞成了一个所谓《中外互相保护章程》的。霍必澜在电文中说：

“我没有收到关于北方局势的准确情报，但消息似乎愈来愈坏。我深信，如果有同北京政府终于断交的任何可能性，我们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我完全相信：如果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尽力维持和平。毫无疑问，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可能使很多人丧失生命。必须采取迅速行动；局势是严重的。”

这个建议得到英首相同意。15日，索尔兹伯里电告霍必澜，他将派军舰去南京和汉口，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保证，“他们在维护秩序时将获得英国的保护”。16日，英政府命“仙女号”开往南京，“红雀号”开往汉口，“无畏号”“离开香港驶往吴淞”。19日，“仙女号”指挥官致电英政府，认为“目前不应减少长江的兵力，而且我对派遣军舰前往各条约口岸已经作好安排”。

刘坤一、张之洞本来就是敌视义和团运动的，“皆极愿与英联络”。他们在6月15日《寄总署电》中曾借赫德所谓“大局若无速转机，各国定并力大举，危亡即在旦夕”的话来压清政府。16日，金陵关税司韩森（P.C.Hansson）把英政府的保证告诉刘坤一。刘说：“只要英国方面帮助，什么都肯做。”他还“屡次声明不管太后的意图如何，他决心照自己的方针行事。他甚至于这样说：如果太后现在有谕旨给我，谁敢说这不是俄国政府的指示呢”。17日，英驻汉口代总领事法磊斯（Evarard D.H.Fraser）见张之洞。张说：“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他说：“若英水师入江内，恐民间惊扰生事，外恐各国援例效尤，转为不妙。若虑他国占先，吴淞外英舰甚多，英舰不进，他国不敢，似此镇静密防，最为上策。”20日，盛宣怀电刘坤一说：“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

参阅本书第十章。

《义和团史料》上，第24页。

赖特（Wright, A.）主编：《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中国其他商埠志》，1908年英文版，第362页。

《义和团》（三），第536页。

《英国蓝皮书》第41页。

同上书，第42页。

同上书，第43页。

同上书，第45—46页。

《义和团》（三），第327页。

同上书，第327页。

白藻泰 (Comte G. de Bezaure) 已将此情电法。”这是盛宣怀从美人福开森 (Ferguson, John Calvin) 那里了解到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单独由英国来保护后向刘提出来的, 他的意见是, 刘坤一“应飭沪道告知各国领事, 自认保护, 勿任干预”。刘承认“英允保护, 确系诡计, 已电沪道密阻”。他同张之洞认识到: “长江商务, 英国最重, 各国觊觎已久, 惧英国而不敢先发, 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 以启各国戒心”。21日, 张之洞电驻美使臣伍廷芳, 让他转达美国政府, “愿其与各国切商保全东南大局, 不可遽派船入江”。22日, 张之洞又电驻英、美、日使臣罗丰祿、伍廷芳和李盛铎等转告各驻在国政府, 声明“目下长江沿海一带, 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 诸国洋人, 均可无庸顾虑”。23日, 上海领事团把6月20日的联军《大沽宣言》在上海城厢公布。

6月24日, 盛宣怀在得知清政府已于21日发布《宣战诏书》后, 立即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说: “须趁未奉旨之先”, 赶快议订所谓《东南互保章程》; 在这种情况下, “似非从权不可”。他们在接到盛电后, 为了争取时间, 大家都在这一天内忙得不亦乐乎。刘以“盛请会飭地方官沪道与各领事订约”的意见去征求张的同意。张则请刘“即刻飞飭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 并提出“杏翁(盛宣怀——引者)思虑周密, 敢恳杏翁帮同与议, 指授沪道必更妥速尤感”。25日, 盛电两广总督李鸿章; 李答以对清政府21日发布的《宣战诏书》“粤断不奉, 所谓矫诏也。希将此电密致岷帅香帅(即刘坤一与张之洞——引者)”。同日, 上海道余联沅“约各国明日三钟会议”, “各领愿请到场会议”。这就是6月26日所谓《东南互保章程》的由来。在会上, 余联沅盛宣怀和福开森等人代表刘坤一和张之洞, “要求领事们致电他们各本国政府, 建议说: 除了现在正在进行战斗的北方地区之外, 他们宣布其他所有地区的中立; 如果那样办理, 那么, 他们就能够保证维持秩序。”各国领事说, 6月20日的联军《大沽宣言》也就是他们的答复。“他们宣称: 各国仅对义和拳及那些反对派遣部队前往北京援救他们本国同胞的人进行战斗。保持和平的责任须由中国官员承担; 如果中国不破坏和平或不从事战争行为, 他们无需害怕遭到我们这方面的任何袭击”。

这个所谓《东南互保章程》的议定, 实际上是中外反动派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所勉强达成的相互保护的协定, 是联军《大沽宣言》具体地运用于我国东南地区的结果; 但是, 它却始终不曾正式签字。6月28日, 盛宣怀“见宣战各明旨, 与所议保护章程, 诸多窒碍”。“若一传播, 则东南保护之议全裂, 立刻危变”。因此, 他要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飞飭各局,

韩森:《致赫德函》(1900年6月19日), 见《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第74—75页。

《义和团》(三), 第327页。

同上书, 第328页。按白藻泰是当时法国驻上海总领事。

同上书, 第328、329页。

同上书, 第328、329页。

《张文襄公电稿》第三五卷, 第27页;《义和团》(三), 第336页。

《义和团》(三), 第330、332页。

参阅《义和团》(三), 第530—531页。

参阅《义和团》(三), 第332页。

《义和团》(三), 第332—333页。

不准宣扬”。另一方面，他又将李的不奉“矫诏”与刘、张的“无论北事如何”，均“一力担承，仍照原议办理，断不更易”的主张与各领事去面商。结果是“诚恐北方衅端更大，东南人心摇动，自应彼此再为声明”；“由余道赶办照会”，并“会电各驻使愈速愈好”。在帝国主义列强方面，对章程中某些条文他们还有异议。比如说《东南保护约款》中第五款所谓各国兵轮，如不经中国督抚允许，驶入长江出事后中国不认赔偿一点，与前此之不平等条约相违，“恐各国难允”。只是由于列强慑于拳民战斗的声势，在当时只好“默然接受”罢了。一旦时局有变，他们就是根本不遵守的。1900年8月17日英军之在上海登陆，虽经督抚以对此口岸已经给了有效保护为理由而加以抗议，仍是无济于事的。美国政府对于这个抗议也答复说：“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派兵登陆上海以保护我们在那里的公民的话，我们就应当这样作，像我们已经在天津作过的一样；对于其他任何国家这样作的权利，我们是不能提出疑义和质询的”。随着英军的登陆，其他列强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在中国登陆，这就大大地“削弱了总督们的地位”。可见义和团运动在本质上决定了列强对中外“互保”的默认，没有拳民在京、津的鏖战，所谓《东南互保章程》是一文不值的。后来清朝封建统治者“论东南保护之功，皆论无盛某维持策画，刘张亦无所措手，何论余道”，好像盛宣怀一人系天下安危似的，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罢了。

“上海领事团对总督们有能力维持秩序一点很少有信心，他们坚持其派遣外国军队和军舰去保护口岸的要求”。只是因为拳民在京、津的鏖战使“局势极为严重。义和拳运动正在发展；如果天津的联军不能制止它，那么，它将扩大到华中和华南，并成为全国性的运动，结果将驱逐或杀死内地的所有外国人，而且使外国贸易遭到彻底毁灭”。因此，领事团之所以“支持总督们维护秩序”，乃是以拳民在天津的激战为前提的。由此可见，决定当时局势发展的不是所谓《东南互保章程》，而是天津激战。归根到底，这个《章程》之所以被列强暂时默认，也是由天津激战来决定的。

不能否认，6月14日霍必澜的电文与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关于“每一国应个别地及独立地在它自己的利益范围内行动”的看法是一致的，意思就是根据“势力范围”来瓜分中国。但是，义和团的英勇战斗使局势变化得出乎人们所能预料到的要快得多，不到七天，在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使中国的瓜分危机得到第一次的缓解以后，同一天，美人福开森就把列强反对单独由英国来保护上海及长江流域的意见告诉了盛宣怀，使他们认识到这个英国的诡计为其他列强所不容许，乃改而同各国驻沪领事磋商，使“英人想在扬

同上书，第334页。

《英国蓝皮书》，第54—55页。

《义和团》（三），第340、342页。

同上书，第341、344页。

同上书，第342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48页。

《美国外交关系》，1900年，第285页，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73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73页。按列强上海登陆军队于1902年底才开始撤出。

盛同颐：《盛宣怀行述》，见《义和团》（三），第538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48页。

子江流域建立特权，要求在那里不仅占领导地位，并且排除其他列强的参加”一事未能实现。6月26日，在所谓《东南互保章程》的议定会议上，上海领事团就援引了《大沽宣言》说：“六月二十日发布的联军各国舰队司令的布告，就是领事们所作的答复”。

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东南互保”为地方军阀官僚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搞封建割据开了先例。他们在东南独树一帜，与清政府公开发布的《宣战诏书》唱反调。这种情况在实际上表明了“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三位总督和福建巡抚许应骙，联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临时政府，并派代表到上海去，同各国领事商量保持华中、华南中立的办法”。这种情况也使某些英帝国主义分子跃跃欲试，认为“由于刘坤一倾向英国”，“英国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从内部重建一个中华帝国，以南京为核心。只有英国能办到这件事”。这些督抚们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的瓜分危机面前，早已对瓜分割据作了卖国求荣的思想准备。据说张之洞在1897年底德军强占胶州湾以后曾说：列强“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梁启超认为，张氏这话代表了当时“中国全国二品以上大员之心事”，即“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也”。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互保”的办法一时在刘、张的串联下，为各省督抚所效法，使“互保”范围由原来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江西、安徽和湖广总督所辖的湖北、湖南等省迅速扩大到了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河南等十余省。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这种明目张胆的封建割据的恶例乃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未果所保存下来的流毒；不管怎样，它以地方政府而公开抗拒中央政府一事是太明显了，始终也是这帮督抚们的心病。1901年3月6日刘坤一在《复盛宣怀电》中说：“昨读客腊二十六（1901年2月14日——引者）电旨，查销五月二十四日（1900年6月20日——引者）以后‘伪’诏，不禁拍案叫绝。西狩以来，惟此次纶音最为得体，而运量妙于无形”。为什么呢？照刘坤一看来，这样销毁原件的结果，可以使那些爱国人士“以东南保护之约为不遵朝命，甚至指为海外叛臣，亦无所施其‘毒蜚’矣”。他们好比是一面卖淫，一面却念念不忘地要树立贞节牌坊。这也不足为奇，那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封建官僚搞两面派活动的拿手好戏。

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1900年7月5日），见《英国蓝皮书》，第68页。

《红档史料》，第235页。

《英国蓝皮书》，第54页。

韩森：《致赫德函》（1900年6月29日），见《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6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安格联：《致金登干函》（1900年7月24日），见同上书，第78页。按安格联（Aglen, Sir.F.A.）时任江海关税务司，于1911年升海关总税务司。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戊戌变法》（一），第269页。

第四节 美国《海约翰通牒》与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900年7月3日）

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以后，使美国朝野“大为震惊”，并引起普遍注意。一时“有关中国的消息和文章，数量之多，前所未见”。美国金融资本家“因为轻易地战胜了软弱的西班牙而洋洋得意”，“他们迈步登上了世界舞台”，自以为“没有任何事情或任何人是值得惧怕的”。但是，他们却惧怕由于不曾取得在华势力范围而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没有自己的一份，因此，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赶忙在1899年9月抛出了所谓对华“门户开放”的通牒。如今，中国突然地全面爆发了义和团运动，美国政府在列强联军《大沽宣言》的发布和所谓《东南互保章程》的议定以后，又抓紧时机于1900年7月3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向列强发布了阐明美国目的和政策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海约翰通牒》。它声称：

“值此中国局势处于紧要关头之际，美国自宜就目前情况所允许的范围内，阐明美国的态度。我们坚持我们在一八五七年所提出的政策，即无论如何必须在根据条约规定的治外法特权和国际公法的保证下，维持同中国的和平，促进合法的贸易，保护我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如果我们的公民遭受冤屈，我们将提出要肇事者承担最大的责任。我们认为北京事实上已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因而权力和责任实际上已移归地方上的各省当局。只要他们不公开与叛乱串通并行使他们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权力，我们就认为他们代表着中国人民，力求同他们保持和平与友谊。总统的目的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与其他列强采取一致行动：第一，打开北京通路并解救那些陷入危险的美国官员、教士及其他美国人；第二，对于那些在中国各地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提供一切可能的保护；第三，看守和保护美国的一切合法利益；第四，协助防止骚乱向帝国其他省份蔓延并防止此类灾难的再发。当然，预报到达这个最后结果的方法还为时过早；但美国政府的政策是谋求一项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可以给中国带来持久的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preserve Chinese territorial and administrative entity），保护条约和国际法所担保给予友好列强的一切权利，并维护世界各国在中华帝国各地区进行平等与公平贸易的原则。”

以上就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美国总统麦金雷的同意下送致列强的通牒。就《通牒》的全文来看，美国政府认为，在义和团“叛乱”（rebellion）已使中国局势处于紧要关头，即转折点之际，一方面深恐拳民运动扩大，把所有的美人都驱逐出去；一方面又深恐列强乘机根据其势力范围瓜分中国而使自己落空。在双重恐惧下，他就一方面声明支持各省当局，具体地说就是东南督抚如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对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保护；另一方面又声称，必须在坚持中外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治外法特权的基础上“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因为如果中国遭到瓜分，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就不会作为实体而存在了。结果是，美国的在华利权也就随着中国的瓜分而付诸东流，同样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美国政府就在联军《大沽宣言》发布之后不到两个星期，向列强送致了这个“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的通牒。“领土与行政的实体”

同上书，第269页。

《义和团》（三），第360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转引自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第169—170页。

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领土与行政的完整”（territorial and administrative integrity）或“领土的完整与行政的独立”（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administrative independence），后来它被这后面的两个短语所代替了。帝国主义列强都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瓜分中国领土乃是引起义和拳起义的最重要的原因；美国政府当然也懂得这一点。1900年夏季“北京城内和北京周围的纷扰，多少是由于外国侵略和欧洲列强割去中国领土而引起的”。“如果把在中国所干的那种有关强制并吞和侵占领土的勾当试行于英国，那末我国每一个人都会奋身而起，拿起武器来阻止那些没有合法权利的列强或个人进入我国”的。“在义和拳叛乱时期，为了充分理解关于欧洲列强在远东的地位，就必须记述他们在直接冲突发生之前那几年中对中国的领土侵略。在这次中国反对西方的最后的大变动中，领土侵略乃是所有直接原因中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领土侵略之事从来不曾发生过的话，那么是否会发生这次叛乱就是很可疑的了。这幕历史上卑鄙的一页主要应归因于欧洲的领土贪婪。”正因为中国人“极端反对瓜分”，于是美国政府就提出这项《通牒》。它有助于保持美国的在华权利，因为它事先声明这是以不平等条约的坚持为前提的。

自6月10日帝国主义列强派出西摩尔联军，发动侵略战争屡遭失利以来，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的发布，声明“断不侵犯地方”，说明了他们企图利用军事手段来瓜分中国领土的失败，并说明他们还企图把武力针对拳民起义这一点上来阻止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但是，这后一点的影响甚微，京、津鏖战显示出起义运动正在蓬勃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单是军事上的《宣言》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政治上的保证。6月26日所谓《东南互保章程》的议定，英国被迫默许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而“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形成了一种中外互保的局面，这就开始从政治上局部地涉及到这个问题了。不过，据上海英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的电报来看，到7月5日，义和团运动还正在发展，正在扩大“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问题在于天津鏖战的结局如何。看来为了阻止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从他们本身的利益出发，必须从政治上全面地来提出不瓜分中国领土的问题，即不宣布他们在华的势力范围为他们自己的殖民地或保护国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在义和团运动中已经不可能这样来宣布了，因为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已经失利。在军事势力达不到的地方去侈谈什么殖民地或保护国，岂非痴人说梦。更何况在拳民的京、津鏖战中，他们在华的官员、传教士和侵略军队已经吃尽了苦头。他们往日那种以殖民者的身份君临中国的威风早已丧失殆尽，象征他们统治权力的教堂、跑马场、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等等，“坛场宫馆”在起义地区早已大部化为灰烬，真是一副“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的局面。这些都是他们要抢占中国的领土、引起中国人民的义愤所导致的。对此，他们又有什么值得怨天尤人的呢！不过是自作自受罢了。

莫瓦特主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4页。

《美国外交档案，1901年》，1941年英文影印本，第12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1983年英文第四版，第322页。

麦克拉斯：《中国年表》，1982年英文版，第198页。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26页。

正是在拳民京、津鏖战，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声中，美国政府于7月3日发布了关于“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的《海约翰通牒》。这个《通牒》正式声明不瓜分中国，比起《大沽宣言》的“断不侵犯地方”的纯粹属于军事行动的范围来说，要明确得多了，并且它是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作为帝国主义列强成员之一的美国，第一次从政治上全面地来提出不瓜分中国领土的问题的。有人把它看作是过去“门户开放”政策的重申。其实，“根据赫德的看法，一八九九年九月海约翰的门户开放照会，对于中国的完整并没有提到，而且对于势力范围的扩充也没有提出限制。照会主要是关于保护中国的海关收入的”。只是在1900年7月3日的《通牒》中，“才提出了中国的完整问题”。这个不瓜分中国的问题，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声中，在其他列强的文件中也反映出来了。他们都对这个问题正在加以研究或正处于酝酿的过程中。6月30日，德国政府就提到了“应该避免不必要地摇撼或甚至瓜分中国，因为这不符合于我们的利益”。同一天，沙俄政府的驻德大使奥斯登·沙根就密电说：“柏林内阁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凡足以动摇中华帝国基础的事，都要避免，德国希望保持中华帝国的完整。它坚决反对瓜分帝国的主意，并努力希望和北京中央政府恢复关系”。美国政府之所以能较早地把这个问题正式向列强提出来，主要是由于它在华没有势力范围，包袱较轻的原故。这个《通牒》在7月3日一经提出，同日，法国外长达嘉谢（Delcassé, Théophile）在法国国民议会下议院就宣称：“法国没有兴趣去促成或渴望中国的瓦解”，“法国急欲保持远东的均势”，它“不希望同中国去作战”。可见义和团运动之阻止列强瓜分中国，乃是大势所趋，不单单是美国政府才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海约翰通牒》当然也否定了当时保留在列强驻北京公使们手中的丁魁良的《四条措施》。按照丁氏自己的说法，他这《四条》与“推翻当前的朝代和帝国的正式瓜分”是有区别的、非正式的瓜分方案。不管它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瓜分方案。因此，在这个方案中，有“勒令皇太后归政”，即把慈禧太后流放充军的问题；有让光绪皇帝作为傀儡而复辟，即维持着中国领土的虚假的完整问题；还有在列强势力范围内的各省当局受该强国代表控制，即实际行政权的丧失问题，也就是慈禧所谓的“代收各省钱粮”和“代掌天下兵权”的问题。如今，在《海约翰通牒》中，所谓“勒令皇太后归政”的问题没有被再提出来了，与中国领土虚假的表面完整和行政权的丧失不同，它提出来“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即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与行政的独立，反对对中国进行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瓜分，形成了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的中国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8页。

佐原笃介等：《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112页。按“英吉、俄罗斯势萧然”一句又作“英、美、俄、德哭连连”或“英、美、德、俄尽消然”（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1、34页）。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321、322页。

《德国外交文件》（二），第23页。

《红档史料》，第224页。

第十章 全国反帝怒潮的兴起与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 (1900年6—10月)

在拳民京、津鏖战和清政府6月21日发布《宣战诏书》前后，兴起了全国性的反帝怒潮，义和团运动也陆续在京、津以外各地高涨起来。他们的斗争，大部分是在义和团的旗帜下进行的，同时也有会党起义、参加响应。他们的斗争内容，基本上继承了过去反对外国教会的侵略和统治的斗争传统，是以反洋教运动为其主要特征的。

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早已显露头角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也在这个全国反帝风暴的高潮中积极活动，准备新的起义。

随着所谓《东南互保章程》的议定，使外国侵略者得以在天津集中兵力，镇压拳民起义，并且随着清政府妥协投降政策的逐步确立，削弱了拳民们在京、津的鏖战，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和北京相继在1900年7月和8月沦陷于敌军之手。慈禧太后仓皇西遁。沙皇俄国趁火打劫，占据我国东北，形成了一股瓜分中国的逆流。

由义和团运动掀起的全国反帝怒潮进入了紧张的艰苦斗争的阶段。在清政府的叛卖下，在帝国主义侵略军的进攻下，在中外反动派的围剿下，中国人民面临着考验，他们用生命和热血，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坚持了斗争。

全国反帝怒潮的兴起与拳民们所具有的“官败民不败”，“除国之大害”的大无畏精神，加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瓜分危机缓解形势下的帝国主义列强本身间的矛盾及其新产生的矛盾之逐步激化终于抵制住了沙皇俄国蓄意瓜分中国的逆流。1900年10月16日《英德协定》的出现，最后形成了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在各地的高涨

拳民在京、津地区的鏖战，既揭穿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军对华百战百胜的谎言，又迫使清政府发布了《宣战诏书》，促成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形成了瓜分危机之两次缓解。义和团运动的高涨，不仅反映在京、津地区拳民的反侵略战争上，同时还反映在全国各地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之中。义和团运动是在数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而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又反过来大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反洋教运动在各地的全面展开，使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也同时进入了高潮。1900年七八月间，全国各地城乡，凡是教堂林立之处，该地爱国人民，莫不纷纷斩木为兵，揭竿而起，欢欣鼓舞，积极斗争。一时红巾遍山谷，喊声震原野，形成了全国性的反洋教斗争的反帝怒潮。在这片不约而同，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反帝怒潮中，一些数十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外国传教士不是逃跑，就是被杀了；一些为虎作伥、鱼肉乡里的教民大部都身首异处了；一般教民不是反教，就是逃避了；作为他们为非作歹的活动中心的教堂也大都付之一炬了。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单凭占据几个沿海军港和大城市是统治不了中国的。所以，帝国主义列强数十年来孜孜不息地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实施和炮舰政策的威胁，利用他们的传教士在全国各地城乡的苦心经营，就为的是有朝一日，借助于这批侵略先锋的活动，可以稳操胜算地瓜分中国，不仅在点上并且在面上也能控制和统治中国。他们的眼光是远大的，在全世界利用这个办法来掠夺领土也曾经是大有成效的。因此，所谓传教士是帝国主义列强了不起的尖兵，传教活动是他们在全世界掠夺殖民地的基础，这些都成了他们的不刊之论。不过，这些东西一碰到酷爱祖国、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就大触霉头而显得是心劳日拙的了。从他们开始传教，进行侵略活动的那一天起，从未停止的反洋教斗争就此起彼伏，此伏彼起，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今，在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又形成了一个反洋教斗争的反帝怒潮，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统治进行总的清算的时候到了。在这次总清算中，由于各种原因，虽然说不上彻底粉碎，至少也是严重地破坏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因为散布在广大城乡的、听命于他们的第五纵队已经大大减少，星罗棋布的侵略中心已经烧的烧、毁的毁，残破不全了。代替它们的是义愤填膺的中国人民的义勇军，有如一片汪洋大海。帝国主义者如果敢于跳进去，那是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的。中国的瓜分危机就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这样遭到破坏从而最后得到缓解的。因此，各地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和义和团运动中都在实际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结合实地调查进行区域性探索。

假定在中国近代史上从19世纪60年代起没有开始连续不断的反洋教运动的话，那么，中国的瓜分在这个“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恐怕来不及等到义和拳民的出现就早已完成了！假定在义和团运动中没有全国各地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配合、支持和四起响应的話，那么，尽管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因遭到失利而发布了《大沽宣言》，尽管美国由于没有来得及抢到势力范围而发表了《海约翰通牒》，但是，由于他们瓜分中国的基础没有遭到破坏，这些《宣言》和《通牒》也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即使一时缓解了瓜分危机，谁也难保对领土贪欲无比激烈的列强最后不去完成他

们经营了数十年之久的对中国的瓜分和领土掠夺。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在各地的反洋教斗争使帝国主义列强“的确不可能像他们瓜分非洲那样去瓜分中国。他们更不可能像英国人接收印度和俄国人接收中央亚细亚那样去接收中国”。因此，反洋教斗争乃是义和团运动的基础，因为义和团运动是从这个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由于这个斗争之普及和高涨才得以完成的。

这个规模壮阔的反洋教斗争在这一时期基本上是在拳民起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所以我们把这一节命名为《义和团运动在各地的高涨》，但是，它也包括了在南方一些地区由会党领导的反洋教斗争。它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地，声势极为浩大。我们知道，就发展过程而论，义和团运动是在1900年5月底到6月初时局急转直下以后，以京、津一带拳民斗争的高涨而全面爆发起来的。它以京、津为中心，并由此以辐射的形式向四面八方迅速发展。由于全国各地人民数十年早有反洋教斗争的传统，所以义和团运动一爆发，就“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它的组织几乎同时在所有的地方一下子冒出土来。就每一点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开始时并不显眼，但集合所有的各点在一起，就成了一片燎原的烈火”。这时，义和拳的发源地直隶和山东两省，接近京、津两地的西面的山西省和东北面的盛京（今辽宁省）都基本上成了拳民活动的天下，竖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光辉旗帜。特别是在直隶省，据说是“不管怎么说，自六月十七日以后，运动遍及于这个首都所在的省份的其他部分，遍及它的西南部、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地区”。“一到七月一日——夺取大沽炮台两星期以后——拳民们就完全控制了直隶全省的局势”。在山东，虽有帝国主义挑选的巡抚袁世凯的镇压，也阻止不了这个反帝风暴的再爆发。因为它本来就是义和拳发源的地带。比如济南府邹平县东关外于8月18日午后，出现了“执有枪械”的“拳民八九十人”，“城关洋房均甚吃紧”。他们声称：“北直拳民早蒙朝廷录用，何以不令伊等学习”；“此等情形不能忍受，非学不可”。由于“山东的义和拳始终是处于非法地位的”，他们为了反帝，在8月内就爆发了“与清军的四次大规模战斗，即阳信县东门里书院之战、陵县九圣庙之战、蒲台县玉皇阁之战、滨州皂李庄之战。这四次战斗使清军遭到重创，而义和拳也牺牲了二千五六百人之多。此外，在东陵、海丰、武城、阳谷、惠民、德州、平阴、邹平、冠县、济阳等县，也都发生过义和拳‘挟制官长’、‘戕害委员’、‘抗官拒捕’和‘占县’、‘闯营’等大规模的战斗”。

在山西，义和拳的出现比起直隶、山东来要晚得多；但一经出现，发展就非常迅速。“庚子三月（1900年4月）闻山东、直隶练义和拳者甚多”，“五月中旬（6月中下旬）传言吾晋亦有之”，“迨六月初旬（6月底到7月初）晋阳一川练者纷纷。未经旬，遂联群结伴，焚烧教堂”。可见民教之间，积怨甚深，已非一日。6月27日，太原“东夹巷教堂，为义和团民焚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一），第49页。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义和团》（二），第188页。

费伊：《鸦片战争》，1975年英文版，第364页。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588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35、237页。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50—151页。

毁。奸谋日亟，潜聚教民益多；民心惶惶，日夜惊扰”。由于义和团在山西的发展很快。到7月，太原、寿阳、曲沃等地都有拳民进城，在城、乡与外国传教士发生战斗。在太原县清源乡梁泉道教堂，潞城县高家庄、马厂村与安阳村等处教堂，都有过较大的战斗。全省包括归绥六厅在内共有12个府州，40余县，都有拳民的活动，“焚毁教堂九十余所”，“几于通省之民，半成拳党”。

在东北地区，1900年2月在营口已有拳民出现，“名为义和拳。营埠有无数幼童皆往演练，询以练此何意，则众口一词，皆以预备杀逐洋人为言”。“一呼百应，揭竿而起”。当时，俄国人承认，“义和团的密使已对在我们铁路上做工的中国苦力进行宣传鼓动”。6月中旬，“奉属锦州、宁远、新民、广宁沿边一带，时有拳民出没”，“一唱百和，妇孺皆起”。自6月16日以后，沈阳“方有练习之人，然传练甚速”。自此以后，“盖平（今盖县）、海城、兴京、宽甸、开原，铁岭、海龙、辽阳等地都建立了义和团组织。据《辽阳县志》记载：义和团蔓延至奉天全省”。在海龙厅还“出现了由旗队兵弁组织的两支义和团”。到“一九〇〇年春夏之交”，义和团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发展也很快，“在吉林省长春府的拳民最多”，“省城吉林、怀德、双城、伊通、阿什河（今阿城）、宾县、三姓（依兰）、宁古塔都开始出现义和团”。“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早在“四、五月间也有了义和团的活动”；“之后，呼兰、北团林子（今绥化）、一直到祖国的北方重镇——古城瑗瑗都开始出现了义和团的组织和宣传活动”。由于东北地区受到沙俄的严重侵略，清政府又命令盛京将军增祺、吉林将军长顺、署黑龙江将军寿山等人“分练义和团民，以资战守”，并令“须先设法拆毁”关外锦州铁路，“以遏敌人来路”等等，所以义和团运动在这个地区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

在河南，义和拳的传入较早，因为它的发源地冠县本来就在直鲁豫边区平原的北端，位置十分接近。1899年5月，“有山东民人高志忠来省（开封——引者），称系精于义和拳，意欲来此传艺”。到1900年6月义和拳在京、津兴起以后，“河南接壤直东，民间自无不闻风兴起，各思创立保卫身家”。河南巡抚裕长“亦拟”将高志忠“饬传来省，即令充当豫正营教习”。一时河南全省大约有30个州县都卷入了反洋教斗争：黄河以北在彰德府的武安、林县、涉县、汤阴、安阳、临漳、内黄，在卫辉府的淇县、汲县、辉县、新乡、获嘉等县，黄河以南的南阳、确山、信阳、息县、商水、鄢陵、郑州等地，都有拳民的活动。

《等笔偶存》，第12、20页。

刘大鹏：《潜园琐记》，见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页。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纪事》，见《义和团》（一），第501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78、1079页。

佐原笃介等：《拳事杂记》，见《义和团》（一），第239页。

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第12页。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349页。

《盛京将军增祺折》（1900年6月28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1页。

黎光、张璇如：《义和团在东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2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0页。

在北部和西北地区，义和团的发展也很快。甚至远至伊犁地区，在 1900 年 10 月，“忽有天津拳党贾永潜来伊犁，在距惠远城西五里处之乌哈里克河西大庄子地方，开场教习拳棒”。在甘肃的凉州和庆阳，在陕西的延安和汉中，在内蒙古西部的“伊克昭盟的大部分、乌兰察布盟和巴彦淖尔盟的一部分以及今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四周围绕的地区（包括土默特旗和当时属于山西省归绥道的七个厅，一般也称‘口外七厅’的一带区域）”、“东部昭乌达盟与今辽宁、河北交界的一些村落，主要是在赤峰一带”等等，都是义和团活动的地区。

在长江流域地区，主要是各地会党，即哥老会等领导的反洋教运动；但是也不排除义和团运动的蔓延。虽经刘坤一、张之洞等籍《东南互保章程》的议定来大肆镇压，并谓“长江一带止有会‘匪’，并无可恃义民”；但反帝斗争的爆发，他们是镇压不了的，只不过使其声势不像在北方那样壮大罢了。实际上，就在两江总督的驻地南京，1900 年 7 月便贴出了义和团的揭帖，宣称“本帅所统神兵，不日由京到宁。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杆毁尽”；“兵到南京之后，平民不要虚惊。神兵逐尽洋人，从此天下安宁。兵丁一切食用，买卖必须公平”。当时，在长江流域各省普遍发起了反洋教斗争：江苏省的徐州、镇江、丹阳、泰州、邳州、宿迁；安徽省的寿州、青阳、南陵、铜陵；江西省的建昌、南丰、饶州、景德镇、吉安、赣州、进贤、德安、高安、婺源、建德、南城、安仁、新堤、萍乡；湖北省的蕲州、黄梅、广济、襄阳、谷城、枣阳、随州、南漳、天门；湖南省的衡州、永州、岳州、来阳、衡山；四川省的大邑、邛州、崇庆、温江、郫县、灌县、双流、崇宁、天全、汶川、彭县、蒲江、名山、丹棱、犍为、荣县、宜宾、富顺、眉山、南部、梁山、永川、大足；贵州省的桐梓；云南省的昆明、陆凉州、师宗、镇雄州等地，人民都纷纷揭竿而起，有的声言要烧教堂，而在其中的绝大多数地区则拆毁了教堂，驱逐了传教士。

在东南沿海各省，义和团和会党也在各地张贴揭帖，教授拳术，烧毁教堂，发动起义。在不同程度上发生这类事件的有浙江省的余姚、诸暨、宁海、临海、黄岩、乐清、永嘉、瑞安、平阳、玉环厅、西安、开化，常山、江山等地；有福建省的福州、厦门、漳州、龙岩、汀州、邵武、建宁、永春等地；有广东省的番禺、南海、顺德、新会、新安、饶平等地；有广西省的贵县、象州、修仁等地。在厦门的义和团揭帖上提出了收复台湾的正义要求。在福州，声讨闽浙总督许应騫的揭帖甚至贴到了他的卧室前面，说“老许老许，老而不死，误国殃民，实为祸始”。许应騫虽悬赏 3000 元捉拿，却始终破不了案。

就义和团运动在各地高涨的分布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各

《河南巡抚裕长折》（1900 年 6 月 26 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192、193 页。

参阅吴应铤：《义和团起义及其后果——对河南的影响》，见《义和团研究会通讯》第 3 期（1987 年 4 月），第 5、9 页。

《伊犁将军长庚等折》（1901 年 2 月 18 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961 页。

戴学稷：《一九〇〇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211 页。

《义和团》（三），第 335 页。

《日本外交文书》第 33 卷，别册一《北清事变》（上），第 127 页。

省：其中直隶、山东、山西、盛京四省，几乎全是义和团的天下；别的省区，凡是教堂林立之处，也都有拳民领导的、或受拳民起义影响而由会党领导的反洋教斗争；甚至远至新疆的伊犁、广西的贵县，贵州的桐梓，都有大师兄前往教练义和拳，发动反洋教、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赵三多、阎书勤等人在 1898 年 10 月领导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中所抱有的在全国“发动普遍的起义”的愿望，不到两年，在 1900 年夏秋之际就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形成了中国人民席卷全国的反帝、反侵略、反瓜分的爱国主义的高潮。遍及全国穷乡僻壤的外国教会的统治和压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不经过这样一次全国人民在各地、也基本上是在同时掀起的如火如荼的反洋教斗争，是动摇不了、也是无法加以破坏的。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不能把在各地所有的斗争情况都一一叙述，下面我们只把几个比较典型的事件抽出来谈一谈，以概其余。

一、沈阳的反帝火炬（1900 年 6 月 30 日—7 月 2 日）

这是盛京义和团发动的一次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斗争。当地拳民在刘喜禄和张海的领导下，于 6 月 30 日（六月初四）下午开始焚毁了东关耶稣会礼拜堂。具体经过如下：

“本年自五月间，省城内外居民，有演习义和拳者，不知传自何人，三五成群，聚散无定，人习见之。突于六月初四日未刻，有拳民四五十人，其中十五六岁童子居多，向内治门外英国所建洋楼，争为拆毁。随见火焰上腾，楼屋俱为灰烬。不移时，东南小河沿地方英人所设教堂、医院、亦俱为拳民焚毁无存。次日，城内外各洋人讲学堂，及俄国铁路公司，拆毁殆尽。所可异者，各处起火，只延烧附近教民房屋，四邻居民，俱未殃及。惟德胜门外法国洋楼尚存。该主教指挥教民，排列枪炮，拒杀拳民。而拳民仇视之心，似非尽毁其洋楼不止。且拳民日聚日众，至有数百人之多。”

到 7 月 2 日中午，“约有义和团三百余人冲向天主教堂”，“终于烧掉天主堂。堂内一百多名男女，包括一名外国牧师，都被烧死”。后来，“义和团第一次抓到一个俄国人把他杀了。后来他们又抓到了六个，但全都释放并且送回牛庄。”沈阳拳民“在杀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时候，也杀了一部分教徒，这是由于一部分传教士胡作非为，教徒中的败类分子仗势凌人，激起团民强烈义愤的结果。义和团并不把捉到的教徒全部杀掉，除罪大恶极的教徒外，一般教徒只要肯在‘佛寺烧香’，表示‘放弃对基督教的信仰’，就发给他们一份‘证明书’，‘给他一个可以求得生存的机会’（施督阁：《奉天三十年》，《矢内原忠雄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五四至一五五页）。那种不分良莠，一概杀掉的记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河南南阳靳岗教堂之战（1900 年 7 月 6—9 日）

距南阳城 12 里的靳岗，早在嘉庆年间（1796—1820 年）便有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前往传教，到 1843 年据说便已拥有 2000 人左右的教民。随着近代

参阅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2 页。

《日本外交文书》第 33 卷，别册一《北清事变》（上），第 299 页。

《盛京户部侍郎清锐等折》（1900 年 7 月 2 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220—221 页。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帝国主义教会在河南，也如同在其他各地一样，“既是一种经济势力，也是一种政治势力。教会组织拥有大片地产，仅在靳岗一地就占有总数达三千亩的土地”。在义和团起义之前，靳岗总堂主教安西满业已成为南阳官府的“太上皇”，出入坐绿呢官轿，前呼后拥，“一切军民人等，必须远远闪道”。他“在实际上握有对官吏的任免权”。“例如在修筑靳岗寨垣时期，南阳知县黄源”，以“办事不力，于一八九六年通过巡抚把他撤换，而代以奴性十足的潘守廉”。为了表达对认贼作父的潘守廉的义愤，南阳人民“曾在城内张贴许多匿名揭帖，上面画着安西满撒尿，潘守廉在底下接着喝的漫画，这些漫画充分揭露了清朝官府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主仆关系”。在义和团起义以后，靳岗人民忍无可忍，于7月6日到9日（六月初十至十三日）展开了围攻靳岗教堂之战，经过情况如下：

“七月六日，……大批农民队伍扛着木铎、铁钯、刀矛、棍棒，有的还打着红底黑边（也有黄边）的三角形大旗，潮水般向着靳岗教堂拥来，沿途高喊‘扒洋楼，报冤仇！’各村农民……争先恐后地参加战斗行列，总数约有七千多人。……南阳城中许多士兵，也不顾官厅的禁令，自动加入群众队伍。……靳岗教堂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就已被帝国主义传教士修建成了一个军事堡垒，……拥有抬炮和洋枪一百多支，凭着深沟高垒的掩护，向群众开枪轰击，并由教士率领小股马队向外冲锋，打死打伤群众多人。与围攻靳岗的同时，……许多农民……与市民一起，将城内的天主堂（在县十字街东边）拆毁。……南阳镇左营游击双奎，妄自带兵出来‘弹压’，……慑于人民的愤怒，抱头狼狽而逃。……南阳城内的商人也罢市声援。……七月九日，南阳各乡人民聚集了数万人，……从东、南、北三面再次围攻靳岗教堂，……主教安西满下令开枪，……俘虏受伤群众八人带回寨内，……被割去脚筋，拴住锁骨，酷刑吊打，……暴露了他们是一群披着袈裟的豺狼。南阳……各乡的‘联庄社’进一步联合了起来，……准备更大规模的围攻。吓得洋教匪徒终日行‘告解礼’，等待死亡。南阳消息很快传入‘东南互保’的中心省份——湖北，……张之洞……刊印七月十七日、二十四日清廷颁发的保护外人的上谕……散发，……急命襄阳、枣阳、老河口、光化等处守令添募守勇，……相机剿捕，……严禁闹教。……可以看出南阳人民围攻靳岗教堂的英勇斗争对于邻近各省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靳岗教堂的围攻战接着发展到毗邻的新店镇，在那里的20名传教士和外籍工程师，连同他们的40车行李，都被教民大恶霸李承瀛掩藏起来。义和团闻讯赶到说：“外国人欺负咱中国，真是到了头，清家不敢惹他，咱老百姓要教训教训他！”遂即包围新店。外国人开枪突出包围；但40车行李全被砸毁，是为“砸洋车”之役。

三、山西太原教案（1900年6月27日—7月9日）

山西太原的拳民群众在6月中旬起来以后，太原府寿阳布道团（the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113页。

黎光、张璇如：《义和团在东北》，第58页。

吴应銑：《义和团的起义及其后果——对河南的影响》，见《义和团研究会通讯》1987年第3期，第5页。

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科学院河南分院历史所：《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人民的反帝斗争》，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0页。

shouyang mission) 的库姆斯小姐 (Miss Coombs) 于 6 月 27 日黄昏手持左轮手枪出来, 借口说是一个人“企图要抢夺她带的钱包”而首先向他开枪, 遂被当场群众“击倒并被杀”, 接着教堂及其附属建筑均被焚毁。布道团的其他成员则“逃到了另一个传教士的家里, 在那里他们受到巡抚的军队的保护, 直到 7 月 9 日。无论如何, 巡抚同这次骚动没有牵连”。“在太原府骚动两天之后, 瑞典浸信会 (the Swedish mission) 的十个成员在朔平府长城北面被杀”。至于 7 月 9 日 (六月十三日) 发生的太原教案, 事情原委如下:

“光绪庚子夏五月 (1900 年 6 月) 洋夷乘义和团纷起之日, 联贼入寇, 势甚猖獗, 锐不可当。朝廷命将征讨, 虑及在华诸夷纠结教民约为内应, ……乃诏各直省督抚同心讨贼。凡在内地之洋夷, ……如有乘机作乱, 或谋内应者, 着即就地正法, 毋稍宽纵。……时在晋洋夷业经暗与教民议, 在省倡乱, 占踞城池, 召其国之兵, 长驱来晋。而教民之魁李富且系千总, 不从。越日又议, 仍二三其心。又遣教民与辽州把总李义议谋。未定而机已泄。毓中丞闻之, 急命中军参将引抚标亲兵, 将在省之夷圈禁于猪头巷之客馆, 名曰保护, 以防义和拳之有伤洋夷也。潜拘教民, 严密审讯, 悉洋夷谋乱事。六月十三日 (7 月 9 日), 毓抚戎服督兵至客馆, 提解详夷, 俱赴抚署西辕门外, 次第骈戮, 凡四十余夷。……谕千总李富出教, 不听。既而闻其与夷同谋作乱, 遂于十八日弃市。富临刑自语曰: ‘悔不听洋人五月乱晋之谋, 致有今日’。越数日, 械系李富之弟义自辽州至省审讯。义曰: 吾兄不听洋人之谋, 已遭毒手。事已败露, 夫复何言。但自此以后, 君等恐莫能安然朝食矣。”

据毓贤奏折称“洋人勾结教民, 潜谋倡乱, 业已正法”。其中包括“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 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太原教案的发生乃是事出有因的。在此以前, “毓贤任山西巡抚已有三个月, 并没有任何仇外的表现”。库姆斯是在 6 月 27 日第一个丧生者; 但此事“炮击大沽炮台后十天之前迄未发生”。7 月 9 日的洋人正法事件发生“在开衅宣战以后三个星期, 也正好是在西摩尔联军开始向北京进军之后一个月”。在帝国主义列强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以后, 慈禧太后曾在 6 月 24 日发布了一道把不法传教士和洋人就地正法的上谕。“据说总理衙门的两个成员——袁昶和许景澄——把上谕更改, 用‘保护’来代替了‘正法’, 毓贤怀疑这个命令的真实性, 打电报询问; 结果他收到了正确的文本, 于是着手执行”。因此, 慈禧太后要负“全部责任”。此说虽未经证实, 但就上引刘大鹏《潜园琐记》的叙述来看, 这个“就地正法”的上谕是存在的, 而传教士与叛国教民伺机“谋内应”之事, 亦难保其必无。所以后来继任萨道义 (Sir Ernest M. Satow) 就认为, 要对太原教案作“法律追究”, 那是“不可取的”。

四、萨拉齐 24 顷地教堂之战 (1900 年 7 月 19—24 日)

萨拉齐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地方, 当时属山西省归绥六厅中之萨

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科学院河南分院历史所: 《义和团运动时期河南人民的反帝斗争》, 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第 159—161 页。

同上书, 第 162 页。

施达格: 《中国与西方: 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第 240 页。

刘大鹏: 《潜园琐记》, 见乔志强: 《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 第 31—32 页。

《山西省庚子年教案前后记事》, 见《义和团》(一), 第 501 页。

拉齐厅。早在 1830 年，天主教就在西湾子村（今河北省张北县）设立侵略据点，后设“蒙古教区”的总教堂于此，作为天主教在西北播种的起点。1883 年（光绪九年）罗马教廷把“蒙古教区”扩大为东蒙古、中蒙古和西南蒙古三个教区，萨拉齐厅属西南蒙古教区。“在萨拉齐，洋教士在一八九一年以低价购入大批土地，建立了有名的二十四顷地大教堂”。到 1892 年前后，教堂利用灾荒年景，“更乘机扩张，霸地多至一百余顷，以后更扩张至二百六十多顷”。它是地地道道的地主堂，“武装团丁应有尽有”，建立碉堡，私设法庭，“几无异于名城巨埠之有租界地”。它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互相勾结，并吸收他们入教；他们则“恃教堂为护符，凌轹乡里，鱼肉良善”。7 月 19 日（六月二十三日）萨拉齐二十四顷地教堂之战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萨拉齐所属之二十四顷地方天主教堂，前因教民石险生、任喜财、刘二存等，因争地起衅，率领多人至托克托城厅所属之河西准噶尔旗属麻地壕村，杀死高占年等九命，弃尸黄河一案，该教堂洋教士（即天主教的主教韩默理 Bisbop Hamer, Ferdinand——引者）藏匿正凶，旋又勾结教民一千余人，在村外房上及村口排列，势甚凶猛。该厅深恐出村滋事，扰害平民，……派委德克吉克率领马队，会同……练军步队后旗……及义和团等，前往防范。六月二十三日，该教匪等胆敢先行施放洋枪，向前劫杀。马步各军亦即开枪冲杀……义和团民亦即相随杀入，……乱战村中，……村房及教堂，经义和团神火焚烧，顷刻烈焰飞腾。……案内首犯石险生、任喜财、刘二存三名，一并拿获。……是役也，计阵亡练军步兵二名，义和团民八名；受伤马队前锋校长一名，练军步兵四名，义和团民二名。……饬将拿获之石险生等一并就地正法，以结杀死九命一案。”

后来，“‘西南蒙古教区’的主教、老‘中国通’韩默理也被义和团逮住了。群众把作恶多端的帝国主义分子韩默理带到托克托进行公审。他们‘以铁索穿（韩默理的）肩骨，囚以笼……背上插一小旗，上书‘老洋魔’三字，拽之游街市，民众聚观，诋辱万状’（《拳“匪”祸教记》，第 322 页）。可见人民仇恨他到如何程度了”。最后，这个帝国主义分子韩默理“于七月二十四日”被处以极刑，人人称快。

五、浙江衢州教案（1900 年 7 月 21 日—8 月 6 日）

衢州地处浙江西部，与江西、福建两省接壤。衢州教案“无疑是对北方骚动的一次响应。但是，浙江全省的普遍骚动则是部分地由于在 7 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大量上海难民的来到。他们带来了有关外国最惊人的谣言”。这谣言就是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发动侵略战争，瓜分中国；加以去年意大利曾经索租浙江的三门湾，所以浙江人民的爱国热情特别高涨。当时已有拳民在温州等地散布揭帖，推动反帝斗争；但是，以衢州府斋教首领刘家福等人领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41—242 页。

叶守真：《山西的火与箭》，1903 年英文版，第 21 页。

戴学稷：《一九〇〇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见《义和团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 215 页。

转引自《重修绥远通志稿本》、《基督教篇》及《教案篇》（内蒙古图书馆藏）；戴学稷：《一九〇〇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见《义和团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 216 页。

《山西巡抚毓贤折》（1900 年 8 月 6 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438 页。

戴学稷：《一九〇〇年内蒙古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见《义和团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 229 页。

导的反洋教斗争声势最大。他们在七月初于闽浙交界的九牧山、江山二十八都首举义旗，江山、常山“两县失陷”，随后又攻下了开化县，并向衢州西安县进军。一个传教士报导说：

“麻烦最初发生在江山县，该处的骚乱是那些来自江西广信府（今上饶——引者）的‘斋教徒’所造成的。……‘斋教徒’……结成一伙并进攻江山，常山等县城，那些地方因防守薄弱而落入他们手中。……七月二十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据说‘斋教徒’正向衢州推进。当时，关闭了城门，城内开始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六月二十五日（公历七月二十一日）中午前后，桑普生先生的住宅受到攻击。……群众……接着前往罗马天主教会，经过仔细搜查炸弹和大炮之后，他们把该会彻底毁坏。桑普生先生及其家属在道台衙门的大门口被杀死。……晚上，在一个非基督教徒的家中避难的两名年青女传教士，遭到了杀害。七月二十二日，在白天的某个时候，常山新教教会成员——两名妇女和两名儿童，在城门口被杀死。瓦尔德先生……逃入山中……被杀。在一名姓李的军官指挥下的部队到达后，才恢复秩序。”

西安县知县吴德潇因站在传教士一边也被杀。在衢州教案中，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传教士男女老少共计 11 人被杀。衢州城的反洋教斗争持续了半个多月，城门“紧闭着，直到八月六日才开放”。一位目睹者说：“桑普生先生刚刚筑成的那所新房子的砖块已被拿走，并用来修补城墙”，以作准备抵抗外国侵略者之用。绍兴的梅度士牧师听说，桑普生曾被解送到金衢严道鲍祖龄那里，“但道台说他同桑普生先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他还说：“西安知县是桑普生先生的一位朋友”，“他的被杀也是意味深长的”。此事之所以意味深长，在于它说明了一件事，即人民群众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所掀起的爱国的反洋教斗争乃是波涛汹涌，势不可阻的。谁在帝国主义列强业已发动侵略战争之后，还敢于认敌为友，认贼作父；即便他是封建统治者，即便他处于《东南互保章程》的地区，也同侵略先锋的传教士一样，是没有好下场的。浙江衢州教案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六、直鲁边区的反洋教斗争与阎书勤等壮烈牺牲（1900 年 8 月 19 日）

直鲁边区的冠县梨园屯是 1898 年 10 月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的地区，领导起义的赵三多、阎书勤等人此后便分头活动。“一八九八年冬，赵三多北上枣强、武邑、正定、阜城等地组织反帝队伍，一八九九年四月初八（5 月 17 日），在正定县大佛寺主持召开了各路头领会议，决定举行第二次起义。随后联络冀中、冀南和鲁西北等地的其他反洋教组织，于一九〇〇年四月初四（5 月 2 日），在枣强县卷子镇举行了第二次起义”。7 月 9 日，赵三多率众攻打临清小芦教堂，7 月 18、20 和 22 等三天，又攻打了威县的魏村教堂，使这些地区的教堂都被焚毁，后来去广宗县一带活动。至于阎书勤等率领的拳民，他们的活动范围则仍以梨园屯一带为中心。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44 页。

同上书，第 245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907 页。

《英国蓝皮书》，第 253—254 页。

参阅《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826、907—909 页。

《英国蓝皮书》，第 255 页。

“在这期间，阎书勤、高元祥等率众在威县、丘县一带活动。一八九九年冬，阎书勤率众来到黎园屯北二十里的常家屯，……一九〇〇年一月九日，……准备攻打黎园屯。……一月十一日，……未能攻下，……于是撤退，……北去滹沱河流域和赵三多的队伍汇合。……一九〇〇年五月间，赵三多、阎书勤等又率义和拳和饥民万余众，在直隶阜城、景州一带展开斗争。……阎书勤一部……经过恩县，直攻武城西北的十二里庄教堂，……未能攻下，阎书勤乃转到黎园屯一带活动。”

这时正值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他和赵三多在首义时所正确预计到的“普遍的起义”的时刻已经到来，阎书勤等便以梨园屯为中心，与周围各地拳首联系，准备进行一次更大的起义。据东昌府知府王燊修所了解到的情况是：

“阎书勤等自武城十二里庄被官兵击败，即纠夏津‘匪’首郝洛有、任寡妇，博平‘匪’首孟兆连、杨付桂等各股合伙。又有直‘匪’宋狮子、刘化龙，附近十八村之塾子孟洛珠，各徒众互相联络。各庄教民房屋多被拆毁。惟梨园屯教屋尚存，为‘匪’党往来屯聚之处。现在‘匪’焰既张，附和日众，若不及早扑灭，必致势成燎原，为直、东巨患。自非捣穴擒渠，大示惩戒，不能断根株而绝响应。”

由于梨园屯等是义和拳首义之处，阎书勤又是首义领导人之一，所以他们便成为反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得而甘心。“拳教不和，以冠县梨园屯一案为最。此案既结，而在平之神拳遂起。驯至去冬今春，遂有各属闹教之祸”。他们处心积虑，于1900年8月16日夜（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往袭梨园屯，17日晨把村庄团团围住，发生激战。是役以阎书勤等警惕不高，敌军之来，“初未知觉，未及出庄抗拒”。敌人入庄以后，虽“持械吹号迎扑，势甚凶猛”。但阎书勤却因叛徒李三的出卖而被捕，于8月19日在临清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五岁。在临刑前，他激昂地说：‘我不是贼寇，也不是响马，我是替天行道，拆玉皇庙盖天主堂我不服。有我阎书勤就没洋人，有洋人就没我阎书勤，二十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充分表现了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革命英雄气概。”

七、四川 23 个州县的响应（1900 年 7—9 月）

四川在义和拳起义以前，是“近代中国重大教案爆发次数最多的地区之一”。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以来，四川爆发了1895年5月反对第一次瓜分危机的成都教案和1898年7月反对第二次瓜分危机的余栋

同上书，第256页。

李岚锁：《在义和拳议事厅落成典礼仪式上的讲话》（1986年12月29日），见《义和团研究会通讯》1987年第二期，第5页。

宋文宣、刘绍刚：《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斗争》，见《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1期，第98—100页。

《东昌府禀》（1900年9月6日），见《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380页。

《东昌府禀》（1900年7月12日），见同上书，第366页。

《东昌府禀》（1900年8月26日）见同上书，第375页。

同上书，第382页。

同上书，第376页。按是役被俘拳民于8月19、20及21日三天在临清遇害。阎书勤牺牲的日子文件上没有说明，今姑定为8月19日。

臣起义。当然，这些反瓜分斗争都是通过反洋教运动来进行的。在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四川人民和南方各省人民一样，仍是通过反洋教斗争来响应和支援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并具有了长期坚持斗争的特色。现将其在 1900 年的 23 个州县人民展开反洋教斗争以声援义和团运动的情况概列于下：

“七月初，大邑县民罗文榜建旗‘顺清灭洋’四字，操拳练武，远近来者数千人，并于七月九日起事，……捣毁教堂，惩办不法教民，‘屯聚寨栅’，以拒官兵。十二日，（四川总督）奎俊派高维寅……前往镇压，……在唐场大肆屠杀，……罗文榜被捕牺牲。……拳‘毒’迷人举若狂。……与大邑县唐场人民举事的同时，邛州城人民也纷起捣毁教堂，……成都西境颇不能安。……七月十日，邻近的蒲江县教堂亦被愤怒的群众所毁。……七月十四日，雅州名山县武举庞世琪聚众数千人，……焚劫教堂。……同月，丹棱任春、古老五等率领群众焚毁英、法两国教堂，驱逐教士，眉、丹两境为之骚然，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七月十九日，……四川……参加东南互保。……以盐工为主的自贡人民，于七月三十一日，奋起捣毁豆芽湾、两口塘二处教堂，并将大部分信教徒的房屋及其部分家具打烂。杨司铎在地主豪绅的保护下，逃到县城，知县玉润田肃衣冠延见，……杨司铎盛怒疾声谓：‘你管的好百姓，打了我的教堂、教友、限你三天办人赔款。’言时以代手仗的旱烟杆击桌有声，傲慢无理，有甚于上司之命令下属。……八、九月间，成都附近的群众，成群结队，自称‘保国团’，到处打击外国教会侵略势力。……从大邑发难以来，邛州、崇庆、温江、郫县、灌县、双流、崇宁……天全、南部、汶川、彭县、梁山（今梁平）、大足、永川、名山、蒲江、丹棱、犍为、荣县、宜宾、富顺、眉山等二十三个州县都掀起了反洋教斗争。仅双流等八州县（教民）被毁五百家之多，邛州尚不在内。各处法国教堂、经堂、医馆、书馆以及教民房屋多被焚掠。……四川人民发动的反洋教斗争，……与清军武装对抗，……在‘东南互保’的后院，燃起了反帝的怒火。”

范围广大的反洋教斗争虽经四川总督奎俊卖力镇压，但“温、郫、灌三县仍复报案不已”。它在这里被镇压下去，在那里又起来了。四川人民的斗争大力地声援了北方义和团的反瓜分爱国斗争。

以上是我们就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各地高涨时期，即 1900 年 6、7、8 几个月中，特别是在 7 月发生的反洋教斗争中所选出来的七个实例。其中前面五个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地方或一个城市的，第六个是属于地区性的，第七个则是属于省区性的。这些实例多少具有典型的性质，基本上可以代表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在全国各地方、各地区或某些省份发生的反洋教斗争的情况。尽管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成败不一，规模不同，地方官吏的向背也不一致；但是，它们都取得了驱逐传教士、焚毁教堂、并诛戮了一些用枪口对准人民的传教士和助纣为虐、横行乡里的叛国教民的结果，大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威风，大长了中国人民反抗瓜分、保家卫国的志气。现在我们把各地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论述。

宋文瑄、刘绍刚，《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义和拳斗争》，见《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 年第 1 期，第 101 页。

牟安世：《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见《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 页。

参阅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第 48 以下诸页。按本书中把四川义和团的战斗分为四个阶段，即：（一）响应北方义和团运动时期（1900 年）；（二）义和拳广为传播时期及陈秀俊事件（1901 年）；（三）高潮时期中的各路战斗（1902 年）；（四）继续斗争时期的各地起事（1903—1911 年）。

八、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

自 1900 年 6 月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以来，拳民们抵抗了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战争的侵略，打击了在首都北京和全国第二大商埠天津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形成了遍及全国各地的反瓜分、反侵略的斗争风暴。中国人民的起义只有当它不只是限于一个或几个城市、地区或省份，而是普及到长城内外、大河南北、长江和珠江等各大流域的整个国家的时候，它才真正显示出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者面前不再依然是“一个原始的群体”“垂死的民族”、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了。他们敢于起来，不顾中外反动派的镇压，铤而走险，拿起手中的刀矛，为了保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和免于瓜分而展开了同帝国主义者的英勇的、大无畏的，不屈不挠的殊死战斗。义和团运动是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义愤”的。

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各地高涨的重大结果之一，毫无疑问就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宣告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的诞生。孙中山先生说：“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他认为，在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事实上，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乃是由义和团运动来替它打下基础的。义和团运动“这次群众起义（this mass uprising），同时也是让外国人不要开始瓜分中国的一种警告。华北农民爱国主义精神的爆发以及中国其他各地的许多暴动，突出地表明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ese Nationalism）。即使预先采取一个法属云南和广西、英属扬子江流域，日属福建和俄属华北殖民地的行动来阻止这次事件的话，那么这样一种瓜分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的”。

所谓“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诞生”，在义和团运动中是由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第一，在认识方面，从拳民的揭贴中，如“最恨和约、误国殃民”和“免被割据逞奇能”的宣告中，说明了中国人民对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和瓜分大祸的来临已经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了。第二，在行动方面，拳民已经采取了义勇军的形式，自发地在全国各地展开爱国斗争。马克思指出：“历

张力：《四川义和团运动》，第 49—53 页。

四川档案馆：《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 645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42—343 页。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第 410 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317 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 279 页。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第 593 页。

同上书，第 590 页。

按孙中山先生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不过，根据他所说的义和团与西摩尔联军“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724 页）话来看，应该说，他是承认和认识到了这一点的。

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义和团运动作为反洋教运动的最高阶段，即是参加反洋教运动的群众队伍的扩大，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统治的斗争这一历史活动的深入的结果。“自从德国利用教案以侵占胶州湾，在我国老百姓眼中，传教者与侵略者遂无何区分矣。德国要挟得到满足之后，俄国之于旅顺、大连，法国之于广州湾，英国之于威海卫，继之而来，如法泡制。此种情势，很明显是准备瓜分中国了。按照以上各国对我之状态，假如说，我国的老百姓竟能甘心忍受，无声无息听其宰割，毫无反抗，那就永远沉沦，世世子孙预备做牛马奴隶之外，别无其他的希望了！然而不能。我国人民所表示的……都是爱国情绪所激起，都有纯洁而神圣的精神”。因此，义和团运动所代表的显然不是什么“封建蒙昧主义”的精神，而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它赋予了义和团运动以不同凡响的意义。甚至英帝国主义的驻华代表之一、以“中国通”而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也不敢随便诬蔑它，只有老老实实地承认说：“就其起源而论是爱国的，就其基本思想而论是可以证明为有理的，并且就事实而论，它要不是外国劝告的结果，就是学习外国方法的结果”。赫德继续意味深长地写道：

“当前这个事件并非毫无意义——今后一百年是一个变革的世纪，而义和团运动就是这个世纪变革的序幕，也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旋律：中国到公元两千年时，将是非常之不同于一九〇〇年的中国的！”

我们认为，不管赫德的立场如何，他这段话毕竟是具有远见的，说得很准确，难道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就是我们今天 20 世纪历史的主旋律吗？歌词号召“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要“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因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中华民族，只有起来“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才是救国之道！才有出路！难道当时的义和团不就是我国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的一种抗日武装，义勇军的先驱吗？难道当时的揭帖号召“三界人士，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精练义和团拳术”以反抗侵略瓜分，保家卫国不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曲吗？

世传所谓，1900 年 8 月 23 日的《和约二十五款》，其中绝大部分反映了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主义要求，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在收复失地方面有“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德国将胶州交还中国”，

珀塞尔：《义和拳背景研究》，第 271 页。

《义和团》（一），第 112、120 页。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04 页。

刘厚生：《张謇传》，龙门联合书局 1958 年版，第 88 页。

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见《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76 页。

赫德：《北京公使馆：一个民族起义和国际事件》（1900 年 8 月），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 4 页。按所谓义和团运动系“外国劝告的结果”或“学习外国方法的结果”之说，乃当时流行于外国人中的一种看法。因为他们认为义和团“在其成立之初，有点儿像共济会（Masonicorder），而拳民们的许多习惯和仪式，据说又与共济会成员那套相似得出奇，这样就使人联想到拳民们起源于古代和外国的很大的可能性。”（见鲍罗杰：《中国简史》，1901 年英文版，第 521 页）这当然是一种穿凿附会。又按共济会是存在于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初期的一种秘密结社。着重点引者所加。

赫德：《北京公使馆：一个民族起义和国际事件》（1900 年 8 月），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 49 页。

“俄罗斯将大连湾交还中国”，“英国须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等；在反洋教侵略方面有“所有各国教堂一律充公”等；在海关方面有“中国海关仍归华人办理”，“各国运来中国货物合应加倍收税”，“洋人商船到口者，须先禀明该处守口中国兵官，方准入口”，“凡货物运往外国者，亦须加倍收税”等；在赔款方面有“各国前所索赔款，一概作废”，“各国应偿中国兵费四百兆两”，“另赔义和拳兵费四百兆”等等。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对外战争中所提出的第一个条约的蓝本。如果说它反映了义和团的“灭洋”的要求的话，那么他们的要求也无非是属于自卫的性质，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罢了。其中赔款一项，也无非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促成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则反过来又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这个“作为反抗西方统治的结果而发生的大发雷霆的暴动”，使“那些关于中国人民完全没有任何爱国主义精神的传说都变成了一种历史上的无稽之谈”。美国的进步作家、美国“文学中的林肯”马克·吐温（Mark Twain）于1900年8月12日所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就说道：“现在中国人全都起来了，我同情中国人。他们一直受着高踞君位的欧洲强盗的欺凌，我希望他们能把洋人全都赶出去，永远把他们拒于门外”。他预言：“中国最终必将获得解放，拯救自己”。同年11月23日，马克·吐温应纽约公众教育协会之请，在伯克莱学术会堂的讲演中宣称：“洋人们在中国的国土上只是惹是生非，中国为什么不应摆脱他们”？“我无论何时都站在义和团一边。义和团是爱国者，……我祝愿他成功。义和团坚定地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祖国，我也是一个义和团员。”

《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于“一九三四年为电影《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作曲），传遍祖国大地，强有力地鼓舞着人民团结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确定为代国歌，并在一九八二年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1986年版，第859页）。

《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期），第10页。

佐原笃介等：《拳事杂记》，见《义和团》（一），第259—260页。按《和约二十五款》系有友人自湖南衡州，交来拳民“所拟”的；但又称系8月23日“皇太后召各大臣会议”所立（《义和团》（一），第259页）。实际上，当时慈禧太后已西遁至宣化，仓皇逃窜，本来就没有召开什么大臣会议；因此，这二十五款当为《义和团和约二十五款》。内容除上引者外，还有一些属于“扶清”方面的旧的传统观点，此处不录。

朱熹：《中庸》第十三章注文，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1483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12页。

第二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维新派乘机起义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的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都曾经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而进行过斗争。前者首先提出了反对“瓜分豆剖”的号召，并于1894年11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后者则把自强图存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维新上，并由此而发动了1898年6月至9月的戊戌变法运动。但是，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中，把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却始终是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和在此基础上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自1900年夏季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反瓜分斗争席卷全国以来，中国大地沸腾起来了，一时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维新派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有1900年8月的维新派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与10月的革命派领导的惠州起义之爆发。

一、自立军起义（1900年8月9—22日）

1900年8月的自立军起义是在维新派唐才常等人的领导下进行的。唐才常是湖南浏阳人，1897年与谭嗣同等在浏阳兴办算学馆，提倡新学。又在长沙编辑《湘学报》、《湘报》，参加创办时务学堂。1898年9月，他应谭嗣同电召，欲赴北京，参加变法运动，抵汉口而政变猝起，遂出亡日本。1899年2月返国，3月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是年秋，他又重赴日本，冬返国，于1900年春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未几，易名自立会，等组自立军。

先是康有为在1898年9月21日政变发生的前一天，即20日在英人保护下由北京逃沪转香港，10月离港赴日。于时梁启超也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下流亡日本。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先生等此时也在日本，力谋与维新派合作救国而不果。孙中山、“陈少白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陈少白曾“请康、梁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举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1899年4月3日康有为离日赴加拿大；5月赴英；6月重返加拿大；7月20日在温哥华与李福基等组织保皇会，专门与革命派对抗；10月经日本返香港；1900年1月26日离港赴新加坡，接受英帝国主义的“保护”；8月9日应英国新加坡总督邀往槟榔屿，住总督署中；至1901年11月始离槟榔屿赴印度，随即定居大吉岭。自康有为离日后，维新派首领梁启超表面上赞成与孙中山合作的主张，同时由陈少白与徐勤共拟两党合作章程。徐勤与麦孟华等是坚决的保皇党，写信告诉康有为，说梁已“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得信后勒令梁“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1899

方纳：《社会批评家马克·吐温》，第259页，转引自张廷琛：《马克·吐温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四辑（1982年6月），第298页。

《马克·吐温讲演集》，第145页，转引自张廷琛：《马克·吐温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四辑（1982年6月），第299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冯自由：《革命逸史》（一），《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第49页。按有人认为康有为“不识时务”，说领导戊戌变法的人不识时务，岂非不合情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指他不识中国改革须经革命的时务。同

年12月19日，梁乃离日赴檀香山。从康、梁的行踪来看，上述唐才常两度赴日，都有机会同他们商议在长江两岸各省起兵“勤王”的计划，但决定却在最后一次。“己亥冬（约在1899年11月前后——引者）湘人唐才常与康有为、梁启超诸人决议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运动各省会党及防军发难之责，才常任之。向海外华桥募集饷精接济义师之责，康梁师徒任之”。唐虽在日见到过孙中山，并受其影响，但他的“勤王”思想没有什么改变。

1900年春，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本会以正气命名，原因中土人心涣散，正气不萃，外邪因之而入；故特创此会，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济时艰”。由于当时义和团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又由于孙中山正在积极准备革命斗争、部署惠州起义，唐才常和康、梁等人都力图在革命派起义之前发难，以便争取地盘。“才常应付各方，至有权术。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故各方咸为之用。留东学生先后归国参加者，有林锡圭、秦力山、吴禄贞、戢元丞、沈翔云……等二十余人。才常初在上海设办事处，……旋又易名曰自立会，称其军曰自立军。进行半载，成效渐著。湘、鄂、皖、赣之哥老会头目多与联络，所发富有票散放于沿江各省者为数甚伙，势力日益膨胀”。

7月26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唐才常以在义和团运动中，“人民须自行保种救国为辞，邀请沪上当代名流开大会于张园（在英租界内，今泰兴路南段，南京西路和威海卫路之间——引者），美其名曰国会。莅会者有容闳，严复、章炳麟、文廷式、叶瀚、张通典、吴葆初、宋恕、龙泽厚、沈荇、马湘伯、毕永年、戢元丞、狄葆贤等数百人。公推香山容闳为会长，侯官严复为副会长，才常为总干事、林锡圭、沈荇、龙泽厚、狄葆贤为干事。成立后大招清吏之忌，以时值拳‘祸’猖獗，无暇禁阻”。“时国会中参与分子至为复杂，除才常及其密友数人外，鲜有得参预自立军机密者。余人大都震于国会民权之新说，乘兴来会，非有如何确定之宗旨也”。实际上，它的宗旨的不确定性是由于其内容的自相矛盾造成的。它的六条宗旨中有：“保全中国自主之权，创造新自立之国”、“决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请光绪皇帝复辟”等等，遭到了与会的革命派的反对。章炳麟“责才常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戴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因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毕永年则“以乡谊力劝才常继绝康有为关系。才常利保皇会资，坚不肯从，相与辩论一日夜，失望而去”。

这个张园国会由于它坚持勤王，不与革命派合作，所以在其成立之日起，即是它的瓦解之时。

唐才常等在召开张园国会后即赴汉口，把指挥起义的机关设在汉口英租

时在他于1898年9月27日至29日从上海去香港途中，英使馆汉文参赞戈颁（Henry Cockburn）同康氏谈话后的印象是康对“世界政治所知甚少”（见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59页）。

参阅《康有为年谱简编》，见《康有为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21—328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二），《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第29页。按“行者”指孙中山。

冯自由：《革命逸史》（二），《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第29页。按“行者”指孙中山。

同上书，《正气会及自立军》，第68页。

《正气会序》，《亚东时报》第19号（1900年2月28日）。

冯自由：《革命逸史》（二），《正气会及自立军》，第68页。

同上书，《张园之国会》，第69页。

界内，决定把他们利用哥老会组成的自立军于1900年8月9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同时在安徽的大通镇与安庆府，湖北的汉口和新堤（今洪湖）以及湖南的常德等五处起义。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的汇款迟迟不到，举事日期不得不一再推迟。仅前军统领秦力山以长江沿岸戒严，未得军报，如期起兵，占领大通，并四处张贴汉口所预印之《安民告示》说：

“中国自立会会长以讨贼勤王事，照得戊戌政变以来，权臣秉国，逆后当朝，祸变之生，惨无天日。已亥十二月念四日（1900年1月24日——引者）下立嗣伪诏，几欲蔑弃祖制，大逞私谋。更有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名，贼臣载漪，刚毅、荣禄等阴助军械，内图篡弑，不得则安然与中立为难。用敢广集同志，大会江淮，以清君侧，而谢万国，传檄远近，咸使闻知。”

在这篇《安民告示》中，还列有四项“宗旨”和九条“法律”：宗旨与张园国会的基本相同，不再赘述；九条“法律”中的第三条是“不准烧毁教堂杀害教民”。由此可见，康、梁与唐才常等利用义和团运动来发动的自立军起义是站在反对义和团运动一边的。因此，秦力山领导的这次大通自立军起义，虽说活动了部分会党及清水师营并参加，终因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的要求，最终不得不陷于失败。从8月9日到11日，总计自立军在大通起义为期不过三天。

至于自立军汉口总部的情况，还比不上大通镇，它在起事以前就被中外反动派镇压下去了。唐才常决定在8月23日于武昌、汉口、汉阳三地发难。英国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在了解到“他们的目的是使皇帝复位并推翻目前的政府”后说，“我已经使那些领导人了解：如果他们采取此种行动，他们不能够期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同情，因为它已保证对总督们为维护和平和秩序所做的努力给予支持”。英领事并有公文致湖广总督张之洞说：“南方有所谓大刀会、哥老会、维新党诸种，皆与北方团‘匪’相仿佛，有为乱者，即速擒捕，敝国决不保护”。张之洞在8月21日侦知此事后，“即照会租

转引自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冯自由：同上书，《张园之国会》，第69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一），《秦力山事略》，第86—87页。按1900年五六月间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之际，中国资产阶级“爱国志士中颇有主张乘时游说拳党首领，使改扶清灭洋标帜为革命排满者，（秦）力山亦此议之一人，遂只身至天津，求见拳党大师兄痛陈利害。拳党斥力山为二毛子，命牵之出”（冯自由：《革命逸史》（一），第86页）。这些资产阶级爱国志士看不到义和拳起义的爱国主义精神，看不到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看不到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教会侵略来瓜分中国的阴谋；因而他们对义和团运动持反对态度就不是偶然的了。他们去天津游说义和拳不果；但是，他们却把长江一部分会党的票据，凡参加勤王运动的，“都一律改用富有票，所有原票内涉及‘灭洋’一类的字句，都让其完全改变”，“易以自立或救国二字”（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245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一），《秦力山事略》，第86—87页。按1900年五六月间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之际，中国资产阶级“爱国志士中颇有主张乘时游说拳党首领，使改扶清灭洋标帜为革命排满者，（秦）力山亦此议之一人，遂只身至天津，求见拳党大师兄痛陈利害。拳党斥力山为二毛子，命牵之出”（冯自由：《革命逸史》（一），第86页）。这些资产阶级爱国志士看不到义和拳起义的爱国主义精神，看不到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看不到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教会侵略来瓜分中国的阴谋；因而他们对义和团运动持反对态度就不是偶然的了。他们去天津游说义和拳不果；但是，他们却把长江一部分会党的票据，凡参加勤王运动的，“都一律改用富有票，所有原票内涉及‘灭洋’一类

界各国领事，于二十八日清晨（8月22日——引者），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与轮船码头等处，先后逮捕唐才常等二十余人”，当天“夜二更乃押至大朝街浏阳湖畔加害。一时延颈就戮者十一人。尚有日本人甲斐则移交驻汉口日领事讯办。自是张之洞乃大兴党狱，湖北杀人殆无虚日”。同时，在新堤的自立军右军统领沈荃闻变起事，亦被清政府镇压。

自立军8月起事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酝酿的一次大起义。梁启超由檀香山匆匆赶到上海，“居沪十日，以汉口事败，无可补救，乃往新嘉坡晤南海先生（康有为——引者）”。与此同时，参与张园“国会诸首要咸被清吏指名通缉，容闳、严复以是先后出亡英美避之”。“可怜名士多如鲫，何异秋灯扑火蛾！”维新派的志士们被捕的遇害，被通缉的远走他方，这个以“新造自立之国”为目标的自立军起义就这样虎头蛇尾，烟消云散了。他们本来是利用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可是又脱离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爱国反帝的要求，为了所谓“勤王”而一意孤行地把会党中原有的“灭洋”票据加以更改，首先把自己孤立起来，就极易为反动派所侦破；即便不被侦破而得以发动起事，成功的希望也渺茫得很，秦力山的大通起义就是前车之鉴。

二、惠州起义（1900年10月8—22日）

在自立军起义之后两个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惠州起义在广东爆发了。

惠州起义本是孙中山在1897年七八月间与日人宫崎寅藏笔谈的起义计划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具体实践。1900年6月上旬，正值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之际；孙中山认为：“目前北京风云变幻，是一个亟需注意的时机。如果说清政府最终完全丧失实力之时正是我们成事的好机会；那么，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正应特别加以注意。”因此，他在这时抱着“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的“最终目的”而离开日本南下，准备组织惠州起义。南下还有一个原因是此时英国香港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考虑到这个国家即将被瓜分的可能性”，“急切地要保护他们在两广的利益”而授意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怂恿兴中会员、《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主张革命党与粤督李鸿章合作”，“宣告两广自主”。李氏

的字句，都让其完全改变”，“易以自立或救国二字”（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245页）。

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1900年8月28日），见《英国蓝皮书》，第189页。

赵仲愚：《日益斋日记》，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7页。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76—77页。按这次逮捕，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磊斯（Evarard D.H. Fraser）曾“指示巡捕同张之洞的军队合作”（见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95页）。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60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二），《张园之国会》，第69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一），《秦力山事略》，第89页。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4页。

参阅本书上编第四章，第90页。

《离横滨前的谈话》（一九〇〇年六月上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8—189页。

幕僚有粤绅刘学询者闻其事，遂以故旧关系致书孙中山，“谓粤督李鸿章因此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时总理方经营惠州军事，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然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

1900年6月17日，孙中山偕杨衢云、宫崎滔天及平山周等乘法轮“烟狄斯号”抵达香港，李鸿章“派幕僚曾广铨率安澜兵轮来迎，即邀总理及衢云二人过船开会”。孙中山派“宫崎乘兵轮晋省”，与刘学询密谈，“学询述李督意，谓各国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与此同时，孙中山在船中召开会议，布署起义，决议“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义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日本诸同志则留港助杨、陈、李等办事”。孙中山在布署就绪后乘原船去越南西贡。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和香港总督卜力等人都认为，义和团运动“是由暴力行动引起的，因此任何暴力行动，即使它是反对清政权的，都是对西方生命财产的威胁”。卜力之所以授意发起孙中山与李鸿章的合作，其目的就在于阻止革命党人的起义，并将他们的活动纳入自己的范围，以“准备照料英国在长江和西江流域的权益”。自1900年6月26日所谓《东南互保章程》的议定，确定了中外反动派合作镇压人民起义的条款后，卜力这个怂恿孙、李合作、宣告两广自主的设计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到了7月8日，清政府宣布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以后，卜力这个计划就必然告吹了。李鸿章接受清政府任命，于7月18日途径香港。当时他“对广东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猜测在对中国未来的统治者的选择问题上英国的意向如何”？他特别询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当皇帝？”从他同卜力的谈话中使英国殖民部注意到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的。这时正值孙中山、宫崎等亦于17日乘日船“佐渡丸号”抵达香港；但在李与卜力会谈时绝口“不提和孙中山约会的事，反而力劝总督禁止颠覆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并“宣称广东和平的主要危险来自香港”。由于当时港方继续维持对清政府允诺的不许孙中山逗留香港的保证，所以孙中山只好呆在“佐渡丸号”上，于7月20日开往日本。他曾派代理人同卜力联系，“卜力的回答是建议他们不要举行起义”。

实际上，孙中山于7月17日在“佐渡丸号”上已经召开了军事会议，“将惠州发难之事委之郑士良”。7月24日，他领衔与陈少白、杨衢云、谢缙

史扶邻著，丘权政，符政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四），《孙总理庚子运动广东独立始末》，第88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一），《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第77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四），《孙总理庚子运动广东独立始末》，第93页。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81—82页。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之起源》，第181页。

同上书，第175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526页。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之起源》，第178—179页。

同上书，第178页。

泰、郑士良、邓荫南、史坚如、李纪南等共 8 人联名致书港督卜力，请英国帮助“改造中国”，并提出《平治章程六则》。8 月 28 日，孙中山自日本乘轮抵达上海，曾会晤刘学询及英国驻沪领事；9 月 1 日离沪赴日；9 月 28 日又由日抵达台湾基隆。孙中山先生后来回忆说，由于日本“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之革命，以北方已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也，乃饬民政长官后藤与予接洽，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予于一面扩充原有计划，就地加聘军官，盖当时民党尚无新知识之军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发动，并改原定计划，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点，多集党众，以候予来乃进行攻取”。1900 年 10 月 8 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五日），革命党人领导的起义就在惠州三洲田爆发了。起义经过如下：

“惠州归善县属之三洲田，稔山等处，向为会党啸聚之区，郑士良奉命运动起事，即以其地为根据。时有健儿六百人，而洋枪仅三百杆，子弹各三十发，……不敷所用。……郑及黄福……等……设司令部于……马栏头同志罗生之大屋中。……凡近乡樵牧入山寨者，皆拘留之，不许外出，以是谣言大起。……庚子闰八月上旬，粤督德寿据各方警报，乃令水师提督何长清抽调新旧靖勇及虎门防军四千余人，于初十日进驻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率惠州防军填扎淡水镇龙，以塞三洲田之出路。……革命军思坐以待敌之不利，乃于是月十五晚，由统将黄福率敢死士八十人袭清军于沙湾，阵斩四十人，夺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生擒三十余人，皆令剪辮服役。……郑士良适自香港带总理复电以至，乃集众横冈，改变军令，取道东北，以向厦门。……革命军……二十二日（十月十五日）趋镇龙……敌复惊溃，杀伤甚众，是役生擒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及敌兵数十人，杀守备严某，夺洋枪七百余杆，弹五万发，马十二头。……二十四日（十月十七日）自永湖出发，……遇……清军大队，约五六千人……战数时，清军大败，向惠州城淡水白芒花等处四散逃窜。……二十六日（十月十九日）革命军至崩冈墟，见隔河敌军麇至，数约七千人，……次晨……苦战数时，清军大溃，因弹药不继，未便穷追。是日进至黄沙洋。……二十八日（十月二十一日）至三多祝，……是晚宿营于白沙。……总理……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从香港经海丰而达革命军大营，传令郑士良等，谓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请司令自决进止云云。山田后以归途失路，为清兵所害。革命军得总理传令，……以厦门一路既不能行，不如沿海岸退出，……然军中弹药两乏，卒致解体。郑士良、黄福、黄耀廷诸人先后抵香港，旋避地海外，计是役将领阵亡者仅四人。”

当惠州三洲田起义的消息传到广州以后，史坚如等则准备刺杀广东巡抚署两广总督德寿来响应起义。他们在广州抚院后面租了一间住宅，挖地道把装进一只桶里的炸药安放在离德寿卧室 50 至 100 码的地方。10 月 28 日黎明，点燃了导火线，轰然巨响，全城震动。但德寿只从床坠地，没有丧命。次日史坚如被捕，于 11 月 9 日慷慨就义。

从 1900 年 10 月 8 日至 22 日的惠州起义，革命党人在整整半个月的武装斗争中战斗是勇敢的，也不止一次地击败了清军；但结果仍不免于失败。失败的原因何在呢？照孙中山本人在横滨与美国《展望杂志》（The Outlook）通讯员林奇（G. Lynch）的谈话中以为：“惠州起义失败的唯一原因是缺乏弹

同上书、第 181 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五），第 16 页。

《致港督卜力书》，见《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193—194 页。

《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173 页。

药。他表示对此次起义的结果‘丝毫没有灰心丧胆’，说‘只要有足够的武器装备并作好充分准备，就能轻易地打败清朝军队’。又谈到三十年前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进步，充满信心预言：‘日本是需要三十年才能完成的事业，我们顶多不会超过十五年’。”孙中山没有讲为什么会缺乏弹药呢？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破坏和背弃了他们所许诺给他的“援助”。这就说明，他在1897年七八月间与日人宫崎寅藏谈话中所设想的“暗结英、日两国为后劲”的起义计划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虽说他不为起义的失败而“灰心丧胆”是值得赞扬的。

三、时代的考验：《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

义和团运动向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提供了起义的机会，同时也向他们提供了一个时代的考验。这就是如何认识中国在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危机的时代之中怎样才能救亡图存的问题：是他们的自立军起义和惠州起义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呢？还是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这个问题于1901年初由中国留日学生在横滨出版的杂志《开智录》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中加以回答了。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本来都具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主义的传统。但是，在中国面临第三次瓜分危机，义和团反瓜分运动席卷全国之际，维新派认为“勤王”，革命派则认为推翻满清政府才可以救亡图存。双方也都为此而举行了起义。到了这个时候，自立军起义和惠州起义都相继失败，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也由于我们在下面即将谈到的京、津失守而渐进尾声。一些受资产阶级革命派影响的中国留日学生这时已经知道中国的瓜分危机正在缓解，“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或涂红圈绿线于支那地图谓某地为某国势力范围之企图，亦未胆敢如前之猖獗”。那些“狂思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者”，已在“废然变计”的过程中。这些关心祖国命运，深受“民权独立、政体自由”影响的青年学生面临着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不得不探究一下是什么力量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他们斩钉截铁地认为，这是义和团运动而不是什么自立军起义或惠州起义。因此，他们就根本不提这些起义而只提出了一个“义和团有功于中国”的论点。

这篇文章首先揭露了号称所谓“文明”国家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本来面目，

冯自由：《革命逸史》（五），《庚子惠州三洲田革命军实录》，第17—20页。按孙中山在惠州起义中，指望得到日本的援助。台湾日本当局企图在福建沿海，特别是在厦门有所行动而利用孙的起义；结果，孙中山是受骗上当了。一些假装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政客从中破坏，准备运给起义军的械弹全是废铁。10月19日伊藤博文组成日本新内阁，禁止日本军人参加起义军；孙中山本人也在台湾被驱逐出境，于11月10日离基隆，19日抵达横滨。

按史坚如就义前，“没有出卖他在广州的任何朋友，但据清统治当局的原始资料说，他曾提到杨衢云是他加入兴中会的介绍人，并且指派他在广州担任密谋的首领。”（见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之起源》，第219页）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在香港被清政府派人行刺，次日死于医院。1901年8月郑士良亦在香港逝世，据说也是被清政府收买的凶手毒死（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一），《郑士良事略》，第25页）。

林奇：《两个欧化的东方人》，《展望杂志》第67卷第12期（1901年3月23日出版），转引自《孙中山年谱》，第51页。

他们是“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的国家。为什么呢？他们明目张胆地采取强凌弱、众暴寡的方针，利用船坚炮利作为手段去强夺他人土地，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这是“可惊”的。他们在强迫他国赔款割地后还说自己有“不得已之苦衷”；或“今日唱瓜分之害，明日唱保全之议”，这是“可惑”的。有的国家“内政始修，外侮仅镇”；但“见人之横侵强索于他人也、则执干以随人之后”。“设反问已国昔日之景况如何”，则“绝不自量”，这是“令人可憎可恶的”。此文在这样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所谓文明固如是耶”？

在中国面临瓜分危机的时候，为了救亡图存，义和团是起义有理的。“中国人虽至愚不肖，横览列国，纵顾己邦，长江黄河促人激发波涛之声，洋洋盈耳！尺蠖之屈，尚知求伸，岂天之特别降我人种，使长此幽牢密网，如没脑气筋之物，毫不察觉，甘受第二犹太之恶号，印度、埃及之失权哉”？文章批判了那种过分渲染义和团愚昧迷信的观点说：“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而谓二三民贼，托神托鬼，所能使其履险如夷，置生死于不顾哉？”在清政府卖国投降的政策下，对列强“夺我之土，掳我之财，凡外人之要求也则顺手与之”的情况下，在“中国人柔筋脆骨，已为万国所不齿矣，绝东老大之号，第二犹太之名，已凄声盈耳矣，甲午一败、割地求和，俯首帖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携，不敢稍违豪命，人心板板，民气毫无”的境地下，难道中国人民就任人宰割，至死不悟吗？在当时首揭反瓜分之议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戊戌变法的维新派，他们的领袖们在清政府的反动镇压下都不得不亡命海外的条件下，难道中国人民就不能奋起斗争，默然忍受瓜分肢解，亡国灭种的命运吗？不能！不能！因为这本是当时反动透顶的种族主义的谬论。我们具有数千年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华民

按这篇文章是在1901年3月20日出版的《开智录》第6期上发表的。《开智录》是粤籍留日学生郑贯一等在1900年冬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清议报》杂志的“印刷和发行机构”而“创办的一个半月刊”（见史扶邻：《孙中山与革命之起源》，第240页）。康、梁等在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时，于1899年春“在横滨发刊《清议报》，大倡保教清帝光绪之说。”（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一）《横滨清议报》，第63页）1899年12月19日，梁启超离日赴檀香山后，“《清议报》笔政由麦孟华摄理，报中文字则由湘籍学生秦力山、蔡松坡、周宏业诸人分任之。……郑贯一亦驻该报任助理编辑，时《清议报》言论大受康有为直接干涉，稍涉急激之文字俱不许登载。诸记者咸以为苦，而莫敢撻其锋”。郑贯一乃约同学冯自由等“同创《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真理”。“凡有《清议报》销流之地，即莫不有《开智录》，各地华侨以其文字浅显，立论新奇，多欢迎之，尤以南洋群岛为最”。事发后“《清议报》经理冯紫珊遂不许《开智录》在该报印刷，并解除郑编辑之职。《开智录》出世仅半载，以无所凭借，由是告终”（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一），《横滨开智录》，第95—96页）。《清议报》“于庚子年（1900年）冬骤遇火灾”，“停版歇业”（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一），第64页）。《开智录》后亦停版。《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后由《清议报全编》收入时未署名，而“1903年出版的《黄帝魂》这个论文集收入此篇，亦未署名，据章士钊说，《黄帝魂》一书的编者是黄藻，他也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651页）据新近发现的《开智录》原刊本上，本文是有署名的，即“贯公”，即所谓“本会会员郑君贯公”者，当系郑贯一（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3、444、474等页）。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2页。

族，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大无畏精神，在义和团即义勇军的形式下，已经挺身而出，排除万难，自我牺牲，不计成败利钝地站起来，勇敢地走向反帝爱国斗争的第一线了。拳民们“蜂蜂然，轰轰然，视死如归，摇动世界。屠外使，火教堂、毁公署、拆铁道，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虽坚船云集，巨炮雨飞，而犹苦战多日，前仆后兴，直至政府倾，首都破，国主西狩，然亦雅不欲罢”。他们“不管政令，攘臂呼号，一唱百和，揭竿而起”；“一诚所感，声振全球。则平日所鄙我以睡狮病兽者，亦未尝不谓言之太过也！”“今虽败师逐北，溅血横尸；然其勇之一字，未尝不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也”。

法国16世纪的小说家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写道：“没有比老百姓的勇武更可靠、更坚固的城墙了。”《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这篇文章在盛赞义和团的英勇精神以后认为：“时至今日，执成败论人之辈，直指而目之曰‘匪’，蹂躏北部，颠倒政府，启衅邻邦，请盟城下，是贻国家百年之羞也。记者曰：噫，是何言哉！”“义和团之揭竿起也，虽未达其灭洋之目的，而亦开历史之辉光”。义和团对中国是有四功的。第一功是义和团的斗争大大地削弱了满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势力，从而“茁固有民权之萌芽”。第二功是在这次运动中，中国人民通过中外谈判的活动细节，“于是林林总总四万万入始知有国耻”而“望国政之改革矣”。第三功是拳民勇武斗争的精神代表了中国的“民气”，“春雷一振，万物皆苏”，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妄想豆剖瓜分我中国”。第四功是列强在利用掠夺让与权，占领沿海军港，划分势力范围等施加于世界上其他各国的有效的瓜分殖民地的办法在中国遭到义和团的反抗，行不通以后，正处于无所措手的境地。即便他们野心不死，但在目前也还不知道应“立何种之方针，施何种之政策”。

正如马克思对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分析中所指出：“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马克思这段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于由拳民起义所形成的义和团运动的全部过程。1902年4月，景廷宾在义和拳的发源地梨园屯以北不远的直隶广宗县竖起的“扫清灭洋”的大旗，就表明了他们已经开始摆脱了在三年多以前在“扶清灭洋”旗帜下所摆脱不了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这篇文章认为拳民运动茁长了中国人民“固有民权之萌芽”；通过运动，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始知有国耻”而力图“国政之改革”等等，就是从这个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观察问题的。鲁迅先生也指出：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同上书，第58—59页。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59页。按文中所谓“排外”一词，是指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而言的。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9—61页。

拉伯雷著，成钰亭译：《巨人传》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59—62

在横滨《开智录》上刊登的这篇《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对当时在那里活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来说，可谓一新耳目，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因为他们都是反对义和团运动的。维新派在其喉舌《中外日报》上曾说义和团是“乱民”，“乱民必宜剿，必不宜抚，宜急剿必不宜缓”。革命派在他们《致港督卜力书》上也曾说义和团是“酿祸奸民”，“妖言惑众，煽乱危邦”；认为“平匪全交，乃为至理”。把这些话拿来同《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中的论点相比较，真是南辕北辙，有如水火之不相容，枘凿之不相入。如今，居然在他们海外活动中心的地区之一横滨来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应是在他们中间一场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敢于承认现实，改变观点的结果。我们估计维新派的《清议报》之所以“不许《开智录》在该报印刷”，观点不同当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孙中山之所以承认义和团运动使人“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的观点，也很可能是以阅读此文为嚆矢的。这是时代的考验，能否与时俱进这一点，决定了维新派的日趋式微，也决定了革命派的逐步成长。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393 页。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7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 252 页。

《歼厥渠魁说》，《中外日报》（1900 年 6 月 17 日），见《义和团》（四），第 183 页。

《致港督卜力书》（1900 年六七月间），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192 页。

第三节 在清政府叛卖下，京、津鏖战的结局

自1900年6月10日帝国主义列强组织西摩尔联军发动对华的侵略战争以来，拳民和爱国官兵在京、津地区的鏖战和全国反帝怒潮的兴起始终是决定时局发展的主要因素，使中国面临的瓜分危机通过6月20日的联军《大沽宣言》与7月3日的美国《海约翰通牒》而得到了两次缓解。那时，京、津的战斗情况成为全国人民视听的中心，是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战斗能力的考验；只要这里的抗战越持久，全国人民的反帝风暴就越是强烈和更加扩大。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使帝国主义列强数十年来积极经营的在华“基督教殖民制度”处于朝不保夕的情况。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却出现了中外反动派逐步相互勾结的局面。结果，在清政府的叛卖下，天津于1900年7月14日沦陷于敌人之手。一个月后即8月14日，帝国主义侵略军进入了北京，使抗战形势为之一变。

一、天津保卫战（1900年7月9—14日）

我们在前面《天津的激战》中已经可以看出，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战略在于确保交通枢纽的老龙头火车站，破坏中国部队的军火供应。因此，比较重大的战斗都是在火车站和北洋机器局进行的。自东局子即北洋机器局被敌军占领后，位于天津城南门外海光寺的天津制造局（即西局子或北洋军械局）就成为侵略军所要加以破坏的最重要的目标。1900年6月30日，“各西兵欲将离津三英里最紧要之北洋军械局夺取，议定后，当由英、俄、法、意、德五国兵士共三千人同往攻击，战有五点钟之久，始将该局火药栈轰毁。该局为最关紧要之处，华人军火，悉出于中，现除上海、南京、福州三处外，华人已无处可取军火接济矣。是役西兵伤七十名，死十二名，大半系俄人”。

当时，“洋兵麇集紫竹林、老龙头，西沽、北仓等处，连日焚烧机器、制造、武库各局所”，通过销毁武器弹药的供应来从根本上破坏清军的战斗力。清军方面，这时却把重点放在进攻紫竹林的租界区，议定“由马玉昆、聂士成两军，联合张德成、曹福田两团拳民，分路进攻紫竹林，使之应接不暇”。7月5日，清军“三面围攻东局”。6日晚，聂士成率部“驰往跑马厂及八里台扼札”；在马家口驻队之“义和团张德成亦率团民数千”与清军“并力击退洋人，即乘势追下，直抵紫竹林交界，将附近租界一带之洋楼焚烧多处”。7日夜，“聂士成率队往攻小营门，洋人携炮遁去，该军即札该处”。连日以来，义和团同清军还在老龙火车站一带冲击，“兵气甚奋”。在帝国主义侵略军方面，到6月30日已经登陆的八国联军数字如下：

	军官数	士兵数
美国.....	20人.....	329人

冯自由：《革命逸史》（一），《横滨开智录》，第95页。按《开智录》“曾得到孙中山二百元的捐助。”（见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之起源》，第240页）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24页。

佐原笃介等：《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192页。

《四川提督宋庆折》（1900年7月5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6页。

《直隶总督裕禄折》（1900年7月4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30页。

奥国.....12 人.....	127 人
英国.....184 人.....	1700 人
法国.....17 人.....	387 人
德国.....44 人.....	1300 人
意国.....7 人.....	131 人
日本.....119 人.....	3709 人
俄国.....117 人.....	5817 人
共计.....520 人.....	13500 人

“联军总共有五十三门野战炮，三十六挺机关枪”。7月7日，沙俄关东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到达天津，担任了“联军的总指挥”，统一协调他们对天津的侵略战争行动，使那些“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疲惫已极”的侵略军又要张牙舞爪地向中国人民进行反扑了。天津保卫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7月9日敌军攻占西局子（天津制造局）。先是当日凌晨两点四十分，1000日军，500俄军和1000英军分路向天津南郊进攻，包抄那里的义和团与清军。日本骑兵冲向了大量拳民的集中地——纪家庄，与韩以礼率领的义和团发生了激烈战斗。敌军在那里“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整个村庄毁于帝国主义强盗之手，上千名义和团民和百姓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之下”。与此同时，英、俄军则向跑马场、八里台和海光寺的西局子（天津制造局）发起攻击。五点半左右，敌军进攻跑马场，清军约4000人“在彼扼守”，“相持至二点钟之久”，以日本骑兵从纪家庄迂回包围，清军“无从抵拒，纷纷散逃”。聂士成闻讯自小营门率军往援不及，遂与联军激战于八里台，由于弹药不继，伤变甚重，始奋力突围，忍死力战，壮烈牺牲于“八里台地方”。“侵略军随即攻占了西局子，这本是一个“能够有效地炮轰租界的阵地”，就这样被敌军摧毁了。“是日各国兵队，放火焚烧制造西局”。敌军于午后撤回租界。

7月11日清晨三点，中国军民又一次大举进攻老龙头火车站。“他们乘黑夜前进，终于到达车站，进入一些车厢内，于是在那儿发生了肉搏战。印度兵从两侧向车厢扫射，要把中国人从车厢中清除掉。在攻击正在进行的时候，中国人向车站打炮，炮弹如雨，异常猛烈”。拳民“虽不懂使用武器”，但“作战英勇是不能否认的。他们装上刺刀，几次三番从车皮上冲杀出来劈刺敌人”。他们虽在受“重创后被击退，但联军损失也很重大，伤亡人数近150人”。到上午六点多钟，战斗结束，中国人“被打死500人，联军也付出150条生命”。

同上书，第275—276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一卷，第165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一卷，第165页。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198页。

佛甫爱·加来、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299页。

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义和团运动史》，第320页。

北京、天津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佐原笃介等：《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150—151页。

《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第152、155页。

7月12日，联军指挥官会议决定于13日黎明分东南两路进攻天津城：东路以2600多名俄军为主，加上两个德国海军陆战连和一个法国山炮连，共约3000人在阿列克谢耶夫的指挥下在12日晚上九点钟和十一点钟乘夜出发，在黎明前偷渡芦台运河，然后从两岸前去抢夺铁路前的中国阵地，进攻天津城东北角、三义河口黑炮台一带，切断河东清军及义和团同天津城内的联系。南路则由福岛将军（General Fukushima）率日军2400人，利斯坎上校（Colonel Liscum）率美军1100人，多沃德将军（General Dorward）率英军800人，贝勒高上校（Colonel de Pélacot）率法军800人，以及奥军130人共约5000人从海光寺直扑天津城南门。

东路俄军趁驻守芦台运河一带“中国村庄和中国前沿炮兵”（马玉昆部）熟睡之际，偷渡了运河。13日黎明，他们炮击清军阵地。七时左右，法军炮击城东北壕墙外的火药库，引起爆炸，“二十万普特的炸药飞向空中”。慌乱中敌人夺取了清军的速射炮和攻城巨炮，并把“炮口对准了中国人”。八时三十分，俄军“全部到达铁路堤上”，并向水师营炮台进攻。13日中午十二时，清军纷纷向北郊败退，敌人乘胜进抵天津东北城下。14日，“复与在城东营之华兵交战，防守极严，抵御亦甚力；后得与入城之炮队开炮向击，并有日军两中队，夺据黑炮台”。

南路敌军以日军为中路、法军为右路、美英军为左路，于7月13日凌晨三时出租界南土墙向天津城南门进攻。他们的炮兵也在日出之时开炮轰击天津城区。由于义和团和南门外居民事先已开挖河堤，把那里的水塘、沼泽地带变成了一片汪洋，进攻联军遂被阻于海光寺附近。此时，驻守南门城上的清军已被众绅稟请撤去，“众谓城上不用炮击洋人，洋人必不用炮击城内”。

南门内从此无兵防守，只剩下义和团和数十名打雁猎户在那里坚持战斗。他们利用城墙、壕沟和各种隐蔽物去阻击敌人，把前来进攻的联军打得晕头转向。日军“已约有三百个伤亡”，美军碰上了隐蔽在废墟里向他们射击的两门中国炮，到傍晚“伤亡数已达一百二十人。美国兵爬进水深齐颈的污泥水沟里”。“司令官利斯坎上校从一个被打死的旗手手里拿过倒落的军旗时被子弹重创，不久就死去了”。天黑时美军后撤。到夜里，联军利用夜色的掩护继续前进。日军终于“偷偷地走到城边”，于14日“凌晨三时二十分”用炸药炸开了城墙，攻入天津城。

在天津保卫战中，中国方面参加战斗的约有拳民“一万人”，并有“聂军常备兵二十五大队，步兵十大队，马兵三联队，均归马军门节制，马军门并带有防守天津之精兵一大队，与其本部之兵队，统计共有一万四五百人”。

进攻天津的东、南两路敌军“共计九千九百名”，其中“东路军由俄、法、德军组成，有四千七百七十名步兵；南路军由日、美、法、英和奥军组成，有五千一百三十名步兵”。侵略军遭到了义和团和爱国官兵的抵抗，在中国

汤姆森：《中国与列强，记一九〇〇年暴动》，第57—58页。

《京津蒙难记——八国联军侵华纪实》，第152、155页。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223、232、233、236等页。

佛甫爱·加米、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302页。

作者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55页。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238—239页。

按天津南门城墙因年久失修，多处塌陷，联军进攻前数日虽募工修补，只不过“用麻袋装土，堵塞缺处”

军民的浴血奋战中他们虽占据了天津城，但损失不小，总计“联军共伤亡八百八十二名，其中军官三十八名”。

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为华北军事重镇，又是义和团久经战斗，屡创敌人的地区。它理应在义和团运动中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强大堡垒，为什么却在一个多月的鏖战中终于沦陷了呢？天津沦陷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清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的确立。这个政策是利用拳民的血战所取得的瓜分危机的缓解来作为基础的。随着瓜分危机的缓解，帝国主义列强在要求慈禧太后归政的问题上也有所松动。对此，她是心领神会的，于是赶快利用时机，心狠手辣地以镇压拳民来作为她媚外求和的资本。她之所以派在中日甲午战斗中不战而逃的败军之将宋庆去天津帮办北洋军务，与其说是去加强津郡军民的抗战，毋宁说是去破坏它。宋庆在7月10日到达天津以前在京陛见时就“极陈衅端不可轻开，且言中东之役，仅与日本开衅，尚不能支，何况今拒八国”？在去津途中又上奏称“奴才耄昧，年老多病”，“惟有以剿为防”，暴露了他之去津是“剿”拳民的。7月8日，慈禧又下令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0日消息传到天津，使得卖国的官绅买办都“奔走相告”，“有太平之望矣”。7月9日，即聂士成牺牲的当天夜晚，马玉昆军已开始大规模屠杀拳民。当时“华兵在后，义和团在前，合攻租界，洋兵开排枪御之，天明而止，计轰毙义和团二千余名，华兵伤者寥寥。事后探访，知官兵……责令（义和团）充先锋当前敌，否则杀死，……有退后者即用枪击死。故是夕团‘匪’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在天津保卫战的关键时刻，7月13日，“宋军遇团即杀”，“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市中无复有红首红腰者，风声远播，近津各村镇，亦皆偃旗息鼓；惟城内各团尚……出战，然亦无几矣”。当天国贼宋庆“下令军中，痛杀”拳民，一时河东老龙头火车站曹福田等所部拳民“被杀死者数百人。武卫军在西营门外截杀”拳民亦“四五十人”。我们知道，这时正当联军进攻天津，分东、南两路大举袭击的时刻，宋庆理应同拳民合作，共同抗敌，但结果却是去“剿”杀拳民，为敌军进犯天津开辟道路，丧心病狂，倒行逆施，一至于此，真堪痛恨！谁见到了这幕情景和这批汉奸卖国贼的所作所为，即使对他们口诛笔伐，也是不足以缓解胸中的义愤于万一的。尽管如此，义和团和爱国官兵仍然坚持了抗敌斗争，重创了联军，并且正是在宋庆军没有出现的南门城区，战斗最激烈，敌

（《义和团》（二），第28页），很不坚固。时有汉奸教民郑殿芳，将天津虚实情况出卖给了日本人：“津城遂陷”（《义和团》（二），第422页）。

佛甫爱·加米、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303页。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239页。按一说联军“伤亡之人数，内计日军四百零二人，法军一百十八人，俄军一百八十人，美军一百五十人，英军五十人，共计九百人”（见《义和团》（三），第303页）。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239页。按一说联军“伤亡之人数，内计日军四百零二人，法军一百十八人，俄军一百八十人，美军一百五十人，英军五十人，共计九百人”（见《义和团》（三），第303页）。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35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6页。

作者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55、156页。

作者佚名：《遇难日记》，见《义和团》（二），第171页。

人伤亡最惨重。由此可见，宋庆的“以剿为防”，实际上是引狼入室。而天津城的失守也不是在义和团的战斗下失守的，它只是说明了“官败民不败”的真理。诗人莎士比亚在他的历史剧《约翰王》中曾经藉庶子腓力普之口论述一个民族战争时说道：只要一个民族“对它自己尽忠，天大的灾祸都不能震撼我们的心胸”。“尽管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向我们三面进攻，我们也可以击退他们”。除非这个民族“先用自己的手把自己伤害”；否则，它是“永远不会屈服在一个征服者的骄傲的足前”的。

二、北京的沦陷（1900年8月14日）

天津是在1900年7月14日失守的。虽说裕禄、宋庆、马玉昆等人早在13日就已率领清军逃之夭夭，奔往北仓和杨村，但敌人根据中国军民在天津激战中的英勇和拳民抵抗西摩尔联军的显著战绩，没有对裕禄等人实行追击。他们根据上述情况，不敢立即派兵进犯北京，救援使馆，并且还对今后的军事行动作出了如下三点估计：

第一是必须增加侵略军的数量。“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所造成的普遍信仰——即只要有近代军队一万人，就能随意驰骋于整个帝国的论点——如今是已经完全放弃了。军事专家们目前的估计是，仅仅保持从大沽到天津的作战根据地就需要两万人；而要进军北京，则需军队五万人至十万人左右”。“事实上，西摩尔退回之后，联军官方估计推进到北京和维护交通线，所需的武装部队得从二万五千人增加到四万至十万人”。

第二是义和团运动可能发展成为游击战争。当时在天津的法军统帅“佛莱将军（General H. Frey）认识到义和团叛乱如果发展成为游击战争所牵涉的危险”。“对联军来说，幸运的是满清政府并没有如中国人自一九三一年起所作的那样，大规模地发展游击战的战术和政策。义和团的狂热和排外主义（应读作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引者），尽可以为游击战争中的艰苦危险生活提供必要的推动力量。如果这次战争恶化为游击战，联军可能会发现自己已经被拖入一场漫长而消耗巨大的战争之中。即使是现代的军队，以他们的炽烈火力、空军的支持和机械化的速度，也不易于找到一条解决游击战争问题的答案”。法国侵略军曾经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越南北部被刘永福领导的中国黑旗军所开展的游击战争打得晕头转向，损兵折将；所以佛莱将军认识到这一点是有前车之鉴的。

第三是清军爱国官兵的战斗力和勇气也不可忽视。“中国人在大沽，特别是天津的炮兵是杰出的。他们射击准确，阵地选择恰当，转移做得很好；还击的炮火常常证明比联军技术高超。攻克天津城区时联军大多数的伤亡都是炮火所致。中国的炮手是受外国人训练的，而他们对课程又学得很好。有时，中国军队很会利用地形；他们广泛地准备了阵地工事，地势还选择得好；在战

同上书，第156页。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39页。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义和团》（二），第188页。

朱生豪译：《约翰王》，见《莎士比亚全集》（四），第300页。按原文在这里所指的一个民族是指英格兰人民说的。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52—253页。

斗中，他们表现出他们是掩蔽与隐藏的好手。直到被敌人挫败，都证明他们有顽强抵抗的能力”。可见天津的失守，并不是由于爱国的清军官兵没有战斗力，也不是由于义和团作战不英勇，而的的确确是由于宋庆等卖国投降、不战而逃、屠杀拳民所造成的恶果。

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军在天津失守后继续增加。到7月18日，联军麇集天津者已达“三万四千三百人”。此后还陆续有所增加，并由大沽开赴天津。8月3日，联军统帅开会，决定于次日“以一万八千三百人大炮七十尊”，“进兵至北仓及杨村”。其中日军9000人，大炮24尊，以山口素臣将军（General Yamaguchi）为统帅；俄军3500人，大炮16尊，以林涅维奇将军（General Lin-ievitch）为统帅；英军2500人，大炮12尊，以盖斯利将军（General Gaselee）为统帅；美军2000人，大炮6尊，以沙飞将军（General Chaffee）为统帅；法军1000人，大炮12尊，以佛莱将军为统帅；意大利军和奥地利军共100人；至于来华德军此时尚在途中，故仅派出200人参加。8月4日夜，联军以英、美、日军为左翼，沿运河右岸（西岸）前进；以俄、法等军为右翼，沿运河左岸（东岸）前进。

当时，清政府在京、津间的兵力不下10万，应该说是能够抵抗这支不到2万人的帝国主义侵略军的。但是从8月4日到8月14日北京沦陷这10天中的战况来说，除了8月5日的北仓之战，在拳民的参加下尚给敌人以创伤外，联军实际上是在没有碰到什么严重抵御的情况下前进的。这是因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这时已经确立。8月7日谕令“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敌人在进军，清政府要“停战”，前线战士如何是好呢？北仓之战以后，联军于8月6日陷杨村，宋庆、马玉昆逃通州，裕禄逃至南蔡村自杀。8日南蔡村失守。9日联军占河西务，10日占马头，11日占张家湾，12日占通州，13日兵临北京城下。其间虽有抵抗派将领李秉衡于8月9日前往河西务接战，但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河西务未立营垒即被冲破，各军纷纷逃溃，势不可止”。李秉衡于

鲍威尔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二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8页。

鲍威尔：《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二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71页。参阅佛莱：《法国人及其盟友在北直隶：一九一〇年的中国战役》，1904年法文版，第119—120页。

鲍威尔：《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二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70页。

佛甫爱·加米、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304页。按这34400人中，有俄军10000人（步兵八大队，骑兵四中队，炮兵七中队），日军9000人（步兵七大队，骑兵三中队，炮兵四中队），英军6000人（步兵六大队，骑兵四中队，炮兵三中队），法军2600人（步兵三大队，炮兵三中队），美军2500人（步兵五大队，炮兵一中队），德军4000人，奥军及意军各150人。

佛甫爱·加米、施米侬：《庚子中外战纪》，见《义和团》（三），第304页。

按天津失守后，“马玉昆部十五营，聂士成余部四营，吕本元部五营，何永威部五营，安卫军二营共约一万五千人退至北仓，宋庆部十三营退至杨村。芦台有武卫前军冯义和部十七营，胡殿甲部五营；……此外，部分勤王之师也陆续到达；杨柳青有记名总兵蒋尚钧部豫军五营，北京附近有湖北提督张春发部武卫先锋左翼十营，江西按察使陈泽霖部武卫先锋右翼十营，总兵夏辛酉部嵩武军六营，总兵万本华部晋威军四营，陕西布政使升允部陕军八营，甘肃布政使岑青煊部甘军六营，北京城内有驻军六七万人。总计京津间兵力不下十万”（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第2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页）。

按在北仓之战中，联军中以日军伤亡为最，“死亡军官一名，士兵四十一名，失踪八名，受伤军官十二

10日退至张家湾，11日吞金自杀。他总结当时的战斗情况说：

“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以致臣军采买无物，人马饥困。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所未见。兵将如此，岂旦夕之故哉。”

这正是再现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兵败如山倒的情况，它是慈禧太后、宋庆等人“以剿为防”的卖国投降政策的恶果。这种情况证明：没有义和团的参战，帝国主义侵略军真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北京是在8月14日被联军攻陷的，我们现在需要回顾一下沦陷前北京的情况。如所周知，清政府在6月20日下令围攻使馆，曾经引起了一贯作威作福的列强驻京公使们的一度惊惶失措。其实，慈禧太后早作了部署，她于6月22日下令以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民，并以英年和载澜会同办理，来控制拳民的行动，并在围攻使馆中，以“董福祥军其西，武卫中军军其东”，“四面扎住，不许义团帮打”。特别是荣禄所统的武卫中军，到处“搜掠”，“白昼抢劫，遇义和团亦用枪打，而义和团东城遂少”。到6月28日，又在“北御河桥悬挂白旗，旁有告示一张……云：‘奉旨停战，保护使馆’各等语”。

先是，刘坤一于23日电请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声明中朝绝无助拳拒洋之意”。25日李鸿章电请“保住使馆”同日军机处电谕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称“现在兵民交愤，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26日又电谕他们说：义和团在“京城蔓延已偏，其众不下十数万”。“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27日清政府收到了刘坤一、张之洞等对21日的《宣战诏书》的反对意见，其中说中国“可以抗拒各国，臣等决不敢作此矜夸之语，以欺君父而误国家，”“在京各国使臣，亦宜设法挽留”，等等。对于这些督抚的意见，慈禧认为是“度势量力”，“诚老成谋国之道”。所以围攻使馆，实际上是在保护使馆前提下的围攻。难怪身历其境的赫德要说：“很可能有人为了给我们以部分保护而加以干预：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他们从来没有击中过要害，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会成功的时候便停止了攻击——并且，假定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正彻底下决心攻击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坚持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也坚持不了。因此，有某种保护存在的解释是可信的——有人，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会断送帝国和朝代的一个聪明人，在发布和执行摧毁的命令之间加以干预。”这个在发布摧毁使馆命令和执行这个命令之间加以干预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慈禧太后本人授权荣禄这样干的。

名，士兵二百三十四名”（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352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6页。

同上书，第469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9页。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义和团》（一），第348页。

鹿完天：《庚子北京事变纪略》，见《义和团》（二），第410页。按一说此事出现于6月25日夜间（见扑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困记》，《义和团》（二），第264—265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9、186—187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9、186—187页。

同上书，第195、187页。

在7月14日天津失守以后，清政府和使馆之间开始了“信件往来”的关系。首先向使馆送信的行动是由荣禄开始的。他向他的叔叔（时任四川总督）奎俊说：“姪现仍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尚可作将来转圜地步；否则，长驱直入，势将灭国矣。岂不痛哉！幸各使尚未死。昨好不容易拿住一汉奸，令其送信，以通消息。总算（以）拳民攻击为词，好在各使亦怕到极处，求救不得，得着姪信，感激万分，即请不必开枪炮。现在已阻住不相攻（月之十八日事也）。昨又活捉一鬼，姪赶紧送回，以全和好”。7月20日，总理衙门奉旨送给各国使馆“一些西瓜和其他蔬菜”；26日，又奉旨“送来另一批西瓜和蔬菜，而且还有一些大米和一千磅面粉”。这是清政府公开叛卖义和团爱国运动的标帜。“时兵勇团民皆不服，意颇汹汹”。“团民因大内（宫内——引者）送各外国物件，皆不服，恐与外国和约，将团众制服；并因西直、阜成、德胜三门，准义和团出，不准入，勇扎甚严，各团皆要散坛”。正如天津拳民因宋庆、马玉昆的屠杀而散去，预示了天津的沦陷一样，北京拳民的散坛也就说明它的失守也为期不远了。清政府的叛卖行径，只能引起团民的愤怒和鄙视，也只能使帝国主义列强更加迅猛地在北京进军。那时，对东交民巷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均“以友邦礼敬之，不知是何意见，亦不知有何妙理，令人不解。现在各外部业有怒目横视之意，大祸、大局、大变、大乱、大数、大劫，此六大也。现在中国驻各国出使大臣均照常办事，往返发电，均由山东巡抚袁世凯转来”。

8月13日午夜，俄军向东便门进攻，遭到义和团和爱国官兵的抵抗，“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日军于14日上午八时在朝阳门、东直门外开炮轰城。英军在当天十一时左右进攻广渠门，十四时乘虚入城，并于十五时左右从水门爬进东交民巷使馆区，又分兵占天坛。美军随英军于十七时许进入使馆区。进攻东便门的俄军于14日午后在部分美军配合下从城门洞隙处爬入。日军于14日二十一时四十分占东直门，又北占安定门，二十二时许攻入朝阳门。法军亦于14日午夜入城，于15日前往西什库北堂解围。16日，联军攻占紫禁城。17日，列强侵略军占领了北京全城。在这次战役中，俄军106人受伤，28人被打死；日军120人受伤，30人被打死；“英国人没有交战就进了城”，有“两名印度兵在使馆院子里被打伤”；“美国人也同样不经交战就进了城，在街道上大约有二十人受伤。其他国家都没有参加进攻北京的战役”。500名法国兵“是在进攻之后才到达北京的”。联军既入北京，“各国使馆被围六十日，至是始解。此六十日，非中国兵力之不逮，盖明为攻击，

同上书，第195、187页。

赫德：《北京公使馆：一个民族起义和国际事件》（1900年8月），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39—40页。

《英国蓝皮书》，第99页。

荣禄：《致奎俊》（1900年7月18日），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38—139页。按“月之十八”即7月14日，可见荣禄从天津失守的当天就已经明目张胆地阻止进攻使馆。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英国蓝皮书》，第108、110页。

《石涛山人见闻志》记7月20、21两日事，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91—92页。按义和团准出不准入的上谕虽说是从7月26日开始（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页；杨典诰：《庚子中外战纪》），但在实际上却早已这样作了。

《石涛山人见闻志》。见同上书，第92页。

暗则保护焉”。“一致的看法是，驻扎京师的军队有力量攻下使馆这一角”。可是，荣禄等人“显然在暗中破坏了它。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单位，荣禄的队伍并没有参加过进攻的痕迹。尤其是在占领北京之时，联军还发现了大量的现代化枪炮，没有发给那些参与攻打使馆的正规军或非正规军”，是“有意扣留不发”，完全暴露了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可耻的卖国投降面貌，充分证明了它在6月20日所发布的《宣战诏书》，尽管激昂慷慨，也无非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不过，它这种态度却没有取得主子们的谅解而缓攻北京，因为帝国主义列强认为它不曾担负起它们需要它来镇压中国人民起义的责任，从而阻止了他们瓜分中国的原故。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太后只好在北京沦陷之际仓皇西遁了。据说，她在8月14日曾经五次“召见军机王大臣”，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刚毅、王文韶、赵舒翹三人”，连会也开不起来了。15日黎明，她改装穿“蓝布夏衫”，光绪穿“黑纱长衫”，带着大阿哥溥俊“由神武门出西直门，至颐和园少憩”后出走，17日逃到怀来，30日至大同，9月10日抵太原，10月26日逃到西安。负责北京城守的荣禄则于8月15日狼狈逃窜良乡。他虽“新翻花样胜龙韬”，毕竟是“强兵压境全无术，开府骑猪作鼠逃”了。后被“命为留京办事大臣，已而诏诣西安”。

三、“黄祸”乎？“白祸”乎？——联军在京、津的罪行

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侵略、瓜分和掠夺中国，他们的所谓理论根据，不仅有荒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还有伪造的所谓“黄祸论”（The Yellow Peril）。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的瓜分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这种论调尤为甚嚣尘上。灾祸之兴，明明是来自帝国主义侵略者，却硬要说成是来自中国人民，极尽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能事。德皇威廉第二在1895年曾经让人画了一张所谓的《黄祸图》印送给沙皇尼古拉第二说，“远东事态的发展”要求欧洲列强的“共同行动”来抵抗“野蛮人的侵犯”；在中国“吞并某些领土”和“获得一个港口”的问题上，德、俄要彼此“帮助”。事情已经很明显，凭空捏造出一种“黄祸论”，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谈到过的一样，无非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有意作恶”，蓄意在对中国人民“施加虐害之前”搞的一个“借口”，用来掩饰他们“非法暴行的阴谋诡计”罢了。因此，问

佛甫爱·加米、施米依：《庚子中外战线》，见《义和团》（三），第308页。

扬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331页。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22页。

鲍威尔：《一八九五—一九一二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69页。

参阅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290页。按当时人们大多认为：“他们满洲人，本有一种口号：‘与其把国家送给汉人，不如把国家送给外国人’。因为汉人是奴隶，而外国人是朋友也”（见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5页）。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21页。按当时据说光绪“决计不行”，珍妃则被“太后令太监推入井中”，遂“拉皇上同行”（《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22页）。

敦崇：《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见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5页。

《荣禄传》，见《清史稿》第四一册，第12374页。

题根本不是什么“黄祸”，而显然是“白祸”。傅勒铭（Peter Fleming）在其 1959 年出版的《北京围困记》（The Siege at Peiking）一书中，在论述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和经济侵略的一章加上“白祸”（The White Peril）作为标题，乃是很恰当的。如若不信，就请看联军在京津的野蛮掳掠的暴行是怎样的。

联军在进入京、津以后立即纵火焚烧，屠杀人民，抢劫掠夺，无所不为。他们在京、津所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乃是有目共睹、令人发指的。朴笛南姆威尔在谈到他写作《庚子使馆被围记》一书时说道：

“欧洲联军到北京后抢劫情形，野蛮腐败，一至于此。……各军队…漫无纪律，几于无事不可为者。……今日学者，皆言世界已进于文明，古代战争中野蛮之状，将不复见；今就其详细观之，果文明耶？野蛮耶？掳掠奸淫之事，仍为军队之恒态。……一千九百年之事，……世人明此中之真象者实少，……（许多论著）于其最堪注意者，无一字及之，即联军之劫掠是也。此可骇可耻之事，……此书……始将……此亲历目击之人，本事直书，无所隐讳。今为印出，尚有因不得已之故而删减者；然即所留存，亦足令人阅之而惊骇矣！此亲历目击人之所记述，……均系真实之事，较之臆度及欺瞒者，固自不同；后之作史者，可以参考而改正其错误点。……联军肆行掳掠，其贪欲之重，实为可怖；杀人放火，强奸豪夺，无所不有。……一千九百年北京之夏，在世界史上，必永远留存。”

联军进入北京以后，烧杀掳掠奸淫等一切暴行就立即在全城开始了。虽在特许公开抢劫三日之后，于 8 月 18 日“午后，出示安民”，并“分段暂管”，但这些暴行却愈演愈烈，几个月来，“劫掠未尝少止”，“仍可以公然为之”；“其所出之示谕，乃掩耳盗铃之举”。“此次洋兵进城，逢人即发枪毙之，即是屠城命意”。“生者逃亡，死者纵横”；“昔为烦闹市场，今则路不见人”。联军“大肆抢劫，抢毕则纵火焚之，并以枪乱放”，“尸首堆积如山”；他们之中不少人还到处奸淫，“兵丁凌辱妇女”，“堕落于禽兽之列”。“自洋兵入城，不独新到之兵，各处抢掠，即各使馆旧人，除公使外，所有洋官以次一切人等，无不乘机出掠，大满其欲”。实际上，公使也是掠夺者，并“因而发财”，他们“心极贪鄙，而又欲掩其迹，自己不为，

吕浦，张振鹏等：《“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13、114 页。

韦尔斯：《世界史纲》，第 957—958 页。

傅勒铭：《北京围困记》，第 35 页。

《义和团》（二），第 199—201 页。按引文中“（许多论著）”四字系引者为补足原意所加，着重点亦引者所加。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24 页。按自 8 月 23 日各国分段占领北京情况是：“西城宣武门外，自西珠市口起，迄彰仪门（今广安门）止，大街以北归德国管理，大街以南仍由美国管；并自午门起，至东单西单牌楼止，东四牌楼以南，东安门内外，交俄国、义国（即意大利）管理；西四牌楼以南，西安门内外，交法国、比、奥等国管理；东城崇文门外，东珠市口起，迄广渠门止，大街以北归德国管理，大街以南仍由英国管辖；而德国所辖地面较各国为宽焉”。“内九门北城地方由日本管辖”（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24、25—26 页）。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 362、379 页。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27、31 页。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27、31 页。

使其夫人为之，其不堪至此！”一个英国官员在1900年10月写回家的信中说：英国公使“窦纳乐夫人同留在北京的一小队士兵（在直隶征伐之际）出去了，非常认真地专心致力于抢劫财物”。“予知各公使中，有数人已极丰富”，变成了暴发户。他们把抢劫财物之举，美其名曰“无主之财”，这个词在当时“已成伪善者之口头禅，奉为金科玉律矣”。北京城在联军的烧杀掳掠下，直是人间“地狱”，完全成了“一个强盗世界”。

到8月20日至21日，北京沦陷不过一个星期，全城“各街巷大小铺户，货物抢劫一空，房屋尽被拆毁”，“城内城外，十室九空”。“合京城当铺二百余家，钱铺三百余家”，俱被“抢劫无遗。紫禁城内各宫殿，尽是洋兵分国占据。三海、万寿山、颐和园等处，皆有各国洋兵驻扎。各宫陈设，盗抢一空。各处禁地，车马驰骋，任意焚掠”，致使“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最可惜者，翰林院所储《永乐大典》，百世珍之，亦毁弃流散”。此书经第二次鸦片战争渐有遗失。在此次劫掠中，“据鹿传霖奏折，称《大典》共失去三百零七册”。“其余经史子集等，共四万六千余本”。此外，联军还把“六部九卿各衙门稿案”“悉取出，在长安门内付之一炬”。“满街破纸，皆印文公牒”。总计“内府所珍，私家所藏”的我国文化、艺术方面的珍品，有的遭破坏，有的被盗走，“所失已数十万万不止矣”。

在劫掠金银方面，联军首先是抢劫钱铺和当铺，然后抢劫住户，“挨户查看”，“入门便问，有银元与表否”，“如此人家无不被搜索一空”。搜索一空之后，“则破屋掘地，以寻埋藏之银”。其中以日本侵略军所得最多，因为他们在8月中下旬即“将户部所存之银一取而空，其数在百万镑以上，彼矮小之人，最为灵巧，不过取其多者而已”。此事传出后，朴迪南姆威尔得报户部尚有“秘密窖银之所”，因当时“管理户部之权，全在俄人掌握”，“遂将此情通告俄统领阿惹君”，重新在8月31日又去发掘户部所存金银。其经过情形如下：

“阿惹君乃一狡猾之老狐。初闻预言，深谢余之报告，言将派一二队兵掘地二十尺深以寻之。……彼等估计此财宝之数，当有千万佛朗克。……及到户部……有俄兵二队，在此驻守。……制钱堆积如山，其散置于诸处者，合计必有百万或千万之多，……日本人所遗留未取者，仅此物而已。阿惹君召守卫之长官至，告以来此之故，因闻部中有窖藏之金，为日本人所未寻得者，命彼等帮助取之。……于是由报信之管库人领路，……定议推开一边之墙，……入一大洞内，……后见一个喊叫而上，一见予等，即连咒带骂，

朴迪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357、359、391页。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26—27页。

朴迪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360、372页。

转引自傅勒铭：《北京围困记》，第243页。

朴迪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363、371、373页。按“无主之财”（treasuretrove）这个词，系指埋藏于地下之金银财宝，不知其原主为何人者。

《庚子记事》，第36页。

柴萼：《庚辛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16—317页。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32页。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见《义和团》（二），第469页。

柴萼：《庚辛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16页。

其肩上负一大块银锭，走至予等站立之处，掷于地上，作一巨响，言其中所剩者，只此而已。……阿惹君闻而大怒曰，这不能够，必有错误；人说金银在那里，必在那里。……观其神色，似极大之财宝，自其手中失落者。……盖彼灵巧之日本人，业已先来，将窖金尽数取出。……管库者又言…尚有真金之法码，……当为彼日本人所不能知，应尚存在，……其重量与一成人相等，……不料又为彼日本人所给也。……予等今为彼小日本人所愚弄。彼等不但寻得窖金，并知此秘密之门户，已毫不费力，将窖中之物，尽数取去，……而留此一大锭之银，以为后来者之礼物。……彼老统领初欲靠予等之报告，以发大财者；今则怒置予等，谓视彼为一愚人而播弄之。”

这一幕俄军统领发掘户部窖银，兴师动众的情境，大体上也正是日军所为之继续。虽说所得有差，俄人所得只是一大锭之银，日人则劫取了百万英镑以上，但贪婪掠夺的丑恶面目却是不差分毫的。这位具有中将军衔的俄军统领林涅维奇将军在户部扑了一个空，却在洗劫皇宫中满载而归，连沙俄的财政大臣维特也无法为他掩饰。维特说：

“许多私人住宅，尤其是皇宫，遭到劫掠。当时传说俄国的军官也参与了劫掠，我们住北京的代表也私下向我证实了这些传闻。我必须说，这真使我们丢脸。有一个中将（即林涅维奇——引者）因为攻克北京而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在返回阿穆尔地区的驻地时，带来了从北京皇宫抢来的十大箱珍宝。不幸的是这位将军的例子曾为其他一些军人所仿效。”

事实上，参与劫掠的不只是俄国军官，法军统帅佛莱将军所掠物件，亦“为数颇多”，“特装寄四十箱回欧”。英国的办法则是把抢掠之物，“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上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掠之事视为非法行动”。德军以来京较晚，8月23日即“哄传”要“兵到屠城”，26日就在“各处挨户掳掠，更甚于别国，由是人心恐慌，吊胆提心”。27日，有人“适遇美、德二国洋兵，用洋枪击毙二十余名，生禽六十余名。夜间十一点钟，正阳门城楼被焚，火势凶猛，合城皆惊”。当此之时，随“时有新兵入城，其中以德兵为最横。天甫黑，彼等即从事于劫掠。自谓其恺撒（德皇称呼）训词中，命彼等如此为之，彼等不过遵奉命令而已”。9月，联军“辎重往天津者，其车上满堆箱笼，皆抢劫之物也。予思劫掠如此之多，北京精华，想已尽净，所余者不过皮与骨而已”。

我们在看到联军在北京的野蛮掳掠的罪行以后，当能想见一个月前即7月14日天津沦陷后的情况了，北京的掳掠不过是他们在天津的暴行的继续和再现罢了。联军“自海口以至北京，沿路抢掠一空，其在天津尤甚。今日之天津，如一块肥肉，肉均刮尽，只余干枯之骨矣。千奇百怪，可惊可惧之残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25页。

朴迪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361、372—373页。按阿惹君即俄军统领林涅维奇将军（General Linievitch），故原书以L代之。

朴迪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373—377页。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83页。按向维特证实传闻的人是“俄国财政部驻北京的代表，后来任驻北京公使的璞科第（D.D. Pokotiloff）非正式地向我证实了这一点”（见《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141页）。

佐原笃介等：《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234页。

王光祈译：《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52页。

《庚子记事》，第37页。

害凌辱，皆公然出现于世。由于津至北京一路之村庄市镇，同遭浩劫，可为悯叹也”。天津失守之日，“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俄人所踞之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杀，继以奸淫”。“河东地方，一望无际，化为平地”；“至西门则死尸山积”。当时，“俄军、英军、美军、日军、法军都同样地进行抢掠。他们谁都完全是第一流的抢掠能手”。“特别是在盐道衙门，日军在该处被焚之前已经掠去了价值数百万墨西哥银元的纹银。不过，人们知道那里还留下大量财富。一个美国卫兵站在废墟上授命发掘宝藏。约有40个中国俘虏干活，并在四天以内掘出了价值好几百万元的纹银”。“仅仅一个早上在废墟中的发掘的结果”就得到了“一座堆积如山的纯银，大约三十英尺长，三十英尺宽，四英尺高。每块银子重约四又四分之一磅到七磅，并且全都是净银。有些银块被火烧黑，但其价值不减分毫。美军骡马队每天都把这些银子从这里运到外国租界中第九步兵团的总部存放。英军与日军也从别的官邸中运走了同等数量的银子”。俄军、法军也不落后，他们“除去抢劫了许多东西之外，还都抢去了好几百吨银子”。此外，在天津还有一个不同于北京的抢占所谓租界的暴行。沙俄在河东占领大片地方，强行成立俄租界；已有租界的英、法、日、德则要求扩充租界，意、奥、比等国本在天津没有租界，也纷纷要求建立。尽管7月中旬在天津成立了由英、俄、日三国军官组成的“天津都统衙门”，但它本身是一个侵略机构，只能使掳掠罪行愈演愈烈。

从联军在京、津的野蛮掳掠罪行来看，正如马克思所说：“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侵略军既具有“流氓之技艺，而又加以文明之装饰”，所以他们干起坏事来，比野蛮人更加野蛮，更加无耻，更加不顾死活。“这种对公私财物、文化艺术的破坏行为（Vandalism）无疑是应该谴责的”。

朴迪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388页。按“恺撒训词”即指1900年7月27日威廉第二在不来梅对华德国侵略军所发表的著名的《匈奴演说》，他叫嚷道：“你们不仅要为公使的死亡，还要为德国人和欧洲人报仇雪恨。你们一遇到敌人，就把它击败，不要宽恕，不要捉俘虏。谁要落入你们手中，谁就死亡。像一千年前匈奴人在阿提拉领导下声威远播，至今仍到处流传的那样，德国人的声威在中国也要这样，使中国人对德国人只敢侧目而视”（《世界史动态与资料》1977年第9期，原载德国不来梅《威塞尔报》）。

同上书，第342页。

朴迪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342页。

作者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二），第157页。

作者佚名：《遇难日记》见《义和团》（二），第172—173页。

兰多：《中国与联军》第1卷，第191页。

同上书，第205页。

《义和团运动时期一个印度士兵的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第173页。按这个印度士兵的名字是辛格。

参阅杨契维茨基：《八国联军目击记》，第248—249页。按“天津都统衙门”由英军鲍尔上校、沙俄沃加克上校、日军青木大佐组成。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4页。

第四节 沙俄趁火打劫侵占东三省（1900年7—10月）E

历史研究表明在长达 500 多年的历史中，所有的沙皇都奉行一种扩张俄国土地的侵略政策。就同中国相邻的各国来说，沙皇俄国和清帝国的边界是最长的，约计 7000 多公里。在中国近代史上，沙俄一向是以强占我国大量领土来作为它侵略我国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的。1858 年，沙俄曾趁英、法侵华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之际，用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璦琿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作中俄共管。1860 年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约 4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强行划归俄国。除此以外，它还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 1864 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占了我国西北部约 44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如今，在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沙俄认为它强占中国领土的时机又来到了。财政大臣维特说，当拳民事变的消息传到俄京圣彼得堡的那天，“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A.N.Kuropatkin）到财政部办公室来见我。他喜形于色”。他说：“我很高兴。这将给我们一个占据满洲的借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这帮俄国侵略者显然是高兴得太早了。义和团运动诚然是为他们的侵占东北提供了借口，但是也为他们自掘坟墓的日俄战争创造了前提；因为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中国瓜分危机缓解的形势已经大大地不同于 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局面了。

沙俄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以后，立即加紧进行了侵占我国东北的战争准备，到 7 月 14 日天津失守前后，就发动了侵略战争。先是，在 6 月 17 日联军攻占大沽口以后，6 月 23 日沙皇尼古拉第二就宣布在阿穆尔军管区进行动员，全区进入战争状态，接着又在毗邻我国北部和西北的西伯利亚、土耳其斯坦等军管区以及欧洲部分的一些地区进行战争动员。7 月 6 日，沙皇宣布自任俄军总司令，以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为参谋总长。不久，他们把所有远东部队和从欧洲调来的部队编成了四个作战军团：即集结于旅大、海参崴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团，作战部队约 34300 余人，集结于伯力的西伯利亚第二军团，作战部队约 36200 余人，集结于赤塔、尼布楚的西伯利亚第三军团，作战部队约 31300 余人，以及集结于海参崴、双城子的登陆军团，作战部队约 33700 余人。“以上共有作战部队约十三万五千余人，火炮三百二十八门。此外，各要塞和军区尚有留守部队四万余人”。当时，在我国方面，清军在东三省“共有防、练军一百一十七营三哨”，“总数可达五万八千余人”；此外，尚有八旗兵“四万四千余名”。比起沙俄侵略军来，我军数量较少，武器又差，但有爱国的义和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展开了英勇的保卫祖国的浴血奋战。

1900 年 7 月 14 日天津沦陷之日，也就是沙俄军分路准备向我国东北发动侵略战争之时。就在 14 日那天，即“六月十八黑龙江城（璦琿——引者）

朴迪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 372 页。

傅勒铭：《北京围困记》，第 242 页。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 83 页。按布哈拉（Bokhara）原为中亚三大汗国之一，19 世纪后半期被沙俄并吞。

开仗，实由郭米萨尔先发难端。在彼业已开枪，在我势难措手”。这样东北的反侵略战争在沙俄的挑衅和进攻下开始了，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黑龙江省的瑷珲及其直属的江东六十四屯。根据 1858 年 5 月中俄《瑷珲城和约》规定：江东六十四屯，即“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这个“瑷珲对岸江左居住旗屯六十四屯（系咸丰四年，俄人占据以前旧有。咸丰八年订约，载定俄人不得侵犯之屯），面积南北一百五十里许，东西八十里许，计旗丁二千一百五十四户。土地膏腴，人民勤农为务，年产诸粮，富甲全省。家舍居舍广大，宅院整洁，蓄粮盈仓，豢牲皆群”，早已成为沙俄垂涎已久的肥沃之区。在江东六十四屯的对岸是瑷珲城，北岸精奇里河（结雅河）入黑龙江处是早已被俄人占据的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与海兰泡隔江相望的是黑河（今爱辉县）。1900 年 7 月 17 日到 21 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廿一日至廿五日）的 5 天中，沙俄驻海兰泡的军事当局格里布斯基中将在这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的惨案。

7 月 15 日，俄军企图从海兰泡偷渡至黑河，被清军击退。16 日，俄军大肆搜捕拥有 3 万多人口的海兰泡，其中的中国侨民占有半数以上。17 日上午，俄军把抓到的 3000 多中国居民赶到黑龙江边，“各持刀斧，东砍西劈，断尸粉骨，音震酸鼻。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皆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岸。有随浪力拥过者八十余名，赤身露体，昏迷不能作语”。此后同样的屠杀，还在那里进行了三次，一共四批中国侨民都被斩尽杀绝。“他们的鲜血染红了黑龙江畔。不分男女老幼惨遭屠戮的尸体，像木筏一样漂浮在黑龙江的浊流之中。滚滚的黑龙江吞噬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人类的最大悲剧。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行！”“几千个和平居民被消灭了。要知道，一些人说是三千人，而另外一些人告诉我，差不多有一万人被消灭了”。与此同时，拥有中国居民“人数为三万五千人”的江东六十四屯也惨遭俄军马队的焚掠屠杀，残酷情况比起海兰泡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黄童离家长号，白叟恋产叫哭，扶老携幼，逃奔瑷珲对过。长江阻梗，绕越不能，露守江滩，群号惨人”。“各屯旗户悉被俄人驱逐入江，残其生命七千余人，据其财产三百余万”。从 7 月 15 日至 21 日期间，“外结雅（即江东六十四屯——引者）所有的满洲人的屯子已全部被消灭掉”。沙俄匪帮掳掠了“许多收割机、捆草机、耕犁和打谷机。满洲人的居民已经

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二册，第 280 页。

同上书，第 281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898 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85—86 页。

徐希谦：《瑷珲县志》卷八《武事志》，见姚秀芝、卫香鹏辑：《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资料》，载《近代史资料》1981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徐希谦：《瑷珲县志》卷八《武事志》，见姚秀芝、卫香鹏辑：《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资料》，载《近代史资料》1981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石光真清：《谍报记》，见同上书，第 162 页。

维列沙金：《满洲旅行记》，见同上书，第 129 页。

基尔赫涅尔：《围困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瑷珲》，见同上书，第 126 页。

一个也没有了”。从7月17日起，“阿穆尔河（黑龙江——引者）上浮游着大量满洲人的溺尸。这些尸体壅塞在轮船和木排周围，冲积在岸边的浅滩上”。他们是“中国的全体和平居民。这些中国人在这个地区的半野蛮的俄国人当中是唯一的文明成分，他们是当地仅有的农民、园丁和工匠，没有他们，几乎就不能生存”。可是沙俄匪帮却还把这桩臭名昭著的大屠杀惨案当作“向西方显示沙皇能够力挽黄祸狂澜”的证据呢！真是无耻之尤！灾难来自何方，到底是什么祸害，三尺童子都清清楚楚，还能拿去骗谁呢？列宁指出：“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这就是沙俄匪徒滔天罪行的真实写照。

8月1日，北路俄军夜渡黑龙江，占领黑河；3日进攻黑龙江城即瑗瑋，当地守军顽强抵御，城内的义和团及居民奋起参战，激战一天后瑗瑋于5日沦陷。8月16日，俄军过兴安岭经墨尔根（今嫩江）、布特哈（今讷河）于28日占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黑龙江将军寿山兵败殉国。俄军入城，把30余万两饷银及军械、财物抢劫一空。西北路俄军则由赤塔进攻呼伦贝尔（今海拉尔）、牙克石（今喜桂图旗）、博克图，与占据齐齐哈尔的俄军会合后，南下侵占吉林伯都讷（今扶余）等地。东北路俄军则自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出发，早已于7月30日攻占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8月17日进占阿勒楚喀（今黑龙江省阿城），随即进占哈尔滨、呼兰等地。东南路俄军自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亦于7月30日攻占瑋春。东路俄军自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出发向西进攻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宁古塔守军与义和团婴城固守，“相持四十余日”后于8月29日被俄军占领。吉林将军长顺派人乞降，令各路防军“遇俄兵时切勿开枪，免致重开衅端”。9月22日，俄军进占吉林城，把“银圆、银条、银坯计重不下百数十万两，抢散大半”，“枪炮及子母悉行毁弃”。南路俄军则自旅顺出发，于8月4日攻占营口，9月28日攻占辽阳，10月1日进入奉天府（今沈阳市）。至是，沙俄侵略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遂将东三省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全部占领。此后，沙俄把铁岭以北地区划归伯力总督格罗戴柯夫（Grodekov）统治，以南归旅大租借地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统治，对东三省实行军事占领。

东三省为什么失守得这样快呢？主要原因是由于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导致的。在沙俄蓄意要对我国东北实行军事占领、瓜分这片领土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只有坚持抵抗，妥协投降是与虎谋皮，丝毫也解决不了问题的。奉行清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吉林将军长顺“固曾未发一兵，未接一仗，而瑋

徐希谦《瑗瑋县志》卷八《武事志》，见同上书，第109页。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五，见同上书，第120页。

基尔赫涅尔：《围困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占领瑗瑋》，见同上书，第126—127页。

亚历山大·雨拉：《俄中帝国》，见姚秀芝、卫香鹏辑：《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资料》，载《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1期，第131页。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5页。按沙俄匪徒的罪行还不限于海兰泡及江东六十四屯，“余如尼布楚、司特例津、伯力、海参崴等处，枪毙、水淹、火焚不下二十余万”《盛京副都统晋昌折》（1900年9月23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41页，这真是中国人民的一场浩劫。

《吉林将军长顺等折》，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3—814页。接三姓，宁古塔与瑋春在当时称为“吉林三边”。

(春)、宁(古塔)、(三)姓三城并阿勒楚哈亦相继沦陷。可见俄情狡狠，不因我之敢战而不争，亦不因我不战而见好。至此犹欲按兵不动，谓可取谅于俄，图安旦夕，是何异放虎自卫，求其不我祸也，势必不能”。主张抵抗的盛京副都统晋昌继续说道：“俄欲得志于东三省，已非一日。比来创修铁路，是入据我之心腹而制其手足，一旦修通，不伤一兵，不损一矢，而三省一时为敌有矣，犹幸及其已修未通之际，发难于拳民。”他还认为，在义和团运动中，“非战之误，实各省不战之误。当奉旨决战时，如果各督抚同时起师，则犯阙之兵，万不至如此猖獗。观津、沽开战以来，以我两三军之力，当十余国之众，彼有更替，我无休息，然且支持数月之久，战之明效已可概见”。他看到帝国主义者的暴行已经引起了民愤，“彼族残暴不仁，所至杀戮焚烧，人人痛恨，实由此激成众怒，使之各深义愤，莫不欲得而甘心”。因此，当时的形势是“时事迫切，何有万全。始终主战，犹有于危路求安之日”。“苟战而失利，犹胜不战而让人也”。这是清政府中作为抵抗派官员的晋昌，根据沙俄侵略东北的情况对清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的批判。他的看法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道理的。比如说抵抗派寿山本来准备在齐齐哈尔挖壕固守，并武装义和团，只因接到清政府于8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列强求和的上谕，才向俄军议和的。但敌人并不遵守议定所说的只驻齐齐哈尔城外，反而炮轰清军，占领该城。寿山本来是主张“三省必须互相联络，不分畛域”，“不得不战”，“不可不战”的，但他却因此而城陷殉国，言之痛心。他在《遗疏》中还提出黑龙江省的“旗地蒙地均应招放民荒”，“变通兴垦”，批评那些说“汉民日多有碍旗人生计，山林日辟有妨牲丁贡貂，以及旗地应设旗官，不宜民官治理”的谬论为“不顾大局之言”；只有“招民”“开荒”，才以抵御“外侮”。这种把抵抗侵略建立在人民群众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的看法是很有见解的。事实上，根据一个沙俄军官的供认，敌人虽然在东北实行了军事占领，但是，中国人民的抗俄武装“红胡子”却始终坚持斗争，使得沙俄匪帮寝食不安，疲于奔命。他们搞的什么所谓“讨伐”，“不但毫无成效，而且还给团队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讨伐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

在东北人民的抗俄武装中，以刘永和领导的忠义军最为著名。刘永和是奉天海龙厅五里堡（今吉林省海龙县境）人，以枪法熟练出众，绰号“刘弹子”或“刘单子”，成为珲春一带所谓“‘马贼’中巨魁”。后来受清军招抚，任珲春垦务营管带。1900年7月俄军侵入东北，7月30日珲春失守后，

《吉林将军长顺等折》，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3—814页。接三姓，宁古塔与珲春在当时称为“吉林三边”。

《吉林将军长顺等折》，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813—814页。按三姓，宁古塔与珲春在当时称为“吉林三边”。

《盛京副都统晋昌折》（1900年9月23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39—641页。

按盛京将军增祺反对晋昌抵抗，并认为东三省系因寿山“与俄开仗”失守；而寿山则因“晋昌屡次函电激之而成”，所以晋昌是“祸首，言之未尝不疾首痛心也”（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11页）。实际上寿山“与俄开仗”系抵抗俄军已经发动的侵略战争；并且，“从战事一开始，（俄国）军部的欲望就不仅是惩罚义和团而且也是想吞并满洲，这是一件公开的秘密”（见《维特伯爵回忆录》，第85页），同晋昌主张抵抗有什么相干呢！

伯都讷副都统嵩昆：《洋事记册》，《寿山折》，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273、274页。

他率部退至桦甸和盘石交界的黑石头，沿途收集义和团余部和清军溃兵，继续抗击俄军。11月底，他率军攻打朝阳镇，击败清军海龙总管依凌阿部；12月，攻克通化县城。1901年1月下旬在海龙，“以刘永和为首的忠义军，以王和达、董老道为首的义和团余部和农民武装，以李贵春、栾鸿钧为首的一支地方团勇及以杨玉麟为首的镇东军实现了联合，正式组成忠义军”；“基本队伍约二万余人，号称四十营”。“他们为了实现‘御俄寇，复国土’的战斗目标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支自发的抗俄力量。1901年夏秋之际，忠义军曾先后三次攻克俄军据点新宾堡，又在山城镇、凤凰城取得胜利。不过，由于成分复杂，组织分散等弱点，忠义军后来在俄军和清朝统治者相互勾结的“剿抚兼施”的政策下被各个击破。刘永和率少数人退入吉林蜂蜜山子一带继续战斗到1903年。

第五节 《英德协定》与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1900年10月16日）

当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全国反帝怒潮兴起，京津沦陷和沙俄侵占我国东北之际，在造成中国瓜分危机中处于显著地位，并占有广大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英、德两国却在幕后进行了长时期的反复磋商，于1900年10月16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在伦敦由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与德国驻英大使哈慈菲尔德（Hatzfeldt-Wildenburg, Count Paul）交换了一项关于中国协定的换文，即所谓的《英德协定》（the Anglo-German agreement）四条，全文如下：

“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和德国帝国政府，由于渴望保持他们的在华利益和他们根据现存条约的权利，关于他们共同的对华政策，同意遵守如下的原则：

一、中国沿江和沿海的各口岸应当无差别地对一切国家国民的贸易及任何其他合法形式的经济活动继续自由开放，这是各国共同的和长远的利益问题；因此，两国政府同意，在他们势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一切中国领土都拥护这个原则。

二、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和德国帝国政府在他们自己方面不得利用目前的混乱状况，为他们自己在中国的版图上获得任何领土利益，并应使他们的政策以维持中华帝国的领土状况不遭削减为目标。

三、如有另一个强国利用中国的混乱状况以图在任何形式下获得这种领土利益，两缔约国保留对于为保护他们自己在华利益而将采取的重大步骤，达成初步的谅解。

四、两国政府将以本协定通知其他有关列强，特别是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和美国，并将邀请他们接受本协定中所载的原则。”他们把本协定通知其他有关列强后，分别于10月22日得到意大利、25日得到奥匈帝国、28日得到沙俄、29日得到美国和日本、31日得到法国的答复，均表同意。

就上述《英德协定》四条来看，它从以下两个方面表明了中国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

首先，就《协定》的内容来看，它已经根本不同于两年多以前，即1898年9月2日签字的所谓《英德协定》，那个《协定》是为了划分两国在华势力范围而准备对中国领土进行瓜分的协定。如今，1900年10月16日的《英德协定》，却把瓜分转化为保全了。它公开声明两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是“维持中华帝国的领土状况不遭削减”，并声明他们自己不得“在中国的版图上获得任何领土利益”。我们如果再把它的内容拿来同6月20日的联军《大沽宣言》和7月3日的美国《海约翰通牒》相比较，那么，它就不只是停留在“断不侵犯地方”的军事原则和“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的政治原则上，而是声明以两国政府不“获得任何领土利益”来保证和贯彻这些原则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声明不容许“另一强国”以任何形式和借口来“获得这种

多勃隆拉沃夫著，刘秀云、吕景昌译校：《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86、142页。按当时东北部分人民都为红胡子“提供人力，而且从来不出卖红胡子”；当他们同沙俄匪帮战斗时，“在百姓的诚心帮助下，总会巧妙地避开俄国人”（见多勃隆拉沃夫：《一个俄国军官的满洲札记》，第72、143页）。

黎光、张璇如：《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第155—156页。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一卷，第263页。参阅《德国外交文件》（二），第232页；《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2—143页。

马克谟：《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九年中外条约和协定汇编》第一卷，第264—266页。

领土利益”。因此，作为标志着中国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的《英德协定》，比起标志第一次缓解的《大沽宣言》和第二次缓解的《海约翰通牒》来，它的内容无疑是更加具体的。

其次，就《英德协定》订立的时间来看，它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和强烈的针对性。这时，天津的保卫战已于7月14日结束，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在8月14日沦陷。按照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蓄意侵略和瓜分中国的进程来看，京、津的失守似乎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瓜分中国的大好时机。事实上，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者不仅这样看，而且也是这样作的。沙俄利用我东北地区拳民运动相对薄弱和中俄接壤的地缘政治方面的优势，悍然不顾联军《大沽宣言》的承诺，背信弃义地出兵侵占我国东三省。沙俄所造成的这种形势如果出现在1897和1898年间，就会引起其他列强的连锁反应，正如德军强占我胶州湾以后出现的那种狼奔豕突的局面，一时俄、英、法、日等国，都纷纷上阵，强占我国海口和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了第二次瓜分危机的严重形势。如今，在1900年夏秋之际，情况和一两年前已经迥然不同了。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瓜分危机缓解的形势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局部地区的局面已经不可能扭转全局的发展形势了。如所周知，京、津的失守情况乃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利用瓜分危机缓解的形势背叛义和团运动的结果，它们抵消不了拳民和爱国官兵在廊坊、在大沽、在天津的战绩和英勇的战斗精神。与此相反，北京虽然沦陷，但联军亦可能被围。赫德供认说：“解围并未使我们的处境改善。”“中国很有可能使各国援军遭到拿破仑在莫斯科的命运。”他还说：“义和团正成群结队来到北京周围，甚至在城内出现，昨天（9月11日——引者）他们准备架走一个法国人！再来一次更大规模的围攻或封锁，也很有可能。”10月3日上海《北华捷报》在转摘德国远东机关报《德文新报》（the Ostasiatische Lloyd）的十二条对华方案中的第六条上，便有“对任何一个外国强国都不得有领土赔偿”的条文。《北华捷报》在转载时还附有评论，认为十二条中有些个别条款是不当的，因为把这些不当的条款强加于中国，“试图把中国宁愿战斗至死而不愿接受的条件强加于她，那是不值得的”。由此可见，京、津的沦陷只是说明了当时“官败民不败”的情况，无损于义和团运动所已经造成了的瓜分危机逐步缓解的全局。这样看来，《英德协定》在10月16日的订立，它的倾向性就十分明显了，即在华拥有势力范围的英、德两国即使在京、津失守以后，也声明他们不谋求“获得任何领土利益”的了。这当然是有助于瓜分形势的缓解的。

我们说《英德协定》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这一点，是就它的第三条来说的。条文中所说的“利用中国的混乱状况以图在任何形式下获得这种领土利益”的“另一个强国”不是无的放矢的，但它究竟是指谁呢？如果我们撇开那种错综复杂、纵横捭阖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外交手段和官方词令不谈，单就这一《协定》在俄军于10月份强占了我国东三省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以后立即订

参阅本书第二章第二节，《英德铁路范围协定》。

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三和第二节四。

赫德：《致金登干》（1900年8月30日），见《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9页。

赫德：《致金登干》（1900年9月12日），见《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11页。

转引自丁黉良：《北京之围，中国对抗全世界》，第158页。

转引自同上书，第189页。

定的当时当地情况来看，它毫无疑问是针对着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者来说的。因此，“必须阻止俄国达到它的目的；为了作到这一点在十月十六日就成立了一个包括四项条款的《英德协定》。”《协定》订立后，10月22日德国驻英使馆一等秘书艾格特斯坦因（Eckardstein）在其《致外部电》中说到，俄国驻英大使斯特尔（Stael）曾对他说：“协定的突然发表确曾给他一个震动，尤其是因为他对于交涉的进行事先毫无所闻。俄大使曾对奥匈代办表示，他本国政府只能逆来顺受”。11月10日伦敦电文说：“伦敦府尹大宴，英首相沙侯宣称，英德合约立后，中国土地当可因此保全”，“无论何国欲设法瓜分其地，吾英当决计阻之，必不使成”。11月21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一封信中谈到俄国驻美大使喀西尼对这一个《协定》“怒不可遏”。

12月21日，俄国驻德大使奥斯登·沙根（Osten-Sacken）也认为《英德协定》是“我们所不愿意有的协议”，“也不是惬意的”。因此，这个《协定》表明：“还在一九〇〇年十月，德国就采取了倒向英国方面的步骤。英德两国协定将其政策注重于维持中华帝国现在的领土边界，‘如有另一个强国利用中国的混乱局面以图在任何形式下获得这种领土利益’，就共同磋商保护两国在华利益应采取的措施。……德国虽然把满洲排除在该协定所适用的领土以外（指比洛在1901年3月15日在德帝国会议上所说的话——引者），但协定本身已标志着英德之间的接近，而且作为接近本身而论，应该产生一定的影响。……俄国代表格尔思（M.N. de Giers）担心地自北京电告：英国公使已通知李鸿章，英德之间似已签订协定来阻碍俄国在满洲的策划。当俄国驻北京的代表提出关于割让满洲条约的最后方案时，中国政府不仅得到所有列强（法国除外），其中包括德国和意大利方面的支持，而且采取强烈的警告和要求，不得割让满洲”。在《英德协定》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列强形成了对华保持“领土完整”和“利益均沾”（equal rights）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下，如果帝国主义列强都不能瓜分中国，个别强国要单独凭借武力占领土地，造成既成事实，也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义和团》（二），第188页。

按当时德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保持行动自由”。1900年7月20日外交大臣比洛在给驻华公使穆默（F.MummVonSchwarzenstein）的训令中说：“我国的国际地位，大部分是建立在对英、美、日这一集团和对待法、俄另一集团的正确关系上。因此，我们就能够有时和这个集团一道走，有时又和另一集团一道走，而不致于使我们陷到敌对集团去，如果我们失掉这种能力，我们将陷入依附某一集团的不幸境遇中。这种观点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也不能置之不顾”。比洛还认为：“瓜分中国或仅划分为利益范围或势力范围，就目前来说都是和我们不利的”（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第138—139页）。

《英德协定》磋商之初，本是在6月26日《东南互保章程》议定后，德国为了防止英国独占长江流域问题来讨论的。后来他们为了“肯定地切断把满洲让给俄人，把扬子流域让给英人的一种俄英谅解，迅速与索尔兹伯里勋爵完成谈判，一般来说，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德国外交文件》（二），第213页）。《英德协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订立的；虽说到1901年3月15日比洛在德帝国议会宣布说该《协定》“不涉及满洲”（《德国外交文件》（二），第284页），以缓和对俄关系；但为时已晚，并且显然是同《协定》第三条矛盾的。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27页。

《德国外交文件》（二），第234页。

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258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28页。

由此可见，在 1900 年 6 月至 10 日这五个月中，正是义和团与爱国官兵血战联军和全国人民反帝怒潮的风起云涌，迫使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侵华战争的联军发表了《大沽宣言》，美国宣布了《海约翰通牒》，在华拥有最大势力范围的英、德两国提出了《英德协定》，相继形成了中国面临的严重的、迫在眉睫的、非常紧张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缓解。正是在这个三次瓜分危机缓解的基础上，我们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的迷梦，使中国没有从半殖民地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的地位。就整个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也正是在这个三次瓜分危机缓解的基础上，我们说义和团运动结束了自 1871 年开始的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代”和“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义和团运动的丰功伟绩，在当时，在后世，都是值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为之庆幸的。人们如果对这一点还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相反的方面来设想一下，问题也就非常明白清楚了。假定在 1900 年不曾全面爆发义和团运动和随运动而兴起的一系列重大的事件，那么肯定就不会有所谓《大沽宣言》、《海约翰通牒》和《英德协定》，从而使中国面临的瓜分危机一次又一次地缓解下来。其结果就会是，从第二次瓜分危机所开始的对中国的瓜分，在第三次瓜分危机中恐怕就要完成了。这在当时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从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有关中国的所谓宣言、通牒和协定已经不少，但是，在《大沽宣言》以前的几年中间，没有一个不是为了掠夺让与权、划分势力范围而发的，它们都是使瓜分中国的危机一步紧似一步，丝毫没有一点儿缓解的苗头。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只有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在全国沸腾着的，中国人民的义和团运动才能够，也才敢于同它对抗，打掉它的嚣张气焰，从而迫使它不得不缓解的。

第十一章 瓜分危机缓解后之大局（1900年10月—1902年7月）

义和团运动虽以其英勇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造成了瓜分形势的缓解，但是，由于它没有摆脱中国旧式农民起义的局限性，由于它采取了义勇军的形式而“缺乏政权观念、没有政权组织”、“解决不了如何把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的复杂问题”所具有的弱点，因此，它也就控制不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叛卖活动。京、津的沦陷和沙俄的侵占东北虽说没有改变瓜分形势缓解的全局，但是，它们毕竟在其他方面形成了时局的转折点，形成了中国在瓜分危机缓解以后的独特的时局。

这个独特的瓜分危机缓解后的中国大局，基本上包括了以下三个问题：

1. 中外议和谈判。
2. 中外条约的签订。
3. 义和团继续坚持斗争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

以下是我们对这三个问题的简要叙述。

第一节 中外议和谈判

京、津沦陷以后，慈禧太后于1900年8月15日仓皇西遁，10月26日抵达西安。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于9月14日自上海北上，9月19日抵天津，10月11日抵北京。侵华联军统帅德人瓦德西陆军元帅（Generalfeldmarschall Waldersee, Alfred Graf von.）于8月19日离柏林东来，9月27日到天津，10月17日到北京。在此期间，中外逐步开始了议和的谈判。

中外议和谈判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瓜分危机已经缓解，帝国主义列强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五六年间瓜分中国的野心和实践已经被义和团运动所阻止。否则，他们在京、津沦陷以后完全可以由他们自己来开一个会：讨论一下那一块土地属于那个强国的势力范围，由那个强国来统治，成为那个强国的殖民地也就够了，这样的分赃会议根本用不着重开中外议和谈判。列强瓜分非洲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是有前例可循的。中外议和谈判这件事本身就说明“瓜分中国的方案在几个欧洲列强的总理府中已被扔到废纸篓里去了”的真实情况。尽管这个谈判是由列强“自行商定”，“交给条款照会”，“无所谓互议”，是在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他们毕竟不得不承认中国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作为谈判的一方来对待。至于“无所谓互议”的情况，本来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对待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国家的惯技，毋庸深论。甚至业已出兵占领东北，蓄意把这块土地当作“黄俄罗斯”殖民地的沙俄，也不能对当时的全局置之不理，不得不同中国谈判。

既然列强要同中国谈判，那么由谁来代表中国去同他们谈判呢？对此，被认为“在关于中国的一切事情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赫德爵士更有权威，他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已经有三十七年以上”的人出来发表意见了。赫德在1900年8月份提出：“瓜分、改朝换代或修补满洲人的统治——在这三种行动方针之间要有所选择”。关于瓜分，在瓜分危机形势缓解之下业已在事实上被阻止，赫德本人也持反对意见，我们在这里且不去谈它。至于“改朝换代”，部分帝国主义者曾有这个看法，认为“取得了北京，中国政府已不复存在，建立一个新朝代，乃是胜利者们的责任”。不过，赫德认为：“建立一个新朝代——却没有一个全中国愿意接受的有名望的人；这个计划会把中国投入多年的无政府状态中，并且由外国列强一致同意所设立起来的朝代，以后将永远带有软弱和耻辱的标记”。鉴于这种看法在当时帝国主义者中还相当流行，赫德又在他11月份发表的文章中说：如果要“立一个新皇帝，那末这个新皇帝就必须由外国的刺刀来支持，他的命令只会在非常狭窄的范

斯塔夫里扬诺斯：《一五〇〇年以来的世界史》，第203、235页。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602、603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12页所载卫斐列（F.W. Williams）为本书所写的序文。

荣禄：《致奎俊书》（1900年底或1901年初），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42页。

怀特海德：《在华贸易的扩展》。见吕浦、张振鹏等：《“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161页。

赫德：《北京公使馆：一个民族起义和国际事件》，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49页。

围内生效，他的外国渊源会使他受到这个黑发种族的每一个成员的藐视，一当他失去外国人的支持，他本人及其所有的一切就会永远消失。要说呢，只是这个把另一个朝代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企图，比起瓜分来，甚至会是一个更加没有希望的解决办法罢了”。“瓜分”既已无望，“改朝换代”亦非善策，赫德只好乞灵于“修补满洲人的统治”了。怎样“修补”呢？那就是把清皇朝、即“现存的朝代当作一个开着的商店或公司（a going concern）接受下来，简而言之，就是尽量利用它”。因为“它的命令通行于全中国，承认它会是所有的列强都默许的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支持它比起任何其他的行动来都会更迅速、更有效地恢复普遍的平静”。这就是说，赫德所谓的“修补”就是“尽量利用”。他要尽量利用清皇朝的统治来作为“恢复普遍的平静”，即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工具；他还要尽量利用统治的清皇朝来作为“一个开着的商店”，即出卖中国人民权益的公司。在义和团运动中，帝国主义列强既然不能瓜分中国；那么，他们就要以维护腐朽的清皇朝的统治来尽量侵略中国，企图攫取更多更大的权益。

在瓜分危机缓解后的中外议和谈判中，帝国主义列强原则上是执行了这个名为中国官员，实则列强服务的侵略分子赫德所精心策划的方案。因为“对于列强来说，以支持一个它们所能威胁、控制的懦弱政府，自是最为有利。各外国政府的政策就是要迫使中国人依从外国人的每一项要求，而只是以不造成革命原因为度。中国的懦弱无能，四分五裂，才使得治外法特权、低到不合理程度的税则以及千百种类似的特权，有继续下去的可能”。实际上，赫德掌握了中外议和的全局，虽然他没有参加议和的会议；因为他认为：“那样将造成一种英国在谈判里操纵的气氛，而且容易引起反对，不过会议进行的一切情况，和中国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应让我知道”。另一方面，沙俄却准备“坚决把赌注下在李鸿章身上”，维特于是又派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和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董事吴克托来华，于9月29日抵达上海。当时李鸿章已到天津，吴克托就在上海同李经方开始谈判。李经方照他“父亲的吩咐”说：“中国将使我们如愿以偿，心满意足，并要付给我们一笔极大的赔款”。需要俄国做的只是：它“在用武力占领中东铁路时”，宣布在原则上“慷慨地不把全地区（即满洲）据为己有”。李经方“赌咒发誓地”担保，倘若吴克托先付给所谓“李鸿章基金”的第二笔款子中给他“弄到”50万，他就拿着钱去向太后的亲信们炫耀，促使太后回銮北京，“等待更大的赏赐”，并“在满朝官员面前为有利的谈判奠定基础”。

由此可见，清政府在背叛义和团运动后所造成的京、津、东北失守的局面下，所谓的中外议和谈判，只能是在不瓜分中国的条件下的无条件投降，只能是城下之盟，只能是屈辱的丧权卖国的谈判。

同上书，第97—98页。

同上书，第50页。

赫德：《中国和重建》，见同上书，第98—99页。

同上书，第50—51页。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51页。

赫德：《致金登干》（1900年10月28日），见《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15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18页。

第二节 中外条约的签订

一、《辛丑和约》（1901年9月7日）

1900年8月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列强议和；8月25日，李鸿章电请加派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为全权大臣；8月27日，清政府命庆亲王奕劻回京，会同李鸿章妥商办理谈判事宜。9月18日，德国照会各国，主张先“惩凶”，后议和；10月4日，法国通牒各国，建议以下六点作为谈判的基础：

“一、惩办由各国驻北京外交使节提出的罪魁祸首；

二、继续禁止输入武器；

三、对各国政府、团体及个人偿付公平的赔款；

四、在北京组织一个永久性的保护使馆的卫队；

五、拆除大沽炮台；

六、在天津到北京道路上的两个或三个据点实行军事占领，从而使这条道路对从使

馆前往沿海或由海上前往京城的各国军队始终保持畅通。”中国方面，李鸿章自10月11日到北京后，于15日会同奕劻提出五条，“作为各国会同与中国订立专约之底稿”：

“一、围攻使臣公馆，极犯万国公法之要条，……中国一面自认此次之大误，并应许以后必不致再有如此之事；

二、所有此次应行赔补之各事各款，中国自应认赔；……

三、日后贸易交涉一切事宜，应由各国择定如何办理，或照旧约，或另立专条，……均可即由中国照行；……

四、……各国大臣在总署所加之封条，均可起去，一面由办交涉之各大臣照旧赴署办公，……俟……各事各款全行办妥……即由各国陆续退兵；……

五、……现既彼此开议和约，各国应先行停战。……”

五条建议提出后，“外国公使们认为这些建议是狂妄的”。他们“从最可靠的权威方面获悉，中国全权大臣们完全准备采取法国照会中的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实际上，议和谈判也是以法国的照会作为基础来进行的。在这个基础上，列强拟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于12月22日由英、俄、德、

同上书，第228—229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30—231页。按维特在1896年6月4日为了签订《中俄密约》所许给李鸿章的300万卢布，只是在1897年夏由吴克托到上海付出了100万。到1900年9、10月间，吴克托曾经准备为了往李鸿章“嘴上抹点油，现在就付一点钱，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一笔款子，也是必须的”。但维特却要求：“目前李鸿章应尽力补救已发生的一切，以此挣得由于皇上的恩赐，由我答应东西”。以此李鸿章并没有从“李鸿章基金”剩下的200万卢布中得到一个卢布（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30页）。

按刘坤一、张之洞这“两位扬子江流域的总督是由于外国公使们的提议、作为帮办全权大臣协助庆亲王和李鸿章工作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30页）。荣禄在当时被公使们反对没有参加，刘坤一、张之洞参加了，但没有到北京，在京谈判的实为奕劻和李鸿章两人。

《美国外交档案，一九〇一年》，第27页。

佐原笃介等：《拳“乱”纪闻》，见《义和团》（一），第221页。

同上书，第222页；《美国外交档案，一九〇一年》，第41页。按上述第四条又作“总理衙门机关和档

美、法、日、意、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 11 国公使联合递交奕劻和李鸿章，照会中声明这是“必须定而不移之要款”，即已经确定而不能更改的。12 月 27 日，清政府同意：“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1901 年 2 月 14 日，清政府发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的上谕，保证把自己作为向列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一个开着的商店”。现在我们把十二条中比较重要的“惩凶和赔款”两条情况略述于下：

首先，在所谓“惩凶”问题上，本身就是违犯万国公法的。因为这场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是由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西摩尔联军和炮轰大沽炮台来最先发动的；要惩凶，就得惩办帝国主义列强自己，只有他们才是凶，才是罪魁祸首。现在却把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抵抗派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看作是“凶”来加以惩办，完全是极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之能事。对于这个问题，奕劻、李鸿章不仅不敢据理力争，反而加以接受。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也深恐惩凶惩到自己头上，“以首祸当议己，常惴惴不自安”。她“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然每一见电，喜少惊多，实令胆怯”。直到 1900 年 11 月 21 日，她还询问奕劻、李鸿章等人说：“列强所索各条是何端倪，曾否见询，有无万不能行之事，……应据实密奏”。这个“万不能行”或“万不能允”之事，从 1899 年 11 月 21 日开始，就被慈禧提出来了。不过在一年前它指的是所谓“太后归政问题”，如今却是指的“祸首”问题；一年前她恍遇到这个问题是要“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的，如今却是“大局攸关，款议可成不可败，两害取轻”，“朝廷不能遥制”了。当然，她在这里是虚惊一场；因为帝国主义列强既然要保留清皇朝，也就得保留她。早在 1900 年 9 月 25 日，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就对首先提出惩凶作为议和先决条件的德国人说：“他绝对不否认，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欧洲不利”的。另一个人是拥有军事势力的董福祥。虽然列强认为他是罪魁祸首要求处以极刑，但他“系武职大员”，“碍难重予处分，骤撤兵权亦多不便”，最后也只好改为革职降调。说到底，如果清政府真能坚持“不得谓衅自我开”的原则，那么所谓“惩凶”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颠倒是非的问题。加以列强本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如德使穆默在 12 月 4 日的电文中说到的美使康格提出“死刑代以最严酷的刑罚”，英使萨道义（Sir Ernest M. Satow）提出“把罪魁之名字不要列入

案应交还中国”（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39 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39 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979—982 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979—982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853 页。

同上书，第 945 页。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义和团》（一），第 34 页。

柴萼：《庚辛纪事》，见《义和团》（一），第 328 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578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37 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 4578 页。

《德国外交文件》（二），第 130 页。

照会上”等等。因此，这个惩处问题最后就落到他们所能处理的人的头上了。

当慈禧太后看到《议和大纲》十二条中没有把她列为“祸首”时，喜出望外，立即于1900年12月27日“照允”十二条。1901年2月21日又接到了各国要求处死的12人名单，即：瑞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书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四川总督李秉衡、陕甘提督董福祥。其中除刚毅、徐桐、李秉衡三人已死，载漪、载澜“定以斩监候罪名，如以为应行贷其一死，则遣戍新疆，永远监禁”，董福祥“事缓办”外，其余的人都令自尽或正法。4月，清政府又收到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名单，“牵涉百四十二人之多”。根据大部分是由“风闻的证据”来列出的人。清政府于4月29日和8月19日先后发布上谕，惩办了96名爱国官员：其中“四人死刑，十一人判死刑，减为永远流放，十三人终身流放，四人监禁终身，二人长期监禁，五十八人永不叙用，二人谴责，二人追夺官职”，以满足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要求。

其次是赔款问题。帝国主义列强虽然不能瓜分中国，却要尽量榨取中国，因此，赔款一事就成为谈判中最重大的问题。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来华前夕，德皇威廉第二于1900年8月18日告诉他“谨记在心，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且必彻底贯彻主张。因为皇上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故也”。实际上，列强此时都各有盘算，都想乘机在中国人民头上大捞一把。因此，他们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究竟能够偿付多少，”以便竭泽而渔。在这种情况下，“由四国公使所组成的赔款委员会[美国公使柔克义(Rockhill, W.W.)、德国公使穆默、比国公使姚士登(Joostens, M)和荷兰公使克罗伯(Knobel, F.M.)]”于1901年3月开始“讨论赔款的原则”。3月23日，又由英国公使萨道义、法国公使毕盛(Pichon, S.J.M.)、德国公使穆默和日本公使西德二郎(Tokujiro Nishi)四人组成了“中国财源调查委员会”，研究中国究竟有哪些财源能够用来支付各国所要求的赔款。“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中国能够满足总数达五千万或六千万镑的赔款要求。赫德爵士，熙礼尔先生和璞科第先生都同意这个意见，即中国不能够用它自己的信用筹借一笔外债来支付这笔款项。他们都提出某种分期摊付的办法。法、德两国公使似乎强烈赞成由所有列强提保的一笔外国借款，日本公使也似乎不反对该计划”。5月1日，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报告，各国要求的赔款总数为“六千七百五十万镑，或四亿五千万两左右的银子”。5月11日，奕劻、李鸿章“接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747页。

同上书，第748页。

《德国外交文件》(二)，第158页。按英使萨道义于1900年10月25日接奏纳乐任驻华公使。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66、967页。

同上书，第1017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49页；《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66—1068、1284—1286页。

《瓦德西拳“乱”笔记》，第8页。

萨道义：《致外交大臣兰士敦(Lansdowne)》，(1901年2月16日)，见《英国蓝皮书》，第418页。

赫德：《致金登干》(1901年3月18日)，见《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18—19页。

受四亿五千万两为赔款总额”。5月26日，清政府电全权大臣奕、李二人说：“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著即照准，以便迅速撤兵”。6月3日，瓦德西离京赴津，转道日本回国。7日，英国及其它各国侵略军开始自北京撤退。

在勒索赔款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列强虽说在赔款数字、偿付方法以及用中国哪些财源作为偿付赔款的本息问题等各方面，都有不同意见，矛盾重重，斗争激烈。但是，在这些问题的最后解决中，却基本上是按照赫德在1901年3月25日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应付赔款的备忘录》上的意见来进行的。赫德在这里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对中国的财政收支情况了如指掌，他的意见在帝国主义侵略者中是举足轻重的。他认为“中国没有准备金”。所以赔款“不能支付现金”。就当时中国的财政收支来看，中国是一个入不敷出的国家，“岁入共约八千八百万两，而支出据说需要一亿零一百万两。岁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现有借款的利息；至于亏空或所需用与收入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欠债，因为没有资金偿付它”。他还认为：“最合适的偿付方法”是“各国政府同意接受中国政府保证在若干年内每年分期摊付”。“举例来说，假定赔款本金的总额为五千万镑，而且中国保证，比方说，在三十年内对该款支付五厘利息，或每年支付二百五十万镑（一千七百五十万两）”。因为赔款要靠增税，“那就不应超过目前的负担，即应尽量在每年二千万两以下，而且不应超过那个款额”。这个数字“可依靠盐税、常关税、崇文门落地税、京城政费和漕折各项，第一年就可取得二千万两的净数，几年后或许能提供三千万两”。实际上，赫德本人很清楚，如果把他管理的海关真正作到值百抽五，那么赔款问题根本不用增税就可以得到解决的。他说：

“当四十年前（1860年——引者）通商税则开始实行的时候，一海关两或关平银一两值英国钱六先令八辨士，即三海关两等于一镑，而关税过去和现在都是以海关两支付。自那时以来，银价下跌，现在不是三海关两而是七海关两兑换一镑。起草税则所依据的原则，是要把关税确定在从价值百抽五的税率上；但是，银价下跌的结果，不是按货价值交纳百分之五，现在大部分货物仅交纳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而许多货物甚至不过交纳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二；另一个结果是中国岁入减少，中国政府成为受害者。只要通过恢复税则上所规定的关两价值，整个情况就可以一举纠正过来，而这一步骤既不需要作任何修改或改变，也不需要进行谈判。缔约国发表一个声明就够了，该声明说：税则上所规定的两，表示英国钱六先令八辨士或任何其他国家货币的等价物：关税必须按此交纳。此事对海关岁入的影响，将是增加一千万两至一千五百万两的税收，它几乎足以提供新的赔款，而对货物的征税将不超过从价值百抽五的税率。这样增加的税收是海关的岁入。它不需要任何新的机构管理它，而它将是一种简单的并且较其他被指定的税收更易于处理的担保物。”

我们如果依据赫德所说“税则上所规定的两，表示英国钱六先令八辨

萨道义：《致兰士敦》（1901年4月1日），见《英国蓝皮书》，第482—483页。按照礼尔（Hillier, E.G.）是英国银行家，时任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经理。璞科第（Pokotilov, D.D.）是沙俄外交官，时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51页。

《德国外交文件》（二），第390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148页。

士”，再依据他在同一《备忘录》中所提出的当时中国的海关岁入，即：

一般货物.....	17000000 两
外国鸦片.....	5000000 两
本国鸦片.....	1800000 两

共计 2380 万两来换算，那么这个数字就应等于 793 万多镑。再按“七海关两兑换一镑”计算，那么就应为 4853 万多两。比起 2380 万两来，它应增 2473 万多两，比起赫德所说的“将是增加一千万两至一千五百万两的税收”要多得多。实际上，从我们即将谈到的《辛丑和约》中所列兑换率来看，“海关银一两”，“即英国三先零”，而不是按六先令八辨士来换算的，因此和约中所谓的“进口货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一点，其实是不切实的。因为当 1901 年 5 月 6 日赫德致电金登干说：中国“海关每年能提供一千四百万两，但希望英外交部允许将税则中的税率都增加三分之一，这样海关每年可提供二千二百万两”。5 月 8 日伦敦来电称：“密：外交部同意修改税则，达到切实值百抽五。您的意见是否主张在百分之五再加三分之一，例如按百分之五应征六两则加征为八两”。5 月 9 日，赫德回电说：“按现行税率加三分之一即可”。这就是说，所谓值百抽五是名义上的，实质上只不过是就现有税率加三分之一罢了。当时，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英国对华贸易约占 62%；赫德这样玩弄花样就可为英国的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有利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之所以要争夺海关的控制权和赫德之所以紧紧抓住海关不放，原因正在于此。赫德此次要“在赔款问题上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在关税问题上不“照时值加足”，只增 1/3；提出依靠盐税等来赔款，企图“揽盐课厘等项，归其征收，冀获大利”，他的野心是不小的。

1901 年 9 月 7 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劻、李鸿章和十一国公使 [英使萨道义、俄使格尔思 (M.N.deGiers)、德使穆默，美使柔克义、日使小村寿太郎 (Jutarokomura)、法使鲍渥 (Paul Beau)、意使萨尔瓦葛 (MarguisGiuseppe Salvago — Raggi)、奥使齐翰 (MoritzFreiherrvonCzikann)、比使姚士登、荷使克罗伯、西班牙使葛络干 (B.J.deCologan)] 等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十二款及其十

《英国蓝皮书》，第 483、486、487 页；参阅《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 64—67 页。

《英国蓝皮书》，第 488—489 页。按“南京条约时所规定的关税税率，对进出口货都是照价抽百分之五 (fivepercentadvalorem)。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中，这一税率不变，但改为从量税表 (schedulesofspecificduties)，同时免税货物的名单略有扩大”（见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 450 页）。前者称为“从价税”，后者叫“从量税”。例如某物值 100 镑，值百抽 5 应抽 5 镑，接三海关两等于一镑计算，则此物值 300 两，抽税 15 两；如今按从量税，则此物已实值 700 两，而抽税则仍为 15 两；按从价税切实值百抽 5 则应为 35 两，中国政府此时已少收 20 两，所以成为“受害者”。

《英国蓝皮书》，第 485 页。按以下换算系按 12 辨士等于一先令，20 先令等于一镑来计算的。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1005—1006 页。按“先零”即先令。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1005—1006 页。按“先零”即先令。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第 19、20 页。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第 19、20 页。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第 19、20 页。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第 22 页。

九个附件，主要内容如下：

1.勒索巨额赔款。《和约》第六款规定：“大清国大皇帝允定，付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两”，“按年息四厘，正本由中国分三十九年……清还”。这45000万两的赔款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有如下表：

国别	海关两	百分比
1.俄国	130371120	28.97
2.德国	90070515	20.02
3.法国	70878240	15.75
4.英国	50620545	11.25
5.日本	34793100	7.73
6.美国	32939055	7.32
7.意大利	26617005	5.92
8.比利时	8484345	1.89
9.奥匈帝国	4003920	0.89
10.荷兰	782100	0.17
11.西班牙	135315	0.03
12.葡萄牙	92250	0.02
13.挪威与瑞典	62820	0.01
14.其他	149670	0.03
共计	450000000	100

比起中日甲午战争后的23150万两赔款来，这次45000万两的庚子赔款超过将近一倍，它是我国近代史上数量最大的一次赔款，而各地的地方性赔款尚不在其内。再加上四厘年息，39年累积的结果，赔款本息共达98200多万两，成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列强最无耻的剥削，极其严重地束缚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沙俄在赔款中所得独多，名列第一，致使其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Lamsdorf)把1900年的对华作战“作为‘最够本的战争’的罕见例子来谈论”。对列强的这笔大量赔款“从一九〇一年七月一日起支付；清偿在一九〇二年一月一日开始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结束；本息都用黄金付给，依照固定兑换率，逐年清偿。一九〇二年清偿数为二千八百八十二万九千五百两，一九〇一年起为一千九百八十九万三千两，一九一五年为两千三百三十八万三千三百两，一九一六年起为两千四百四十八万三千八百两，一九三二年起到期为每年三千五百三十五万一千五百两；全部本息总计为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94、1115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1094、1115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005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315页。参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53页。

按各地地方性赔款例如保定府的“十万两”，（《英国蓝皮书》，第406页）宣化府联军“搜罗二万金始退，名曰保险费”，（《义和团史料》，（下），第984页）在北京，“法国天主教堂即另索赔款银一百五十万两，京师及直隶各州县向教堂、教民赔款共达一千四百四十二万余两”（《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

2. 镇压反帝斗争。《和约》第二款第一节规定把“首祸诸臣”，包括王公大臣、总督巡抚等大员 11 人处死，或“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外，还规定把“所有承认获咎之各外省官员，分别惩办”。总计监禁、流放、处死的共达 100 余人之多。第二节规定，在义和团运动中外国侵略者“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第十款规定：“各省督抚、文武大吏及有司各官，于所属境内，均有保平安之责，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侵略者——引者）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之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开脱，别给奖叙”。“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在第一款和第三款中还分别规定派醇亲王载沣和户部侍郎那桐分别赴德赴日，为德使克林德和日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杀事，代表清政府表示“惋惜之意”。帝国主义列强企图通过这些条款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使清政府沦为他们维持在华秩序，继续侵略中国的驯服工具。腐败透顶的清朝封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苟延残喘，不惜叛卖义和团运动，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他的生命是不会长久的了。清政府尽管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不出十年就被中国人民发动的辛亥革命所推翻，实在不是偶然的。

3. 控制京津地区。《和约》第八款规定：“大清国家应允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第九款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十二处由列强“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这 12 处驻军地为黄村（意大利）、廊坊、杨村（德国）、军粮城、塘沽（法国）、庐台、唐山（英国）、滦州、昌黎（日本）、天津、秦皇岛、山海关（国际军）。在 1902 年 7 月 18 日清政府外务部和列强公使在《交还天津照会》中规定，“联军仍应接续照旧在现今所屯各处驻扎各国军队，及其所需粮食、衣被等物概免各项赋税”；中国军队不得进入或屯扎在天津周围“二十华里内”；设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虽可置亲兵一队，但数目“不得过三百名”，虽可设立警察勇一队，但其数亦只“足敷河面安静无事为主”。如此交还的天津，实际上仍在列强的军事管制之下，包括天津在内的 12 处驻军地，大体皆然。因此，凡是列强在中国取得了驻兵权的地区，就成了中国的不设防地区，把京津一带地区置于帝国主义军事控制之下。

4. 北京划使馆区。《和约》第七款规定：“大清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常留兵队，分保使馆”。这块所谓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界线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以东、东长安街以南、崇文门大街以西、前门东大街和崇文门西大街以北的地区，面积较大于紫禁城而与之遥遥相对。如所周知，在不平等条约下拥有治外法特权的帝国主义者聚居之处，如遍布各

第 400 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 227 页。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352 页。按美使柔克义曾于 1908 年提出把对美赔款的“一部分退还中国，条件是所退款项应专用于教育”（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3 卷，第 354 页），这就是后来所谓庚款留美的起源。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1004 页。

同上书，第 1007 页。

同上书，第 1003、1004 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 1006、1007 页。

地的教堂，早已成为“国中之国”。如今，他们又像在通商口岸划定租界一样地在首都划定使馆区，而其不准中国人民居住一点，则比起租界来更加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并且屯兵驻守，俨然敌国，时刻威胁着清皇朝首都和宫廷的安全。这样一来，列强驻华公使更加有恃无恐可在区内为所欲为，随时发号施令，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了。

5.重新修订商约。《和约》第十一款规定：“大清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据此，清政府工部尚书吕海寰、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于1902年9月5日同英政府代表马凯（Mackay, J.L.）在上海签订了《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3年10月8日，吕海寰、盛宣怀又分别同美国公使康格与日本驻华使馆头等参赞日置益（Hiok, Eki）缔结了《通商行船续订条约》及《通商行船续约》等等，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由于义和团运动使瓜分危机的缓解已成定局，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他们利用清政府背叛义和团运动来签订《辛丑和约》，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命脉，把清政府当作“一个开着的商店”来投机倒把，肆意掠夺，妄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辛丑和约》的签订表明：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同西方国家（帝国主义侵略者——引者）发生直接关系七十年后，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步伐——一八四二年、一八五八年、一八六一年、一八八五年、一八九五年——如今在一九一一年，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落到连一个拥有主权的和独立的国家属性，都几乎没有什么保留了”。它那“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宣言，是昭昭在人耳目的。这样一个为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作为侵略中国的驯服工具的卖国政府，在经受过义和团革命运动洗礼的广大中国人民眼中，是不可能长久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利用它来长期镇压和剥削中国人民，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1902年4月8日）

俄国在趁火打劫，侵占东三省以后，是不惜采取一切它所能使用的各种阴谋诡计，极尽了强词夺理、威胁利诱、玩弄花招之能事，立意要把我国东北变成俄国的殖民地“黄俄罗斯”的。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三四十年，它曾经以口蜜腹剑和军事威胁双管齐下的方式，掠夺了我国东北和西北的大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如今，它在对东三省实行军事占领以后，对这块土地更是必欲得而甘心的。但是，在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瓜分危机业已缓解的条件下，国际、国内情势与三四十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它不仅不能明目张胆地把东三省宣布并入俄罗斯的版图，并且也不能把占领军死皮赖脸地驻在那里而不撤走，结果就是1902年4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在北京有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之签订。

从1900年10月沙俄侵略者对东三省实行军事占领开始，到1902年4

同上书，第二册，第59—60页。

同上书，第一册，第1006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007页。

同上书，第二册，第101—110页。

月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之签订，中间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非常曲折、极端复杂的谈判。谈判过程彻底揭露了俄国侵略者对东三省的领土野心和无耻伎俩。

俄国作为八国联军中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员，有关中俄方面的交涉理应包括在北京的中外议和谈判和其后的《辛丑和约》中一并解决。只因它决意要占据东三省，坚持要同清政府单独交涉，所以关于交收东三省的谈判没有列入北京议和谈判的议程。俄军在1900年10月1日占据奉天以后，南满俄军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便胁迫在俄军劫持下的盛京将军增祺，派已革道员周冕，与俄员考洛斯托维茨(Korostovetz)会议于旅顺，于11月8日订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九条》：(1)由将军“保卫地方安靖，务使兴修铁路毫无拦阻损坏”；(2)“奉天省城等处，现留俄军驻防”，“将军及地方官等，……随时尽力帮同，譬如住宿处所及采买粮料等事”；(3)“奉天将军所有军队一律撤散，收缴军械”；(4)“拆毁”奉天各处“炮台、营垒”及“火药库”；(5)“营口等处俄官暂为经理”；(6)“将军设立巡捕、马、步各队保护商民”，“人数多寡，携带枪械，另行酌定”；(7)“沈阳应设俄总管一员”，“凡将军所办要件，该总管应当明晰”；(8)“将来将军设立奉天各处巡捕”，“不足于用”，可“转请俄带兵官帮同办理”；(9)“前八条遇有评论以俄文为准”。

章程订立后，俄方诱逼增祺于11月30日签字批准。这个章程“所包含的内容，废止了中国在南满的军权（在营口连民政管理权也被废止了），并把将军变成了向俄国军事指挥官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工具，亦即明显破坏了中华帝国的‘独立’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12月31日，章程内容被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Morrison, G.E.)的一篇电讯所揭露，并于1901年1月3日见报，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强烈反响和责难。对此，俄国政府一方面对列强的质讯公开否认，当面撒谎；一方面则胁迫清政府于1月2日降旨委任在俄京交涉接收东三省之全权大臣杨儒签字，以便造成既成事实。1月6日，它就向英国否认了这个所谓章程的存在。1月16日和17日，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分别向奕劻和李鸿章提出：章程九条“关系甚重大”，“虽交还，如同占据，于中国大有损害”。“英国已与德国立约（指1900年10月16日的《英德协定》——引者），不占中国土地；惟他国得有利益，彼亦须一律均沾。东三省若为俄有，英必占长江一带，德必占山东全省，我日本……亦不得不起而争利益”。“我日本所注意者，莫过于东三省之事”。1月21日，杨儒在与维特谈判中，维特说，章程“业已画押，须由两国政府批准”；次日，拉姆斯多夫又向杨儒声称：“增阿暂款，须请贵国批准”。最后，在杨儒义正辞严的争辩中，拉姆斯多夫于1月24日表

同上书，第181—188；192—195页。按中英和中美商约中关于“加税免厘”的条款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行。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58—359页。

《杨儒庚幸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226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32—233页。

参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344页。

同上书，第345页。

示《暂且章程》的批准“作罢”，但“异日商议正约，贵大臣务勿阻难”。

这个所谓需要商议的正约又是什么货色呢？它原来就是1月17日维特向杨儒口头提出的约款十三条，主要内容为：“兵费偿款，由各使在京核定”，“铁路偿款另算”（第一条）；“东三省中国只可设巡捕兵，仍与俄商定名数”（第二条）；“东三省简放将军，先与俄商明”（第三条）；三省“将军处，由俄派郭米萨文武二员佐之”（第四条）；“满洲、蒙古及中国北省，未经俄允许，无论何项利益，不得让与外国”（第五条）；“满洲、蒙古等处中国不得建造铁路”（第六条）；“满洲税关归俄人代理”（第八条），等等。接着，拉姆斯多夫又在2月16日向杨儒提出书面约款十二条，主要内容为：允东省铁路公司“设兵保路”（第二条）；中国在东三省“不设兵队”，“军火禁入满洲”（第四条）；“凡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第五条）；“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第六条）及“连界各处，如满蒙及新疆之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于阗等处矿路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中国不得自行造路；除牛庄外，不准将地租与外国人”（第八条）；“此次俄兵费，各国赔款，均应清还”（第九条）；“被毁铁路”赔款，可“以他项利益作抵”（第十、十一条）；允俄向北京“造一路，直达长城”（第十二条）。

不管是维特的十三条还是拉姆斯多夫的十二条，它们都是来自沙俄外交、财政、陆军三大臣于1900年11月13日所一致通过、并在12月17日经沙皇批准的所谓《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的。这个原则的草案共有十五条，它的精神是“不经俄国同意，中国政府不得在满洲任命一名官员，在俄国边防指挥官所允许的巡捕数额之外，不得增加一名巡捕，兵部不得调一兵一卒去保卫满洲边界，而在‘归还给’中国的这一地区内，将驻扎俄国将军指挥的正规军和边防军这两种形式的俄国武装力量”。因此，根据这个原则所形成的条款就根本不是什么交收东三省，而是对我国东北领土的直接吞并，所以它们都遭到了杨儒的严词驳斥。杨儒根据这些条款认为：“禁运满洲军火，禁用外人练兵，并及北省水陆。满蒙新疆均有金矿，矿路利益一网打尽。又建入京枝路，铁路赔款用他项利益相抵，盖指关税矿路等事，隐而未露。其侵我兵权、利权，以图自便，可谓周密深远”。他迭商沙俄“外户两部，告以俄声言保我主权，何以兵权、利权、派官之权一朝夺尽？声言不利土地，何以现商东三省事，勿牵连蒙古等处及中国北省”。

俄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如意算盘是要抢在《辛丑和约》以前，赶快从清政府手中搞到一张出卖主权的正式文凭，以使其掠夺东三省的土地合法化。维特认为：“正是在列强与中国缔结和约之前，趁着瓦德西推行‘报复与恐怖政策’还在促使中国作出让步时，协定才是‘适时的’。”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就一面在北京向李鸿章施加压力，驻华公使格尔思向李威胁说，如

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天津大公报社1932年版，第73—74页。

《杨儒庚幸存稿》，第23、25、28页。

《杨儒庚幸存稿》，第23、25、28页。

同上书，第16页。按“郭米萨”系俄语 КОМССАП 之音译，义为负责某种领导任务的委员。

《杨儒庚幸存稿》，第57—58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41页。

《杨儒庚幸存稿》，第74页。

果中国“听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必永为俄有”；另一方面又在圣彼得堡向杨儒威逼，并于3月13日把十二条删削为十一条抛出，逼限在14天内签字，一字不准更改；咄咄逼人，气焰极其嚣张。杨儒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的具有爱国精神的外交家，临危不惧，折冲樽俎，坚决拒绝签字。3月23日，清政府电李鸿章“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也”。同日，李鸿章据此电杨儒说：“内意已松”，“即酌量画押，勿误”。24日，杨儒扶病出席与维特进行谈判，情况如下：

“维云：……璞科第来电称，李相告伊，贵大臣业奉政府训条画押矣。

杨云：不错，本大臣确已奉到李相、军机处两电，令本大臣自行定计，酌量画押，并非画押全权。……我非明奉朝旨，何能私行画押？……

维云：我意总劝贵大臣画押。……现在期限甚迫，今日礼拜，后日期满。……如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如欲加害于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

杨作色云：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

维自觉失言，颇有惭色。”

3月26日，清政府在国内强烈反对俄约和列强的干预下认为：“不遽画押仅只激怒于俄，画则群起效尤分据，其祸尤速”，“以坚持不画押为害较轻”，“请先议公约（即《辛丑和约》——引者）”；电令杨儒“婉告俄外部，中国为各国所迫情形，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沙俄阴谋终未得逞，于4月6日发表声明，暂停谈判。但李鸿章此后却电告吴克托说：“各国多方恐吓，中外大臣，多信其言；我虽屡奏催，孤掌难鸣”，“俟公约定后，再行画押”。在9月7日《辛丑和约》签订前后，李鸿章与俄使格尔思及维特代表波兹德涅耶夫（Pozdneev, D.M.）进行了频繁的接触。10月7日，沙俄提出了关于华俄道胜银行协定草案七条，连李鸿章本人也认为，这个“协定把满洲全境交给银行支配”。但是，俄方却逼迫他签字。10月27日维特电告波兹德涅耶夫说，如果李鸿章“不老老实实在地‘在最近数日’签订协定，就‘分文不给他’”。11月7日，李鸿章在俄人的“恫吓催促”下病死，“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李的病逝，对维特等人

同上书，第8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40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3卷，第17页。据安德鲁·马洛译莫夫（Andrew Madozemoff）所著：《俄国的远东政策》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75页。维特在1901年2月23日曾致电华道胜银行经理璞科第说：“我授权你通知李鸿章，我们的协定一经缔结，你就给他或他所指定的任何人五十万卢布，以表示我们的感谢”。此后如果“我们的事情办得好，我将再给他……一笔适当的款项”。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34卷，第6页。

《杨儒庚幸存稿》，第94页。

《杨儒庚幸存稿》，第53—54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同上书，第97页。按俄约遭到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中国各地人民的反对，3月15日上海人民在张园集会抗议，要求“力拒俄约，以保危局”；号召中国人民“出死力以争此一日之命”（《中外日报》1901年3月16日）。同时，英、德、美、日等国也警告清政府说：“同任何一国单独签订条约都对国会是一个危险的根源”（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45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34卷，第29页。

来说，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他们“这时才发现，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因为‘随着失掉了李鸿章与许景澄（许早在1900年就死了），不仅我们一派已经完全没有台柱子了，而且在中央的最高当局中，看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勇敢地负责与外国人办理交涉’，而‘从物质上使某人具有切身利害关系’暂且‘为时尚早’。”

我们知道，由于清政府叛卖义和团运动，致使在瓜分危机缓解形势下签订的《辛丑和约》扩大了和加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对华侵略，即在“门户开放”政策下的进一步掠夺。但沙俄却要占领我国东北，把东三省的“门户完全关闭”，以“巩固俄国在满洲的绝对势力”。这就使它同其他列强，特别是同样对东三省怀有领土野心的日本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1902年1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兰士敦（Henry Charles Lansdowne）与日本驻英公使林董（Hayashi）在伦敦签订了《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31日日本驻俄公使便把同盟条约通知了拉姆斯多夫。“日本公使的通知对俄国外交界是一个晴天霹雳。这也立即使俄国改变了它原先在撤军条约问题上的态度”，因为《英日同盟》表明了“那个置俄国于死地的远东国际联合体的成熟”。沙俄为了摆脱它的不利处境，被迫在撤军问题上作出让步。1902年4月8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奕劻、王文韶同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P.M. Lessar）在北京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四条：

“一、俄国……允在东三省各地归复中国权势，并将该地方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治理。

“二、大清国家……允认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即将东三省俄国所驻各军陆续撤退。……由签字画押后，限六个月，撤退盛京省西南段至辽河所驻俄国各官军，并将各铁路交还中国；再六个月，撤退盛京其余各段之官军及吉林省内官军；再六个月，撤退其余之黑龙江省所驻俄国各官军。

“三、……俄国各军全行撤退后，仍由中国酌核东三省所驻兵数，应添应减，随时知照俄国国家。……”

“四、……俄兵所占据并保护之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交还本主。大清国家允许：（一）……不可准他国占据俄国所退各地段；……（三）至日后在东三省南段续修铁路，或修枝路……应彼此商办；（四）应将……山海关、营口、新民厅各铁路所有重修及养路各费……赔偿。……”

在签订这项条约时，清政府本来已经看出，第二条中所谓“允认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作为撤军条件，会把沙俄“关于撤军的承诺化为乌有”，因此，签约一事拖延下去。一贯善于搞贿赂外交的维特于是下令使用“李鸿章基金”，“即便花很多钱”也要结束此事。3月31日，璞科第“答应付给王文韶二万两，给其他小人物一万两”，于是在4月8日“中国人保留了那项条件，签署了撤军协定”。在这种条件下签署的协定实质上是为不撤军寻找借口的协定，但它也为1904年2月8日至1905年9月5日的日俄战争埋下了种子。俄军在日俄战争中“元气大伤”，“连在欧洲打一声防御战都已应付不了，俄国本身又在发生革命”，“俄国已不再作为一大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56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82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91、297页。

同上书，第297、298页。

强国存在了”。为沙皇并吞领土野心效劳的维特，虽是一个搞贿赂外交的能手，但他在掠夺我国东北领土的侵略罪行中，他不仅“忽略了不能使一八九五年和一八九六年的局势在当时重演的种种因素”，也昧于义和团运动所引起的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者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乃是必然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尽管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没有能使沙俄全部撤军，但它却保持了我国东三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不能不使我们回想到，这是一年多以前我国驻俄公使、全权大臣杨儒在圣彼得堡坚持斗争、不屈不挠的结果。“杨儒在各方煎迫之下，矛盾攻袭之中，犹始终固执（应读作顽强坚持——引者），至以身殉”。“因其固执之一念，未由中国自画卖身契，为东三省留下一线生机，日俄战后，日本仍不能不将东三省交还中国者，实杨儒固执之功也”。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40—41页。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98页。着重点系原书所有。按“李鸿章基金”自此次付出后，“在财政大臣名下存于华俄道胜银行的还有二百三十四万二千二百二十八卢布二十四戈比”（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同页）。

泰勒著，沈苏儒译：《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75页。

第三节 拳民继续坚持斗争——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 (1900年8月—1902年7月)

京、津沦陷是清政府叛卖义和团运动的结果，同时也标志着义和团运动高潮的结束。慈禧太后自1900年8月15日自北京仓皇西遁后，于19日在怀来县发出谕旨寄李鸿章，利用联军不瓜分中国的《大沽宣言》来作为保存清皇朝的借口说：“彼方以代民除‘乱’为词，谓于国家并无他意”。9月7日，她为了进一步卖身投靠列强，竟然颠倒是非，把帝国主义侵略军首先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完全转嫁到义和团身上，认为“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正式发布了剿团谕旨：无耻地说什么“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命令“地方文武各官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实力剿办，以靖乱源”。她再也不像两个多月以前把义和团称作“义民”或“义兵”，要各省督抚把他们“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的了。这是很典型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以镇压中国人民的一幕丑剧，把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把中国从瓜分危机中挽救过来的义和团从此抛进中外反动派共同镇压的血泊之中了。

对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这种叛卖行径，对他们这种翻手为云覆手雨的卑鄙伎俩，广大的义和团爱国群众是嗤之以鼻的。拳民们说：“他们皆已逃走，何配称为太后、皇上？”当怀来县令吴永为此作辩护时，拳民认为：“此乃二毛子口气，应当宰了！”在京、津沦陷后，与清政府大小封建官僚狼奔豕突、纷纷作鸟兽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拳民们本着“官败民不败”、“除国之大害”的英勇爱国精神，在京、津郊区潜伏下来，阻击敌人，坚持斗争。他们同坚持抵抗的爱国官兵一起活动，形成了一种对外国占领军的巨大威胁。那个既作帝国主义谋士、又是清政府官员的赫德在1900年9月11日说：“义和团和中国兵已在距（北京）城数里处出现。”12日他又说：“义和团正成群结队来到北京周围，甚至在城内出现，昨天他们准备架走一个法国人！再来一次更大规模的围攻或封锁，也很有可能。”9月15日，“俄、德兵出彰仪门（广安门——引者）击义和团于城西之七十里，俄兵败绩”；“是役也，俄兵伤亡不少；俄人服义和团之能”。俄兵后来是在德兵的援助下才打败了拳民，免于被歼灭的命运的。敌人虽说占领了北京城，但京城周围“各寺庙和西山都充满了义和拳。不带卫队乘车下乡是很危险的”。

至于直隶各处，义和团更是方兴未艾。据暂护直隶总督廷雍在9月中旬奏称：“如交河之齐家堰，……容城、新城交界之白沟河，静海之独流镇，文安之胜芳、苏桥一带，均为拳‘匪’巢穴，动聚数万人，广有快枪，敛捐粮草，水旱各路盘诘来往。广平府前有拳‘匪’攻袭郡城，……河间府拳‘匪’

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299页。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4卷，第149页。按所谓“杨儒固执之功”应读作“杨儒不畏强权、坚持真理，坚持爱国之功”。

金家瑞、林树惠：《有关义和团上谕》，见《义和团》（四），第39页。

《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540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义和团》（三），第401页。

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闻见录》，见《义和团》（二），第188页。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10—11页。

围城。……其余各处拳民，众寡不一，旋散旋聚，粮赋差徭一概抗停，凡事不容地方官作主”。他又说：“现查顺、直各属，拳‘匪’众多者，共计三十余州县：……涿州一带……白沟河一带、……河间府一带、……静海一带”都是拳民集中活动的中心；“此外如大名、广平、宣化、冀州、深州五府二州所属”也有不少拳民。直隶周围之山东、山西两省，义和团也在活动、或围攻教堂，或与前来剿办之清军开仗者，不在少数。甚至远在厦门，在北京沦陷后于8月下旬还出现了义和团揭贴说：“义和团为天地正气，……由北迄南，所向无敌。此次团友……来此大征同志。台湾割据，神人共怒，恢复把握，在此刹那”，表现了我国人民要恢复日本占据我国领土台湾的强烈愿望。即便京、津沦陷，帝国主义列强也是不可能消灭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的。加以这时冬季将临，只须坚壁清野，便可使侵略军遭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赫德提出了联军可能“遭到拿破伦在莫斯科的命运”的论点。他在8月30日发给伦敦的电文中就北京的情况说道：

“现状极其紊乱，解围并未使我们的处境改善。邮电不通，供应仍缺，对于平民更少顾及。抢劫、强奸和自杀经常发生。……除非鼓励中国人运粮进城出售，全城的人都将饿死。……中国很有可能使各国援军遭到拿破伦在莫斯科的命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的叛卖义和团运动和正式发布剿团谕旨，给与了帝国主义侵略军以多么巨大的“援助”！清政府的公开叛国也给与了一些汉奸官僚公开降敌、帮助敌军的口实。比如那个曾经参加过辩论和战问题御前会议的恽毓鼎等人，就在北京日占区设“安民公所”，在德占区设“华捕局”，在英占区设“保卫公所”等等，不仅替敌军维持“秩序”，尤其重要的是组织运粮进城，为敌人解决了军粮供应的重大问题。

帝国主义侵略军虽然占领了京、津，但在义和团继续坚持斗争的情况下，他们所占据的只是几座孤城；况且他们军无纪律，大肆抢掠，更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对于侵略军来说，客观形势并不总是很有利的。只是由于清政府这时已经成为惊弓之鸟，更由于它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去同侵略军勾结，合作起来镇压中国拳民，致使赫德关于他们可能“遭到拿破伦在莫斯科的命运”的预言落空了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京、津的沦陷才成为结束义和团运动高潮的标志，并把爱国拳民抛到血泊之中的。比如说，那个暂护直隶总督廷雍于1900年8月下旬就已经派兵去镇压包围献县天主堂近两月之久的义和团，其目的在于“给自己造成一个积极反对义和团的名声”。他同荣禄于9月下旬上奏说这样作是“以剿为防”，可“固边城之藩篱，杜外人之口实”；“非肃清内匪（义和团——引者），无以保邦安民”。实际上，这是先剿义和团来为洋兵的入侵开道，那有一点儿防守的意义呢！当洋兵于10月上旬侵占保定以后，11月上旬廷雍等人就被洋兵斩首示众，“该行动已获得瓦德西伯爵的批准”，这就是镇压拳民的刽子手官僚们的可耻下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29页。

《英国蓝皮书》，第215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84—585、599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84—585、599页。

《日本外交文书》第三三卷，别册一，第990页。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9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北华捷报》，1900年9月19日。

场。

应当指出，中外议和谈判的开始并没有阻止联军的军事行动。当李鸿章到天津后，俄军统帅阿列克谢耶夫便令其外交专员科罗斯托维茨（I.Y. Korostovets）迫使李在“十月一日中午以前不经战斗而交出山海关”，但英军却在禧在明（Hillier, W.C.）的统领下于9月30日抢先占领了山海关。

10月11日李鸿章入京与奕劻同各国使臣开始谈判之际，法军于10月13日首先侵入保定，18日侵入正定，20日德军侵入青县，23日日军侵入宝坻，24日联军侵入易县，25日德军侵入完县，29日联军侵入紫荆关；11月5日，联军侵入张家口，6日侵入宣化府，8日侵入迁安县，9日炮击天津杨柳青镇王庆沱村，13日侵入延庆州，18日侵入昌平；12月4日，德军侵占沧州，后又侵占南皮、盐山、庆云、吴桥等县及东光、泊头等镇，15日，联军侵占束鹿城，进攻容城县，德军则侵入永清县，25日德军侵入蓟州；1901年2月20日德军进攻广昌县，3月8日又侵占长城岭及铜钱沟，4月23日，德军进攻娘子关，法军攻固关，5月21日德军去固安县四乡抢掠等等。总之，在整个议和谈期间，列强联军实未停止其侵略战争行动。他们以北京、天津和保定为巢穴，随时出动向附近城乡攻打劫掠，直隶省大部分州县都遭到浩劫，甚至波及到了山西省，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我们可以说，从1900年7月14日和8月14日天津、北京相继沦陷之日起，直到1901年9月7日《辛丑和约》签订之日止，在这一年多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民是历尽了清政府卖国投降的深重灾难的。然天津、北京之失守，实因清政府叛卖义和团运动的结果；否则，即便失守，也不致于如此之速，而敌人要取得这些城池，也是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的。中国人民从亲身经历的这些事实中，已经深切认识到，这次抗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不可了。远在北京尚未沦陷之前，民间就出现了“大清亡、中国强”的童谣，把清政府的存在或灭亡作为中国强盛与否的必要条件来看待，当非无因的了。

到1901年6月20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五日）端午节前后，在各地坚持反侵略斗争的义和团以及在义和团运动影响下或有义和团余部参加的中国人民的起义队伍就公开打出了“扫清灭洋”的旗帜，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走上斗争的前线了。据储仁逊《闻见录》在1901年6月15日所记直隶深州一带情况是：

“深州武举田燮经在该州所属地方，倡立连（联）庄会，约有七、八十村庄，又有
武卫军溃勇及‘匪徒’（指义和团）等混迹其中，现共约二万余人。又与安平连（联）
庄会勾结，其器械旗帜甚伙，旗上书‘扫清灭洋’字样，比去夏拳‘匪’尤为猖獗。”

到8月，原在冀中活动的义和团于1900年10月退到西北金沙滩一带的如今又在祁子刚的领导下，重振旗鼓，卷土重来，但口号却“已经变成‘反清灭洋’了”。《固安县志》称：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1901年8月），拳‘匪’复聚，始据雄县之王家场，号三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627—628页。

《英国蓝皮书》，第407页。

科罗斯托维茨著，李金秋、陈春华、王超进译：《俄国在远东》，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40页。

参阅邹谓三等：《榆关纪事》，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75页。

胡思敬：《驴背集》，见《义和团》（二），第516页。

千人。统军梅汝仪偕霸州勇攻剿，官军败退。‘匪’旋北窜新城黄家庄蛮子营，……北入县境（固安县境），据马庄镇。”

从访问中所得材料说，王家场之战是在：“庚子年京南义和团的总领袖”王德成的援助下解围致胜的。官军败退后，祁子刚“率领少数几个人，又到西北山中去了”。“到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南方革命军起，祁子刚听到消息就又下山来组织军队响应革命”。“建立起北洋革命军的大旗”了。“当时的《大公报》辛亥年十一月初三日（1911年12月22日）曾记载这事说：客有自任邱县来者，据云，雄县一带大帮‘土匪’刻已蔓延到任邱县境内，曾将该县绅士某孝廉之次子用枪击毙，并闻该‘匪’著名头目祁子岗（祁子刚——引者）、王黑等，均系庚子乱，大兵剿捕王家场逃窜之团‘匪’，今又死灰复燃，乘势‘抢掠’云”。“冀中义和团的活动，可以说到清朝灭亡以后才算告一结束”。

当时属于这种“扫清灭洋”式的起义活动，不仅限于直隶一省。比如说，远在祖国西南的四川，红灯教于1901年6月就在川东贴出揭贴说：

“今奉上帝令，灭清剿洋兴汉。行事多人商议，定今端午日（1901年6月20日——引者）戌时，天下各处共起征伐，临时忽然起火为准。凡欲投者，在起火时各执军器，将发剪短，只留寸长，勿包帕戴帽，以光头短发为记。凡灭清之兵，概以现短发为记。”

自1901年9月7日《辛丑和约》签订以后，在水深火热中痛苦备尝的中国人民又增加了赔款重负，只好铤而走险，纷纷起义。“时和议甫成。直隶有教案，各府州县罚赔民间现款，共计四百余万两之多。既遭浩劫，再罚此巨款，民何以堪？”这样就更加壮大了直隶全省早已兴起的“扫清灭洋”起义运动。在1898年10月26日在山东冠县梨园屯首先举起“顺清灭洋”义和拳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赵三多，在经过了三年半的斗争后，终于在1902年4月23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率义和团余部在巨鹿县的厦头寺参加了景廷宾起义，举起了‘扫清灭洋’的旗帜，这是赵三多领导的义和团第三次起义。在这次起义中，赵三多不但主持一切，而且充当了先锋”。景廷宾是广宗县城北东召村人，关于他在联庄会的基础上领导的起义情况是：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直隶广宗县知县王宇钧和教士议定赔偿教会‘损失’京钱二万吊。……新任广宗县知县魏祖德又借赔款之名目擅自派捐以饱私囊，令各村每亩摊钱四十文。……东召村以景廷宾为首的广大群众首先‘聚抗’。……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景廷宾‘竟敢聚众列伍，屯聚城外，操演枪炮，自称闯边，应完钱粮，亦抗不交纳，……筑寨挖濠，私铸枪炮，遇见官弁，辄即截缚’。……袁……于

转引自李文海、林郭奎，林克光编：《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502页。按储仁逊《闻见录》系手稿本，原件藏天津人民图书馆。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刘汝霖：《辛丑条约后冀中义和团继续斗争的史实》，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编》，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1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刘汝霖：《辛丑条约后冀中义和团继续斗争的史实》，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编》，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1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刘汝霖：《辛丑条约后冀中义和团继续斗争的史实》，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编》，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62、63、66、67、69页。

《四川红灯教》，见《义和团史料》（下），第884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本年（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1902年2月25日）命如松入村晓谕’，……景廷宾拒不相见。……于是袁世凯‘檄飭正定镇董履高……带队伍……弹压’，……‘景廷宾竟督其党羽四出迎抄，……至阵亡弁勇四人，受伤四十五人之多’。（按此即3月3日的东召村之战——引者）……景廷宾……率领队伍，于三月十六日（4月23日）转移到巨鹿县的厦头寺，打出‘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旗号，建立了各级联庄会组织。……袁……奏说……景廷宾‘以广宗县属之件只村为老巢，聚众已至二万余人，……号大元帅，……穿黄马褂，……编列营伍，以黑旗为先锋’，……并‘于十九日（4月26日）经县境苏庄、刘庄之间的法国教士罗泽浦（Lomuller）亦被起义民众击毙’，‘都中颇形震动’。……于是，袁世凯就派……段祺瑞……张腾蛟……等，率领骑马队共二千人……前来……镇压。……帝国主义列强……也在调兵，如德、日两国军队四千多名，法国两千多名，由北京开往广宗，冀州一带驻扎镇慑。……时景廷宾闻大军已发，先由厦头寺趋回件只老巢，预备抵御，……凭高以枪炮俯击，相持数时之久’，……总计‘官军死已四、五营人，而官军所剿灭则已先后三十余村，其人既难数计，其地无不荒凉’（按此即1902年5月8日的件只村之战——引者）。”

“四月初二日（5月9日），道员段祺瑞、倪嗣冲督武卫右军及总兵张腾蛟督自强军攻破件只，团众死数百人，良民亦多伤亡”。战后景廷宾南下转战至成安县被捕，7月25日在威县英勇就义；赵三多则北上转战至南宫，被武举范炳纲告密被捕，在南宫狱中绝食7天，壮烈牺牲。

景廷宾、赵三多领导的1902年4月至5月的广宗起义，旗帜鲜明，影响甚大，是在义和团运动高潮结束以后规模较大的一次起义。它把一年前深州联庄会起义提出的“扫清灭洋”口号，通过这次起义而远播中外，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通过义和团运动由“扶清灭洋”走上了“扫清灭洋”的新阶段。章太炎说：“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扶清灭洋”与“扫清灭洋”虽只一字之差，但它却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通过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的背叛，通过成千上万的爱国拳民对侵略者和统治者的武装斗争，通过他们亲身经历的残酷的血的教训才得来的宝贵经验。要跨越这一步是多么艰难，而这一步又是跨越得多么远，只要看看连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等人到了这个时候还在高唱那早已过时的保皇老调，就可想见了。它比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于1894年11月提出的“驱除鞑虏”来，虽说晚了七八年；但它毕竟是表明了广大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使清政府在9年后的辛亥革命中，“不崇朝而土崩瓦解”，一举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就这一点来说，这个口号的提出对中国近代史今后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王振声：《庚子畿疆教案赔款记》，见《义和团史料》（上），第477页。

李岚锁：《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义和拳议事厅落成典礼仪式上的讲话》，见《义和团研究会通讯》第2期（1987年2月），第5页。按梨园屯起义的另一位领导人阎书勤早在1900年8月在梨园屯与清军战斗被捕后于临清就义。又赵三多在梨园屯初次起义后，在1900年5月2日曾在枣强县卷子镇举行了第二次起义。

宋秀元：《从清军机处档案看景廷宾起义》，见《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年第2期，第1—3页。

《广宗县志》，见《义和团史料》（下），第958页。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第十二章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意义

在 1900 年全面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它的高潮时期，从 5 月 27 日占领涿州城开始，到 8 月 14 日北京沦陷，总计不过将近三个月；虽说它的酝酿过程和继续战斗的时间，都比较长远和持久。尽管这个运动的高潮时间为期不长，但它在中国史上和世界史上，都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自 1839 年中英之间爆发了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不过像义和团运动这样同时又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者，实不多见。这是因为，它发生于世界史上的帝国主义时代，它的抵抗战争面对着当时全世界所有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而发动的殖民地侵略战争，即八国联军所发动的战争。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掠夺殖民地领土以及弱小民族反列强掠夺和侵略的斗争和战争乃是当时世界史上的主要矛盾。因此在世界近代史上，涉及到中国历史事件时常常可以用几句话一笔带过，唯独对于义和团运动却需要较大的篇幅。而一部世界近代史，如果缺少了义和团运动这一章或这一节，那它就不可能说是完备的，因为它缺乏了从 1895—1902 年世界史上这七八年间的最重大的事件。现在我们就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它的功绩和它同中国近代化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来谈谈义和团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现分述如下。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20 页。

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见《义和团史料》（下），第 661 页。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义和团运动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次重大事件，并且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构成了世界近代史上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章，主要在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正义的。它所从事的反瓜分、反侵略的斗争，不仅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也代表了全世界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和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共同的呼声和行动。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是没有任何人敢于否认的，甚至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本身，只要他们敢于承认现实的话，他们也是不能否认的。

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首先表现在它的目的和宗旨上是爱国的。它是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对资本、帝国主义教会侵略的“反洋教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面临亡国灭种的瓜分危机时就发展成为这个规模壮阔的救亡图存的群众性运动；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以后随即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战争。列宁指出：“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所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我们通常把这种掠夺政策叫做殖民政策。”

列宁继续指出：“欧洲资本家的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在上述两段引文中，列宁指明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就是反对“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从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反对那些“已经开始瓜分中国”、“盗窃中国”的“欧洲各国政府”。谁能说反对这些东西不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行动的表现呢！因此，义和团运动具有光明正大的爱国目标是无可置疑的。

其次，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还表现在它在手段上的自卫性。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生而具有自卫的正当的天赋权利；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瓜分中国，拳民们在义和团运动中纷纷走

按本节所论问题具有综合性质，以此在这里不免要重新提到本书有关各章节中的某些论点和引语；为了免于读者翻检之劳，所引文字亦将出处注明。

按克莱门茨在其所著《义和拳“叛乱”》一书的序言中说：“论及一八九五到一九二二年中国历史上的这段时期，它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外交上都占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地位（*a unique place*）”（见该书第7页）。

出家门，练习拳艺武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不仅使帝国主义侵略者一时为之目瞪口呆，同时也使自己有能力和勇气去抵抗任何入侵的敌人。否则，这个所谓“东亚病夫”要去击败西摩尔联军和实行京、津鏖战，那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练习拳艺武术，乃是拳民们自卫手段的核心部分，但是，它却包括在一些迷信活动的外壳中。今天我们来认识义和团运动，首先就要善于从它的这些迷信活动的外壳中找出它的合理内核——练习拳艺武术作为自卫的手段。否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强调和夸大所不应强调和夸大的方面，而忘记自己本来就应该重视的合理内核。

所谓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现在应该是到了它破产的时候了。它曾被中外反动派利用它来夸大其迷信活动的外壳，作为他们对拳民们在没有新式武器的条件下不惜以血肉之躯去同敌人拼搏战斗的大无畏的英勇斗争精神的诬蔑。在整个义和团运动的战斗历程中，拳民们从来不拒绝利用洋枪洋炮来武装自己，打击敌人。在1899年10月11日朱红灯领导的山东平原冈子李庄之战以后，10月17日清方检察其据点李长水家，“见设防甚备”，“当大道设炮一，炮重百数十斤，有横箍三、横环二，盖洋庄”。1900年5月27日沙俄驻北京公使格尔思的密电中说：“由官方所证实的事实是：派去攻击‘叛徒’的一支军队被义和拳打败，而且义和拳拥有枪炮”。6月16日，天津“军械所内所存军械，任拳‘匪’随便抢取，洋枪药弹，搬运一空。拳‘匪’……见洋枪枪刺，明洁悦目，亦遂各持一杆，以为御敌之具”。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总司录事司英人辛普森（Simpson, B.L.）在其6月21日所记北京街头见闻时说，他曾亲手放枪行凶，杀死一人。“此人非兵，乃一拳民，身穿红布长衫，周围以蓝布缘之，头戴红帽，如法国大革命时所戴之帽，腰系一蓝色之弹药袋，内装有马梯垒子弹（Martini bullets）；予等见之，甚以为奇，彼拳民非不信弹药者乎？何以又自带之耶？”可见这个所谓义和团不信枪炮、刀枪不入的神话，当时就有目击者把它揭穿了。直到1902年5月8日景廷宾和赵三多所领导的直隶广宗县件只村大战中，团众便“凭高以枪炮俯击，相持数时之久”。原来，义和团所谓的“刀枪不入”，乃是为了鼓励爱国人民，包括那个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久已丧魂落魄的清政府起来战斗，“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亡国危机的缘故。如果义和团真正相信“刀枪不入”，那他们又要枪炮来干什么呢？这一点当为天下后世所共谅共闻，我们要善于识别在运动中带有迷信活动的外壳，千万别相信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刀枪不入”的神话来烘云托月，夸大所谓义和团运动“落后”、“野蛮”的形象，从而歪曲拳民们爱国斗争的正义性及其光辉形象。

其三，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包括它的前身反洋教运动在内，还表现在它们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由于外国教会在其所在地区对中国人民

《中国的战争》（1900年12月24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3—214页。

同上书，第214—215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按所谓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只散见于个别揭帖，多数揭帖上没有这类词句。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一），第358页。

《红档史料》，第217—218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二），第15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曾经进行过侵略和统治，传教士既是侵略者又是统治者，所以反洋教运动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是明确的。在反洋教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是否也具有这个性质呢？它反对外国侵略是明显的，是爱国的、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反对的外国侵略是一种特殊的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的枷锁，本来已经把中国置于它们的间接统治之下，东交民巷的列强驻华公使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业已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连皇室家族的继承问题都得听他们的，唯他们马首是瞻。但是，他们还感到不足，要把间接统治的中国变为直接统治，要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因此，义和团运动所反对的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要求直接统治中国的斗争。它既反对外国侵略，也反对外国统治中国，当然它也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性质。一般论述这个事件的外国史书都把义和团运动叫作“拳民起义”（The Boxer uprising），这种“民族起义”（The national uprising）就是指义和团运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来说的。

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R.R.Palmer）和科尔顿（Joel Colton）曾经把当时中国的情况设身处地作了一个对比说：“读者不妨想象一下，在美国如果外国战舰在密西西比河上巡逻一直到圣路易城；如果外国人在美国全国往来而不受它的法律管辖；如果纽约、新奥尔良和其他城市都有不受它的裁判权管辖的外国居留地，而其中却集中了所有的银行和管理机构；如果外国人决定关税政策，征收货款收入，并将其中大量税金汇寄他们自己的政府；如果华盛顿的西郊曾被焚毁（如圆明园）、长岛和加利福尼亚曾被来自远方的帝国所并吞（如香港和印度支那）以及整个新英格兰又被两个紧邻的帝国所垂涎；如果这个国家的当权者在与这些外国人串通勾结的同时又受到他们的迫害欺骗……那美国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了呢？因此，他就能理解，上个世纪末的中国人是怎样观察问题的了，而‘帝国主义’这个词又是为什么会被世界上这么多的民族所憎恶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民族起义就成了挽救国家免于危亡的唯一的力量。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曾经劝告在1883年成立的英国樱草会（Primrose League）会员说：“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地区尽其可能地去创立一个来服枪俱乐部。让自己有能力去抵抗入侵之敌这一点要成为每一个有本事的英国人的责任。这种气氛如果一旦波及国外，……那么你们就将拥有一支防御的力量，它不仅将击退来犯的进攻之敌，并且将使那些进攻者的命运如此之坏，以致于根本就不会有进攻者出现！”当赫德引用这段话来评价义和团运动时，他说：“这正是引起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的真正思想。”不同之处只是拳民俱乐部没有来服枪，只能靠练习拳术来救国罢了。总之，义和团运动以爱国为目的，以自卫为手段，

朴迪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二），第247页。按朴迪南姆威尔（Putnam Weale）系辛普森之笔名。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署直隶总督袁世凯折》（1902年5月21日）。见宋秀元：《从清军机处档案看景廷宾起义》，《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年第2期，第3页。

参阅牟安世：《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见《近代中国教案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1页。

帕尔默、科尔顿：《近代世界史》，1964年英文版，第655页。

是当时中国人民的正义的民族起义运动。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的功绩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虽说为期不过三个月，并且最终还在清政府的叛卖下，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陷于失败，但是，它的丰功伟绩却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它的功绩，概括起来说是：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醒并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些功绩，主要是在中国方面；不过其中有些也涉及到了世界方面，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

一、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

根据本书叙述，我们知道义和团运动是通过拳民的英勇战斗，在瓜分危机三次缓解的基础上才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这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是：1900年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7月3日美国《海约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0月16日《英德协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三次缓解的过程从所谓有限的军事行动到“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从“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国目前形势“获得领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体明确，并使个别具有领土野心、企图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强盗也终于没有达到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通过义和团运动中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结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它需要说明和解释，即义和团运动为什么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呢？

首先，这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正义的斗争，取得了国内外先进人士和进步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的原故。当运动开始全面爆发的时候，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报纸《前进报》就在1900年6月19日的社论《铁拳》一文中盛赞它为“神圣的战争”。文章说“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我们“不能不寄予同情”。美国的进步作家马克·吐温于8月12日说他“同情中国人”，11月23日他更公开宣称他“也是一个义和团员”，“无论何时都站在义和团一边，义和团是爱国者”。秋冬之际，我国留日学生在横滨发行的《开智录》上发表了《义和团有益于中国说》一文，盛赞拳民的英勇斗争，足以“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列宁在12月24日《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的战争》的光辉论文，痛斥列强的“殖民政策”，特别是痛斥了那个顽固坚持瓜分中国的沙皇政府，“为了一小撮富人和显贵的利益出兵掠夺”中国人民，它“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结束政府的专制统治”。日本进步作家青柳猛于1900年写了一篇《义和团赞论》的文章，刊登在1901年2月25日发行的《女学杂志》513号上，谴责列强以武力强占中国领土，如日本“割

赫德：《中国和重建》（1900年11月），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112页。

赫德：《中国和重建》（1900年11月），见《“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112页。
《义和团史料》（上），第27页。

张廷琛：《马克·吐温与中国》，见《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4辑，第298、299页。

占台湾全局，并勒索赔款三万万两”，如“德国强租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口，英国也占领了威海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义和团“为了防御手持凶器的强盗而拿起刀枪，决没有罪，在哪一国的法律上也应属于正当防卫，不能问罪”。“只知谴责义和团，而对那些外国传教士和耶稣教徒可鄙的行为保持沉默，这是任性胡说，也是极不公平的！”“我认为义和团是值得同情的，而应该谴责的恰恰正是外国人（包括日本人）和他们卵翼下的耶稣教徒。”在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中，改良主义者容闳也于1901年告诉他的学生刘禹生说：“予默观现时大势及中国将来情形，当竭诚以授汝，汝其阐行吾志乎？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之民气也。民无气则死，民有气则动，动为生气，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美国）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以义勇军形式进行的保家卫国的正义斗争，身在北京的赫德就其亲身经历感到那时“除教徒外一般人均同情义和团”，甚至“每个中国人都将为了把外国人（外国侵略者——引者）赶出去而欢庆呢”！

其次，义和团运动以其英勇战斗的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不得不得来一个紧急刹车，中止他们的瓜分罪行。单凭事业的正义性，而不靠英勇的战斗去把它付诸实践，最后也必是一番空话，一事无成。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因为他们掠夺殖民地的强盗行径的非正义性而停止其疯狂罪行的；不然的话，何以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了呢？这种人们所谓的“一种可怕的真理”（an awful truth），在世界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在义和团运动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战场，即面向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的前线战场和面向拥有武器的外国教会和教民的内地战场。拳民英勇战斗的结果：在前线战场上迫使西摩尔统帅的八国联军在1900年6月16日公开承认，廊坊之战使“远征在事实上已经失败”。迫使联军在6月20日发表《大沽宣言》以消除那种“认为北部战事即表明帝国之逼近瓜分的这种疑虑”。一个在山东恩县庞各庄传教多年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congregationist）明恩溥（Arthur H. Smith）曾就西摩尔联军的失败一事写道：“这次试图援救（北京使馆）的远征军的戏剧性的事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不管它也许已经完成了什么别的冒险事业，反正它是永远地消除了那个经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论点，即是说，一小队外国军队，只要组织好了并且武装齐备，就可以在整个中国横行，长驱直入，不会遭到有效的抵抗。这次强行开辟通向北京路线的失败的重大结果就是，对许多军事权威们来说，他们都深信，如果没有一支足以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事故的庞大的野战军，如果没有足以抵抗中国人所能纠集到的任何部队进攻的基地来保持畅通的通讯联络的话，那么首都北京就是目前所不可能抵达的。当中国人被彻底唤醒起来并且在实际上以无限的数目倾巢而出的时候，过分相信外国处理中国人抵抗的能力，就会

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61页。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4、217页。

青柳猛（青柳有美）：《义和团赞论》，转引自王晓秋：《日本进步人士同情义和团的呼声》（见《北方论丛》1982年第4期，第103—104页）。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第114—115页。括号内“美国”二字系引者所加。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8页。

有损于我们对面临的困难作出许多比较正确的估价的能力。”

在内地战场上，拳民继承了以往数十年来反洋教斗争的战斗精神，在全国城乡各地展开了武装斗争，使那些多年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穷凶极恶、民忿极大的外国传教士和一伙为虎作伥的叛国教民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利用了一切机会去铲除了这些祸根”，使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基础倒塌了，即便还存在一些也都岌岌可危了。所以，列强之中中止瓜分中国，不是由于他们一时顿发善心，也不是由于他们侵略的非正义性而改弦易辙，而是由于他们面临拳民的英勇战斗在两个战场上失败以致不可能瓜分的结果。因为当时“中国是帝国主义者争夺的最大的一块骨头。每个强国都毫无例外地想对这块骨头咬上一口”。只要能瓜分，他们就是要瓜分的。把中国同非洲相比较，“南非亦如尼罗河谷一样，在这个‘帝国主义时代’中都只不过是插曲。盖过所有其他问题的大事是远东。中国已接替了土耳其的位置，成为杰出的‘病夫’”。如所周知，这些地方都已被列强瓜分殆尽，而比这些地方都更重要的中国，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却突然歇手了呢？正是由于拳民奋不顾身的战斗，才使得“瓜分中国的方案在几个欧洲列强的总理府中被扔到废纸篓里去了的”；才使得所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

再次，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乃是由于它是一次民族起义运动，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种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所镇压不了的。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史证明，它虽屡经镇压，却此起彼伏，更加茁壮成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它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性质的缘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它的这种性质就更明显了，规模也大得多了。因此，京津虽在1900年七八月份因清政府的背叛而沦陷，义和团运动也结束了它在发展中的高潮时期，但拳民的斗争并未中止，仍在顽强地继续着。帝国主义列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背弃前言，重操瓜分的老调，于是有10月份《英德协定》之不利用目前形势以图获得领土利益的声明。这是因为，在战斗中成千上万的拳民牺牲了，他们在活着的伙伴们眼中是“殉道者”，“在殉道的血液中难道不是有一种像长生鸟一样的力量（a phoenix-like power）吗？”“再说，军事示威能一直继续到所有现存的和可能出现的拳民都被斩尽杀绝为止吗？然而，又怎么能把中国的四亿人民都消灭光了呢？”“不管中国哪一部分领土被割去，都必需用武力来统治”，而“整个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去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早晚会在各地表现出民族情感的存在和力量。这样做上算吗？根据这个利害得失的简单理由，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应被宣告为完全无用的”。这就是代表英帝国主义者利益的赫德的看法。9月27日，联军统帅德人瓦德西在抵达天津后也认为：

培根：《译立科伯爵传》，第107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47页。

明恩溥：《动乱中的中国》第二卷，第443—444页。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一九〇〇年，第三八四件附件。

帕尔默·科尔顿《近代世界史》，1964年英文版，第649页。

泰勒著，沈苏儒译：《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38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12页。

《义和团》（四），第246页。

“世人动辄相语，谓取此州略彼地，视外人统治其亿万众庶之事若咄嗟可立办者。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如欲实行此下策，则后患又不可不防矣，然此似亦非易望者也”。1901年2月3日，瓦德西在其上德皇威廉第二的奏折中更认为，瓜分中国一事，“绝对不能实现”，且“系毫无益处之举”。他从这次拳民运动中看出“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中国群众“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生气”；在直隶、山东两省至少有10万人参加的义和团运动，其所以失败“只是由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E

正因为义和团运动不单纯是一个战争胜败的军事问题，而是一场规模壮阔的民族起义运动，所以即使在京津沦陷，它的高潮看来已经结束之际，帝国主义列强的代言人仍然认为瓜分是“完全无用的”、“毫无益处”的、并且是“绝对不能实现”的。所以，“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义和团运动以后，各国报纸再不喜讨论这个‘题目’了。”“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或涂红圈绿线于支那地图谋某地为某国势力范围之企图，亦未胆敢如前之猖獗耳”。这些就是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通过瓜分危机的缓解而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真实原因。这些也是那个香港英国贸易界重要人物怀特海德(Whitehead T.H.)于1901年2月8日所宣称，这个“被认为已经死亡了的巨龙现在仍然富有应变的才智”。他还说：“人们都知道，使用刀、矛等武器的人能够打败以后膛枪装起来的最好的正规军队，如果这个国家确实很顽强，如果以刀、矛为武器的人以十与一的比例超过他们的敌人的话”。“因此，不论是我们，还是任何其他强国，都不能长久地控制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基督教国家可以统治中国，因为它的人民每隔五年就挑起一次大屠杀(应读作发动一次反侵略斗争——引者)”。怀特海德这番话，不正是说明了在酝酿这场民族起义运动的反洋教运动初期中国的一位志士所说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的话并非空话，而拳民血战联军也产生了它应有的效果了吗？

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事实和道理，现在看来是十分明显的了。不过有的研究者却撇开义和团运动来谈这个问题，并把这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矛盾。例如，约瑟夫(Joseph P.)在他的著作中说：“自一八九四年以来，中华帝国崩溃的形势在政治范围内曾经是始终存在着的。瓜分不只一次地迫在眉睫；如果说瓜分被阻止了的话，那并不是由于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具有任何杰出的政治本领，也不是由于在中国的国家结构中具有任何组织特色。更正确地说，那只能归因于列强之间的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阻止了他们去达成瓜分中国的一致意见。”这是有名的列强矛盾阻

《中国和重建》(1900年11月)。见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111—112页。

同上书，第97页。

转引自佐原笃介等：《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三)，第244页。

《瓦德西拳“乱”笔记》，第141、143—144页。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98页。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6页。

怀特海德：《在华贸易的扩展》，转引自《“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第161、166页。

止瓜分中国说的论点。不过，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列强在瓜分非洲和奥托曼帝国的时候并非不存在竞争、猜忌和利害冲突等等矛盾，然而它们却终究被瓜分了，又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列强之间因瓜分世界而产生的矛盾，一般可凭协商解决，不可克服的矛盾则是可以用战争手段去解决的。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迟某个地区的瓜分过程，但不会影响到瓜分的最终目的。能阻止列强瓜分的基本上只能靠当地人民群众有效的武装斗争。在中国正是因为有了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和英勇战斗，才使得帝国主义列强“的确不可能像他们瓜分非洲那样去瓜分中国。他们更不可能像英国人接收印度和俄国人接收中央亚细亚那样去接收中国”。

再说，“天助自助者”。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强盛，主要在于自力更生。在中国当时面临瓜分亡国危机的形势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的奋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强瓜分中国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个徒然的、一相情愿的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一堆肥肉出现在一群豺狼面前，不管豺狼之间的矛盾是怎样的不可克服，这堆肥肉最后被掠光吃尽的命运是不问可知的。在义和团运动迫使中国瓜分危机的形势缓解以后，1904—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者还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而进行了战争。既然为了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那么为了瓜分中国领土，列强就不可能利用战争去解决他们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了吗？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说列强之间的矛盾曾经有助于缓解中国当时面临的瓜分危机的话，那么，它也是以义和团运动的全面爆发，拳民在各地的英勇战斗，杀敌致果为前提的，它只能构成一个伴随的原因（a concomitant cause）。没有义和团运动这个前提，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不管它是多么不可克服，也不可能缓解瓜分危机，只能加速和扩大中国的瓜分危机。1897年11月德军强占胶州湾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是一个再明显也不过的实例。

二、保存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

义和团运动既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它就相应地保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悠久的文化，使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文明古国得以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存在下来。这一点有些外国研究者看到了，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说：

“无论如何，中国在一八九四年在她同列强的关系上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一八四二至一八九四年的追求贸易的时期终止了。插进来的新的因素影响了中国的命运。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向全世界暴露了她在抵抗侵略上骇人听闻的软弱无能，并且引起了外国负责的政治家们的贪婪野心。此后，列强就忙于对中国的政治统治权和经济统治权的争夺。对华贸易问题再也不是他们唯一的和主要的关心的事情了。远为更加重要的利害关系问题乃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前途问题。究竟中国应该继续享有一个主权上的政治存在（to have a sovereign political existence）呢？抑或她应被列强所瓜分和并吞（to be dismembered and absorbed by powers）呢？这是一个难以预测其后果的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国的完整濒于危险的问题。世界的和平也包括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之中了。任何一个在列强中急于要保持其大国地位的国家，对于涉及到四百万

平方英里以上的领土的支配权，对于涉及到占全人类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的支配权，都是不可能掉以轻心的。这种情况严重地危及了欧洲国家之间的均势。

“不过，中华帝国随时有发生崩溃的危险，在文化方面（the cultural aspect）却比在政治方面更加重要。它涉及到全人类文化的命运。中国文明（Chinesecivilization）虽说在过去不曾大大地影响了那些不是她的直接邻居的人民，但是在将来它的影响可能很大，这是可以相信的。中国一旦遭受瓜分，就会消灭这种可能性，其结果是中国文明的中断，是由被同化了的中国人去替俄、法、英、日和其他文化集团增加一点东西。”这位作者可能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斯宾格勒（Spengler, O.）和汤因比（Toynbee, A.J.）等人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形态学派的影响，所以他在论述这个问题时着眼于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保存方面。实际上，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文明之保存乃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直接后果。义和团运动在这方面的功绩，一向被我们自己所忽略了；旁观者清，西方作者倒是把它明确地提出来了。

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本来是互相影响，彼此渗透，互相补充的。毋庸讳言，中国近代由于西方产业革命没有波及到中国，它是落在文化发展的后面了，但是，它是可以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的。正像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代表中国文化的四大发明，曾经有助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之结束一样，中国文化和文明在将来也是很可能对世界文化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在义和团运动中，英勇的拳民敢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号称“八国联军”的“挑战”（Challenge）作出“应战”（Response），就把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未开化的群体”，“一批没有活力的群众”，“一群没有民族热望的东亚病夫”，所谓中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是“一个垂死的国家”等种种诬蔑，一扫而光，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它的文化并未衰老，而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没有像挑战一样的应战，就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火花”。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挑战所作出的应战证明，中国文化和文明是有其生存的价值和权力的，而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和文明并借此得以保存，义和团运动的功绩是不朽的。

三、遏制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

1900年全面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如果说它曾经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就曾经相应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瓜分中国领土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如果说义和团运动不曾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话，那么，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后来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现在为了在全国范围内争夺我国领土当然更要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它们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了。不过，这时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多半不会是日俄战争，却很有可能是英俄战争；也有可能不只是两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以上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当然，也有通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27—28页。

费伊：《鸦片战争》，1975年英文版，第364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〇年列强对华外交》，第27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过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协商来进行和平瓜分中国的可能性，虽说这种可能性很难实现。

在中国面临瓜分危机的这段时期中，“剥去这段时期中的一切政治色彩以及威信和均势的虚构，这段时期暴露出一个赤裸裸的残酷的事实，即金融资本与各国政府之间的紧密结合。这段时期比起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来或许都会更加清楚地证明，列强是如何把它们权势和军事力量的全部压力施加于中国，以便强迫她把借款让与权、铁路让与权和矿产让与权给予那些私人银行和私人特许权获得者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既恫吓中国，又彼此恫吓，它们随时可以动员它们国家的人力、险些儿就要打起仗来了”。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正是在义和团运动前后，如 1898 年的美、西战争（the Spanish-American War），1899—1902 年的英、布战争（the Anglo-Boer War）已经表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殖民地的矛盾是可以，而且在事实上也是通过战争来解决的。

就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在华掠夺各种让与权的现势来看，我们可以说，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都毫无例外地要来中国掠去一块领土作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之间在让与权的争夺上都矛盾重重，寸土必争，互不相让。就中以老牌帝国主义者英国在华所取得的权利最大，势力范围也最广，同各国的矛盾也最多。特别是沙皇俄国利用俄法同盟所提供的金融资本，利用其邻近中国的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借口他在“三国干涉还辽”一事中曾有“大功”于中国，自 1895 年 7 月俄法大借款胜利以来，在对华让与权争夺战上，大有凌驾英国之势。到 1897 年 12 月沙俄军队强占旅顺口以后，英方就认为这是“瓜分中国的一个开端”，并“承认没有一次大战是不能改变旅顺口的情况的”。一时英俄矛盾，十分尖锐，很有可能走到战争的边缘。公开鼓吹英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柯乐洪（Colquhoun, A.R.）在他 1898 年出版的《转变中的中国》（China in Transformation）一书中主张要在中国同沙俄干一场，不能示弱；他说：

“三百年来我们同法国打仗，才逐步地建立起我们的帝国。难道我们现在就不敢正视俄国，而宁愿让我们自己第一次在中国被俄国所取代，然后终于被诺亚时代的大洪水所吞没吗？”

柯乐洪认为，当时形势的显著特点是：

“从现在起，在不多几年内，欧洲俄罗斯将与太平洋联结起来。它的西伯利亚将通过南满的辽东半岛而与满洲诸省结合起来。半岛的内地将横贯着铁路，丰富的矿产资源将得到初步的开发。旅顺口、大连湾和金州等为俄国所占有的战略阵地将保卫着这个内地并控制着内地的中国水道，绝对地支配着北京和北部中国。……第二阶段，俄国将支配蒙古，而西藏除非被英国阻止也将受俄国支配；如果这些事情实现，从中国的西北部直到扬子江盆地就没有救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要保持和绝对巩固它在扬子江盆地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617 页。

汤因比著，曹未风译：《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5 页。

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 417 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815、817 页。着重点系原书所有。

地位的英国来说，问题就非常严重，简直可以说是成了英国的生死问题了。……

“英、美、奥、德等国家已经到了必须研究远东变化的时候。考虑一下古代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帝国的历史是有道理的，因为历史正在重演它自己。俄国正在用现代的方法去征服成吉思汗帝国；俄国沙皇一旦作了中国皇帝，就行将代替这位鞑靼征服者，在欧洲、亚洲的东部、西部和南部各处进行烧杀了。”

就当时的世界形势和国内外的局面来说，一旦中国被瓜分，“最后征服者会自己争吵起来，一场战争将会发生，对失败者一方说来意味着灾难”。这样看来，中国人民如果不在义和团运动中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的斗争的话；那么，势必就会有一场正在酝酿中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战争出现；而在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之后，中国的命运除了被宰割瓜分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可说的了，也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了。能指望清政府吗？那是徒然的。诚如柯乐洪在同一本书中所称，帝国主义列强“自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结束以来，施加于清政府的，论外交越来越少，论暴力则越来越多。正如一个俄国官员所说：‘问题不在于中国给不给，而在于外国要不要’。——除了暴力以外，再没有别的了。”暴力只能用暴力对付。是中国人民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英勇战斗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同时也阻止了一场他们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通过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的爆发，同时也反过来有助于阻止列强瓜分中国。义和团运动相应地阻止了当时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理应受到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所重视。“西方也同中国一样，都应从义和拳运动中接受到一些教训。（中华）帝国自失败于日本之手以来所曾受到的绝对蔑视，已被一种比较健全的考虑所代替，这种考虑差不多达到了尊重的程度”。这样的评价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本身的功绩才导致的。

四、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醒

我们在前面曾经写过《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与《义和团继续坚持斗争——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等节，正是从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这个政治口号的变更上，我们看到了义和团运动曾经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醒。

如果我们把“顺清灭洋”、“助清灭洋”等等都看作是“扶清灭洋”这个提法的不同词句来看待，那么，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来正式提出，当始于1898年7月的余栋臣起义，并被后来的义和拳民起义所一致接受和广泛采纳。在义和团运动中，这个口号流行全国将近3年；到1901年6月，它才被深州联庄会起义的“扫清灭洋”的旗帜所正式替代。1902年4月至5月，景廷宾、赵三多领导的直隶广宗起义，就是在“扫清灭洋”的旗帜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两个口号中，都有“灭洋”二字，但含义因时间的不同而有异：前者主要指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后者则主要系指反对在中外议和过

转引自约瑟夫：《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一年列强对华外交》，第275、290—291页。

柯乐洪：《转变中的中国》，1898年英文版，第381页。

同上书，第377—379页。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第2卷，第93页，转引自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第15页。

程中，特别是《辛丑和约》中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及其大量赔款。无论前者或后者，“灭洋”二字都没有要从肉体上消灭洋人的意思。从1900年1月到5月31日以前，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发展很快，但在这段长时期内都没有一个外国人或外国传教士在直隶曾被拳民伤害过一事，便可为证。至于“扶清灭洋”口号的正式提出，它在当时是适应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认识水平，并且它在客观上也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因为当时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这个口号的提出有助于联合清政府的爱国官兵，共同抵抗外国侵略军，这已经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当然，这个口号有局限性，它使拳民丧失对清政府背叛义和团运动的警惕，因而在背腹受敌的形势下京、津沦陷。中国人民正是在义和团运动中，亲身经历了清政府的可耻背叛和出卖，亲身经历了中外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亲身经历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它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的事实，大大提高了觉悟，才最后打出“扫清灭洋”的旗帜的。

没有义和团运动提供的这些亲身经历，中国人民在当时是很难从“扶清”走向“扫清”的。为什么呢？鲁迅先生在讨论中国小说发展问题时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这个现象；他说：

“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拮据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如果我们在这里把“灭洋”作为反对列强瓜分中国来解释的话，那么孙中山作为一个“有识者”，早在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时就“已翻然思改革”，要“扫清灭洋”了。但是，对那些“尚啜茗听平‘逆’、武功”的广大中国人民，要他们“扶清灭洋”是可以的，让他们去“扫清灭洋”，却是比较困难的。由于义和团起义运动声势浩大，直接或间接受到它的影响的人民群众遍及全国城乡各地，加以它本身又同数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具有内在联系；所以这次运动就其波及面之广大和涉及人数之众多而论，恐怕都是首屈一指的。实际上，规模壮阔的义和团运动本身就是一所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学校。人民群众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要救国必须“扫清”的结论的作用，在当时是远比革命派宣传的“驱除鞑虏”更强大、更有效的。孙中山把1895年他们领导的广州起义与1900年的惠州起义曾经作过一次比较，使他吃惊的是人民群众对两次起义失败的反映竟然如此截然不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说：

“当初次（指1895年10月的广州起义——引者）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是庚子（指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引者）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

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把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提高到了“扫清”的新水平，那么，上述对比是不可能产生的。“扫清灭洋”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是义和团运动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醒的主要标志。

除此以外，义和团运动促进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醒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努力学习西方的思想已经变成“一般中国人的思想”，而不再像从前那样局限在几个“先进的中国人”的手中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经把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四人作为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他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孙中山认为：“自义和团以后，一般中国人的思想，时时刻刻，件件东西，总是要学外国。”“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这种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只要不流于孙中山所指出的那种“极端的崇拜外国”，“完全失去‘中国人的自信力，’”的情况，那么就应该被看作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一个比较普及的阶段。

由于受到当时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从今天的一些观点来看，义和团运动本身当然是免不了有若干缺点和弱点的。一方面，像这样大规模的起义运动，在任何时候都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另一方面，参加这一运动的中国广大城乡人民又是处于受压迫、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中刚刚觉醒过来的情况下，本身往往具有一些封建迷信的弱点。这些弱点和缺点，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只有在实际运动中”，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可喜的是，在1901—1902年的“扫清灭洋”的起义中，有关这类封建迷信的记载就很少了。生存下来的拳民，如祁子刚等人，还进一步发展到去参加辛亥革命的地步，可见他们的进步是很大的，也是很快的。“用列宁在一九〇一年所作的描述来说，列强已经‘像盗贼那样偷偷摸摸……像盗窃死人的财物’那样地开始瓜分中国了。可是，正如事变早已证明的那样，中国并没有死去，而行将死去的只不过是满清帝国罢了。巨人似的中华民族正在开始觉醒，从熟睡中觉醒得太慢是真的；利立浦特人（the Lilliputians）被绳索捆绑得太久了，他们是不大可能带着他们的绳索而立即昂首阔步地前进的”。

列宁指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义和团运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反映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代表了“亚洲的觉醒”并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12页。括号内的“中华”二字系引者所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52页。

《有志竟成》，《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175页。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25页。

《毛泽东选集》，第1474页。

《毛泽东选集》，第1474页。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24—725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6—77页。

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认为中国是“一群没有生命力的群众”（an inert mass）所组成，用不着害怕他们的“抗议和愤怒”因而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从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当然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阿Q精神”，而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来写成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光辉篇章。

但是，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光辉篇章的写成却是来之不易的。它是以拳民们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成千上万的生命牺牲来铸成的。可惜我们现在缺乏统计数字，只能从敌人的伤亡表上来作大概的估计。单从各地反洋教斗争敌方损失来看：“天主教的全部损失据报告为五个主教，三十一个欧洲司铎，九个修女和两个玛利亚会会员。中国天主教民被杀死或被困死的没有确切数字，但可能超过三万多人”。新教传教士的死亡数字不太可靠，估计为“一百三十四人或一百三十五人”，其中约有1/3为内地会传教士。新教中国教民的数字更加不准确，约为“一千九百十二人”。东正教也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在700个传教士和教民中，死者“在两百人和四百人之间”。除了为虎作伥的教民不计外，总括起来，外国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遇害的最多不到300人，按“十个人杀他一个人”的比例来算，拳民就得牺牲3万。实际上，“拳民死于教、死于兵、死于法，无不视死如归”，他们的牺牲何止此数。但是，他们诛戮的这些大部分都具有上至总督、巡抚，下至司、道、府、厅、州县官衔的传教士，就无异于除掉了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基础。没有这帮即熟悉中国国情，又在中国各地侵略多年，拥有一群为非作歹的叛国教民的支持的传教士，列强即便瓜分了中国，他们的统治也是会架空的。拳民们如果不借助于反洋教斗争来从根本上摧毁这个万恶的基督教殖民制度，瓜分中国的危机虽可缓解，但永远不能消除。

五、“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义和团运动不仅在当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了中国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和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醒，并且还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12月《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是这样地把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同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起来观察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功绩的。他在《讲话》中说：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

罗德津斯基：《中国史》第一卷，1979年英文版，第360页。按利立浦特是18世纪英国杰出的讽刺作家斯威夫特（Swift, J.）所著《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中的假想国。

《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8页。

施达格：《中国与西方：义和拳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第277页。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第513、517、519页。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二，第34页。

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半个世纪以前的义和团运动为什么会成为代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奠基石之一呢？这是因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运动，这些问题也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基础所必需加以正确解决的。

首先，1949年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以“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作为基础的，而义和团运动则是以作为斗争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成为这个胜利的奠基石之一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按即由此而划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引者）。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表明了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伟大胜利，作为这个胜利的奠基石包括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每一个发展阶段，而作为1900年标志着这个发展阶段的义和团运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50年后，即1949年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了。

其次，既然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发展阶段，但它又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农民革命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就抗日战争中的情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民主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根据毛泽东的看法，既然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的原故，尚可称为“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那么，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更加在“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了。农民的力量本来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之成为这个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当是无可置疑的了。

艾声：《拳“匪”纪略》。见《义和团》（一），第447页。

《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626页。

其三，由于义和团运动在其发展的高潮中突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的方面，并起到了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因此，它在“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中乃是一块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必要的奠基石。问题是十分清楚的。假定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不曾被义和团运动所阻止，中国一旦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以后，毫无疑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过程就必将根本改观。它首先得把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统治，终止中国的殖民地地位作为革命的第一个目标来抓。同时，由于中国被列强的瓜分所分割和分裂，各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又极不平衡。这些都会为中国革命增添许多复杂而难办的问题，会影响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貌大大地不同于如今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已经呈现出来的面貌。关于这个方面的实例，近代世界史上各殖民地保护国人民斗争的历史事实业已提供出不少典型的情况，我们在这里就不必去一一列举了。由此可见，义和团运动作为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的这块奠基石，乃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不可等闲视之的。

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自 1839—1842 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以来，就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学会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die Produktionsweise der Bourgeoisie sich anzueignen）；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这就是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不想灭亡”，而要抵抗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的话，他们就必需“学会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使自己具有近代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才能使国家民族免于灭亡，不致沦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如果我们对所谓“近代化”的目的和内容作上述这种解释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国近代化问题本身就是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需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东西来抵制他们的侵略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于 1843 年 1 月就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有名论点，它的意思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才能抵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16 年后，太平天国革命领导人之一的洪仁玕于 1859 年刊行了《资政新篇》一书，介绍了世界各国大势，提出了必须学习的当时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科学生产技术的立政方策。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清政府也由于“不想灭亡”而进行了 35 年的“洋务运动”。清政府当然主要地是不想灭亡在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之中，不过我们可以不妨假定它搞洋务运动多少也存有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图，虽说它曾一再声明那是“为防家贼”，非“御外侮”或“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的。因为洋务运动的成效在客观上毕竟要由它能否抵御外侮来考验，而不是仅仅由它的当事人说一声“非御外侮”就可万事大吉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它的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宣告，以清政府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来挽救“灭亡”的破产。自此以后，中国立即面临瓜分危机，那就不是偶然的了。

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真实历史背景。换句话说，义和团运动正是在以清政府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破产以后，中国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瓜分危机之下才兴起的。清政府搞了 35 年的洋枪洋炮，没有能挽救中国；如今瓜分危机迫在眉睫，不容许，也没有时间来让清政府再搞一次洋务运动了。洋务运动“自诩为畅行新法（意即近代化——引者），岂知所谓新法者，如百结之鹑衣，聊纫针请补缀耳；以视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 545 页。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685 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55 页。着重点系引者所加。

魏源：《海国图志叙》。

泰西之新法，渺乎沧海之一粟”。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 35 年来洋务运动的破产，其结果是，“利权兵权制造之权，駸駸乎及于用人行政之权，一以授之敌；无短篱之不撤，有一网而俱尽，直合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而亡之”。

所以，即便容许清政府再搞洋务运动，也是无补于危亡的。况且，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洋枪洋炮，北洋水师，比起日本的来，虽互有短长，可也并不十分逊色。为什么却连日本都打不过呢？可见，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问题，不仅在于物质方面的枪炮水师，还有精神方面的爱国主义觉悟、民族主义思想等等问题，而这些在“兵为将有”的、实行封建割据的腐败的清政府方面却是极端缺乏的。

因此，如果我们从历史背景这个角度方面来观察问题的话，那么在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问题上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事实便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第一次以其爱国主义觉悟和民族主义思想来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近代化精神的。正因为它具有近代化精神，所以有的西方观察家就认为：“义和拳”会，就其起源而论是爱国的，就其基本思想而论是可以证明为有理的”。孙中山说，义和团血战西摩尔联军，“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事实上，这些爱国拳民和官兵，只要拥有洋枪洋炮的话，他们就能沉重地打击侵略者，使帝国主义联军蒙受重大损失的。拳民在京、津的鏖战和大沽口爱国官兵对来犯敌军的迎头痛击都是明证。这样看来，中日甲午战争固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洋务运动的破产并不等于中国近代化的破产。因为以清政府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所谓中国近代化并不是真正的近代化。它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对近代化作出了极其片面的理解，并在以保持清朝封建政权为主要的目的下，“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的方向是同真正的近代化背道而驰的。洋务运动的破产就在于它对近代化的极端片面的理解，它不是真正的近代化，真正的近代化是能够挽救中国，使中国复兴的。

义和团运动不仅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近代化精神，尤为重要的是，它通过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和促进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醒的两大功绩，为中国人民今后实行真正的近代化保留了机会，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如果当时不曾爆发义和团运动，中国遭到瓜分而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的话，那么中国也还是不可能实行真正的近代化的。诚然，帝国主义者是要在他们的殖民地上修筑铁路、创办开采原料的工业企业的；但是，他们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殖民地的经济体系，使之成为宗主国的农业和原料附庸，而不在于要发展殖民地的经济，并使之近代化。下面我们可以看一看英帝国统治印度的典型情况：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第 290 页。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 43 页。

李提摩太：《西铎》（一），第 2 页。

谭嗣同：《思纬壹 短书，报贝元徵》。

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 4 页。

《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724 页。

“工业化的欧洲需要原料资源以及剩余资本和产品的市场。例如英国就曾向印度输出了大量的纺织品和资本，后者主要用于建筑铁路。到一八九一年，约有与英国本土铁路系统相等的一万七千英里长的铁路在印度建成。从一八九一年到一九一一年，印度铁路网翻了一番，建成三万三千英里，同一时期，英国本土只增建了三百英里左右。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这些铁路以及其他大的企业如灌溉工程、港口设备等等都是由英国资本来负担它们的费用的。换句话说，在印度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以前，她不曾发展她的经济和增加她的出口。早期印度经济这样的发展是英印关系促进的。但是，要点在于、它不仅促进、并且也修改了印度经济的发展，到后来还使这种发展归于无效。英国纺织品太便宜了，如今能够通过铁路系统而分配给印度全国，从而毁灭了印度本地的手工业者，正如在一个世纪以前它们曾经毁灭过英国手工业者一样地无情。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别。那时英国手工业者可以到城市里那些像雨后春笋般猛烈增加的工厂里去作工；而印度手工业者却没有地方可去，因为在他们的城市里没有出现工厂。英国人当然是根本不愿意在印度去建设一个同自己竞争的工业机构的。他们宁愿让印度经济来补充他们自己的经济，而不愿让印度的经济去同他们的经济竞争。这样，印度就向英国提供原料，回过头来又接受英国机器制造的产品和建设企业的资本。

“这是一个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安排，但对印度人民却影响深远。印度人民在传统上是通过农业和手工业来谋生的。如今，手工业者虽被迫削价谋生，却找不到生活来源的替换物。农民也不是没有触及到，因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卷进了替英国工厂生产黄麻和其他商品。这就是说，他们再也不是仅仅喂养他们自己和附近城镇的人民了。如今，他们已是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受到世界经济市场波动和危机的影响。欧洲在引进医药科学和保健措施方面也基本上影响了印度，结果是人口急剧增长。这事也同样发生在欧洲，但欧洲的数百万人口却可以去到城市和海外，而印度人则两方面都不能去。因此，纯结果就是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停止。

“那时，新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地区冲击的性质就是这样。印度是被用来作为这种冲击的一个例证的，在其他地区也同样是这个普遍的模式，虽说也往往带有地区性的变化。应该记住这个模式，因为它可以说明今天全世界为什么会被分为发达的世界和不发达的世界的理由，可以说明在这两个世界的生活水平上如此骇人听闻的差别为什么竟占有压倒的优势的理由，还可以说明这个不发达世界的人民为什么在他们取得政治独立以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变成发达的——尽可能快地达到西方经济水平的理由。”

印度经济那时作为殖民地经济的模式说明，它虽然被拉进了近代化的世界经济，但它本身并没有近代化。殖民地化与近代化完全是两码事，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否则，由绝大多数是当年殖民地组成的今天的第三世界，为什么其中没有一个成为发达的国家了呢？近代化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政治的独立。殖民地是没有政治上的独立的，根本谈不上近代化的问题。我们之所以原原本本地引述上面关于印度经济的模式这段文字，就为的是说明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关系到我们对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根本上的评价问题。比如说，有一种看法经常下意识地或者片面地强调和夸大拳民们某些迷信活动的外壳而忽视其练习拳艺武术、保家卫国的合理内核以后认为，义和拳起义乃是“中国反对进步的历史中的一个事件”（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sistance to progress)。这种看法似乎要着重说明一个问题，即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反对进步的”势力存在的话，中国就可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进步会更快一些。否则，为什么它们总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义和团的迷信外壳问题上大作文章，纠缠不清，而忽视或者根本不承认义和团运动曾经起到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主要作用呢？如果不就近代印度经济的模式来对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关系作出一个明确的说明，那么，上述那种对义和团运动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始终会是若明若暗，时隐时现，得不到一个正确的解决途径的。当然，义和团运动不是没有缺点，我们这样来看它的主流不过是“识其大者”罢了。

就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来看，我们之所以说它为中国人民今后的近代化事业保留了机会，创造了条件和开避了道路，乃是由于：它一方面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使中国避免了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觉醒，加强了一般中国人要学外国的思想，去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原故。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它在政治上也同殖民地一样并不独立，虽说在程度上它们之间有所不同，加以清政府的腐败和继之而起的北洋军阀的混战，使近代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历尽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些事情是不能由义和团运动来负责的。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反对进步的历史中的一个事件”。由于它同中国近代化事业具有上述的密切关系，我们只能说，义和团运动乃是促进中国进步的历史中的重大事件。

结束语：从义和团运动看人民群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

本书从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状况，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其发展，以及义和团与爱国官兵血战联军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等三个大的方面、分成上、中、下三编，按照年代顺序来依次地论述了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它在实质上是一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中国的瓜分危机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

义和团运动是在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瓜分危机，在他们早已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和统治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这个名称来自义和拳，义和拳则是 18 世纪 70 年代前后出现于山东冠县一带冀、鲁、豫边区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的名称。到 19 世纪末叶，在 1898 年中国人民为反对第二次瓜分危机的斗争中，赵三多和阎书勤等人于 10 月领导了以“顺清灭洋”为旗帜的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由于瓜分危机、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义和拳起义在各地得到了普遍的支援和广泛的响应，并得到了一部分爱国官兵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自己也就把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以便迅速壮大自己和扩大影响。一时许多爱国的民间组织和个人，都纷纷参加到义和团中来，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斗争，进行了练习拳艺武术的保家卫国的活动。1900 年 5 月底，6 月初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的全面爆发，乃是帝国主义列强首先发动侵略战争，瓜分危机空前严重的结果。

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通过拳民与爱国官兵的英勇斗争，曾经使空前严重的瓜分危机得到了三次缓解。由于义和团运动是一次正义的、充满着英勇战斗精神的民族起义运动，所以它就能通过瓜分危机的三次缓解而最终起到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巨大作用。在那个帝国主义为所欲为的时代里，义和团运动竟然能够阻止他们瓜分中国，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它毕竟是事实，这就是人民群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作用问题，我们有必要在这里谈一下。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由人们自己创造的。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Die Menschen machen ihre eigene Geschichte），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什么是历史？恩格斯说：历史就是人们“按许多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在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所直接碰到的既定条件就是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按照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愿望和逻辑，他们既然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进一步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为他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这就是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外国教会侵略顿形加剧，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瓜分危机日益迫近的原故。爱国的中国人民本着他们使自己的祖国免于侵略和不遭瓜分的正义愿望，才掀起了不断的反洋教斗争和规模壮阔的义和团运动，从而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事实证明，“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而不是

斯塔夫里扬诺斯：《一五〇〇年以来的世界史》，第 237—238 页。

珀塞尔：《义和拳起义背景研究》，第 7 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603 页。

帝国主义列强；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提法在下述两个意义上看来都是正确的。

第一，所谓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的人们是泛指所有的男男女女。这就是说，人民群众是包括“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它既包括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包括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领袖人物来自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在义和团运动中，广大爱国群众被组织在一种自觉自愿的义勇军队伍之中，从中涌现出了赵三多、阎书勤、朱红灯等领袖人物，而大量出现的则是以“大师兄”名义进行各种活动的无名英雄，他们同拳民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

第二，如果一定要在人民群众和个人之间加以分别的话，那么，恩格斯早已指出：“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就是说，创造历史，需要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整个阶级都行动起来；这样的行动才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可以超越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个别人物的极限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在差不多跨越整个19世纪下半个世纪，几乎遍及全中国各省和各地区、大小教案共达400余起之多的反洋教运动中，要由个别英雄人物来领导这样一个运动乃是根本不可能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它的个别领袖牺牲不少，但运动不因此而稍形挫折，反而在发展的道路上茁壮成长。这就是说，反侵略、反瓜分的爱国主义思潮已经使广大人民群众，使整个中华民族，使遍布中华大地的整个农民阶级都行动起来了。它决非“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如果把反洋教运动加在一起，那么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就是它在当时所能引起的“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在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人民亲自上场了，决定了列强不能在中国上演瓜分的戏。那种把人民群众的作用仅仅归结为“舞台”的作用，不能决定演什么戏和哪些角色上场的看法显然是不妥的。毕竟，“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扩大了群众队伍所进行的持久行动，它的力量是伟大的。

决定历史结局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甚至“当义和团的抵抗从根本上被破坏的时候，运动已经显示了中国人民抵抗外国侵略的伟大潜力，并使瓜分的前景成为不可思议的了；因为瓜分需要展开一个反对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没完没了的斗争，这也就是义和团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即使瓜分，“那么这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4页。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年3月27日），《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35页。

黎澍主编：《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5页。

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5页。

参阅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春阳：《也谈马列主义关于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和黎澍：《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6月30日，等文。按这种“舞台”作用说，既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原理，也不符合一般人的看法。一般看

样一种瓜分也只能是昙花一现”，长不了的。义和团作为中国人民群众的爱国起义运动来说，“在其实践所达到的目的上，它使中国将来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真正的成员国的地位成为可能的了”。它的“影响是如此重要，如此深远，以致当时没有人能理解这些影响，更不用说去充分正确地判断它们了”。中国人民群众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某些帝国主义者是体验到了的。赫德据此看出：“到公元两千年的时候，中国必将是非常之不同于一九〇一年的中国的！”如果我们不以人废言的话，那么，赫德这句话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还是具有相当的理解的。“人民群众的武装起义保全了帝国的领土完整，它们使外国列强慑于群众起义，特别是在经历了义和团起义的恐怖以后，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希望”。

在中国近代史上，代表中国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精神的义和团运动是源远流长的，它是在数十年来反洋教运动不断失败中茁壮成长起来的。义和团运动本身虽在清政府的叛卖下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军的镇压下结束了它自己的高潮时期，但斗争却坚持下去，并在对清政府的认识上迈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在1901—1902年景廷宾领导的广宗起义中，原来在1898年10月领导义和拳梨园屯首义的赵三多也前往参加，但旗帜已经不是“扶清灭洋”，而是“扫清灭洋”了。在“扶清灭洋”下，载活“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如今，在“扫清灭洋”的旗帜下，中国人民就不再作为臣民同清政府发生关系，而是要革清政府的命了。这样一来，清政府的寿命就屈指可数的了。它在9年以后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难道是偶然的吗！美国史学家克莱门茨在他1915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著作中说到：

“为历史上这段使人神魂之颠倒的时期（this fascinating period of history）的文献提供一本补充的著作，用不着作任何辩解。当这个反对外部世界的惊人义愤表现（exhibition of wrath）的情况和结果被充分地研究和评价的时候，人们一下子就能了解，义和团运动是怎么为当时的评论家们事先所完全没有预见到的，它使中国从多少世纪以来的沉睡中惊醒了，它使一个拥有巨大内在能量的民族的历史和政治革命化了，它造成了今天事实上在远东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背景和原因，也造成了那难以预言的这些重大事件的最后的根本倾向。”这就是说，义和团爱国运动乃是“构成

法是：整个世界是舞台，而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演员。诗人莎士比亚曾在《皆大欢喜》一剧中通过流亡公爵的从臣杰奎斯之口说过：“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全都是演员”（《皆大欢喜》二幕七场，第139—140行）。演员是包括人民群众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说没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提法，但他们具有这个思想是显然的，不能因其没有这一具体提法而否认这个唯物史观的原理。正如我国前人所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注疏》，见《十三经注疏》下册，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2735页）。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罗德津斯基：《中国史》第1卷，第385页。

珀塞尔：《义和拳起义背景研究》，第271页。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16页。

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文集》，第49页。

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65—666页。

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主张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在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之间，中国国内最重大的事件”来看待的人实际上是深深懂得人民群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历史作用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是信而有征的。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2页。按载溆即光绪帝。

克莱门茨：《义和拳“叛乱”》，第7页。按本书作者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自己祖国的愤怒比喻为希腊诗人荷马所著《伊特亚特》史诗中的英雄“阿基里斯的义愤”（thewrathofAchilles）的。

附 录

一、大事年表

1517 年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	葡萄牙人安刺德率船八艘到达广东东莞，下碇屯门，近代西欧与中国交通，此为嚆矢
1582 年	明神宗万历十年	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至澳门，翌年在广东肇庆设立第一个天主教堂。
1689 年	清圣祖康熙二十八年	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1723 年	清世宗雍正元年	始禁天主教，命将各省西洋人送往澳门，改所建天主堂为公所。
1779 年 1 月 12 日	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清代官方档案中，首见“义和拳”之名。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王伦起义与川楚白莲教起义以后，义和拳以与白莲教有关，屡经清政府查办，很可能拳民们在十九世纪初叶白莲教起义失败以后，就逐步地把“义和拳”的名称改为“梅花拳”。
1839 年 9 月 4 日	清宣宗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九龙之战，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1842 年 8 月 29 日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为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之始，包括割让香港，五口通商，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协定关税等。
1843 年	道光二十三年	中英继续订约，包括了作为治外法特权的领事裁判权，值百抽五的进出口货物税率与最惠国条款等。
1844 年	道光二十四年	中美《望厦条约》与中法《黄埔条约》相继签订，允准外人在商埠设堂传教，批准天主教弛禁。
1856 年	清文宗咸丰六年	广西西林教案，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原因之一。
1858 年	咸丰八年	《天津条约》签订，包括了所谓“传教宽容条款”，允准外人自由进入内地传教。
1860 年	咸丰十年	《北京条约》签订，在中法《北京条约》的中文本上，被塞进“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规定。
1862 年	清穆宗同治元年	南昌教案。

1870 年	同治九年	天津教案。
1873 年	同治十二年	四川黔江教案。
1884 年	清德宗光绪十年	在中法战争中云南发生了永北厅教案。
1890 年	光绪十六年	四川大足教案，余栋臣初次起义。
1894 年	光绪二十年	
3 月 1 日	一月二十四日	中英在伦敦签订《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
8 月 1 日	七月一日	中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9 月及其后	八月及其后	英教士李提摩太提出变中国为英国殖民地的计划。
11 月 24 日	十月二十七日	孙中山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
1895 年		
1 月	十二月	沙俄《新闻报》叫嚣由俄、英、法三国瓜分中国。
4 月 2 日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八日	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在柏林向德国政府提出瓜分中国的方案。
4 月 17 日	三月二十三日 中日	《马关条约》签订，承认朝鲜独立，割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日人得在中国口岸设厂制造。
4 月 23 日	三月二十九日	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政府放弃辽东半岛之占领。
5 月 2 日	四月八日	康有为“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主张。
5 月 8 日	四月十四日	美驻华公使田贝向国务院提出十九条建议，要求把中国置于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之下。
5 月 28 日	五月五日	四川成都教案，波及十余州县。
6 月 20 日	五月二十八日	中法在北京订约，续议商务界务，法国铁路可自越南延伸入中国境内。
6 月以后	五月以后	台湾军民展开了反对割台的抗日斗争。
7 月 6 日	闰五月十四日	中俄订立四厘借款合同，由俄法合借四万万法郎。
8 月 1 日	六月十一日	福建古田教案。
8 月	六月	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强学会。
9 月 26 日	八月八日	德皇威廉第二为了制造侵华舆论，命人绘制由他设计的所谓《黄祸图》；今日以其图送致沙皇尼古拉第二。
10 月 26 日	九月九日	孙中山拟于今日举行广州起义，因故延期，次日陆皓东等被捕，未及发难即遭失败。
11 月	九月	法国“里昂赴华贸易考察团”来华，在云南、四川、两广、贵州等省调查资源，

12月	十月	其报告书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发表。 英国汇丰银行与德国德华银行组成德英银行总会。
12月10日	十月二十四日	华俄道胜银行在圣彼得堡成立。
是年		美商成立华美启兴公司
1896年		
1月15日	十二月一日	在伦敦签订了关于川、滇协议之《英法声明》。
	光绪二十二年	
3月1日	一月十八日	阿杜瓦之战，意大利侵略军被埃塞俄比亚人击败，后订《亚的斯阿巴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为独立国。
3月20日	二月七日	清廷设立邮政，以总税务司赫德兼总邮政司。
3月23日	二月十日	订立英德借款一千六百万镑。
3月27日	二月十四日	以俄皇尼古拉第二加冕，出使俄、英、德、法、美五国大臣李鸿章于本日自上海启程赴俄。
4月	三月	美传教士林乐知等编辑的《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八卷在上海出版。
6月3日	四月二十二日	李鸿章与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莫斯科签订《中俄密约》。
6月4日	四月二十三日	所谓三百万卢布的李鸿章基金《议定书》于本日“给李鸿章过目”。
6月中旬	五月上旬	苏、鲁、豫、皖边区人民即大刀会众在刘士端的组织领导下发动反洋教起义。
9月8日	八月二日	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于柏林签字。
10月11日	九月五日	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使馆诱捕，在康德黎援救下于10月23日获释。
1897年年初	光绪二十三年	英意合办之福公司在伦敦成立。
2月4日	一月三日	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在北京签字。
3月15日	二月十三日	法使施阿兰强迫清政府同意海南岛及对面广东海岸不割让予他国，这事被看作是中国的第一件“不割让声明”，成为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先声。
5月27日	四月二十六日	《卢汉铁路借款合同》在武昌签字，借款四百五十万金镑。
		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开业。
6月12日	五月十三日	法国取得从越南筑铁路至昆明和在滇、桂、粤三省开矿的特权。
11月1日	十月七日	巨野教案。

11 月 14 日	十月二十日	德海军强占胶州湾，造成所谓“瓜分中国的信号”。
12 月 15 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	俄海军强占旅顺口，造成所谓“瓜分中国的开始”。
12 月 18 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	德皇威廉第二派亨利亲王率舰队来华，并在基尔发表演说，对中国要“用铁拳打进去”。
1898 年年 初	光绪二十四年	英国银公司成立。
1 月 22 日	一月一日	英驻俄大使欧格讷就瓜分中国问题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进行谈判。
1 月 24 日	一月三日	康有为上《抗论德据胶州、亟宜变法自强折》，称“发愤维新，或可图存”；否则清帝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英军总司令吴士礼公开宣称，英军业已作好“充分准备”，以应付“战争突然爆发”。
1 月 25 日	一月四日	英首相索尔兹伯里照会沙俄，建议整个亚洲可以从土耳其的亚历山大勒达划一条线直到北京，线以北属俄国势力范围，以南属英国势力范围。沙俄认为没有必要把亚洲最好的一半放弃给英国，避开了这项建议，一时英俄危机达到高峰。
1 月 29 日	一月八日	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三条变法主张，认为“维新有图，虽不敢望自强亦庶几可以自保”。
2、3 月间	正、二月间	直鲁交界各州县，以谣言来有洋兵，拳民们会聚“亮拳”，“梅花拳”恢复了“义和拳”的名称。
2 月 4 日	一月十四日	清廷批准印造“昭信股票”一百万张，预计发行一万万两。
2 月 11 日	一月二十一日	英使强迫清政府声明不以长江流域割让或租借他国，造成所谓“瓜分之局已成”的形势，这种势力范围的划分，是对中国进行“活体解剖”。
2 月 20 日	一月三十日	樊国梁受任北京天主教大主教。
3 月 1 日	二月九日	订立英德续借款一千六百万镑。盖德润在伦敦中国协会宣称，2 月 11 日的“不割让声明”是英国对于长江流域的保护权。
3 月 6 日	二月十四日	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字。

3月27日	三月六日	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字。
4月9日至10日	三月十九日至二十日	中法交换《滇越路及广州湾等事来往照会》。
4月14日	三月二十四日	驻美公使伍廷芳与华美启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四百万镑。
4月21日	闰三月初一日	广西永安教案。
4月22、24日	闰三月二、四日	中日交换《福建不割让来往照会》。
4月27日	闰三月七日	直隶大名府义和拳发布反帝揭帖。
4月	。	德国外交大臣比洛在帝国议会上说：“瓜分中国的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严复译述的赫胥黎名著《天演论》出版，他在《自序》中说，译述此书目的在于“自强保种”，“讨论国闻”，籍明“审敌自镜”之道。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以图干扰维新运动
5月1日	闰三月十一日	美国和西班牙海军战于马尼拉。
5月2日	闰三月十二日	英军强占威海卫。
5月4日	闰三月十四日	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发表演说，谓中国为“垂死的国家”，十天后，即5月13日，英殖民大臣张伯伦演说，称“中国问题”为英国“生存将受到本世纪初拿破仑企图阻止英国贸易以来所未受到过的威胁”。
5月7日	闰三月十七日	对日赔款在伦敦全部交清。
5月22日	四月三日	义和拳出传单于直、豫、苏各省，欲与洋教为难。
6月9日	四月二十一日	中英订立《展招香港界址专条》。
6月11日	四月二十三日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
6月15日	四月二十七日	以荣禄署直隶总督，统北洋三军（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军）；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嗣后授二品以上大员均须向慈禧太后谢恩。
6月30日	五月十二日	山东巡抚张汝梅奏称，将义和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改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铃束”。
7月3日	五月十五日	四川大足县龙水镇余栋臣再次起义，提出“顺清灭洋”口号，捕获传教士华芳济于荣昌河包场。 中英签订《租借威海卫专条》。

7月15日	五月二十七日	设立京师大学堂。 上海人民反对法国扩大租界的斗争。
7月	六月	广西梧州等地会党起义。 兴中会员谢缙秦绘制《东亚时局形势图》，以警世人。
8月13日	六月二十六日	美舰队攻占马尼拉。
8月21日	七月五日	英国向清政府提出修筑天津至镇江，山西经河南至长江沿岸，九龙至广州，浦口至信阳，苏州经杭州至宁波等五条铁路的要求。
9月2日	七月十七日	英、德在伦敦签订瓜分中国铁路范围的协定。
9月21日	八月六日	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幽禁光绪帝于瀛台。史称“戊戌政变”。
9月28日	八月十三日	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清政府杀害。
9月30日	八月十五日	英海军少将贝思福到香港，开始到中国各地考察，于1899年1月9日离沪回国，写成《中国的瓦解》一书，轰动一时。
10月1日	八月十六日	各国驻华公使召军前来北京卫护使馆。10月9日，以英、德、俄派兵入京自卫使馆，命出使大臣向各国外部商明撤回。
10月10日	八月二十五日	中英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及《南票矿务合同》。德国成立山东矿务公司。
10月26日	九月十二日	赵三多、阎书勤等在直鲁边区冠县梨园屯蒋家庄马场发动首次义和拳武装起义，树“顺清灭洋”大旗。
11月9日	九月二十六日	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在伦敦谈英国对华政策时说道：列强之间“关于究竟谁来充任丧失了原来地位”、并且在衰亡中的“国家的继承人”的斗争是战争的原因；“战争的话题在各方面都极其流行”。
11月28日	十月十五日	湖北长乐县哥老会领导反洋教起义，传教士董若望被杀；他们专以“灭洋攻教”为名，宜昌震动。
11月		日本成立东亚同文会，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民的民族发展强行全面控制的计划之开始”。 湖北西南江湖会开展反洋教斗争。 贵州重安堡教案。

12月5日	十月二十二日	美总统麦金雷向国会提出年度咨文称，中国沿海若干领土已在列强控制之下，美军舰已停泊天津，准备必要时采取行动。
12月7日	十月二十四日	清政府从荣禄奏，分聂士成、董福祥、宋庆、袁世凯所部为武卫前、后、左、右四军，分驻芦台、蓟州、山海关、小站，另自募中军万人，驻南苑。
12月19日	十一月七日	余栋臣起义军拒抚，进军铜梁、荣昌。
12月22日	十一月十日	上海广学会召开十一届年会，李提摩太在会上说，要明告中国官吏绅士，“阐明救世教（即基督教）之真谛，俾知教化之与政治，息息相关”。
是年		山东黄河漫溢、寿张、郓城、历城、济伯、东阿、东平、肥城、长清等县受灾甚重，江苏淮、徐、海等属，安徽凤、颖、泗等属大水。此外，直隶玉田县，陕西甯、羌各州、韩城等地，河南滑县，四川资州，新疆吐鲁番至乌鲁木齐一带，均被水成灾。东北人民和山东人民展开反对俄租旅、大，德租胶州湾和英租威海卫及列强修筑铁路的斗争。
1899年		
1月3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	清廷命各省将军督抚均著兼总理各国衙门事务大臣。
1月7日	十一月二十六日	皖北涡阳饥民在刘朝栋、牛世修领导下起义，14日陷义门集，群众纷起响应，众至二万余。
1月		余栋臣起义及湖北长乐哥老会起义失败。
2月1日	十二月二十一日	英国银公司与华美启兴公司签订协议，瓜分两国金融资本在华权益，分享他们在华取得的让与权。
2月5日	十二月十五日	俄军在旅顺枪杀抗议征收地税农民，94人被杀，123人受伤。
3月1日	光绪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美使康格向国会建议租借大沽口，以直隶为势力范围。
3月2日	一月二十一日	意大利要求租借浙江三门湾，为清政府所拒。
3月14日	二月三日	清政府以毓贤为山东巡抚。

3月15日	二月四日	清政府发布授予外国传教士官衔的上谕。
3月29日	二月十八日	德军占山东日照县城,并于31日分兵进占沂州府。
2月至3月	一月至二月	朱红灯率拳众自山东长清转移至茌平,“设厂授徒”,三个月内,“茌平县治八百六十余庄,习拳者多至八百余处”。
4月2日	二月二十二日	德军在山东兰山县撵逐居民,焚烧房舍。
4月15日	三月六日	广东九龙人民在大埔墟武装狙击英军接管九龙,有二千五百人在上涌与英军激战。
4月28日	三月十九日	英俄在圣彼得堡签订了关于瓜分在华铁路让与权的协定,长城以北归俄,长江流域归英。
5月8日	三月二十九日	上海公共租界自一千五百英亩扩展到五千五百八十四英亩。
5月12日	四月三日	清政府照会英、俄公使,英俄瓜分在华铁路的协定不得作为中国允许之据。
5月17日	四月八日	赵三多自1898年10月领导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后,今日又在直隶正定大佛寺召开会议,筹备再起义。 清政府以意大利兵船至吴淞,将强索三门湾,命江督刘坤一及浙抚刘树堂戒备,至本月31日,意政府放弃三门湾要求。
5月21日	四月十二日	命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刚毅前往江南一带清理关税、厘金,盐课。
5月		山东巡抚毓贤出示改义和拳为义和团。翼州一带拳首王庆一在枣强攻打教堂,“出入衙署”。
6月15日	五月八日	福建建宁府人民暴动,焚毁英教堂。
6月21日	五月十四日	江西南昌发生反教会起义,并宣布在26日那天把所有的洋人都驱逐出城外。
6月22日	五月十五日	云南蒙自群众烧毁了法国领事馆。
6月		山东高密县人民反对德国强筑铁路,被德军枪杀二十余人。 议结山东沂州教案,赔款四万七千八百二十两。
7月20日	六月十三日	康有为在加拿大域多利成立“保皇会”,自任会长,以梁启超、徐勤为副会长。
8月		厦门发生反日暴动。 昆明发生反法暴动。
9月6日	八月二日	美国务卿海约翰行文驻英、法、德、俄

10月2日	八月二十八日	等国大使，提出所谓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上海《北华捷报》第一次出现了义和拳的英文名称 Boxers。
10月11日	九月七日	朱红灯领导义和拳在山东平原迎战捕役，是为“冈子李庄之役”树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击败官军。
10月11日以后至18日以前	九月七日以后至十四日以前	义和拳自己改名为义和团。
10月18日	九月十四日	朱红灯领导团民在平原森罗殿激战清军。
10月21日	九月十七日	南非爆发英布战争。
11月16日	十月十四日	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
11月21日	十月十九日	朱红灯于博平花园寺被捕，于12月26日左右被毓贤杀害。 清政府谕各省督抚，称“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必须同心协力”，“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
12月5日	十一月三日	美使康格要求清政府撤换山东巡抚毓贤；6日以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法使毕盛要求清政府撤换两广总督谭钟麟；19日以李鸿章署两广总督。
12月12日	十一月十日	直隶总督裕禄批准刷印吴桥县令劳乃宣所辑《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会衔示禁。
12月18日	十一月十六日	武修和尚在直隶景州朱家河教堂之役中被诱捕，于一九〇〇年一月初遇害。
12月22日	十一月二十日	孙中山在《支那现势地图跋》中沉痛叹息“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
12月30日 是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英传教士卜克斯于山东肥城与乡民互斗丧生。 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发生旱灾。在一八九九年一整年中，并继续到一九〇〇年，各省均有群众起义之事发生，外国教堂在每个省份里都受到攻击。

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敦煌莫高窟石室藏经亦于本年七月二日为道士王圆篆所首次发现。

1900年

- | | | |
|-------|------------|--|
| 1月11日 | 十二月十一日 | 清廷发布上谕称“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叠出”，以此“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这是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基本方针。 |
| 1月24日 | 十二月二十四日 | 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儀为大阿哥，准备废立光绪帝，史称“己亥建储”。 |
| 1月27日 | 十二月二十七日 | 英、法、美、德、意等国联合照会清政府，以11日诏文含译，再次要求取缔义和拳。 |
| 2月1日 | 光绪二十六年一月二日 | 山东高密群众围攻德国铁路公司，相持数日，并破毁铁路，至14日德军扬言要以武力镇压。 |
| 2月14日 | 一月十五日 | 清廷命闽、浙、粤各省悬赏十万两，严拿康有为等，并毁其所著书籍。 |
| 2月 | | 义和拳发展至天津城厢内外。 |
| 3月13日 | 二月十三日 | 帝国主义列强在渤海举行海军示威，显示要用武力干涉中国。 |
| 3月14日 | 二月十四日 | 清廷以毓贤为山西巡抚。 |
| 3月20日 | 二月二十日 | 德国《柏林邮报》转载上海《德文新报》抗议英国报纸传播极不可信的谣言，以影响中国股票的价值。 |
| 3月21日 | 二月二十一日 | 河间府任丘县拳民败清军梅东益部于梁召镇。
中德在青岛签订《胶济铁路章程》和《山东华德矿务公司章程》。 |
| 4月 | 三月 | 义和拳发展至北京城乡各地；在东单裱背胡同于谦祠内出现第一个义和团坛口。
义和团在北京发布《最恨和约》等揭帖。
义和团在天津贴出《只因鬼子闹中原》等揭帖。 |
| 4月6日 | 三月七日 | 英、美、德、法公使照会清政府，限两月剿除义和拳，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直、鲁两省，代为剿平。 |
| 4月21日 | 三月二十二日 | 清苑教案 |

5月2日	四月四日	赵三多在直隶枣强县卷子镇发动第二次起义，既反教会，又对富户进行“均粮”斗争。
5月11至12日	四月十三至十四日	直隶涞水高洛村义和拳飞帖邀请定兴、新城、涿州、易州、涞水各州县拳民，攻打该村教堂。
5月19日	四月二十一日	天主教主教樊国梁致函法使毕盛，谓形势严重，请求派兵保护教堂。
5月20日	四月二十二日	公使团会议，提出调兵来北京。
5月22日	四月二十四日	拳民在涞水县石亭镇击毙清军副将杨福同。
5月27日	四月二十九日	义和拳进占顺天府涿州城，又烧高碑店长辛店铁路车站。
5月28日	五月一日	义和拳焚毁丰台车站。 义和拳为“保护中华，驱逐洋寇”发布告白，使“中原各省集市村庄人等知悉”。列强驻华公使开会，决定调卫队护馆，德使克林德认为“这些行动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5月29日	五月二日	芦保铁路洋工司倭松等四十一人于今日自保定乘船赴津，31日遇拳民于雄县，舍舟登陆，于6月4日至津，失踪9人，受伤者23人。
5月30日	五月三日	赵舒翘、何乃莹上奏清廷，认为义和拳“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
5月31日	五月四日	英、俄、美、法、日、意等六国军队四百余人到北京，使他们的公使具有“完全不受约束”的“处理事务的自由”。
6月1日	五月五日	英传教士二人在顺天府永清县以民愤被杀。
6月2日	五月六日	是日晚拳民在独流镇围攻来犯之沙俄哥萨克兵。
6月3日	五月七日	德、奥两国军队八十余人到北京。
6月4日	五月八日	派赵舒翘，何乃莹去涿州招抚拳民；6月又加派刚毅前去。天津义和团张贴《警告国闻报》揭贴，要驱逐洋人，“免被割据逞奇能”。
6月5日	五月九日	帝国主义侵略军六百余名入卫天津租界。聂士成军在高碑店伤毙拳民多人。
6月6日	五月十日	聂士成军在廊坊、落堡一带镇压义和拳，拳民烧毁落堡车站，京津铁路中断。
6月7日	五月十一日	刚毅离京前往涿州，8日在窦店与赵舒翘、何乃莹会合，商定由赵先行回京汇

		报，刚毅与何则前赴涿州。英政府授予驻华公使窦纳乐以便宜行事之大权，沙俄、美、德等国政府也先后授予格尔思、康格、克林德等使节以同样权力。
6月8日	五月十二日	沙俄派兵四千人赴天津。 杨寿臣率拳民数百自安次县入津，于三义庙建总坛。
6月9日	五月十三日	窦纳乐致电大沽口英国东亚舰队总司令海军中将西摩尔率军进京。
6月10日	五月十四日	西摩尔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共两千余人分批乘火车自津赴京。
6月11日	五月十五日	日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出永定门迎候西摩尔联军，在永定门外为董福祥部甘军所戕。
6月12日	五月十六日	西摩尔联军中午抵达廊坊。 拳民继续大批入京，开始焚烧教堂。各国公使照会清政府，声称“各国之兵现已决计入京，我等无力阻止，深为贵国惋惜”。
6月14日	五月十八日	义和拳与西摩尔联军血战廊坊。 上海英领事霍必澜向英政府建议，由英与两江总督、湖广总督达成谅解，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
6月16日	五月二十日	西摩尔联军承认“远征在事实上已经失败”，暂停由铁路前往北京，大沽口列强舰队司令向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交出大沽炮台。慈禧太后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剿”抚问题。是夜三鼓，江苏粮道罗嘉杰把事先弄到手的由列强公使委托丁韪良起草的所谓“太后归政”四条送呈荣禄，荣禄在17日晨上奏慈禧太后。
6月17日	五月二十一日	刚毅自涿州返回北京。 列强侵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占据大沽炮台。 下午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慈禧声称得洋人照会四条，讳言“归政”，但声言决战，经18、19日的三次、四次御前会议后，决定宣战。
6月18日	五月二十二日	孙中山、陈少白等至香港，准备在粤举事。 义和拳及爱国官兵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与敌军激战。

6月19日	五月二十三日	丁韪良于是日将其所谓“太后归政”四条正式送呈各国公使。 西摩尔联军确定退兵，本日自杨村向天津撤退。 德国工人阶级政党报纸《前进报》发表《铁拳》的社论，赞扬义和拳是“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
6月20日	五月二十四日	列强联军发布《大沽宣言》与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 德使克林德在东单为虎神营章京恩海所戕。 义和拳与董福祥甘军及武卫中军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
6月21日	五月二十五日	清政府发布《宣战诏书》；明令嘉奖义和团为“义勇”，并令各省督抚“召集成团，籍御外侮”；任命英年、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
6月22日	五月二十六日	西摩尔联军于溃败途中占据天津西沽武库，得到武器，军火和食物的供应，挽救了他们全军覆没的命运。
6月23日	五月二十七日	清政府派载勋、刚毅等“统率”义和团。刘坤一、张之洞、王之春、盛宣怀等联合电奏，力主“剿”团乞和。 上海领事团应联军大沽方面司令官的请求在上海布告《大沽宣言》。
6月25日	五月二十九日	慈禧太后命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使”，并于北御河桥竖立“钦奉懿旨，力护使馆”木牌。
6月26日	五月三十日	上海道余联沅与盛宣怀等奉刘坤一、张之洞令与列强驻上海领事议定《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及《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
6月27日	六月一日	西摩尔联军退回天津租界。 天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向各国下战书；张德成率“天下第一团”七千人从静海至天津参战。
6月30日	六月四日	天津北洋机器局（东局子）失守。 沈阳义和团发动反洋教和反对中东铁路的斗争。
7月3日	六月七日	美国发布《海约翰通牒》与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清廷一面发布上谕称“中

7月6日	六月十日	外业经开战”，“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一面又致英、俄、日三国国书，请“排难解纷”，致美、法、德三国国书，请“代为解纷，言归于好”。湖南衡阳、清泉二县群众于是日及次日焚毁教堂，法国传教士三人被杀。
7月8日	六月十二日	沙皇尼古拉第二宣布自任俄军侵华总司令，以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为参谋总长，先后动员部队约十八万人，分为四个作战军团，准备入侵中国。河南南阳人民于是日起至九日展开了围攻靳岗教堂之战。
7月9日	六月十三日	清廷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直隶提督武卫前军总统聂士成于天津城南八里台与敌军奋战牺牲。 联军攻占天津北洋军械局（西局子）。 太原教案。
7月10日	六月十四日	赵三多率拳民至临清，围攻小芦教堂。 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四川提督宋庆至津。
7月11日	六月十五日	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激战。
7月12日	六月十六日	沙俄关东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主持联军指挥官会议，定十三日黎明分兵东南两路向天津城发动总攻。 宋庆命所部继马玉昆部于9日晚所开始的在天津屠杀义和团。
7月13日	六月十七日	宋庆、马玉昆和裕禄率部逃离天津，退驻北仓。 厦门“义和会”发出“扶清灭洋”揭帖，召集群众。 盛宣怀委托伍廷芳与华美启兴公司在华盛顿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款额四千万美元。
7月14日	六月十八日	天津失守，帝国主义联军在津大肆抢掠屠杀。 闽浙总督许应騤与英、俄、美、法、德、日、荷七国驻福州领事签订《福建互保协定》。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拟定一份所谓《如何在中国恢复秩序》的意见书，鼓吹组织“联合内阁”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7月15日	六月十九日	英政府强调“现在保全中国，准视各疆臣之能守靖地方与否”为断。

		北京义和团杀死清军副都统神机营翼长恒庆。
		直鲁边区各地拳民始攻景州朱家河教堂，数日后在爱国官兵的协助下破之，是拳民们在京津以外地区的最大的一次战斗。
7月16日	六月二十日	李鸿章自广州启程北上，于18日途经香港，与港督卜力会谈。
7月17日	六月二十一日	俄军从是日起至21日发动了惨绝人寰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惨案。荣禄下令停攻使馆，并馈赠西瓜水果。拳民围攻景州朱家河教堂，三日后破之。
		孙中山在香港舟中开会，布署郑士良惠州起义事宜。
7月19日	六月二十三日	义和团攻打萨拉齐二十四顷地教堂。成都将军焯哈布、川督奎俊告示，贯彻《东南互保章程》，保护教士商人。
7月21日	六月二十五日	浙江衢州人民攻打教堂，杀死传教士和知县。
		李鸿章自广州到上海，迁延观望，暂不北上。
7月26日	七月一日	唐才常等召集维新人士八十余人于上海张园开“中国国会”，推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
		慈禧太后召见李秉衡，令帮办武卫军事务，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诸军均归节制。
7月27日	七月二日	李鸿章电邀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吴克托来华，两个月后即9月29日，吴克托至上海。
		德皇威廉第二在不来梅向来华侵略军发表著名的血腥的《匈奴演说》。
7月28日	七月三日	清廷杀许景澄，袁昶。
7月30日	七月五日	敌军在天津成立“天津都统衙门”。俄军分别侵占海拉尔，瑛春、三姓（今依兰）及辽阳等地，大肆烧杀。
		天津关税务司德璀林与英商胡华私订《出卖开平矿务局合同》。
7月31日	七月六日	四川富顺县自流井人民捣毁豆芽湾、两口塘二处教堂。
		清廷以调“前敌打仗”为名，骗团民出京，然后“里外夹打”，以“半抚半剿”之阴谋来消灭拳民主力。

8月1日	七月七日	沙俄军攻陷黑河屯及盖平县城。
8月4日	七月十日	日、俄、英、美、法、德、意、奥八国联军一万八千余人自天津出发，向北京进军。
8月5日	七月十一日	俄军占营口及瑗珲城。 敌军占北仓，败裕禄、宋庆、马玉昆及直隶提督吕本元。
8月6日	七月十二日	德皇威廉第二电尼古拉第二，推荐瓦德西元帅任侵华联军总司令。
8月7日	七月十三日	敌军占杨村、裕禄自杀于蔡村。 清廷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
8月9日	七月十五日	唐才常自立军前军统领秦力山起兵安徽省，占领大通，于11日失败。
8月11日	七月十七日	清廷杀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 敌军攻通州张家湾，李秉衡兵败自杀；次日通州失守。
8月12日	七月十八日	通州失守。
8月14日	七月二十日	联军入北京，大掠。
8月15日	七月二十一日	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西遁。
8月17日	七月二十三日	英国派来的印度军队在上海登陆；次日法国水兵也在上海登陆。 阎书勤在黎园屯被清军捕获，19日在临清遇害。
8月19日	七月二十五日	联军统帅瓦德西离柏林东来。
8月22日	七月二十八日	自立军起义事泄，张之洞逮捕唐才常等，并于是夜把他们杀害。
8月23日	七月二十九日	《义和团和约二十五款》，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
8月28日	八月四日	俄军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将军寿山自杀。
8月		赫德写成《北京公使馆：一个民族起义和国际事件》的论文，认为维持清廷的统治比瓜分好，并在8月30日的一封信中说：“中国很有可能使各国联军遭到拿破仑在莫斯科的命运”。
9月3日	八月十日	奕劻自宣化返北京，任议和大臣，英日派兵迎护。
9月7日	八月十四日	慈禧太后发布“剿办”义和团谕旨，认“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
9月15日	八月二十二日	《京津时报》发表了丁韪良起草的所谓“太后归政”四条的原文，即所谓中国的《重建问题》。

9月18日	八月二十五日	李鸿章自沪抵津。 德国照会各国，主张先“惩凶”，后议和。
9月20日	八月二十七日	以顺直各属拳民聚集之所，尚有三十余州县，命各统兵大员“剿办”。
9月21日	八月二十八日	俄军侵入吉林省城，23日侵入奉天牛庄。
9月27日	闰八月四日	联军统帅瓦德西到天津。
9月29日	闰八月六日	俄军占辽阳。
9月		中国留日学生在横滨《开智录》上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可能是在本月前后。
10月1日	闰八月八日	俄军侵入沈阳（奉天府），至是东三省的主要城镇和交通线归沙俄强占。 英军占山海关。 慈禧太后离太原赴西安。 李鸿章在天津接任直隶总督。
10月4日	闰八月十一日	法国提出和议条款六点。
10月8日	闰八月十五日	革命党人郑士良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至22日失败。
10月11日	闰八月十八日	李鸿章自天津抵北京。
10月13日	闰八月二十日	法军占保定。
10月16日	闰八月二十三日	《英德协定》与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
10月17日	闰八月二十四日	联军统帅瓦德西到北京，设司令部于仪銮殿。
10月18日	闰八月二十五日	法军占正定。 刚毅病卒。
10月23日	九月一日	美国伟大作家马克·吐温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讲演中公开声明说：“我也是个义和团员”。
10月26日	九月四日	慈禧太后抵西安。
10月28日	九月六日	革命党人史坚如炸署两广总督德寿，次日被捕，11月9日死难。
11月8日	九月十七日	盛京将军增琪与阿列克谢耶夫订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九条》。
11月13日	九月二十二日	沙俄外交、财政、陆军三大臣制定《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于12月17日经沙皇批准。
11月19日	九月二十八日	德、意侵略军占张家口。 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吴克托到北京。

11 月 21 日	九月三十日	慈禧询李鸿章等谓列强所索各条“有无万不能行之事”。
11 月		赫德写成《中国和重建》的论文。
12 月 10 日	十月十九日	联军组织“管理北京委员会”。
12 月 16 日	十月二十五日	联军占直隶束鹿县，遭到人民的英勇抗击。
12 月 22 日	十一月一日	英、俄、德、美、法、日、意、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十一国公使联合向奕劻、李鸿章递交《议和大纲》十二条。清政府于 27 日同意接受。
12 月 24 日	十一月三日	列宁《中国的战争》一文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
12 月 30 日	十一月九日	中俄签订《天津租界条款》。
12 月 31 日	十一月十日	德军将枪杀克林德之虎神营章京恩海于崇文门内“枭首示众”。
1901 年		
1 月 2 日	十一月十二日	清政府以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商办接收东三省事宜。
1 月 15 日	十一月二十五	奕劻、李鸿章在《议和大纲》十二条上正日式签字画押。
1 月 17 日	十一月二十七日	维特向杨儒口头提出关于满蒙及中国北境草案十三条。2 月 16 日拉姆斯多夫又向杨儒提出书面约款十二条。
1 月 18 日	十一月二十八日	清政府宣布《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无效，并将增祺交部议处。
2 月 14 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	清政府发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保证把自己作为向列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一个开着的商店”。
		电旨查销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日以后的诏旨。
光绪二十七年		
2 月 21 日	一月三日	清政府接受了列强要求处死的十二人名单，即：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书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等；到 4 月，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共达 142 人之多。
2 月 25 日	一月六日	日本进步作家青柳猛在《女学杂志》上发表《义和团赞论》一文。
3 月 15 日	一月二十五日	上海爱国人士集会张园，坚决反对签订

		俄约，“以我之疆土入彼版图”。
3月20日	二月一日	《开智录》第六期出版，载有郑贯一《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
3月23日	二月四日	英、法、德、日四国公使组成“中国财源调查委员会”，认为中国能够满足总数达五千万或六千万镑的赔款要求。
3月24日	二月五日	杨儒拒签俄约。
4月1日	二月十三日	东北忠义军在通化袭击俄军。
5月10日	三月二十三日	秦力山等在日本之《国民报》（月利）创刊，为最早提倡反清革命的刊物。
5月11日	月二十四日	奕劻、李鸿章照会列强公使，接受四亿五千万两赔款总额的要求。
5月23日	四月六日	德皇威廉第二电召瓦德西回国，并转告各国政府取消他所担任的联军总司令职务。
5月26日	四月九日	清政府照准各国赔款四百五十兆两、四厘息。
6月3日	四月十七日	瓦德西离京赴津，转道日本归国。
6月15日	四月二十九日	直隶深州人民组织联庄会，打出“扫清灭洋”旗帜。
6月20日	五月五日	四川红灯教贴出揭帖，号召“灭清剿洋兴汉”。
8月8日	六月二十四日	八国联军从北京撤退完毕。
8月12日	六月二十八日	冀中义和拳三千人在祁子刚等人领导下占雄县王家场，击退清军梅汝仪部。
9月7日	七月二十五日	奕劻、李鸿章和十一国公使在北京正式签订《辛丑和约》十二款及其十九个附件。
9月17日	八月五日	侵据天津和直隶各地的联军开始撤退。
10月6日	八月二十四日	慈禧太后自西安启程回京。
11月7日	九月二十七日	李鸿章在沙俄强迫签订《华俄道胜银行协定草案》七条的恫吓催促下病死，以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
11月22日	十月十二日	直隶广宗县东召村景廷宾聚众抗拒摊派教案赔款，受到附近南宫、威县等各县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1902年		
1月7日	十一月二十八日	慈禧太后还京入宫。
1月30日	十二月二十一日	《英日同盟》在伦敦签订，期限五年。
	光緒二十八年	
3月3日	一月二十四日	清军至广宗镇压人民，发生东召村之战。

4月8日	三月一日	中俄在北京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四条。
4月23日	三月十六日	景廷宾移营巨鹿县厦头寺，赵三多率义和拳参加，树“扫清灭洋”旗帜，建立各级联庄会组织，但仍以广宗县件只村为根据地。
5月8日	四月一日	件只村之战，段祺瑞、倪嗣冲等于次日破件只。景廷宾南下转战至成安被捕，7月25日在威县就义，赵三多则北上转战至南宫，于南宫狱中绝食牺牲。
1904年2月	光绪二十九年日	俄战争爆发，于1905年9月5日双方签订十二月订《朴茨茅斯条约》，战争结束。
1905年8月20日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正式成立大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选举孙中山为总理。
1911年10月10日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	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二、1895—1902年清政府出使各国大臣（公使）名单

1. 英国

龚照璠	1893年11月—1897年4月
罗丰祿	1897年4月—1902年5月
张德彝	1902年5月—1905年12月

2. 俄国

许景澄	1891年2月—1897年5月
杨儒	1897年5月—1902年2月
胡惟德	1902年7月—1907年10月

3. 法国

龚照璠（兼）	1893年11月—1895年12月
庆常	1895年12月—1899年9月
裕庚	1899年9月—1902年12月

4. 美国

杨儒	1893年9月—1897年4月
伍廷芳	1897年4月—1902年10月

5. 德国

许景澄 (兼)	1891 年 4 月—1897 年 1 月
吕海寰	1897 年 1 月—1901 年 12 月
荫昌	1901 年 12 月—1906 年 4 月

6. 日本

汪凤藻	1892 年 10 月—1894 年 8 月
裕庚	1895 年 9 月—1898 年 10 月
李盛铎	1898 年 10 月—1901 年 11 月
蔡钧	1901 年 11 月—1903 年 10 月

三、1895—1902 年列强驻华公使名单

1. 英国驻华公使

欧格讷 (Nicholas R. O'Conor)	1892 年 11 月—1895 年 10 月
宝克乐 (W. N. Beauclerk) (署)	1895 年 10 月—1896 年 4 月
窦纳乐 (Sir Claude M. MacDonald)	1896 年 4 月—1900 年 10 月
萨道义 (Sir Ernest M. Satow)	1900 年 10 月—1906 年 9 月

2. 俄国驻华公使

喀希尼 (Count A. P. Cassini)	1891 年 11 月—1896 年 10 月
巴布罗福 (Aleksander Ivanovich Pavlov) (署)	1896 年 10 月—1898 年 11 月
格尔思 (M. N. deGiers)	1898 年 11 月—1901 年 9 月
雷萨尔 (P. M. Lessar)	1901 年 9 月—1905 年 3 月

3. 法国驻华公使

施阿兰 (A Gérard)	1894 年 3 月—1897 年 7 月
吕班 (G. Dubail) (署)	1897 年 7 月—1898 年 3 月
毕盛 (Stéphan Jean Marie Pichon)	1898 年 4 月—1901 年 5 月
鲍渥 (Paul Beau)	1901 年 5 月—1902 年 6 月

4. 美国驻华公使

田贝 (Charles Denby)	1885 年 10 月—1898 年 7 月
康格 (Edwin H. Conger)	1898 年 7 月—1905 年 5 月

5. 德国驻华公使

绅珂 (Freiherr Schenckzu Schweins-berg)	1893 年 7 月—1896 年 6 月
海靖 (Herrvon Heyking)	1896 年 8 月—1899 年 5 月
克林德 (Baron Clemens Ketteler)	1899 年 7 月—1900 年 6 月
穆默 (Freiherr Mummvon Schwarzenstein)	1900 年 11 月—1906 年 4 月

6. 日本驻华公使

小村寿太郎 (Jutaro Komura) (署)	1893 年 11 月—1895 年 5 月
林董 (Tadasu Hayashi)	1895 年 5 月—1896 年 11 月
内田康哉 (Yasuya Uchida) (署)	1896 年 11 月—1897 年 6 月
矢野文雄 (Fumio Yano)	1897 年 6 月—1899 年 11 月
西德二郎 (Tokujiro Nishi)	1899 年 11 月—1900 年 1 月
小村寿太郎 (Jutarokomura)	1900 年 1 月—1901 年 11 月
内田康哉 (Yasuya Uchida)	1901 年 11 月—1902 年 10 月

7. 意大利驻华公使

巴尔迪 (Alessandro Bardi)	1894 年 5 月—1896 年 10 月
威达雷 (Guide Amedeo Vitale) (署)	1896 年 10 月—1897 年 5 月
萨尔瓦葛 (Marquis Giuseppe Salva-go-Raggi) (署)	1897 年 5 月—1898 年 10 月
马迪纳 (Renatode Martino)	1898 年 10 月—1899 年 3 月
窦纳乐 (Sir Claude M. MacDonald) (代)	1899 年 3—6 月
萨尔瓦葛 (Marquis Giuseppe Salva-go-Raggi)	1899 年 6 月—1901 年 9 月
罗玛纳 (Baron C. Romano Averzance) (署)	1901 年 9 月—1902 年 4 月

8. 奥匈帝国驻华公使

古典和福 (Heinrich Coudenhove) (署)	1893 年 7 月—1895 年 1 月
比田布禄古 (Christoph Graf)	1895 年 2 月—1896 年

Wyden-bruck)

讷色恩 (Arthur Eldervon 1896年11月—1897年4月
Rosthorn) (署)

齐幹 (Moritz Freiherrvon 1897年4月—1906年3月
Czikann)

9. 比利时驻华公使

陆弥业 (H . G . Loumyer) 1891年6月—1896年4月

米师丽 (Charles Michel) (署) 1896年4月—1896年9月

费葛 (Baron Carlde Vinckde 1896年9月—1899年4月
DeuxOrp)

贾尔牒 (E . de Cartierde 1899年4月—1900年5月
Marchienne) (署)

姚士登 (Maurice Joostens) 1900年5月—1904年7月__

10. 荷兰驻华公使

绅珂 (Freiherr Schenckzn 1894年11月—1895年10月
Schweins-berg) (代)

克罗伯 (F . M . Knobel) 1895年10月—1901年

罗敦 (Jonkherr John Loudon) 1901年—1902年1月
(署)

欧登科 (W . J . Oudendyk) (署) 1902年1月—1903年10月

11. 西班牙驻华公使

梁威理 (J . Llaberia) (署) 1894年7月—1895年9月

葛络幹 (B . J . deCologan) 1895年9月—1902年1月__

贾思理 (Don Manuel de Carcery 1902年2月—1910年4月
Salamanca)

四、从中日 甲午战争至庚子赔款时期

清政府所借外债表__

(见下页表)

年 月	借款名称	借款者或经手人	贷款者	款 额		利率	折扣
				借款额	实收额		
1 . 1894 年 9 月	上海洋商 借款	闽台巡抚 邵友濂	上海洋商	规元 500000 两 (456204.38)	规元 500000 两 (456204.38)	7%	
2 . 1894 年 11 月 2 日	津榆铁路 借款	津榆铁路 督办	汇丰银行	行平银 200000 两 (193760.90)	行平银 200000 两 (193760.90)		
3 . 1894 年 11 月 9 日	汇丰银款	总署	汇丰银行	库平银(10000000 两)	库平银 9945255.47 两	7%	
4 . 1895 年 1 月 26 日	汇丰磅款	总署	汇丰银行	英金 3000000 磅 (18653961.78)	英金 2865000 磅 (17118870.50)	6%	95.5%
5 . 1895 年 6 月 20 日	瑞记借款	南洋大臣 张之洞	德国国家银行(瑞记洋行经手)	英金 1000000 磅 (6217987.26)	英金 960000 磅 (5736166.03)	6%	96%
6 . 1895 年 6 月 28 日	克萨镑款	张之洞与 龚照璠(驻 英公使)	伦敦克萨银行(麦加利银行经手)	英金 1000000 磅 (6217987.26)	英金 955000 磅 (5706290.17)	6%	95.5%
7 . 1895 年 7 月 6 日	俄法借款	总署	俄法辛迪加	法金 400000000 法郎 (98968369.82)	法金 376500000 法郎 (90517516.50)	4%	94.125%
8 . 1896 年 3 月 23 日	英德借款	总署	德英银行总会	英金 16000000 磅 (97622400)	英金 15040000 磅 (91425152.5)	5%	94%
9 . 1896 年 2 月 7 日	津芦铁路 借款 1	津芦铁路 督办胡燏 芬	汇丰银行德 华银行	英金 400000 磅 (2440560)	英金 390000 磅 (2379546)	5%	97.5%
10 . 1896 年 10 月 23 日	津芦铁路 借款 2	胡燏芬	汇丰银行	行平银 400000 两 (387521.8)	行平银 400000 两 (387521.8)		

年 月	借款名称	借款者或经手人	贷款者	款 额	
				借款额	实收额
11 . 1897 年 6 月 8 日	津芦铁路 借款 3	胡燏芬	汇丰银行	库平银 300000 两	库平银 300000 两
12 . 1897 年 12 月 3 日	津芦铁路 借款 4	胡燏芬	汇丰银行 麦加利银行 华俄道胜银行	行平银 200000 两 行平银 200000 两 行平银 200000 两 (581282.7)	行平银 200000 两 行平银 200000 两 行平银 200000 两 (581282.7)
13 . 1898 年 3 月 1 日	英德续借 款	总督	德英银行总会	英金 16000000 磅 (112776779.78)	英金 13280000 磅 (80727077.71)
14 . 1898 年 3 月 24 日	关内外铁 路借款 1	关内外铁 路督办胡 燏芬	英国银公司	规元 200000 两 (1842817.52)	规元 200000 两 (1842817.52)
15 . 1898 年 3 月 24 日	关内外铁 路借款 2	胡燏芬	华俄道胜银行	行平银 400000 两 (387521.8)	行平银 400000 两 (387521.8)
16 . 1898 年 10 月 10 日	关内外铁 路借款 3	胡燏芬	汇丰银行	英金 2300000 磅 (16211622.09)	英金 2070000 磅 (13797326.5)
17 . 1898 年 6 月 26 日	卢汉铁路 借款	督办中国 铁路大臣 盛宣怀	比国铁路公 司	法金 112500000 法郎 (30425864.36)	洋例银 30266230.99 两 (28410993.14)

年 月	借款名称	借款者或经手人	贷款者	款 额		利率	折扣
				借款额	实收额		
18 . 1899 年	秦皇岛购地借款	路矿督办张翼	英商墨林公司	英金 200000 磅 (1351175.09)	行平银 1400000 两 (1356326.29)		
19 . 1899 年 8 月 15 日	萍乡煤矿借款	湖广总督张之洞	德商礼和洋行	德金 4000000 马克 (1329281.05)	库平银 1300000 两	7%	
20 . 1900 年 7 月 13 日	奥汉铁路借款	张之洞、盛宣怀及两广总督德寿	美国合兴公司	美金 6974000 元 (9455816.46)	美金 5999000 元 (7133846.13)	5%	90%
21 . 1900 年 8 月 4 日	沪沽新水线借款	中国电报盛宣怀	英商大东公司 丹商大北公司	英金 210000 磅 (1375886.17)	英金 210000 磅 (1332689.4)	5%	
22 . 1900 年 12 月 26 日	沪沽副水线借款	盛宣怀	大东公司 大北公司	英金 48000 磅 (314488.27)	英金 48000 磅 (30461472)	5%	
23 . 1900 年 8 月 24 日	湖广借款	张之洞	汇丰银行	英金 75000 磅 (491387.92)	洋例银 50704225 两 (475961.94)	4.5%	
24 . 1901 年 6 月	奉天借款	奉天借款	华俄道胜银行	沈平银 280000 两 (269230.77)	沈平银 280000 两 (269230.77)	8%	

年 月	借款名称	借款者或经手人	贷款者	款 额		利率	折扣
				借款额	实收额		
25 . 1901 年 9 月 7 日	庚子赔款借款	总署	俄、德、法、英、日、美、意、比、奥、荷、西、葡等国内计： 百分比 俄 28.97 德 20.02 法 15.75 英 11.25 日 7.73 美 7.32 意 5.92 比 1.89 奥匈 0.89 荷 0.17 西 0.03 葡 0.02 挪威与瑞典 0.01 其他 0.03	关平银 450000000 两 (45760500 两) 关平银 (两) 130371120 90070515 70878240 50620545 34793100 32939055 26617005 8484345 4003920 782100 135315 92250 62820 149670		4%	

五、19 世纪 90 年代初期清政府岁入岁出一览表

收入	
田赋	25088000
漕粮	6562000
盐税（包括盐厘）	13659000
商口厘金税	12952000
关税（一八九三年）	212989000
地方关卡收入	1000000
对国内鸦片征收的税和厘金税	2229000
杂税、捐纳和“贡献”等	5500000
合计	库平银88979000两
支出	
中央政府行政费用、皇室津贴和满洲戍军军饷	19478000
海关行政费用	2478000
公共工程	1500000
现代化军队、沿海防务	8000000
满洲防务	1848000
甘肃和中亚的军政和军务开支	4800000
北洋水师	5000000
南洋水师	5000000
铁路建设	500000
广西、贵州和云南三省拨款	1655000
各省行政费用，各省军队	36220000
偿还外国贷款的本利	2500000
合计	771,882,200两
